

柳南文史汇编

第 1~5 辑

政协柳州市柳南区委员会
2010年10月

柳南文史汇编（第 1~5 辑）

政协柳州市柳南区委员会 编

广西区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号：№ 0002670

柳州太奇高印业有限公司承印

二〇一〇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889×1230 1/32 17印张 插页 1页

字数 539.6千字 印量 550册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柳南文史汇编》编纂委员会机构及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主 任 蒙凤生

副 主 任 申西光 胡火生 唐尚献 张智铁

委 员 覃宣贤 朱建修 周佩琴 周祖广

张兆海 陈玉英 朱柳军 王家成

执行主编 唐尚献

执行副主编 周佩琴

校 对 张兆海 朱柳军 王家成 张 林

韦善香 蒋晓梅 江 云

校 审 唐尚献 周佩琴 龙家泰

汇编说明

征集出版文史资料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惠及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自1988年11月至2006年止，柳南区政协历经六届，出版文史11辑。除第11辑文史因新近出版，保存尚好外，其余1—10辑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不善，经历1996年柳州“7.19”特大洪涝浸泡等诸多原因，仅存下来的书籍已残缺不全，字迹模糊，不便成套长久保存。为了抢救、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启迪后人，2009年7月柳南区七届政协决定，组织力量对前已出版的1—10辑《柳南文史资料》进行汇编成册。

一、汇编后书名定为《柳南文史汇编》。由于汇编后，书稿太厚，因此分两册，第1—5辑为一册；第6—10辑为一册，结集出书。

二、《柳南文史汇编》规格大32k，14.8（宽）cm×21（高）cm，页面字数29字×29行排版（原书规格为小32k，26字×26行排版）。

三、为了保持原貌，《柳南文史汇编》对每辑的目录和文章均照原稿分类按顺序编排。每辑的编委名单、准印证号、出版时间均继续保留，分别附在每册封底内页。同时对原稿中记载不详、有缪误的资料，经查证核实后进行了更正；对部分明显的文字错误也作了修改。但对一些字迹模糊、自相矛盾，至今已无从考证的资料仍然照录。

四、《柳南文史汇编》对每辑的“补白”部分，采取有选择的保留。一些有史料价值、署名的补白内容继续保留，按照顺序编排该辑的最后。其余没有太大意义、从其它书刊摘抄的补白内容不再录入汇编。

五、与文史资料保存无关的内容也不再收入汇编。如第七辑中论文类的文章“浅谈如何从政协文史的角度去征集资料”，第三、第四辑中的“柳南文史资料征稿启事”等，不再收录。一些图片由于模糊不清，也无法录入。

编者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辑

柳南区概况····· 刘锡香 (1)

地下斗争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胡习恒 (4)

铁道烽火····· 王椿湘 (7)

机务段工纠队护路护厂迎解放····· 周 正 韦兑现 (16)

铁路史话

广西筹建铁路经过····· 梁志强 (18)

军事话旧

标营事略····· 曾宪荣 (24)

航校在柳州成立之缘由及盛况····· 梁志强 (26)

兴建柳州机场的回忆····· 曾宪荣 (30)

桂系空军袭击长征红军始末····· 梁志强 (34)

抗战春秋

防空警报声中····· 陈铁生 刘汉忠 编写 (38)

一九四五年柳州光复之真相····· 梁志强 (42)

抢劫金银

李品仙强抢柳州中行黄金光洋运桂经过····· 陈兴让 (49)

文物考证

陆道岩的重新发现····· 潘朝业 (52)

张公岭张公考····· 潘朝业 (56)

柳州水火

柳州经过多少次水灾····· 练敏公 (59)

一九四四年的南站街大火····· 汉忠 铁生 (62)

寺庙修建

灵泉寺的复建者——释愿修····· 韦明生 整理 (65)

学生运动

抗战胜利后的柳州学生运动····· 董咸熙 (67)

广西大学学生在柳州的“返梧”运动····· 石宝熙 (72)

文化教育

解放前的柳州香山慈小····· 赵 焰 (75)

柳州市第二工人中学的始末····· 巫帮隆 (79)

《屏山小学校名辩证》的辩证····· 刘锡香 (82)

中外人物

胡志明在柳州····· 陈铁生 刘汉忠 (84)

柳州史事人物丛考(二则)····· 陈铁生 刘汉忠 (89)

戴叔伦过柳州题诗····· 司马宓 (92)

徐霞客游柳日程志略····· 潘朝业 (94)

柳州风貌

柳州八景与八景诗····· 陈显达 (97)

鹅岗桥建桥始末····· 黄河究 刘思孝 (98)

解放前柳州的牛市····· 陈显达 (99)

解放前柳州的谷米市场····· 董光熙 (100)

故事传说

杨家将在柳州的古迹和传说二则····· 黄太茂 (102)

竹鹅溪的传说····· 刘锡香 (104)

补白

关于华丰湾名称的来历·····	刘锡香 (105)
柳州大水·····	小 秋 (105)
附：柳南区地名图（编排在本书最后一页）	

第二辑

柳南交通

广西协筑湘桂黔桂铁路之经过·····	梁志强 (109)
柳州公路发展简史·····	梁昌权 (116)
解放前柳州民航史略·····	梁 辛 (118)

柳南绿化

柳州最早的苗圃及其它·····	士 弓 (124)
-----------------	-----------

柳南文史

黄绍竑筹划在柳州建省会详情·····	梁志强 (127)
谷埠设卡之起因及裁撤时间·····	士 弓 (135)
柳南最早的农贸市场·····	刘锡香 (137)
柳南区名胜古迹·····	刘锡香整理 (142)
螺蛳塘的今昔·····	黄立建 (145)

地理与民俗

柳州地名考·····	潘朝业 (146)
桂中壮族民俗志·····	潘朝业 (159)

乡贤史略

龙城乡贤王浚中简介·····	陈铁生 刘汉忠 (170)
柳州籍清代名臣、台湾知府杨廷理传略··	陈铁生 刘汉忠 (172)
柳州史事、人物三则·····	陈铁生 刘汉忠 (180)
马平王拯的由来·····	陈佚生 (184)

柳州文史

- 柳宗元在柳州种竹····· 潘朝业(187)
柳州被炸知多少····· 梁志强(189)
罕见的警员潜逃事件····· 梁 辛(200)

文化教育

- 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情况····· 董咸熙(203)
高沙锣鼓····· 张兆金(206)

补白

- 柳州的“力行工会”····· 小 秋(208)
一张白纸飞过街····· 汀 汀(208)
谷埠码头高又高····· 辛 辛(209)

第三辑

工厂史话

- 柳州市冷柜厂····· 韦柳盛(213)
柳州第二空气压缩机总厂经济发展史····· 田茂琳(226)
柳州微型汽车厂史略····· 范绍赓(239)
美陶充满民族情····· 胡光裕(244)
柳州机车车辆工厂发展简史····· 李达成(249)
柳州市造漆厂的几度变迁····· 冯光祥(257)
柳南区工业史话····· 刘锡香(260)

铁路·车站史

- 前进中的壮乡铁路····· 欧阳巩(264)
柳州火车站的发展概况····· 严 庸(267)

柳南区史料

- 柳州的第一座无线电台····· 彭 澎 (272)
柳南区教育史话····· 刘 信 (273)
柳南区著名的民间文艺团体及名艺人····· 伍 香 (275)
柳南辖区解放前后医疗卫生状况····· 伍齐信 (277)

能工巧匠

- 陆老二米粉····· 沙培铮 整理 (284)

壮族史料

- 壮族“老师”考····· 潘朝业 (286)

柳州史事

- 《柳州府志》府、州、马平县秩官补录····· 刘汉忠 (289)
柳州史事拾零····· 铁 音 (302)

补白

- 红庙码头····· 刘锡香 (307)
柳州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民盟的地下活动····· 订 订 (307)
广西制造的第一架飞机····· 容志裕 (308)
第一架滑翔机····· 容志裕 (308)
第一次组织机群飞出外省····· 容志裕 (309)
广西第一架双翼单座战斗机····· 容志裕 (309)
第一颗炸弹试制成功····· 容志裕 (309)
鹅山藏银洞····· 潘朝业 (310)
柳州首次防空演习····· 容志裕 (310)

第四辑

人民公社史

- 南站人民公社的历史回顾····· 姜新和 (315)

工厂史话

- 柳州市红旗机电五金厂发展史····· 柳 生(320)
柳州市综合机械厂史略····· 江 海(322)
柳州市机械修配厂简史····· 江 礼(323)
红旗玻璃仪器厂始末····· 周顺刚(324)
一个草棚工厂的兴起····· 谭丽君(326)
红旗拖拉机配件厂创业史····· 黄淑群(328)
一所草棚小学的变迁····· 姜新和(330)

街道史话

- 柳南区街道史话····· 刘锡香 彭 澎(333)

航空史话

- 柳州航空站史话····· 江功绪(342)

铁路史

- 柳州车站“三变”····· 欧阳玗(350)
焦柳铁路(广西段)建设····· 柳州铁路局工程处(354)
修建焦柳铁路的意义及其他····· 欧阳玗(361)

柳南文史

- 柳南水厂今昔····· 顾读云(363)
鹅山飞瀑见闻····· 梁始菊(365)
鹅岗桥下话沧桑····· 梁始菊(367)
柳南区解放前后文体活动琐谈····· 伍齐信(369)

柳南教育

- 一间朝气蓬勃的完中····· 赵 庆(372)
柳铁五中艰苦创业史····· 伍齐信 于鹏飞(378)
民办鱼峰中学的建校经过····· 卢润民(382)

柳州文史

- 柳州史事拾零(续上辑)····· 铁 音(387)

南明永历朝柳州史事纪略·····	刘汉忠	(390)
廉父贤母育良臣·····	龙城柳	(396)
到过柳州的唐朝僧人浩初·····	金石生	(398)
记解放前的桂柳航空客机·····	陈显达	(400)
象州曾改名“相州”·····	梁始菊	(401)

补白

打烂水桶不敢回·····	汀 汀	(402)
柳州人民生活今昔·····	何 人	(402)
解放前侨家巷的归侨·····	柳 人	(403)
旧时辖区的交通要道·····	南 人	(403)
沉重的代价·····	何 人	(404)
柳州何时有电影·····	汀 汀	(404)
暗河·····	杨再荣	(405)
柳江鱼类·····	柳 人	(405)
哭 嫁·····	柳 人	(406)

第五辑

人民公社史

柳南人民公社组织沿革·····	李燕珍	(409)
柳州市耐火材料厂创业史·····	邓宝芳	(414)
柳州市针织服装厂史·····	李秀琼 谭桂森	(418)
柳州市综合五金厂创业史·····	李秀琼	(421)
我所知道的柳南五金厂·····	沙培铮	(423)
柳南塑料制品厂建厂始末·····	子 燕	(425)
街道卫生医疗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李燕珍 杨立贞	(427)

- 谷埠小学沧桑史·····蔡远征(428)
- 柳南劳动联队建队简史·····孙连亭 李燕珍(430)
- 柳石人民公社的历史简况·····罗 维 刘锡香(432)
- 柳石小学变迁史·····韦家萍 朱禾(438)

建设成就

- 柳州水泥厂·····朱 铿(441)
- 柳州鹅山路立交桥·····韦长文(447)
- 柳铁鹅山公园·····伍齐信(449)
- 红杏一枝出墙来·····柳州一职校 侯建雄(452)
- 柳南辖区“8·31”抗洪救灾实录·····刘春香(458)
- 洪水无情人有情·····美术陶瓷厂(464)
- “8·31”柳江铁路大桥抢险记·····欧阳巩(469)

柳南文史

- 有关“振柳营”一些问题的探讨·····哨 兵(471)
- 华丰湾水碾被拆之经过·····梁镇海遗稿(474)
- 张、覃两派势力在屏山镇之争·····吴 宏(475)
- 接管屏山镇公所前后·····吴 宏(477)
- 湘桂黔铁路局平剧社·····柳南区志办 罗维整理(479)
- 旧时谷埠路的老字号·····陈显达(481)
- 柳州机场接管简况·····伍齐信(483)

街道史话

- 辖区街道史话·····伍齐信(484)
- 柳州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烈士生平简介·····柳南区志办(488)
- 董秀峰·····柳南区志办(489)

柳州文史

- 王拯事迹述要·····刘汉忠(490)
- 柳州文化工作史料剪辑·····于辉云(497)

门头村摩崖石刻、竹鹅村刘炳丞墓碑刻····· 刘 文(504)

柳南大事

柳南区古今事略····· 刘伍罗 整理(506)

补白

芙蓉与薜荔····· 小 秋(514)

小统计····· 方 可(514)

绿 化····· 南 人(514)

柳侯公园····· 小 柳(515)

辖区内的桥····· 上 余(515)

名厂名牌····· 海 工(516)

旧时柳州妇女····· 柳 人(516)

旧歌谣····· 小 君(516)

街道的命名····· 石 谷(517)

古时柳州瘴气····· 伐 西(517)

旧时归侨悲惨遭遇····· 南 人(518)

跋····· 蒙凤生(519)

柳南文史

第一辑

柳南区概况

刘锡香

柳南区位于柳州市西南部，北沿柳江与城中区隔江相望，傍江7.4公里，南依银仔山，群山绵亘，连接羊角山；东邻鱼峰区，西至郊区西鹅乡。地处东经 $109^{\circ} 14' \sim 109^{\circ} 23'$ ，北纬 $24^{\circ} 15' \sim 24^{\circ} 25'$ 之间，面积22.7平方公里。

明、清时代，设马平县于柳江北岸，隶属于柳州府，府治设马平县城。清初，柳江南岸始有“对河圩”（今太平中街一带）与“谷埠”两处农贸市场。另有何家村（今大同巷以北之菜园）与云头岭两个小村，其它地方多为菜园或荒野。今五里卡一带则属一都管辖，总人口约二至三千。

清时，谷埠为谷物重要市场，是柳江南岸人口与财富较集中之地，曾设谷埠团局。南岸各处零星村舍，皆属谷埠团局管辖。局置局董、局丁，以维治安，兼理民事。此一机构，沿至民国二十年未改。

民国二十年（1931年）新桂系统治下的广西实行保甲制，撤销团局，改设区、乡（镇），村（街）。原马平县改为柳江县。全县分为四个行政区，即雍和、大同、中道、维新。雍和即城区，辖滨江、城东、城中、城西、屏山等五镇，当时柳南地区属屏山镇。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撤销区，将乡镇直属县。柳南地区仍属屏山镇。辖区内有云岭街（包括今柳邕路至飞机场），接云街（包括今文笔路、大同巷、维新巷），谷埠上、中、下街（包括今东一巷、东二巷、两闸巷及红庙一带）。今之柳邕二、三街，鹅岗桥，竹鹅及大、小鹅山一带则属文笔乡管辖。

新中国建国后，柳州改市。初，河南仍设屏山镇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属柳州市第三区人民政府。一九五三年，第三区和第四区合并，属第二区政府。

一九五五年撤销区，柳南地区分属第十、十一、十二街道办事处。一九五八年撤销街道办事处，分别划归鱼峰区公所下属的南站、柳南、柳石等三个公社管辖。

一九六一年恢复区公所，柳南区属南站、柳南、柳石三个公社。一九七二年鱼峰区与城中区合并为城区。南站、柳南、柳石三个公社所辖地区未变。

一九七九撤销城区。由南站、柳南、柳石公社大部分合并组成柳南区人民政府。区党政机关驻华丰湾25号。辖五个办事处；即南站、柳南、柳石、鹅山、河西等。下分三十六个居民委员会，地占三十四条街（路），四十一条巷（里）全区有32,213户，141,485人，其中汉族139,996人，余为壮、回、苗、瑶、侗、京、白、黎、满、藏、傣、畲、土家、仫佬、布衣、毛南、蒙古、朝鲜族。

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业生产曾几度有较快发展，三批工厂先后上升为市属企业。现在有区办工厂十二个，另有建筑、供销、服务等三个公司。街道办有厂（组）133个，商业服务网点150个，基建、土方、装卸等专业队三个。

设在区内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共280多个。其中铁道部木材防腐厂、机车车辆厂是铁道部直属企业。柳州工程机械厂、广西十一冶金建设公司、柳州微型汽车厂、第二空压机厂、柳州机电厂、探矿厂、肉联厂、井巷公司、林业基建公司、柳州水泥厂等是自治区直属企业。造纸厂、刀片厂、玻璃厂、冷冻柜厂、钢圈厂、金属回收加工厂、东风瓦厂、钢改厂、微型电机厂、工具厂、铁锅厂、美术陶瓷厂等是市直属企业。农用汽车厂是柳州地区办的企业。柳州铁路局所属企业基本集中于本区。

文教卫生方面，解放前，全区只有“私立香山慈小”和“屏山镇中心校”两所小学，另外铁路亦有“扶轮中学”和“扶轮小学”各

一所。解放后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辖区现有市属六中、十中、十七中、十八中、第一职业高中等六所中等学校。属柳州地区的有：地区高中，地区民族师范学校，技工学校等三所。属柳州铁路局的大中专学校有：铁一中、铁二中、铁三中、铁五中、铁路运输学校、铁路司机学校、铁路电大分校、职工学校等八所。小学有市属八所，铁路局八所。市属幼儿园一所，铁路局幼儿园三所。

文化设施方面，现有市工人电影院、探矿厂电影院以及柳铁下属的工人文化宫、少年宫、鹅山体育场。

解放前，全区没有一个卫生医疗单位，仅谷埠街有两间药房，一些个体中医师行医。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亦有区属医院一所，门诊部三个，运输公司亦有医院一间，柳州铁路局亦有中心医院一间。

柳南区是南来北往的通道，柳州火车站，柳州汽车总站，柳州民航机场等重要交通机构均设在区内。柳州火车站是湘桂、黔桂、枝柳、柳湛四大铁路的交汇点，每日均有通往北京、上海、武昌、昆明、贵阳、南宁、衡阳、湛江等地的十二对直达列车。汽车总站可通向自治区的大部分县、市。柳州民航，目前有班机直飞广州。

区内有柳州八景之一的鹅山和竹鹅溪、张公岭、银仔山、老龙岩、牛仔岩等地可供游览，旅游资源丰富。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胡习恒

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元月在桂林穿山东乡村高天梅同志住地，主持召开广西城市工作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八年的工作，分析了形势，确定了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党的中心任务是认清形势，加强领导，宣传党的政策，巩固和壮大党的组织，培养干部，深入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大胆放手建立和发展群众秘密组织，积极做好迎接解放“里应外合”的准备工作。陈枫同志再三强调：湘桂黔铁路是广西交通的纽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柳州的同志，要迅速把柳铁的建党和群众秘密组织工作搞起来，方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们柳州地下党负责同志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决定把发展柳铁的地下斗争列为一九四九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并决定由胡习恒亲自抓，一定要做出成效。为了开展柳铁的地下斗争，我们对柳铁作了分析，认为湘桂黔铁路工业管理局（柳州铁路局的前身，简称柳铁），管湘桂、黔桂两条铁路干线。铁路局设在柳州市郊的鹅山新村。柳州不但是广西的交通枢纽，而且也是华东、华中通向大西南的铁路交通孔道，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解放战争时期，柳州是国民党加强对铁路指挥和控制的中心。在柳铁除了设有公开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和工会外，尚有属于中统的调查统计室，属于军统的警务处和路警总队等特警机构。他们对路局各部门实行明里和暗里的双重严密的统治。我党在柳铁还是个空白点，党组织尚未建立起来。目前，我们对铁路的职工又不认识，这是我们开展斗争的难度之一。但是我们相信：铁路工人有

“二七”光荣革命传统，思想觉悟高，是一支可靠的产业工人力量，这是我们开展革命斗争的有利条件。要想把铁路斗争的烈火迅速点燃起来，关键是派得力干部去开辟这块处女地，把革命的火种撒进去，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经城工委研究，指派了地下党员刘达尊、胡敬之，党的培养对象罗群、周正等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到铁路去培养党的发展对象，建立起党的斗争据点。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分别在柳铁机关发展王椿湘同志，在水电厂发展老工人陈聚奎同志入党。不久，我又发展罗群和周正两同志入党。组织决定，这四个新党员，由我分别直接联系。从此，在机关、机务段、水电厂等重要单位有了党员在此开展地下活动。他们彼此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党员人数虽然少，却给我们开辟柳铁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短时间的教育后，他们都先后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简称解联会）

王椿湘同志在运输处和会计处先后发展李克勤、江滔、宁宗萼、张之俊、张豪等人为解联会会员，尔后，他们通过党的培养教育和斗争的锻炼，王椿湘同志发展李克勤、江滔、宁宗萼、张之俊、张豪等同志入党。

罗群、周正同志在机务段先后发展苏尚忠、林贵安、温桑恒、覃鼎权、邱冠木、罗长荣等同志入党。

陈聚奎同志在水电厂等处发展张发堂、曹俊兴、魏喜缅甸、张学忠、陈明德等同志入党。

这些同志入党前均事先经过培养教育，本人先写入党申请，经市临时工委审批后才办入党宣誓手续的，入党后仍按单线组织联系，执行党的秘工条例，接受党交给的任务，积极开展工作。

这些党员又在运输处、材料处、工务处、会计处、秘书室、机务处、铁路医院、水电厂和机务段等单位发展陈炽昌、刘慈谦、黄凤雕、吕庆斌、周为砥、孙剑民、黄石渠、江荫璋、谢孔铸、朱次安、罗帮彦、盛桂珍、柏英、田富让、黄念慈、黄伟、陈廷佳、宋吉昌、李金标、林荷达、邓卓然、龚守安、计孝礼、凌剑海、郑侃等（有的会员姓名

记不起了)同志为“解联会”会员。

这些会员同志,加入“解联会”后,在党的领导下,单线联系,接受党的任务,为迎接柳州的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上已崩溃,市场物价飞涨。这时,柳铁路局常常不能按时全额发放工资,铁路广大职工生活困苦不堪。少数职工为了生活,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拿到市场摆地摊出售,有的去打零工。在这种情况下,实难维持家庭生活的开支。三、四月间,以柳铁机务段和柳铁水电厂为主体的铁路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先后四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结果,旗开得胜,迫使路局补发了部分工资,还先后迫使袁梦鸿、王文彦两局长仓惶弃官离去。同年六月,党在机关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的力量壮大了。同年七月中旬,发薪的日期早已过去,而六月份的工资何时能发,还是个未知数。对此,广大职工怨声载道,罢工斗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柳铁地下党负责同志先后向城工委反映了上述情况。经研究决定,要因势利导,积极推动铁路职工参加“索薪”斗争,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放手发展和壮大群众秘密组织,但又要 在斗争策略上注意适可而止,否则,路局头面人物被吓跑了,就可能出现大混乱的局面,对今后我们完整地进行接管铁路增加困难。柳铁的同志认真贯彻这一指示,他们互相协同作战,积极发动职工参加这一经济斗争,以“停工待命”为口号,发动群众参加“索薪”签名活动。结果,当局不得不于八月中旬补发全局职工三个月的欠薪。这次开展的“索薪”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时,国民党极为震惊,他们在补发欠薪的同时,派来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王和华兼任路局局长,并宣布湘桂黔铁路直接受白崇禧管制,从宣布之日起对柳铁实行军管。

自此,党在柳铁开展斗争更加复杂尖锐了。所幸的是:党在柳铁职工中已播下了火种,这“星星之火”,必定会在整个路局熊熊燃烧起来!

铁道烽火

——为庆祝柳州解放三十九周年而作

王椿湘

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现将解放前柳铁地下党在柳州铁路局积极开展地下斗争的几个主要方面回顾如下。

一、一条重要的铁路交通孔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动派为了发动内战，加强对后方铁路的控制，由伪交通部把湘桂、黔桂两个铁路局合并为湘桂黔铁路局，委任袁梦鸿为局长。铁路局设在柳州鹅山脚下，它管辖湘桂、黔桂两条干线，北起衡西，南到来宾、大湾、西达都匀。这条铁路贯通湘桂黔三省，并和粤汉、浙赣等铁路干线相衔接。是从华东、华中通向西南的交通孔道。因此，柳州不但是铁路运输的枢纽，而且成了敌伪控制铁路的重要中心之一。一九四八年底，我党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后，蒋介石表面“引退”，暗中却积极部署撤向川滇，妄图负隅西南，走抗战时期的老路。白崇禧率领的主力部队在华中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也梦想有一条退踞老巢的后路，因而，在解放战争后期，这条铁路对反动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加强对这条铁路的控制，除公开的国民党特别部和黄色工会的极力控制外，尚有中统的调查统计室和军统的伪警务交通总队参与其中。他们除掌握局领导权外，还以“专员”、“客货稽察”、“督察”以及“车长”、“查票员”、“监工”等公开身份对各部门进行严密的特务统治。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局。

对我们来说，如果这条干线能为我掌握、利用，这对打乱反动派在整个后方的作战部署；对我军解放大西南，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这条重要的交通孔道，就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二、打入铁路，建立党的组织

有着“二七”光荣传统的铁路工人，没有被国民党施行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一心向党，早就盼望解放的来临。一九四九年初，我柳州地下党农委，首先在铁路水电厂建立了第一条线（后交城工委领导），继由城工委在柳州机务段建立了第二条线。同年六月，根据斗争的迫切需要，又在湘桂黔铁路机关建立了第三条线。这第三条线统一称为《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党的外围组织），均由城工委单线领导，不发生横的联系。机关这条线是由王椿湘同志发展建立起来的。先后在运输处发展了李克勤、江滔、宁宗尊、陈炽昌、刘之俊等同志；后来在会计处发展了周为砥、张豪等同志、再后又逐步扩大到材料处、电务处、秘书室以及柳州站、铁路医院、材料厂等单位，会员达到四十多人，形成了一条坚强而牢固的战线，在敌人的心脏里，积极而坚定地开展了斗争，为迎接解放，全面完整地接管铁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当年路局机关里，特务、警察林立，党进行地下活动，是十分困难的，稍一不慎就有暴露被捕的危险。为此，城工委对发展党员及其外围组织，制订了《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章程》和《入会申请书》的规定，会员必须同意会章，写出书面申请、由会员一人介绍，经城工委审核批准，才能吸收入会。入会后必须严格遵守地下党的工作纪律，积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对参加地下斗争的人员由组织上给予代号（即化名），实行严格的单线联系领导，不经上级指示，不得发生任何横的联系。党对发展对象的审查是极其严格的，每个对象必须通过长期的接触，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观察了解，（如对反动统治和反动当局的态度，对时局和我党的态度如何等），然后进一步观察其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及其交往的社会关系，在摸清情况确认其政治可靠的基础上，再经过引导教育才个别履行参加手续。上报城工

委批准后，又进一步进行地下工作纪律教育，才具体交代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地下斗争的铁的纪律，保证了斗争的安全和有效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随着斗争的深入，组织逐步扩大，在经过斗争的考验之后，有李克勤、江滔、宁宗萼、张之俊、张豪等五位同志经城工委批准接纳为中共地下党员，逐渐加强局机关这条线的核心领导力量。其余的同志在解放后的工作和生产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不少同志也先后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柳铁机关一线的地下组织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当年的组织路线和组织原则是正确的。

三、摸清敌情指挥斗争

铁路局机关是交通指挥的神经中枢，又是敌特组织控制的重要部位。城工委给我们这条线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开展敌情的调查研究，收集敌伪有关情报和资料，为城工委根据这些情况和资料决定斗争策略、斗争方式，开展部署护厂护路等斗争，并为解放后顺利接管铁路提供可靠依据。我们机关地下组织的四十多位同志，对此任务，全力以赴，发挥了很高的主观能动性。大家利用自己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运用合法与非法的方法，先后收集到大量的资料和情报，经过集中分析，最后归类整理。这些资料中有：伪特别党部组织系统及其骨干名单；中统、军统特务分子分布及活动状况；各处室股长以上人员姓名及其政治表现；铁路主要物资品名数量、规格及存储地点；铁路局会计帐册；技术设备资料；鹅山铁路地区交通平面图（伪路局密件）；还自制了铁路局机关平面布置图等上报城工委。在地下斗争中完成上述任务是十分艰苦而又危险的。从收集、集中、整理到上转，任何一个环节稍有败露，后果都将十分严重。例如收集敌特情况，是在敌人的眼皮下进行的，只能靠日常对周围的人和事的细心观察，从敌特的言行中自觉和不自觉的自我暴露等方面，加以分析、判断作出结论。我们还冒险偷阅一些资料文件，记录汇集起来给领导。尽管这些情报和资料不可能十分完整，却是同志们冒险犯难得来的，这些资料解放后由城工委全部移交给铁路军管会，对解放初期

办理敌伪骨干集训、反动党团登记，以及迅速恢复铁路运输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负责接管的军事代表吴宗鹏，王慕林和负责铁路公安工作的李文运同志都说：由于地下党同志事先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资料，对我们接管这个庞大的铁路企业帮助很大。

四、开展索薪运动组织罢工斗争

开展索薪运动，组织罢工斗争是我地下党领导的一场重大战斗。国民党反动派临崩溃前滥发货币，物价飞涨。路局常常不能按时全额发放工资，铁路职工生活困苦不堪。一九四九年初，衡西铁路工人和桂林铁路工人先后开展了截留站收进款（营业收入不上缴铁路局）和拒不出乘的斗争。三月到五月，在我城工委的领导下，以柳州机务段和水电厂工人为主体，柳州地区铁路工人四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迫使反动当局发放了部分工资，原局长袁梦鸿也因控制不了局面而去职。虽换来了伪行政院长何应钦的小舅子王文彦，但在工人斗争的浪潮中也仓惶去职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时铁路局机关的职工群众都没有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去，这是由于反动当局分而治之造成的。事实上局机关中的低级职员，特别是其中一些正直的，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在我党的政治影响和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有的向往解放区，有的想找游击队。七月中旬，发薪的日期已经过去，六月份的工资杳无消息，这是反动当局连续第三个月没有正式发放工资了，群众无不怨声载道。由于运输处是我党在机关中一个较强的据点，在同志们教育推动下，有一些思想进步，敢于斗争的职员终于发出了“机关也要起来罢工”的呼声。经禀报后，城工委指示，应该因势利导，积极推动机关群众起来参加索薪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应该注意适可而止，避免将头面人物统统吓跑，出现无人负责的混乱局面，这不仅索不到薪金，而且对今后完整地进行接管也不利。根据这一指示，同志们积极串连发动群众，参加以“停工待命”的索薪签名运动，使索薪运动由运输处迅速发展 to 会计处、总务处。反动当局虽千方百计派

爪牙进行阻挠、恐吓，但签名运动的浪潮大有燎原之势，最后扩大到整个局机关，迫使黄色工会不得不同意由各处推选代表，于七月末召开局机关全体大会，（基层单位也推选代表参加）并勒令局、处长到会。大会上，由于反动派的走狗人事处的代表唐振权用花言巧语迷惑了一部分群众，使这一斗争只决定组成代表团赴广州向伪行政院和交通部索薪请愿，未能做出通电罢工的决议。如果我们坚持正式通电罢工，可能使敌人狗急跳墙，疯狂镇压，使刚刚起来的群众受到伤害，使积极分子受到损失，对机关今后的斗争反而不利。为此，我们本着城工委的“适可而止”的指示精神，今后继续秘密串连鼓动群众相约都不上班，这样就使罢工成为半合法化，使敌特无机可乘。这场斗争，终于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于八月份一次补发了全局各单位三个月的欠薪，使斗争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铁路局机关职员起来索薪罢工，是我国铁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它直接影响了反动派在湘桂黔铁路干线上的作战部署，使反动当局极为震动。为了控制局势，反动当局在补发欠薪的同时，派了“华中剿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王和华来兼任局长，宣布湘桂黔铁路局直接受白崇禧司令长官节制，并派遣大批爪牙，对这条铁路实行了军事管制。自此，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了。

五、打入“福利会”，把“应变”组织为我所用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衡宝战役即将结束，白崇禧梦想退踞老巢，负隅顽抗。这时局长又换了桂系将领赖和平作最后挣扎。他一方面召集处、课长以上高级职员开会，决定铁路局在重庆、昆明等地设办事处，满足敌特上层骨干分子有随时逃跑的去路，以此暂时安定他们的恐惧心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另一方面，由桂系特务黄伟芳（伪专门委员、黄旭初的侄儿）和帮会头子张心濂等出面，组织所谓“员工福利委员会”（简称福利会）。这本是敌人为了“应变”，暂时维持局面以掩护其上层人物安全撤退的另外一手。他们为了迷惑群众，打着保护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的幌子，吸收索薪运动中各处代表为委员，借此装点门面。我们认为，如能将计就计，将它掌握过来，使之为我

所用，对完成护厂护路，迎接解放是十分有利的。经请城工委批准，决定由张豪、陈炽昌等同志打进去。他们打进去之后，分管钱粮事宜，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一些具体工作，但实权却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利用公开身份，名义上为福利会四处奔忙，实际上团结了思想进步的职工和杂工班一百多名工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福利会上层人物的接触，摸清了他们“应变”的各种意图和动向。例如警务处给福利会配发一批枪枝、弹药准备撤退时进行对抗破坏之用，结果这批枪支、弹药的数量和存放地点及保管人等机密情况，都为我们所掌握。到解放前夕，福利会的实际领导权已进一步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利用它的公开名义，将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组织纠察队，一方面护路护厂，一方面监视敌特的“应变”动向。在这场应变与迎解放的斗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的主动权。

六、进行统战，组织“策反”，粉碎逃跑逆风

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向广西边境挺进。敌人破坏铁路的阴谋计划正在提前实施。敌特上层骨干准备随时携眷逃跑，有的已预定机票打算飞昆明，有的包车准备撤向贵阳。在临走之前，他们最险恶的手段是煽动职工西撤，散布各种谣言，污蔑我党我军，还挑拨铁路职工与广西人民的关系，弄得柳铁人心惶惶，一股逃跑的逆风顿时吹遍路局上下。他们的目的是不让铁路回到人民的手中。针对敌人的阴谋，我们在打入福利会的同时，积极进行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迎接解放任务迫在眉睫，争取他们靠拢人民留下不走，才能稳定人心，才能维持铁路的正常运转，这确是一场关系到铁路存亡的斗争。根据城工委要求，我们在铁路局物色一些思想比较开放开明，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上层人士，将他们吸收到“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中来。当时任副局长的王之翰是比较合适的对象，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高级技术人员。他和铁道部石志仁副部长有同学之谊，感情亲密。石被我任命为副部长的消息传来，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将他争取过来是有条件的。但当时我们这些低级职员，在旧社会是“人微言轻”，无法和他接触。幸好当时运输处计核课长李劭洪是他的老部属，

关系甚深，来往较密。王椿湘同志和李曾先后两次同事，了解李在历史上没有大问题，经过多次帮助将李争取了过来，然后通过李的关系，由王椿湘同志携带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廖联元对他晓以大义的信件，去作王之翰的工作。王立即表示留下不走，并保证严守秘密。对于铁路局其他处级以上高级职员，凡是政治上没有重大问题的，我们也分别发出告诫信件和约法八章，交代政策，指明前途，动员他们坚守岗位，靠拢人民，负责保护铁路财产和公文档案的安全、完整，准备迎接解放。结果，王之翰和大部分局、处级上层人士都留下不走，带动了职工放弃西撤的想法，使反动派煽动职工逃跑的逆风逐渐平息下来，这对后来铁路能不受损而完整的交回人民手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由军统特务头子史铭控制的铁路警务总队，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队伍。据我们调查资料所掌握的情况，他们并不是“精诚团结”的集体，其内部派系斗争相当尖锐复杂。其中与史铭矛盾较深，积怨较大的人物是驻守鹅山的警二大队队副兼中队长胡久守。胡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资历很深，而史是他的晚辈。由于长期受史的排挤、压制，胡极为不满。这情况使我们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先派张豪、陈炽昌同志以福利会的名义和他们联系，在要求他给工人纠察队配发枪支的商谈中，对他进行试探。这时桂林已经解放，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他正处在彷徨之中，这正是我们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他率队起义的好时机。经请示城工委同意，并研究了“策反”的具体办法。经过陈炽昌同志与他交友和多次接触谈话，向他晓以大义，最后，胡久守决定带队起义，立功赎罪。不久，他将警察总队所有队长以上警官花名册、每个人的政治身份及表现情况，还有每个单位武器配备及存放地点以及兵力部署等写成文字，绘制成图交给我们。他对可靠的下属警官进行串联，并得到他们的响应和支持。我们约定他等候通知，待机起义（因担心其兵力单薄，决定我军逼近柳州城下时起义）。十一月二十五凌晨，我们与他再次接头，他已将起义准备工作做好，待命行动。

李克勤同志立即赶赴市内请示。由于我军进展神速，地下党限

于当时没有现代通讯设备，情况了解不够及时，此时柳北枪声大作，李克勤同志尚未及时返回。特警头目已严令队伍集中到铁路局大楼。胡久守的中队未得到通知，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在史铭大队伍的挟持下，被迫同行。（后来在昆仑关附近被我军缴械，胡久守回到柳州，对人说：“起义不成，无面见共产党”。没有找到我们就回老家江西去了。）策动起义虽然未能实现，但仍然反映了我们的同志，当年为了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深入虎穴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七、黎明前的战斗

十一月中旬，解放大军已经逼进广西北部，捷报不断传来。柳州人民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曙光的时刻就在眼前。张之俊同志负责动员，组织力量，赶编赶写大量的墙报、标语、传单，经过几个彻夜不眠的紧张战斗已经完成。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柳北方向传来了紧密的枪声。反动军警狼狈窜逃。继王杰兵团和伪铁道兵团逃跑之后，伪交警总队全部向机关大楼集中。警特头子史铭下令调集汽车，可是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连小车所有的司机事先已被我们动员带着汽车钥匙分头隐藏起来，急得史铭暴跳如雷。最后，他本人只得以机枪拦路劫持一辆敌军卡车狼狈逃走。他们来不及带走的五十支步枪也全部为我缴获。敌警务总队刚刚逃离之际，我们以五星红旗为报头的墙报、标语和印着约法八章的传单，立即贴遍鹅山各处。群众最担心的是所谓“真空”状态的出现，这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铁路早就有党在这里。因而人心很快就安定下来。这时伪铁道兵爆破队一列满载炸药的装甲车尚停留在局机关后面的铁道上，准备爆破局大楼和南站水塔。市内的枪声越来越近，他们吓得心惊胆战，敌中校指挥官正在观察动静时，恰遇上我们带手榴弹前来贴标语的周为砥等同志。敌中校被这些“土八路”的迅速到来吓得丢魂丧胆躲进涵洞里，经我义正词严地告以不许破坏铁路，并表示可以允许他逃走的话时，他连忙诺诺连声地下令将铁甲车向来宾方向开跑了。铁路局大楼和南站水塔终于完整地保存下来。伪中央军械库的两辆满载炮弹、炸药的铁棚车，由库主任带一个排武装押运，停留在鹅山道口附近个来不及挂运。解放

的枪声使他们万分惊惧。经我们冒险喊话，敌军全部缴械并交出了光洋四千多元。我们将投降敌军安置在铁路局礼堂，下午移交给进驻鹅山的解放军接管处理。此外，我们还收缴了逃窜散兵的步枪三支手枪两支，以及敌军溃逃散落的大量子弹、雷管，炸药、引线等。当我们在鹅山紧张战斗的同时，林荷达同志也团结住在城站附近的群众，日夜守护着铁路材料厂。溃逃的敌军在城站放火点燃了一车炮弹，眼看即将波及连挂的车辆，并可能使整个城站地区夷为平地，这一万分紧急的时刻，他不顾危险，带头冲上列车拉开车钩，将燃烧的炮弹车厢溜放到站外空地上爆炸，保住了城站及其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十一月二十六日，敌机两架轰炸了柳州南站，潜藏的敌特又四处造谣，说什么“国军已从来宾一线开始向柳州反攻”，说什么“红旗飘五星不定”等等。初步稳定的人心又开始浮动起来。我们发觉后，即时以“解放联合会”的名义写了《告全体铁路职工书》和《给铁路局高级职员的一封信》，并印发广为张贴。对敌人的反动宣传进行的揭露和驳斥，使群众识破敌人扰乱人心的阴谋，有些高级职员说：“共产党已经和我们打招呼，今后要看我们自己的行动了”。在军事代表到铁路局接管前十多天的时间里，铁路局机关仍然按时上班，人心安定，城工委领导同志为此对我们进行了表扬，十二月九日，衡阳铁路局派出的军事代表到达柳州进行接管工作，铁路局的全部设备、财产、帐册、档案完整无损的交回人民手中。我们在敌人心里战斗的同志们，和柳州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国灿烂辉煌的新曙光。

机务段工纠队护路护厂迎解放

周正口述 韦兑现整理

解放前夕，柳州地下党为了迎接柳州的解放，号召我们职工要防止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破坏。我们组织了工人纠察队负责护路护厂。机务段工人纠察队由唐盛辉同志负责，车辆场工人纠察队由梁配溪同志负责。我们的任务是防范残敌破坏厂房、机车、机器设备、建筑、桥梁等。当时组织只给我们工人纠察队两支驳壳枪和四发子弹，任务艰巨，困难很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发动过四次罢工，一连赶走了几个伪铁路局长。迎接柳州解放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一九四九年十月间，当解放军已解放湖南，乘胜向广西挺进的时候，机务段伪段长温念一感到末日不远，他正苦于没出路时，柳州地下党城工委胡习恒同志指示纠察队抓住时机，写一条子通知温念一，要他保护好工厂、机车、机器设备的完好，作为立功赎罪的条件。这通知是通过一位倒茶扫地的工人带进他的办公室，压在他办公室桌的玻璃板下的。温见后，自知厄运已临，不敢不答应，便很快回答我们，要求我们列出工人纠察队人员名单，由他发给武器。这时城工委又指示我们，要预防不测，令温念一先列出护厂人员名单给我们，温一一照办。他开了一串名单，其中有他的亲信、打手，我们把他的亲信、打手删掉，留下基本工人，并在名单中补充地下党外围组织的骨干，温念一只好同意。随后我们要他把所有的武器交出来。他的枪支弹药也不多，只有八支步枪，子弹也少，就是手榴弹多一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一并交给了工人纠察队，地下党把这些枪弹武装了

工人纠察队。此后我们一方面严密地监视温念一一伙的行动，一方面日日夜夜保护厂房、机器和设备。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早上，解放军进入柳州城。敌人破坏队开始进行破坏了。他们企图破坏车站水塔（原在今兵站处）。当时地下党的胡习恒同志指令唐盛辉同志带领十个纠察队员从小鹅山洼地赶到铁路附近，准备向破坏水塔的敌人发起攻击时，被敌人发现，他们仓惶破坏水塔便急忙逃跑，再不敢继续破坏其他重要设备。九时许忽闻鱼峰山脚响起枪声，残敌狼狈向南逃窜，柳州解放了。我们工人纠察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护路、护厂做出了一点贡献，也感到无限的欣慰。

广西筹建铁路经过

梁志强

广西抗战之前，铁道交通，迄付阙如。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始进行铺设湘桂铁路。但铁路筹设之酝酿，则远溯于清末。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几经计划筹办，其中五次已经勘测，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没有正式开工。直至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建筑铁路的计划才得以付诸实行。

法国首先觊觎染指

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际甲午战后，法国以退还辽东半岛有功于我，乘机要求从安南（越南）建筑铁路入中国境内的让予权。清廷慑于10年前（一八八五年）中法战役所缔订之中法新约十款中的第七款，明白无误记有：“……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等丧失铁路权利的允诺，只好屈从对方要求，于同年与法国订立如兴筑同登（法属）至龙州铁路，由法商费务林公司承办的条约。

两年后（一八九七年），法国为实现其安南（越南）为根据地，对华兴筑铁路，实现剥削我国西南各省经济利益的计划，派出里昂委员会商业考察团来华踏勘自安南建筑铁路入川的路线，最后确定的路线有二：一系经广西、贵州至重庆；一系经云南至成都。但此二线均因沿途山峦峻峭，工程异常困难，终于使其瞻顾而却步。但法国对西南之用心，则灼然可见矣。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发生世界列强对华的利权争夺战，各国纷纷露骨地要求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俨然有瓜分中国之势。法国因与帝俄为同盟国，对华政策尤为积极，遂乘机取得延长同（登）龙（州）铁路至南宁或至百色，及自广东北海港筑铁路至南宁或别处的权利。同时，积极进行测量同龙铁路，后因满清之亡，没有正式开工建筑。

民国建立后，法国对广西铁路之政策，不但无何变更，而更趋积极。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法国向我索得同成、钦渝，叙成三路投资权。其中钦渝一线即为贯穿广西南北的大干线，其南端起自广东的钦州湾龙门港，向北经广西之南宁与百色，历贵州之兴义入云南昆明，与滇越铁路相衔接，再出四川叙州府以达重庆。如是法国多年希望的侵略西南铁路计划，又获得条约上的依据。至此，其欲犹未足，于同年9月复向我国要求完全独占广西全省铁路投资权利。北京政府竟亦同意称：“本政府今格外表明睦谊，此后广西省内如有修造铁路，或开办矿业之事，如须用外资时，极愿首先借用法国资本。”这样，法国实际已取得垄断广西铁路投资的优先权了。

法国虽然取得对我国西南铁路投资的优先权，但一直没有动工开筑。主要原因为；同龙铁路，在广西境内一段长约60余公里，约需建筑费200余万两，法商费务林公司鉴于滇越铁路所耗工程费极巨，行车收入不敷营养，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暂不兴筑；至于由中法实业银行投资6亿法郎兴建之钦渝铁路，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北京政府财政整理会的报告称，中法实业银行因受欧战影响，未能依约在法国发行钦渝铁路债票，即对先交付垫款一亿法郎的条款，亦未完全履行，仅交付过3,210余万法郎，悉数供财政部移充军政费。其后，中法实业银行亦即停办，此路的建筑遂作罢议。

美国不甘落后乘机挤入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美国裕中公司获悉我国拟开发湘、桂、

粤、鄂、豫等省，马上趁机而入，与北京政府达成由其借款给我国兴筑株（州）钦（州）及周（口）襄（阳）铁路的协议。五月十七日，交通总长曹汝霖与美国裕中公司代表卡利签定借资造路的合同。其中株钦一线，即系联络湘、桂、粤三省，从粤汉铁路的株州站起，经广西之全县、桂林、柳州，历武宣、贵县而到广东之钦州。六月二十七日，此合同呈报大总统袁世凯备案。法国得知后，当即命其驻华公使向我国提出抗议，认为株钦铁路借款权之让予美国，与其既得权益相抵触。北京政府以株钦铁路之终点为钦州而非北海，故以与法国成约无碍为复。九月二十九日，新任交通总长许世英复与裕中公司订定增加附件，旋命路政司长曾鲲化选择路线，曾即选定由湖南株州至钦州之路线。经部会议议决，认为株钦一线于军事商业均有利，外交上亦无妨碍，实为最良之路线，宜积极进行。随即组成株钦铁路工程局，任孙多钰为局长，着手拟定计划书。

此线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开始勘测。全路划为四段；易家湾至宝庆为第一段，宝庆至桂林为第二段，桂林至柳州为第三段，柳州至钦州为第四段。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株钦铁路工程局长孙多钰正式向交通部呈报全线总报告书。内称：“第一段至第三段已经用仪器细测，第四段只从事勘测。”第一段平均每英里需银 143,980 元；第二段平均英里需银 146,607 元；第三段平均每英里需银 159,474 元；第四段柳州至贵县平均每英里需银 128,089 元；贵县至钦州平均每英里需银 132,828 元。”报告书同时指出，此路通车以后，“收入必致有绌而无赢”，“预计全线收入平均每英里约有 12,503 元，除去资本利息和行车费用，一年之间损失之数，平均每英里约为 3,149 元，合全线计之，每年要亏折 2,144,469 元。”

在筹建过程中，美裕中公司陆续交来垫款三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第一次垫款美金 50 万元（年息 7 厘），作为开办测量等费用；次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第二次交来了美金 50 万元；以后，即不按合同及时垫款，直至三年后（一九二零年）才又交来美金 15 万元。至于合同规定的 1,000 万元债票，始终没有

正式发行。到了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垫款用罄，株钦铁路工程局不得已于同年二月开始裁员减薪，每月仅靠交通部拨款 2,400 元维持（从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增为 2,700 元）。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五月，交通部给株钦铁路工程局下达了“裁撤令”内称：“查株钦及周襄铁路，原由美国广益公司（裕中公司所组织以办理此项借款之机关）借款建筑。嗣因欧战影响，该公司以债票未经发售，不能交款。数年来迭经本部催该公司筹款动工，该公司屡屡延宕，以至两路工程未能著手进行 …… 既裁撤 ……”。于是，该局从交通部领取裁撤费 4,300 元之后，即行结束。

此路修筑计划未能实现，除因欧战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欧战后，美国对中国铁路投资有远大的计划，拟成立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共同投资中国全部铁路交通事业。此时，美国正需要法国政府的积极合作，故尽量避免与法国发生摩擦。裕中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美国政府及财团的赞助，筹不到建筑资本而无形延搁下来的。至于由美国发起组织的四国银行团，因列强彼此利害之不一致，亦始终未有所成。

我国计划自亦成空议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广西一些有爱国心、民族感的商人和有识之士，目睹法国和清廷所为，主张“利权不应外溢”遂发起筹组广西商办铁路公司。获准成立后，即拟筑邕（宁）桂（林）铁路。此时，法国殆已视广西铁路为其禁脔，立即命其驻华使向我国提出抗议。清廷外务部以邕桂铁路与法国之既得利益并无抵触，据理驳复。但此线后来因筹款困难，筑路计划未能付诸实现。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广西巡抚张鸣岐从加强国防和振兴经济出发，有筹筑衡（阳）邕（宁）铁路之议。此线从衡阳沿衡山脉经零陵、全县至桂林，再沿洛清江历柳州以达南宁，共长 800 余公里，拟分衡桂、桂邕二段先后进行。此计划系着重在国防的需要，

这可从钦命管理军咨处复广西巡抚的函中看出：“查桂省地处边圉，道路艰险，而桂林省会又与各处交通梗塞，诚有鞭长莫及之虞，非特平时无以振兴实业，遇有军事征调，其贻误戎机，尤匪浅鲜，所以修筑铁路为贯通全省之命脉，与军事关系重大，洵属切要之图。”可知此线在国防上有极大的价值，同时对于开发广西内地的经济，也有重大的贡献。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七月，邮传部派工程师章祐、洋员锡几宾会同广西京绅林炳华勘测此线之桂邕段。事后章祐等根据勘测结果分析，此段如先由桂动工，则碍于交通；如改由邕动工，则府河太浅；因此他们力主先从柳州筑起，理由有十：“运道之近一也，地居大半平原二也，富川运煤甚易三也，易见功效四也，习练人才五也，其工作可赶六也，于沿途运料河流畅送七也，据红水黔水之上八也，于营业首尾相兼九也，地居广西之适宜气候土料众多十也。”对于全路工程，章祐等认为，“昆仑关 80 里为最难，永福之 200 里次之，其余之 520 里皆平坦易修”。隧道、桥梁情况为，“山洞大者有二处，一为昆仑关长 5 里，一为山心坳长 3 里；大山洞自 100 法尺至 600 法尺者六处，均在永富，宣化境内。大桥自 50 法尺至 150 法尺者五座，此处则在 10 法尺以下”此线勘测结束不久，辛亥革命发生，筑路计划也就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搁浅。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邮传部另有筑滇桂铁路之议，派工程师罗国瑞往勘测路线，旋拟具详细报告书。罗氏认为，此线如以百色为起点，昆仑为终点，经过桂、黔、滇三省，长约 700 公里，沿线山脉连绵，所需工程费极巨，而此三省僻处边陲，地旷人稀，出产有限，诚恐将来运费收入，不足以养路，故主张此路线应北自曲靖展筑至贵阳入川境，南自百色展筑南宁，以出北海港，如此上下脉络相通，方称完善。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交通部复派工程师钱世禄、陇高显二氏前往勘测后，意见与罗氏略有出入，他们主张百色南展到南宁后，不宜向北海港出口，而改东行历梧州至三水，与粤汉铁路南接。同年，云南督察蔡锷以滇桂铁路关系重要，亦派袁绩熙、伍文渊二氏前往调查，袁、伍于勘测南宁迤南路线后，则主张此线展筑至龙

门港口出，如此滇桂铁路即相当于法国计划的钦渝铁路南线了。上述设想，均因投资额大，筹措不易，结果成了纸上谈兵。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贵州省府倡议兴筑渝柳铁路，即从重庆经遵义、贵阳、荔波、怀远至柳州。并向桂省府建议，由广西负责展筑柳州经南宁达龙门港的路线。一时，川、黔、桂三省函电往还颇密。贵州督军刘显世并派前黔中道道尹王伯群经柳州赴广东、上海，与南洋华侨公司总经理赵世覲缔约，由赵筹措筑路资金。但不久，此计划即遭到贵州一部分人士反对，认为王与赵所结条约有失主权，有的更惑于迷信，以为一修铁路，伊等祖宗庐墓有损，进而横加干预，施加压力。赵世覲得知，即与王伯群毁约。以后，三省继续磋商将近一载，卒因资金短缺，未能实现。

李宗仁、黄绍竑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后，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令建设厅拟定修筑钦邕铁路计划。后因粤省有异议，加上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发生政变，此计划被迫放弃。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全省底定，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兴建三（水）贺（县）铁路之说。法国闻讯，表示愿意提供资金。李、白对此反映并不积极，但一时自筹资金又不易，未几，抗日战争爆发，此事又成空议。

标营事略

曾宪荣

过去陆军的营房叫标营。标营的兴建是在柳州机场动工之先，时间约在1923——1924年间建成，地点在帽合村所好屯西边约三、四百米处。（即现在的帽合学校及广州军区通信仓库以北约二、三百米处）此标营为有楼的四栋烧砖木质结构。座北向南一栋为团部；座西向东一栋为第一营；座南向北一栋为第二营；座东向西一栋为第三营。每栋营房仅够一营官兵驻扎。每栋营房后面有厂房、厕所和浴室。四栋营房中间的大操场面积约四、五百平方米。

标营建成后陆续有零星部队进驻。除1924年间有一个山炮连是北方部队（官兵操河南口音）外，其余均为广西部队。约在1927年，先父曾瑞珍曾在标营招募一个步兵连的志愿兵并自任连长。以后开赴桂平、梧州一带，约一年后离职回家。先父的连队属何部队因当时年幼，无从得知。

约1930——1931年间开拔来一个步兵团到标营驻扎整训，番号五十五团，属第七军24师覃连芳直辖部队。先父趁此机会在营房南角起两间泥墙瓦房开杂货店，并要我学经商。杂货店销售对象以官兵为主。

五十五团约于1932年间全部调走。在驻扎期间发生的一些较突出的事件略举一二：

（一）该团纪律较严。一次星期天官兵放假外出时，有一士兵到帽合山右方的麻疯岩附近玩时强奸了一名平地村的曾家妇女。被人发现将该士兵追赶至所好屯的陈家厕所内后捉住送往标营第三营，该

营值星官当即亲自带那士兵至麻疯岩处执行枪决。后来，骚扰百姓的事就少了。

(二)五十五团驻扎期间,李(宗仁)、白(崇禧)曾实行清乡剿匪。该团第九连奉派到洛满剿匪,他们没有捉到一个土匪,即将二十余贫民捉了来,其中有十五、六的青少年,也有六十以上下的善良农民。两三天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全部被枪决了。到了第四天,洛满乡农民集体来标营要求释放时,已无一幸免了。

(三)第三营方营长奉派去石龙大湾清乡剿匪,借此公报私仇,枪决了改恶从善的土匪头曾四。曾四原是柳江下福村人,由做小偷小摸发展到拥有数百人枪的大土匪头,流窜在大湾一带。后来被陆荣廷招安出来任团长(先父曾跟他当副连长)。后来在龙州被红头军(滇军)打败,曾四从此解甲归田。方营长为公报私仇,借机捉了曾四枪决。行刑前大湾一带曾四的老兄弟策划去劫法场。事情被曾四得知,他为了顾全当地父老的生命财产,极力劝阻了此事。

一九三八年,广西黄埔第六分校十六期学员曾在标营驻过一段时间。一九四〇年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关麟征总部)也在标营驻扎过三个月。抗战胜利后曾驻扎过军官总队。

柳州标营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间曾被陈济棠的飞机投掷过两枚小型炸弹,但均未炸中。抗战时日本飞机也曾来轰炸亦未受损。如一九三九年日机大轰炸,因有我机(波兰飞机)截击,营房均能幸免。柳州沦陷至光复,标营也未被破坏。解放前夕,因第二营营房久年失修,国民党将其拆除后改修为大礼堂。柳州解放后,标营地区划归机场。五十年代末,标营营房全部拆除,由广州军区建为通讯仓库。

航校在柳州成立之缘由及盛况

梁志强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1932年9月），隶属广西省建设厅之航空管理处（原称广西民用航空管理局，直属省府，1932年3月16日始建，1932年8月24日改组，称广西航空管理处）因感南宁机场狭小，难以适应航空事业发展，且飞机每有损坏，而无修理之地，故呈请广西省府批准，由邕迁往柳州。盖柳州机场为当时全省最大，且广西机械厂设于鸡喇，飞机损坏可就近修理。

同年10月，航空管理处开始由邕陆续往柳搬迁。整个搬迁工作，省府方面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全赖第四集团总司令部支援督导。故搬迁一结束，省府商得第四集团总司令部同意，即将该处移交给总部管辖。

次年（1933年），航空管理处着手大力整建柳州机场营舍、机库、跑道，因向英国增购之新机陆续到达，由广东航校代培的30名飞行生亦毕业回桂，自行训练的第一期飞行生亦行将毕业，并开始计划招收第二期。航空管理处在组织领导、计划安排这些工作中，囿于职权范围和力量，逐渐暴露训练和指挥管理难以兼容，现行体制适应不了日益发展的航空事业需要的弊病，于是，有成立航空学校之议。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第四集团总司令部决定将航空管理处一分为二，分出一部分人成立第四集团军航空学校（1935年1月航空管理处并入后，改名为广西航空学校）。4月4日上午，航校在机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成立典礼。

是日，为睹典礼盛况，雍和区居民几乎倾城而出，连同各代表、

四郊乡民，总计多达二、三万人（当时柳州城乡居民为三万七千余人）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人流如鲫，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河北几个码头，几乎无插足之地，所有客艇和临时充渡艇的几十只货船，大有应接不暇之势，热闹情形为空前所未有。在往机场的路口，航校虽派有几句专车迎接来宾，但人多车少，挤不上的只好步行或改乘商办汽车。这天，所有商车为典礼助庆，收费均较平时低廉。于是，“柳庆道上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源源不绝，极一时之盛！”

设于会场西南侧的演讲台前搭起松门，顶悬国旗，中悬党旗和总理遗像，下悬红布白字横额一幅，上书：“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航空学校成立典礼。”讲台两边设速记席，左为司仪席，贴有仪式宣誓词；右首为军乐队，前挂四幅红布白字“军民合作发展经济”、“明耻教战航空救国”、“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生聚教训之准备”、“硬干苦干负起救民族救国家之责任”大标语。

场内派有招待员招待各长官、来宾及民众入校舍或临时搭起的棚内休息，或由专人引导到各处参观。机场内分批排列着整齐雄壮的英制“亚维安”式初级教练机、“吉的”式中级教练机、“亚扶路”式侦察教练机、“暗士苍”式大马力驱逐机、“窝拔地”式轻型轰炸机、“亚拉士”式侦察轰炸机。四周由警卫队拱卫，有讲解员给观众介绍。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专程前来参加典礼的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总司令部少将参军黄韬、曾希颖，柳州民团指挥官尹承纲，第7军军部各官佐，第二十四师师长覃连芳暨师部各官佐，柳州军医院主任林有良，柳州县县长李阴唐，柳州公安局局长黄建元，航空处总务科长刘剑奇，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代团长江玉珊，七十一团团团长张光玮，七十二团团团长程树芬，广西第五军训大队大队长林鹿垣，驻柳车务主任郭寿彭，民团副司令黄健夫，公路管理局车务副主任高小培，工程师陈庆树以及工兵大队、统税局、印花局、禁烟局、邮政局、电报局、电灯局、地方法院、地方金库、柳州汇兑所、柳州红十字分会、柳江林区区署、广西农林实验场、广西省立第四中学、南宁民国日报柳州分社、柳州县建设委员会、县商会、柳江民船同业公会，

书仪印务纸料业同业公会、雍和区公所、柳州县立中学、模范小学、屏山小学、镇北小学、安雅小学等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五、六十人。第七军军长兼航校校长廖磊、副校长林伟成、教育长廖济群以及该校英籍顾问兼教官白朗、罗哩、马逊、士的芬、海顿、哈顿等，亦在台上就座。

正午12时，航空学校成立典礼正式开始，二、三万人站列台前旷地。由刘维周司仪，行礼后，廖校长恭读总理遗嘱，接着，监督官白崇禧，校长廖磊，副校长林伟成、教育长廖济群依次就位，举手宣誓就职。词为：“余誓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服从长官命令，努力校务，培植航空人才，以达航空救国之目的，不得放弃职责，如违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此誓。”誓毕，廖教育长报告航校筹备经过，即请白副总司令训话。

白崇禧首先回顾广西空军的历史，然后结合国内外形势，提出航校成立后之任务。他指出：“（现在）空军价值一天天增高，地位一天天重大，当前我国正蒙受日（本）的耻辱，希望诸君负起救国责任，为民族、国家争存亡，一洗从前的耻辱。”同时要求大家“抱着为国家牺牲的决心，不可只求能在空中表演，必须达到我们能以一架飞机抵御数十架百架（敌机）的力量，为祖国雪耻复仇，而复兴中华民族。”

接着由第七军二十四师师长覃连芳致训词。他指出：“欲谋民族生存，保障世界人类幸福，就必须自救，航校成立就是民族生存开始的一天。”因此，他希望大家“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他认为“廖校长、林副校长素来治军有方，定能不负众望，替国家民族培养出一支所向无敌的新型空军。”

覃师长致毕训词，白崇禧即起立，将刚由意大利陆军大学毕业回国的黄韬介绍给大家，并请其演讲。黄韬说，意大利非常重视空军的建设。经过长期努力，现在已装备飞机数千架，用其元首墨索里尼的话形容，“意大利的飞机飞起来，可遮（蔽）意大利全国的领土。”他勉励大家要向意大利学习。

往下，英籍教官兼航校顾问室主任白郎、航校副校长林伟成，柳州县县长李荫唐相继发表演说。

讲话结束后，即进行民众盼望已久、最感兴趣的各种飞行技术表演。当刘维周宣布这一消息后，二、三万人的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纷纷翘首以待。第一批升空的九架飞机，全部系由航校的技术骨干驾驶。他们是：飞行组主任兼教官李凌云、教育处长兼教官曾泽堂、飞行教导第一队队长宁明阶、副队长吴汝璠、分队长邓沃权、郑梓湘、教官陈有琇、邓梓超、李一飞。表演项目为布队飞行，九架飞机先成“品”字形，接着换成“人”字形、右梯形、菱形，最后变成正梯形掠过会场上空。

第一批表演的飞机刚降落，由飞行员沈瀛、黄昌琳、陆光球和第一期优秀飞行生何信、阳永祚、黄孙分别驾驶的六架飞机随即腾空而起。他们首先表演两个三机布队，接着，两队同时表演了令观众大开眼界的特技：反转飞行，翻跟斗、卷筒、尾旋、衔尾上升、伏波下降。

当观众还未从激动中平静下来，由第一期优秀飞行生欧阳森、李大经、张伯寿分别驾驶的三机已临空。他们相继续表演了单机俯冲射击、“品”字形密集射击、散开轮流射击等项目。每次，各机发射出的子弹，粒粒皆中设置在会场周围的石灰靶。观众情不自禁为他们高超射击技术鼓掌。

第四批升空的是由英籍教官罗哩、马逊分别驾驶的“窝拔地”轻型轰炸机，他俩表演了空中轰炸术——低空投弹法。

令观众叹为观止的是第五批升空表演的机群。这批由航校各主任、队长、中西教官和第一期飞行生代表吕天龙、莫休、李膺勋混合组成的机群，在领队的一声令下，十二架飞机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有条不紊地穿插表演了花式飞行、半滚转、全滚转、慢滚转、滞坠转、俺麻文转、尾旋、翻跟斗及反转飞行等高难度动作，一时间，看得观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既紧张，又过瘾！大家一直欣赏到下午五时，始尽兴而散。

兴建柳州机场的回忆

曾宪荣

一、柳州机场初建

李宗仁、白崇禧统治时期，于1925——1926两年间，由伍延颺为总指挥开始建设柳州机场。机场用地，均是征用附近农民地，大部分是门头、帽合、基隆、竹鹅等村为多。征用的土地也给了一些土地费，但为数不多。初建时，多是征雇上述农村之农民，机场跑道全是民工挖、挑土方建成，民工每天早出晚归，每天劳动能得工钱仅是三、四角银毫不等，约两年后才平整好机场土地。

二、第一架飞机降落柳州机场概况

大约在1929年初夏，一天下午一时许，我突然听到轰轰的响声，见一架双翼飞机由南方金瓜山上空徐徐向北对准机场的跑道（黄泥平地）着陆滑行到凤凰嘴山对面跑道上停止了。当年我才十三岁（我是生于1916年10月），我那时读私塾，那天教学先生有事未上课，因此我跟随我母亲去扯花生。花生地在螺蛳岭（现机场场站军医院西侧）故我才得亲眼看见那架飞机着陆。飞机着陆后，我即奔跑去看。我跑到飞机旁的同时，有许多在附近畚地干农活的农民及小孩等，也都跑来看。那架飞机是草绿色圆型体双机翼，仅有一名驾驶员。不久来了一个警戒兵，只准我们离飞机两米外围观。那架飞机约停留一小时后即起飞向南飞去，围观者也各自散去。

三、成立广西航空学校概略

柳州机场平整土地后，其面积约有现在机场六分之一宽，即除去现在之柏油马路再往西约二百米处才是机场范围，以后才在东南北

三面安装铁丝网（西面无）。南面由螺蛳岭石山向西延伸，至北面银子岩上，凤凰嘴对面铁丝网旁有出入机场的大门。第一、二次飞机着陆时，场内无任何建筑物，连最简单的工篷都没有，以后才陆续建筑了机库、营房、仓库及广西航空学校校本部等等。校本部座北向南，是二层楼的大厦。约在1933年初夏，成立了广西航空学校后，飞机跑道才用混凝土铺填。广西航空学校成立后，即开始训练空军。在训练期间，飞机经常失事坠落，这是因为全是购买日本的过时劣质飞机造成的。（机型为长方机体银白色双翼练习机）。致使许多年轻飞行员因此丧生。例如：我亲眼看见两架飞机，在练习飞行时，由门头村金瓜山峰，准备向机场逐渐下降时，飞机飞到下被村陈家上空，两架飞机的机翼突然相碰，先是一片机翼坠落，然后两架一前一后同时坠落在陈家西后侧的稻田里，两架坠落飞机相距约20米，坠落后即起火燃烧。待机场救护人员赶来，火势将熄灭。次日，机场人员才将死者尸体抬出埋葬。又如我的堂妹夫之胞弟李传声，是少尉飞行教官，刚二十岁出头。约在1936年间他带领学生作空中实习教练时，因飞机机件失灵不能控制，在榴江县城（今寨沙）上空坠落，葬送了两个年轻的生命。

四、我在柳州机场广西航空学校当兵时之见闻

我从小读了七年私塾，后来“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上海抗日高潮等事的宣传，使我懂得国家正处在危亡之秋，激发了我的爱国热忱，萌发了参加抗日的念头。1936年秋末，我考入柳州机场的广西航空学校高炮大队探听队（后改称照测队）当学员入伍。当时是两广（即陈济棠与李、白）联合反蒋时期，其口号是“先倒蒋后抗日”。即所谓“六一运动”。值此非常时期，在机场当兵是非常艰苦的，我在探听队是学习照空灯技术，便于高炮兵夜间向敌机射击。

约于1937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是广西航校成立四周年纪念日。当时是校长冯璜（现是黄埔学会广西分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搞纪念活动。当天整个柳州机场大开放，欢迎柳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城乡民众等进场参观。来者不下万人。白崇禧等要人也亲临指导。

当天天气非常晴朗，约在上午九时开始进行各项表演，至下午五时结束。表演节目有：飞机空中特技表演，还有投弹、空对空、空地对射击、跳伞、和高炮对空射击。照空灯因白天只能操作表演。最后约在下午四时许，有个原是蒋介石中央某航校大队长驾驶一架刚从英国买来的B~24型战斗机（草绿色圆型体单翼机），作低空俯冲表演。头两次表演成功，第三次俯冲时机头撞地失事，机毁人亡。观看者无不为之惊恐万状。事后白崇禧向全校官兵讲话，并向死者默哀。

五、广西航校转变成国民党中央航校

两广联合反蒋约一年多，粤军余汉谋一个军部队，叛陈（陈济棠）投蒋，粤空军将近百架，又相继叛陈，飞南京投蒋。陈济棠见大势已去，则自动下野，飞逃香港。致使广西孤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派程潜（当时是蒋中央军委参谋总长）到广西与李、白谈判，促使广西与蒋的对抗得以和平解决。至于西安事变之发生，当时我在广西航校当兵，闻讯之余，整个航校官兵，都在庆幸蒋介石被张学良扣留。我最近看电视放映《西安事变》时，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是：两广事件解决后才发生西安事变，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广西第一次调第七军（廖磊部）北上抗日，当时是在柳州河北体育场誓师北上。航校全体官兵均前往参加，欢送北上抗日将士。当年秋末，蒋介石的中央洛阳航空学校迁来柳州机场与广西航校合并。我所在的高炮大队（辖照测队）是属于防空部队，于1938年2月即调往桂林归广西防空司令部（司令官是唐纪）指挥。同年五月间我在桂林考入了黄埔军校。于是我告别了广西航校。

六、日寇飞机轰炸柳州机场之见闻

1937年秋冬，日机第一次轰炸柳州机场时，我亲眼看见一架银白色日本轰炸机飞到机场投下了两三枚小型炸弹，炸中了凤凰嘴对面机库营房两间，炸死一人。

1939年冬，我在黄埔毕业，被分派往广东。经柳回家时，听我族人说：这年秋季，日寇飞机若干架来轰炸柳州机场和标营时，我方

升空飞机十二架与之空战（是苏联派来支援中国抗日的波音飞机）。在激烈的空战中，敌机被我击落一架坠落在门头村东的山脚附近。敌飞行员跳伞在空中被我机击毙坠落隔河的园岭脚。遗憾的是，我方也被击落一架，原因是领队飞机起飞后未能升高前，即被敌机居高临下击中，坠落在金瓜山之外的山坳处，机毁人亡。空战那天敌轰炸机未来得及飞到机场投弹，便将弹投于标营南面地带。现在帽合村陈家门前还留下个大坑，已成为私人养鱼的小鱼塘，塘里的水还作淋菜之用。

当天晚上，敌机又作报复夜袭柳州机场。天刚黑，敌机若干架接连七、八次轮流轰炸，帽合山顶及附近之石山均有弹坑，曾家祠堂及很多人家屋顶均遭山上石头落下打碎了半数以上之屋瓦。此次敌机夜袭，除炸死帽合山脚农民金狗母子二人外，其余均无损失。

柳州机场至抗日初期，均无甚变动。直至抗日后期，大片国土沦陷后，柳州机场才加紧建机场外围之防御工事。如钢筋水泥结构的重机枪掩体及战壕等。（这些掩体在大跃进、文革时期均遭破坏）。日寇退出广西后，美国空军来到柳州机场扩建了外跑道，在我帽合村及机场山边建筑了“U”字型机库，这种机库是用人力挖挑土方填成，上面用铁丝拉结成网，再在上面插上青叶树枝作伪装。上述机库现在我帽合村政府后面尚有一个，机场内还有二至三个，其他均已推平。

桂系空军袭击长征红军始末

梁志强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四月，第四集团军航空学校（由航空管理处分出）于柳州宣告成立。不久，由该校训练的空军即开始使用于实战。其中规模最大的两次行动，是配合地面部队堵截长征经桂的中国工农红军。

一、袭击长征先遣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震惊中外、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肖克率领的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九千余人，首途自赣入湘，八月进至道州一带。为防范红军入桂，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急调第七军周祖晃的第十九师和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指挥之民团，开往桂北边境堵截，空军亦同时奉命参战。

八月二十三日，由飞行教导第一队队长宁明堦率领分队长郑梓湘、邓沃权和上尉飞行员甄道成分驾三机，由柳州飞桂林秧塘机场，归总部行营直接指挥。第二天，飞机即出动往湘境侦察。因距离较远，飞行半径太长，活动时间不足逐于数日后移驻全州，不时飞往湘境实施威胁性轰炸。

九月初，红军由湘桂边境清水关入灌阳，桂北告急，驻柳州的第七军军长廖磊即移节桂林，驻防柳州由覃连芳指挥的第二十四师亦以汽车输送至灵川、兴安之间，九月三日，留柳机队奉命全部出动桂林助战，驻全州之三机亦于是日飞返桂林归还建制。四日，第七军军

长廖磊亲书“红军投降免死”六字，及“劝告共匪携械投降书”、“劝告西延同胞书”（附后），印制成五万张传单，交飞机携至鲁塘、西延一带散播。九月四日和五日，红军主力进至兴安界首和全州洛江一带，为配合地面部队堵截，机队频繁出动侦察、轰炸。但由于越城岭山脉峰高峡多，山道纵横，气候多变，便于红军疏散隐蔽，当时飞行员操作技术低劣，袭击效果甚微。五日，奉命侦察红军主力动向的一架“亚拉士”机，目标未捕到，自己反而被劣质气候弄得不辨去处，最后迫降于西延（今资源县属）山中的小河旁，机坏人伤。六日晨，机队接报，红军主力已进至西延一带，当即派出“窝拔地”轻型轰炸机三架前往轰炸。待飞机抵该处，红军已化整为零，隐没于崇山峻岭中，三机无奈，最后只好盲目投弹，乱炸一通。次日，由飞行员沈瀛、韦淳杰驾驶的“亚扶路 637”式机，飞抵西延车田一带时，发现红军正向湖南城步方向前进，当即投弹轰炸，弹尽后继用机关枪俯冲扫射。未几，该机即被红军火力击中坠毁石溪村附近，驾驶员沈、韦同时毙命。

九月十日，红六军团胜利通过西延，进入湖南境内，中旬越湘境进入贵州。机队即奉命停止一切活动，飞返柳州。

二、轰炸红一方面军

一九三四年冬，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突破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经赣西入湖南，进至湘桂边境。桂系常备十四个团和民团十余个联队倾巢而出，由白崇禧亲自指挥，陈兵湘桂边境堵截。和前次一样，空军亦奉命出动参战。

十一月二日，飞机教导第一队队长宁明堦率领飞机十架，由柳州飞抵桂林，仍归行营直接指挥。

十一月上旬和中旬，该机队每日均派出飞机侦察红军动向。

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军以第一、九军团佯攻龙虎关，掩护第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纵队分两路从永安关和雷口关入桂，渡灌江，直趋兴（安）全（州）。是日，第一队多次派出机群袭击第一、九军团。

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兴安界首渡口，在湘江东岸搭起三座浮桥。总部行营急令第十五军之第四十四师赶往新圩、吉头岭及石塘圩一线，截击源源不断开往界首之红军。二十八日，第四十四师在新圩附近遭到严阵以待的红三军团强有力的阻击。机队奉命全部出动配合地面部队攻击，轮番轰炸扫射，投炸弹过百，红军有一定伤亡，但始终未能击破红军之阻击线。同日，红军中央纵队开始在界首渡江，次日晨，浮桥被侦察机发现，机队即派出数机去轰炸，桥被炸毁，红军亦有伤亡。当夜，红军又将浮桥修复，后续部分乘黑夜迅速抢渡，机队终于无法阻止红军强渡湘江。

二十九日下午，红军后卫六个团进至石塘圩一带宿营。总部行营接报，当即令机队全部出动，队长宁明堵率机九架于黄昏飞抵石塘圩实施突然袭击，造成红军入桂以来遭空袭最大的一次伤亡。

十二月一日，红军之主力由全州鲁塘、洛江、大湾翻越三千界和清坪界，进入西延车田山区。机队虽不断跟踪轰炸，但因受天候和地形限制，对红军已无甚威胁，只好转而袭击麻子渡与界首之间的红军后卫和零散掉队人员。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由龙胜之瓢里、平等进入湖南通道县境，越出了飞机活动半径范围，机队徒呼奈何，惟有结束，撤回柳州。

附：“劝告共匪携械投降书”原文

“可怜的共匪们，你们多是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只因一时受共党的诱感和欺骗，以致误入歧途，真真可惜极了！现在我们广西派员十余团，由东、西、南三面向西延围剿，湘军复派兵助剿，并早已派兵在东安、宝庆、武岗一带堵截，后有追兵，前无去路，上空复有飞机轰炸，那么你们大家若不觉悟，无异是自寻死路！现在我们李、白副总司令是仁爱为怀、励精图治的革命领袖，希望你们尤其是广西子弟赶快①悔过投诚的我们是一视同仁均不加害；②携械来归的奖洋30元；③带机枪投诚的奖洋500元。这是你们避死求生的机会，其

速图之。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司令部印发。”

“敬告西延同胞书”全文

“亲爱的西延同胞们，杀人放火、罪恶滔天的共匪来了，我们率湘桂大军数万人围剿，并派飞机数十架向匪轰炸，请大家速往山顶躲避，并将粮食亦要运藏上山，切勿为共匪劫杀，亦可免玉石俱焚，勿谓言之不预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七司令部印发。”

防空警报声中

——柳州民众避难纪实

陈铁生 刘汉忠 编写

格兰姆·贝克是位美国画家，出于采风和旅游的目的，他于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及一九四〇年的春天两度来华，并完成了一部著作《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它被誉为“在许多外国人所写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书里，这一本可称为经典著作之一”（爱泼斯坦序）。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出众的笔法。题材多以亲自耳闻目睹为主。他栩栩如生地重现了许多往事的景象、声音和感受。还透过在当时所谓“大后方”的经历，重现了那个独特的动乱时代所意味的一切。在一九四〇年春那次来华的第一段行程，是由香港中转柳州往重庆，在柳州呆了一个星期。这七天大多是在防空警报的恐怖声中挨过，而他的文笔正如其画笔一般，描绘了一幅柳州民众在警报声中的逃难图。其深入到画面的笔触，又洞悉了当时民众的思想和意识。这不能不深深地感谢这位美国画家，让我们在今天看到这部分文字时，立刻就有找回了一件遗落已久的珍物一样的感受，虽然说这段往事是那样的不幸和苦涩。

一九四〇年八月，贝克先生由香港经梧州到达柳州，在柳州度过了第一个早晨。天刚破晓，庙里的一座大钟就从覆盖尖屋顶的丛林之上传来了叮当巨响。然后扩音器就穿过树叶发出了大声喊叫：“十八架敌机到广西！”这些由机器宣布的字眼和它那既夸大又毫无表情的腔调滚过家家户户的屋顶，掀起了一阵喧闹之声。旅馆伙计和挑夫们一个接一个地敲门喊叫：“警报！空袭！”柳州是因其易于惊慌失措

驰名的。因为它曾遭过惨重空袭。次数虽不甚多，但还没少到不要使人对警报漠不关心的程度。旅客们手提衣箱行李以及他们摆在荷花池边的柳条篮子或鸟笼子，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来到花园。然后就挤出门去，加入跨过广场的人流，直逼农村道路两旁树木荫影，那荫影在人群穿过时摇曳不已。再走近点，那些小山峰脚下的斜坡上已爬满了人群。

从广场到山脚下的田地是非常拥挤的。人行道只能单人行进。叫喊声在这儿就更大了，有些人边跑边吵。这个踩了那个的脚后跟，跑得慢的就被推倒在泥塘里，如此等等。田野上，有个建筑脚手架高高耸立，第一次报警时，就在它的横梁上悬出了一盏红灯。忽然，第二盏红灯又顺滑车升起。从屋顶的台子上发出的巨大声音催促着人群快跑。他报导说，敌机离境已不过三十英里了。警报器的调门儿变成各紧张的人声，喊道：“快！快！快！”人群在哭喊叫骂声中踉跄地跑着，在山脚下较为干燥的地方散开，成为一排爬行者。有时，第三次警报传到山脚下的岩石洞里，那是柳州的天然防空壕，还不曾遭过轰炸。此刻，在洞外享受新鲜空气与开阔眼界的人可就手忙脚乱了。

在各个高处，成千上万人呆在那里犹如戏院里的观众，在“乐队指挥台”外，多彩的仲夏天空伸展开来，像在表演着节目。在它下面，柳州城一目了然，像是舞台的布景。灰绿色的高地上，银灰色的建筑物构成了一块结实的补丁。周围有阴暗的三角山峰。奔跑的人群荡起了一缕灰尘，覆盖了房屋，这支黄色龙在有汽车逃跑着的公路上一直延伸到农村。

“敌机已到柳州了，”扩音器隆隆在响，令人不寒而栗。山上，香烟熄灭了，阳伞折起了，孩子们叫着父母，穿白衣服的被警告隐蔽。一切谈话都停了。下面这座空城里，除了马厩以外，听不见其他声音了。在阳光照耀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圈里的牲畜和喘息的狗以及一群自高自大的鹅摇摆着走下水去。再过一会儿，沉寂中听见了嗡嗡声。每把扇子都停止了，每只眼睛都向山看。敌机自城南飞过，每三架一组看起来象些小黑点，飞往西方，顷刻间就不见了。西方是印度支那

跨过广西高原的公路所在之地，随着一阵风吹过麦浪，柳州四围的斜坡上也响起了声音。

柳州人也许还没被轰炸搞得谈“机”色变，可跑警报却颇有经验。他们不像那些新手，把日历、花瓶、照像本什么的，抄起来就走，而是带着吃的喝的，坐在山洞里。在敌机过去后十几分钟里，就设法出来使自己舒服点。他们拿大树叶遮荫凉，用草编织篮子。当大家都感到满意时，谈话声喧闹了起来。在较低处的山洞口，有些人买了面条、豆浆、带穗的老玉米，把炉子燃起来，和那些打算迟一点在家用早饭的人一起，繁忙地干起活来。穿着破烂的孩子们悠悠荡荡地上山下山，好像戏院里叫卖报纸、花生米的小贩。

过了一会儿，山下一些玩游戏的孩子看到贝克先生，就立即停下来，用他们所想象的外国话，和贝克先生逗趣。这些柳州孩子不断地发出“郝勒儿，郝勒儿”这样的卷舌音，在俄语里是“好”的意思。在一九四〇年的柳州，听到更多的外国话是俄语，那是由于苏联顾问与地方的国民党军队发生联系的原故。

清晨渐逝，云朵渐开，那本来很长的荫影也逐渐缩回到小山脚下了。人群开始不安地蠕动起来。当上面的人向下面人群中荡下灰尘时人们就吵起来了。每当一点点怪事和那些呆滞的目光相遇时，人们就聊个没完，笑个不止，狗打架呀，卖花生的争吵呀，都曾相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有一回，一个受惊的男孩想躲进大家所坐的荫凉高地，可谁也不许。“这儿不让！”“这儿不让！”“我不给你让坐！”他们就这样幽默地朝他喊着。他就只得哭着到太阳地里去了。最后，过来个士兵，给他满身披上树叶。于是他又在哄堂大笑中，重新跑上山去。

不一会儿，有个小小的殡仪队在下面那空虚的城镇出现了。它小心翼翼地靠镇边走过。当扩音器报到一架敌机返回柳州时，整个队伍就冲刺到山上来了。他们带着棺材和一切红绿色仪仗幡旗，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抬棺材的苦力竟想把他置于活人之中。他们在上山打趣地说，把他留在这儿吧，他不会有意见的。于是整个山峰中的人群

嘲讽地哈哈大笑了。这架敌机飞过柳州时，既高又快。这时，有个人在对面山上脱下了衬衣，露出了大片白色。于是所有山坡上的人就都吵嚷起来了，他们彼此呼应，愤怒地涌向那人所坐的地方，势如倾泻的瀑布。那人则疯了似地跑下去，在山脚下不见了。那些想要他命的人在紧跟着追赶。而贝克先生所在的那座山上，喧闹转变成一番大家幽默交谈，题目是以什么方式杀死那些看来是给日本飞机打信号的人最为合适。这时，太阳已过头顶，荫影开始从对面的山峰消逝，人群为躲避新出现的阳光，就更加不安，更加骚动起来。由于一切公共活动均已停止，多数人就满足于在山上坐下来聊天，直到解除警报。可妇女们却为未了的家务而犯愁，其中许多人回城去了。

突然，扩音器又响了。它宣布：其他那些飞机回来了！当晴朗的天空又因机声而震动时，那些高处的人就蹲下来躲进灌木丛中，不出一声声音。那些带头回城镇的人也静悄悄地跑回来。

敌机去后，山上山下，到处笑着，重复地问着一个问题。“怕不怕？”然后，回答来自儿童、老人、残疾人：“不怕，不怕！”“怕一点！”或者，在最使人高兴的回答中，有个最常见又最烦人的回答：“怕，没有办法！”当“指挥台”上的巨响报告敌机已离省境后，一阵人群的嗡嗡声响过群山，就像戏院经过断电重又接好一样，大家发出笑声，彼此从衣服上扔掉树叶，走时还摘点花朵。人群流下山，重新占有了他们的城镇。

贝克先生在柳州住过的这一周里，只有一天没响警报。有一天还响了两次，可只有一次遭了十二架飞机的轻微轰炸。其实，轰炸本身并不如人们的喧嚣那么可怕和实在。因为轰炸只在多次警报中来一次，而喧嚣却在每次警报中都有。但只要有警报中声起，民众们就还得奔跑，骚动，躲开那死亡的阴影。

一九四五年柳州光复之真相

梁志强

近年来，一些反映1945年柳州光复的史料，对日寇撤退原因、时间、路线及敌我双方交战规模、番号、兵力、伤亡、消耗等方面的记述，除多有渲染夸张、言过其实之处外，还不至于张冠李戴、“乱点鸳鸯”之例。对此，笔者试图根据敌我战后披露的文书档案，并参照当时报刊所载的电讯、专访及目击记，对柳州及邻县战况作一综合辩证，以求澄清存在于某些史料的谬误。

一、1945年初夏敌我态势

1、日军在广西的兵力部署

1945年4月末，盘据于广西的日军为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八十八旅团（一些史料记为“第五”、“第二十二”、或“第二十七”、“第六十”师团和“第八”、“第十八”旅团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些日军部队，有的根本未到过广西，有的早已调离不在广西了）其中：

第三师团辖步兵第六、第三十四、第六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三联队和辎重兵第三联队。部署在以宾阳为中心的来宾、上林、南宁地区。师团部设来宾大贤村。

第十三师团辖步兵第六十五、第一〇四、第一一六联队，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工兵第十三联队和辎重兵第十三联队。部署在以宜山为中心的河池、南丹、思恩（今环江）、罗城地区。师团部设宜山县九龙庄。

第三十四师团辖步兵第二一六、第二一七、第三一八联队，工

兵队和辎重队。部署在以全县为中心的桂林以东、以北地区。师团部设全县。

第五十八师团辖步兵第五十一、第五十二旅团和独立第九十四大队，工兵队、通信队、病马厂、野战医院。部署在桂林周围及其以南地区(其中第九十四大队驻南宁，归第三师团指挥)师团部设桂林。

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辖独立步兵第六十六、第七十一、第一二五、第一二六、第一二七大队。部署在以桂平为中心的西江沿岸地区。旅团部设桂平(五月移驻武宣)。

独立混成第八十八旅团辖独立步兵第五一九至五二三大队。部署在全县。旅部设全县。

2、国军部署在桂西、桂黔边境的兵力

第二方面军辖的第46、第62、第64军，部署在桂西东兰、万岗(今巴马)、田阳、天保(今德保)及百色一带。

第三方面军辖的第13、第20、第26、第29、第71、第94军，部署在桂黔边境南丹、天峨、宜北(今属环江)、荔波、独山、罗甸及贵阳一带。

二、日军退出广西的原因及计划

1945年夏，侵桂日军并不是像一些史料所说“被击败溃退”，而是在国军反攻前即有计划地分批逐步撤走。澄清这个史实，有助于实事求是地检验和评价国军在桂西及桂中的“反攻战绩”。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5日，苏联通知日本驻苏大使馆，不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在两国对他国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的条约)。

日本大本营根据上述形势的重大演变判断，由于冲绳岛作战已经展开，华南地区对保卫日本本土作战的重要程度已大大减弱；苏联对日的态度，实际上已明显把日本视为“准敌国”，因而，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已迫在眉睫。根据这一判断，日本大本营决定撤出华南地区的兵力，用以加强华北和华中。

1945年4月14日夜，大本营秘密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告

知内定将部署在广西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师团调往华北待机。四天后，即18日，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令1310号”，命令从4月30日零时起，第十一军所属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师团归中国派遣军直辖。

根据大本营的命令，4月27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正式调动命令，分别规定了上述各师团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和到达地点。第六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拟出了8月底完成在广西全省的撤退计划。第十一军按照第六方面军的计划，决定4月下旬先将梧州以西西江沿岸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撤至柳州附近地区。5月上旬第三师团驻南宁部队撤到宾阳、5月中旬从宾阳地区撤出第三师团主力。6月，第十三师团撤出宜山。7月，再将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撤出柳州地区。8月底全部退出广西省境。具体步骤是：5月底撤出南宁、河池之线；6月中旬撤出宜山、迁江之线；6月下旬撤出柳州、荔浦之线；7月撤出桂林地区；8月中旬末撤离全县地区；9月下旬在湖南祁阳附近集结待命。但后来由于形势变化，撤退并未完全按计划进行。

三、日军撤退及国军反攻经过

1、柳州以南及以西日军撤退的时间、路线

自5月中旬开始，柳州以南、以西日军分别有计划地由四条路线向北撤退：

一自迁江或宾阳经来宾、石龙、象州、桐木、修仁、荔浦……撤退。第三师团辖的步兵第三十四联队于5月下旬，步兵第六联队辖的第三大队自6月10日起即系沿此线撤退。

一自宜山、思恩、天河、罗城经大埔、三皇、寿城……撤退。第十三师团辖的步兵第一〇四、第一一六联队于5月下旬开始即系沿此线撤退。

一自迁江、来宾或宜山或武宣经柳州、鹿寨、永福……撤退。5月中、下旬计有第三师团部、步兵第六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三联队、辎重兵第三联队以及第十三师团部、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工兵第

十三联队、辎重兵第十三联队沿此线撤退；6月中、下旬计有第十一军司令部、第三师团辖的第六联队部及第一、第二大队、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沿此线撤退。

一自宜山经三岔、柳城、中渡、永福……撤退。6月末，以第十三师团辖的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为骨干组成的服部支队（以支队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名字命名）即系沿此线撤退。

2、国军反攻邕、柳、桂、梧路线

属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的第46军和第64军主力，5月上旬自都安出都阳山脉向南宁攻击。收复南宁后，第46军一部由桂东南贵县、桂平、武宣向柳迂回攻击前进，一部则沿邕柳公路攻击前进；第64军之156师则向龙州方向追击。

由汤恩伯指挥的第三方面军，于5月上旬先后分四路出击：第169师自天峨和河池黎明关、宜山、大塘、柳州攻击前进；预11师在攻克天河后，沿宜柳公路北侧山地前进，策应正面作战；91师则自南丹沿黔桂铁路向柳州攻击前进（此路克柳后，第29军之133师加入，分三路进迫桂林）；第26军和第94军则沿桂穗公路越城岭山脉，向义宁和全县新安间攻击前进；第13军自贵阳经独山、河池、柳州、藤县向梧州进击。

3、日军撤退时与国军保持接触的兵力

从日军撤退的时间、路线及国军出击的时间、路线看，柳州以南及以西的日军在撤退时，在南宁、河池和柳州地区与国军保持接触、发生战斗的兵力，实际只有第三师团的后卫步兵第六联队、第十三师团的后卫服部支队、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的后卫步兵第六十六大队和自南宁撤退至柳州归第三师团指挥的第五十八师团独立步兵第九十四大队。其余日军主力在撤退时，根本未与国军接触。据此，可以认定，一些史料提到别的日军部队曾于上述地区与国军发生战斗之事，是不存在的。

4、在柳江、柳城、柳州发生的较大战斗

百子坳战斗。1945年6月17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后卫第六联

队（欠第三大队）前卫第二大队，由忻城大塘沿邕柳公路撤退至柳江县三都乡板六村与盘龙村交界之百子坳时遭到国军第46军175师525团与忻城、柳江自卫队伏击，经两小时激战，日军第二大队主力虽冲出了伏击区，但其尾后的第七中队却被围困在坳中公路上。位于其后的联队本部欲前进增援，但道路两旁均为陡峭的悬岩，根本无法向第七中队靠拢。欲后撤，从宾阳、迁江捉来的民夫所挑的辎重又完全堵塞了道路。在无法进退的情况下，只好以道路两旁大石作屏障展开抵抗。战至下午，国军利用有利地形节节进迫，愈战愈近，迫使日军炮兵不得不进行“零距离射击”，步兵不得不以死马和同伴的尸体作掩体拼死挣扎。后来由于国军最终没有组织白刃格斗，与日军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才使日军得以避免全队复灭的命运。黄昏后，国军攻势渐弱，日军第七中队及联队本部趁机冲出伏击区。半夜，当日军第六联队后卫第一大队进至百子坳及牛屎岭时，再次遭到国军和自卫队伏击，日军抵抗至18日凌晨才窜出伏击区，于上午10时狼狈逃至白见村。21日夜退至柳州与联队主力会合。

是役，日军共死伤200余。国军阵亡官9、士兵20（有的史料说是日军伤亡2,000多，国军缴获枪支2,000多，无一牺牲，是夸大战果，将一当十了。其实这次被伏击的日军，全部加起来也没有2,000多人）。

大武山战斗。位于柳江县百朋街西南约一公里的大武山，地势险要，来宾通往柳州的公路在它脚下穿过。日军为确保撤退安全，配置独立步兵第九十四大队在这一带扼守。1945年6月18日上午，国军第46军175师523团开始向大武山展开攻击。由于地形对攻方不利，几次冲击均受挫，伤亡不少。下午，523团改变战术，组织兵力先拿下大武山附近之凉山、和村、上别和下别等日军据点，将大武山孤立起来。五天后，即6月23日，523团再次对大武山发起攻击，付出了一定代价仍未攻下。第二天，从柳石、柳邕、柳宜公路和黔桂铁路攻击前进的四路国军，完成了从南、西、北三面将柳州包围的计划，开始对市区发起总攻。百朋作为柳州西南屏障的作用已失，守敌遂于

25日拂晓前放弃大武山，退往柳州。

是役，日军死亡百余，国军伤亡二百余（有的史料说是役日军伤亡三百余人——此数几乎等于整个守敌总数。如果是这样，日军第九十四大队就不应再存在了。实际该大队后来还参加柳州城防战）。

沙塘、沙埔、洛满战斗。自河池、宜山、三岔、洛东节节抵抗、担任掩护撤退任务的第十三师团后卫服部支队，于1945年6月18日凌晨退至柳江县境。驻柳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令其立即在柳城（凤山）周围展开，以保障柳州侧翼安全。服部支队接令后，以第一大队据守洛满，第二大队据守上雷（21日移驻长塘），第三大队据守沙埔，支队部驻长塘。

当天服部支队一展开，立即对上述地区进行“扫荡”。第二大队进至沙塘时，遭到柳城县警察第三中队坚决抵抗，双方在圩内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日军竟施放毒气，我第三中队被迫撤出沙塘向太平转移。第三大队进至沙埔时，遭到抢先占领沙埔的国军91师挺进部队和柳城县自卫队共500多人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入夜，日军虽然占领了沙埔，但被击毙了20余人。

第二天，即6月19日，由三岔沿黔桂铁路向柳州攻击前进的国军91师272团，进抵洛满附近时，遭到日军服部支队第一大队阻击。20日晚，272团以一个加强连在柳江县自卫队配合下，绕道山区向洛满侧翼佯攻，主力则从正面以炮火开路实施多路突击。日军四处受敌，付出伤亡60余人的代价勉强坚持了三天，于6月23日向柳城凤山退去。28日，服部支队按第十一军命令，昼夜兼程北撤，去增援兴安界首以西的五旗岭地区战斗了。

柳州城区各点战斗：

飞机场攻击战。1945年6月23日，国军175师525团前卫部队和柳江县自卫队，向退守飞机场的日军第六联队第二大队发起攻击，战至25日，攻占机场一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步兵第六十六大队一部百余人由羊角山向机场增援，被国军击退。27日，国军完全攻占飞机场，日军沿桂柳公路逐步退往三门江。是役（包括

攻打张公岭)，共毙日军约百人（有的资料说仅毙伤增援之敌即达二百余，这显然是夸大了。查实由羊角山向飞机场增援之敌人只有一百余人）。

南站攻击战。6月21日夜，国军169师尖兵连和柳江县自卫队一部队从思贤乡突入柳州南站，与守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步兵第六十大队一部发生混战，战至第二天傍晚，共毙伤敌40余。23日，169师后续部队加入攻击。25日，南站一带即为国军全部占领。守敌退往马鞍山和大队主力会合。

河北市区攻击战。由洛满攻击前进的国军91师272团，于6月25日克柳江西岸基隆后，当夜渡过柳江。26日，开始向市区展开攻击。当晚收复黄村、北站。27日，河北市区守敌，第六联队第一大队开始交替掩护退往河南，然后撤向窑埠、独凳山。

1945年6月29日，会攻柳州的各路国军于是日晚同时攻入河南、河北市区，零星巷战进行到子夜12时。至此，柳州完全光复。日军第六联队残部和第六十六大队由三门江渡河退往雒容。

事后发现，在柳州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日本天皇“圣旨”、日本皇后一“令旨”。圣旨一开头就承认“战局愈趋危急，帝国（已）面临亘古未有（之）重大时机，要求全体臣民”愿各自爱，勤勉奉公……令旨和圣旨一样，也直言不讳指出“内外形势益形多难”，希望全体将士“自重自戒”……从中，可以看出，连侵略者的最高层，对这场不义的战争前景也丧失了信心，毫不掩饰地发出无可奈何的哀鸣了。

李品仙强抢柳州

中行黄金光洋运桂经过

陈兴让

一、接受任务

1947年至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政权面临崩溃，通货膨胀，已达最高峰，物价直线上升，米珠薪桂。四九年初，李品仙败退桂林，作困兽犹斗计，成立桂林绥靖公署。六、七月的一天，经理处长李剑虹（在皖旧同事，我在桂十分困难，他为我请李批准，每月给光洋八元，作补足生活费）到家找我说：鹤公（李品仙号）要我转知你，要你无论如何，去完成一件极重大的任务。我问有什么指示，李说，目前形势，相当紧张与恶化，军事与经济，互相为用，我们的军饷，已无来源，鹤公意欲将柳中央银行现有黄金光洋，全部搬运桂林，控制在手，作为后盾，现鹤公请你去完成此重任，你不能推诿。我说署里人才济济，何必点我这无关痛痒的闲人（牢骚语）。李说鹤公选人，不会有错，一是你为人机智，二是你与苏新明讲得来，三是柳州情形，你比较熟。你是知道鹤公这人的，希望你明天就走，现在同我到署里领旅费及应带的证件以及空白手令等，并随带一两名手枪兵做护卫，柳桂路目前不大安全，需加注意。你到柳情形如何，可用电话随时请示鹤公。我说既然如此，请代告鹤公，我尽力办就是，能否如愿，不敢估计。次日清晨，我带手枪兵王国忠一人，乘火车赴柳。当时柳桂铁路，被破坏相当厉害。车抵永福鹿寨之间，路轨已经被破坏多处，火车不能通行，前面不远处，停有军用车一列，原来是二十四师军车。师长刘昆阳，是远征军同事，我告以去柳的任务，刘请我到他的车上。该师工兵，正在抢修路轨，饭后无聊，信步看看铁路中断情形。有的

被拔去道钉，有的钢轨不见了，破坏约百余米长，经工兵抢修后，直至第二天下午，始达柳州。

二、在柳州的经过

我在柳罗池路大华旅馆，离专署很近，便于联系。次日到专署访苏新明专员，告以来意，商议着手对策。决定由苏打电话给中央银行行长，请他来专署，有要事相商。不久该行长到来，由苏相互介绍，并道我来柳任务，我随将李品仙意思传达。冯行长一时不知所以，答：此事重大，我不敢作主，回行后与同事商讨后见告。我问什么时候答复，冯答两日内。两天已过，未见消息。第三日几次电话找冯，均答不在行里，问到何处去了，答云不知。我即与苏商讨解决办法。认为冯是有意拖延，他必定向总行请示而行，果真如此，那就麻烦了。我们必须先下手，威逼冯就范。不如你我唱双簧完此重任。第四日我就亲到银行找冯，恰巧在银行外不远处相遇，估计他是外出。我问他事情讨论如何了？并说此处未便谈话，请到专署好些，遂同到专署，与苏相会。苏问：你们的事怎么样了？冯答经前日讨论，此事重大，要请示总行后答复。果不出我二人所料。我说本人是奉李主任命令来办理这事的，贵行长如有什么疑难，请亲自与李主任说明最好。冯说，那就劳专员代向李主任说明我的困难。苏答请二位在此等候，我叫长途台接通后，还是由行长亲自与李主任说明，比较恰当，无需旁人插嘴。这样，直等了两个多钟头，均接不通（这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步骤）。这时我将早已准备好的盖有官印的手令，递交冯行长。我填的手令内容是：“现已军需孔亟，仰该行即将库存黄金光洋，全部点交来员陈兴让点收运桂，不得有误戎机，至于有关手续，由本处迳电知中央银行总行，此令。”我说行长，情况急迫，长话又挂不通，为了卸却你我二人的责任，最好请行长与我一同到桂，由阁下与李主任商洽。这军情紧急，你我都难背此重任。请苏专员即帮派人代买桂林火车票三张，同行长到桂。当时我态度非常严厉，非要他到桂不可。经过约十分钟的寂静，大约他也分析了利害，便答道：如此说来，李主

任既然一肩承当向总行交代，我冯某绝无意见，胆敢阻碍军情？我恐时间一长，又会发生变化。即说，那好，现在才过正午，时间还早，即请苏专员马上派十轮大卡车一辆，武装兵一班，随同行长和我到仓库点收。旋即开车到仓库（记得，仓库好像在羊角山一带）。将所有箱装的金条，光洋全部满堆车上。余下的银毫未装（全部数目年久已回忆不起）。随同给了冯有官防的收条一纸，至此才算侥幸完成任务。

三、空运桂林，费了不少心机

当时柳州情况已很不安，更感责任严重，军车过河后，我将数十箱黄金放在大华旅馆我住房内，余数全放专署内。放馆内由王国忠护守。当晚即与李通话，将完成任务情形报告给他听，请示如何处理。李说目前公路铁路均极不安全，虽大量武装护送，亦担风险，还是空运为妥。这一指示，增了我许多麻烦，盖当时民航机构，大部分由军队封用，能为民用者不过百分之几，尤以当时的飞将军们与执勤人员，均趾高气扬，难以攀附。哪里会得到空运的机会？担搁了已近十日，心中如焚。我们四处找门径，后来通过友人介绍，与一位韦大队长接谈，经过请客送礼，才允许帮忙包机一架，空运桂林。运费光洋 1,800 元，另外送礼 500 元，数日后才通知第二天上午十一时起飞，嘱准备好一切。即转告苏，届时请帮忙派卡车二辆，枪兵一排，并电话道知桂林派武装到机场接机。一切安排就绪，按时到达机场，经士兵将车上黄金白银全部装上飞机后，不久安全飞抵桂林机场。机场上已有武装士兵及汽车在等候，我指挥士兵将这些黄金白银全部运进绥署内（即现在 181 医院）交给李品仙收讫。

陆道岩的重新发现

潘朝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为了考查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游柳路线，我和柳州博物馆馆长萧泽昌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徐霞客研究专家周宁霞女士等人，根据徐氏《粤西游记》的记载，在柳州东郊寻找他曾经游过的“罗洞岩”。在考查途中，经过将《游记》文字与现实的地貌特征作反复对比，这个“罗洞岩”终于找到。由于“罗洞岩”的找到，作为徐氏寻找罗洞岩的基准坐标，也是《游记》中所谓“广西三独秀”之一的柳州独秀峰也随着找到。于是湮没三百年的古迹，终于又和人们相见了。

明代崇祯十年丁丑岁（公元1637年）六月十四日，徐氏自洛容步行，经山门冲（三门江）、马鹿堡而抵柳州东郊，为了等待有病的同行僧人，曾在独秀峰下略作休息。在和过路人的闲谈中，使他知道在独秀峰东南不远的山中，有一处“第一仙区”的“陆道岩”。由于方音的差异，徐氏遂记作“罗洞岩”。后来，他虽也入岩一行，但因为时匆忙，未曾发现洞内的碑刻，所以一直将原来的“陆道岩”误记为“罗洞岩”。

从陆道岩中的宋代碑刻来看，最早一块应推“淳祐七年岁次丁未（1247）孟秋朔日”所刻的“拱真岩”功德碑，碑上记载“众信”施钱施米塑造列位“天尊”塑像。如“土岩坊信女黄氏二十一（岁）同男唐寿施钱五贯足米，塑“太清道德天尊”。“信士蓝潺蓝揖施钱四贯五百口口匠塑造三清诸真斗像。今已圆成仟左龙虎君”等等即是。由此可知，这个岩洞，最先是称“拱真岩”。是供奉道教诸神的处所。

在岩中进口的甬道尽处，刻有对联两联，均上联在左壁，下联在右壁。内一联是：

脱却凡尘，须向闲中寻活计。

登临彼岸，全凭静里作生涯。

从内联往外约二米，即为外一联，句是：

天地欲吾玄，预敕环中题石壁。

山川如我意，复开奇景作丹丘。

从对联的内容看，本来是道士“言志”之作，但其中也参杂一些禅语，（如登彼岸之语即是）。此可见宋代的道教已大大吸收了佛教思想。再从古今神庙布置的习俗看，对联所在的位置，应是在神座的两边。是道士焚香静坐，配药炼丹之处。此处似堆积很厚，若能发掘，也很可能尚见一些文物。

对联之外右壁上，镌有律诗三首。皆南宋景定间作品。其中两首是一唱一和，另一首是稍后重游之作。但从刻石字看，诗与联皆是一人书写。唱和诗的碑刻是：（不清之字用□代）。

“判府大将军王公诗翰（按：此乃是住持僧注语）

“春日游陆道岩，席间赋呈、命推诸僚友”

“□（飞草体） 皇恐”

阎浮海上驾山来（注），谁为岩前凿石开。

渴饮丹池平地水，寒飞金鼎旧时灰。

相逢腾喜当晴昼，弃醉何妨卧绿苔。

笔画龙蛇任飞走，蓝村陆洞记传杯。

（注）阎浮：即阎浮提，亦称南瞻部州。

以上一律是王公名□之作。下一首和诗是：

“勉继□府

赵和□韵”

瞥眼还惊三月春，呼童载酒快追寻。

来游陆道岩多古，聊记溪翁柳种今。

风细簪峦云漠漠，月明刁斗夜沉沉。

欲求千古神仙事，谁是知心为发明。

诗末署小字一行：“时景定辛酉（公元1261年，理宗景定二年）季春望日门下前报恩光孝禅寺住僧飞兴上石”。“飞兴”二字，飞草体书写。由此可知，这位道士取名“飞兴”，飞兴者，飞昇也。是道家修炼的愿望。飞兴先在禅寺为和尚，后来到此岩炼丹修道。他曾在岩前修一座石碑坊，上题“第一仙区”四大字。此坊于明末徐霞客来时见过，曾记入他的《游记》。

另一首律诗不标诗题、不署年月。句曰：

陆道真岩不厌行，道高岩古几阴晴。
 笑看野鹿衔花去，卧听孤猿叫月清。
 世事悠悠浑梦幻，神仙寂寂记芳名。
 苍生自此无兵劫，景定年年保太平。

末题“涓溪主人重来

门下僧飞兴上石”小字二行。

按：诗末题字，皆是飞兴口气。此公既称“涓溪主人”必是涓水流域（今随州、安陆一带）人氏。既谓“重来”，必有“曾来”。而且飞兴对他很敬重，故自称“门下僧”，；因此，很可能仍是“判府大将军”王□人。

此岩在淳佑七年（1247）时，尚称“拱真岩”，至景定二年（1261）即被改称“陆道岩”。何以仅隔十四个年头，而岩名竟改？此必这位陆道人很有名望，自他来往此岩后，社会上乃以其姓称呼此岩。再看诗中每称“陆道岩”、“陆道真岩”，皆是飞兴在场。至于说“道高”的赞辞，又是正指飞兴。由此可知，飞兴姓陆，陆道岩是因陆飞兴为住持而得名的。

陆道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古迹早已为世人所忘，所以清代乾隆间王锦等修《柳州府志》，即已不能确指其处。只据传说而在该《志》卷四的山川目中记下一条：“蟠龙山城在东，旁有陆道岩，空润明爽，下临澄潭。明王启睿隐此，著有《蟠龙岗志》”。当时由于不知岩中的宋代遗迹，竟将此一重要古迹列入普通的“山川”项目中。以致后

人往往一谈到陆道岩所在的蟠龙山，即将窑埠诸山充当蟠龙。由于一九八四年陆道岩之再现，我们才知道，古代所谓蟠龙，实是东起蓝家村的柳江西岸，蜿蜒西蟠的这一脉石山。陆道仙岩正在其西头尽处，岩口东顾柳江。所谓“澄潭”，实是在一个黑岩中的深井。在地形学上，是一口地下河的见水天窗，并不成什么澄潭。

由于陆道岩碑文的再现，使我们知道，当开庆元年(1259)蒙古(当时未称“元”)将领兀良合台率军自安南入广西后，所过卢舍丘墟，他们把南宋末的象州军(在今来宾县逢莱州)即已彻底毁灭，随即北进再灭柳州(宋末柳州府迁今之柳城县凤山镇对岸旧龙城地)。但当其部北去之后，在柳州的南宋政权却仍然存在。故于景定二年，仍有“判府大将军”王□在此。这一事实，也可补正史及方志之不足。

至于拱真岩功德碑所载塑像工价，也是研究宋末柳州物价的重要资料。若将此工价与其他佐证资料作综合考证，也可把当时此地的民生状况再现出来。

张公岭张公考

潘朝业

《柳州府志》卷三十二艺文目载：张岳《平五都大功勒石记》说：“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乙巳岁）春，诏提督两广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岳^①……八月征兵^②悉会龙城，分为三道。……九月丁卯，诸军按道分攻”，“明年丙午（1546年）春三月，缓攻以弛贼备，撤围若去而复乘之，募敢死士缘石壁夜登，夺其隘，夏四月甲午，马鞍破。丙午鱼窝^③破……鱼窝者，自国初以来，四攻弗克。”

《府志》卷三十一艺文目亦载张岳《报柳州捷音疏》，述作战经过较详，且言“鱼窝、马鞍等巢，自洪武初年以来，不入版图”，“占据庆远水陆二路，敌杀官军，攻劫县库，杀戮乡村，每杀一村，则一村田土尽被包占”。及诸寨被摧灭之后，“擒斩贼级共四千零八十四颗”。“百姓原被贼杀占额征粮米，今清出一千三百二十六石有奇”，“经报在官听抚，造册给贴者已有二万零六百六十三名，送出原日行凶盔甲枪刀弩箭等项共二千八百一十七件，马三百五十五匹”。

《府志》卷三十瑶壮目、马平条则云：“嘉靖二十四年，马平壮韦金田作乱，占据水陆二路，都御史张岳……调汉士兵七万讨之，攻拔雷岩、同银、洛满等寨，进围鱼窝寨，鱼窝石壁削立，拔地数千丈，四周倾侧不可置足，山顶绳悬插石，兵一临寨，飞石交击，我军进而辄却，……岳督攻愈力，贼悉众固守，昼夜不辍。岳佯令解围，寨中贼稍遁去，……乃召副总兵程鉴，令选精锐，备亲军，鉴选三千余人，请所用。岳曰：‘吾欲得死士任吾指挥，死且优恤其家。’于是愿往者七十人，属鉴劫寨，……鉴泣曰：‘愿为公死’！”

“时贼巢苦乏水，每日瓶水计口而分。一日五贼守险径，争欲夺瓶，瓶覆，皆大喧欲散去，比夜坚卧不巡警，而鉴将七十人至寨下，未敢发也，先令五死士援木而上，五贼熟睡不觉，因斩之。代为巡警。而召六十五人，冒险夜登，声噪寨中，贼大惊，并力出战，山下兵乘之，炮刃交发，遂破鱼窝，韦金田及其众皆自焚死，俘斩凡四千余级，抚馘其余党而还。”

今据以上资料，可知在明代嘉靖二十四年，马平五都韦金田继承自洪武以来的割据势力，作更大规模的割据叛乱。其所占地域，西起都博（土博），东达洛满以东的柳江边；南负崇山险隘，北临龙江之滨。故文献有“占据庆远水陆二路”的记载。正因如此，方才惊动了明朝廷，以致“诏……张岳”率土汉师旅七万征讨。

当年八月，兵会龙城（柳州）。九月部署进攻：以南丹兵为中路，攻鱼窝；那地兵为东路，攻马鞍、洛满；东兰兵为西路，攻都博。自此展开激战，于第二年四月下旬，始破韦金田最坚固、也是最后的据点——鱼窝寨，完成了此次的军事行动。于是，“天子诏命，是月幕府移驻柳城（州）。”并命“周观营垒，阅诸将功。”“叙刻于崖石。”（上皆《勒石记》原文）。

综此史实，可得两点判断：第一、当七万大军会于龙城之时，当日龙城不过是一二万居民的小城，军队不会入城挤扰官民。如此则必选城外有利地形扎营。而“张公岭”为平野中一个突出的高地，四周视界广阔，来往运输便利，岭下又有鹅溪可供用水，自是最理想的营地中心点。所以当时幕府驻此，其可能性应属最大。

第二、当时东、西两路是助攻，中路指向鱼窝是主攻。所以幕府所在的总司令部，既要便于联络东、西路，又要能直接指挥中路主攻。这在张岳亲自布置副总兵程鉴登山夺险一事，即是明证。以此，这个总部的的位置，既须离州城不远，以便调度军需品；又须易守难攻，以防偷袭；更须紧接中路，时授方略。而龙城附近之地，具此三条件者，也只有“张公岭”其地。因为自此岭西行十多公里，走完一都盆地北沿，即至今成团；由成团再转而北，通过数里的福堂谷地，再越

数山，即可直捣鱼窝之背。今成团尚有军垒、营盘岭等地名，据父老传说，乃是明代遗迹。此必曾是当年中路兵的中心营地，亦是一证。由此，更可作进一步的判断：当年张岳的总部，舍“张公岭”更无他处。从而可简括一句，即：指挥战争的张岳，当年曾常住“张公岭”。

另外，在“张公岭”上。四十年前尚有一座张公庙（祠），据地方前辈说，其神玉带盔甲，威武异常，必是一员大将。由此推论，其庙既称张公庙，其神必然姓张。再考明、清两代，在马平虽曾多次用兵，但以姓张为主帅者，只有张岳其人。又按明人习俗，凡在边疆立功者，既死论谥之后，或则朝廷诏命，或则地方官绅倡导，常在立功之地，立庙以祀。如南宁有阳明祠以祀王守仁。柳州有山公祠以祀山云（祠址在大龙潭雷神庙左）。而张岳在柳州所立之功，烈过山云，何独无祠？必是张岳既卒之后，赐谥“襄惠”公，柳州官绅，即在其昔日设置幕府旧地，立庙以祀。

总的来说，张公庙的张公，只有是张岳的可能性最大。至于张公岭的得名，也是由于这位张公而来。这一论断，在未见更有力的否定理由之前，应该给与成立。

【注释】

注①张岳：泉州惠安人，字维乔，号净峰。正德间进士。学宗程朱，攻击阳明良知之说。仕至右都御史。卒谥襄惠。著有《小山类稿》。

注②征兵：指征南丹、那地、东兰三土司狼兵。故《捷音疏》载：参将戚振统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鱼窝、雷岩、同银、北岸。参将孙继武统那地兵由东道，以向马鞍、平田、北册、洛满、南团。副使魏良辅监都指挥李霖、统东兰兵由西道，以向都博（土博）、高桅、龙船。

注③鱼窝：在今流山以南、福堂西北，自流山步行约七公里即至雷岩，再南即至鱼窝。此处泉清洞邃，山壁环绕，要入鱼窝，非走雷岩不可。而当年韦金田山寨则更在鱼窝之南的高山中，故有“拔地数千丈”之说。若非高山缺水，则自然不用下山“瓶水”分饮。明军当更难仰攻。

柳州经过多少次水灾

练敏公

据文献记载，柳州大水记录，始见于元代至和年间，距今660年。从那以后，历明、清、民国，几百年来，柳州发生大水成灾有如下20次：

- 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
- 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四月。
-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
-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
-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
-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
-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
- 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
- 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
- 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
- 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
- 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
-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六月。
-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
-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
-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
-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
-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
-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八月。

在清光绪以前没有确切的水文数据可考，但据文字记述，如“柳州大水”，“漂没民房甚多”，“沿江庐舍田园漂没殆半”，“几没城”等等，可知已成大水灾。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七月十一日柳州的最高水位是91.47米，最大流量每秒34,000立方米，是近百年内柳州遭受的最大一次水灾了。

柳州民间传说：“柳江长长像竹筒，竹筒装水对直冲。甲子年间发大水，人财一水两头空。”甲子年间发大水，是指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恰逢“甲子”。这一年柳州的最高水位达到90.49米，每秒水流量为3万立方米。大水淹没了大半个柳州城。现今“五角星”夜市区都被水淹。市民多避往柳北坡地上去安身，更新亭附近都住满了人。沿江的板壁房屋没有剩下一间，全被大水冲光了。大水之后又发生大疫，不知死了多少人。现时健在的老人们仍深深地记住那一段毁灭性的灾难。

新中国建国后这三十多年来，柳州水位超过80米的也有20次，历次最高水位如下：

1950年5月2日	最高水位81.67米
1952年6月8日	最高水位83.27米
1954年6月29日	最高水位84.37米
1955年6月20日	最高水位80.98米
1956年6月20日	最高水位81.81米
1958年7月15日	最高水位80.13米
1959年7月5日	最高水位83.15米
1961年6月14日	最高水位82.43米
1962年6月28日	最高水位87.21米
1966年7月13日	最高水位83.70米
1967年8月8日	最高水位80.52米
1968年7月15日	最高水位82.97米
1970年7月15日	最高水位88.54米

1971年6月6日	最高水位 81.46 米
1974年7月26日	最高水位 82.07 米
1975年5月11日	最高水位 81.24 米
1976年7月10日	最高水位 86.80 米
1977年6月10日	最高水位 80.06 米
1978年5月18日	最高水位 85.89 米
1988年8月31日	最高水位 89.04 米

柳州市在建国后出现最大的一次洪水，当数 1988 年 8 月的这一次，接近了“甲子年间大水”的水位。但有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终于战胜了多年不遇的洪灾，做到保安全、保吃饭、保不死人，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对比历史，才真正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每个人都应该奋发努力，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力量。

一九四四年的南站街大火

汉忠 铁生 整理

一九四四年八月，日寇攻陷衡阳后，锋芒沿湘桂直指广西。大批湖南、桂北、粤北等地的难民纷纷流落到柳，顿时，不大的柳州城畸形的热闹起来。旅馆家家客满，房租涨价惊人，一座三间木板房，每月租金为五千元（当时的国币），还起码要先交三个月租金，小洋房每月要一万五，要先交一年租金，此时连江上的篷船都有人不惜高价租住。市面上物价飞涨，加上战火日近，到柳的难民感到此地不可久居，立即又想办法转到贵州、四川去。不久，柳州也公布人口大疏散，于是火车站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大门内外地上睡满了等车的人，售票窗外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头等车已无开，二等车按规定要登记，再按次序买票，票价是每张一千一百二十九元，可黑市上卖到一万元以上。买三等车票的，则早在头一天已排队在售票窗前了。每人限购五张，每张五百六十元，黑市上则卖到一千至一千五百元。由于车次的减少以及开车不正点，每次火车一到，人们便蜂拥而上，呈现出一派慌乱而激烈的场面。在此情况之下，南站街就变成了货物、行李的囤集地与交易场。当时，随工厂、机关南迁托运到柳，准备转运贵州、重庆的布匹、瓷器、香烟、五金、机器、书籍等货物堆集如山，这一带的旅店、栈房客人爆满。由于铁路不畅通，大量公私物资只好就地削价抛出。投机者乘机买通车站查票人员，把货物低价买进，然后当作行李装上火车（行李不纳税、免费装运），转到贵州销售，大获其利。而大批难民因上不了车则叫苦不迭，许多人早把带出来的一点有限现金和货物用光卖光，于是只好叫化度日。

正是屋漏又遭连夜雨，八月十五日凌晨二时二十分。南站街突然发生一起空前大火。大火一直烧到五时二十分方止，共焚毁房屋一百四十余家，灾民达一千多人。大批堆放在旅店、栈房的货物全部化为灰烬。最为可惜的是，由开明、远方、实学、学艺、光明、新光、学术等出版社疏散到柳州的学生教科书和实用参考书六百多箱、文具十箱也在被焚之列。时值中小学开学在即，南站街的失火使学生陷于无书可读的失学困境。起火地点有人说是在广贤管内军政部第三纺织厂转运站内，该站的人却极力否认，说是由邻居大来号引起，街长则随便指控了一些失火嫌疑犯交当局究办。可怜的是那千余灾民，风餐露宿，事隔半月才每人领到四十元救济费。

柳州南站街的大火，引起了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关注。九月七日，该报二版转载了桂林方面报导的这一消息。消息说：“桂林开明、远方、实学、新光、学艺等书店疏散到柳州的书籍共五六百大包，准备运销川、黔、滇等地。因交通困难，一时无法起运，堆存在火车站附近的栈房内。八月十四日晚上（按：应为十五日凌晨）该栈房无故起火，书全部焚毁，损失约一千万元，起火原因还没有查明。十三日在二版又通过署名“先召”的文章，对火灾的情况作了较详细的报道。对于书籍的被焚，作者感慨地说：“这样大批文化粮食被焚，在目前出版业种种困难之时，实是一大损失。”紧接着第二天，《新华日报》四版刊载了沈灵题为“书的自焚”的评论文章。文章在引述“柳州失火、书籍被焚”这一情况后，对这次火灾的起因提出了疑问：“我们无法猜出这‘无故起火’四字里的玄虚，但那五六百大包的书籍究竟是自焚还是被焚却是值得玩味的”。很快，该报在九月十一日二版中，以“作家出版家心血成灰，柳州焚书案水落石出”为题对南站街失火原因作了揭露：“原来是旅馆老板串通偷窃寄存物资，纵火灭迹。上次在柳被烧的各书店书籍，据说共值一千数百万，其中以开明损失最大，计八百万元，但最惨的还是几家资历较弱的小书店，每家损失总在百二、三十万元，多年辛苦化为灰烬，伤心之至。据说这次柳州焚书案是由各旅馆店主串同偷窃其他客商寄存的五金、布匹、文具

等物之后，加以纵火灭迹。书籍虽非此等人偷窃对象，但因与五金布匹等商人的货物同时存在各旅馆中，也就连带遭殃。据说若将其他商货损失合计起来不下数万万元。”至此柳州南站街失火的真相大白。

当年柳州的这一失火丑闻，肯定会引起柳州百姓的愤慨。本地舆论界亦肯定有所揭露，然而，由于解放前柳州出的各种报纸，我市图书馆早已无存，而其他大城市如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图书馆所存解放前出的柳州各报又恰恰缺少一九四四年的出版物，因而当时人民的呼声及反映，今已无从得知。幸好《新华日报》刊载的几则消息，才使得这一事件不致因岁月的流逝而湮没。

（资料来源：柳州市图书馆藏复印本一九四四年八、九月《新华日报》）

灵泉寺的复建者——释愿修

愿修师，俗姓刘，名阿美。原籍龙州人氏。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七月初三日，逝于一九五九年，得寿六十。

其父从小学武，曾在龙州为一小官，性好交游，故陈柄昆在龙州从军时，即与他结为老庚，情如兄弟。阿美约六岁时，刘氏全家被盜杀害，阿美躲入牛粪堆中，幸得逃生。当时陈身为管带，遂率兵杀盜为老庚报仇，从此以后，阿美由陈抚养。

阿美这个名字，是由陈接养后给她取的名字。因为她人品清秀、聪明能干，所以叫做阿美。后来陈屡次升官，相传是托阿美的福，因而陈柄昆更器重于她，将钱财全部由阿美掌管。柄昆有几个姨太太，每月生活费用，都由阿美支发配给。庚父与同僚或部下官员的人情来往，都由阿美料理应付。因而她认识了不少官方人士和官太太们。

陈柄昆死后，人们都说她有很多钱财。可是她为人不贪，将庚父遗留之钱，全部分给几个姨太太，而自己却一无所有。

在抗日年代，她流落柳州。为谋生度日，住在王修文（太白神）家做家务^①。王修文常与黄竹巷的周道人（清白道人）有来往，从此阿美又认识了周道人。日本投降后，周道人去湖南南岳办道。此时恰是阿美受太白神毒打难忍，便逃往南岳找周道人认为继父，从事学道，不久又到南岳福严寺（二生庵）拜福印和尚为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冬，在南岳开戒，她就成为当年受菩萨戒的女尼之一，法名释愿修。从此，阿美走向佛门做尼姑之路。

光复后，柳州有些女居士，欲在外地请尼姑来柳布道。以吴性斌为首的居士，伙同李锦华、黄吉成、石士林、刘汉琼、许奶老、和众善男信女，齐发心愿到南岳接释愿修回柳州。但因回柳无庙可进，

所以她不愿回。吴性斌等众居士便商量设法起庙，庙址选在马鞍山仙人足迹下（今灵泉寺）处。此地本是覃连芳插牌霸占的地盘。愿修原姓刘，早与覃连芳的表妹刘汉琼相识。借此关系乃与覃连芳讲情，说是为陈柄昆的接养女阿美出家修庙。覃乃满口答应赠地建庙。建庙是件大事。可是经费问题，却一时没有着落，故只欲建一间简易的念经堂。乃具文报请柳江县政府莫显成。莫将文转交县长。县长杨义不同意建简易念经堂。并说若是恢复灵泉古寺就批准。众居士去人说明经费困难问题，杨义县长便发给他们捐款簿，盖上县长的大印，让她们在社会上募捐款项，以便恢复灵泉寺。

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初八观音诞，灵泉古寺大雄宝殿落成，举行开光仪式。覃从《府志》中的古句中节录“天开古洞，地勇灵泉”一句为联相赠。从此，释愿修成为柳州重建后灵泉古寺常住的主持人。也表现了覃连芳、杨义等人，还有热爱柳州名胜古迹的思想。

一九四九年柳州解放，政府遵照党的政策，对宗教界实行“三自”政策。庙里接收供养有限，教徒唯有走向新的道路。当时释愿修利用庙内的场地，发动信徒，在庙内办起纸盒厂，安排部分佛徒入厂工作，解决生活来源。其他教徒参加街道办的车缝组、社。在释愿修的开导带动下，许多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佛教徒。至今一些年老信教得到政府的退休费，都得欢度晚年。

为使灵泉寺香火不断，释愿修又送其女弟子释镇心前往江西云栖山受戒，作为她的继承者。

愿修师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六因病圆寂。教徒遵照她生前吩咐和安排，死后坐缸，坐幢幡宝盖。丧事一度轰动了柳州全城。

（李智程、韦普安二位老居士口述，韦明生整理）

【注释】

注①太白神：巫妇王修文乃一团长之姨太太，每装“降神”时，常称“太白神到，各人下跪！”人们因而以“太白神”作其混名。

抗战胜利后的柳州学生运动

董咸熙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夺取胜利果实，表面宣扬民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签订“双十协定”暗中却遣兵调将，准备发动内战。同时滥发货币，搜刮民财，全国人民，陷于窘境！师生生活，更加朝不保夕，为了民主，为了生存，在中共柳州地下党领导下，学生爱国运动，彼起此伏，一浪高过一浪！

（一）柳州中学生反暴运动

1946年元旦，柳州各界举行庆祝柳州光复大会。会后举行运动会，在柳中学生和宪兵团士兵争夺一万米赛跑冠军时，应跑二十五圈（每圈四百米），才够一万米，当宪兵团的士兵跑了二十四圈时，便称夺得一万米冠军，柳中学生跑完二十五圈，反而不算夺得冠军，必然提出不同意见，宪兵团就蛮横无理，殴打了柳中校长王剑功，打伤柳中学生钟展鹏，军管区中将司令王赞斌主持公道，暗下也挨了几捶！于是激起了柳中员生的愤怒，回校后，集中礼堂开会，酝酿罢课，上街游行，发传单，要求宪兵团登报，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

当时王剑功深怕事件扩大，怕会因此丢掉乌纱帽，连夜到柳江县中找我，请我禁止县中学生响应柳中学生的反暴运动，并约我同到龙中校长高天骥家，同样请高禁止龙中学生响应，并请高对柳中学自会主席梧玉茂（原是龙中学生）说，叫他息事宁人；同时柳州专员公署也觉得事件扩大，难于处理，也暗下和宪兵团打交道，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暴斗争，便烟消云散了。

（二）柳庆师范学校学生反饥饿的斗争

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物价高涨，群情沸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培养小学教师为己任的柳庆师范学校，严格控制学生，不愿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不给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不许音乐教师教学生唱进步歌曲。在数百学生共同阅读的阅览室内，固然看不到《新华日报》、《民主报》的影子，就是中性的大公报也看不到。所看到的全是中统、军统办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打滑报》、《民主晚报》。

1946年夏，学生每餐吃的是糙米饭，缺盐少油的豆腐青菜。此后，几乎这样最低生活也难维持下去的时候，学校还借口学生没有办好给养手续，拒绝发给学生伙食费。事关吃饭大问题，全校学生轰动起来，于是列队上街游行，发传单，部分学生沿街摆卖旧衣服，烂皮鞋……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给学校当局极大的讽刺和打击，最后，柳州专署不得不出面拨款给学校，解决学生的食饭问题。

1949年春，学校开学时，作为公费学校的柳庆师范，竟要学生缴交学杂费后才给注册，三月，学校又无理停发教师工资和学生伙食费，全校师生，在中共柳州地下党领导下，罢课三天，举行反饥饿运动！柳州专署和学校当局，被迫发给教师工资和学生伙食费，一场反饥饿的斗争，才胜利结束了。

（三）“六二”学生爱国运动在柳州

1947年，解放的号角吹响了，革命战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就在这严峻的日子里，柳州中学（柳高前身）的阅览室内，《新华日报》、《民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连篇累牍，不断地传来全国各地学生反内战，要和平，罢课、游行示威的报导，激起了全校六百多同学的注意；同时，学生自治会又接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各大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电

文。特别是5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学生游行队伍，造成死伤百人以上的流血惨案，震撼全国！

在这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在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学联，遂定六月二日，举行全国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爱国运动。随后，全国游行示威的浪涛，汹涌波涛！

柳州中学学自会，根据中共柳州市地下党指示精神，作出如下决定：（1）柳州中学是柳州的最高学府，义不容辞地起来联合柳州各中等学校，响应全国的“六二运动”。（2）以柳中学自会出面，先在校内宣传学生活动，张贴报刊登载的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实况，大造声势！（3）派同学分别到市内各中等学校联系，统一罢课、游行示威行动。（4）先召开学自会扩大会议，邀请各班代表参加，公开讨论罢课、游行、示威事项。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消息传到柳州专署，传到桂林广西省政府，桂系头目黄旭初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破坏和封锁桂、柳、邕、梧的学生运动，柳州专员（特务头子）林茂出面，督促柳州市内各中等学校校长，不许各校响应柳州中学的罢课、游行……否则出了事要负责任。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学自会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学自会的三个负责人都说了话，柯国雄说：老师生活困难，是因为物价高涨，我们要求政府降低物价，改善老师生活。梁就文说：全国各大中学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游行是正义的，应该声援响应。蒋志颺发言：物价高涨，老师生活困难，无法安心教学，请政府设法改善老师生活。会议通过了罢课宣言和游行示威。

一天深夜，休假的校长王剑功，亲自到宿舍找到柯国雄，他对柯说：“外面讲我们柳中要罢课啦，你不知道，这几天我们学校周围都有宪兵、军队、警察，若要闹罢课，他们就要抓人，闹出人命案来，那是千万搞不得的……”但是王剑功的威胁利诱，没有丝毫收获！

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两个晚上，高十二、十四班、十七班的教室里，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围着暗淡的灯火，忙着写标语。就在初中十六班、十八班的教室里，初中部的小同学，也在紧张地写标语。

两个晚上，共写了两捆五色纸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是：（1）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民主；（2）抗议无理逮捕学生；（3）要求政府改善教师生活；（4）响应全国学生“六二”总罢课；（5）全国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内战；（6）反对政府一党专政、独裁。

六月二日上午，集合的号声响了，同学们按惯例站好队，照例举行升旗仪式，礼毕后，学自会的副主席柯国雄走上升旗台，向全体同学宣布：“今天早上，召开全体会员大会。（1）宣布我们柳州中学全体学生，今天举行罢课；（2）通过我们柳州中学罢课宣言；（3）走出学校到市内各条街道贴标语……”这时，站在升旗台边的代校长莫若一，气急败坏地走上讲台去讲话：“柯国雄鼓动学潮，违反政府的规定，是要受处分的！”接着他向同学们大声呼叫：“解散！”同学们一个也不理睬他，一个也不动。柯国雄仍站在升旗台上，坚定地说：“今天我们开学自会的会员大会，学校管不着。我们是请求改善教师生活，你们学校不用管……我们的罢课是正义的。”接着布置各班同学上街贴标语，初中五个班在河北街道贴，高中六个班到河南去贴。街上的市民、工人，赶对河圩的农民都说：柳中学生有志气，敢于罢课，走上街来贴标语，专员、宪兵团长、警察局长也不奈其何！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不敢明目张胆的镇压，却暗下派便衣去撕毁标语。当天下午三时，学自会又组织学生买纸，又回校写标语，再上街头贴它成千万张。但他们又企图软化柳中同学，六月二日下午，救济总署柳州分署的两辆汽车，装满美国的救济物资——罐头奶粉，开进柳州中学，准备散发给同学，可是柳中的同学抵制他们的小恩小惠，宁愿吃盐水泡饭，也不肯去领美国的罐头奶粉！

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阴谋破产，利用学校放暑假，同学们离校回家时，柳州中学换了黄公健作校长，出了一张布告：“查柯国雄、梁就文、蒋志颺三人，言行乖谬，鼓动学潮，组织罢课，反对政府，勒令退学。”

一九四七年冬，被柳州中学开除的三位同学，均转移到中共广东西江游击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参加武装斗争，为解放

广东、广西、湖南作出了贡献。

上述几篇回忆录，经过石宝熙、柯阳两同志口头提供和书面的材料，加上笔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写作而成，如有错谬的地方，尚盼知情者指正。

广西大学学生在柳州的“返梧”运动

石宝熙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广西大学从贵州榕江迁回广西。在榕江时，西大曾遭到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图书仪器、教学设施及公私财物损失殆尽，处境凄凉。迁回广西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人人都归心似箭。8月间，一部分师生员工即已到达融县（即今融水县城）。9月间，大部分人员先后涌到柳州。当时，柳州半城已被日寇烧毁，难以安身。只得暂时借栖于柳州鹧鸪江原“国民党十六集团军妇孺共读学校”（即鹧鸪江园艺场），该地仅有几间破旧平房和一些破烂不堪的竹棚。数百师生员工拥挤不堪，生活十分狼狈。而国民党当局却集中精力忙于“劫收”分赃，根本置广西大学于度外。校址问题，师生生活问题，迟迟未予解决。

10月间，学校当局突然决定以鹧鸪江为临时校址，在柳州复课。匆忙间，大兴土木，前后仅两个月，就在鹧鸪江荒地上搭盖起几十幢大小草棚，最大的可容数百人的平铺大宿舍，小的也可容五、六十人的教室，课桌板凳都是长板木条支架，摇摇晃晃。不仅浪费巨大，而且层层贪污中饱，偷工减料。建成的草棚，风雨飘摇。1945年12月6日开始正式复课，一千五百余师生，一齐暴露在寒风冷雨之中。大家早晚要下河边洗脸洗澡，吃饭时，多是在树脚下，草地路边。下雨时，大部分草棚上面漏雨，四壁透风，地下潮湿泥泞不堪；晚上自习只靠一盏小油灯往返于宿舍教室之间。而当地的国民党驻军还到处设卡戒严，张贴布告：“不准自由行动，否则格杀勿论”！同学们在学习、生活及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大难之余，尚复如此遭罪。广大师

生实在不能再忍受。终于在1946年2月前后，发出呼吁，迫切要求早日离开这可怕的鹧鸪江。何去何从？成为当时的热门课题。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及广西省政府要求西大迁回桂林，目的在乎便于控制，而广大师生出于向往接近沿海地区，有利于文化和人才师资交流，力图靠近广州，便于与中山大学等高校联系，以摆脱或减弱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因此，极力主张迁回梧州碟山西大故址。由此就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返梧”运动。这场运动由学生自动发起，立即在班代表会上得到了大多数代表支持。并即席选举三十名委员组成“返梧委员会”，在学治会的统一领导下，具体组织领导这场运动。运动发起后，很快得到绝大多数师生热烈响应，立即蓬勃开展起来。

“返梧运动”表面上是广西大学究竟迁桂林或是迁梧州之事。实际上反映久经战火煎熬的广大师生向往先进文明，追求文化更好地发展，争民主，争自由的反迫害斗争。质言之，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政府要加强对民主的控制与广大师生的反控制的一场搏斗。因此，当时不仅在校内很快地掀起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以广大师生为基础的“返梧委员会”为一方，和当时“三青团”凑拼的一小撮组成的“护校委员会”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在校外也很快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仍在我地下党掌握领导的《柳州日报》就发表了热忱同情和支持西大师生“返梧运动”的文章，运动得到了社会的响应。最后，“三青团”的“护校委员会”终于在理论与事实全面前被批得一败涂地无法阻止进步师生的行动。“返梧运动”自此更向高潮发展，进入到具体组织部署向梧州进发，指日在梧州复课的具体行动阶段。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国民党当局马上放出流言，中伤“返梧运动”为异党活动，声言要取缔肇事者，国民党“柳州专员公署”派人封船封车，威胁船主，阻止学生包船往梧州，真有风雨欲来，乌云压顶之概。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的这一阴谋，1946年2月27日在“返梧委员会”的领导下，一千多名学生从鹧鸪江徒步到柳州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先在柳州主要街道环绕一周，最后得知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南京政府教育部派来的一位高级官员正在“专员公

署”之中。学生队伍马上蜂拥到“专署”大门静坐示威，要求面见黄旭初和教育官员，答复问题。一时间，“专署”门前的东大路（即现在的中山东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从下午二时起直到深夜十二点，男女同学席地而坐，不吃不喝，毫无懈怠。过往行人均瞠目而视，只能从一楼底侧身而过，（据知情者说，当时原定给黄旭初吃的筵席都无法送进去，最后只好由后面用绳子吊过围墙去）双方坚持达十余小时，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最后，一直到凌晨，当时的“柳州行政专员”莫树杰才垂头丧气地走出阳台，用沙哑的声音向同学们宣布：“第一，对同学们要求迁校梧州的心情和要求表示理解；但你们是国立大学，我们是地方政府，对迁校问题不能干涉，我们也无意干涉；第二，保证不会因此事对学生加以迫害；第三，保证不采取任何措施封车、封船，阻扰学生迁校梧州”。最后，他还假惺惺地说：“现在夜深了，同学们在外面受风寒挨饿，我已经叫下面腾出地方，请大家到里面休息休息……”好一个广西赫赫有名的莫树杰！在强大的民主气氛的压力下，也只能暂时收敛了。示威游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学们没有去欣赏“专员”的“好意”，也不再上他的圈套。大家都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浩浩荡荡地走到大光明戏院（即现在的“柳州剧场”）继续开大会，商讨迁校的具体行动，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迎着朝阳，徒步走向鹧鸪江。经过这次行动，扫清了“迁梧运动”的阻碍。不久，第一批同学欣然登上轮船向梧州进发。同时，学生推选出的代表何康（即现在的农业部部长）及唐天培等人也顺利地启程往重庆、南京等地请愿，“返梧运动”转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返梧运动”经过半年多时间，最后，虽然在国民党当局的谋划下，广西大学于次年五月在桂林复课，但经过这一次民主冲击，使同学们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而复课后，学校的教学设施及师生们的学习条件也得到适当的改善，大大地鼓舞了同学们争取民主的斗志。特别是在柳州的这次轰轰烈烈的示威大游行，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学生运动第一次同反动势力的正面交锋，给龙城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柳州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解放前的柳州香山慈小

赵 焯

香山慈小的全銜是“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抗敌将士遗族及义童学校。”

一九四一年八月才从三江县丹洲迁来柳州的香山慈小，是应柳州绥署参谋张任民及地方上热情教育人士所邀而迁来的。校址设在现柳邕路狮子山麓。（即现今的柳州柳邕一小校内）校址总面积约七千多平方米，校舍均为砖木结构。初开办时只四个班，四二年增至七个班，四三年增设了幼稚班，全校学生达四百多人。要求入学的人很多，不少家长均慷慨解囊捐助该校扩充校舍，新建了楼房一栋，秋季时便增加了两个班，学生共五百六十多人。校方还为远道的学生提供住宿，当时有七十多名学生住进了学校，学校还为这些内宿学生开膳，使们能在学校安心学习。

在学生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地方上热心办学的父老，经学校的建校委员会统筹募捐，为学校兴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礼堂，作为学生开会、演出的场所。一九四三年十月底，大礼堂将要竣工的时候，修建机场的第七工程处前来商借大礼堂作民工暂住和办公之用，并提出为学校代建楼房一座为借用的补偿。当时的校长张子招一再考虑，认为将大礼堂暂借给第七工程处，虽影响了学生和活动，但却可帮助工程处早日完成机场建设的任务，又可因工程处代建学校一座楼房而收到实惠，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因此便将大礼堂借给了工程处用。后来，借用合同期满，工程处修建机场的任务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期完成。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工程处又为学校捐建了两间教室，作为学

校增班之用。这时，学校的校舍建筑已趋完善，拟兴建的儿童图书馆尚待捐资开办。

一九四四年后，日寇由湖南长沙向南入侵，衡阳危急，广西桂林开始大疏散，柳州形势也跟着紧张起来。国民党当局命市民做好疏散的准备，并饬令中小学停课，提前放假。香山慈小师生在柳州有家可归的都各自回家，未有家可归的则随学校租船向三江县丹洲疏散。这时，日寇的进攻在衡阳被阻，时局暂时又稳定下来。柳州中小学多陆续开学上课。慈小师生匆忙从三江县丹洲迁回柳州原址，于九月一日继续开学上课。这时的慈小，已有十二个班组，学生共五百四十六人，老师二十一人。正当学校开学忙乱之际，驻防柳州的某军部进驻了学校，全部教室均给驻军占用，教室内不是住上了国民党士兵，就是给驻军当作军库放进了各种军需物资。学校以为这些驻军是路过柳州北上抗日的，便让老师带领学生在操场上课。不料衡阳战事重起，前方吃紧，衡阳不久为日寇攻陷，并挥师继续南下。桂林、柳州等地宣布紧急疏散，居民纷纷迁家外逃。学校被迫再次疏散，这次疏散地点是河池地区。当时交通工具缺乏，铁路车辆上上下下挤满了人，找部汽车更是难于上青天。至九月十七日，学校师生正在危急之时，第七工程处的疏散车勉强答应让出一个座位，让一老师护送病已垂危的张子招校长到河池去。这是大疏散中逃离柳州的第一批人员。不幸，病重的张子招校长在汽车开至欧峒抛锚时，因已病入膏肓，竟与世长辞了。时间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张子招一生为教育事业操劳成疾，病逝于抗日逃亡途中。这是他本人和慈小师生均料所不及的憾事。护送张子招的同仁在忙乱的逃亡途中历经辛苦将其遗体运返柳州，这时柳州已紧急大疏散了。同仁们将其遗体草草葬于大礼堂大门右侧，准备将来时局平静后再迁葬别处。日寇投降后，慈小师生从重庆返回柳州。为了纪念张子招办学功绩，大家决定将其遗骨葬于校内大礼堂右侧，并在其上建了“子招亭”，以示对他永恒的怀念。这是后话了。

当张子招校长带病乘车离柳后，留校师生到十月一日才挤上火

车离开柳州，投入了湘桂大撤退的逃亡洪流中去。一路上停停走走，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当时的重庆已是人满为患，各省的人都来到这里避难。慈小同仁来后，要想重建慈小确非易事，只好托各方人事，分散到各校去就读就教，挣些钱糊口度日。

一九四五年七月末，日寇被迫退出柳州，慈小同仁得悉，兴奋之余，便急发函电柳州建校委员会诸先生，询问慈小校舍情况。从复信中得知校舍未遭大的破坏，张任民在给慈小同仁复电中，还特别欢迎慈小原班人马急返柳州，复校上课。可惜的是当时车船票不易买得，一时无法回柳。一九四六年春，香山慈幼院领导到了重庆，得知柳州情况后，就令在贵阳的周仰岐先生就近来柳视察校址情况。当时的柳州专员莫树杰已令其秘书萧劲华邀请各机关首脑组成了慈小复校协进会，并函重庆同仁迅急来柳共商复校事宜。周仰岐四月一日到柳后即往慈小察看，校舍虽未遭毁，但却被粤桂公路工程局及湘桂铁路局占用。周又去拜访复校协进会各先生，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经与占用校舍单位商谈，均愿即时搬出。协进会还答应筹款修复损坏的校舍。周仰岐便于四月十一日从柳乘飞机往重庆，将一切情况报告了院方。院方当即派了周仰岐、王旭晨、邱建中、李凌云等人来柳筹办复校之事。

四个月的筹备过程中，经柳州善后救济分署拨款二百万元，柳江县府拨款五十万，湘桂铁路捐款一百万元，供修复校舍，购买桌椅之用。学校于八月二十日正式复课，共七个班级，学生约三百二十余人，教师三十人。尽管经过各方拨款资助，但校内教室破损之仍处处可见，战火留下伤痕仍一时无法消除。虽经周仰岐校长四处奔波求助，但因光复后的社会经济疲惫不堪，谁还能出资兴学？故学校仅能草草复课，企待日后的振兴了。

关于香山慈小的历史，简要介绍如下：

香山慈幼院的创办人是熊秉三（希龄）先生，民国六年秋，河北省永定河水灾，当时熊秉三督办顺直水灾帐务事宜，救活灾民百万以上。设慈幼局，收容水灾后无家可归儿童数百人。民国九年，在北京西郊香山静宜

园内的新院落成,便将慈幼局迁至香山正式开办规模宏大的香山慈幼院。内分五校,有婴儿园、幼稚园、小学、中学及各种职业学校和工厂。抗日战争时,慈幼院向内地迁移,一九三九年迁到我区三江县丹洲。一九三七年熊秉三病逝于香港后,由其夫人毛彦文继续主持院务。这年,慈幼院在贵州的芷江和我区的桂林各设分院一处。桂林当时为省府驻地,经常遭日机轰炸,慈幼院即迁至三江县丹洲(时为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九四一年则迁至柳州。

柳州市第二工人中学的始末

巫帮隆

解放初期，据不完全统计，文盲人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工农干部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故当时的扫盲工作，即成为首要任务，全国在1951年，遂掀起了一个扫盲运动。当时，柳州市先由文教局局长沈章平带队到中南局，学习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参加学习的有牛秀、李业功、胡深源等三人。他们学习回来后，局中即成立一个工农股（科），以牛秀任股长；李业功任扫盲组组长，随即开展宣传、培养干部，开始进行扫盲工作。1952年初，分别在河北、河南成立职工学校（小学班）。河北第一职工学校校长为董咸熙，河南第二职工学校校长为关广发。与此同时，又开办两个职工中学，工一中校长为刘祺祥，工二中校长为罗靖。我是从市一初中（二中）教导主任调到工二中任教导主任，教师有王之祜、谭元颢、杨遇春，职工有巫纪生。学校设在鱼峰山小学内。当时沈局长曾指示：“小学与中学共用，不是属于那个方面的，有事共同协商。”这个学校是从无到有，开办费只拨下三百元，以购置办公桌椅、床铺和必要的办公用品。此后每月办公费为一百元（充水电及纸笔墨等费用）。总的人事安排和业务指导，则由文教局负责，经费则由市总工会开支。

1954年，罗靖调离学校，我被提升为该校校长，同时也曾派来两名教师，即吕叔奋、叶惠明。1956年，又派来教导主任董咸熙和教师肖希，从此学生人数增多，教师队伍也逐渐扩大，这就更使领导的重视与学生的学习日趋积极。

办学最初只是准备办两个班，学生只凭单位的工会证明，不限

性别年龄，皆可免试入学。不料，报名人数太多（约四、五百人），仅柳州机械厂即将近一百，大大超过我们意料之外。于是只有向文教局请示。得到指示是：“增收一个班，考试！择优录取。”我们即按指示办法招生，录取了三个半班，约一百五十人。其中有河南邮电分局姓黄的两父子，烟厂姓周的两夫妇，通用机械厂姓凌的两兄弟，工人医院姓马的两姐妹。各单位工会保证学生学习时间，都把职工学文化列为议事日程。评优调资作为主要条件。柳州机械厂每晚都派专车接送学生。由于各单位领导重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迟到早退的现象很少。事、病请假，必须得到工会同意经学校批准。假期过长，工会给予时间，自动回校补课。

工中的学制，是暂时以普通中学为样板，实行三三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但又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适当删改一些课程，争取在实用上达到一般中学文化水平。在开始招收三个班之后，每新学期都招收一个班。1954年开始办高中，那时的班次共达十二个班。学生人数达五、六百人。每周授课十六节（星期日上午连上四节，除星期六晚休息外，其他每晚两节），每节五十分钟。各科课程安排如下：

高初中课程安排

年级	科目及每周授课节数			
一	语文 6	数学 6	物理 2	化学 2
二	语文 6	数学 6	物理 2	化学 2
三	语文 5	数学 6	物理 3	化学 2

新的事物出现，人们一时是不会理解的。我们晚上才上课，又不是正规学校，因而有人称我们为“猫头鹰教师”，似比一般老师要低人一等。这就使老师们产生一种自卑感，不大安心工作，后经上级领导耐心进行思想工作，方才基本安定下来。

我们的作息时间与一般学校不同。白天上午上班，进行业务学习、

备课和批改作业。下午休息，晚上上课，星期日上午课时更多，所以大家更忙。每周老师还要下厂一至二次，以便和工会联系，了解学生工作、学习情况，以求结合具体事实，进行教育，每个老师每周授课十至十二节课外，还要担任一至两个班的班主任。另外还经常组织到校外听课，以图吸收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曾经因为班数增多，老师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一方面请普通中学教师兼任代课，另一方面则请街道有大专水平的知识分子代课。初中每节代课费六角，高中八角。

为了适应学生的实用特点，我们定出了教学目的。在语文方面，要求使学生能写报告、写总结。在数学方面，要能计算、画图、看图。在物理方面，要懂力学、电学的基本原理。在化学方面，要懂分子结构和化学反应的基本知识。所以有的学生说：“这样学得来，用得上，也不枉花了许多宝贵时间。”因而学习都相当认真、积极。我们在教学方法上，是采取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原则。课堂上作业较多，占作业份量的百分之七十。课外作业较少，占百分之三十。这就解决了学习与工作脱离的问题。每学程单元测验一次，有段考，有期考。补考三科以上仍不及格者留级。形成一个制度，养成一种重实学的校风。

工二中从1952年初开办，到1957年结束。共费了六年时间。毕业高中一个班，初中九个班，共约五百人左右。1957年，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不到十人，而录取却有四人。即通用机械厂姓凌两兄弟，录上了华南工学院。工人医院姓梁的考取广西林学院，姓马的考取贵阳医专。至于其他学生，经过学习之后，有不少提升为领导或干部。如河南邮电分局的陈化红被提升为局长。农械厂的覃聚卫提升为厂长，蒋明提升为科长。通用机械厂黄伯熙提升为厂工会主席。诸如此类，真不胜一一列举，还有未毕业的十个班，也有五百多人，他们通过入学学习，也各得到不同程度的文化水平。

可是，1957年厂矿企业进行反右运动，1958年学校停办。所有教职员工，一律下放工厂的红专学校，从此这所工二中遂成为柳州教育史上的陈迹。

《屏山小学校名辩证》的辩证

刘锡香

一九八八年二月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出版的《鱼峰文史》第二辑关于“屏山小学校名辩证”一文，我认为不切合历史实际。

解放前的“屏山小学”全称为“柳江县屏山镇中心国民学校”，简称是“屏山镇中心校”。这是新桂系统治广西时，实行普及国民教育，振兴新广西，而创建的中心校之一。每个乡（镇）设中心校，每个村（街）设基础学校（初小）一所，学校的命名都以乡（镇）村（街）的名为校名。旧时整个河南都属屏山镇公所管辖，“屏山镇中心校是镇立小学，所以校名不是因屏山而得名，而是以镇名命名的。

屏山镇中心校的前身是马平县第二小学，始建于一九二八年，第一任校长是洪惠周。一九三二年，新桂系实行保甲制，才改为镇的中心校。一九四三年，柳江县中迁往拉堡木罗村新校舍，旧址（今市二中处）改设县立“实验小学”。那时河北的教育比较发达，中学有柳中、龙中、中正中学，豫章中学。小学公立的有柳东镇、柳西镇、城中镇三间中心校，还有几间私立小学。河南还没有一间中学，小学公立的唯有屏山镇中心校，另外有私立“香山慈小”一间。河南的父老们为了发展河南区的教育事业，积极向县政府建议，争取在河南也能设立一所县立小学。由于父老们的力争，一九四七年县里同意在河南设立一所县立小学。校址的选择上下几经研究，最后确定在屏山镇中心校的校址（今工人文化宫）来建校，而不是把屏山镇中心校更名，屏山镇中心校则迁至云头岭（今六中处）重建，校长是廖仲萍。新设

的这所县立小学，命名为“柳江县立表证中心校”，第一任校长是吴际平。当时屏山、表证两校并存。

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把各校的旧名改为以次第排列，原实验小学改为市一小，表证校改为市二小，柳东镇中心校改为三小，城中镇中心校改为四小，柳西镇中小校改为五小，屏山镇中心校改为六小。一九五二年“市二小”改为“工人小学”，一九五三年市里建立“工人俱乐部”（今工人文化宫前身），则把“工小”迁至今天鱼峰山脚（现鱼峰山小学），而不是因柳州解放时，由于学校设备破坏严重，无法上课，选用了“工人小学”（今工人文化宫）校址来建工人俱乐部。这是不切合事实的，因柳州解放时，没有任何单位受到破坏。而《柳州市地名志》称鱼峰山小学，为一九三七年始建，时称“屏山小学”更是不符合事实。一九六〇年新建“柳州市第六中学”设在“六小”内，中小学合并在一块，实行“一条龙”的领导，当时称“六小”为“六中附小”，到了一九六五年，中、小学共有学生将近2,000人。校舍、场地不敷应用，小学（六小）则迁至柳邕路下段新建，更名为“柳邕路下段小学”，文革期间改为“东方红小学”，今改为“柳邕路第二小学”。这才是“屏山镇中心校”的实际历史。

现在的“屏山小学”于一九六五年兴建，这是市人民委员会为解决这一带众多儿童入学问题，原文已叙明当时新建该校的目的，那时河南区的小学过于集中在区的东南两侧，市人民委员会在屏山大道设立学校是英明的。据了解：建校并没有明令为恢复历史悠久，早已迁走的“屏山小学”而重建。而新建的“屏山小学”的校名，是按所在地屏山大道命名的。这只不过是与历史悠久的“屏山小学”同在一个地区，同用一个名字，两者根本没有历史渊源关系，哪能说是一脉相承呢？虽然当年的“屏山小学”几度迁移，和更名数次，但她的实体却仍存在。如果人民政府有必要恢复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理应把今“柳邕二小”重新正名。因为只有柳邕二小才真正是旧屏山小学的继承者。屏山小学是我的母校，我想校友们都深知母校历史的，大家可以把这一多历沧桑的母校从头回想，自证吾言之不虚。

胡志明在柳州

陈铁生 刘汉忠

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三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胡志明曾三次到过柳州。这是不久前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一书披露出来的史实。

胡志明第一次到柳是在一九四零年夏秋之交。那年的六月，胡志明根据越南的国内外形势，决定将革命工作重点，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然后再相机向越南国内发展。不久他即去重庆与中共中央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而这时黄文欢等人则遵照指示，通过一位叫胡学览的越南爱国者介绍，到柳州市郊的大桥，和张佩公见面。张是越南人，在中国国民党军队任少将，国民党交有任务给张，要他组织情报工作和准备将来充当中国军队进入越南的向导。在几经交往的过程中，黄文欢看出张是个军阀式人物，是中国国民党的走卒，只想利用黄文欢等人为他搞情报，从而讨国民党的欢心，不是一个利于他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人选。这时胡志明从重庆回到昆明，又从昆明秘密到柳州，听取了黄文欢的工作汇报，指示他们立即离开张佩公到桂林去，以桂林做基地，在那里物色有利于革命的活动人选。结果胡志明和黄文欢等人很快先后离柳到了桂林，在桂林争取到李济深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使他们的革命活动取得了明显的合法地位，并成立了“越盟海外办事处”与“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

胡志明第二次到柳时间是一九四零年冬，那时张佩公已把他的队伍拉到中越交界的靖西县。张佩公队伍里有人同情越南革命者，他写信到桂林告诉胡志明，说越南国内许多干部到了靖西，建议胡志明

赶快去联系。得到这个消息，胡志明立即决定把在中国（桂林、昆明）的干部邀到靖西集中。胡志明为了此行顺利，他设法动员了张佩公致电桂林，说要邀请越盟办事处人员到靖西商讨工作。李济深接到张的邀请电，十分支持，赠送了路费八百元，并发给“华南工作团”证件，上面盖有蒋介石“中正”二字红色六印章。胡志明等人堂而皇之地从桂林出发，先到柳州，和从昆明来的其他同志汇合，然后浩浩荡荡地乘长途汽车到了南宁，再经周转，最后到达靖西。

胡志明第三次到柳是一九四三年春，这次他是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从越南过境准备到重庆，经过广西德保时被拘留的。先被解到桂林，再于一九四三年春，作为一名政治嫌疑犯被从桂林转拘禁到柳州的第四战区军人拘留所。关于胡志明被中国当局拘留的前前后后，《桂海春秋》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曾有李庆忠《胡志明柳州脱险记》一文予以介绍（以下简称“李文”），其中一些事实，与黄文欢回忆录中（以下简称“黄文”）所述有很大距离，很有澄清的必要。

一、“李文”说：“胡志明为了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坚持斗争，决定亲赴重庆，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会晤。”此与“黄文”所记不同，文中说胡志明到重庆的目的是会见蒋介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胡志明决定去重庆会见蒋介石是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从来很少人知道，虽有所知，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避免谈及，也有人说胡主席去重庆是为了与中共联系，不是去会见蒋介石，这种说法是由于没有人看到当时越南革命应取得国际地位的需要，具体地说，没有看到越南革命和中国这个反法西斯盟国建立明确关系的需要，因为中国当时为日本占领大片国土，正在进行抗战，并准备派遣军队进入越南。”对此还有当时越南共产党为营救胡志明大造国际舆论，致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文，可为佐证：电文中说明胡到中国是“代表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赴重庆向蒋委员长献旗致敬，并与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商讨事宜。”

二、“李文”说胡志明在德保被拘留后，由靖西保安局押送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室审查，启程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

而据“黄文”所述，胡被押送桂林的起程时间至少在十一月九日以前，他说：“越南共产党方面是直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底才从中国群众那里获悉胡志明被拘留的。”他们闻讯后，马上“以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名义致电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要求立即释放胡主席。”“孙科接电后即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十一月九日，吴铁城致电广西省政府和张发奎立即查明释放，但这时胡主席正被押解在同正与南宁途间，广西省政府和张发奎未能查明。”另外，黄文欢还谈到越南共产党致电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五日。“当驻重庆各国通讯社收到这一电文时，胡主席已被解送到桂林。”按此推算，十一月十五日的电文最迟几天内亦即十一月底前也会由驻重庆的各国通讯社收到，而这时胡“已被解送到桂林”。可证“李文”所说的胡于十二月十日才上路往桂林这个日子不确。

三、“李文”说，当时四战区“知道胡志明是‘越南独立战线’的代表，在越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只好将胡志明释放”。但遍览“黄文”，从未见其提到越南当时或以后有过“越南独立战线”这个组织的存在。当时越南共产党致电各国通讯社，表明胡志明的身分是“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之重要成员。”其真实身分是“共产党和越盟领导人。”而越盟的全称是“越南独立同盟战线”。（于一九三六年初在南京创立）。看来“李文”所说的“越南独立战线”恐系“越南独立同盟战线”之误。

四、“李文”说的胡志明在广西被关押了一年另十二天后，终于在柳州获释。“此话说得太过笼统，不知李对胡被关押的时间计算是从桂林开始算起，抑还是从柳州开始算起。而“黄文”在这方面说得很具体，而他“是参考了新近搜集到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原始材料，原作为更明确和肯定的证明”的。“黄文”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致电驻重庆各国通讯社，当他们收到这一电文时，胡主席已被解送到桂林，但几个月过去了，桂林仍未查明，他又被解送回柳州交第四战区处理。第四战区把他当作政治嫌疑犯，拘禁在军人拘留所，供给充足的食物，允许阅读书报，不服劳役。一九四三年

七月，第四战区查明原是一位国际活动人物……”不久，张发奎得知胡主席身分后，反而更加敬重和优待。一九四四年一月，张发奎致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胡志明迳留政治部察看，予以礼待感化”。当时，张发奎有意释放胡主席返回越南，对此，蒋介石驻柳州的特派员甚为不满……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胡主席获张发奎允许完全恢复自由，并即准备回国。”可知在这段时间里，胡志明仍被拘禁着，虽然待遇不错。恢复自由后，张发奎给胡“长期来回使用护照一张，其中必要证件和部分药品。中国钱币七万六千元。”“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胡主席同十八个干部一起离开柳州，经龙州、靖西、平孟回到高平。”

若从“黄文”所说，胡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以前被拘留，至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始完全获得自由，则被关禁时间已近两年，不止如“李文”所说的“一年另十二天。”

附：越南各党派在柳州的活动

黄文欢在回忆里，还记录了一些越南各党派在柳州的活动情况，现摘录如下供修志时参考：

一九四二年，越南一些党派的成员陆续到了柳州，并举行过一些活动，其中有一派称“复国军派”，约有五百人，集中在柳州大桥原张佩公工作队驻地，由农经猷、黄良带头，梁文意任军事指挥，中国国民党把他们看作是所属的一支别动队。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有被迫入伍的，如农经猷的佃户（农是越南谅山区禄平的一个地主）；有被抓来做饭、挑水、挑行李的夫役，也有盲目跟随他们的一些教职员。故在大桥集中进行法西斯式的军训时，因那些教职员反对农经猷和黄良，要求分开单位。中国国民党即安置他们在一家小旅馆，单独管理，企图将来加以利用。又有一派为以阮海臣、陈豹为首的越盟部分成员。阮海臣原为越盟创立初期积极分子搞派别活动，自称越盟负责人，从事政治欺骗。陈豹为越盟的叛徒，中国国民党的特务。曾以要挟和欺骗的手段，在中国国民党的安排下，把越盟人员一批六十人集中到距柳州七、八公里的附近单独训练，他们受到严格的管理，星期天才允许两三个人外出。

一九四二年，以重庆为靠山的越南国民党人武鸿卿、严继祖从昆明来到柳州，在第四战区的赞许下，于十月一日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但越革内部矛盾重重，思想无法统一，第四战区只好出面召集越南在柳州一些党派代表开会整顿越革领导机构，会议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到会各团体代表十五人，包括原属越盟方面的云南越侨解放会代表、驻南宁别动军代表、龙州解放会代表、大越党代表和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代表等。完成了越革改组任务。

柳州史事人物丛考（二则）

陈铁生 刘汉忠

一、马承荫叛乱柳州城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春，正当清廷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柳州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军事行动。镇守柳州的昭义将军马承荫为了依附吴世璠，把清军将领、广西巡抚傅弘烈执禁了。

这马承荫原籍宁夏固原人，祖上到他迁来南方已有三代，其父马雄因灭南明有功，被清廷授为广西提督，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清，马雄随附，不久在康熙的感召下又降清，得到赦免，后死于雒容。马承荫原与其父一同附吴，其父死后，他也于康熙十八年六月降清，随着上疏表示要效力赎罪，康熙从一统大业出发，不咎其既往，并授以伯爵，佩昭义将军印。谁知马承荫很快就把誓言抛到脑后，曾纵容士兵借口饷乏闹事，又无理地以自己管辖的五营兵少，而要求增至七营，因军制无此先例遭到拒绝，心更不服。1680年春天，清军在康熙的统一部署下，拟分兵三路会合云南对吴世璠作战，其中一路由征南将军赖塔率师从广西进兵，时马承荫镇守柳州，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阴与吴世璠勾结，蓄意复叛，正当傅弘烈统军经过，马以“邀计机宜”为名，把傅哄骗入城中囚禁起来，并即遣兵攻破清营，使康熙的进军计划遭到破坏，推迟了对吴世璠的作战进程。

马承荫的反复，使柳州一带沦于敌手，由于柳州“城小民众，米谷匮乏，周围百里村庄米粮，马承荫尽掠入城内”，致使康熙愤怒

已极，认为他“蹂躏疆土，扰掠生民，罪恶已极。”命令清军向马用兵，清将莽依图根据柳州地形和马的情况，向康熙奏请了作战方案：“柳州城即时（攻取），亦无不可，但地方甚恶，三面皆水，何忍以朝廷爱养精兵，肉搏城下，轻委之攻取耶？马承荫若降，则受其降，散其兵，随地安插，柳州得以无恙；若不降，则四面围逼，绝其饷道，柳州弹丸一城，不久可下矣”。以后柳州问题的解决，正是按照这一方案进行的。由于马的负隅顽抗，五月四日总督金光祖统兵败其于武宣，同日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收复雒容，初八日镇南将军莽依图在来宾陶邓地方与三万马军作战，在这次战斗中，马承荫出动了战象。但终未能挽回败局，清军乘胜追击，攻占了象州。至此形成了对柳州的包围形势。马走投无路，几天后，被迫率文武官员六百余名，兵七千多出降。对于马承荫的复降，这次康熙可不宽宥了，于七月令内阁学士萨慕哈将马及标下守备以上官员押解到京，破坏统一的马承荫终于逃脱不了一死的下场。

柳州的问题解决后，康熙二十年，广西的这一路清军与其他两路大军会合于昆明城下，包围了吴世璠，经过激战，攻占了昆明，吴被迫自杀，康熙终于迎来了长达八年的削藩战争的完全胜利。

马承荫叛乱柳州城是柳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柳州县志》只一语带过，所记不详，以上详情据《康熙起居注》《清实录》综合而成。

二、守城抗清的柳州同知王奕昌

王奕昌，字德符，江苏常熟人，生于明万历19年（公元1592年）曾任江西布政司理问，代理过高安令，由于有政绩，迁为广西都司断事。在南明时，先后代理过武宣，阳朔令，还任过柳州同知。

在代理阳朔令时，王发现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有反叛南明之心，就密报给当时的广西巡抚瞿式耜，让他早作准备。1645年7月，朱果然在桂林称帝，在梧州的瞿得到消息，写信去谴责，朱不仅不接受，反而派兵攻袭梧州，把瞿拘捕后用船解回桂林，囚于王府中，是时王奕昌星夜和思恩参将陈帮傅一道攻破王府，抓获了朱，把瞿解救了出

来。第二年朱由榔在肇庆登位，称永历。不久清军攻破广州，肇庆，永历皇帝逃到了桂林。1647年春，清军分两路向广西两大军事重镇进攻，一是桂林，一是柳州。时王奕昌任柳州同知，郡守和推官托病不出，分守副使逃跑，只有王和县令一道守城，他拒绝了浔州守将李明忠的劝降，派兵在断藤峡一带袭取清军船只沉入江底，有效地阻止了清军溯流而上进攻柳州，使柳免了一场战祸，也解除了桂林的后顾之忧。这次王固守柳州，对于南明政权的生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久他又以其威望，说服了阳朔守兵归附南明。1648年永历帝于肇庆升王奕昌为广西布政使司右参议，督理粮储。第二年，王在船上被乱兵误伤而亡，先厝于阳朔，五年后由其子扶柩回乡。

王奕昌其人在《柳州县志》无传，要不是其同乡、清代大文学家钱谦益为他写下墓志铭，恐怕他的事迹也湮没无闻了。铭文见《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为江南铁琴铜创楼旧钞，从未刊印过，前几年才在《中华文史论丛》第27集中披露出来。该文可补县志中人物记载不足。

戴叔伦过柳州题诗

司马宓

唐代著名的诗文大家到过柳州的除了柳宗元之外，还有一位戴叔伦。

据《柳州府志·艺文》载有戴叔伦的五言律诗一首，列在柳宗元之前。《志》载“答刘连州帮字”一律为柳宗元诗。《志》误排，故改。诗题为《过柳州》，其句为：

地尽江南戍，山分桂北林。
火云三月合，石路九嶷深。
暗谷随风过，危桥共鸟寻。
羁魂愁似绝，不复待猿吟。

这首诗写于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是他到广西任容管经略使路经柳州时之作。“经略使”为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始于边远重地设置的地方军事长官。戴叔伦与柳宗元的遭遇不同：柳宗元来柳州是被贬谪；戴叔伦到广西却是升迁。但他过柳州写的这首诗仍离不了“愁”字，那是因为当时这里尚被看作“百越文身”之地，“荒蛮瘴厉”之区，远离乡关，形同谪戍，所以不待听到凄切的猿啼声，已使得羁魂愁绝了。从这首诗中写出的火云、石路、暗谷、危桥等等，描绘了柳州一带的特殊环境和风物，反映出他那沿途艰辛跋涉的情景。

戴叔伦字幼公，他的生平，据《唐诗纪事》卷二十九记述，他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死于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32～789年），大半生活动在我国诗歌空前繁荣的盛唐时代，早年曾从学于萧颖士。因避乱由原籍江苏金坛移家到鄱阳寄居。经著名理财家刘晏推荐，做

过湖南、江西盐铁转运使，“博访选材，揖对宾客”，表现出颇有才干，曾被嗣曹王李皋表佐幕府（高氏《唐宋诗举要》）。后任抚州（治临川）刺史，作均水法，解决民间水利纠纷，便利灌溉，“耕广岁丰，狱无系囚”（《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由于他的政绩显著，官做到容管经略使，被人赞誉为“清明仁恕，治多方略”，晚年却看破红尘，上表自请出家，当道士去了。未几卒。

徐霞客游柳日程志略

(附徐霞客游柳路线示意图及地名正音)

潘朝业

明崇祯十年(丁丑岁、公元1637年)六月十三日上午,霞客舟过旧街,始于柳州之雒容县界。下午抵雒容南门,夜宿舟中。

十四日,昧爽,离舟步行。二十里至孟村(高岭塘)。再南行至南寨村西,逾岭至三门冲(按:即今古榕树处),横渡柳江,往南经马鹿堡(今村)而西入坳。经罗山、李冯山之间,至独秀峰,憩树下。因闻路人言,从独秀峰东南行里许,转北入一小坳,至罗洞岩(陆道岩)。以待静闻和尚故,匆促自罗洞岩返独秀峰,西行至王氏书馆所在之山下,渡江至柳州东门而入城。以寻静闻,复出城经开元寺(在今柳侯公园动物园内),再东北行至江边,入天妃庙而见静闻,夜宿庙中。

十五日晨,入城至寓处,以仆人顾行及静闻皆病,天气酷暑,在寓中追写三日来游程记。

十六日,出东门,沿城北行。至二贤祠西转观柳侯庙及柳墓。复至天妃庙,并觅医为静闻治病。

十七日,雨后溽暑,寓中休息。

十八日,复至天妃庙看静闻。归游罗池旧迹。回寓饭后,出小南门问融县舟,复循江东向至大南门。渡江游立鱼而望仙奕诸峰。

十九日,处理二病人留宿事毕,出西南门(疑即小南门),上沙弓小舟,夜宿沙际。

二十日,舟上柳城,夜宿古城堡(见本刊《游柳路线图》)——

以下简称（游图）。

二十一日，过柳城县，泊于旧县（见《游图》）。

二十二日，过大堡五里，暮宿。

二十三日，至融县之沙弓（见游图）。

按：此后自六月（小月）二十四至七月初八皆在融县游各名胜，本志从略。

七月初九，乘舟离融，夜泊沙弓。

初十，复经大堡、旧县、柳城、古城、古陵、皇泽圩（黄村）而抵柳州南门，夜宿舟中。

十一日，入城休息。

十二日，出东门投刺谒王翰简（启元）之子罗源公（罗源令名唐国）以疾辞。（按：《柳州府志》作康国，唐字必因原稿字迹不清而误抄）。

十三日，游仙奕岩，见篆书“钓台”二大字。（按：二字乃宋代名臣方信孺于嘉定二年题刻，霞客未及辨认）。其后，再游仙奕其他三洞。复游寿星及其南向支洞。下寿星支洞后又赴对山，登黄红色之“轰崖”。（按：即今一中同游山之黄崖）。午后，抵东台山，沿山东麓而行。历蛮王、蛇洞、杨文广等洞而抵姚埠，上山游王氏山房。日既暮，乃渡江入城。

十四日，在寓不出。

十五日，在寓不出。

十六日，在寓，作一书与罗源公。（按：霞客甚欲与柳州人士缔交，惜康国无缘。）

十七日，再以书投王罗源，但不俟回书即下舟准备下浔州。夜宿南门舟中。

十八日，舟行，经石狗湾（经江湾之凤凰咀处）、油闸、罗沟、山门冲、鸡腊、犁冲、横旋滩而至三江口（今江口圩），夜泊。

十九日，以多蚊，乘夜放舟。五鼓抵宾江（运江），后历象州、大容堡、红河口、菱角滩，夜泊泷村。

二十日，昧爽放舟，下大鹭滩（大陆滩），过武宣西门，至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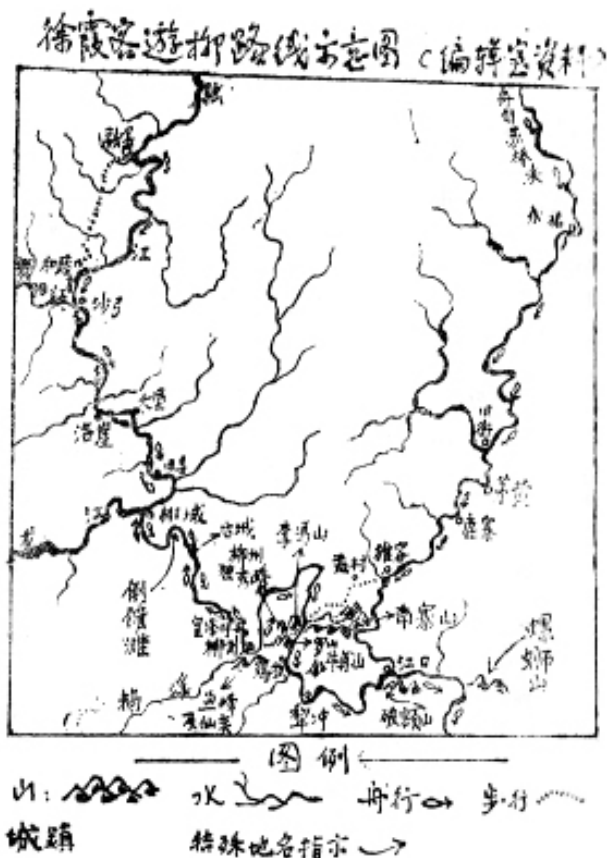
马堡而入浔州界。

徐霞客游柳所记地名多用近音

由于方音的差异，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地名多用近音字。今举其在柳州所记为例，以便研徐学者参考。

陆道岩记为罗洞岩。陆山记为罗山。两峰山记为李冯山。黄村圩为皇泽圩。窑埠为姚埠。油榨村为油闸。鸡喇为鸡腊。古灵为古陵。大埔为大堡。沙巩为沙弓。洛清江为洛青江。洛垢为罗沟。

(编辑室资料)



柳州八景与八景诗

陈显达

据清末民初的《柳州县志》载，旧传柳州八景有：一是南潭鱼跃。即立鱼峰与小龙潭的景物。二是天马行空。天马山俗名马鞍山，特出群峰之上，有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三是笔峰耸翠。即屹立于文笔路所向的文笔山，山势卓立，直上如笔。四是鹅山飞瀑。相传旧时有水自山半喷出，远望有台悬瀑飞舞。五是罗池夜月。罗池为唐人柳宗元常游之地，清池月色，令人幽思。六是东台返照。东台山削壁临江，夕阳辉映，水影山光，亦富佳趣。七是驾鹤晴岚。驾鹤山耸如孤鹤，独立江干，晴日烟岚，望之神怡。八是龙壁回澜。龙壁山石壁形似龙状，江水至此急转东北，旋涡万状，亦一壮观。

但《柳州八景诗》却与柳州八景名目不尽相同。其诗为：

一条玉带束龙腰，镇粤书声壮气毫。
东台独秀文风盛，北鹊轩昂驾鹤高。
西野鹅飞腾碧汉，南潭鱼跃奋青霄。
古迹留传天马上，罗池夜月映波涛。

诗中不举天马、文笔、龙壁三景，却换进北鹊山、镇粤楼及环城如带的柳江。显然与古传八景不同。

镇粤楼旧址在北门外，为表彰张岳于明嘉二十四年平鱼窝狼寨之功而建。可见此诗之作，必于明代后期以后。

鹅岗桥建桥始末

黄河究 刘思孝

柳州西南文笔诸山的水，在雨季涨水时，汇集而成鹅溪，过飞鹅坝，流过两块大石板，下有闷水，清莹透彻，鱼石可数。流至鹅山东边的平野，溪即曲折蜿蜒，两岸犬齿相互，河床内大石罗列，水流湍急，啮其涯，故溪傍广而中深，岸高二十余米。涨水时造成两岸隔绝，全靠舟楫摆渡，否则，要绕数里方可到达市区，至为不便。为了往返之便，曾由磨滩、基隆、渡口诸村的黄启清、黄启顺、梁少记（都是平民）领头发起募捐兴建此桥。初在1926年建成木桥，后因水势浩大，桥梁常被大水冲垮，因而又由以上诸人倡议募捐，兴建石桥，约在1945年建成，並立石碑记载其事。碑立南岸桥头，现已圯没。

1946年闹日本时，此桥南段被毁，后由柳铁分局改建，始成今日之桥，因桥建在鹅岗村外，故名鹅岗桥。其位置在今技术馆与鹅岗村之间。

解放前柳州的牛市

陈显达

柳州牛圩坪的牛市，在清末民初时已初具规模，它与当时河池六甲牛行并列，成为桂中、桂西两大牛市。

牛市地址随着柳州的发展几经更易。最初的牛市设在马鞍山脚至颇家巷大塘边一带地方。当时那里开设有好几家专供买卖牛只的商贩住宿和洽谈牛经牛价的“牛院”和“牛庄”之类的客栈。1929年，广西建设厅长伍廷飏开辟鱼峰路以繁荣柳州经济，牛市迁往云岭竹园中。后数年，再迁往谷埠街大同巷与维新巷之间。后来再迁往荣军路与蚂拐岩东边市场；解放前则迁回鱼峰山北面一大片空地上。

由于柳州水路方便，牛市上常有香港客商，来此收买菜牛返港宰杀，以供应港市居民之需。在交易繁荣时，每批菜牛出口多在百头以上。港商收购菜牛后，均交轮船拖渡转运回港。后因世界性经济不景气影响香港市场，港商来的也就不多了。

柳州市的牛贩和牛只除来自柳州附近乡镇外，也有来自柳城、来宾、雒容等地。在牛市上，还可见到湖南、广东的牛贩也参与交易。

解放前柳州的谷米市场

董光照

解放前，柳州是广西的大米市场之一，而柳州的最大米市则是谷埠街。谷埠街成为柳州的谷米市场，据老人说，在满清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了。

谷埠街为什么成为柳州的谷米市场呢？主要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第一、它的北端临柳江南岸。华丰湾，坡度比较平缓，河对面是沙街（现在叫柳江路），柳州大商行都集中在那里。从华丰湾启运米谷至广州极其方便。

第二、它的东南面是阳和、社湾、里雍圩、榴江县的道江圩、江口圩和象州县的运江圩、中平圩、罗秀圩，这一带的谷米多数经由水路运至鸡喇上岸，再由陆路运到谷埠街来销售的。

第三、它的南面是穿山圩。穿山附近农村的谷米和豆类，也是运到谷埠街来出售的。

第四、它西南面是双桥圩（现在叫进德）、百朋圩，西面是拉堡、成团、福塘、三都、里高，这一带的农村，是柳州产谷米最富庶的地区，特别是拉堡、双桥、成团附近农村出产的香梗油粘米，更是广州最俏市的优质米。这广大地区的谷米，经商贩或农民运到谷埠来销售。

第五、它的西北面的新圩、流山圩、洛满圩的谷米，大部分由陆路或水路运到谷埠来销售。

第六、自从有公路通南宁、铁路通贵州后，忻城县思练、大塘附近农村生产的谷米和豆类，有部分也经汽车、火车运来谷埠销售。

谷埠的谷米货源，由于来自附近百十里路的广大乡镇和邻县的一些乡镇，所以每年由阴历七月至第二年的三、四月间，每逢圩日都有十多万到二、三十万斤的谷米或豆类到谷埠街来云集出售（在八、九、十月间，平日也有一些，但不很多），特别是旧历的八月到十二月最为旺盛。所以在八、九、十这些月份，还未有公路之前，每逢圩日天还未亮，云头岭、接云街这些街道，都可以听到运载谷米的牛车，“嘎吱！嘎吱！”尖锐刺耳的声音由远而近向谷埠街驶去。

原来，牛车运输的谷米，是一直可以进到谷埠下街来摆卖的，后来因为时局不好，治安混乱，谷埠中街、下街都做了闸门（具体时间待考证）来保卫安全，牛车就无法进到谷埠中街下街了。这之后，谷埠上街就成为谷米市场最热闹的地方了。

抗日战争前，谷埠街收囤谷米的大商号主要有广荣安、安记隆、刘祥和、黄连和、庾松记等。抗日战争后，有刘祥和、黄连和、刘合昌、龙祯详、刘福民、练×记等商号。董太和大杂货铺，从未收囤谷米。

在未有柳邕公路和铁路之前。一些商号如广荣安等都到沙子岭（航空站大门北面附近），云头岭大路口设收购点。因为从百朋、进德、拉堡、成团、三都、里高这一带地区运来的谷米都要经过这些地方进入谷埠。

谷埠街收购谷米的商号，并不是真正的“收囤铺”。这些商号的老板们，特别重视货物的快速周转。他们上午开始收购，到下午两三点钟一收盘，就马上到沙街去将收购的谷米卖给那些大商行，一般是很少留过夜的。沙街的大商行主要也是把这些谷米运到梧州和广州去销售。所以谷埠街的谷米市场从来都是“多多益善”，有多少就收购多少，没有“供过于求”的情况。谷埠米市直到一九五〇年还兴旺不衰。

杨家将在柳州的古迹和传说二则

黄太茂

杨文广庙

在柳州名胜古迹中，旧时曾有一座“杨文广庙”，这是纪念北宋名将杨文广的祠庙。《柳州县志》曾有记载：“杨文广庙在驾鹤山下。”《柳州附志》云：“杨文广，太原人，狄青南征时，为广西钤辖，知邕州，抚驭有方，士卒乐为效死，时以名将称。”《柳州附志》还说，在皇祐初，杨文广任“广西柳州路兵马钤辖。”据史料记载，杨文广镇守广西大约十年。宋英宗时挑选边将，认为杨文广是“名将后，且有功”，调为成州团练使，屡迁为定州路副都督。后来辽宋互争代州地界，杨文广曾献出旧军用地图。他还建议进取幽燕，但不久病故。身后被追赠“同州观察使”的官衔。柳州人士为了纪念杨文广，也在城南驾鹤山修建“杨文广庙”，春秋二祀。可惜年深日久，古庙无存。

杨八姐与梳妆岭

梳妆岭，是柳州市北面屏障之一，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梳妆岭的得名，与杨家将也有关。据《柳州府志》记载：“梳妆岭在封门峡后，相传杨文广之妹闻兄被侬智高所陷，至此改妆而去。”所以此岭叫“梳妆岭”。民间也有一个传说：相传杨文广之妹杨八姐为了援

救被围困的哥哥——杨文广，她决心女扮男装去搬兵。下山前，她对着一块大岩石头梳妆打扮，然后下山搬兵。现在岭顶上还有一块大岩石，高约七米，宽约三米，犹如一块高大的镜面，人们说这就是杨八姐当年的“梳妆镜”哩！

竹鹅溪的传说

刘锡香

竹鹅溪，发源于文笔山，由大岭、杨柳、山头三条小溪汇集于文笔羊角汶后，水流蜿蜒潺湲，向北自鹅岗桥注入柳江。

据地方传说，溪原无名，到柳宗元治柳时，有一次到此春游，见溪水清莹，游鱼可数。两岸绿树婆娑，青草如茵，溪中一群白鹅戏波荡碧。柳宗元一时心旷神怡，竟忘贬谪之忧，沿溪流观景赏玩。第二天又复前往。行前，令人扎以小排带去。到小溪时，仍见白鹅在水中嬉游。他勒须而笑，把竹排放入溪中，追逐鹅群于溪中取乐。时人遂称此溪为“逐鹅溪”。“逐”“竹”谐音，相传渐讹。后人竟称“竹鹅溪”直到现在。

溪上有村也因此得名，称“逐鹅村”。后来也随溪名之讹而叫“竹鹅村”。再后村设驿站，站又因村得名，称“竹鹅塘”。因宋后计程十里为“塘”，每塘常设一驿站，“竹鹅，距府城约十里，恰是设一驿站也。”

[补白]

关于华丰湾名称的来历

华丰湾，地处柳江自北面而东曲流之处。旧名“麻疯湾”。或说旧时曾有麻疯病人住过，因而得名。或说此地旧时荒凉，遍生草茅，江风过处，萧瑟有声，因此便有“茅风湾”之名。由于“茅风”音近“麻疯”，俗传渐讹，遂有“麻疯”的屈称。后说似近常理，因为纵然真有麻疯病人，也必寻破庙岩穴居住，哪有自卧于沮洳丛草之中？

一九四五年，柳江县参议会感到“麻疯”二字不雅，曾于会上决定更名为“华丰湾”，是取华夏丰足的意思。而今，湾上竹木垂荫，楼宇相望，入夜华灯初上，处处传出袅袅清歌。果然证实“华丰”二字，确有先见之明。

(刘锡香)

柳州大水

明朝诗人桑悦，曾有一首记柳州大水的七言绝句，题为《柳州大水》，全诗如下：

十日十夜雨不休，
 龙城水欲女墙流，
 东市撑船过西市，
 不知撞破几烟楼！

桑悦没有写明柳州大水的时间，但从诗中的“龙城水欲女墙流”句看来，大水已涨到了城墙的“女墙”（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短墙处），可见水位之高。今年的大水，还没有涨得那么高呢！

(小秋)

柳南文史

第二辑

广西协筑湘桂黔桂铁路之经过

梁志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计划开发西南各省，决议发行公债一亿二千万元用以兴筑湘黔川桂铁路。同年四月，交通部着手制订筑路计划，因感于陆地国际运输线之重要，经请示行政院同意决定将其中的湘桂铁路展筑至镇南关（今友谊关），与安南（越南）的铁路衔接，假安南海防为吞吐港。

交通部计划之一的湘桂铁路系由湖南衡阳起，中经桂林、柳州、南宁至镇南关，全长1,043公里（一说1,046公里）。预算投资三千七百万国币，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其中国府负担两千万，其余一千七百万则由湘桂两省分担，（广西计划发行公债一千万，以田赋收入为公债担保，每年摊还一百万，分十年还清）。后因财力有限，筹措资金困难，修筑费用（包括黔桂路桂段）实际系由以下四种来源凑成：①交通部投资一亿一千九百余万元，此款系由建设专款旧路材料及向中英庚款董事会转借而来；②湖南省政府投资四百七十七万余元，广西省政府投资三百五十三万余元（合桂币七百零六万余元）；③财政交通两部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及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代表国民政府三次与法国银行团及中国建设银行订约借款，计：（甲）材料借款一亿五千六百万法郎；（乙）附带工程借款二千四百万法郎；（丙）英金借款十四万四千镑；④征用民地转作人民对该路投资额八十四万七千九百八十一元七角五分（发给湘桂铁路公司股票211,998股，计75,603张股票）。

次年（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国府急令交通部赶筑湘

桂黔桂两路，以适应抗战之需要。交通部随即与湘桂黔三省政府协订两路征工、征地、征枕等办法。双方分工：工程方面，由交通部组设之工程处负责；征调民工建筑路基，清查用地及征采枕木等工作则由各省负责。为适应形势之需要，尽快将路筑好，交通部同时决定，湘桂铁路分为衡（阳）桂（林）、桂（林）柳（州）、柳（州）南（宁）、南（宁）镇（南关）四段同时施工赶筑（但具体实施时有先有后）。同年八月，交通部设立衡桂、南镇两工程处，以侯家源为衡桂段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师，凌鸿勋为南镇段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师。次年（1938年）三月三日，交通部以湘桂铁路衡桂段已开工，南镇段亦已有成议，故再设桂柳、柳南两工程处，以侯家源任桂柳段工程处长及总工程师，凌鸿勋兼任柳南段工程处长及总工程师。至此，全路之兴筑始有整个计划。八月十四日，湘桂铁路公司成立。交通部任侯家源为该公司总经理，并将桂柳桂南两段工程处合并为桂南段工程局，以凌鸿勋为该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湘桂铁路各段最先动工者为衡桂段。该段全长 375 公里，路线所经之黄土井，为湘桂两省的筑路分界段。衡阳至黄土井路基，长约 208 公里，定为干线，由中站之冷水滩至零陵，长约 22 公里为支线，均由湘省征工建筑。黄土井至桂林路基，长约 167 公里，系干线，由桂省征工建筑。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广西成立湘桂铁路桂黄段（《广西年鉴，〈第三回〉》称为全桂段，不确）路工管理处。处长由省建设厅厅长陈雄兼任，副处长由蒋继伊专任。先后征调全县、临桂、兴安、灌阳、资源、灵川、永福、阳朔、义宁（今临桂县属）、百寿（今永福县属）、龙胜等十一县民工 309,374 人（内土方民工 134,874 人，石方民工 45,000 人，道渣民工 75,500 人，运枕木 54,000 人）于十月一日（一说十一日）开工建筑。并于沿线工地组设派出所十四所，其中十所负责监管民工所做的土方，四所负责指挥民工开炸与搬运石方工程，另设四所道渣所，负责承打石渣。次年（1938 年）九月，全段路基筑妥，共完成土石工程 4,471,440 公方（工费由广西负担）。十月，衡阳至桂林段通车。

衡桂段动工半年后，南镇段（全长230公里）亦上马。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一日，南镇段路工管理处于南宁成立，陈雄兼任处长，苏诚专任副处长，南宁区民团副指挥官邓笃初和龙州民团副指挥官邓殷藩兼任副处长。下设三个办事处、十六个派出所。先后征调横县、永淳（今横县属）、宾阳、隆山（今马山县属）、上林、都安、那马（今马山县属）、武鸣、宁明、平治（今平果县属）、龙津（今龙州县）、养利（今大新县属）、明江（今宁明县属）、果德（今平果县属）、上思、镇结（今天等县属）、左县（今崇左县属）、思乐（今宁明县属）、万承（今大新县属）、雷平（今大新县属）、龙茗（今天等县属）、邕宁、上金（今龙州县属）、绥淦（今扶绥县属）、隆安、崇善（今崇左县属）、凭祥、同正（今扶绥县属）、向都（今天等县属）、扶南（今扶绥县属）等三十县民工214,662人，于同年四月开工建筑。至次年（1939年）五月，已完成全部土方工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计707,036公方（工费由广西负责）。同年十月，由镇南关经隘口、下石圩至宁明河边一段（约长56公里）已通车。并与安南铁路衔接，开始运输由法方代购之材料，供应路段使用。不料一个月后（即十一月二十四日），日寇占领南宁，工程被迫停工并予以破坏，路段铁轨亦被拆移至黔桂路使用。

南镇段施工后三个月，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桂柳段（全长178公里）路工管理处在桂林成立。陈雄兼任处长，蒋继伊专任副处长。下属组织同桂黄段。先后征调富川、钟山、恭城、昭平、蒙山、平乐、修仁（今荔浦县属）、荔浦、三江、融县（今融水、融安县）、中渡（今鹿寨县属）、榴江（今鹿寨县属）、雒容（今鹿寨县属）、柳江、柳城等十五县民工103,396人（内土石方民工94,069人，运枕木9,300人。其中有瑶族同胞一万余人），于同年八月十六日开工建筑，（有些史料说是六月一日，有的说是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均不确）。除永福矮岭至柳江桃花坞一段特殊工程（全长26公里）由桂南工程局建筑外，其余均由该路工管处负责实施。次年（1939年）六月，沿线各地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已建成路基被冲坏不少，材料亦有损失，

民工被溺毙二、三十人。七月，黄冕一带霍乱流行，筑路民工死亡甚多，尚未染症者纷纷走避，土方工程大受影响。延至九月，路基始全部筑成（工费由广西负责），共完成土方3,925,529公方，十二月十五日全段铺轨完竣，次日，首列满载支援攻击昆仑关之重炮专车，由桂林驶柳。

柳南段（全长260公里）路工管理处亦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在南宁成立。陈雄兼任处长，苏诚专任副处长，浔州区民团副指挥廖庆祥和玉林区民团副指挥官肖道龙兼任副处长。下属组织仿南镇段，设四个办事处，十八个派出所。先后征调贵县、兴业（今玉林市属）、桂平、柳江、玉林、来宾、象县（今象州县）、罗城、邕宁、宜山、平南、博白、北流、陆川、武宣、忻城、迁江（今来宾县属）等十七县民工153,543人，于同年八月开工建筑。至次年（1939年）十一月上旬，路基工程已完成百分之八十，计5,850,204公方（工费由广西负责）。适日寇入侵桂南，形势紧张，该段即行停筑并于破坏，民工遣散回原籍。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桂南会战结束后，日寇退出广西。为便利合山煤运，该段开始由柳州向来宾铺轨，同年九月（有些史料说是1941年9月，不确）通车至来宾县城西十五华里之水落村。此外，为便利盐运，于柳（州）来（宾）段之凤凰站架设长18公里至大湾支线，此线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勘测，九月动工，次年（1943年）三月通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交通部决定兴筑黔桂路。四月一日，黔桂铁路工程局成立于宜山，由侯家源任局长兼总工程师。八月二十三日，黔桂路桂段（由柳州至南丹县泗亭，全长302公里）路工管理处在南宁成立。陈雄兼处长，苏诚专任副处长，柳州民团副指挥官练达和庆远区民团副指挥官何世任兼副处长。与湘桂路南镇柳南两段工管处合署办公。十一月下旬日寇进犯南宁时，迁宜山办公。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陈雄辞省建设厅长职，遗缺由阚宗骅接充，各路工管处处长即改由阚兼任，各兼任副处长亦于此时撤销。黔桂路桂段工管处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开始先后征调柳江、柳城、融

县、宾阳、三江、上林、来宾、罗城、武宣、雒容、忻城、隆山、宜北（今环江县属）、天河（今罗城县属）、南丹、中渡、迁江、宜山、都安、河池、思恩（今环江县属）象县、那马、榴江等二十四县民工252,470人（内土方民工179,678人，运料792人，运枕木72,000人）。先筑六甲以东路段183公里，十月开始动工修筑。次年（1940年）春，交通部决定移湘桂铁路镇南段和桂南段之材料敷设黔桂路。五月三十一日，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第477次会议通过批准黔桂铁路工程局发行地价券，偿还期为五年，每年抽签还五分之一，利息为八厘，每年发给一次。七月一日，由柳州南站开始铺轨，十月十日即通车至宜山。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一日通车至金城江。四月起，展筑六甲以西之路段119公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通车至六甲，七月三十日通车至拔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通车至侧岭。二月，桂境路基全部完成。五月，通车至贵州独山。六月六日，举行黔桂铁路通车典礼，开始正式通过柳州城站（今火车东站）与湘桂铁路举办联运。十月，交通部下令撤销城站，两路改在南站联运，黔桂铁路工程局长侯家源以南站距市区过远（3公里），市民往返殊感不便，且迭接各方函电要求维持城站之设立，乃亲自谒见交通部长曾养甫，请求收回成命，保留城站不撤，在座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表示深切赞同侯的主张，城站乃得以维持。

修筑“湘桂”、“黔桂”两路，广西人民秉着“有力出力”“有物出物”的精神，踊跃参加，争作贡献，因而各路段工管处才能两年之内集中民工百万（广西当时共有壮丁二百四十万，参加修两路之壮丁约占全省壮丁总数百分之四十。征调原则：由各工管处查照所需工额，时间长短，以路线附近各县壮丁多少为比率，近者，按壮丁总数征调百分之五十至七八十，远者，征调百分之十五至五十，配定应征人数，分令各县政府，成立征工队组织实施），其中有在一个月发动十余万人报到者（柳南段），有一个县出工三万余者（贵县、上林、桂平）。“广西素称贫瘠人稀，又值抗战时期，于兵役及其它服役之外（如柳江县在1938年，除征调10,140各壮丁修铁路外，还征调3,500

人筑公路，12,280人修飞机场，1,670人筑防御工事，9,134人运输军用品，22,012人运输军粮，1,500人修水利。全县参加服役壮丁共计60,236人），在极短促之时间，征调集合，有如此优良成绩，其平时训练之严，组织之密，由此可见”（凌鸿勋向交通部总报告语）。“开工后，昼夜兴筑，遍地烽烟，未尝沮其气，弥天轰炸，不足攫其心，共砺尝胆卧薪之志，卒竟逐段完成之功，此种艰苦卓绝牺牲奋斗之精神，实足以规吾民爱国之热忱”（侯家源之评语）。“此种精神，殊足令人歌泣”（翁文灏评语）“（与其它省筑路对比）办理最善，收效最佳者，端推桂省”（聂肇灵评语）。“桂省人民给予国家之贡献，不可不谓相当伟大”，而“桂省利用民力之伟大，诚足为我国交通史上辟一新纪元”（凌鸿勋评语）。

然而，广西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由于劳动强度大，营养差，居住条件恶劣，医疗设备不足，致使员工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患病者日众。据不完全统计，仅湘桂路南镇柳南两路段和黔桂路桂段。染上痢疾、疟疾、斑痧、伤寒、霍乱以及其它病症者，即达82,660人，平均每百员工即有十五人得病。加上施工方法落后，作业条件不良和天灾所引起的伤亡事故，这三个路段总共死亡员工2,943人（职员12人，民工2,931人，其中有柳江县民工45人，如加上桂黄桂柳两段员工死亡数则更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湘桂黔桂两路局，曾计划在两路交点之柳州建一“征工筑铁路纪念碑”，附刊殉职之员工姓名于上，以资纪念，而垂永久，已函请广西省政府撰送序文，嗣以敌陷桂柳，其事遂寝。在此之前（1944年春），两路三段专任副处长苏诚，为纪念广西民工协筑铁路劳绩及培植本省铁路中下级干部，个人出资在宜山创设“广西路工纪念中学”，并自兼校长。凡筑路殉职员工子女考入该校肄业者，有免费之优待，毕业后派在铁路机关服务（至少服务半年，始准升学，已商得两路当局同意），不料（初中两个班）仅开学两月余，敌薄桂柳，学校疏散天河（不能上课）。光复后，苏回宜山筹划复课，不久病逝。该校乏人领导，经费无着，校产校址随即交宜山县立初级

中学接收，条件是在该校内设立“路工纪念室”及“苏校长纪念亭”。

其次是由于物价增涨，使物主蒙受不少损失。如两路铁道所需之枕木，广西前后在资源、三江、龙胜、融县、百寿、灵川、兴安、全县、罗城、灌阳、临桂、永福等十二县征采1,002,711根。最初，协定甲枕每根价为1.2元，后因物价迭起，生活指数直线上升，甲枕价每根虽先后调整至3.25元、5元、10元、然仍未能跟其它物价增长之幅度。尽管如此，大多数物主都能以大局为重，为了国防工程需要，不予计较，仍如数按协定价格交征。仅此一项，即损失（少收）数百万元。

最后是由于中央不守信用，单方撕毁协定，不办任何手续，不给分文补偿，即强行将湘桂路收归国有，使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以桂黄南段为例，筑路时，总共征用私有、省有土地七万余亩，迁移房屋335间，坟6,676座，种植物1,572,601亩。当时仅发迁移补偿费24,287.21元，其余系发给湘桂铁路公司股票。（仅苍梧一县即占7,535股——殷绅富股5,253股、村街股2,282股）至于广西省政府投资之款（用作迁移损失赔偿费、民工伙食费、征集材料费以及其它管理开支），亦系向全省各村街绅富、殷商、矿商及机关公务员分头募集，由各人分担。因此，广西在该路所占的股份，实际完全是由全省人民投资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光复后，中央以复路为名，不办正式手续，不给任何补偿，即强行将湘桂铁路收归国有，与黔桂路合并，组成湘桂黔铁路工程局管理。这对于曾经以其血汗钱及赖以养生的土地投向该路的人们，无异是当头一棒！省内各界当即对此议论纷纷，愤愤不平，就连官办的桂林《中央日报》亦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一日发出“湘桂铁路的收用手续和收用价款的补偿，必须及早办理”的呼吁。但中央当局始终不予理睬，直至其政权崩溃前夕，仍无下文。

柳州公路发展简史

梁昌权

柳州地区公路,已有50余年的历史。1925年11月开筑柳石公路;1926年柳庆公路总局成立,柳州驻军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伍廷颺任该局总办,1926年陆续兴建南柳、大六、柳荔、柳长等线,1927年伍氏晋升广西建设厅厅长,1929年10月,以上线路全线竣工。以柳州为中心的陆路交通,汽车可直达南宁、桂林、庆远(宜山县)、石龙、长安等地,行人往来,城乡物资交流,颇为便利。1949年11月柳州解放,1950年1月1日,成立柳州公路军事管理委员会办事处,接管以上路线计长352公里。

建国初期,以恢复交通,支持清匪反霸为主要任务。1954年修建浮泗、欧(洞)忻(城)公路;1956年修建六来、长板、忻古、石象、拉进、石武、沙大、上车、浮宜等9条新路。大跃进的1958年新开筑长古、红竹、桐金、北欧、岔忻、融三、武通、象桐、鹿中等9条公路。到1959年底止,以上公路计长781公里。此后,虽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文化大革命”动乱,柳州地区公路依然有所发展,到1971年止,增加武三、桂泗、石凤等线共42公里。1981年底止,接受英三、中小、古林、埔塘、岔龙、鹿清、古迁、来陶、忻加、周金、柳洛、拉进、桂泗等13条新线,计长363公里。特别是1958年的改弯降坡工程突出,把鬼子坳、香炉坳、古木坳、沙坪等路段坡度降低,实现了公路运输拖长化。全地区基本实现社社通汽车,大部分大队有公路。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对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公路养护和油路建设方面。1950年接受的建国初期公路，大部分的碎石路面，路况基础差，多数凹凸不平，行车十分困难。1956年起，柳州地区公路开始引进保护层、磨耗层路面，且历年来的勤修细养，路况逐年不断改善。为了适应公路运输的发展需要，1971年开始铺筑南柳油路，到1976年止南柳、大六全线、柳广、柳沙、柳覃的一部分及柳江公路段实现了公路路面黑色化。到1988年止，柳州公路总段铺设油路888公里，占受养里程的49.29%。

在桥梁工程架设方面。建国初期的桥梁，除园艺场桥、许家村桥、大帽桥、丹洲桥等4座石拱桥；石台木面的三拱桥、杜村桥、龙江桥、乾怀桥以外，皆桥面窄，载重通过能力有限，难以适应运输的需要。从1956年起，国家有计划地新建、改建重要路线为永久性桥梁。1960年代以在拱桥为主，1966年开始引进双曲拱桥，同时对原有窄桥进行逐步加宽。到1989年止，全柳州地区实现了桥梁永久化，消灭了沙埔、斗江、贝江、雒容、脚板洲、鹿寨、罗秀、迁江、来宾、清水河、柳州、古宜、大埔、武宣、融安、象州、石龙等17个渡口，缩短了待渡时间，加速了车辆周转，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解放前柳州民航史略

梁 辛

广西办理民用航空事业，始于民国二十二（1933）年。柳州正式设站，有定期班机往返升降，则是民国二十五（1936）年十一月五日以后的事。不过在此之前七年，即一九二九年，柳州已有民航性质的飞机降落过，那是广东航空处为发展民用航空事业所作的一次试验飞行。这一年的二月初，广东政府电告广西省政府，谓为发展民用航空起见，拟辟粤汉（武汉）航线，计划先飞柳州，如同意请着手建筑飞机场，以便飞机抵柳之升降。中旬，驻柳的第十五军第一师，即奉令在河南帽合标营前一带畲地修筑飞机场。三月，粤方获悉柳州机场平整完竣，即派“中山”号飞机，由广州沿西江、浔江、黔江西飞首航柳州。该机由飞行员曾传贤驾驶，搭载广东航空处代表陈卓林，于下午一时在帽合机场顺利降落，受到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兼广西省建设厅长伍廷飏和马平县长陆希澄等百余人热烈欢迎。柳州人得睹飞机真容即自此始。未几，粤桂之间因“武汉事件”反目，兵戎相见，此计划亦随之告吹。

（一）

三十年代初，民航以崭新的姿态，在全国各大城市出现。广西当局鉴于航空在交通及国防上之重要，乃于一九三三年与粤省（粤桂已于一九三一年通款言和，化敌为友）共同投资200万元毫币，合组“西南航空公司”，向外订购士汀逊厂二一五匹马力四座位客机三架（分

别命名为“长庚”、“启明”、“北斗”号)、哥德士莲厂一一零匹马力两座位游览机一架(命名为“天狼”号),于一九三四年夏试航成功,十月正式开办广龙线:由广州经梧州、南宁以达龙州。当日自龙州飞返南宁,次日由南宁飞返广州。最初,每周对航两次:星期二、五西上,星期三、六东下。嗣营业发达,增为每周对航三次:星期一、三、五西上,星期二、四、六东下。

一九三六年夏,粤桂酝酿联合反蒋。为方便与外界联络,乃于同年七月十日增辟广河线:由广州经梧州南宁、龙州至越南河内。每周往返一次。星期五上午由广州西上,星期六上午由河内东下。同时与越南约定,实行中法民航联运办法。自此,两广与欧洲之间航空邮件,仅三数日可达,颇称便利。

一九三六年十月,广西省政府由邕迁桂。十一月,西南航空公司将广龙线改为广邕线,增设桂林和柳州两航空站。此线由广州经梧州、桂林、柳州以达南宁,每周对航两次。十一月五日中午十二时二十分,“长庚”号由桂飞柳,于一时十分抵柳州上空,为扩大影响,该机绕市三匝始降。但市民对通航一事反应并不热烈。原因除大家对飞机已司空见惯外,更主要的是认为民航班机并非他们乘坐之物,与百姓无缘。因当时桂林至柳州的机票每张售价三十元国币,此数相当于稻谷四百余斤,为汽车票价的三倍,一般民众是支付不起的,次年春,该线航班改为每星期二、三由桂林起飞,(《广西年鉴》)第三回误记为星期一)经柳州、南宁至梧州,当日由梧州飞回桂林。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机频繁空袭广州。为安全计,西南航空公司由广州(《广西年鉴》第三回误记为柳州)迁桂林。广州沦陷后,航班飞行时遭日机威胁,被迫全部停航,将所有飞机让与中央航空委员会接收使用,该公司遂告正式结束。

(二)

一九三七年,交通部中国航空公司(系交通部于一九三零年八

月与美国飞运公司合资经营，后改为与联美公司合资经营）及欧亚航空公司（系交通部于一九三一年德国汉莎公司合资经营，中德绝交后改为国营，于一九四三年二月改称中央航空公司）因国都西迁，西南空运甚关重要，乃积极筹设与西南有关之航线。

中国航空公司初试办筑（贵阳）港（香港）线，在桂林、梧州设降落站。不久改为渝港线：由重庆经贵阳、桂林、梧州至香港，并以柳州为备用站。一九三八年元旦，该公司在桂林设立分公司。同年底，增辟滇渝桂线：每星期一由昆明飞经重庆达桂林，并于当日折返。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原有的渝港线缩短为渝桂线。滇缅战役后，政府急需输入国外物资，该公司先后增辟几条新航线，其中之一有重庆，芷江、柳州航线。

欧亚航空公司于一九三八年初开辟滇河桂港线，因桂林当时正在扩建机场，暂不能降机，改降柳州。该线分柳港及柳昆两段航行：每星期一、四下午二时由柳州飞香港，每星期日、三上午十时十五分由柳飞昆明，均当日到达。柳州至香港每张客票为国币一百四十元，至昆明为国币二百零五元，货物交运每公斤收费照客票价百分之一计算。行李免费十五公斤，超过每公斤柳港收二元一角，柳昆收三元一角。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该公司“十五号”机由香港飞昆明，在广东省英德县佛岗上空，遭到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日机三架偷袭，身中数弹，最后勉强坚持飞到柳州。自此，该线被迫改为不定期飞行，同年十一月中旬，桂林机场扩修完竣，欧亚公司即将柳州站撤销，建立桂林站，将滇河桂港线改为渝桂昆线，初拟以桂林昆明两站为终始站，重庆为转运站，旋又决定每星期一由重庆起飞至桂林，当日继续飞往昆明，星期二由昆折返，后以乘客渐多，改为每周对航三次。一九四〇年七月，增设桂昆来回班，中途在柳州停降。一九四四年，又增辟蓉桂线。另外，为发展渝闽空运，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夏，曾着手筹设由重庆经贵阳、柳州、曲江、赣州至建瓯之航线，旋以敌发动湘桂战役，柳州失陷而中止。

一九四四年秋，敌薄桂柳，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在广

西所设机构相率西迁，全省航空事业完全陷于停顿。

抗战胜利后，复员者日众。中国航空公司首先利用各地军用机场设备，恢复不定期飞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重庆至柳州正式通航，每张客票为国币三万元，航程约三小时可达。次年，该公司正式在桂林恢复办事处，并于同年七月开辟沪京汉桂粤港线。这段时间是空运最繁忙时期。挂着各种头衔的接收大员，自川、滇、黔经柳州飞往全国各地“劫收”。每天，柳州机场平均（包括美国军用运输机）五分钟即有一架飞机起落。同年十一月九日，该公司又新辟穗昆线，每周星期日由广州经柳州飞昆明，星期一由昆折返。票价：柳州到昆明十三万元，柳州至广州六万五千元，至香港八万二千五百元；货运至昆明每公斤一千三百元，至广州每公斤六百五十元。一九四七年四月，该线延长至香港，同时恢复渝桂段，并入沪京汉桂粤港线飞行。至年底，渝桂间旅客稀少，该段遂停航。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因货币贬值，油料飞涨，加上客货、邮政、行李等运量全面衰退，营业困难，公司决定收缩业务，沪京汉桂粤港线随之全部停航，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行将总崩溃时，南逃之机构及人员激增，此航线遂再恢复。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港昆线改为自香港经广州、桂林、柳州、南宁至昆明，每周往返一次。广州解放后，则改由邕（不经桂林、柳州）直飞香港。

前身为欧亚航空公司的中央航空公司，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才在柳州设站复业。航线有二：一为港穗柳昆线，一为柳汉沪线，每周对航两次。柳州至昆明，客票每张为国币九百一十万元，货每公斤收国币九万一千元；柳州至广州，客票每张为国币五百九十万元，货每公斤国币五万五千元；柳州至香港，客票每张为国币八百七十万元，货每公斤收国币八万七千元；柳州至汉口，客票每张为国币九百八十万元，货每公斤收国币九万八千元；柳州至上海，客票每张国币一千九百八十万元，货每公斤收十九万八千元。随着沪、汉、穗、柳等地相继解放，该公司这两条航线亦跟着先后消失了。此外，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队曾经于一九四八年冬开辟过沪京汉穗线，此

线逢星期一由汉口径衡阳、桂林、柳州至广州。星期二折返，桂林至柳州的票价为三百一十五元金圆券。一九四九年春停航。

(三)

解放前，柳州的民用航空事业虽已有十余年之历史，且初具规模，但因限于一般民众之生活水平尚低，无法乘坐民航飞机，故仅为极少数达官贵人和豪绅富商之交通工具。故其对交通上之价值，在量的方面，实无甚重要。以两广合办的西南航空公司为例，自开办至结束，每周由柳州站上落之乘客只不过为一二人，累计总共不到百人，货运量则几乎等于零。

更有甚者，在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淫威下，航班竟演变成他们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的工具。一九四四年八月，柳州奉令疏散，河南城站堆满急待转运至云、贵、川等省的各种物资。而黔桂铁路列车由于燃料不足等原因，开行已不正常。一些货主无奈，只好忍痛削价就地抛售。有权势者乘机将货物收购下来，利用特权把它变成免税免费的“行李”，用飞机运到西南一带出售，牟取厚利。仅中国航空公司渝桂线，一九四四年免费运输的行李，即为收费行李的7.5倍，中央航空公司昆桂线，一九四四年免费运输的行李，竟达收费行李的一百四十二倍！

至于国民党当局，利用民航运输快捷的有利条件，大干镇压人民和掠夺胜利果实的勾当，更属家常便饭了。仅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经柳州中转去抢占受降区的专机（运部队和军火）即达六百架次以上。一九四九年夏，当一万元面额的金圆券丢在柳州大街没人捡时，中央银行立即用专机运来几十箱取代金圆券之银元券，强迫民众使用。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即从百姓身上榨去相当于一百多斤黄金的财富。

解放前的柳州航班，也曾经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如一九四五年秋，广西十七个县发生霍乱，其中以柳州为最烈。联合国救济总署

广西分署及时雇请飞机从上海运来疫苗和药品，分发给各县防治，使疫情得以控制，不致蔓延扩展，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一九四六年春，柳州等地出现几十年罕见的旱灾。柳江城乡无米为炊者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众多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联总广西分署于三月下旬利用航班空运面粉五十吨到柳办理急赈。随后，又陆续空运面粉三百吨、大米二百吨（另由水陆路运输面粉二千七百吨、大米八百吨）分发给广西各县受灾饥民。

柳州最早的苗圃及其它

士 弓

柳州官办育苗造林机构始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多数史料认定，最早当推由省建设厅创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位于大龙潭畔的柳江农林试验场和柳石路造林事务所。但据笔者考证，在柳江农林试验场和柳石造林事务所创办之前九年，即民国六年（1917年）春，马平城郊鹅山下（今柳铁体育场以南一带），已设立有官办的苗圃了。这个由柳江道（辖马平、雒容、柳城、罗城、怀远、融县、象县、来宾等8个县）办的苗圃，才是“柳州育苗造林事业之嚆矢”。它的出现，是广西有识之士坚持长期疾呼的结果。

原来广西自清乾隆始，森林资源即不断遭到严重破坏。至清末，广西境内已呈“触目皆秃地荒山”之状，据有关资料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广西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39.1%，到宣统三年（1911年），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已降到不足10%。首先是广西自乾隆以后人口猛增，为了解决衣食，不得不盲目毁林造田！乾隆十八年（1753年），广西人口为197万，此后人口直线上升，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即达786万，67年净增2.99倍（589万），到宣统退位时（1911年），已突破1,000万；其次是乱砍乱伐放火烧山，当时山区人民为生活所迫，砍伐林木很难做到有计划进行，而放火烧山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习俗，或烧垦，或以火狩猎，或烧灰取肥，也有因取暖，驱兽、赶蚊不慎引起山火的；第三个原因是木商大量组织收购，进一步刺激了砍伐。宣统年间，仅柳州一地，每年放运至广州的大（杉）木即达60余万条。森林大量被毁的结果，使得自然生态失

去平衡，水土大量流失，气候变异，灾害频生。民国建立后，广西不少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大声疾呼：“保护资源，救救荒山”；“大力营造人工林，尽快改变广西童山濯濯的面貌”……但由于当时广西都督兼民政长陆荣廷正沉迷于整军经武，梦想充当西南盟主，根本无心搞建设，因此对地方热心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建议，一概置诸脑后。然而关心广西前途和命运的社会贤达，始终不灰心气馁，至死不改初衷，一直坚持向当局进言。民国五年（1916年）春，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广西邕宁县籍留学生雷朝福，给当时兼任广西省长的陈炳焜写了一封信，力陈保护森林资源和植树造林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希望当局给予足够重视。雷朝福这封信，终于打动了陈炳焜。九月，广西省长官公署正式下文，分令各道设立苗圃，以促进广西林业的发展。

柳江道于次年（1917年）春，择鹅山下官荒20余亩建苗圃，委卢高寿为管理员兼宣讲员，着手雇工选取种育苗。当年，共育松苗20余万株，杉苗5万余株。第二年，开始向马平、雒容、柳城等县推广种植。到民国九年（1920年），苗圃用地已扩大到40余亩。是年，共育松苗50万余株，杉苗10万余株，杂苗（桐、樟、柏、板栗、女贞、酸枣等）3万余株，全部供给道属各县种植，民国十年（1921年）夏，陆荣廷垮台。七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马就任后，励精图治，其中措施之一是大力发展实业。十月，鹅山苗圃奉省令改组为柳州第四区林场，自此，该场即以造林为主。不久（1922年5月）粤军退出广西，自治军蜂起，省局不能维持（马君武于5月22日辞去广西省长职），第四区林场亦陷于停顿，员工四散，各谋生路。直至10年后，即1932年春，广西局面重新趋于稳定后，柳州县政府才在原地重办苗圃（县属）。当年，育成松苗200余万株。次年（1933年），育成松苗、杂苗150万株。

鹅山苗圃复办的同时，柳州县建设局奉省建设厅令组建一县属林场。局长廖宗海最后选定河南新桥（今新风桥）一带官荒作为建林场之用。三月一日，建设局张贴布告，规定“东自法院右侧西边田地（今

文笔路二空宿舍楼后一带)为界,南以沿展览会马路(今柳邕东段)为界,西以展览会极西房屋西北角一带高地(今石油批发站内)为界,北以新桥大路(今城站路)为界,如有私人土地在上列四界限之内,务须于三月十五日前,携带契据前往建设局报请验明与办理,并不得妄加阻挠,妨碍工作”。七月,建设局开始组织机关、团体、学校在上述范围植树,每人限令栽30株。后因缺乏力量管理,树苗成活率不到10%。十一月,建设局奉令修筑立鱼峰至飞机场公路,此路刚好经林场南沿,该场即在公路两旁植树1,500多株。次年(1933年)夏,柳州县府奉令合署办公,裁局设科。柳州当时定为二等县,按规定不设第四(建设)科,建设经费大量缩减,于是县府决定停办鹅山苗圃,将新桥林场改为苗圃,聘罗子玉为管理员。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新桥苗圃区育松苗63万余株,有加利苗桉树1,200余株。次年(1935年)七月,省建设厅所属的柳州农场(前身为广西农林试验场)扩大,改称广西农事试验场,负责统一指导全省农林事务,包括培育推广优良树苗。在这种情况下,柳州县府认为新桥苗圃已无再办之必要,遂于当年冬将其裁撤。

黄绍竑筹划在柳州建省会详情

梁志强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仲夏，柳州人烟稀少的云头岭和荒凉的大龙岭（今火车站）一带，突然喧闹异常。每天，东方刚现鱼肚白，即有上千民工在挖土、平地、筑路、运料……经附近居民打听，才知道是广西省政府在此修建物产展览会址。

其实，兴建物产展览会址，只是当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掩人耳目而玩弄的一种手段，说穿了，在此大兴土木，主要是为了搬迁省政府来柳作好准备。

原来，新桂系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后，就一直为省会设于何处而举棋不定，原因是高层领导意见相左。归纳起来，共有三种主张：一是照旧在南宁不动；一是搬回桂林；一是迁往柳州。以黄绍竑为首的桂东南籍将领多数持后一种主张，理由是邕宁过偏桂南，桂林亦偏处北隅，而柳州地处广西中心，军事上可进可退，历代为兵家瞩目；从地理上看，此处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加上柳州商业发达，兴办各项实业的潜在条件均多具备，只要积极组织进行，完全可以将其建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张留邕、迁桂者，亦持有不少站得住脚的理由。面对各种分歧，为了缓和矛盾，负责主持省政的黄绍竑表面暂时不再坚持迁柳，而暗中却指使其心腹第七军第五旅旅长伍廷飏（1927年改任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并兼任省建设厅厅长），坐镇柳州大抓各项建设，将省内各种工作重心逐渐向柳州转移，待条件成熟时，即行将省会迁柳。

首先，以柳州为中心，修筑辐射公路。共分北横、南横、中纵、

西纵、东纵五线以及田南至滇边之特别线（详情已有文记述，不赘）。其次，大力兴办实业，仅民国十六年（1927年）度，由省建设厅直接委人在柳州创办的工厂就有广西酒精厂、柳州机械厂、未来战士敏土厂、电力厂、造纸厂、制砖厂、平民工厂等。此外，还先后在柳州设立了柳江农林试验场、柳庆垦荒局、广西实业院、广西第四职业学校、广西交通专门学校以及已筹备但最终未能办成的广西师范大学。在通讯方面，亦以柳州为中心，架设柳——荔浦（分一支至桂林、全州；一支至梧州）——八步长途电话东干线；柳——大塘——宜山——六甲长途电话西干线；柳——长安——三江——富禄长途电话北干线；柳——石龙——武宣——桂平——贵县——玉林长途电话南干线；柳——大塘——宾阳——邕宁——龙州长途电话西南干线（1927年各干线即分别架设至平乐、迁江、宜山、长安、石龙）。为了加强与外界联系，还建成发报通话两用、可与太原、南京、上海、广州等地通报的大型无线长波电台一座。

黄绍竑得知柳州各项建设进展顺利，非常高兴。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上旬，他专程到柳州巡视，当面夸奖了伍廷飏。同时指示他：应尽快选定省政府办公地址并付诸实施，对外则以修建广西物产展览会馆为名，但一切计划图则均须按省政府和各厅局需要设计，待十八年（1929年）“双十节”（10月10日）举办展览会过后，会场现成的房屋即作为省政府的办公处所。十一月十五日，广西物产展览会筹备处正式在柳州成立，由伍廷飏兼任主任，邓植仪任副主任。他们通过反复勘察，最后选定地势开阔平坦的大龙岭为会址，并着手拟定详细施工计划报省。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广西省政府正式批准物产展览会筹备处呈报之计划，同意工程总预算为80万元毫币（1928年末追加34万元）。四月初，物产展览会筹备处通过柳州市政筹备处开始征用云头岭至大龙岭以及牛圩坪、毛家园一带土地。全部工程确定为：

一、会场及房屋：整个会场为椭圆形，东西宽1,800余尺，南北长2,300余尺。会场内共建房屋9座，当中一座为三层之大洋楼，

面积 200 余井，用钢筋士敏土建筑（计划作为省政府办公大楼），预算需款 30 万元毫币；其余 8 座为两层建筑，均匀分布于椭圆形四周，八座楼房中两座，完全仿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红墙绿瓦，庄重肃穆。（计划用作省图书馆及博物馆），其余 6 座均为洋式建筑（计划作为各厅局办公用）。这 8 座房屋建筑面积共 450 井，预算需款 24 万元毫币。此外，在东路尽头的立鱼峰附近，建一可容 500 人住宿的新式旅馆（计划以部分作省府职员住所），预算需款 10 万元毫币；在会场之东南辟一面积为三十余亩的公园，内设可容 5 万人露天演讲场，两座音乐亭及一座传音台。

二、马路：场内修大小纵横马路约 10 里，最宽者 268 尺，最窄者 100 尺，路之两旁种植树木，安设电灯。由于受经费所限，路面暂以 6 寸厚之碎石铺设。场之东南，连缀两条宽 268 尺之马路：东路由会场起，中过云头岭，直至立鱼峰，再折北走，与柳江新码头相接，此路共长约 10,000 尺，南路连接柳庆公路，长约 4,700 尺。这两条马路，内分小马路 3 条，各宽 30—35 尺，当中分别种植树木，并在马路两旁装设电线杆。

三、码头桥梁：在柳江南岸建一座长 40 尺、宽 100 尺的新式码头（命名为振柳码头），配以起重机，并铺设轻便铁道直至会场，轨道两旁复建 30 尺宽之汽车路和人行道，为缩短水路运输里程，同时在鸡喇修码头一座，并铺设轻便铁道与振柳码头轻便铁道衔接。另在会场西面之竹鹅溪，建造长 80 尺、宽 30 尺之木桥一座。

为使这个耗资近百万元（以当时物价折算，大约等于现在两千万万元）的工程不被持异议者攻击；为了让省内外人士加深对柳州地位的认识，并争取他们的支持，伍廷飏亲自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五月上旬起草了一份“广西省政府筹办广西物产展览会宣言”（原文附后），交筹备处印制 2,000 份向省内外分发。“宣言”在详细阐明开办物产展览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同时，明确指出柳州当时已成为广西的“交通枢纽”，“实业中心”和“开发本省富源的根据地”！

五月中旬，第一期工程（挖土、平地、筑路、修码头、造趸船拖船）

开始动工，除振柳码头包给“李云记”承建外，（工程费22,000余元毫币）。其余均由筹备处自行组织筹建。为使工程尽快完成，伍廷颺坚持每天亲临现场指挥。不久，困难接踵而至：先是在马路线内的云头岭19间民房铺户和大南门码头对河左边的20余间民房铺户不愿搬迁，虽经市政筹备处限期勒令迁至划定地点，住户仍不肯从。以云头岭团绅刘耀武为首的户主数十人联名诉愿到省民政厅，要求筹备处修改施工计划，后经民政厅驳回。他们又在拆迁费上讨价还价，致使工期一拖再拖。其次是材料费供应不上，除向香港订购的材料（如钢轨、土敏土等）不能按时运到外，就连修马路明渠用的火砖也得不到保证，因当时马平民间无砖可供，新办的制砖厂又未建成投产，只靠拆城墙（边拆边被百姓偷，马平县公署三令五申严禁窃取也无济于事）和拆庙（如拆五显庙）远不敷所需。为此，迫得伍廷颺限令公安局强行封雇民船20艘到象县运砖以解燃眉之急。未几，由于马平长期雨旸不调，五个月未降过一滴水，造成早稻失收，晚稻插不下，杂粮亦枯槁殆尽，饥民嗷嗷待哺，从农村来的民工普遍思归，每天均出现大量不辞而别者，因而工程进度大受影响。但是这一切，丝毫动摇不了伍廷颺的决心，他一方面提高工钱，安抚尚未离去的民工，一方面调军队来支援。到八月，立鱼峰至大龙岭以及鱼峰路之路基已修竣；轻便铁道亦铺设了4,000余尺；鸡柳轻便铁道路基亦筑至龙泉山附近。

九月八日，黄绍竑率视察团抵柳。对物产展览会工程进度表示满意，同时指出，主体（会场及房屋）工程可以和辅助工程同时进行。于是，物产展览会筹备处分别派出计划师杨锡缪赴上海、工程师胡继良赴广州，分别办理招商投承建筑展览会工程事宜。

十月，筹备处聘北京总商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会长、广州总商会会长以及各大学校长（原档案无校名、姓名）为广西物产展览会名誉顾问，于月底分别发出聘书及展览会章程简章。十月二十一日，广西省政府批准物产展览筹备处副主任邓植仪辞职，遗缺委雷颺接充。

十月二十五日，柳州河北发生空前大火灾。当时属柳州党政军

最高领导的伍廷颺，在处理这场特大浩劫善后时（省府委其为柳州火灾善后办事处主任），被弄得筋疲力尽，焦头烂额。按当时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人认为，展览会工程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然而，事实却不像这些人所想象那样，工程不仅没停，施工速度反而加快了。原因是伍廷颺以受灾为由，向省外发函电，请求给予支援。十二月上旬，香港禅臣洋行赠送的半英里长度的铁轨和五部铁泥车（在轻便铁道上靠人力推行可向两侧倾倒的铁皮车）以及贵州赠送的一批枕木先后运到。筹备处当即增开夜工加紧铺设尚未完工的铁道。到十二月中下旬，东大路（今文笔路）及鱼峰路全部修竣。会场内大小马路已全面动工，其中环场马路的路基已筑好。椭圆形四周的8座楼房地脚已全部完成，其中3座已着手砌墙。竹鹅溪上的桥墩已建好。振柳码头之人行路面洋灰（水泥）亦铺妥。

次年（1929年）元旦，广西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在柳州召开。会议期间，伍廷颺邀请到会代表（广西各部门长官、要人、名流、专家、学者）和名誉会员（两广政治分会、贵州省政府、中国工程学会、吉隆坡华侨实业团和华侨协进会、南洋华侨实业团、吉隆坡广西会馆代表）七十余人参观展览会工程，大家纷纷以“卓有远见”、“广西之幸”……等语来颂扬。

正当黄绍竑、伍廷颺力争按计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月完成展览会全部工程时，形势却急转直下，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武汉事件”牵动了广西政局。在湖南、广东积极准备出兵夹击广西的情况下，全省人心浮动，新桂系高层领导的精力全部转移到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复杂局势上，展览会工程被迫停止。未几，黄绍竑、白崇禧率师东下广东作战；接着湘军入侵，新桂系首脑亡命出走，广西为南京政府所统一。省府领导易人后另有一套主张，黄绍竑苦心策划的上述计划至此遂寿终正寝。

附：

“广西省政府筹划办广西物产展览会宣言”原文

我们主张实业救国的总理孙中山先生曾经肯定说过：“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本政府秉承总理的遗教，以推行革命建设于广西，于兹两年，近来更感觉到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改善人们的生计，在政府方面，固要运用政治的能力，来提倡和奖励实业，在人民方面，更需有深切的认识，来和政府合作，大家努力，使生产率一天增过一天，那么民生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

但是像我们生产落后的中国，尤其是万业窳败的广西，实业的智识，十分幼稚，各地的物产，向来漫无统计，又无整理调节的方法，所以现在要开发实业，增加生产，当然要搜集各地物产，来致力研究，使先有经营实业的智识，同时作出一种实业现状的总帐，使大家了如指掌，共策今后的进行。可怜的广西僻处偏隅，地瘠民贫，久为一般人民所公认！然而天然富源好像西江下流的冲积层，浔梧玉各区的沃野，柳庆镇邑各地山货和木材，的确是优美的农林场所。此外如山禽野兽，随地都有，金属非金属的矿苗，到处发现，尤为本省绝大的富源，即就最著名的，如富川贺县南丹河池的锡矿来讲，现在所探获的矿区，已有三百余万方米之广，矿的深度，也有深至百余尺以上的，至其矿质之美，成数之高，比较世界产锡最著名的马来半岛尤且过之。就这样看，物产这样丰，宝藏这样富，确有发展经济之可能，提高国富的资格。

但是我们试一回顾广西以前的事实，又觉得天惠之厚，而人力实有未尽，在民国以前，官吏如传舍，对于人民的生计，固属漠不相关；民国建元之后，一般掌握政权者，虽曾设官立局开办富贺的锡矿，也因无实业常识，苟且因循，不能收良好的效果，卒至本省绝大富源，迟迟不能开发，民十四年以后，本省虽然底定，然为执行革命任务的缘故，军粮的供给，还占本省收入三分之二以上，当然不能拿全力来推行革命的建设。侥幸两年以来，土匪肃清，交通实业还能积极进行，初期计划已经次第实现，至于今后大发展的企图，要望海外人士来和我们合作了。

我们深知道举办和创造一种大事业之先，必须要有一种作业的调查和准备，然后着手经营才没有失败的危险，所以决议在柳州创设大规模的物产展览会，欢迎中外人士到会参观，各抒所见，以谋实业的发展，打算

由民国十八年十月十日起开会一个月，作长时间讨论。至于设立这个会的意思，不外下列各点：

大凡经营实业，必须有实业的常识，这种常识的宝库，端赖陈列产物的场所，然后足资一般作业者实验和研究，而收互为观摩，启发新智识的效果，这是第一点意思。整顿实业的初期，须先有一种生产的统计，然后可以定经营的方法，本省向来没有这种统计，哪一种实业有没有进展，皆所不知，出品的良和窳，又所不悉，比来欧亚各国与亚东日本物质文明，一日千里，苟非征集各地的产物公开研究，哪能够知舍己之所短取彼之长，定出整理和奖励的方案，这是第二点意思。开发实业，必具有充量的资本，有了资本，又要熟知而详审其利之所在，方能投资本来开发，本省的财力是有限的，本省的富源，急待开发者是无穷的，今欲谋尽量开发，使物无弃材，地无秘宝，非荟集各地产物，设场陈列，欢迎各界参观，用以唤醒海内外资本家和实业家的注意，知道本省为富源所在，乐于投资经营不可，这是第三点意思。

现在本省为实行民生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须认识哪种事业应归国家经营，哪种事业应归人民经营，才容易着手进行，惟这种识别的过程，又非征集各地的物产，详细考察不行，这是第四点意思。

这次会址，定在柳州，却有一个原因。柳州居柳江上游，电船可以时常来往，天然的交通还算便利，现在柳庆柳邕柳石几条公路已经通车。第一期的公路计划，限今年九月以前通行的，柳州以南有直接柳邕路而通镇南关的邕绥绥明路线；有直接柳宾路而通贵兴玉线的宾贵线；有接贵兴玉路而达梧州的容苍线；有直接柳庆路而达河池南丹的路线；有自马平而直达全州的柳桂线；柳州以东有自马平榴江修仁荔蒲而接富贺钟路的路线；有接富贺钟路而达梧州的路线。人为的交通更属便利，所以柳州将来当然是本省的交通枢纽，实业中心。现在的实业院、农林试验场、垦荒局、平民工厂等均经次第成立，并定于最短时间内，设立士敏土厂、火酒厂、制纸厂等实业场所，那么柳州简直是开发本省富源的根据地，将来工商业的发达是很有希望的。

现在这个会的筹备处已经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柳州组织成立，鸠

工庀材，从事建筑，一方面搜罗国内外物品，以备陈列，务使于明年十月间如期开会。所愿国内外的资本家、实业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一般热心的同胞，念我们筹办这个会的宗旨，多寄出产物品，届期莅会，指示一切，大家合力发展广西的富源，这不独本省之幸，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可以同沾其利的。同人等仅以十分诚意，预先表示恳挚的欢迎！

谷埠设卡之起因及裁撤时间

士 弓

柳州在未修筑公路前，货物进出均由水运。统税征收机关只须在城厢上下河面各设一个分卡，即可查验所有进出口货物，保证税款的征收。但自柳（州）石（龙）、柳（州）庆（远）、柳（州）长（安）等公路修通后，不少货物即不走水路而改由陆路运输。原因除可缩短运道距离（如柳州至鸡喇，水道为45公里，陆路只有6公里），更主要的是当时河南尚未设有税卡，货物走公路可以不必交税。一些贪利商人，每日由对河用牛车载货，或经四方塘至石龙；或经拉堡往来宾、迁江、庆远；或经鸡喇下船至运江，再分销往象县之中平、罗秀或修仁属之桐木及荔浦……其中以鸡喇一道为最多，每逢圩期，约有牛车十余架，每车载五、六百斤，或于黑夜、或将拂晓时运货偷出鸡喇。至于偷运至石龙、大塘、迁江、庆远之货物，每圩亦有三、四十担。

柳州统税兼餉捐征收局局长韦超庸和监督钟季和有鉴于此，一面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月二十二日呈文省财政厅，请求在谷埠设三等分卡一所，专司查验河南陆路进出口货物及征收税款之责；一面派出临时稽征人员常驻谷埠，检查偷运漏税货物。韦等这一做法，立刻引起河南地方势力和一些不法商人的不满，稽征人员进驻谷埠第四天，即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抗税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时，驻谷埠之统税兼餉捐征收局员司接到报告，黎明有牛车七架，偷运黄豆往鸡喇。该员当即带同巡丁一名赶往察看，追至立鱼峰南三华里，果然发现牛车七架，当即喝令他们停车接受检查，对方恃人多势众，根本不理。该员无奈，只好返回报告。

征收局马上加派巡丁四名，配枪两支，前往拦截。追至龙船山附近即赶上，但这伙私贩早有准备，他们纠集十六、七人，持枪七八支和挑刀十二、三把，气势汹汹冲过来朝巡丁直刺，并高声喝令缴枪，命巡丁投降，否则就不客气。走在后面的员司见状情急生智，赶忙调头跑去羊角山向驻军报告，请求派兵协助。当姚连副带队追至鸡喇河边，豆已上船。私贩们见部队出面，不敢再逞凶，当即四散逃窜。结果仅缉获刘亚才一名，随同黄豆一起押解回局。据刘亚才称，他系牛车主，被谷埠商店陈友和、陈长茂、谢裕兴、刘顺发等雇用，伙同其它牛车六架载黄豆三千斤向鸡喇偷运。至于在途中纠众持刀枪抗拒，乃系各货主联合云头岭团绅刘耀武派团丁所为。当时各店主及团绅均在场指挥，后见军队出面协缉，知势不敌，才作鸟兽散。

财政厅及广西省府获悉此事，大为震怒。因这等恶劣抗税事件，在黄绍竑主政广西后尚属首次。为此，除飭柳州统税兼餉捐征收局将黄豆全部没收充公外，同时严飭马平县公署限期将团绅刘耀武及商人陈友和、陈长茂、谢裕兴、刘顺发缉拿归案，严加究办，以儆效尤。

二十天后（即十一月十六日），柳州统税兼餉捐征收局谷埠分卡正式挂牌成立，半个月即收得税银374元5角2分6厘。自此，河南一带偷税之事基本得到制止。

民国二十年（1931年）广西奉中央令，财政实行划分国地收支，同年十二月成立财政部广西财政特派员公署，将各地国税机关及所属卡所全部移归公署接管。次年三月，广西省政府以各陆地国税分卡征及肩挑负贩，百弊丛生，决议依照二十年度（1931年度）施政方针，咨由财政特派员公署，将广西十六处分卡（其中包括谷埠）一律裁撤。至此，谷埠分卡即不再存在。

柳南最早的农贸市场

——谷埠街今昔谈

刘锡香

谷埠路位于柳南区东部，南起鱼峰路，北至飞鹅二路。全长六百五十米，宽十二米，混凝土路面。该路始建于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前后）。

谷埠路，原叫谷埠街，地濒柳江，当时附近四乡所产谷、豆等，农产品多在此集市贸易，故名谷埠路。一九四九年曾改称鱼峰路，一九五〇年恢复旧名，一九六六年曾一度改为四新路，一九七五年恢复今名。

旧时谷埠系柳南辖区内的商业中心，也是整个河南市区的主要工商业区。沿街有门面二百零七间，并以此为中心，周围又发展了一些街巷：东有东一、东二巷。西有西闸巷、大同巷、维新巷。民国团局设在谷埠，所以这一地区统称为谷埠。

民国十六年，伍廷飏在柳州大兴土木，沿河边修建了河南大街、河南大码头和鱼峰路，把谷埠与对河连接起来，还开辟柳石、柳邕两条大公路，使河南成为初具规模的市区。

谷埠因它地濒柳江，当时交通以河运为主，柳江上游的融县、三江等所产木材都到此集散，使谷埠更为繁荣起来。

谷物市场，初在沙子岭（原叫狗肉垌，今柳州飞机场一带）交易，尔后转移到谷埠，收购的商人由行商成为坐商，建起房屋开店铺成了一条街。街道从码头到旧时的“福隆当”地段。当时经商者多半系本地人，董、刘两姓较多。上游来的木材多停泊在今的车渡码头（即华

丰湾)。除谷物外又成为木材集散地。木工,码头夫(旧时对搬运工人的贬称),也就随之散居在这里,这些人多系一八五七年随湖南的团练来柳进剿李文茂时留居下来的。谷埠成为谷物和木材的集散地后,这就为他们提供了谋生之处。有技术的为木材商人锯木、开板、做家具,能打铁的打铁,会弄泥水的替人修建房屋,其余的帮商人搬运谷物和木材。这些人生活有了着落后,逐渐成了家,于是街道渐向南伸,由“福隆当”到黄泥岬(今大同巷口)。市场发展了,人也多了,随着供应居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等的杂货店、小饮食店、为来往客商服务的伙铺等都随之兴起,街道发展到鱼峰脚(今文笔路口),成为河南的主要街道。

旧时谷埠街分为上、中、下街:上街由现在的“龙胜旅社(即旧时刘瑞记收囤号)起,包括黄泥岬(今之大同巷)、及现在的“工人电影院”至鱼峰山脚,这原是一片荒地,是鱼峰山的庙地(乾元庄)。后来作为牛行,称为“牛圩坪”是桂中地区较大的牛市场,每圩有两百多头牛的交易。今东一巷原是一个小岭,初为附近居民编晒烟架之处,后来有几家打石碑和打铁铺在此开业,慢慢地成为今之东一巷。当时打铁的有雷湘利、周时利、彭官清、周志荣、黄新古、李志刚等几家。打石碑的有:唐兴发、蒋子清、伍顺和、谢宏发、宁恒信、邓广森等几家。中街为“万福堂”东二巷半节和西闸巷上步桥至旧时曾安太酒房止(今已拆掉变路)。下街由河边巷、驾西、飞二、东二巷、罗汉巷组成。全街街道十分狭窄,两对门讲话都能听到,街道地面铺石板,地势是两头高,中间低、好似一条扁担形。

民国初年,军阀争战,匪乱多,居民为了安全,在街道的出入口处建起闸门,谷埠码头处建有两闸,一为大闸,供货运和过渡之用。一为水闸,是居民下河挑水之用。今西闸巷口建一闸,叫西闸。大同巷口建一闸,叫黄泥岬闸。东一巷口建一闸,叫东闸。今谷埠幼儿园处又建一闸,叫东大闸,又叫梁德合闸(因闸边是梁德合家)。

民国十五年,伍廷颀在柳州开马路,将下街河边一带房屋拆除(即今江滨饭店至鱼峰路口)。

民国十八年，街道进行改建，由爵力公司承建，其目的是拓宽街道，将所有闸门拆掉。改建后，两旁建起骑楼，成为现在的街道。

民国二十六年又开辟谷埠码头至华丰湾口为汽车渡码头，同时又兴建飞鹅路（即谷埠下街至南站的大路，今称飞鹅二路）。

谷物最初的交易，为周围各乡农民挑来变卖，换取生活所需，初时是零星变卖的交易，个人挑来的百十市斤，数量不多，他们在沿街两边（由现在谷埠粮店至大同巷口）摆卖成米行，那时三天为圩，每圩的交易约在三、四万市斤左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米市，在交易中出现了转手卖买的“二道贩”。谷埠成街后，本地董姓和柳江一些富有人家便设店专营收购业，旧时叫做收囤，他们与“二道贩”竞争，因其本钱大，便提高价格收购，操纵了谷物市场的价格，这些坐商由收购谷物到收购油料、糖、烟、染料、药材、牛皮等土特产。他们为了各自的生意兴隆，进而扩展到附近的鹿寨、象州、忻城、来宾去拉生意。而鹿寨、象州的谷物多数由水路运到鸡喇上岸至谷埠。忻城、来宾等地的谷物则由陆运，多数是用牛车运到谷埠，那时云头岭，接云街一带停满牛车，每圩都有十多万市斤到二、三十万市斤的谷物到谷埠云集出售，特别是在旧历八月到十二月最为旺盛。谷埠的收囤商，并不是真正的收囤铺，除少数批给米铺和一些做米粉的粮食加工业外，多数是做代客买卖坐盘收利，然后将收得的大宗谷物转卖给沙街的大商行，沙街的大商行再运往梧州、广州和港澳销售。

收囤的大商号有安记隆、黄连和、朱天和、刘祥和、刘运记、永德、朱荣发、广德隆、民兴、跃昌隆、合昌、龙祯祥、福安行、练威记、刘福民、朱万太等。

谷埠那时可是百业俱兴：有三个当铺，设在下街的叫“安荣当”，设在中街（现谷埠粮店处）的叫“福隆当”，设在云头岭的叫“一善押”。专为剥削入城谋生的劳苦大众和城里的贫苦人民。杂货有：董太和、廖广胜、广亿隆、彭聚源、振兴、曾福兴（兼酱园）、曾安太（兼酒房）。药材有万福堂、博爱两间。为来往客商服务的旅社业也兴旺起来，初时叫伙铺，后叫客栈，较高级的有“国际旅社”，一般

有德合、都龙、群束、熊兴、三来、三都、九如、二柳及覃三源伙铺。

有名的粉店有何冬狗、老龙、覃六一、春发等几家。

木材的交易在今天的车渡码头，上游下来的木排、竹排多数停泊在河北四得庵码头和马草坪一带。河南停在红庙、车渡码头（旧时麻疯湾）、蛋家社。初，生意不大，主要供建筑用，本地商人购入少数加工成板，做家具、花床、棺材等。下运的木材，当时都是一些个体的，一时不能售掉，无能力下运梧州和广州，就委托本地的木材商代管代售，使他们有利可图。由于柳州日益繁荣，对木材的需求不断增大，木材商由小商变为大商，看准小宗的个体户，无能耐，就先吃小批商，还派人到产地低价收购，顶住运来的大宗木材在柳州市场出售，迫使他们以低价售给坐商。然后坐商组织放下梧州、广州，或运到香港、澳门去牟取厚利。那时的木材行业分别在下街和今大同巷两处。下街有汤成德、吴兴利、陈进先、胡宾、董岐三、新民、联群等二十余家，尤以新民、联群为最有名。时人称为木板行的，在大同巷的有徐松林、陈驼子、董森和、苏万利、陈双合、赵玉成、林福昌、钟桂记、朱吉祥、森兴栈、高连兴、周和盛、高炎乐。专做棺材的有双发祥、徐子林、广盛祥、韦有道、董海泉、温顺利等。

抗日战争期间，湘、桂、黔铁路建成通车，今文笔路车站为客运站（那时叫城站），柳州水陆交通方便，成为广西交通枢纽。云、贵两省的土特产、特别是烟叶、药材、桐油都到谷埠集散。不久武汉、广州沦陷，外地人员和客商不断迁来，谷埠遂由商业发展为工商业区。上街建有“大陆烟厂”（老板是福建人黄友三），中街有“广全烟厂”（老板胡荣文），“民生烟厂”（老板罗卓球）。早有盛名的烟丝店是罗天昌、吴安昌、黄天太等。花纱有天生、粤兴针织厂、恒益行。大商行有西南运输公司、平安行、公利行、正气行、荣安行、胜利行、力生行、刘合昌等。还有信生猪庄、庆丰（生猪土产）、天成视厂、天成兴视厂。粮食加工的有合隆面房，设在华丰湾的有成丰米机厂、正荣面粉厂、柳江上还有一水上碾米厂，老板是高伯伦。华丰湾处还有两个砖瓦窑。这时谷埠可说是鼎盛时期。

解放初期，商民对党的政策尚认识不足，多数停业。后来在市人民政府大力动员商民做生意后，就有殷实商民投资合股开设功利土产公司、大陆烟厂、兴国酒厂等，旧时的商店也相继开业。

工商业改造时期，国家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所有经营粮、油收囤的商店都已停业，一些店员转为粮食部门的职工，大陆烟厂合并到新华烟厂（今柳州烟厂），兴国酒厂和功利土产公司合并为今之柳州酒厂。谷埠最大的“国际旅社”改为国营的“红星旅社”，有的商店为公私合营，有的商店由上级接管成为国营企业，饮食业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国营商业为主导。整个河南的商业中心转移到河南大街和鱼峰路，谷埠成为机关单位的职工宿舍和居民居住区为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谷埠又恢复生机，一九八一年谷埠上街辟为农贸市场，为柳南区东部的重要市场。现今上街有旅店四家，最大一家为国营的“龙潭旅社”。饭店八家，较大的集体经营的“龙潭酒家（兼营旅社）”和新华饭店。杂货店三家，还有市粮烟公司和果品商店，工人电影院设在街口。下街有旅社八家，最大的为国营“红星旅社”，饭店十一家，以设在街口的“江滨饭店”为最大。土产、日杂、杂货共七家，物资供应共六家，纸张、物资回收、汽车配件、五金其它有七家。谷埠粮店、柳南区人民医院、储蓄所两家、中国银行柳州支行设在街口。

谷埠市场现有固定摊点六百余个，临时摊点四百余个，营业人员有一千二百人，每天交易七万元，每月收管理费四千元。晚上还是柳南区的一个热闹非常的夜市场，华灯初上，从工人电影院门前到谷埠幼儿园门口，粉摊、甜品摊、狗肉摊各种熟食一摊紧连一摊，每夜都到凌晨二时才散市。

柳南区名胜古迹

刘锡香整理

（一）鹅山

鹅山，位于柳南区内北段西侧。北距柳江三公里，南北走向，长700米，海拔303米，为柳州市区第一高山。山体是石灰岩质和白云岩质，其形似鹅就食，长颈俨然。柳宗元《柳州山水诒可游者记》中云：“鹅山在野中、无麓、鹅水出焉”。明，徐霞客记述：“江之西，鹅山亭亭，独立旷野中，若为标焉。”《柳州县志》记载：“鹅山……水自半岭喷出，流小河，入大江，远望如双鹅飞舞。”旧时人们往往以“鹅山柳水”来形容柳州的山光水色。鹅山飞瀑被称为柳州旧八景之一。

柳宗元曾有《登鹅山》五绝一首曰：“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唐时尚未见有飞瀑之景，至宋代刘洪道作《观鹅山飞瀑》诗之：“探奇不畏险，拨云上高岭，放眼观飞瀑，枕流听素琴”，则飞瀑之景已经形成、并见于历代诗人吟咏。清人周文炳诗道：“天地伏流不可测，凭虚瀑出水涛沓。奔腾澎湃鹅山巅，俨若飞鸟搏玉翻。纵横震动雷雨声，纷射万斛珠玑白。造化生成实变幻，阴霾昼夜无休息，高悬活泼大文章，四郊野魅惊魂魄。层层倒泻龙江泽，兴云鼓浪朝天北”。可见近百年前鹅山确已出现较高的高山瀑布。此瀑何时断流，已无可考。

至今每逢大雨过后，仍有一股水流从鹅山半山石槽急泻而下，犹可想见当年飞瀑胜景，

（二）小鹅山

小鹅山位于柳南区内红岩路南段东侧，为石灰岩质，挺拔奇秀，山形似鹅，因体积较西侧的鹅山小，故名。

山坐东南，西北走向，长约300米，海拔121.7米。铁道部柳州机车车辆厂建于附近。房舍栉比，也是市民聚居地区。

（三）张公岭

张公岭在柳南辖区南端，是一土岭，坡地隆起，呈圆形。方圆约400米，海拔137米。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前，靠近岭顶处原有一庙，庙内悬挂神像，人称之为“张爷”。据传是供明朝提督两广军务都察院右付都御史张岳的。

张岳于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以镇压马平壮瑶少数民族起义受到朝廷重用，死后谥“襄惠”，世称张襄惠公，相传张公岭即由此得名。

此岭在军事上有一定价值。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桂系第七军曾在此筑有三处上下相连的混凝土暗堡和散兵壕，四周建有战车防御壕。现今残址犹存。

（四）老龙岩

老龙岩位于柳南区内柳邕路二街东面，在柳州飞机场左侧山脚下。旧说洞前有姓龙人家居住，故名。

此洞入口处原极窄小，只容一人侧身而入，洞体下堕，深约两丈余，底部平坦，洞腹穹窿。幽深处有泚水，水击石琮琮若琴音。水洼处有无鳞鱼供垂钓。沿洞壁前进可通老虎冲，传说早年有人把一只鸭子投入泚水，鸭随水流去，竟至象州县云。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39年）时，日寇空袭柳州。柳江县政府派人凿大洞口及排除洞内障碍物，作为防空洞可容二、三千人。

1970年柳州市人民政府防空指挥部指令探矿厂、电机厂、汽车总站、柳州第二空压机厂等单位负责拓宽老龙岩为防空洞，施工历时八年，现岩内较前宽十倍多，可容二万余人。

（五）华丰湾

华丰湾位于柳江北来反折东去之处，曲流成湾。旧时茅苇成丛，江风吹过，簌簌有声，相传原名“茅风湾”。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前，湾内曾有破瓦窑数孔，乞丐多聚宿于此，常有暴死者，人们误以为麻疯病，遂习称之为“麻疯湾”。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柳江县参议会以“麻疯”二字不雅，决定取近音字更名“华丰”，亦以寓华夏丰贍之意。

1950年华丰湾曾一度改名红庙屯。1982年始复今名，现为飞鹅路中段，南起飞鹅路，北至河南水厂，全长300米。柳南区党政机关驻此。

（六）竹鹅溪

竹鹅溪简称鹅溪，亦名竹鹅小河，是柳江支流之一。发源于文笔山，由大岭、杨柳、山头三条小溪汇于文笔羊角汶，由北往南再转向北贯串柳州市西南部城区，在柳江铁桥下游约500米的鹅岗村注入柳江。全长9.25公里，城区溪流长5公里，河床宽10米，属季节性小河，流量约5m³/秒。上游地下水资源丰富，沿溪两岸均有地下水溢出补给溪水。

昔日竹鹅溪，溪水澄澈清静，唐柳宗元曾有文记之。

螺蛳塘的今昔

黄立建

螺蛳塘，顾名思义，为多产螺蛳而得名。由于年代的沧桑变化，螺蛳塘现在何方，柳州人多无法辨认它的真面目了。

三十年代，螺蛳塘原在老谷埠街的上、中街衔接处东面，面积包括两块水田，约二十亩。水田种植过水稻、莲藕和芋头等。当时的吕国忠为把鱼塘和水田种养好，在水塘西面搭了座竹楼，以便让雇工住宿。塘和水田之间有条尺许宽的小径直通鱼峰路，是谷埠街儿童上屏山镇小学读书的近路。冬季时水田丢荒，就成为附近娃仔的游乐场，他们在这里打量尺、放风筝、打泥团仗等。

每年柳江河水猛涨时，因螺蛳塘口有阴沟通往谷埠街排水至上步桥受阻时，这一带的住户家就受淹，家中有时进水尺许。这些住户有时能在屋前房后抓到不少塘鱼呢！每到春天来临，塘里的蚂拐哇哇鸣叫，真是蚂拐闹塘，吵得附近人家彻夜不眠。

现在，柳州人再也不见螺蛳塘了。一九七九年这里建成的东风西路，就是过去螺蛳塘所在地，而东风西路已是我市主要干路之一了！

柳州地名考

潘朝业

一、非“以地当柳星更名”柳州

《新唐书》地理志云：“柳州龙城郡、下，本昆州，武德四年（唐高祖年号，辛巳岁，公元621）以始安郡之马平置，是年更名南昆州。贞观八年（太宗甲午岁、公元634）又以地当柳星更名”柳州。若从此说，则南昆州之更名柳州，乃因地当柳星之故。

所谓地当柳星之说，是出于大地相应于周天十二宫次分野之法。我国古代迷于乾坤对配、天人相感之论，谓地有大河（黄河），天有天河（银河），地以大河为基准坐标（地中在颍川阳城，见注^①）而分东西南北，有九州诸国之域；天以天河为基准坐标（以赤道为定位），也分东西南北，有十二宫次二十八宿之位。从而将十二宫次二十八宿分配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日躔每日为一度有奇），各应大地之九州诸国。于是天地相配，某宫星变，则占某地灾祥。故《春秋》襄二十八年（丁亥岁、前514）有“春无冰”，《左传》则载：“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岁星、即木星）在星纪，淫于玄枵，以有时暵，阴不堪阳，蛇（玄武）乘龙（青龙、即东七宿）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玄武），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此为据星宫分野以占灾祥见于文献之始。延及东汉，郑玄注《周礼》，遂云：“九州诸国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由是乃将十二宫次分配吴越（星纪）、齐（玄枵）、卫（媯訾）、鲁（降娄）、赵（大梁）、晋（实

沈)、秦(鹑首)、周(鹑火)、楚(鹑尾)、郑(寿星)、宋(大火)、燕(析木)等十二国。此俑一作,使后世星占、阴阳之家,纷起引入邪道,以致邪说充世,将天文历算之科学成果,变为迷信愚民之工具。考其余谬,直至近代犹常作祟。但今为讨论柳州是否地当柳星,姑从传统分野之法述亦于后以证《新唐书》之非。

按《旧唐书》天文志云:“柳、星、张鹑火之次。午(宫)初起柳七度(柳一至六度居鹑首之次,属东井,舆鬼分野),中(午宫之中)星(七星)七度,终(午终)张十四度。”其分野则是“北自荥阳、滎泽并京索暨山南,得新郑、密县至于方阳。又自洛邑负河之南,西及函谷,南纪达武当汉水之阴、尽弘农郡。古成周、虢、郑、管、郟、东虢、密、滑、焦、唐、申、邓,皆鹑火之分也,及祝融之都(即新郑地)。柳、星(七星)舆鬼之东,又接汉(银汉)源,故殷商洛之阳,接南河之上流。(按:此处疑有阙文)七星上系轩辕,得土行之正位,中岳象也,故为河南之分。”如此,则张十四度前皆属鹑火之次,其分野皆在中原,不可能包括当时的南昆州(即更名后之柳州)。

同书又云:“翼、轸鹑尾之次。巳(宫)起张十五度,中(巳宫之中)翼十二度,终(巳终)轸九度。”其分野:“自房陵、白帝前东,尽汉之南郡、江夏,东达庐江南郡(疑部字之误),滨彭蠡之西,得汉(代)长沙、武陵、桂阳、零陵郡。又逾南纪,尽玉林、合浦之地。(原注云:玉林县在今贵州,合浦县今为桂州。今自富、昭、蒙、龚、绣、容、白、罕八州以西,皆属鹑尾之圩。)”此则今之贵县、桂林之间,蒙山、平南、容县、博白等县以西之地,皆属鹑尾之圩。

另外又云:“南斗、牵牛,星纪之次也。”其分野有“尽苍梧、南海”之语。句下注云:“又逾岭表,自韶、广、封、梧、藤、罗、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东为星纪,其西皆鹑尾之次。”此又佐证:自今藤县至雷州一线以西之地,皆属鹑尾分野。

综上所述,今之柳州,既地居桂、贵之间,不惟处于藤雷一线之西,即是比之蒙山、平南的经度,仍是显然偏西,更当属鹑尾之次,位在

翼、轸分野。今又姑不论此地当翼或轸^②，只从鹑尾初度而言，其与柳宿未度（ 14° ）之间，即已隔有七星十度、张宿十四度，合计共二十四度之角距。这怎么能说“地当柳星？”

今为易于参对，可作十二宫次列宿分野图，并加简要说明于下，以便观览。

十二宫次列宿分野简图：

分野图简要说明：

因赤黄交点每年西退 50.2 秒，故尧、周、汉、唐及今之冬至线按时针方向而退，计其年代时距，基本与事实相符。即尧时冬至线正子午，在虚 $7^{\circ} 32'$ ，汉时洛下宏沿用周贞定王时冬至线，起牛初。东汉张衡测移线，起斗 $19^{\circ} 18'$ 。唐初李淳风测定线，起斗 10° ，今冬至在 1926 年时在尾 $14^{\circ} 55'$ 至今虽隔半个世纪，所差亦未及 0.7 度。



冬至线虽年有变更，代有差异，而分野之法却仍古说。自汉至唐，分野之说最具权威性者，当首推唐初李淳风。《旧唐书》天文志云：“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县配焉。”故唐代星宫分野之法，是据李氏《法象志》而定，这是无可置疑的。而同书《李

淳风传》则说：李淳风于贞观初“授将仕郎，直太史局。”贞观七年，他造成铜制的混天仪，其精密密度远超汉代的洛下宏与张衡所制。仪成，并著书七卷，名《法象志》，与仪器同上太宗。“太宗称善，”“加授承务郎。”由此可见《法象志》著成上献，是在南昆州更名柳州一事之前。若当时以星宫分野而命州名，岂有不依《法象志》所说之理？而《新唐书》竟谓“以地当柳星更名”柳州，殊属失考，乖谬之甚。

二、柳州不因柳江得名

今之柳江，是指融江、龙江会合后（在今柳城县之凤山镇会合），以至本江与红水河会合处（在象县石龙镇南约五公里）的一个河段。

考此江首见于史籍者，先有牂牁之名。《史记》西南夷传云：“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按夜郎国地域甚广，约有今黔南、黔西、滇东北、桂西北及川南一部分土地。汉武帝取其国后，曾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夜郎县，其治地在今贵州省之关岭。此则今之关岭一地，必是当时夜郎国首要之区，其所临之牂牁江，当是今之打帮河、北盘江、红水河这一水系。但查元鼎五年（前112）时，因南越相吕嘉反汉，汉发五路师众南下征讨，其中一路是“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史记》文）。则此牂牁江必是便于兵粮船只通行。以此条件，则今之北盘江、红水河，实是远远不够资格。再根据古来黔桂间行军路线的记载，多般取道今之南丹，河池一路，再沿龙江而顺柳江东下，或则自都匀而趋榕江、丙妹下老堡口，沿融江而下柳江。除此之外，绝少经过水恶滩险之北盘江、红水河者。如此，则《史记》所说的“发夜郎兵，”必是集中于今之贵定、都匀一带，然后取道龙江或融江而下柳江，一直东趋广州。因此其所下之“牂牁江，”实是今之柳江水系。从而可知，西汉时的柳江，亦有牂牁江之名。这是由于汉时一则对西南水文不甚了了，二则夜郎县又改置牂牁郡，所以，凡是从夜郎境流出之水，皆名牂牁水。红水河如此，柳江又如此，甚至对玉江（邕江）也如此。如《旧唐书》地理志即载：“邕州……驩水在县（宣化）北，本牂牁河，俗呼鬱林

江，亦名温水。”此是鬱江古有牂牁之名的记载。究其由来，实因此江上源之右江亦出古夜郎境汉牂牁郡之故。因此，说是在汉时凡是出自古夜郎境之水；皆有牂牁之名，乃是切于事实的断语。故柳江古名亦是牂牁江，乃是定论。此江的牂牁古名，直到唐宋，犹为文士所喜用。如中唐的柳宗元即有“牂牁南下水如汤”及“牂牁水向郡前流”的句子。南宋初的王安中为天宁万寿禅寺（灵泉寺）新殿作记时，亦有“祥光夜烛牂牁川”之语，此皆是证实古柳江不惟名曰牂牁，而且是此名历久不衰，始于西汉，直迄南宋犹见沿用。

再则，两汉时期的牂牁江，又有遁水之名。据《汉书》地理志云：“夜郎县有遁水，东至广鬱。”《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后。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也说：“有竹王者，……兴于遁水，……遂雄夷濮。”又说：“遁水通玉林，有三郎祠。”从这些资料看，竹王是一位加上神话色彩的部落、或部族首长，而其所兴起的有关地理条件（即遁水玉林、广玉等），则是十足足的现实。据此，遁水既是竹王发祥之域、其水又通广玉、玉林。而汉时的广鬱，鬱林，皆设治于今之贵县，其属地在今之红水河与柳江流域者，计有潭中、中留（或作溜）二县。潭中县境包括有唐代的马平、武化、龙城、洛曹（在今石榴河一带）、洛容、融水、武阳等广大地区；中留县境则包括有今之武宣县全境，象县南境，来宾县东北境。潭中治所似已设在马平一带的江边；中留治所，据我个人的初步考证，疑在今之武宣境内金鸡、黄茅二圩间的黔江东岸，来宾铁帽山斜对面处。如此，所谓通鬱林或至广鬱的遁水，又不外是今之柳江水系。无怪此江长期又有潭水之名，原来是从遁水转音的结果。

按遁字今音为，dùn古音近段(duàn)，方音略转遂变为潭(tán)再转为浔(xún)。

另外，最有趣者是三郎祠中竹王的传说，其神猪首人身而朝服。据云是被皇帝杀害后续以猪首。这在贵州省如此，在广西也有此一传说。猪头庙我曾发现两处，一在柳江县白沙圩东的猪头山，上有猪头神庙。一在来宾南部的万德观，其中亦祀猪头神。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观察，竹王的故事与崇拜，所以能远达广西中部的原因，乃是随着“至广鬱”“通鬱林”的遁水而来。那么遁水今在何处呢？此又只有今之柳江可以当之。

所以，古牂牁江又名遁水，遁转为潭，又称潭水。潭再转为浔（潭可读如旬（xún）再转为浔（xún）更有浔水之名。柳宗元谓“四姥山”“北枕浔水濑下”的浔水即是一例。

据上所举，溯自西汉以下，直迄初唐的武德、贞观年间，此江只有牂牁江、遁水、潭水、浔水之名。却绝无以“柳”字名江之例。当时此江既无“柳”字之称，而谓贞观八年将南昆州改名为柳州，是因“柳江”得名，岂不同于宋版《康熙字典》一样闹笑话？

但是，尽管此一说法属于笑话，却偏偏出现一种主张，认为“柳州因柳江得名。”其理由可分两点：第一、是柳州之得名，见于李吉甫的《元和郡国图志》柳州条下，有“因柳江为名”一句。而且还替李吉甫作主观性的臆想，认为该《志》既是成书于中唐，自然本于李泰的《括地志》（成书于贞观十五年，实为著作郎肖德言等所撰）、又本于元和前的各朝实录（尤其是贞观实录）及《国史》等，故其可靠性最大。第二、与此不同的《旧唐书》虽有“以州界柳岭为名”之句，但该书是撰于五代后晋的天福，开运年间，到底较《元和志》最少晚出一百二十二年（李吉甫于元和九年冬暴病死）。此书既非当代之作，其语自不可靠。这种看法，是撇开对史料的鉴别，只凭“凡前书皆是，后书皆非”的简单逻辑去看问题所致的谬果。在此，我们可以不惮麻烦，加以讨论一下：第一、是否凡属前书皆是？第二、是否凡属后书皆非？关于第一：所谓前书，是指《元和志》，该《志》为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个人所撰。吉甫凡二度为相，一度是元和二年春至三年（公元808年）九月，此次因惧为窦群、羊士谔、吕温等伺机

诘陷而求出镇，出后充淮南节度使。二度是自六年（公元811年）正月到九年冬暴病而死为止。此时他以宰相而监修国史，《元和志》的编撰应是在此数年之中。但此数年间，因其再受征而“秉政之后，听视时有所蔽，人心疑惮之，……多畏避”（《旧唐书》本传）。这样的人心疏远，史官自不例外，故其撰《元和志》时，所得时贤之助自是不多，只由个人搜集整理而已。加上政务纷忙，朋党险恶，岂能专心治理繁浩的地学资料？故在撰写过程中，发生讹误自是难免。

再从《元和志》编撰的体裁看，是以图为基础，再以志释图。这就酷似在德宗贞元十七年时（公元801年）贾耽所撰的《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一是有图有志，一是有图有述。而且两书撰成的时间，前后又仅隔十二年。所以《图志》必受《图述》影响很大，甚至可说《图述》是《图志》的底本。《图述》对资料鉴别的态度如何呢？贾耽在上献《图》和《述》时，在表文中，曾坦白的说到其资料来源问题，自认有一部分是据“鬯阆之行贾、蛮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摭其要。”这就是说：在一些边远地区，在一时又找不到可考的文献，就只有问之於行商和偶然遇见的当地遗老了。这种态度，本来就很不慎重，怎么说得上是科学可靠呢？柳州，在当时为边远小州，撰写到此，也只好根据“行贾”“遗老”之言而“述”下了。《元和志》可嫌其《述》过于复杂，乃简化而为《志》。但基本看法是不出《述》的范围，观其《志》到柳州治所在的马平时，竟志为“马平……潭水东去县二百步，柳江在县南三十步。”实则从地质、水文史的资料来看，柳州一地，自从全新世开始以后，约在一万五千年前，水文即已基本定型，柳江河槽的位置即已基本固定。岂有近在千年之前，马平之南三十步既有一条柳江，而另外在离县东二百步又有一条潭水？这明明是对柳州地理的基本特征毫无所知，以致将在不到一公里内的流段，志成两条河流。像这样用眼即可看出的地理特征尚且志错，其对地名来源又怎么能说是经过深入考究？其所谓“因柳江为名”之语，也不过是一种姑妄闻之，姑妄志之而已。这种妄志，要不是从贾耽那里沿袭下来，也就是李吉甫自己听来的。绝不是根据

什么“实录”、“国史”的文献。因为“国史”的编撰必据“实录”，“实录”必据当地长官的奏报。既是当地的命官，谁敢冒着欺君之罪而作此荒谬的奏表？

所以，若认为李《志》是有文献可据，同样是一种荒谬的臆想。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柳州绝不可能因柳江得名。

反之，关于第二。后出的《旧唐书》未必无据。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该《书》的柳州更名时，“以州界柳岭为名”之句，倒是必有文献根据，其可靠性反而不可动摇。首先，从其资料来源看：《旧唐书》成于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但却在天福（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六年（公元941年）时，宰相赵莹即已开始着手布置撰修工作。他定出规划、组织专家、收集史料及确定体例。后经桑维翰、刘昫相继为相监修，至刘昫时书成，计自天福六年上去唐亡（公元907年宋全忠篡位）仅三十四年。唐时由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所修的《国史》及各朝《实录》尚存，可以作为原始资料。如撰至《李吉甫传》时，则说“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人。父棲筠，代宗朝为御史大夫，名重于时，‘国史’有传。”又如撰到顺宗二十三子，则说“庄宪皇后生宪宗皇帝，王昭仪生郟王经，……余十八王，‘本录’（按即实录）不载母氏”此中明举《国史》《实录》原载内容，可见编撰《旧唐书》时，正是处处有文献为据。

何以这些文献能保存到后晋呢？《国史》在安史之乱时，正本已在兴庆宫被焚，但韦述却将原稿一百一十三卷抱藏南山，乱后由其子献归朝廷。《实录》虽也曾在兴庆宫被焚，但乱后也经吴、韦、韩愈等史官相继补修，恢复旧观。这些原始资料，曾随唐昭宗东迁洛阳，又由朱全忠迁于大梁（开封），每次搬迁，皆是书与翰林人员一同行止，所以直到石晋之世，犹能全璧可睹。《旧唐书》至今仍有资格列于正史之林，就正因其保留唐代原始资料最多最详之故。而其地理志所说“柳州”乃因“以州界柳岭为名”之句。必是据文献而写。不然又会在什么地方找出这个说法？

其次，是从编撰的人员来看：按照唐代史馆组成的通例，史馆

工作人员都是任命当代各有专长的专家。依纪传体的纪、传、志、表所需人才，分门别类，各以所能充任。赵莹开始组织人员也正如此，也是各以专长而治专学。然后由贾纬、张昭远等人总其成。这些人员多般生于唐朝末年，又都是饱学之士，故老传授，耳闻目睹，唐朝旧事，犹可历历知之。即如其中的贾纬来说，他是贾耽后人，有家学渊源。他在唐末即举进士，举虽不第，但却长于史学。曾以唐朝自武宗以后无实录，撰《唐年补录》六十五卷。若无相当原始资料，安敢撰写《补录》？由此可见，在《旧唐书》编撰之时，不惟原始资料甚多，而且专家们的业务水平甚高。每录一事，必甚严谨。所以，柳州“以州界柳岭为名”之语，必据原文而录。

再次，又从史料鉴别的规律来看：《元和志》较《旧唐书》既先出一百二十二年，又为一代名著，当《旧唐书》编撰之时，负责地理志写作的专家，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岂有不将该《志》作为参考资料？如此，岂有不见“柳州”，“因柳江为名”这一条？为何不从此说呢？必是此说与原始资料不同，所以遂敢弃此无稽之谈而取原始资料之记载。于是方敢写下“以州界柳岭为名”之句。

讨论至此，即已足证《元和志》“因柳江为名”一语之非，这只有到了后晋，才为史馆的专家考而正之。这也正是后书优于前书之例。由此可以断言：《元和志》所载柳州“因柳江为名”的记载是错误的。

三、柳州因柳岭县得名

“柳”字与今整个地区发生关系而见于史籍者，最早莫过于“柳岭”。据《唐书》地理志所载：“龙城”隋县，武德四年置龙州，领龙城、柳岭二县。贞观七年，废龙州，省柳岭县（柳岭县并入龙城县）”。以“废龙州之龙城（县）来属”南昆州。当时，龙城置州、柳岭置县，虽前后不满十三年，但“柳”字与地区发生关系，实自此始。

柳岭县境在今何处？或说在今柳城县北境的洛崖一带。我以为不然。因为据《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自贞观八年将南昆州更名柳州

以后，天宝元年（公元742）曾一度改为龙城郡（治地不移）。但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又“复为柳州”。这皆由“以州界柳岭为名”之故。所谓“界”，当是分界，接界之义。“州界”是指南昆州之治所马平县境与龙州之柳岭县境接界之义。若柳岭县居今柳城县北境，则马平与柳岭之间当隔一个龙城县，两者之间又怎么有地相“界”呢？如果你不能证明《旧唐书》的“州界柳岭”一语为谬误，则应承认：武德、贞观间的柳岭县境，正正就在马平县境之北，其地是紧紧接壤。按此，则龙城既在今之凤山镇对岸，事已无须赘证，那么在龙城与马平之间，即应有一个柳岭县治所。因当时为县不一定很大，如马平、新平（治在今新兴村）、乐沙（治约在今进德至百朋一带）三县，其治之近，其境之小，即是一例。由此可知，当时在马平龙城二治之间，又有柳岭一治，并不足奇。

到底三治城之间各有多少距离呢？此可引《元和志》与《旧唐书》之文观察一下。《元和志》载：龙城“东南至州八十八里”。《旧唐书》地理志柳州条下载：“柳州……北至柳州三十里。”为此问题，又得先说明这种唐里是现今多少远的概念。

《考旧唐书》天文志日晷条下，有云：“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③，而北极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此即是说：每差纬度一度，其地距离为351唐里又八十步。按度制：一步五尺，八十步则为四百尺。再按每唐里为1,800尺，则八十步为0.222唐里。三按：唐时一般周天度法，是以日躔一日一度为准，故分周天为365度（如张遂——僧一行的《大衍步日躔术》第三、周天度条即是。）而同书晷法又有“夫横既有之，纵亦宜然”之说，此可见当时是认为经纬相等、度法相同。黄赤圜既各分365度，经圜亦正相同。故自二分线（春秋分）至极之度，应为：

$$\frac{365^{\circ}}{4} = 91^{\circ} .12$$

（日晷条原注云：“凡度分皆以十进。故一度而四分，应为0.25度。”）

以此较之今世，已定大地上凡1 / 4经圈为一万公里，换唐时以度法分之，则每唐度在地上之经距应为：

$$10,000\text{km} \div 91^{\circ} .25 = 109.588\text{km}$$

即每差一唐度，地上经线长为今之109.588km。

$$109.588 \div 351.222 \text{ 唐里} = 0.312\text{km} = 0.624 \text{ 市里}。$$

即每一唐里为今0.312公里，为今0.624市里。故龙城所离马平治应有：

$$0.624 \times 88 = 54.912 \text{ 市里}。$$

此数从古驿道是古灵塘一线来看，约为今六十市里，可说大致相近。

柳岭县又在何处呢？考唐时在广西所设州县治地，除特殊的军事性重点之外，一般都选择交通便利之处以置治所。而当时在交通上最为便利又最为安全的，莫过于水上运输。故一般治所多设在江河之滨。因此，柳岭县境既在马平龙城之间，其治所亦必在潭水岸上。上文曾引《旧唐书》地志柳州“四至”条下有“柳州……北至柳州三十里”之句，此乃不通之语，必由传抄中的字有讹错。故中华书局版《旧唐书》的校勘记第115条即指出，下面的“柳州”疑是“柳岭”之误。这个校勘是有见地的。因为柳州之北，只有柳岭，断无又来一个柳州。若果不错，则自柳州至北三十唐里即是柳岭县治。按上文数字的推算；每唐里为今0.624市里，则三十唐里应为今十九市里左右。以这样的距离算，则柳岭县治要不在今鹧鸪江至洛坵的江边，则必在长塘一带的江岸。

1984年冬，我们到凤山镇作古迹调查，问当地人士，皆言凤山和柳州间的柳江东岸，还有一处古城的名称。这和明末崇祯十年六月时，徐霞客早上乘舟离柳，暮宿古城堡的记载完全一致。徐乘是上水舟，其水程和十九市里的陆程大致符合。故当地人所说的古城地名，必定是徐氏所宿的古城堡。这个古城堡很可能就是古柳岭县的旧治，其地大概在长塘一带的岸边。但这须作实地的考察，方可论断。不过，不管怎样，柳岭县治既在龙城与马平二治之间，其距马平不远，且居

北方，是可断言的。

为何将南昆州因“界”柳岭而改称柳州呢？这不外如下原因：在武德四年时，龙州和南昆州同时并置，两州的治城又只相距八十八里（即五十四市里），两州所领属县又都很小。这样的布局，在时局初定的武德时代，为了容易控制，遍地多设机构、多置官守，原是形势需要。但到了贞观八年前后，全国局面已经平稳，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唐太宗为了发展经济、普及教化，对以前这样琐碎的布局，乃有调整的措施。其方法是简化政区、减少行政机构与冗杂官员。其目的是节省行政开支与提高行政效率。于是，遂大量并小县合为大县，必要时更并小州合为大州。在此区域的省县方面，有省掉乐沙入新平，又省掉新平入马平。在省州方面，先将柳岭省入龙城，更废龙州以龙城并入南昆州。但南昆州与龙州原是并置的两个州，今合二而为一，如何显示其以二合一呢？乃取龙州的一个旧地名加在南昆州旧治上，从而南昆之名也就作废，遂因州“界”柳岭而称柳州。这正是“以州界柳岭为名”的来历。（天宝间改名为柳州龙城郡，也是显示合二而一之意）。

自从龙州与南昆州合并而称柳州后，州治终唐之世，一直置于南昆旧治之马平。其名称虽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一度改为龙城郡，但十六年后，在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称柳州。计自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此地称为柳州的名称，即已经历一百零八年。在此长长的一个多世纪中，柳州已发展成为桂管（桂州下都督府）十五州内的重镇。有户（包括四属县）六千六百七十四（乾元以前数字）。户数如此，人口可知。官吏民商，来往纷然。过此绕城之江，遂逐渐称之为柳州江。名随俗成，久之竟简称为“柳江”。这就进入了以城名江的惯例。

这类以城名江之例甚多。仅就柳江下游来说，即可引出数处。如象州原居柳江东岸，而《明史》地理志则说：“象州”“西有象江，即柳江。”这是柳江流到象州又有象江之名，是一例。又藤县本滨浔江南岸，而《明史》地理志则说：“北有藤江，亦曰潭江，即浔江也。”

这是浔江流到藤县又得藤江之名，是二例。自梧州至广州这一河段，本称西江。但流到端州（高要）则又可称端江，清袁枚《随园诗话》载：乾隆间，杨国霖为高要令，值袁枚过此，杨作诗送别云：“送公自此止，思公何时已？有泪不轻弹，恐溢端江水。”这是称西江为端江，是三例。以城名江之例甚多，是地名学中规律之一。何独见怪于柳江因柳州得名？

新起的柳江名称，到中唐时还与潭水、浔水甚至牂牁江等旧名并用。这不独使《元和志》错为两条江流，即柳宗元身临其地，也常常在文学上数名杂用。如“牂牁南下水如汤。”如“种柳柳江边。”如记四姥山“北枕浔水瀨下。”等，皆是一水数名，而由一手随意运用。但此乃文人喜用古地名的习惯，和地名学有所差别。在民俗学上，凡是一种新风俗兴起后，便往往使旧风俗逐渐衰落以至代而取之。“柳江”一名之取代以前各个旧名也是如此。是一种名随俗成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作一个结论：柳州因柳岭得名，柳江又因柳州得名。

【注释】

注①地中：古人认为自二分线至地极为三万里。于夏至之日中天，以八尺长之土圭测之。正树圭而景（影）长一尺五寸者，是地中。在我国则以颍川之阳城为正。

注②軫：金本《广西通志》与乾隆本《柳州府志》皆载：“柳州、軫三度。”若此则距柳宿末度 38° ，因本文从最小数字设想，如再加翼 12° ，軫 2° ，则为 38° 。

注③唐步：步为古代度的单位，长五尺，本文既算出每唐里为936市尺，因代入近代市里1800尺计算： $936 \div 1800 = 0.52$ 市尺，即每唐尺为今0.52尺。此所谓百黍之广为尺也。故每唐步为 $0.52 \times 5 = 2.6$ 市尺。

桂中壮族民俗志

潘朝业

桂中地区的乡村，大抵多居壮族人民。在明代嘉靖以前，汉壮人民之间交往较少，故壮人与封建政权之间的对立性甚为剧烈。因而发生韦银豹、韦金田等大大小小的反抗与镇压事件。嘉靖以后，一则由于屡次反抗失败，壮族人民精英损失过巨，一则由于官府怀柔，渐编壮人为民，于是彼此各自渐趋安谧。入清以后，生活既定，生产有所发展，壮人遂得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形成了壮区书声相继、贡举蝉连的新局面，从而亦出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如柳江覃连芳先世即是其例）。他们不惟与汉人知识分子交朋结友，而且由于门第相当，互通婚媾也渐成为常事。此种融和趋势，先是行于士大夫之家，后渐普及民间。壮人希得汉妇，汉人亦娶壮女。迄于清末，融合逐渐成熟，汉壮之差，除了语言，其他如血统、文化，实已达于融合。在太平天国反清运动中，汉壮人员合作组织堂、会者，比比皆是，在辛亥革命运动中，汉壮人物并肩作战，更是史不胜数。故今在柳州市区，虽不少壮族居民，若从形体、文化上看，实难分出孰壮孰汉。其因何在？实有以汉人而化为壮者，亦有以壮人而化为汉者。前者是汉人而入居壮区，娶妇是壮，接触皆壮，数代之后，即操壮语而为壮人；反之，壮人外出城镇，娶妇渐汉，接触常汉，数代之后，亦操汉语而为汉人。其例只须略考各氏家谱，自可显而易见。

民族既渐融合，风俗也渐接近，大抵交通较便之区，旧俗渐少，汉俗色彩渐多；偏僻之地，遗风较浓，旧俗较重。故同是壮人，习俗亦常有所差异。为考壮族旧俗，就力所能及，取其原始者，作桂中壮

俗志。

一、婚俗

汉古代婚俗仪式，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此礼衍及后世，即汉人亦未必依仪全行。其于壮族，差异更甚。

壮家欲娶某女，先使媒询问女家。女家同意与否，媒者回报男家。此次询问，不带礼品，其程式虽相当纳采而与纳采不同。盖古之纳采，乃始相采择之意，因恐女家不许，必用雁（鹅）为纳礼，而壮家则只使媒询问而已，问其允许与否？愿否结为姻亲？较之古礼是既轻而简。

若问得女家同意，男家即使媒氏再至女家问要八字。此次亦不带送礼品，只由女家开出女儿八字，用宽三寸、长六七寸红纸一张，写上“坤造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大吉”字样，是为“命书”，送出“命书”是为“放命”。由于壮家不喜男方呼其女儿之名，故不言名，此一程序相当于问名。但女家只是“放命”，男家亦无礼物。并无古礼问名之时，“问女之姓氏，将归卜吉凶于庙”的内容。

八字回到男家，男家即请术士将男女“命书”合配。若不契合，则不言娶。若属契合，又须将女命置于祖宗神位之前（或在本家祠堂、或在居家香火堂），上压清水一碗，三朝之后，若见碗水澄清，是为吉象。若不清，是属凶象。此外，在三日之内，务须家事康宁（如不打破器皿，不失财，六畜无恙）吉象乃全，则可使成婚配。若命不契合，或吉象不成，则将“命书”付媒退回女家，叫做“退命”。女家遭到“退命”，并无怨恨。认为命不契合或兆象不佳，强嫁女儿将不利，故并不损害往日乡亲之情。

配命契合，又得吉象，男方即决定娶女为妇。请媒氏领仆人带去鸡酒、钱币，告以婚缘天定，好事必成，是为“下定”。下定之礼，与古纳吉相近。

“下定”之后，双方通过媒氏，商讨装奁、彩礼数目（亦有由于女家富裕，不与男方计较者）如酒肉多少，彩礼（实是嫁奁购置费）多少，商定之后，由男方择取吉日，由媒氏带领持事人员送往女方，

叫做“过礼”。“过礼”之日，仪式隆重，女家除设酒招待媒人与持事之外，还会六房（族亲）同庆喜事。媒归之时，以礼相送，岳母为婿送布，伯母，婶母、姑嫂、姐姐亦有所赠，以示亲事已成，亲戚份定。此与古纳徵之礼亦近，因为徵者成也。与“过礼”之意甚符。所不同者，“过礼”之日，未送已商定之肉类数量，因此肉是女方嫁女日请酒之用，须于女儿出闺前一二日方才送去，皆是生猪，数在百至千斤不等。

“过礼”之后，女方即备嫁奁，以待婿家报期。婿家择得黄道吉日，又请媒氏与一二持事携带送礼鸡酒，再往女家，报道迎亲之日。叫做“报日”。此举虽似古礼“请期”，所不同者，即“请期”，是婿家不敢自专有请女家给期之义，而“报日”则明显全由婿家单方主张的方式。

至期之时，婿家迎亲，迎亲仪式，皆事先通知女方，由于贫富不同，礼有加减。富者或用持事七十二名，次则三十六名，再次则视其财力，依次减少。届期，婿往亲迎，或坐轿。或乘马，媒氏一般坐轿，伴相一般乘马，外备大花轿一顶（可容二人坐），四人或八人抬，持事夫役皆二人抬一礼盒，盒中皆有礼品、礼帖之类。另用四童子持彩旗四面，旗以红绢（或布）为之，上书“良缘同夙缔”“佳偶自天成”“彩旗迎淑女”“吹箫引凤凰”之类字样。旗杆用寸径筋竹，长丈五六，竹尾留青叶，一路鼓吹鸣锣，每隔若干路程，又鸣礼炮三响，浩浩荡荡，直赴女家。及门，婿由媒氏领拜岳父母及一切长辈。事毕，女家设宴招待，宴毕，婿辞出恭立门外，以待新妇，此与汉俗亲迎仪式全同。

新娘于出阁前三日或五、七日（甚至有更长期者），则招聚姊妹闺中，啼哭悲诉。悲诉今后别离父母亲人，不复在家奉老抚幼，诉至亡故亲人，怀思忆旧，其声更悲，闻者往往心酸泪涌。据说啼哭而去夫家，可使家财兴旺，子孙繁衍。此与汉古俗亦近，卓文君“凄凄复凄凄，嫁女不须啼”的诗句，即与此俗相类。若在原始壮风浓厚地区，出嫁前则聚姊妹唱歌。新娘唱今后离别之苦，唱其依依不舍之情。如“一莧叶菜叶重重，张张招（嫁谐音）去各西东。从今姐去留妹妹，各往各方难相逢。”之类。妹妹则答以劝嫁歌，如“女儿总要有个家，

姐去前头享荣华。今天种下胭脂李，明天开得满园花。”胭脂李是李果中之美者。李花白，壮俗以白花象征男孩，有“白花贵子”之词语。歌唱之意，其目的亦在嫁后富贵昌荣，与啼哭同。

出阁之晨，新娘在闺房要人穿衣、梳头、簪花，再用纱绢蒙头。妆罢，由好命伯母、姑婶（即夫妇双全、子孙众多的人）搀扶出到祖堂，进行下堂啼拜（或歌）之礼。啼哭之意，多是从今而后，去到别姓人家，不再是本家的人，不得归来再拜先人，辜负先人传（生）身恩德。拜后，亲人喂饭三口，咽下两口，吐第三口。意即退回部分福泽给返外家。此时，堂前露天之处，设桌一张，上置一尺寸长、七八寸宽的红布一块，一人在旁边挡伞，一人仰开左手，右手持笔染墨，在红布上慎心工写“命书”，内容和“放命”时一样，惟八字两边多分写“百年偶老”、“五世其昌”字样。写成后，由别人收拾笔墨桌子。一人将“命书”摺好置入一新布袋中。置命后，将祭在祖神前的一碗钱米倾入命袋，倾时须留少许反播回头，其意亦在留福外家。壮语称米为糍，即后的谐音，有钱有糍，是为有前有后之意，皆属彩语。从置“命书”、倾钱糍入命袋这一仪式，是为“装命”，“装命”既毕，由婿家派来一人恭接而背出，是为“背命”。背命人不准回头，直归婿家。此举或称“背礼”。以上凡女家派人穿衣、梳头、簪花、写命、撑伞等持事人员，皆由婿家备有封包酬谢，内封银毫二毫四毫不等，惟其数必是成双。

“背礼”人出，搀扶者即扶新娘随出，出时亦不准回头。此时堂下鼓吹齐作，婿在门外恭迎新娘上轿，然后自己上马，持事人等，各就各位，礼炮三声，响撼山谷，迎亲队伍启步登程，送嫁姊妹艳装拥轿而去。赴礼宾客，纷至门外遥送，各各嗟叹婚礼之隆，佳人才子匹配之美。

行至中途，或遇州县长官巡行。官则必（据言此乃皇谕）率众避道左，肃立路旁。新郎新娘则下马停轿，新郎揖拜长官，长官答礼。新娘则于轿中令人以香帕一方，赠献长官，长官则以随身所带银钱为答礼。礼毕花轿复行，礼炮鼓吹又起，长官亦自队而去。此一习俗，

与汉俗甚近，皆示承平之世，上下俱重礼义也。

若在出阁之前唱嫁歌，则送嫁姊妹随轿边唱，此时已无凄苦之音，全是期望之辞。

行至婿家，在礼炮、鞭炮、鼓吹声中，新郎先入，由婿家好命人搀扶新娘出轿。然后登堂，双双拜祖，复拜父母尊长（一拜），拜毕同入新房。自入大门至进新房，新妇因仍戴面纱，须极谨慎脚步，忌踏门坎，忌触门框，恐得罪门神，日后不祥。

新娘既入新房安置坐定之后，由新郎揭去面纱，露出玫瑰羞貌，由一人用猪油和糖拌饭一碗，用二小碗各分一半送与夫妇品尝。意即今后丰足如油，甜美如糖。此与古俗合盃相近。惟合盃用酒（甜酒），而壮俗用糖油饭。

如贫家娶妇，过礼微薄。迎亲之日，或用牛车载妇，嫁奁及送嫁姐妹皆在车上，由一人替新娘挡伞。他人则拥挤而坐。婿亦不须亲迎。或甚至牛车也无法具备，新娘或则由人背，或则步行，亦专有一人替为挡伞。但每过一桥一沟，皆须给封包一个，方肯启步。若在盛行歌唱风俗之域，则送嫁姊妹亦一路踏歌送行。

常见以歌送嫁之区，每当新婚之夜，送嫁姊妹与婿方男子齐会洞房，各相以歌斗胜为乐。两边人数，少者十数人，多者二三十人。若洞房不够容纳，则移至大厅对唱。至有婿家聘请专家替唱者。此时斗歌，除新郎新娘外，人人皆可参唱。或一夜、或三夜，直至新娘“回门”方止。唱多通宵，主家供给宵夜餐。

斗歌之间，有歌有“欢”。歌用汉语，“欢”用壮语，歌七言而叶脚韵，“欢”五言而叶腰韵兼脚韵，“欢”以两句为一珥，珥中叶腰韵。四句或十句为一首，邻珥叶脚韵，今以汉字举二例，以供学者研究。

一、颂“欢”

她像天边[·]月，

如白雪如[·]花。

姑姣落平[·]沙，（姑姣、壮语雁鸟）

也·在她·太·美·。

二、调情

山·上·画·眉·鸟·。

声·声·好·清·脆·。

唱·歌·逢·阿·妹·，

哥·心·醉·难·舍·。

“欢”中字下方标“·”者为腰韵符号。字下方标“〃”者为脚韵符号，如第一首中，第一珣内，“雪”字须叶“月”字，是珣内腰韵。第二珣首句末字“沙”字，须叶上珣末字“花”字，是为邻珣间叶脚韵。而“她”字叶“沙”字，又为第二珣内之叶腰韵。第二首韵法类此。至于十句长“欢”，不惟韵法似此严格，而且又须迴环重唱，以太复杂，此后当有专论言之，不在此处详举。

贺婚歌、“欢”，题材广泛，有男女求爱，有祝愿生活生产，也有猜谜为难，一唱一答，答不出者，是为唱输，引起哄堂大笑。

壮族人民能歌能“欢”，这正证明壮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

另有族人妻死再娶，继室则称“填房”，填房妻之出嫁与入门，可以如新婚一切仪式。惟入门之际，先有一种特别的迷信仪式。新妇至门，男家一老妇在门内，代表死妇语言；女家一老妇在门外，代表继室语言。外问：你穿何鞋？内答：我穿板鞋！外说：我穿钉鞋（是一种下用厚木加钉作底，上钉普通布鞋，是雨天走过泥泞处的鞋子。）并且说：破板鞋，丢出来！让我新钉鞋，上高台！

外又问：你是何树？内答：我是嫩笋！外说：我是篙竹！你嫩笋从腰损，我篙竹齐天绿！

外又问：你是何种篾板（打布机上用以压下纬线之篾）内答：我篾百！外说：我篾十！篾百要不得，我篾十，织得千千万万尺。

至此，内老妇退归灶房，新妇由好命人搀扶入门，外老妇随入。至灶房门，外又问：你是何种锅？内答：我是铁锅！外说：我是铜锅。你铁锅容易破，该早落，我铜锅响登登，该上升。

这些问答完毕，新妇即可如常仪进新房。但此后在无人之际，

继室又须焚香秉烛，具备供品，在房中祭供死妇，呼为姐姐，说明来到填房，是为替姐抚幼奉老，望姐保佑平安。

此种婚俗，各处有所出入，今只择其要者入志。

二、丧葬俗

父母既逝，守灵一如汉俗，所不同者，即入敛之前，买水洗尸。洗尸必用新水，由子女亲到江边，向天号哭三声，向江中丢钱若干文，然后汲水回家，烧温洗浴尸体。洗浴之后，换出临终衣服，另穿寿衣。换出之衣物，须将裤子一条，置于卧房屋梁之下，是为留福。尸衣装换，视贫富而定，大抵皆内穿有色布衣服二层，外罩及膝白衣，然后再加一层外衣。据说阴间鬼卒常常欺负新死之魂，衣服常被抢剥，但剥至白衣，即以为已经见肉，不复再剥，而死魂即可保留白衣以内之衣裤。

入敛之际，含法与汉俗同，或金或玉，或以银钱不等，惟双手心中必各握米饭一小团。据说：魂至“奈何桥”时，桥头的天犬常将死魂咬碎，此时若死魂手中有饭，见犬来则将饭掷出，令犬争吃，其魂即乘机过桥，上升天界。

入敛之后，即用五寸铁钉三根，其中一根以五色布叠成花形，贯至钉头，是为花钉，在置尸入棺，盖下天板之后，将花钉在棺左中部敲下，敲声一响，大小号哭。因自此而后，千秋万代，不复相见矣。花钉下毕，然后在棺右两头钉下二常钉，于是入敛完毕。

棺木用时，男死棺木花头在脚下，女死花头在头上，是所谓男人脚踩花，女人头戴花之意。棺木近耳处忌有节疤，据说将使儿孙有聋子。

凡治丧事，祭吊、服饰、斋醮、道场皆如汉俗，可繁可简。惟个别地区则有“做缸饭”之习。“做缸饭”者，是出嫁女儿，以糯饭一坛，置于架上，与死者之灵牌同迎回女家。在女家开吊、做道场一番，然后再将灵牌送回本家。此后，凡“做缸饭”的女儿，亦分得父母部分产业。

出丧之日，灵柩既至预作墓坑之前，为待孝子孝孙至齐，略作停灵小奠，此时送丧男女青少年，纷纷跳下墓坑，各抓新土一把，洒出坑外，以示亦有营葬之情。不久，下棺安葬，葬毕迎回灵牌，在家供养。或则数月，或则二三年，朝朝暮暮，焚香供养，一如生时。

烧灵之时，以纸扎成华屋一座，安置灵牌于其间，届时，牌、屋皆在号哭声中焚化。从此丧事完毕，孝男孝女方可除下孝服（孝服孝杖，平日为了生计，常挂于灵牌近侧）。

出丧之晨，乡里亲戚相吊，丧家视其财力，皆做或厚或薄招待，惟其席必设置于地上，客人只能以砖石草团垫坐，饮酒食肉，不能高声调笑。主家待客，常用四方木盘一个，中置白切猪肉，盘四角放盐各一撮，绝无酱醋葱糖兼味，佐菜则只煨黄豆或玉米之类，皆示诚俭哀戚之意。此俗与古汉俗略同。

又于出丧营坟之后，孝女或儿媳须为新逝父母“送火把”。送时全身披麻挂孝，手持稻草结成的火把一条，长约三尺，每晚从自家门外放声号哭，直送墓前。如此三晚，以后则至途间而止，渐送渐退，一直退到门外。历时共要七七四十九晚，或则三七二十一晚，最少也要七晚。送时，由于已近黄昏，日暮风凉，与亲长辞，哭声凄楚，闻者心酸。如遇雨之夕，其惨倍增，其哀倍痛。考此送火之俗，一则借火暖墓，以防禽兽毁坏，二则不忍别离，犹如父母尚有所知，皆尽孝心之意。

次年清明节，此坟算是新坟。祭扫新坟，须先于清明前一二日举行，此日子女坟前罗拜，思及去年今日，父母犹与自己团聚，笑貌音容，依依如昨。今则纵有酒肉，亦不能再供奉矣！因而亦常致泪涌失声。一人失声，全家皆哭，一时泪染莹土，云黯低空，孝子之心，千丝万绪。“为人子有终身之丧”一语，又于壮乡见之也。

自此之后，或三五七年，捡骨再葬。捡骨用堰，称骨为金，称缸为金堰。捡金堰中，自足至头，务使其形如坐。捡后寻求吉地而葬，葬下二三年开墓探视，若堰中骨黄有油光者为吉，否则不吉。若入水土虫蚁则凶，立即起坛迁移。如数葬不吉，或无地可葬，则将金堰权

厝于岩穴，或在田坎边掘一土洞，置坛其中，以土埋堰至大半，此皆避牛羊践踏之故也。如此风俗，显然受堪舆家影响甚大。与汉俗亦大同小异。

妇人怀孕而死，或生产未满三十六日而死，皆为湿死。死者叫月难婆。据说：月难鬼最易为厉，故葬法亦与常不同。

月难妇死，除其本人衣物被褥之外，夫家器皿，也须平分，出葬之日，全部焚之坟前。抬棺出丧，于途中常常绕转一圈，使其魂迷失归路。营坟之时，坟上散放稻草，散洒芝麻，据说：其魂出坟，必先收拾根根稻草，又捡粒粒芝麻，如此费时，天已早亮，鬼魂怕天亮，只好躲入坟墓，夜夜如此，自然不能归家作祟。

此外，柳州地区丧礼，另有一项怪俗。其出于汉或出于壮，至今尚难考证。即是部分地方，每见富裕之家，若其父母年及耄耋而逝者，开吊之日，常用红纸书写丧联与灵牌。内容亦多自我吹牛歌颂。问其故，则说老人福寿全归，用红以示荣耀。此俗近年犹见，外客有问：此家治丧何以用红？有答曰：“乃庆贺其父母之死亡也！”自古闻丧不哀且为孔子所深遣，今则竟喜其父母之死。可谓大逆不道。此辈富人，可谓如獐如象。此种习风，堪称颓风。

三、禁忌及岁节

新娘入门，众人皆避，谓若在前挡路，使新妇常与家人争吵。孕妇及其夫为“青眼人”，绝不能使新妇看见，说是新妇若见，则会心灰意冷，不欲安居夫家。故迎亲之日，必待新妇入门，众人方可蜂拥随后。及至祖堂瞻拜。翁姑方可出于堂左，接受儿媳一拜。

女儿既嫁，归宁时不许上楼。其高于祖神牌位，将使祖神愤怒降灾。

女儿生育，必四十九日后方许归宁，否则将使外家秽重招灾。异姓妇女生育未满七七之数，亦不许入他人之门，否则亦致秽重招灾。

凡“生离妻”（即离婚女子）不许回娘家及入他人之家，须另寻住所居之。及至改嫁，移居野外草棚或岩洞，由娶者派人守护，经三七二十一日之后，方在三叉路口请人书写改嫁文书，经有关各方打

下手摸，方由娶者带去。据说：书写改嫁文书时，只能在笠帽上写，写后异帽，若在石上则石裂，若在草地则草枯，皆属不祥。改嫁后须一百二十日，方可回娘家。

凡身带重丧，不能入他人之门。别人新居尤忌。

禁在神社前大小解。他人祖莹前亦然，此乃恭敬之意。

忌言父母小名，若在他人之前道出对方父母小名，即算侮辱。如二人争吵，常大声道出对方父母小名，此骂属于最为恶毒。故不少后人，对先代祖父小名，祖母正名，皆无所知。因祖母存时，在家中只称第几嫂、几婶、几婆。即在娘家，也只能呼几姑、几姐、几妹，从无呼小名者，及有子女，则因子女为称，如“妈阿狗”“爸阿猫”，之类。

凡村中有人凶死，三日内不准补锅人入村，认为补锅即是补祸。

禁止在家烹狗，禁止以狗祭祀，吃过狗肉，三日内不入神庙，认为狗肉有秽，渎犯神圣。

岁时新年，禁说不祥之语。与汉俗同。

二月春社，不一定用戊日（古有用甲），多固定在二月初二。拜社之晨，由村人轮流充任村头，村头事先向村人收钱收米，在社晨宰猪煮粥，以备平分村户。届时，村户各去一人，于天亮前齐至社林之中，焚香秉烛，向一块山石（社王石）礼拜，拜毕，村头平分胙肉，社粥（猪红粥），由各户领取回去。据说：人吃拜社胙肉，可得社王护佑，终岁平安；牛马猪羊鸡鸭得食社粥，可以无灾无害，肥硕速长。

家主出去拜社之时，先在自家门前插一草枪于土中，及领社粥归时，拔起草枪，以粥少许，屏气置于枪孔之中，并以足拨泥盖上踩平。谓如此可使家中减少蚊蝇。

社夜不点灯，谓可以无鼠。

任何人不得砍伐社林，否则犯社，须招灾殃。小者灾罹其家，损丁失财；大者祸及全村，不堪设想。故社林从来无人敢毁。

社日不宜雨，谓社雨必致淫雨五十日。

三月清明，除新坟外，扫墓祭祖同汉俗。

四月初八，做五色糯米糖饭，以供牛神。红色用观音草汁，黄色用山上黄花汁，黑色用小枫叶浓汁，蓝色用小枫淡汁。凡此诸物，皆甚芳香，采归时，除黄花烹取黄汁外，余皆碎其叶为末，热水浸泡，采其色汁，然后将糯米浸入，过夜入蒸，加糖乃成。（白色饭不加色汁）。

五月端午，门挂蒲剑、做雄黄酒等，与汉俗同。

六月六，祭禾神，由村头人祭禾神，做白纸旗遍插田间，以禳虫灾鸟害。

七月七，无乞巧俗而有“公马”。马者壮语归也。公马者，言祖先归家探视儿孙也。月初七清晨，即焚香供茶陈果，迎接先神，此后朝暮供奉，至贫者只要烧香一柱陈粥一碗，亦算敬意。至十三或十四日，则大宰鸡鸭，备鱼肉、冥衣冥钱，举行大祭。十六日再一小祭而送祖。甚至有多事者，十七十八又祭，言是祖先忘记带伞回去，所以又复回来要伞。为此者，人虽不多，却甚有趣。

八月十五，食果饼而不赏月，只祀祖先。

九月初九，不登高而祀祖先。

此后壮俗无节日，直迄年晚。

民俗学是与历史学、社会学紧密关联的科学。它可以为后者提供资料或佐证。尤其是在研究缺乏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史与社会结构学上面，民俗学更是成为一门不可忽视的学科。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正是研究民俗的伟大成果。以上所举桂中壮族民俗，从婚姻、丧葬以至禁忌、岁节之内容虽多迷信色彩。但只要能揭开迷信之外衣，其社会发展史与自然条件的实质便可显露而出。如壮俗与汉俗之融合，即是壮区社会发展之明例。学者自可从中体味其深远的内涵。

本志所举，当然遗漏尚多，不过姑且抛砖于此，以待引出高明之玉也。

龙城乡贤王浚中简介

陈铁生 刘汉忠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曾二到广西讲学，招收门弟，传播了变法思想、培养了一批改革人才，在这批人里面，马平的王浚中是突出的一个。

王浚中字颖初，光绪乙酉（公元1885年）年拔贡，曾为奉议州学正（今我区田阳县），是在康于一八九四年四月第一次到桂林时收为及门弟子的。康曾这样评价王：“志清而气壮，好心学”。一八九六年“公车上书”后，康第二次来桂林，组织成立了一个“圣学会”，开办了“广仁学堂”，沟通风气、提倡新学，王为圣学会会员。康又发起出版了广西最早的刊物——“广仁报”，可惜该刊早已散佚，目前国内仅区博物馆尚藏有残缺的第五册，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王浚中有一篇《上恭亲王书》登在上面，可惜不全。

从文中可以看出王是提倡变法自强的，他赞同西方的议会制度。（王的文章当不止此，但目前我们未尚发现他篇）王浚中其人后来情况不详，看来他是柳州近代最早探讨国事的人物之一，下附该文尚存部分。

上恭亲王请开设各直省下议院书

马平 王浚中撰

窃闻邻火费□，必兆焚如之祸；同舟共艰，方占利涉之美。是以子與重训，忧乐关乎天下，亭林著论，兴亡责及匹夫。大义常昭，普天共懍。浚中乡曲陋民，学识猥劣，尝窃慕夫陈东上书之义，抱范滂澄清之志，原为殿下陈之：慨自甲午兵兴，举国震动。夫日本不过区区三岛耳，吾中国以二千年神明之

胃，沃垠二万余里，物产二十六万而反败于一蕞尔之强藩。于是偿款不足、复割地以媚之；割地不足，复准其内地制造而以利权归之，大耻大辱，莫甚于斯，践土食毛，咸怀忠愤，攘臂争言变法，抗腕而图自强。夫中国之变法自强者非一日矣，而孱弱如故且更甚焉，岂变法不足自强耶，抑亦未得自强之本耶，窃以为西人之强，首在议院，议院之本，首在学校，学校未立，而议院万不可开。何者，学校为人才之藪，议院为清议所宗，无人才而妄议，斯为处士横议矣，有人才而不议，则国家又何贵乎立学校以养人才也。近者叠奉谕旨，变通书院，建设学堂。学校之兴，举目可俟。以中国四万万人之众，地界温带，人民灵慧，而谓竟无能会古今，贯通中外者乎？岂其然乎；良以无位无权，坐是不论不议，以束身自好为第一，以不与外事为纯儒，而天下之事，遂败坏而不可收拾。然岂尽若辈之罪哉？或亦无所位置若辈之故也。然而今日之大局，有以请建议院为言者，即通人达士亦莫不以时尚未至为词，以今日之势，岂复能久待耶！或亦稍不变通而急收近效耶！方今外夷恫喝，要挟多方，政府无以应之，不得不勉强偏就，近来条约可为前车，然亦由中国民太无权，以致政府无以为应耳。不然吾中国去岁加税之议，沙士勃雷所以拒我者，彼非托言商会商民乎！彼之民有权，凡条约不便于彼者，彼得托于民权以拒之。吾之民无权，凡条约有便于吾者，吾不得托权以拒之。一彼一此，炯鉴昭然，近在睫前，目岂不见，则民权何负于国，又何损于国也。吾中国礼义之邦，循美之俗，复加以教化，岂等法兰西之民气嚣张。学校未立，如鲁意第十六之时，议院愈多而愈政乱，夫因噎废食，达人所嗤；以蹶止步。智者所笑，有识之士，断不出乎此也。妄拟当今各直省宜设一民政局，专司外人交涉之事，中国政令姑尚缓之，如遇外人要挟之端，政府万不可从，而又难于峻拒者。系交民政局援公法以议，即彼议院章程而略变通者或亦有补于万一。以今日学校即兴，风气日辟，当万不至债事也。浚中自愧绵薄，无力补天，婺恤空毁，杞忧日切。迺者纠集桂林人士创立圣学、书局，惟冀主持世教者。专以提倡风气，培植人才为宗。然一木难支，孤掌莫应，又以材力菲薄，莫能上达天听。俾得筹拨巨款，以冀大成，如蒙俯赐成全、赐谕当道。力扶危局，共矢血诚，则听衣被者，不独桂林人士，而天下所共额庆者也。

柳州籍清代名臣、台湾知府杨廷理传略

陈铁生 刘汉忠

汉朝以来，大陆历代都有人到台湾任职，为台湾的开发作了或大或小的贡献。这中间，杨廷理是值得称道的一位。

杨廷理，字双梧，号甦斋。柳州府马平（今广西柳州市）人，清乾隆42年丁酉（公元1777年）拔贡。拔贡是清代科举制度之一种。清初为六年一次，乾隆7年后改为12年（逢酉）一次，届时由各省学政从各府学中选二名，州、县学中分别选一名优等生员到京朝考，入选者分三等，一等可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杨廷理以优异成绩先后被任命为福建侯官知县，建宁知府，不久因政绩显著升为台防同知。乾隆51年（公元1786年）11月林爽文在台湾起事，攻陷彰化，知府被杀，杨代理知府，与林爽文部作战，几次用计打败了林。这次起义，后被乾隆从大陆调集了大量兵力入台，几经杀戮，才算平定。台湾平定了，杨因镇压“有功”，升为台澎道加按察使衔。这段时间，台湾农业大丰收，他特将此情上奏皇帝，乾隆闻讯，欣然命笔，题为“台湾提督哈当阿。道员杨廷理奏报早稻收成八分有余，传以志慰，”诗曰：“一厅三县属邵广，早稻八成报有余（自注：台湾南北两路，今春自栽插早稻以后，暘雨应时，禾苗畅发，兹据哈当阿等奏：本年节候较早、各处早稻俱已成熟。陆续刈获登场，除台湾县土性浮松，向不种早稻外，其淡水一厅，及凤山、嘉义、彰化三县，通计收成共八九分用余。现在米价平减，市野怡熙等语。）鱼米乡仍资内地（自注：台湾一地内称鱼米之乡，岁获丰收。内地漳、泉一带，每年资其拨运接济。）间阎风久靖安居（自注：该处自逆匪林爽文等就擒之后，

数年已来闾阎安居乐业‘元气久复’绥靖如常。)抚兹海晏年丰彼,益切戒盈畏满予。北塞南瀛幸时若(自注:今岁各直省麦收多在八九分以上。迩日巡幸避暑山庄。历览塞外农田亦极繁茂,自北及南,雨旸幸俱时若,寸衷益增感惕。)惕然方寸敢舒如。”

嘉庆10年(公元1805年)以后,有蔡牵、朱濆为首的一伙海盗占据台湾海面的零星小岛,对台湾进行骚扰,皇帝任杨廷理为台湾知府,率兵行剿。杨团结当地土人,大败蔡、朱,收复了这些海岛。从此台湾得以颇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嘉庆15年(公元1810年),皇帝又委托他筹办开设噶玛兰厅(即今台湾宜兰县)噶玛兰是台湾当地少数民族语音,福建语讹为蛤仔滩,位于台湾东北部,那里三面负山,东临太平洋,森林茂密,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起初只有当地少数民族居住,在那里以捕鱼、打猎为生,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蔡牵、朱濆曾看上此地。欲占为据点。终因当地人的反抗而未能成功。其时,清政府大臣之间对噶玛兰是保持原状还是加以开发有所争议,杨廷理根据那里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为巩固台防计,提出“当开不宜弃置貽边患”的意见,这是很有眼光的。当时清政府真正在台湾行使权力的地方不多。除少数几个县外,其余大部地区号令未能到达。在此之前的康熙23年(公元1684年)施琅攻灭郑民政权,统一台湾后,清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曾就台湾的弃取问题展开过一场大争议,一些朝臣主张守澎湖而弃台湾,连康熙本人也一时看不清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而未能决断,施琅等人则坚决反对“守澎弃台”的愚蠢主张,上疏力排众议,阐明台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进而说服了康熙皇帝。决定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于福建省。而杨廷理开发噶玛兰厅的建议,可说是当年清政府决定开发台湾的继续。他的建议几经周折,最后得到皇帝的批准。为此,杨几次亲到那里勘查,解决当地少数民族的土地纠纷,划定地界,组织生产,经过数年的开发,把荒凉的宜兰平原建设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新城镇。杨廷理开发噶玛兰厅的经过,后来到过台的大文学家姚莹在《噶玛兰记略》一文中详细的记录。(文附于后)。更重要的是,此后台湾东北一片领

土算是真正在清政府的控制下。不久杨调回大陆，由于他开发噶玛兰的功绩，当地人立了一个杨公去思碑纪念他。

杨廷理于67岁时因积劳而逝，他死后，福建著名学者高澍然替他作有传，（文附于后），文载于《抑轩文钞》一书中，现代台湾学者连横（雅堂）先生在其所著《台湾通史》也对杨开发台湾的功绩予以肯定。杨不仅是个武人，诗文也写得很好，曾有《双梧轩诗草》行世，另有《东瀛纪事》一卷，记载在台湾镇压林爽文事。还有《噶玛兰说略》一卷，记在台湾的见闻。存有《东游诗草》一卷，其中的诗作于今已成了研究台湾开发情况的重要史料，如两首《重定噶玛兰全图》：“两幅图成噶玛兰，旁观慎勿薄弹丸。一关横锁炊烟壮，两港平铺海若宽。金面翠开云吐纳，玉山白映雪迷漫。筹边久已承天语，贾傅频频策治安”。“三农力穡趁青晴，雨霁烟消极望平，山拟半规深且邃，溪如双带浊兼清。培元布化思良吏，划界分疆顺兆氓，他日浓阴怀旧泽，听人谈说九芎城”。（注：九芎城即公宜兰县治，九芎木很硬，当年曾植为城垣。）又《度建兰城公署》：“背山面海势宏开，万里平原亦快哉。六万生灵新户口，三千田甲旧蒿莱。碓舂夜急船初泊，岸涌晨喧雨欲来，浮议频年无定局，开疆瑞赖出群才。”又一首《罗东道中》（罗东镇在宜兰县之南）：“凌晨闲揽辔，极目望清秋。地判东南势，溪分清浊流。炊烟村远近，帆影海沉浮。欧鹭应驯我，三年五次游。”还有一首《登员山》（员山乡在宜兰县城东七里）：“莫谓此山小，龟峰许并肩。千寻压吼浪，一抹绕浓烟。蟠际看随地，安排本任天。披榛舒倦眼，吟望好平田。”（按：诗中的龟山是指宜兰城东北三十里海中小岛，平田指兰阳平原。）这些传作除对台湾城镇风光给以赞美外，也表达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

杨廷理在台湾镇压人民起义，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但他后来为巩固台防，开发台湾出力，却是应予褒扬的。对此，我区钟山旅台人士卢世标有诗云：“兰志重翻百六年，方知吾桂出名贤。不辞筭路三秋苦，赢得馨香一瓣鲜。绩著黄堂光史册，语惊丹阙富诗篇。东游自愧居杨后，异代相思益惘然”。然而，三百多年来，他的事迹在

柳州却堙没无闻。于今修新志，应该给他一定的位置。

附高氏《台湾知府杨廷理传》

杨廷理，字双梧，柳州府马平人。乾隆丁酉拔贡，由侯官知县洊历台防同知。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陷彰化，知府孙景燧遇害。廷理同知摄知府事保郡城。城故植竹为之，联以木栅，栅久倾败。廷理令各街巷数十户植一栅，甫就而诸罗、总兵紫大纪方领兵次盐埕，城中空虚，廷理手一旗，大书“募义勇”，号于市三日，得八千人。复募海口长年水手一千人，调熟番一千人，凡万人。设营帐、铸铍子、整炮械，数日而战守具告备。廷理自部署，分四千人守各隘，以六千人屯城应调，忽报南路贼首庄大田陷凤山，与爽文合。是时也，三县全失，一郡城孤峙海外，当南北之冲，内地援师隔重洋不时至，仅驱市人不习战者守一木栅，而贼方由南路聚而攻我，势且无台湾矣。廷理沥血誓师，以战为守。乘贼初合，开门喊杀，歼灭百余人，夺铜炮旗帜无算。贼知有备，退去。已而，爽文由大武陇赴大目降，会南路贼专事郡城，十二月二十九日南北贼会大目降，绕道抵郡东门，谋是夜用蔗叶、枯藤傅琉璃烧木栅入，会大雨滂沱，竟夕火不能燃而罢。凌晨，廷理率民兵二千人出小东门，左营游击左渊率二千人出小南门，斜围贼陈，并力冲杀，生擒贼目陈允、蔡茂，贼惊遁，民心始固。是日五十二年元旦也。三月二十九日贼复至，其大目庄锡舍有族弟庄达才为道辕吏，廷理令赉书谕降，时锡舍攻大南门，得书倒戈攻贼，呼声振地，我兵夹击之，贼大败去，自是不敢复窥府城矣。十一月大将军大学士福康安以禁旅至，进攻斗六门，大里戍，廷理已擢知府，奉檄领义勇一万二千人会剿，至三坝店中路犹梗，贼来益众，廷理涉水截杀，贼三战三北。贼目陶乌率党五百人降，廷理即给口粮，用为前驱。中路贼解散，遂及大将军于平口，逆首林爽文为大将军，得大将军以次年移师南剿大田。廷理由水底案杀贼净尽，与大军会。大田率众列海岸抵拒我军，我军横击之。生得大田。台湾平，进台彭道加按察使銜。六十年以往时亏侯官帑被逮，清款起用。嘉庆十年，海盗蔡牵结山贼窥台湾。报至天子，思用旧人足资镇抚，命廷理驰驿知台湾府事，至则牵已遁。而朱潰于十二年秋入苏

澳，谋夺蛤仔滩东势。廷理奉檄往厘兼程至艋舺，亟遣人谕东势潘贤文，晓以大义，于是蛤仔滩人竟荷镭开道迎太守，请受约束，廷理集耆长抚慰之，众皆欢跃罗拜，有林永福、翁清和愿率精兵，备糗粮取朱瀆、廷理即令率番兵千二百人穿山辟路达苏澳，与总兵王得禄合蹙之，瀆大败，顺流遁去，自是蛤仔滩东西势皆内附，然不能有也。会有旨下督抚收抚其地、廷理已内渡，督抚命廷理假空衔，绥定之事克集，遂设厅，置官吏，改名噶玛兰，而廷理以劳卒矣，年六十有七。

论曰：杨太守全城之功伟矣，厥后开噶玛兰厅，资其粟足食数郡，其泽尤可百世也。乃以劳殒其天年，譬诸舟已抵岸，而操舟者死，得毋憾乎？在太守始终生成吾闽，于是役为终事可以无憾矣。而吾闽民之恩戴将安旧也夫，其又乌能无憾也邪。

（录自高澍然的《抑轩文钞》）

噶玛兰纪略

（清）姚莹 撰

噶玛兰本名蛤仔滩，在淡水东北三貂、鸡笼、大山之后社番地也，三面负山，东临大海，三貂、金面掖其左，摆芝、苏澳、草岭搯其右，员山、玉山枕其后。自山至海，宽广不及四十里，自三貂溪南至乌石港三十余里皆山石无地。自乌石港至苏澳山下绵亘不及百里，然一望平畴，溪港分注，实天生沃壤也。其始，番居不知开辟，杂处深林水窟之中，捕鱼打鹿而已。康熙中，即有汉人兴通市易，蓝玉霖《鹿州集》、周宣子《诸罗县志》皆已载之。乾隆三十三年民人林汉生始召众入垦，为番所杀，后或再往，皆无成功。五十三年林爽文平，淡水同知徐梦麟署府事，乃为台湾府杨廷理言：漳州人吴沙可信用，及蛤仔滩生番易于招抚。杨议上之巡抚徐嗣曾，以界外地恐肇番衅，弗许。吴沙既入垠，惧获罪，嘉庆二年赴淡水请给札招垠，同知何茹莲予之。沙出私单招佃，每地五甲为一张犁，取番银二十助乡勇费，沙死。四年，其众诡名苏长发赴省请垦，蕃司刘斌檄府察之，淡水同知李明心议以蛤仔滩远在淡水、三貂以外，距淡城五百里。深林密菁，叠

嶂重峦，鸟道纡迥，人迹罕至。三十六社生番性同泉獐，勿许便。时杖已去，藩司李长森从之。六年，沙子光裔及何绘、赵隆盛、柯有成等请复加前议，置之，然三籍人众，亦未议逐出，山封禁，民垦自若也。绘等多方求为业户，不克。十一年，海寇蔡牵至乌石港，欲取其地，使人通谋共垦，众患之，贼舟有幼童被虏者乘间登岸，遇其文匿之，贼索不得，扬言且灭头围，众益惧，头人陈奠邦、吴化辈相与谋：今通贼官兵必讨，不如拒之，且以为功，乃夜定计集乡勇并各社番伏岸上为备，贼犹未觉，晨入市货物，众乃缚之。得十三人并贼目，贼闻之怒，连帆进攻，众断大树塞港，贼不得进，拒敌久之，贼败去，化等乃以所擒贼献将军，赛冲阿闻，乃有该处膏腴为蔡逆窥伺之奏。夏四月奏命官兵相机筹备，犹未议开也。七月，杨廷理以事戍伊犁返，复授知府，召见问状，廷理奏：蛤仔滩当开，不宜弃置貽边患。上使驰驿至闽与督抚商之，未果。十二年七月，海贼朱瀆大载农具泊苏澳，谋夺溪南地为贼巢。五围头人除奠邦等遣人告急，廷理乃与南澳镇王得禄水陆赴援。先是，漳人尽得有西势地，柯有成、何绘、陈奠邦、赖岳、吴化、吴光裔六人为之董事，而东势之强者独潘贤文处罗东社，自罗东以南至苏澳数十里朱瀆谋，夺之以哗吼红布散给东西势各社番，有漳人李祐阴结党与通。杨廷理乃以札谕柯有成、潘贤文七人，晓以大义，以哗吼十板红布五百匹、番银千饼赉众番，贤文大悦。民咸踊跃，乃设木栅于海口，各出器械巡逻，捕通贼者，祐党惧，挈妻子入于贼舟，贤文复获海寇黄善等七人以献，有黄灶者，大股贼目也，遁于蛤仔滩，为黄姓所匿，廷理索之，黄姓缚灶出献，于是蛤仔滩民竞出治道以迎廷理，时镇道以地叵测檄勿往，廷理勿从，九月九日自孟甲入山，四日而至五围，蛤仔滩向多雨，秋以后山海气蒸，瘴云暝合，及杨至而群峰开霁，民以为祥，集耆老抚慰之，众皆鼓舞听命。义首林求福、翁清和等愿率精壮效用。朱瀆距苏澳港内之南澳，王得禄以舟师进至港口，港口内宽外狭，贼以巨缆缠铁锹横沉港口，林永福等番勇千二人穿山开路以达苏，合舟师潘贤文，以众断贼樵汲。戊午，得禄以舟师进攻贼于苏澳，杨廷理、林永福等自澳后攻之，贼大败击出，官军截击，焚贼舟三，沉其大舟一，获二舟，贼以十六艘顺流东遁。廷理安抚其民而归，言于将军赛冲阿，请设官丈田园，弗许。旋去府任，

又力言之，将军令与署府邹翰议之。十二年春，乃奏请设屯而免其升科，部驳中止。十二月少詹事闻人梁上国上言：蛤仔滩田土平旷丰饶，每为海盜窺伺，前朱潰，蔡牵皆欲占之，俱为官兵击退，老收入版图，不特绝洋盜窺伺之端倪，且可获海疆之利，并条奏其状甚悉。上命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议之。阿林保乃以同知徐汝澜署台守诣勘，徐仍如赛冲阿。十四年正月，上谕阿林保曰：蛤仔滩居民现已聚至六万余人，且盜賊窺伺能知协力备御杀賊，深明大义，自应收入版图，岂可置之化外，况其地又膏腴，素为賊匪覬覦，若不官为经理，妥协防守，设竟为賊匪占距岂不成其巢穴，更添台湾肘腋之患乎，该督抚其熟筹定义如何设官安，立厅县，或用文取或用武营，随宜斟酌，期于经久乃善，梁上国摺内叙及蔡逆賊船近至苏澳时先率以上岸，有番人与斗，居民吴氏擒获数賊以献，賊始惊溃而去。嗣朱潰窜往亦经居民与官兵夹攻败賊，如此出力，从前曾否奏明施恩，彼时如曾擒献賊犯即当加之奖赏，亦此时收抚之要著也。时以漳、泉分类械斗未及行。十五年，总督方维甸过台治之既定，乃谋此事，至孟甲有蛤仔滩番土目包阿里率噶里阿完等社番迎见，送呈户口清册，遵制薙发请入版图，并请设立通事，以免熟番侵凌。又有民人何绘等呈请已垦田地照则升科，设官弹压，分定地界，维甸大悦，生番各予奖赏，传比番面询其状，乃复奏曰：淡水玉山之后地名噶玛兰，系番语，闽音不正，讹为蛤仔滩，其地三面距山，东临大海，平原宽广，形若半规，南有苏澳可行大船，北有乌石港，仅容小艇，中有浊水大溪出山东，原在噶里阿完社东旁入海，近年故道汗浅正溜北徙绕过员山经五围之东由乌石港入海，民人所居自五围之外，尚有员山、溪洲、罗东、汤围、柴围、大湖围、三十九结围、都美鹤围劳劳围、下溪洲、几穆捞辛那罕等处，围外零户浊水溪故道之北，尽为漳人开垦十之七八，故道之南系泉人，粤人开垦，又有岸里社、阿里史社、阿东社、东螺社、牛骂头社、熟番迁居其中，荒埔尚未全垦，此噶玛兰地势情形也。当令总兵武隆阿、知府杨廷理勘查。复称噶玛兰南北约长六七十里，东面约宽二三十里不等，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余丁，归代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余丁，未垦荒埔申请分出地界何处，今何籍民人开垦，何处令何社番开垦，分画公平以杜争执，已垦田

地上量升科。其员山东北，地处适中，可以设官安营，头围为水陆扼要之处，应设分汛。臣查噶玛兰田土膏腴，米价较贱，流寓日久，又有朱潰帮内散去余党及逃凶逸犯潜匿其中，前年漳人与泉人械斗，熟番互相庇护，泉人为漳人所困，大半避出，以强凌弱，相习成风，良善民番皆思设官纳赋，若竟置之化外，恐台湾日后或添肘腋之患，镇道会议，皆以设官经理为宜，然该处数十年为王化所不及，一旦绳以法度，亦不能立就安贴。经府杨廷理丁忧，巡检胡桂于情形最为熟悉，臣已令其清查田甲、分划地界，俟其查明，会同抚臣详议具奏。四月初五日杨廷理入山请定章程十八则，丈绳一具以行，何绘等始犹谋为业户，廷理不许，令各结首分领垦单自往丈量，经月三始毕，乃草其节略具报，时维甸已去闽，汪志伊继之，檄台澎道张志绪与廷理复勘。十六年三月，廷理至郡定，九月，汪志伊与巡抚张师诚酌定条例以闻。（以下一节因与杨廷理事迹无关，略去）

（录自《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九帙）

柳州史事、人物三则

陈铁生 刘汉忠

一、林则徐不扰柳州民

林则徐一八三九年三月作为使粤领差大臣到达广州，第二年年初接任两广总督。不久，即处理了一件与柳州有关的政事。

事情是这样：林一上任，即接到广西巡抚梁章巨的报告。说庆远府属的思恩县有人在湖南传习邪教（加入秘密宗教组织），断绝荤腥，炼丹运气，私刻禁书，回籍后发展人员，百姓被诱，执迷不悟者不少。已访获六人，自首十六人，搜得经卷板文等物。林则徐认为：柳州平乐二府，其地多近湖南，难保无习教之徒，于是一面令梁派人分赴柳州，平乐一带暗访明查，一面把情况上奏道光皇帝。皇帝收到奏章，立即下谕，谕中把林上奏的“恐平乐，柳州有人习教”，认定为“平乐、柳州传习尤众”，下令“严行查缉”，把林的怀疑当成了事实。其时，梁委人访查及广西右江道陈修鼎署柳州府知府杨时行等禀告结果是：二地“并无习教踪迹”。但在谕旨的压力下，林只好亲派广东嘉应直隶州知州韩凤修改装易服下到民间密询百姓及各县保正，最后还是查无实据，于是他再次上奏，客观地分析了情况：“此次特奏谕旨饬查，经臣及抚臣先后委派州牧三员，周历查访，如果实有教匪，大小各员正欲显其缉获之能，断不敢蹈欺蒙之咎。兹核所禀情况，是现在无人传习，尚属可信。”皇帝接到上奏后虽然相信了林的话，但对习教一事还不放心。仍下旨“著随时认真防缉，有犯必惩”至此，

清廷追查柳州等地秘密宗教组织一事，总算告一段落。

柳州当时是否有习教之人，史籍无载，不得而知。林则徐出于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需要，对柳州等地百姓进行防范、监视，固不足取，但他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能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并敢于实事求是，没有迎合皇帝的旨意趁机“立功”，免柳州百姓受到一次惊扰，这种爱民的态度也是值得赞扬的。

以上资料来源于《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林氏后人提供的“林则徐使粤督粤未刊奏稿”。

二、著有政声的欧阳永禧

曾住在东门、罗池附近的欧阳一族，是明清时期柳州的一个大族。该族始祖出自江西庐陵，先迁避四川，宋以后有一支到了柳州，以后遂在此定居、繁衍。清代以来，该族出过不少名人，欧阳永禧是其中的佼佼者。

欧阳永禧曾于雍正十三年举拔贡，即授甘肃合水知县，在当地发展水利，初具政声。不久调到武威，当地有一个大灌渠可灌溉民田五千亩，但长期被军队屯田占据，百姓无法使用，永禧和驻军长官协商，撤除军屯，其地由农民代种，其租由农民代交，而农民得以利用水渠灌溉，妥善地解决了问题。由于政绩显著，他升到凉州知府，不久因母丧回籍，数年后授为兰州知府。接着升任河南盐驿道。乾隆二十六年，黄河决口浸溢四十余州县，以朱仙镇灾情最为严重，永禧令人在镇的高阜处结扎棚舍，安顿灾民，并从外地及时购入大量粮食济赈百姓。后调为河陕汝道，又擢升为浙江按察使，在那里他禁革两件旧习，一是废除新官上任时，下属各官要派人到一二百里之外迎接这种劳民伤财之举；二是禁止占用舆夫的劳力而不给工钱。一年后再升至广东布政使，又为当地百姓办了两件好事：一是奏请将连州瑶民编入户籍。那里的瑶民曾于康熙时进行过反抗斗争，失败后被拘禁山中不许外出，欧阳永禧上奏道：瑶民“地狭人众，将无所得食，请许其良者编人民

籍以广谋生之路，而消其生事之端。”另外，他还禁止西江下游近海处的百姓，为贪田亩之利，把淤积在水道中的沃土堆积作田，避免了上游因水道淤塞而泛滥成灾。

欧阳永禧最后一任是江西按察使，不久卒于官。他一生历官好几个省，前后任十数职，每任均能有德于民，这在柳州清代的“乡贤”中是少有的。永禧除从政外，也曾有多种著述行世，计有《政学诗文集》、《仕镜篇》、《罗池族谱》《猗叟年谱》等。

三、乾隆七年的柳州抢谷事件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夏，柳州发生了一起哄动一时的抢谷事件。据当时任广西巡抚的杨锡绂向皇帝反映，产生该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广西粮食大量外运广东，以至广西一些地方米价腾贵造成。

原来“广西所产谷，除本地食用尚有余，广东省即有收，亦不敷岁食，向来资商贩运”（引自《清实录》乾隆朝卷581）平时广西每年以粮食接济广东，对两省经济，民生都有利，然而乾隆六年冬七年春间，广东不少地方因天灾造成粮食特大歉收，对谷物的需要量比以往大得多了，经两省督、抚协商，广西已以官府名义调拨二十一万石仓谷给广东，但仍感不敷，于是商人趁机大量收购贩运倒卖牟利。而这段时间广西也正好雨水欠缺，禾苗栽插未遍，一时间，广西各地米价腾贵。往年每石卖价为七、八钱，而今要卖到一两七八钱以上，有谷之人又囤积居奇，不肯平价卖与百姓。于是首先在梧州、浔州地区引起了骚乱，发生了一系列抢谷事件。因为那里历来是广西粮食外运的中转站，谷价的消长对当地百姓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至于柳州、庆远二府的米谷，曾经前任广西巡抚杨超奏明，是禁止广东来采买的，所以当乾隆七年春间，梧、河地区米价昂贵，而柳、庆二地区却仍如既往，每谷一石价止五钱。这时广东代理总督庆复由于广西所运谷米仍不能满足需要，而梧、浔一带的谷价又已高昂，于是要求杨锡绂暂行开禁，到柳州、庆远二府采买谷子，这一计划实

施的结果是与梧、浔一样造成谷价的提高，使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柳州百姓一见广东方面的谷船来，就群起拦阻，事态逐渐扩大，遂产生了抢夺船谷的事件。据杨锡绂的反映，抢谷者不仅限于百姓，“其实一半民人，一半即系营兵，如提标前营则有兵丁唐仁祥，柳州城守营则有兵丁曾彩玉，王田、陈公旺、王国辅、莫玉凤，又有革弁马士英，俱查明实系抢夺之犯。”

乾隆七年柳州等地的抢谷事件表明，即使“康乾盛世”其实也早已隐伏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而统治阶级对这些情况的发生是隐而不书的，故在《清实录》、《清史稿》、《柳州县志》中均不见记录，只是在地方官员向皇帝的上疏中透露出来，此事如何处理，最后结果不得而知。可是从杨锡绂疏中的严厉措词：“重兵驻乱之地，法纪荡然，刁风渐不可长。是以严行批饬查审。”就能知道统治阶级最终是动用镇压之权的。

马平王拯的由来

陈佚生

王拯,原名锡振,字少鹤,一字定甫,因钦佩宋朝包拯的刚直不阿,为官清廉,改名为拯。他生于清仁宗嘉庆二十年(公元1816年),德宗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病卒,享年六十二岁。道光二十一年(1842),二十六岁的王拯考中进士,受官户部主事,后充任军机处章京。时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王拯厕身戎行,以随行幕僚身份随大学士赛尚阿到广西镇压太平军,极力出谋献策。赛尚阿失败后,他返回北京。咸丰年间升任大理寺少卿,再次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赴天津镇压捻军。同治三年迁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衔,任通政使。后因时局动荡,政治上很不得志,加之中年就染上恶疾,便告老离京,漂泊江湖。

王拯的政治生涯是不足称道的,他致仕后向文学方面发展,尤工诗词,并有一定造诣。著有《渝斋文钞》十二卷,《龙壁山房诗集》十六卷,《茂陵秋雨词》四卷及《谈艺录》等诗文集传世。他的诗词在清代广西文坛有一定地位。他还引导晚清四大词人中的王鹏运,况周颐进入词坛。还是广西五个桐城派古文家之一,对桐城派古文传播于广西也出了不少力,像王拯这样的名人,在广西为数并不多,得引为乡贤,当然值得地方自豪。但是,王拯到底是哪府哪县的乡贤,很有必要查查考考。

对于王拯的籍贯问题,很少有人去追究,《全清词钞》、《岭西五家诗文集》、《枢垣记略》和广西通志馆编的《广西省县概况》,柳州博物馆编的《柳州史话》等书,都说他是广西马平(今柳州)人。

可是，《柳州县志》罗列的乡贤名单中，却没有王拯的名字，只在该志卷之七的《选举》栏目中提到他中了进士。其实，王拯的祖籍在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出生地是广西桂林。在他写的《怪江王氏族谱序》中，他就自报家门：“吾家祖籍山阴，先曾祖、尝有丝谱，王父纂录之。”在给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抗英名将葛云飞写的墓志铭中，他也提到祖籍问题：“公讳云飞，姓葛氏，浙江山阴县人……锡振先籍山阴，于公同里……”。在北京居官时，王拯还在道光三十年回过山阴谒先人坟墓，并见到了从未谋面的舅舅袁最翔。王拯的母亲也是山阴人，他在《先妣行实》中提到“府君年十七从先大父游桂林，越年先妣自山阴来归。”无论从父系或母系来说，王拯原籍在浙江山阴县是无疑的了。至于后来王拯这个家族是怎样从浙江山阴来到广西的缘由，他在《先大父行实》中写得很清楚：“先世居浙江之萧山，明万历中迁山阴，历九世。至先曾父登仕公以县佐起家，官云南江洱县尉，积叙升巡检……改广东新会县福永司巡检……登仕公卒后，伯祖书盘公（名朝姍）弃制举业，司名法家言，寿笔出游……后居桂林。”

在《族谱序》中说：“我王父府君讳延姍又讳惟新，从兄游于粤西，生我伯父任洪及我先孝府君。”在《山阴谒墓记》中，他又提到这件事，“维我先大父咸与府君始自山阴出游粤西，穷老而不得归。”由此可见，王拯的父祖这两辈已定居广西了，且居住在桂林，王拯本人也在桂林出生。他在《存恕堂遗诗序》中写道：“于生桂林，与（商）孝廉家比舍居……”。出生桂林的王拯怎么会成为马平王拯的呢？这里，有他一段辛酸的经历。

王拯一岁丧父，七岁丧母，成为孤儿的他跟大姐刘氏生活。在《须砧课诵图序》中，他记述了这段生活：“念七岁时先妣没，遂来依姐氏，姐适新寡，又丧其遗腹子，茕茕独处屋后小园数丈余，嘉树荫之，树荫有屋二椽，姐携锡振居焉。”这里有必要顺带提一下王拯的姐夫刘茂林。刘的祖籍也是浙江山阴，先祖官游至粤，客居梧州，后迁柳州，刘十七岁弃书从贾，发妻亡后取王拯大姐为继室，生两个女儿后病故。

王拯到柳州后与大姐相依为命，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相传他当时替姐姐卖油条度日，后来姐姐节衣缩食，送他进吴轼主持的柳江书院就读，这时王拯已有十五岁了。五年后，转到桂林就学于唐尧心，他在《龙孝先墓志铭》中也提到此事：“余始弱冠，游桂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年已二十二岁的王拯回柳州参加乡试。按当时的科举规定，不是本籍人是不能参加当地乡试的，有人检举王拯不是马平籍人，幸有当时负责管理乡试的秦克绳爱王拯之才袒护着他，为他改了个马平籍。此后，王拯便自认为马平人，不敢再更改籍贯。所以，在为龙州同知王君写的墓表署名就自称“粤西锡振”，在为彭子穆写的墓表后面署名“马平王锡振”在《茂陵秋雨词自序》中，他自号“龙壁山人”，连书斋也以《龙壁山房》命名。龙壁山是柳州八景之一，名为“龙壁迴澜”，在今鹧鸪江左转弯处。戴钦曾以住处附近的马鹿上山定诗稿名为《鹿原集》，王拯仿效他以龙壁山作诗集名为《龙壁山房词》。这样，祖籍江阴，出生于桂林的王拯就成为马平人了。

柳宗元在柳州种竹

潘朝业

柳子厚在柳州栽柑植柳，都各有诗作名篇传世，千古以为美谈。而他领导大规模种竹一事，却很少为人注意。

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一文中，详述了复寺工程是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他到刺史任后开始，十二年十月完成。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立东西序，崇佛店”，“广大逵，达横术”等基建工程外，还“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种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竟然种“竹三万竿。”如按种竹之最高密度算，每竿间隔最近是一米五，则每一百零一竿，即需用地一百五十米长。若方一百五十米地，也仅能种竹一万零二百有一竿。今种三万竿，则非占地二万二千五百平方米不可。何况地形多变，沟壑纵横，山石犖确，田圃交错要栽培竹木，须各随所宜。因使当年种竹之区，必以大云寺（即后来之灵泉寺）为中心，南至同游山，北滨柳江湄，东尽屏山麓，西傍茅风湾。所栽都是以竹为主，间杂嘉木，据他记述仙奕山的景物中曾说：“仙奕山”“多筮簞之竹”^①。此竹竿竿修长直翠，锁烟藏鸟。其下则遍地清阴，和风习习。当时的寺僧退思、令寰、道坚等住持和尚，由于受到太守的重托，自然不敢懈怠，必亲率寺众朝暮护理，使竹木日复一日，欣欣向荣。由此可想，当年在此苍山碧水之间的蔽天竹林，曾一度是漪漪呈绿，临风摇影的胜地。

子厚种竹，何止种在大云寺。据其《柳州东亭记》所载，当柳州正南门外的东亭兴建时，在“披荆蠲疏”之始，亦随着“树以竹、箭^②松、桤、桂、桧、柏杉”等植物。在栽植中，又把竹、箭列于首位。

从此可知，他每逢兴建，都爱种竹以作衬景。他的爱竹，实不下于爱柑爱柳。

爱民及物，是贤者之心。故贤者临民，必多美政。柳先生诚可为千秋良太守之。

【注释】

注①箬笋：《异物志》载：“箬笋生水边，长数丈，围一尺五寸，一节相去五六尺至一丈。”按此乃以古尺寸计。

注②箭：竹细小而劲实，可以为箭者。高七八尺，叶大而阔如箬，节甚密。

柳州被炸知多少

梁志强

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至解放初期（1950年3月）柳州先后遭到各方的飞机反复轰炸。在70余次空袭中，尽管方式相同，而性质却大不一样，现分叙如下。

（一）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驻于湖北的张发奎第四军在鄂西发难，取道湘西辗转进入广西联桂反蒋。同年冬，桂、张两军与粤军开战，首挫于广东从化，再败于广西北流。桂境大河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被粤军占领。次年（1930年）一月，粤军开始派遣飞机侦察、袭击桂、张军防区。

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三日（一些史料说是四月，而当时的报纸却记为二月三日待考），粤军出动飞机18架携120磅炸弹50余枚，袭击桂平至马平一线桂、张军阵地，其中二架飞到柳州，在河北华荣寺一带（今柳新街北段）投下炸弹二枚，炸死炸伤居民20余人（一说50余人）。这是柳州有史以来第一次被飞机轰炸的事件。

同年（1930年）七月，打着“北上护党”旗号的桂、张两军，在湖南衡阳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残部集结于柳州进行整顿。八月二十四日，由曾传贤等驾驶的粤军飞机“台山”、“中山”号飞到柳州，在河南太平街圩场（今太平中街）一带，投掷炸弹4枚，炸死炸伤平民约10人。并向标营（帽合村所好屯西）投炸弹2枚，未中。

十月中旬，南宁解围，滇军退走。粤军于十一月中旬，先后派出侦察机4架，侵入柳州和南宁上空散发“讨伐布告”11万份。其大意谓：不日将派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凯旋返粤的飞机和在粤的飞机数十架轰炸邕柳，奉劝两城居民在三日内撤离，否则将自食其果。然而此举纯属恫吓。以后并未见有粤机来袭。

（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丧心病狂发动侵华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4年，日寇总共出动62批、718架次飞机对柳州（其中42次对机场、13次对市区、7次对郊区）进行狂轰滥炸，共投炸弹2,300余枚，炸死我军民672人，炸伤我军民654人，炸毁焚毁各式飞机102架（待证），毁屋4,500余间，炸沉大小船20余艘，财产损失20,000,000元以上。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一月初，日军航空母舰侵入广州湾（北部湾）。八日，日机开始从舰上起飞入侵广西各地。十日，日机9架经北海侵入柳州，我空军当即升空迎击，我高射炮亦进行密集射击。结果，击落日机2架（一坠柳州，一坠横县）。这是柳州首遭日机侵犯（一些史料说柳州首次遭日机侵犯是1937年冬或1938年秋，均不确）。

七月二十四日，柳州各界代表集会，响应巴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号召，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会后发出“敬电”全文如下：“汉口。外交部驻汉办事处转译。急。巴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勋鉴：日本帝国主义者，肆意轰炸敝国非战区城镇，无辜民众大遭屠杀，各国侨民亦遭荼毒，惨无人道。贵会主持正义，反对轰炸，深表同情，本市民众掬诚响应，敬乞制止暴日侵略，维持世界和平，谨电呼吁，即希垂鉴。中华民国广西柳州各界代表大会叩。敬。”但此电丝毫制止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未隔多久，日机即开始对柳州实施狂轰滥炸。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日机 22 架由海上起飞经北海侵入柳州，在市区上空盘旋几分钟，即飞往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死 2 人，伤 6 人，毁财产 840,000 元国币。

五天后，（九月十八日），日机先后三批共 38 架次由广东武利经灵山、武宣、来宾直袭柳州：十时二十五分，第一批 9 架在机场附近投弹多枚后向修仁飞去；十时三十分，第二批 11 架在机场投弹多枚后向来宾飞去；十时三十五分，第三批 18 架在机场低空投弹，并用机枪扫射，然后分出 5 架飞至河南上空散发荒谬传单，并在窑埠、水南村及河南路一带投燃烧弹多枚，然后向西南方向遁去。这三批日机共投下炸弹百余枚，我人员无伤亡，毁屋 33 间，财产损失 553,000 元国币（一些史料说这一次北门外有几十个地方被炸，不确）。

九月二十七日，日机 22 架由广东经梧州袭柳，在机场投弹多枚，我损失甚微。

十月八日下午，我机 9 架由湖南衡阳飞柳，为倭寇侦悉，第二天黎明，即出动飞机 9 架向柳州机场投弹 30 余枚。幸我机有备，于晨四时二十分已飞走，结果只炸死机场一人，毁财产 163,000 元国币。

十一月十六日上午，日机 21 架（一说 22 架），由广东肇庆经梧州侵入柳州，在河南河北市区共投弹百余枚（内有燃烧弹多枚落于香签街，）共炸死 18 人，炸伤 24 人（一些史料说死伤约百人，不确），受灾人数 250 人，毁屋 46 间，财产损失 2,205,000 元国币。

十二月二日下午二时十二分，日机 12 架在河南中路（今驾鹤路中段）、太平西街马鞍山脚及柳江河面投弹数十枚，毁屋 52 间，炸沉大小船 12 艘，死 13 人，伤 17 人。受灾人数 832，财产损失 147,000 元国币。

十二月二十七日十二时五十分，日机 18 架由粤分两批（一批 9 架经信都转昭平出平乐奔修仁，一批 9 架经梧州、蒙山出修仁）侵入柳州，9 架在市外盘旋，9 架向机场投弹 60 余枚，我损失甚微。

本年，日机共出动 10 批、142 架次轰炸柳州（其中 7 次炸机场，3 次炸市区。《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为 8 次，有误），占该年广西

被炸总次数的 20.4% (1938 年广西共有 16 个县遭日机轰炸 49 次); 投弹 500 余枚, 死 34 人 (占该年广西被炸死 307 人的 11.1%), 伤 47 人 (占该年广西被炸伤 390 人的 12.1%); 毁屋 131 间 (占该年广西被毁房屋 3,746 间的 3.5%, 《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为 74 间, 有误); 财产损失 3,908,000 元 (占该年广西被炸损失 59,563,500 元的 6.6%)。

民国二十八年 (1939 年):

自本年起, 侵华日机数量大大超过我方, 共有 600 余架, 故制空权大部为日机掌握, 特别是桂南战局展开后, 日机集中 251 架攻击桂境, 我空军包括苏联志愿队亦不过 115 架, 因而日机得以更加疯狂肆虐。

四月六日上午, 日机 23 架由海南岛经北海、横县侵入柳州, 在机场投弹数十枚后向东北飞走。我损失甚微。

七月八日下午二时十分, 日机 27 架侵入柳州, 在机场投弹百余枚, 机场设备大部被毁, 被迫暂时停止使用。

七月十五日 (一些史料说是六月二十八日, 不确) 下午一时十分, 日机 18 架 (一些史料说是 50 架, 不确) 由广州起飞经罗定、藤县、榴江侵入柳州, 在河北牛皮码头、东台路、湾塘路、李子园、柳侯公园、北较场、一路塘、映山街大树脚以及小南路一带投弹数十枚, 当天, 因天气炎热, 群众多未避入防空洞而躲于这一带树荫下, 结果伤亡惨重, 事后官方公布, 共被炸死 384 人 (民间说是 400 人以上), 伤 245 人, 毁屋约 300 间, 财产损失 573,000 元。

一周后 (七月二十二日), 日机 18 架自雷州半岛经玉林、桂平、武宣侵入柳州, 在市区盘旋一周后, 即向东台路、兴庆街 (今曙光东路)、东大路、培新路一带投弹 170 余枚 (内有部分燃烧弹), 炸死 151 人 (一些史料说是 200 余或 300 余, 均不确), 伤 129 人, 毁屋 3,440 间, 柳江县政府虽未被炸, 但厅堂监狱亦遭震毁, 逃脱重要犯人甚多 (其中有汉奸案主犯黄河清、要犯蒙品光、莫擎华等, 第二天柳江县政府即悬赏缉拿); 财产损失 4,210,000 元; 仅位于东台路之捷和钢铁

制造厂柳州分厂即损失 20 余万元。

八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时许,日机 18 架(一些史料说是 29 架,不确)由广州经梧州、修仁侵入柳州,在河南北及柳江河面投弹百余枚,炸死 24 人,伤 9 人,炸沉船 10 余艘,毁屋约 500 间,死伤牛 20 余头(文笔路落弹 10 枚,死 11 人,伤 9 人,倒屋 11 间,烧毁房屋 60 余间,死伤牛 20 余头;水南村落弹 3 枚;柳江河面落弹 10 余枚,炸沉渡船 3 艘,死 8 人;柳新街毁屋 13 间;兴仁路毁屋 30 余间;木行街烧毁房屋百余间;铁局街毁屋 10 余间;柳荫路毁屋 20 余间;雅儒村毁屋 40 余间;柴行街毁屋 50 余间;河边街毁民船 10 余艘,死 4 人;西大路毁屋 10 余间,死 1 人;靖南路毁屋 20 余间,青云路毁屋数间,)财产损失 21,092,000 元。

八月二十六日,日机 14 架由海南岛经雷州半岛、玉林、武宣于九时二十五分侵入柳州,我高射炮当即开火猛烈射击,日机仓皇对马鞍山警报灯笼架投弹数十枚后向南遁去。马鞍山脚被炸死 8 人、毁屋 20 间、财产损失 15,000 元。

八月三十一日,日机 6 架侵入柳州,在郊区鸡喇及拉堡投弹多枚,广西中华铁工厂及第九飞机修理厂各毁房屋 1 间,财产损失 20,000 元,死 3 人,伤 3 人。

九月四日,日机 3 架侵入鸡喇投弹 10 余枚,中华铁工厂被炸死 3 人,伤 2 人。

十一月三日,日机 9 架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多枚,我无损失。

十一月五日,日机 18 架在桂林西南遇恶劣气候,即南飞侵入柳州,于 13 时 50 分在机场投弹 10 余枚,我损失甚微。

十二月二日上午八时许,日机 18 架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数十枚,我损失甚微。

十二月四日十一时四十三分,日机 6 架经大塘侵入柳州郊区,在独凳山投弹多枚,我无损失。

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机 9 架经荔浦、榴江侵入柳州,苏联志愿队飞机当即升空迎战,日机一架被击中,坠落于来宾古习乡,人机俱焚。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日机 27 架经横县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多枚后向南飞去。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日九六式驱逐机 18 架侵入柳州，我机分由各地起飞迎击，于是发生了本年最激烈的空战，战斗持续约 15 分钟，结果 8 架日机被击落（一些史料说日机被击落 3 架或 11 架，均不确）。第二天拂晓前，日机 33 架分四批来报复，轮番轰炸机场，共投弹百余枚，因我早有准备，损失甚微。

本年，日机共出动 17 批、238 架次轰炸柳州（其中 10 次炸机场，4 次炸市区，3 次炸郊区。《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为 5 次，有误），占该年广西被炸总次数的 11.9%（1939 年广西共有 13 个县遭日机轰炸 135 次）；投弹 800 余枚，炸死 573 人，（占该年广西被炸死 1,540 人的 37.2%），伤 388 人（占该年广西被炸伤 1,893 的人 20.5%）；毁屋 4,227 间（占该年广西被毁房屋 11,085 间的 38.1%）；损失财产 6,910,000 元（占该年广西被炸损失 17,159,564 元的 40.3%）。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

本年，日寇侵华飞机增至 800 架以上，我机实力单薄，无法正常保卫祖国领空，只能采取“邀袭作战”和重点追逐日轰炸机群的战法。至八月，日先进的零式飞机出现，我机至此在性能、火力、速度上均难以与战，牺牲益重，最后战至仅余各式飞机 65 架，力量已不堪复战，遂开始避战，至印度整训，接收新机。日寇为使蒋介石屈服，接受其投降条件，从各方面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集中空军主要力量大举犯渝即为其一，因而空袭其它地区次数相应减少。

二月二十二日（不少史料说是二十七日，不确）日驱逐机 15 架、轰炸机 36 架（一些史料说是 70 架，不确）由海南岛经海康、廉江、陆川、玉林、桂平、石龙，于下午二时许直袭柳州羊角山，轮番猛炸由蒋介石主持的桂南会战检讨会会场。共投弹百余枚，伤卫士 12 人，（一些史料说有些卫士被炸死，不确），毁屋多间。

四月三十日七时五十七分，日机一架侵入柳州，在市郊大桥投弹 4 枚，我无损失。

五月六日八时许，日机9架自宾阳方向侵入柳州，在立鱼峰一带投弹数十枚，炸死5人，伤11人。

七月二十二日七时许，日机两批各3架分别侵入市郊鹧鸪江、洛垢投弹数枚，我无损失。

八月十八日，日机3架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数枚，我损失甚微。

八月二十五日十时许，日机15架自迁江方向侵入柳州，其中6架在机场投弹数十枚，我损失甚微。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许，日机6架分为两批自南宁侵柳，在机场投弹20余枚，我损失甚微。

本年，日机共出动7批、91架次轰炸柳州（其中3次炸机场，1次炸市区，3次炸郊区）投弹200余枚，炸死5人，伤23人，毁屋多间。

民国三十年（1941年）：

本年，我机继续在印度和中国的西川避战。四月，苏日签订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六月，苏联撤回其援华的全部顾问和飞行员。八月，美国志愿空军250人在陈纳德上校率领下，驾P——40战斗机125架来华效力，重点保卫大西南，故日机仍得以在其它地区为所欲为。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许，日机9架由粤遂溪经来宾侵入柳州，在北郊投弹数枚，尽落荒郊，我无损失。

八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时许，日机两批共31架相继侵入柳州，在河南河北繁盛市区投弹70余枚，炸死45人，伤168人，毁屋72间，其中红十字会、慈善戏院和警察局等处，俱化为灰烬。

八月二十五日八时许，日机6架侵入柳州，在河南马鞍山一带投弹20余枚，炸死12人（其中多为乡间来柳投考柳江县国中的学生），伤23人。

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时许，日机四批共40架先后侵入柳州，在机场轮番投弹数十枚后窜桂林，我损失甚微。

本年，日机共出动8批、86架次轰炸柳州（其中4次炸机场、3次炸市区、一次炸郊区。《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为3次，有误），占该年广西被炸总次数的15.7%（1941年广西共有18个县遭日机轰

炸51次)；投弹100余枚，炸死57人(占该年广西被炸死508人的11.2%)，伤191人(占该年广西被炸伤951人的20%)；毁屋72间(占该年广西被毁房屋1,498间的4.9%)。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本年，由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将在华空军精锐抽调一空，因而袭击广西各地的次数相对减少。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许，日机12架侵入柳州，在机场一带投弹多枚，我损失甚微。

五月三十一日，日机9架由粤经梧州侵入柳州，在机场及火车南站投弹多枚，伤1人，毁屋2间。

本年，日机共出动2批、21架轰炸柳州两次(《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为4次，有误)查实，五月十九日由桂林方向沿铁路线侵入柳州的8架日机，并未投弹即向平南、怀集飞去；十月二十五日上由广州起飞侵入柳州的5架日机，只是侦察并未投弹，投弹多枚，伤1人，毁屋2间。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本年，我空军补充完成返国，实力增强。由陈纳德少将指挥的第14航空队进驻湘桂前线各机场；加上太平洋战事日趋激烈，日机实力大见分散，故空中主动权逐渐转移为我所有。

二月九日上午，日机11架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多枚，我无损失。下午，日机9架又来袭柳，在河北市区投燃烧弹和杀伤弹20余枚，炸死3人，伤4人，毁屋65间。

二月十一日下午，日机18架由粤经梧州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多枚，毁茅屋数间，我无损失。

二月二十二日十二时许，日机15架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数十枚，我无损失。

本年，日机共出动4批、53架次轰炸柳州(其中3次炸机场，一次炸市区)，投弹近百枚，炸死3人，伤4人，毁屋约70间。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五月，日寇开始实施湘桂作战计划。其空军能出动的飞机为220架（到七月减少到200架以内，到八月一日只剩下160架），而我方则为600余架。桂柳会战时，我方集结于桂林、柳州、丹竹、芷江、南雄、遂安、成都等机场的飞机为181架（驱逐机113架，轰炸机68架），因此，上述机场即成了日机攻击的主要目标。

七月二十八日，日机12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投弹70余枚，炸毁大型机5架，小型机5架，焚毁大型机17架，小型机9架（此数字系日本防卫厅于战后公布的档案记录，准确程度待证。以下同）。

七月三十一日，日机6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投弹多枚，我损失不详。

八月十二日，日机3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投弹多枚，我损失不详。

九月四日夜，日机6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先投照明弹再投炸弹数十枚，使美军大型机、小型机各5架起火。

九月十二日，日机3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投弹20枚，机场跑道及其它设施被毁，短期难以使用。

九月十五日夜，日机3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先投照明弹再投炸弹10余枚，炸中大型机2架起火。

九月十八日夜，日机6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先投照明弹再投炸弹20枚，炸毁小型机5架，机场5处起火。

九月二十三日夜，日机7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利用月明在机场投弹数十枚，焚毁大型机2架，另有两处起火，并炸毁大型机3架，小型机5架。

九月二十四日夜，日机6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利用月明在柳州机场投弹10余枚，焚毁小型机2架，炸毁2架。

九月二十七日夜十时五十八分，日机7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利用月明在机场投弹数十枚，焚毁小型机9架，炸毁大型机1架，小型机4架。

九月二十八日夜九时六分，日机9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利

用月明在机场投弹 30 余枚，焚毁大型机 2 架，小型机 31 架，炸毁小型机 1 架。

九月二十九日夜八时四十五分，日机 9 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利用月明在机场投弹数十枚，焚毁大型机 5 架，小型机 3 架，炸毁大型机 2 架，小型机 3 架。

九月三十日，日机 8 架由粤经梧州直袭柳州，在机场投弹 20 余枚，焚毁大型机 1 架，炸毁 1 架，另有两处起火。

十月五日，日机 2 架由粤经梧直袭柳州，对铁桥投弹多枚，未命中。

本年，日机共出动 14 批、87 架次轰炸柳州（其中 13 次炸机场，1 次炸铁桥），投弹 500 余枚，焚毁大型机 34 架，小型机 31 架，炸毁大型机 12 架，小型机 25 架，共计 102 架（系日本防卫厅于战后公布的档案数字，准确程度待证）。

（三）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

十一月十一日日寇占领柳州后，陈纳德少将指挥的 14 航空队不断出动袭击日军。次年夏，日军撤退，国军反攻，美机亦不断配合国军袭击日军。

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美第 14 航空队多次出动袭击由柳州向宜山开进之日军。

十一月二十四日，美第 14 航空队派出飞机 × 架轰炸日军占领之柳州机场。

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美第 14 航空队多次派出飞机 × 架袭击柳州日军后方供应线。

十二月下旬，美第 14 航空队飞机 × × 架多次从贵阳起飞轰炸柳州机场。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六月十日，美第 14 航空队飞机 × × 架袭击柳州驻军，炸毙日

军甚多。

六月二十七日，美第14航空队飞机×架，轰炸柳州日军后方补给线，炸沉运输船×艘。

（四）

柳州解放第二天（1949年11月26日），由海南岛起飞的2架国民党飞机，在柳州火车南站投炸弹数枚，潜藏的敌特趁机散布谣言，人心浮动。柳铁地下党以纠联会名义，印发张贴《告全体铁路职工书》、《给铁路高级职员的一封公开信》，揭露和驳斥敌特谣言，社会秩序又复平静。

隔了四个月，即1950年3月25日，由海南岛起飞的国民党中型轰炸机1架，于上午11时30分侵入柳州，在机场投弹4枚，部分跑道被炸毁。

罕见的警员潜逃事件

梁 辛

1939年，抗战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正是前方抗战最紧张，后方民气最沸腾时。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各尽其力。可是在柳州警察局，却接二连三发生与上述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大量警员弃职潜逃事件。从该年1月至1940年1月，共有37批、181名警员先后逃之夭夭，最多时，一天竟有26人在岗位消失。起因及经过是这样的。

1938年9月13日，日机22架由北部湾的舰上起飞，对柳州机场进行首次轰炸。几天后（9月18日），又有3批、38架次日机袭击机场、窑埠和水南村及河南路一带。接着，5批82架次日机分别于9月27日、10月9日、11月16日、12月2日和27日，对柳州机场和河南北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毁机场部分设施和民房131间，炸死军民34人，炸伤47人。在这7次空袭中，柳州警察局全体警员和防护团一道，负责交通管制、警备、消防、救护等工作。在执行这些任务过程中，一些意志薄弱的警员，目睹了日机疯狂肆虐场面和犯下的残暴罪行后，逐渐产生恐惧心理和畏敌情绪，加上受到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抗战必败”、“日本必胜”等投降主义论调影响（自南京政府将武汉拱手让敌，避往重庆，华南重镇广州相继沦陷后，投降主义论调更甚嚣尘上），开始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纷纷打起各人的小算盘来。

1939年1月，警士王国材、庆威、蓝凤辉、范坤、吴绍安等5人在一次外出执警时，结合当前形势谈起个人打算，不约而同认定“走

为上策”。于是在几天后，分别乘隙弃职潜逃了。王等所为给一些早就想溜但又怕扣上破坏抗战罪名的警员壮了胆，于是开始陆续步他们后尘。2月，即有太平、文惠、城西等分驻所的警士林朝廷、周玉林、李锡钺、容敏生等4人弃职而去。到第三个月，进而发展到挟带服装集体潜逃。先是警士覃义升、梁忠、黄世同、龚海珠、刘有贵、林仲益、黎海廷等7人，串通好于同一天脚板抹油，溜之大吉；接着，柯国治、谭志超、陈旭林、韦开利、韦老三、罗开麟等6人以请假为名，一去不返。4月6日，日机23架袭柳，警士叶永源、林福群、彭福生、沈瑞光、陈俊、黄虎、秦泽云、覃菊英、韦裕受、梁帮首、梁机、黄玉崇、韦永用等13人，乘混乱之机逃之夭夭。5月，又有警士董瑞成、韦超汉、黄兆昆、韦世宽、黄昌甸、阮雨亭、钟天民等7人在岗位上消失。此时，局长王奇珍才觉得问题严重，赶忙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刹住这股潜逃风。如规定各基层每周对警员施行一次时事教育，驳斥各种悲观论调，树立抗战必胜信念；同时，在全局范围进行人员大调整，凡属小同乡的尽量不编在一个所；改单人值勤为双人值勤，明确相互均有监督之责；严格请假制度，因私事外出必须找人作保。经此，潜逃事件暂时不再发生。

进入第三季度，日机再度频繁轰炸柳州市区。从7月15日至9月4日，先后有6批、77架次来袭，共投弹400余枚，炸死军民573人，伤386人，毁屋4,200余间，炸沉大小船10余艘，毁财产2,591万元，面对日机犯下的滔天罪行，部分警员思想又一次波动起来。加上法西斯德国悍然出兵侵略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更加重了这些人的恐惧心理，从此，弃职潜逃事件又再次发生。10月，先后有7批、14名警士挟带服装溜走。11月，日军第五师团从广东钦州龙门港登陆，连陷钦州、防城、邕宁，形势急转直下。柳州警察局在这个月发生的警员潜逃事件也随之达到高潮，平均三天出现一起，最多时一天即跑掉26人，全月共有11批、98名警士弃职潜逃。12月，敌占昆仑关后，又有9批、19名警士溜走。至桂南会战失败（1940年1月），又有4批、8名警士不告而别。

至此，柳州警察局先后已有 181 名警士弃职潜逃，占全局 394 名警士的 46%。造成了各基层组织严重缺员，有的分驻所甚至陷入了无警可派的地步！省民政厅得悉此情况，只好将由邕撤往百色的南宁警察大队 220 人，改调给柳州警察局指挥使用，以解燃眉之急（1940 年冬，日寇退出邕宁，此时柳州警察局已吸收补充了一批新警员，该大队才离柳归还建制）。2 月 17 日，柳州警察局长王奇珍为此引咎辞职，遗缺由梁晓钟接充。梁上任后采取了不少严厉的预防措施，延续整整一年的警员潜逃事件才基本得到制止。

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情况

董咸熙

1989年四月十一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学会在区人民代表大会礼堂，召开广西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会，柳州市教育学会派刘振先、董咸熙两同志前往参加。

雷沛鸿先生是广西邕宁县人，在广西近代教育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创始人。

一、国民基础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1934年，广西省政府根据雷沛鸿先生（当时他是广西教育厅厅长）的意见，公布了《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国民基础教育的任务是扫除文盲。文盲可分为两种：一种不识字的文化文盲；一种是政治上的文盲。为此无论六至十二足岁的儿童和十六至五十岁的成人，均须懂得生产，还要有民族意识。国民基础教育的内容就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和“生产教育”。其特点是“政教合一”，“建教合一”，“文武合一”。学校组织是文化、政治、军事三位一体。要求以政治力量为主，经济力量为辅，限于六年内普及国民教育。规定每乡镇设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长由乡镇长、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兼；每村街设一国民基础学校，校长由村街长、民团后备中队队长兼，名曰三位一体。

二、教育方法

国民基础教育采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与集团活动之生活教育。

（一）运用“互教共学”，“以做为学”，“教训合一”。

(二) 各科教学应注重直观教学。

(三) 指导学生过好集团生活, 启发其自觉、自动、自治之精神。

(四) 全体教师共同负责, 引导学生学习日常生活及社会服务, 并联络和指导学生家庭。

(五) 按实际需要, 指导组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团体并参与活动。

互教共学为集体教育之精髓, 打破我国知识秘传, 技术秘传的传统。

三、师资

(一) 尽先就师范毕业生任用。

(二) 尽先就民团干部训练大队毕业生合格者选用。

四、经费

(一) 拨发各县原有粮赋附加二成为义务教育经费。

(二) 拨用各县附加粮赋三成为教育经费。

(三) 村街国民基础教育经费概由村街自行筹集为原则, 未筹足前, 由省县款补助之。

(四) 中心国民基础学校之经费, 除校长、教师薪给由县款开支外, 其余均由地方自行筹集。

五、国民基础教育实施概况

据《广西教育概况统计》, 1933年, 未实施国民基础教育前, 柳州小学概况:

	学校数	班级	学生	教员	职员	经费
完全小学	16	66	2,499	83	26	15,328
高级小学	1	6	302	11	2	2,292

初级小学	121	144	5,760	165	138	13,861
------	-----	-----	-------	-----	-----	--------

实施国民基础教育后（1934年）的柳州教育概况：

	学校数	学生数	毕业生数	教职员数	经费
中心校	18	11,568	668	395	收入 39,842
基础校	284	3,665	92	30	支出 39,841
合计	302	15,233	760	425	

一九三八年，全县中心国民基础学校从原来的十八所增至三十所。

就广西省全省来说，当时（1934年）全省设有九十九县一市，共有二千三百四十五个乡镇，两万三千九百九十三个村街。实施国民基础教育满六年后，乡镇设有中心校者，为数已达二千二百三十六所，尚须增设的只一百零九所；村街国民基础学校除中心校所在地不另设校外，已设校者达一万九千五百零六所，尚须增设二千二百五十一所。

就入学情形说，全省应受国民教育的学龄儿童共四百一十二万余人，应受教育的成年人四百六十五万余人。已有国民教育智识及在学儿童共三百二十九万六千余人，占总人数 80%，未入学者仅八十二万余人，占总数 20%，成年民众已有国民教育智识及在学者四百一十九万九千余人，占总数 90.1%，未入学者八十二万三千余人，占总数 9.9%。从以上设校数字和入学情况，说明当时普及教育程度是相当可观的；也说明事隔半个世纪的今天，广西区教育学会，召集全区各市县教育同仁，对雷沛鸿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针对教育改革和我国还有两亿以上的文盲而言，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高沙锣鼓

张兆金

高沙村位于西鹅村公所驻地西北部，约于清代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建村，以客家人为主，因所处地势较高，土质多沙，取村名为高沙。后来人口发展，村分为三，才有上高沙、中高沙、下高沙的区分。据说自乾隆年间以来的二百二十年中，高沙村曾以独特的敲击乐蜚声四乡，即旧时名闻遐迩的“高沙锣鼓”。

从清代、民国直至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初，每逢柳州、柳江县的庙会，菩萨出游，抢花炮以及重大传统节日和庆祝活动，都少不了高沙锣鼓队参加，且每次都在队列首位。高沙锣鼓以它鲜明悦耳的节奏和顿挫抑扬的韵律而取胜，因而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高沙锣鼓所到之处，人们都会静下来侧耳细聆，故有“听出耳油”，“越听越想听”的赞誉。如旧时柳州河南码头口有个南评庙，亦称南评宫。民国捣毁神象时，有善男信女把神象藏匿到驾鹤山南麓的小岩中，秘密供奉，香火不久又复兴旺，后来成了新的南评宫。庙祝在盘中养着几条小蛇，称为“青龙”，专作占卜休咎之用。此时，每年都仍举办庙会，据说，凡当高沙锣鼓的敲打声响起时，连青龙也都纷纷下来迎接哩！

1956年，全省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会演时，高沙锣鼓由林福松、林举贤、吴阿云、林福荣、林惠珍、吴宽秀等八人，代表柳州市赴南宁参加会演，获得二等奖，他们还受到北岸、西乡塘等不少单位邀请，去作专场表演，大受省府群众欢迎。

高沙锣鼓队列的组成：队伍前有执三角形旌旗的人开道，接着是“八宝队”，由队员分别或执或举均用锡铸成的“八宝会”牌，这

“八宝”即是双龙、灯笼、罗汉、长矛、关刀、大刀、三叉、狮子等八物的统称。其队员都是十来岁的少年；随后便是抬着敲打的锣鼓篷了。有桶鼓一个，大锣、碗锣各一个，钹和竹笛（解放前后，会吹笛的甚少，后继无人就干脆省了）。队伍外出前，先祭村上的社王，名曰“拜八宝”，祭毕即放鞭炮才敲敲打打出村。

高沙锣鼓敲打的节奏有快、中、慢和强弱的明显区分，开鼓的打法叫长流八宝，接着按上流、下流、二流、三流的顺序变化至三大炮结束，此为整个全套鼓点。继而又从头打起，虽是轮番敲击，却令人听之不厌。

最近，笔者访问了曾参加当年省里会演的林福松。这个年已古稀的老人说：“高沙锣鼓旧时向来配有笛子演奏，解放后已无人会吹了，所以大为失色。如有会吹笛的乐手参加省比赛，应当稳拿第一名的，结果只得第二。老一辈敲打得最有名的是林木生、林石保、林阿养、林家二叔公、三叔公、五叔公、五伯和吴阿仁、吴毛跳、吴三伯、吴五伯等人，但都早已去世，到了我们这辈，和我搭档的只有林举贤、吴阿云。现在他们两人也先后过世，除了我还留有一个旧锣外，什么都已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至今再也无人打了。除我以外，上高沙的林阿小，林阿木俩勉强会打，看来高沙锣鼓曾在柳州闻名了两百多年，如今很可能失传了。”说罢，老人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表露出对即将失传的高沙锣鼓的无限留恋和惋惜！

[补白]

柳州的“力行工会”

柳州搬运工人最初出现在码头做搬运夫或挑夫。最早的搬运工人组织叫“力行工会”，是由伍廷彪的秘书于一九二六年组建的。力行工会的理事长由广东海南出生的李永担任，约有码头工人一百二十多人参加。这些工人多在沙街、大码头、谷埠码头和水南码头搬运货物。后来工人发展到五百多人，办公地点设在五社庙南楼。工人中的封建把头划分地区，盘剥工人，工会大权实际落到了这些人手上。

（小秋）

一张白纸飞过街

一九三四年，雷沛鸿先生为了推行他的《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详文见本辑《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情况》），在广西城乡大办国民基础学校，其目的是为了扫除不识字的文盲和政治文盲。当时的学校课本是由广西自行编印。课本的一册上印有一首山歌是这样的：

一张白纸飞过街，哪个读书哪个乖；

人人读书想官做，剩下禾苗哪个栽？

这首山歌当时在城乡流传很广，真可谓是家喻户晓，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雷先生办学的目的是在扫除文盲以振兴广西。

（汀 汀）

谷埠码头高又高

旧社会时，谷埠码头开辟后，启运货物，均为搬运工人肩挑人抬。搬运工人肩上背着百来斤货物，上下百多级石级，真是苦不堪言，若遇天雨路滑，更加提心吊胆。当时在谷埠码头做搬运工的工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谷埠码头高又高，
上下担心挨折腰；
可怜我们搬运佬，
为了两餐受煎熬！

(辛 辛)

柳南文史

第三辑

柳州市冷柜厂

——从街道小厂到都乐集团

韦柳盛

从街道小厂到国家定点厂

柳州市冷柜厂的前身，主要由一些街道厂于1984年6月10日组合而成。

1、柳南五金厂，原在现市第18中学旁，1958年成立，约20人，主要是为社会提供一些五金日用小商品。1963年在新增20多人的基础上，转为曙光中学工厂，开始为柳机、车辆厂等大厂加工一些零配件。后不久，合并到鱼峰机械厂，职工108人，主要产品为平口钳、冲床等，至1979年合并到柳州市冷冻机厂。

2、鱼峰机械铸造厂，原在现鱼峰加油站旁，于1969年成立打火机厂，职工近20人，主要是为中百站加工打火机。1972年撤销合并给鱼峰铸造厂。

原在现鱼峰路31号，于1968年成立微型电机修理厂，职工约20人，主要是修理电动机及家用电器。1973年撤销合并给鱼峰机械铸造厂。1977年生产雪条机、冷藏柜。

在现柳州市冷柜厂生活区，于1971年成立了鱼峰铸造厂，职工有30多人，主要从事铸造翻沙及帮市工模具厂加工一些模具，1973年撤销合并给鱼峰机械铸造厂，职工增加到100人以上，直到1976年6月撤销合并给柳州市冷冻机厂。

1979年6月，市里将鱼峰机械厂与鱼峰机械铸造厂合并，成立了柳州市冷冻机厂，职工286人，主要产品为雪条机。

1984年柳州市将柳州市冷冻机厂定为县级企业。

1984年2月25日，国家轻工业部同意柳州市冷冻机厂为国家定点生产冷柜企业。之后，为业务对口需要，经柳州市人民政府同意，将柳州市冷冻机厂改名为柳州市冷柜厂。

二期技术改造成效显著

1984年初，为了探索街道工业发展之路，时任柳州市街道工业局副局长的杨鸿泉自动请调到柳州市冷柜厂任厂长。当时工厂的基本情况是：仅11,000平方米作坊式的厂房。从各小厂合并而来的职工不足300人，只有3名工程技术人员，设备甚少，而且陈旧，用手工操作的方法生产较为低档的制冷设备（雪条机及冷藏柜），年利润只有17.5万元，自有资金也只有20万元。面对这些实际，厂领导一班人根据集体企业厂的自身特点，确立以推动企业科技进步为基本方向，以科技兴厂质量第一为基本方针，作出大投入，大产出的战略决策，得到了自治区、柳州市和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与支持。1984年二季度向上级提出进行技术改造的建议，经广西轻工业厅下发（84）轻科字第058号文件，批复同意柳州市冷柜厂进行技术改造，并分两期实施。第一期（84~86年）形成年产5万台冷柜能力，第二期（86~90年）形成年产20万台冷柜能力。同年被国家轻工业部列为国家定点生产冷柜企业。后又经国家轻工业部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以（85）轻计字第19号文件下达了对柳州市冷柜厂引进年产20万台冷柜项目建议书的审查意见，同意所报建议，并将两期投资的款额作了安排。

为了选准引进先进的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设备，1984年6月，杨鸿泉厂长随同当时的柳州市副市长杨基常出国考察，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比较分析和鉴别，于1984年10月26日与丹麦多宝公司正式签订了制冷技术和设备引进合同。这些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又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主要有：丹麦的壳体生产线（Cabinet Forming line）门体生产线（Door Forming line）、意大利产的发泡注射机（Low Pressure Foaming Mach ~ ing）西德产的真空成型线（Vacuum Forming line）和西德法国产的总装测试线（Assembling and testing line）等六条生产线。还有生产过程需要的各种国产配套设备和器械220台（套）。这些洋设备迅速地在“刘三姐”的故乡——柳州市冷柜厂入乡随俗，安家落户，具备了生产各种冷柜、冰箱、冷藏柜、雪条机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柳州市冷柜厂的第一期技术改造项目，1984年开始立项，1986年建成投产，投资1,417万元，1987年全部还清贷款。

完成第一期技术改造工程后达到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如下：

项目	单位	技改前的 1983年	技改后的 1987年	比技改前 增长倍数
主要产品产量	台	909	100,089	110
工业总产值	万元	215	10,137	47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161	10,075	63
税利总额	万元	25.2	1,129.53	43.8
人均税利	元/人年	792	17,594	22.2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年	6,740	157,907	23.4

在1986年完成第一期技术改造计划并取得显著效益的基础上，于1987年4月提出在两年内达到单班产量12万台的第二期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报告的申请意见，经广西区经委研究后，于1987年4月22日下发桂经字（1987）159号《关于柳州市冷柜厂第二期技术改造可行性报告的批复》文件，同意按所报项目进行，冷柜厂于1987年6月3日编报《第二期冷柜〈冰箱〉技术改造方案》，由柳州市经委上报广西区经委，1987年7月3日由广西区经委、计委及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联合下发桂经字（1987）284号文件，同意把项目列入自治区1987年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项目计划，并对项目所

需款额作了安排。二期技术改造项目投资人民币 1,460 万元,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增加生产所需的关键设备,引进的设备主要有:美国 ycn sen 公司的表面喷塑设备;意大利 Atem 公司的真空成型设备及冰箱模具;意大利 Oms 公司的聚氨脂发泡设备及冰箱模具;日本、丹麦等国的总装测试仪器设备;日本的质量控制装置。国内配套的设备主要有:空中输送悬挂链及地面输送线 1,300 米;喷塑生产前后处理线;中心试验室设备;总装生产测试线;计算机中心;工模具制造及维修设备;厂内电话通讯、发电机组(400 千伏安)、快装锅炉等公共配套设备;三废处理、消防器具运输设备及计量器具等。二期技改工程还包括厂区绿化,厂容厂貌。著名书法家柳州市委书记王仁武还亲笔为厂新大门题字“柳州都乐企业集团柳州市冷柜厂”。二期技术改造工程于 1990 年 10 月投入试运行,达到单班生产 12 万台,新增产值 12,200 万元,新增利润 1,200 万元,新增税收 500 万元的设计要求。1991 年 8 月 17 日通过了自治区级验收。广西电视台、柳州电视台、柳州日报、流通报等新闻单位都在黄金时间和显要位置作了报道。

通过两期技术改造项目工程的建成,柳州市冷柜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特点可分为:

- 1、企业规模、物质基础、技术装备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原来占地 11,000 平方米到现在的 67,973 平方米的土地上,按现代化文明生产而扩建 34,986 平方米厂房,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生产线共 302 台(套)设备在运行,企业资产总值为技改前 1983 年的 40 倍。

- 2、企业的产品产量、市场覆盖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年产量最好的 1988 年达到 194,706 台,是技改前的 235 倍。产品以其质优价宜而立足广西、遍及全国,同时还相应建立了 168 个售后服务网点。“都乐”牌系列冷柜还于 1991 年 3 月 7 日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出口西非。

- 3、都乐牌制冷器具产品已从单一的单门、双门冰箱向多品种的立、卧式、多档次发展,现在已拥有四大系列、18 种规格型号,年产量 20 万台的生产能力,以及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三大类、九个品种产品的能力。

4、技术进步，促进了产品质量的不断升华。“都乐”牌制冷器具多次荣获全国性奖牌（产品及企业获奖项目将于后面列出）。1989年被轻工业部授予推动企业科技进步金龙腾飞奖、1991年6月，“都乐”牌BC、BCD、BD三大系列产品，以得分424分（总分为500分）通过了国家轻工业部主持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评审而全部获得生产许可证。

5、企业管理逐步走向现代化、科学化，通过多年努力已形成较严密的十大管理制度，执行严格的方针目标管理。有效地促进企业生产向优质、丰产、低耗、高效、安全方向发展。1987年实现产量超过10万台，产值销售收入超亿元进入柳州市九大工业企业行列；1988年又以年翻番的成绩，被国家统计局计入全国500家大型企业之中；1989年被列为全国同行50家最佳效益企业第25位；1990年晋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先进企业、轻工业部重点骨干企业。

6、技改前后企业经济效益的变化。据统计，“七五”期间完成工业产值57,389万元，比技改前的“六五”期间增长6倍，产量471,942台，增长20倍；销售收入53,688万元，增长26倍；销售税金1,299万元，增长8倍；销售利润3,297万元，增长14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5万元/人，增长14倍；而职工人数仅增长1.1倍，（历年年末的职工总人数将在后面列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年末职工人数统计如下：

1984年年末职工人数为：346人

1985年年末职工人数为：360人

1986年年末职工人数为：490人

1987年年末职工人数为：667人

1988年年末职工人数为：792人

1989年年末职工人数为：713人

1990年年末职工人数为：810人

历年来企业、产品及个人所获各种荣誉称号如下：

一、企业

(1) 1987 年度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授予“全区先进党总支”
全国轻工产品订货会先进单位

(2) 1988 年度

广西最佳对外企业
自治区节约能源企业
自治区标准计量贰级标准企业
自治区二轻系统职工教育先进单位
自治区二轻系统劳资管理先进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列为全国 500 家大型企业，
名次为第 370 位

(3) 1989 年度

为第十一届亚运会提供优质制冷设备荣誉证书企业
轻工业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金龙腾飞奖
商业部授予都乐牌系列制冷产品符合 ZBX99001 ~ 86 标准全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授予“1989 年中国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及
行业 50 家评价本行业最佳经济效益第 25 位”企业

(4) 1990 年度

1986 ~ 1990 年自治区《企业技术进步奖》
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法宣传合格单位
“七五”期间广西二轻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自治区级先进单位
自治区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验收合格单位
轻工部重点骨干企业
“七五”期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先进单位

二、个人

杨鸿泉 1987 年被选为自治区七届人大代表；自治区级优秀厂长（经理）。1988 年被授予全国轻工劳动模范。

赵甫荣 1989 年被评为全国轻工系统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注：企业及个人的荣誉称号只统计到自治区级以上。

三、产品（注册商标均为“都乐”牌）

ByD ~ 150 双门双温电冰箱

获 1985 年度广西轻工优秀新产品奖。

By ~ 170A 型电冰箱

获 1987 年度自治区优质产品奖，柳州市优良产品奖。

都乐牌系列电冰箱

获柳州市 1987 年度最佳消费品奖。

BC ~ 150A 家用双门单温电冰箱

获柳州市 1988 年度最佳消费品奖。

BX ~ 37 型吸收式冰箱

获 1989 年度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品奖。

获 1990 年度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银奖，轻工业优秀工业设计三等奖

BD ~ 145 型顶开式冷冻箱

获 1989 年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银奖；自治区优质产品奖，柳州市优良产品奖

获 1990 年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金奖，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

BD ~ 90 型冷冻箱

获 1989 年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品奖；自治区工业新产品奖，柳州市新产品百花奖。

获 1990 年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铜奖；广西工业新产品百花奖；轻工业部优秀新产品奖。

都乐牌系列电冰箱于1991年7月被广西消费者评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电冰箱。

都乐牌系列冷柜于1991年7月被广西消费者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冷柜。

视才为宝，招来人才聚集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使先进的技术设备转化为生产力，厂领导认为人才是决定因素，但集体企业要靠分来大学生很难，到1984年包括厂长在内仅有3名大学毕业生，怎么办？等待是不行的。因此，在一边谈判引进设备的同时，柳州市冷柜厂就采取请进来、送出去、联合办的办法来引进人才和培训人才。

1、通过向上级人事部门及人才开发中心积极争取和招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企业还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去做广告，招揽人才，厂长杨鸿泉是自治区七届人大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也不放过这一机会，他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发出招聘人才的信息。凡是合格招聘到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家属，优先安排工作优先分配住房。单身技术人员住厂区宿舍还可享受到厂里配给的“五大件”，即：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和煤气灶。工资待遇也高于一般职员。这些良好的环境使科技人员感到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感召了有真才实学者纷至沓来。到1990年底止，工程技术人员达114人，占职工总数的15%，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16.4%。在这些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中既有学识广，经验丰富、久负盛名的老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又有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既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科技人员，也有自学成才的成功者。短短几年时间，一个集体企业能争取到这样多的专业人员，在广西是罕见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厂领导对人才赤诚相待，最早从西安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毕业分配来厂的陈甲春、李园春，30未出头，就分别担任了总工程师和副厂长职务。

为了使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得到不断更新，从1984年起，先后请了广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工学院、航天部703研究所等单位的教授学者、专家来厂讲新知识，这样的内容，每年都有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受教育面达100%。1987年6月还专门请来了美国著名的阿玛那家电公司前副总裁，电冰箱专家罗兹先生到厂讲课，传授他掌握的有关电冰箱制造的关键技术。

2、送出去的办法。据统计，从1984年起：①凡是在职职工，专业对口，经全国统考合格，厂里都支持他们上学，其中全脱产共计23人已毕业，研究生1名。②出国考察学习，共6批，22人次，到丹麦，法国进行培训各1次，到日本、意大利考察技术1次，到香港考察管理1次，到美国实习1次。③到北京、上海、沙市、苏州、广州及本市短期培训140多人次。④鼓励自学成才，规定凡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取得大专单科证书的奖50元，以此类推。厂里不惜重金育人才，每年专项教育经费不少于16万元，最高的是1988年，达21万元，按当时全厂职工总人数792人计算，每个职工年平均教育经费358.2元。

3、联合办学。从1984年起，厂里支付资金，利用当地学校师资，联合招生，联合办学，毕业后定向到厂工作的有：①与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柳州分校联办机械制造专业、电气自动化专业两个班共46名毕业生分别于1987年和1990年到厂工作。②与柳州市一职高、柳铁三中联办《家用电器》《制冷专业》职高班，先后有5期毕业生到厂工作，计230多人。③有普通高中毕业学历，上岗前都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合格后方能招为正式工人。这样，从中专、职业高中毕业的学生占36%，普通高中的占46%，保证工人具有一定的素质。

都乐企业集团的诞生

经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以柳州市冷柜厂为主导企业，以“都乐”系列产品为龙头，通过联合、兼并

及承包、租赁、股份制等方式，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具有法人地位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型的经济实体——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于1988年11月18日在柳州市冷柜厂宣告成立。

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成员企业，共有如下类型：

1、紧密型——实行资产一体化，经营一体化，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承担经济责任，具有法人资格，是企业集团的实体部分。

紧密型成员企业（即集团下属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厂长	书记	职工人数	主要产品
柳州市冷柜厂	杨鸿泉	赵甫荣	810人	冷柜、冰箱、空调系列
柳州市电珠厂	谢明	谢明辉	169人	电珠、自动恒温水瓶、电炒锅
柳州市红波电器厂	伍祖德	陈孟秋 (代书记)	196人	电热褥、胶木电器、电炉、电炒锅、电火锅、电源线
柳州市光电仪器厂	李学孔	冯伟文	59人	照度计、激光功率器
柳州市金属制品厂	李毅生	刘瑞生	154人	镀锌铁丝、冷烫器
柳州市第三机床厂	钟富霖	陈福猷	181人	雪条机、制冰机、万能材料试验机、一扫光杀虫剂、
柳州市电热器具厂	陈国华	陈国华	98人	电热管、电炒锅、电火锅、紫砂电火锅

还有广西家用电器科技情报站，站长：秦善芝，主要从事家用电器、科技、经济、信息、情报收集、调研、咨询和管理工作，为促进本企业集团和广西家用电器工业发展提供情报信息服务。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科研所，所长：李学孔，副所长：林岱华，主要从事中近期新产品开发及新产品的试制。

2、合资型——企业各自保持原有法人资格，按出资比例（包括资金、设备、技术、专利，商标等项或多项作价互相投资）或协定规定享受利益并承担责任。

合资型企业主要有如下5个：

- ①中外合资都乐冰柜电器有限公司
- ②珠海市都乐制冷设备厂
- ③柳州市都乐异型塑料厂
- ④北海市都乐制冷设备厂
- ⑤柳州市帽合塑料厂

其中中外合资都乐冷柜电器有限公司和珠海市都乐制冷设备厂，分别有香港桂龙公司和香港裕芳有限公司参加。

3、协作型——在企业集团的经营方针下，按协作合同的规定享有权利（为本集团配套生产所必要的资金借贷提供担保，按集团生产计划安排协作任务及按质量标准收购协作件），承担义务（按下达的生产计划，按时、按质、按量全面完成配套生产任务），并独自经营，各自承担民事责任。

协作型企业生产主要有如下17个：

- ① 柳州市洛埠塑料厂
- ② 柳州市黄村小学校办工厂
- ③ 柳州市静电涂装厂
- ④ 柳州市第二金属制品厂
- ⑤ 柳州市柳东新桥电镀厂
- ⑥ 柳州市风华塑料厂
- ⑦ 柳州市钢丝制品厂
- ⑧ 柳州市东方电器厂
- ⑨ 柳州市城中五金厂
- ⑩ 柳州市冷柜配件厂
- ⑪ 柳州市侨联塑料制品厂
- ⑫ 柳州市雅莲塑料厂

- (13) 柳铁三中校办工厂
- (14) 柳州市朝阳电器厂
- (15) 86432 部队五金加工厂
- (16) 柳州市教育学院塑料制品厂
- (17) 柳州市通达塑料厂

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形成了跨地区、跨行业、多层次、系列化、多功能、全方位的企业集团。主要经营家用电器及综合经营其他有关产品的科研、生产、经营、维修服务等,兼营为本企业集团申报、分配、组织、调剂原辅材料。整个集团用“都乐”牌注册商标的主要产品有:冷柜系列、电冰箱系列、雪条机系列、电炒锅系列、电吹风、电烙铁、家用节能电炉、箱式电阻炉、胶木电器、电珠、灯具、照度计、激光功率计,还有钢花牌出口电炉丝、金鹿牌出口电珠,卫星牌出口镀锌铁丝以及“都乐”牌液压材料试验机、剪床、刨床、台钻、木工刨床等轻工机械,并在区内外建立有160多个维修服务网点。集团拥有资产总值1亿2千万元,占地面积15万6千平方米,员工2,1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50余人。除拥有国内先进设备外,还先后从西德、美国、意大利、丹麦等国引进八十年代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和制造技术,逐步形成制冷、电热电器、光电仪器仪表,塑料制品、轻工机械工业生产基地和科研情报、生产、销售、服务网络,为本企业集团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

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的管理体制,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是企业集团的最高权力机构,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由柳州市冷柜厂厂长杨鸿泉高级工程师担任,赵甫荣、陈立平任副总经理,冯伟文任办公室主任。集团里一些主要企业厂长参加董事会工作。集团实行资产经营一体化,为统一经营思想和策略,企业集团内实行“五统一”即:经营计划统一、技术改造统一、产品发展规划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产品标准统一。统一向政府承包。

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成立一个多月后,即1989年元月,建立了中共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临时委员会。

根据中共柳州市委员会的指示，1989年5月27日，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召开了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委员会。赵甫荣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杨鸿泉同志任副书记，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厂工会和团委。至此，柳州市都乐企业集团的党、政、工、团机构已设立完善，迅速正常地开展各项工作。

柳州第二空气压缩机总厂经济发展史

田茂琳

概 述

柳州第二空气压缩机总厂（简称“柳二空”），座落在柳州市城站路。工厂占地面积40万平方米，全厂有职工2,450人，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600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700万元。自建厂至1990年底，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5亿元，利润1.5亿多元。

柳二空创建于1950年11月，它的前身是劳改企业，仅能生产石灰、砖瓦、小五金和农具。1958年开始生产空气压缩机，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以生产空气压缩机、塑料成型机和空气净化装置等三大系列产品为主体的大型骨干企业，是机械电子工业部定点生产空气压缩机的重点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包装食品机械公司定点生产塑料产品厂家之一。1989年组建了以柳二空总厂为核心的“柳州气体压缩机企业集团公司”。目前，该厂生产6大类产品，共16个系列100多个品种。其中，全自动塑料吹瓶机和迷宫式压缩机的试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生产空白。自1979年以来，该厂先后有1种产品荣获国家银质奖，3种产品被评为部优，2种产品喜捧自治区名牌生产品奖状，8种主要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凭着这种过硬的高质量产品，使柳二空在日趋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该厂生产的空气压缩机，在全国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产品远销到马里、巴基斯坦、加纳、罗马尼亚、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985年至

1989年,该厂连续三年荣获“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秀企业”称号,1986年荣获“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称号;荣获国家“质量管理奖”;荣获“全国技术进步先进单位”称号。1985年至1987年连续三年荣获“全国设备管理先进单位”称号。1988年荣获“全国先进集体”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同年荣获“国家节能二级企业”称号,荣获“国家二级企业”称号。1989年1月荣获“国家计量先进企业”称号,并取得国家一级计量合格证书。1990年荣获“国家安全级企业”称号。厂长田锡柱于1984年至1985年先后荣获“全国质量管理优秀工作者”、“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广西优秀厂长”等称号,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又荣膺“国家级贡献突出专家”称号。

一、创业时期(1950~1957年)

柳州第二空气压缩机总厂的前身是劳动改造罪犯的场所,创建于1950年11月,称柳州市公安局第一监狱(即现在该厂所在地)。1951年1月改为“柳州市公安局劳改大队”,对外名称叫“柳州市新民窑厂”。

1951年至1954年,该厂处于手工业生产阶段。在全国取得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后,国民经济进入了恢复的时期,为了适应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该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劳改方针,加强对罪犯的改造,强迫他们从事劳动,改恶从善,悔过自新,同时为国家创造财富。1951年至1952年,该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组织犯人烧砖、烧瓦、烧石灰。1952年1月,柳州市公安局劳改大队改名为“柳州市监狱”,对外仍称“柳州新民窑厂”,隶属省公安厅领导。1953年6月,该厂与柳州专署公安处“新生铁工厂”合并正式启用“新生铁工厂”厂名。根据广西劳改系统农场和矿山的发展需要,生产各种农具,如锄头、镰刀、五三步犁;仿制小型农机农具,如手摇玉米脱粒机、脚踏打谷机、畜力

榨蔗机等；并为各农场和矿山设备维修提供零、配件。根据市场需要，还自己安排生产一些建筑小五金、鼎锅等商品。1953年秋，工厂已建有铸工车间、锻工车间、钳工车间、机修车间。这年，全厂占地面积7.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580平方米。这些车间设备简陋，车工车间只有30年代皮带车床、牛头刨床、钻床等16台。铸工车间除自制的三节冲天熔化炉外，只有2台一吨的起重手拉葫芦。锻工车间只有手工锻造炉12盘，全厂投入机械生产的劳动力500人。

1954年，根据主管部门的指令，工厂停止生产砖瓦、石灰，进行厂房改建、扩建、新建工程。首先，修改成4米高的工厂围墙。这年4月，新建成小五金车间一栋，砖木结构，建筑面积648平方米，200人投入小五金生产，产品有色扣、插肖、门拉手、球把门锁、弹子锁等。7月，新建成织布车间一栋，砖木结构。该车间有自制铁木结构、机动力人力两用织布机15台，自制竹木结构的手摇纺纱机20台。投入劳动力170人，生产幅宽32吋的灰色布，自产自销。由于原材料问题，织布车间投产不到一年即停产。1954年8月，柳州市监狱对外名称改为“柳州制造厂”。这年，全厂占地面积9.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524平方米，投入机械生产的劳动力达900人。1951年至1954年，该厂共生产普通砖246万块，瓦505万块，石灰3,494吨，加上一批小五金、小农具，总产值共计172.62万元，利润21.61万元。

1955年至1957年，是农业机械生产阶段。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多种经营的发展方针深入人心。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厂领导及时地调整产品方向，开发新品种新产品。1955年8月，研制成功90吨液压榨油机、动力碾碎机、碎麸机、脱壳机等，并投入大批量生产，产品质量优良，畅销全国各地。1956年4月，该厂试制成功15Hp木炭机。这一年，由于工厂归口问题尚未确定，产品未能列入国家计划，工厂仍处在找米下锅的困境。原商定归煤炭部领导下的部属工厂，后因工厂的人事、产权等问题与公安部未协商妥而落空。于是，工厂的生产又回到以市场为主，自产自销的状态。对销路不大、产量少的五三步犁、双轮双铧犁、玉米脱粒机、脚踏打

谷机、蓄力榨蔗机、500公斤台秤等停止了生产。1957年，该厂又试制和批量生产一批产品，如25吨榨糖机、10Hp煤气机、矿山用的一吨翻斗车、饲料粉碎机等，同时加强和扩大自揽任务。这期间，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该厂增添了无心磨床、万能磨床、插齿机、剪冲机床、自制弹簧锤等设备。1955年至1957年，共完成产品产量5,192台，总产值448.8万元，利润66.63万元。由于这一时期农业机械的生产，为发展通用机械产品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压缩机专业厂定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发展时期（1958～1978年）

1958年，由于“左”的思想狂热所致，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该厂建起“曙光钢厂”，从市郊和玉林专区招收500名工人，专门从事炼钢铁、运输工作。1960年钢厂下马，招收来的工人全部回原籍。柳二空广大职工，努力排除“左”的干扰，从沈阳空气压缩机厂索回了仿苏产品图纸，经过整理和克服种种困难，于1958年10月，试制成功IW~3/7型和2Wy~6/7型空气压缩机。1960年10月，又试制成功A~9/7型空气压缩机，这是柳二空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961年5月，该厂进入全国压缩机行业。同年，还参加了行业产品质量检查评比活动，该厂产品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合格。

为了解决空压机配套轴承，1958年该厂试制成功滚柱轴承，1960年成立轴承分厂。截至1962年5月底止，共生产5种类型共121种型号189,062套轴承。1967年轴承分厂奉令调给宜山，成立广西宜山轴承厂。

1961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该厂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空压机产量430台，1961年下降为69台。该厂通过市场调查，转而进行铁锅生产。同时把已停产多年的弹子锁、镰刀、锄头等恢复生产。还大力开发马车、手推车、拖卡和空压机配件等新产品。

1962年3月,该厂试制成功3J~10/8型空气压缩机。1963年,该厂投入年产3000吨化肥配套设备的试制和生产任务,计有立式双缸循环压缩机、立式双缸氨气压缩机。1964年,柳二空与一机部通用机械技术研究所合作,试制了年产5,000~10,000吨化肥的高压循环机,同年批量生产。同年还试制成功0.184型小型空气压缩机。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由于该厂是劳动改造罪犯的场所,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因此,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1966年7月,该厂又承担了一机部1G20~10/7型螺杆压缩机的试制和生产任务。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样机试制出来了,经国家鉴定达到图纸设计要求,随后投入成批生产。当年按合同订货发运50台,获得一机部表扬,并批准该厂添购10台高精度机床设备。螺杆压缩机的试制成功,不但解决了国防需要,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对该厂发展新产品,特别是有螺杆结构的产品富有深远的影响。

1967年5月,该厂试制成功1G-31/20~60/7型螺杆压缩机。同年6月,试制成功广西第一台冷冻机,2A15~1型氨气压缩机。11月,试制成功1G20~20/7型螺杆压缩机。12月,试制成功2Z~618型无油润滑压缩机。为了解决螺杆压缩机的动力配套,1967年11月,柳二空又试制成功6135型柴油机,1971年该产品移交给英山柴油机厂生产,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及设备随文调给英山。

1969年10月,“柳州制造厂”改为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机械工业公司管辖下的工业企业,正式命名为“柳州第二空气压缩机厂”(厂名一直沿用至1986年7月,才改名为“柳州第二空气压缩机总厂”),原有的劳动力(罪犯)分批调往各劳改单位,只留下少数表现好、技术好的刑满就业人员,同时向社会招收新工人补充劳动定员。从1969年10月至1971年,共招收新工人1,539名,青年工人占当时全厂职工总数的97%。新工人进厂后,厂里聘请工程技术人员给工人上技术课,普及技术基础知识。同时,派160名新工人到北京、上海等地对口培训。还选派190名到广西机械学校和其它学校学习培训。

1972年,柳二空在仿苏1W~3/7型和2Wy~6/7型空压机的基础上,进行了产品改革,自行设计WG~3/7、2WG~6/7以及2WyG~6/7型三种型号空压机,内部结构采用短行程高转速,各项技术参数先进,外型美观,体积小,重量轻。从此,柳二空彻底淘汰了仿苏产品,走上自力更生发展产品的道路。1972年10月,军管小组奉命撤销。

1973年8月,柳二空试制成功2Z~3/8型无油润滑压缩机,并投入批量生产。

1974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后,1975年开始,从抓整顿厂容入手,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年终完成工业产值1,612万元、产品产量561台,实现利润597万元,创造了建厂以来最好成绩。

1975年冬至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后,厂领导在这股狂风恶浪面前,仍然完成生产任务,使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358万元,产品产量442台,实现利润495万元。

1977年10月,该厂又试制成功JG25~20/7型螺杆压缩机,并投入批量生产,其中14台支援毛里求斯修建国际机场。这两年期间,该厂整顿和恢复企业管理制度,规定了各业务科室职责范围,制定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使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

1958年至1978年,累计完成产值1.77亿元,利润总额5,199万元。这段时期该厂是有所发展,有所前进的。

三、改革时期(1979~1990年)

(一) 抓好企业整顿,开展企业升级工作

1979年下半年,柳二空开始进行恢复性整顿,制定了系统的厂规厂纪,工厂开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生产出现了喜人的势头。9月,经柳州市重工业局组织验收合格。1980年11月,自治区机械工业局

对该厂企业整顿进行复查验收，总分达945分，占考核分的94.5%，复查验收合格。同年，区机械工业局发给“整顿企业管理合格证”。

1982年下半年至1984年，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厂领导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整顿，制定了“六好企业”的远景规划，建立健全了如下的规章制度：各级领导人员责任制、职能机构和职能人员责任制、工人责任制、生产责任制、技术责任制、经济责任制、交接班责任制、质量检验制度、工艺规程、操作规程、设备维护和修理规程、安全操作规程、计划编制程序、统计报告制度、调度工作制度、在制品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奖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培训制度、采购验收制度、限额发料制度、仓库管理制度、产品销售管理制度、现金收入管理制度、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管理制度等。整顿后，该厂生产经营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数据化、科学化的轨道。1984年5月29日，柳州市重工业局全面整顿验收小组对柳二空进行验收，一次合格。1985年7月23日，柳州市机械冶金公司验收复查组对柳二空企业整顿进行验收复查，再次合格。1986年1月6日，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国家经委授予柳二空企业整顿先进单位称号，打开了向管理要效益的新局面。

1986年至1987年，柳二空根据国务院关于“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部署，及时转向企业升级工作。把重点放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耗和能耗、提高企业内部消化能力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上。成立了“厂企业升级领导小组”，负责升级规划的制订、组织、实施、协调、督促检查和考核工作，并纳入年度厂方针目标和经济责任制挂钩。1986年10月制订了《关于企业上等级升级的初步设想》计划，11月又以自治区有关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升级定级标准为依据，制订了该厂企业升级规划和基础工作升级规划。提出了“争取国家一级企业，确保国家二级企业”的工作方针，经全厂职工的努力，在自检自评的基础上，向市、区提出了升级申请。经自治区组织验收组验收合格后，1987年12月31日，柳二空获批准为自治区级先进企业。1988年8月，经机械电子工业部批准授予

1987年度“国家二级企业”称号。

（二）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强企业管理

1、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

1983年，柳二空在全厂范围内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主要是推广和学习“首钢”的经验，以考核各部门、车间各项经济指标及岗位责任为基本内容。1984年8月，开始实行以计件工资和浮动工资加奖金方案的经济责任制。工人按实际完工的合格产品（零件）的工时计发计件工资。非定额工人和管理人员，实行浮动工资加奖金的办法，按定员，增人不增奖，减人不减奖。1985年，在上年度的基础上，仍然实行计件工资，年终大奖和单项奖，重点考核与普通考核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1986年，根据工资与利润挂钩的办法，实行标准工资超产浮动奖励的经济责任制，各项工作和经济完成指标与单位、个人收益挂钩。1987年以后，继续实行标准工资和浮动奖的经济责任制。

2、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1979年12月，柳二空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1984年获广西质量管理奖后，1986年又获国家机械委质量管理奖。其中主要采取几个措施：一是建立健全管理机构。二是开展群众性的QC小组活动。三是发挥质量检查的监督作用。四是实行质量否决权。五是加强产品质量信息反馈管理。六是加强计量检测工作。

由于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产品质量稳步升级，主导产品Z系列6立方无油润滑压缩机于1977年荣获“广西优质产品”称号，1980年荣获“广西优质名牌产品”称号，1983年荣获国家经委授予的“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

3、开展全面经济核算

该厂从1982年起，实行三级核算，即厂部核算、车间核算、班组核算。三级都坚持天天考核，每旬分析，月终总结和清算。每月编制财务收支计划，严格控制支出，按资金定额进行考核。根据财务六项管理制度，具体制定了《维护财经制度八项纪律》、《加强流动资金周转措施》等制度。

4、推行全员设备管理制度

柳二空贯彻“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以借鉴日本 TPM（全员生产维修）设备体制为主，探索一条符合本厂情况的设备管理现代化路子。从 1984 年开始，该厂就在全厂首先推行了 TPM 管理教育学习班，成立各级 TPM 管理机构，将全厂设备按新的标准重新划分 A.B.C 进行分类管理。在全厂开展设备日点检、定期点检活动和设备的全过程管理，使设备的技术管理与经济管理相结合。计划预修与滚动计划管理相结合。将现代化管理手段用于应用于 TPM 的计划管理阶段，并开展 PM 小组活动，进行维修质量攻关，设备改造成果发表和评价，设备管理优秀单位评比和考核，促进了设备管理工作，成绩显著。因此，1984 年和 1985 年度被机械工业部评为“机械工业部设备管理优秀单位”，同时被国家经委评为“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是广西获此称号的唯一企业）。1986 年、1987 年和 1993 年该厂又荣获“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称号。

5、加强能源管理，做好节能降耗工作

该厂于 1987 年成立了能源管理科，负责厂内能源消耗的定额、统计、核算、奖惩、计划等管理工作。主要能耗种类有：煤、焦炭、各种工业油类、水、电等。为降低生产能耗，先后做了十次节能技术改造工作。如：动力调度、炉窑设备新型保温材料利用、高频设备以硅代闸、循环水利用、压缩空气动力站建设、旧设备的更新换代等改造，从而降低了能源消耗，使单位产品能耗逐年下降。1982 年以后，该厂产值逐年上升，综合能耗逐年下降，因而荣获 1987 年度“国家二级节能企业”称号。

（三）狠抓技术进步，大力开发新产品

1、加强技术基础工作，促进技术进步

从 1979 年开始，该厂以提高产品质量为突破口，狠抓技术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先后制订了“新产品试制管理办法”、“新产品试制鉴定工作程序”、“新产品开发奖励条例”、“技术革新及合理化建议管理制度”等 33 项技术工作管理制度，加强了技术管理

的基础工作，加速了技术开发的步伐。如：“新产品开发奖励条例”规定：凡研制新产品，通过上级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给予1万元的重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为了加强对技术管理工作领导，先后成立了“工艺纪律检查委员会”、“企业标准化委员会”、“厂质量管理委员会”、“技术革新委员会”、“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对有关制度的制订和实施进行组织、督促、检查和评价。在技术管理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次，该厂十分重视情报工作，配备了专职情报员，先后收集国内外样本及有关资料500多种，翻译40多万字，标准情报组还编印了“标准情报简讯”，为各单位及时提供情报信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充分发挥情报的先行作用，由于情报及时、准确，使产品开发具有先进性。

2、重视产品的开发工作，不断开拓新市场

该厂从1980年至1988年，先后完善了2Z系列无油润滑压缩机，2ZET系列二氧化碳压缩机，GZ系列第一、第二代无热再生空气干燥器，IGWU系列第三代无热再生空气净化装置以及新型螺杆压缩机共9个品种31种规格的产品。在扩大生产压缩机及其配套设备的同时，从1982年起还开发了第二产品——塑料注射成型机和塑料中空成型机，形成了两种系列产品，先后研制成功的新产品38个，平均每年都有5个新产品投放市场，做到了“生产一代，试制一代，构思一代”，有效地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上述产品，技术起点高，难度大，其中2MG—6/8型迷宫压缩机、2V3.5~15/12型、2V3.5~20/8型无油润滑压缩机、1GY20~10/7~B型移动式螺杆压缩机、CPJ~2型全自动塑料吹瓶机、CPJ~2PC型全自动微电脑塑吹瓶机属国内首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Z~6/8~I型无油润滑压缩机于1983年被评为国家银质奖，1988年复评再次获国优，2Z~3/8~I型无油润滑压缩机于1983年评为部优产品，1988年复评再次获部优。1990年此两种产品抽检送合肥测试达国家A级产品，使厂产品继续保持国优、部优称号。1989，该厂不断开发新产品，满足社会需求。面对品种多、任务重、

难度大、停电多的困难，该厂技术员知难勇进，完成新生产 15 个，通过鉴定和发用户试用有 11 个，超额完成计划。其中 VT ~ 130 型注射机、SZ ~ 500 / 1000 型注塑机分别获区优质产品和工业产品百花奖，VT ~ 130 型注塑机和 2V3.5 ~ 20 / 8 型无油润滑压缩机评定为 1989 年度国家级新产品，GWU 系列干燥器、SZ ~ 500 / 2000 型注塑机获市科技进步奖，新产品高压氧舱通过社会鉴定。

该厂在先后开发 60 多个品种中，有 8 种达国际先进水平，14 种获省（区）级科技进步奖和工业产品百花奖，三种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2 种获国家专利。1986 年该厂荣获“六·五”期间“全国技术进步先进单位”称号。

（四）建立销售网络，开拓产品流通渠道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柳二空在进行产品开发的同时，也狠抓产品销售工作，先后建立了一套销售和服务体系与制度。1980 年 1 月，该厂建立了经营科，下设产品销售组、经济情报组、广告宣传组、维修服务组、成品仓库、配件仓库和零配件发运小组。1990 年，该厂将经营科改为销售服务公司，并选派一大批业务能力强的技术干部和能吃苦耐劳的同志到销售公司，使销售队伍由 50 多人扩充到 1990 年底 106 人，具有中级职称以上达 9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2 人），大大充实了销售队伍的力量。为提高销售技巧，该厂不定期举办业务学习班。同时，把销售指标落实到网点，开展单项有奖促销竞赛。有效地扩大产品在市场的销售。为使用户感到柳二空就在身边，该厂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服务点的基础上，又先后在成都、西安、济南、云南建立了新的固定服务点，并与全国 30 多个大中城市近 200 家物资供销部门建立了联销和经销关系，既扩大了市场销售，又缩短了厂家和用户的距离。另外，该厂在产品不同的发展时期，采取不同的营销方式，如该厂主导产品在市场普及时，采取“一次销售，终身服务”的制度，受到用户的好评。

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不能进攻就不能自守，必须以攻为首。该厂组织销售队伍奔赴全国各地，风里来，雨里去，在巩固老用户的

基础上，先后召开各大城市和省区有关设计院座谈会、接待用户、举办用户学习班、对用户进行技术培训等，和广大用户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既扩大了城市市场，又开辟了小城镇“根据地”。

在对外贸易上，柳二空厂参加了东南亚、苏联、欧洲和中东市场的展销工作，使该厂优质产品出口前景十分广阔。1990年，仅空压机出口和正在协议合同的就达200万元人民币（实际出口88.3万元）。吹瓶机、注塑机由于现代化程度高，在开罗1990年3月举办的第23届博览会上，首次订货达38万美元，占中国参展塑机80.9%，意大利客商还冒着酷暑千里迢迢上门订货一次就达60多万美元。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广泛地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纪律教育、厂史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该厂每年十一月定为“爱厂月活动”，发动全厂职工做好事。提出了“厂兴我荣，厂衰我辱”的口号，要求职工热爱工厂，做工厂的主人，为振兴柳二空出谋献策，多作贡献。

该厂积极开展“创文明工厂、文明处室”等活动，提高企业文明素质。为此，成立了文明生产领导小组和精神文明办公室，制定出《文明生产规章制度》和《文明卫生考核内容与奖惩制度》，建立检查评比制度，实行奖罚挂钩，文明生产与经济责任制挂钩，致使文明单位层出不穷。1990年，全厂创文明单位30个，文明先进单位12个，先进集体30个，先进个人138个。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该厂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书法、摄影、球赛、舞会、歌咏、文艺晚会、钓鱼等各种文化体育活动，既陶冶了情操，又活跃和充实职工的业余生活。为使思想工作做得更扎实，全厂还设立了142个政工班长，有效地促进了基层两个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该厂还积极开展“三创活动”（创合格班组、信得过班组、先进班组），加强班组建设；关心职工生活，为职工办实事，使全厂形成一种向心力、凝聚力。

柳二空由于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从1982年起，连续四年保持柳

州市“文明工厂”称号，从1985年起，连续五年保持“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

（六）改革带来了经济飞跃

柳二空在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中，狠抓企业管理工作，加强了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使企业经济效益获得了全面提高。1979年至1990年，累计完成产品产量1.8095万台，工业总产值4.63亿元，利税1.17亿元。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自1985年起，该厂经济效益连续三年居全国同行业之首。1985年，被机械工业部评为经济效益好先进单位。1988年，荣获全国先进集体称号，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年，工厂荣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柳州微型汽车厂史略

范绍康

在柳州市柳南区河西路，有一家掩映在绿树鲜花丛中的花园式工厂——柳州微型汽车厂。该厂1958年诞生以来，几起几落，备受时代风雨的考验。然而，由于该厂干部职工坚持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不断同困难作不懈的斗争，终于使企业闯过重重难关，发展成为我国汽车工业中的一颗新星，是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定点生产微型汽车的厂家之一。1988年，该厂基本建成可年产15,000辆微型汽车的生产规模，当年生产微型车8,736辆，工业总产值12,541.6万元（按1981年不变价计算，下同），利税1,311.18万元，被列为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的重点企业。

1958年建厂时，该厂定名柳州动力机械厂。原生产纲领为年产柴油机40万匹马力，汽油机5万匹马力。1960年8月，该厂建成金工、锻工、铆焊、木模四个车间，并从柳机分出1,096名职工和120多台设备，正式开始投产。

建厂初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职工们住在车间，吃在食堂，买菜要到鹅山菜市，有家属的职工要到周末才能回柳机团聚。那时厂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如今西环路一带，尽是荒坡和农田，进厂要经过曲折的田基和一条独木桥，汽车来往则要绕道防腐厂。在这样的条件下，全厂干部职工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投入6135型柴油机和丰收37型拖拉机的试制。

建厂不久，国民经济即进入困难时期。1961年，该厂只完成建厂投资的三分之一，便被列为缓建项目，原定的投资和设计方案停止

执行，正在试制的柴油机和拖拉机被迫停下来，近半设备被封存，300多名职工被精简回乡，工厂职工人数下降到700人。那时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生活异常艰苦，不少职工由于营养不良，相继得了浮肿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全厂干部职工仍然信念不倒，爱厂如家。为度过眼前的困境，他们主动外出接回多批汽车配件和单人锯汽缸回来生产，这才使工厂出现了生机。随着全国形势逐步好转，1963年下半年拖拉机恢复小批生产，样机经广西、广东、江西、河南、浙江、黑龙江6个点的2,000小时中间试验，证明性能良好，质量可靠。当时的农机部长陈正人来厂看了该厂生产的拖拉机后，赞扬说“根据你们厂子、设备、人力的情况，全机1,800多种零件，自己生产95%以上，能生产出这种拖拉机是成功的。”不久朱德委员长来柳州看了该厂的拖拉机，也充分肯定该厂的苦干精神和取得的成绩。1965年，丰收37型拖拉机由八机部组织鉴定定型，投入批量生产，1966年1月，工厂改名柳州拖拉机厂。

在发展拖拉机生产的岁月里，该厂面对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到1965年底，完成技术革新725项，专用设备65台，各种工模夹具536套，组成了后桥壳、变速箱等4条流水作业生产线，拖拉机的产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然而，就在这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动乱开始了。这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分裂了群众，搞乱了思想，工厂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全厂竟然生产不出一台拖拉机。直到1968年9月，工厂才逐步恢复生产，原有的各种管理制度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工作无章可循，产量仍然很低。在困难面前，全厂职工不悲观，不气馁，1969年，他们冲破重重干扰，奋战一年。拖拉机产量便由1966年的80台提高到464台。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也重新开展。1969年到1972年，先后造出非标设备399台，工夹模具2,000多套，产量也连年上升，1972年生产拖拉机1,002台。不久，一机部派来洛阳拖拉机设计院的同志，对年产5,000台的方案进行扩初设计，确定投资2,500万元。在续建工程的实施过

程中。厂里在依靠外援的同时，仍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般设备尽量自己制造，关键设备及早向外订购，从而节约了资金，加快了建设速度，到1975年9月，完成了土建面积42,700平方米，建成22条流水作业生产线，基本形成年产5,000台拖拉机的生产能力，经一机部组织验收，被列为全国八家拖拉机厂之一。

续建工程的胜利完成，使该厂拖拉机的产量质量得到迅速提高。1973年产量由上年的1,002台增到1,504台，1974年2,015台，1975年3,065台，1976年4,000台，1977年4,488台。至于续建后的拖拉机质量，1978年10月经一机部质量检查组检查，整机性能合格率达100%，装配质量及综合性能合格率88.33%，主要件主要项次合格率88.15%。

然而就在这时，农村经济体制出现新的变化，拖拉机的销路也开始逐渐下降。到1980年底，厂里积压了拖拉机1,713台，负债2,295万元，流动资金被占用3,434万元，全年（1978）亏损58万元，工厂面临新的经济危机。

在困境面前，该厂干部职工不灰心，不气馁，不断增强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和工装设备的优势，一边转产缝纫机、织布机等短线产品，摆脱眼前的困境，一边从长远考虑，积极投入微型汽车的开发试制。经过全厂职工和其他配套厂的共同努力，第一辆微型货车于1982年1月20日问世，同年6月，第一辆微型厢式车试制成功，从此揭开了该厂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样车经过5万公里的路试和严格检验，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1983年4月1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发文，确定该厂为国家生产微型汽车的定点厂。同年8月，1Z110微型车通过省级鉴定，1984年10月又一举通过国家鉴定。1985年2月1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该厂改名为“柳州微型汽车厂”，转口归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管理。

改名转口以后，全厂人员一面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一面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在技术改造的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工夹模具都安排厂内制造。为了少花钱多办事，铸工车间大胆应用实型铸

造新工艺，用泡沫塑料代替木模，短时间内便铸出大批模具毛坯。如大型冲压设备的安装，若请专业安装队伍来施工，需用半年时间，费用也大。厂里几十名职工主动请缨，把任务接下来后，就连续苦干，仅用22天就全部安装完毕，既赢得近半年时间，又节约了费用9万元。接着，厂里抽出一批人员，组成4个专业施工队，一个负责安装设备，一个专门安装水、电、风、气的各种管道，另外两个负责基建项目。由于充分发挥了工厂内部的积极性，一加工、二加工、三加工、一冲压、工模具、总装等车间很快就完成了工艺流程的调整和改造，还组建了油漆、二冲压、焊装三个车间，新建了工模具车间、油漆车间、总装车间的新厂房。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同时，厂里采用技贸结合和租赁引进的方式，从国外引进车身制造软件、冲压、焊装、测试等8个项目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并组织6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到日本进行培训，请日方技术人员来厂交流技术和指导，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技术水平，增强了工厂独立开发新产品的能力。三年多时间，他们就在1Z110微型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出1Z110K厢式车、1Z110S双排座货车、1Z110T铁篷车、1Z110B保温车、1Z110D大轮胎货车、1Z110G高顶厢式车、1Z110G1高顶客车。此外，还从日本引进散件，组装生产出柳州日产轻型车、柳州三菱微型车、1Z110P微型货车、1Z110YH高顶厢式车。1984年11月，国家经委根据该厂研制1Z110微型车取得的成果，颁发了“新产品开发奖”，1987年10月，1Z110G高顶厢式车和1Z110S双排座货车荣获广西工业新产品百花奖。

在自力更生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两个轮子的推动下，这个厂的技术改造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果。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实施的第一期技术改造工程，投资为1,142万元，完成了土建面积10,076.6平方，增加设备603台，形成了年产5,000辆的生产能力。1986年到1987年进行的第二期技术改造工程，投资3,200万元，完成土建面积17,610平方，增加设备566台，基本形成了10,000辆的年生产规模。1987年7月27日，自治区经委发文批准第三期技改工程，投资额为

2,450万元，拟新增土建面积9,533.08平方米；增加设备349台，工程竣工后，年生产能力可提高到20,000辆。随着技术改造不断取得进展，微型车产量也连年大幅度上升。1983年通过省级鉴定时，产量为220辆，1988年即达到8,736辆，到1989年上半年，厂里投放市场的微型车已实破了一万辆，产品遍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在广大用户中间建立了较好的声誉。

柳州微型汽车厂1958年建厂以来，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起几落。现在，正在认真总结经验，向着新的宏伟目标迈进。在目前生产的几种车型的基础上，厂里即将推出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新车型，研制开发微型轿车的各项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在工艺装备方面，大型冲压件将采用卷料开卷落料自动线开料，成型则用1,600吨双动压力机、800吨单动压力机、600吨单动压力机组成的生产线进行冲压；车身焊装拟采用机器人操作，以提高自动化程度，确保焊点的强度和重量；车身油漆已采用八十年代世界先进工艺，“八·五”期间拟将中涂和面涂改为机器人静电喷涂，整个油漆过程将大量采用微机控制。另外，厂里的工模具车间将发展成为柳州模具中心，引进一批国外设计技术和先进的加工、检测设备，以便更好地为本厂和柳州市的新产品开发服务。

美陶充满民族情

——市美术陶瓷厂的崛起

胡光裕

填补了壮区一空白

解放前，柳州已有生产缸瓦的手工业作坊，生产一些盒坛之类的产品。解放后，特别是国家对手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组成了六个陶器生产合作社。六十年代，这几个合作社又进一步联合，组成了柳州市陶瓷厂，仍然是生产水缸、盒坛泥炉等粗陶产品。七十年代初，厂研制小组试制了精陶小酸坛。所谓精陶，不过是产品釉色比粗陶美观一些，前进一步。一九七三年秋，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厂里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工人筹建新厂，同时派人到外地学习生产美术陶技术。经过干部工人的艰苦努力，同年岁末，在如今西环路侧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几间简易厂房和一小方窑建成，这就是柳州市美术陶瓷厂的初期形象，也是工厂当时的全部家当。小方窑只能烧几件产品，但是，就是这几件产品证实了本地泥可以生产美术陶，柳州生产美术陶成功了！紧接着厂里建了一座15m²的倒焰窑，窑小容积小，产量不多。柳州市美术陶瓷厂的诞生，标志着柳州陶器生产前进了一步，结束广西没有美术陶工艺品出产的历史，填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空白。

改革工艺前进一步

初，工厂生产了几年美术陶，企业也就亏损了好几年，这除了当时的“大锅饭”等原因外，工艺技术紧紧束缚着企业。“唐三彩”产品国内传统工艺是实行两次烧成，即坯品先经素烧，出窑后上釉再进窑重复烧一次。这样，装出窑人工，燃料均需投入两次耗用，造成生产成本高，另外，传统烧成温度在1080℃，窑易破损。面对这些情况怎么办？厂技术人员反复调整泥釉配方，烧成人员通力合作，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制，一次烧成终于成功了。产品烧成温度由原来的1080℃，提高到1150℃——1170℃。产品强度大大提高，釉彩鲜艳夺目，具有柳州特色的“柳三彩”产品问世了！烧成工艺的重大改革，使生产成本下降了30%左右，为企业的生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艰辛的十年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三年是美术陶瓷厂艰辛的十年。这十年企业亏损总额39万元，年工业产值在100万元以下徘徊。企业每年靠主管局补助几万元过日子。企业穷，职工苦，有人愧疚地说，十年中职工难与奖金见面。造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而论，建厂之时上级部门只投入了十万元，余下的所有生产基础设施只好向银行贷款，形成负债多多；另一方面，两百多人的企业，退休人员达到上百人，负担重。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大锅饭”把人害苦了。当时企业是按指令性计划，实行封闭式生产。外贸部门收购多少就生产多少，内销路子未打开。那些年，工厂搞计时工资，做多做少，做好做坏一个样，职工缺乏主人翁的思想风格，摇摇欲坠的美术陶瓷厂，在艰辛的十年里，已变成二轻系统有名的老亏损户。

在市有关部门的关怀帮助下，美陶厂在十年中的后期有所觉醒，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加强了企业管理，同时打开了多方销售渠道，使

濒临崩溃边缘的企业立足未倒。一九八四年是美陶厂起死回生转折的一年，这是改革浪潮推动产生的新局面。当年产值达 90.9 万元，实现利润 3.59 万元，扭转了长达十年亏损的被动局面。

可贵的外援

从一九八五年起，美术陶瓷厂有了新的起步。到一九八七年的三年间，工业产值实现税利每年均以 30 ~ 50% 的速度递增，企业有了生机活力。在新的第一步关键时刻，国家民委、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将美术陶瓷厂援助项目推荐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家集体所有制小型企业，生产的民族用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扩大生产能力，企业贷款 50 万元建好一座 69 米隧道窑。但由于前工序设备配套不足，企业自身又无能力，因此建好的窑炉多年未用。一九八五年七月末，联合国派来专家组一行四人，在国家民委和交流中心领导的陪同下，对工厂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考核。同年岁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决定对美术陶瓷厂给予无偿援助 27.8 万美元，支持企业配足设备，启用隧道窑扩大生产。这是我国陶瓷行业唯一获得联合国无偿援助的项目。为配合这难得的外援，市政府对企业给予了极大关怀，批准了相应的项目配套资金，使项目的实施工作进展十分顺利。经过全厂职工的积极努力，69 米隧道窑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正式点火投入使用。至此，美术陶瓷厂结束了使用落后窑炉生产的历史。

难忘的一九八八年

1988 年 1 月 26 日，是美术陶瓷厂历史上难忘的一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助理柔季福，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项目处副处长杜悦新，分别代表联合国及中国政府，与企业负责人对美术陶瓷厂援助项目进行三方审评（区、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审评认为，

美术陶瓷厂实施援助项目以来，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较大，（1987年与1984年相比，工业产值，实现税利均翻了一番）社会效益显著。如解决待业青年就业130人，特别是对四名失足青年的招用，另对桂林市美术陶瓷厂四十二人，为期廿天的技术培训等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审评肯定企业实施援助项目是成功的，项目拟定的目标已经实现。大家对此表示非常满意。项目审评一次顺利通过。美术陶瓷厂通过接受和实施援助项目，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活力，更主要的是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国家争得了信誉。

正当企业迈开新的一步时，罕见的8.31特大洪灾给企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工厂遭受了毁灭性打击。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全厂职工毫不气馁，为尽快恢复生产进行了艰辛的工作，除69米隧道窑由专业工程公司重建外，四孔推板窑、两座48m³倒焰窑等关键设备均在一个月之内用自己的力量修复完毕，恢复了实施项目前的生产能力。企业当年仍然完成了向市政府承包的各项经济指标。工业产值，实现税利均比1987年递增20%以上。一九八八年，美术陶瓷厂被评为自治区和全国民族用品先进企业、柳州市和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朝着远大的理想

美术陶瓷厂十六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各方面有了一定进步。1980年企业研制炻瓷成功，并批量出口西欧市场所需的厨房用品28个品种。当时国内能生产此类产品的企业为数不多。这些年来，企业获区、市新产品百花奖共九件，获全国优秀旅游纪念品奖一件，设计二、三等奖三件，区优质产品一件。由于企业在生产设计上以“工艺品实用化、日用品工艺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指导思想，投入市场的炻瓷电火锅、仿古产品等新品种深受国内外广泛欢迎，每年均有一定数量出口。内销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各省市均有经销。在历届全国旅游产品，内销工艺品订货会上，订货量名列全国同行厂家

之前，保持着供不应求的局面。仿古铜陶制品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对外馈送的定型礼品。

改革开放促进了企业发展，同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工艺美术专业人才，我厂设计室主任黄肇东，（壮族）经过刻苦练艺，水平大提高，他已成为广西九名工艺美术师之一。

美术陶瓷厂是改革浪潮中的一滴水珠，她必将随着澎湃的浪潮奔流直前，在党的领导下，全厂职工决心把充满民族情的产品献给四方、为美化人们的生活，为美好的明天作出积极贡献。

柳州机车车辆工厂发展简史

李达成

铁道部柳州机车车辆工厂，是铁道部直属，主要承担中南、西南地区铁路蒸汽机车和客车车辆修理任务的大型企业。工厂的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6—1949年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是1950—1964年的调整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1965年至今的发展新阶段。

初创阶段：从1946年国民政府交通部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创建柳州机车车辆工厂至1949年柳州解放。在这个阶段，工厂发展十分缓慢，规模甚小。可是，工厂所处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战略地位又十分特殊，工厂的建立仍然奠定了从事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调整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工厂先后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国家调整工业部门结构的时期（1953—1957）和“大跃进”时期（1958—1961），工厂几经上下。经过1951年和1959—1964年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建改造，工厂规模日益扩大。在这个阶段，工厂是铁路局企业，归铁路局领导管理。

新的发展阶段：从1965年工厂划归铁道部直接领导后，工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工厂的建设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一、初创阶段（1946～1949）

铁道部柳州机车车辆工厂其前身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湘桂黔铁路

工程局柳州机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境内铁路相继修复通车，机车，车辆需求量日增，修理任务亦随之增加。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先后复建了麻尾机厂（厂址在贵州麻尾）和苏桥机厂（厂址在广西桂林，后改为苏桥车辆工厂），但因设备简陋，仅能担负本路局机车、车辆的修理。从长远考虑，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决定在“本路之中心，亦为本路路局所在地”柳州兴建一座较大规模的机车车辆修理与制造兼备的机厂。

1946年12月，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在柳州鹅山地区征地，开始筹建柳州机厂。由于资金困难，材料匮乏，工程进展缓慢。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工厂仍未竣工，仅建有无盖顶钢架厂房4,740.4M²，临时工场956.19平方米，办公室及料库372.5平方米，职工宿舍3,540.1平方米。有职工100余人和几台破旧的老式机床，只能从事一些机具整修。

二、调整发展阶段（1950～1964）

新中国建国后，工厂焕发了生机。

1950年工厂交衡阳铁路工程局柳州分局管理，更名为柳州铁路工厂。并将麻尾机厂、苏桥车辆工厂和金城江器材整理站合并该厂。同时决定对工厂进行扩建改造，使之形成生产能力，以担任西南地区的修车任务。铁道部计划在1951年、1952年两年内建成，这是建国后工厂第一次扩建。

1951年5月，工程开工，年底第一期工程完工，共完成锻铸车间、模型库和材料库等工程，使用投资86.19万元。但工程验收时，发现严重质量问题，决定另行投资补修。至此工厂已具有一定规模，有机车工场、锅炉工场、机械工场和货车工场等10个作业工场，职工700余人。当年还完成修理蒸汽机车20台，其中：大修15台，中修1台，局部修4台。

1952年扩建工程因改变计划而停工。同年下半年工厂划归铁道

部工厂管理局领导，当年人员有所增加，有职工 735 人，设备 289 台。当年完成修理蒸汽机车 24 台，其中：大修 2 台，中修 21 台，局部修 1 台；修理货车 139 辆。

1953 年 8 月工厂改归第一机械工业部机车车辆制造局领导，改称第一机械工业部柳州工厂。停修机车，专制车辆。后因另有任务而将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调走。生产直线下降，当年只完成修理货车 6 辆。

1954 年 4 月工厂拨回给铁道部柳州铁路管理局领导。同年冬，铁道部成立柳州铁路工厂筹建组，准备对工厂继续进行改造扩建。

1955 年又因改变计划，工厂筹建组撤销，固定资产移交给柳州铁路管理局。8 月，柳州铁路管理局将工厂撤销，所余人员设备调往局内二十多个单位。

1958 年 9 月，柳州铁路局在柳州铁路工厂原址成立柳州机车车辆配件工厂。

1959 年 4 月，柳州铁路局决定成立柳州机车车辆修理工厂，负责全局机车大、中、架修（南宁机务段架修除外），车辆大、中修及机车车辆配件生产。工厂由机车车辆配件工厂与柳州铁路局桥梁厂铸造车间、柳州机务段工厂（洗修部分除外）及麻尾机务段调来的全部人员组成。计有职工 795 人。9 月，按规划对工厂进行建国后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扩建。近期规划为担任中、架修，远期规划为专做大、中修。近期工程设计年生产能力为大、中修机车 80 台。

1962 年，近期工程竣工，共完成生产房屋 8,898 平方米，生活房屋 1,233 平方米，进厂路线 2.47 公里，道路 2,588 平方米，共使用投资 533.75 万元。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当年即完成不吊炉中修 26 台，架修 36 台。

但由于设备不配套，以及遗留部分建筑安装工程尾工，不能发挥原设计能力，尚不能做大、中修，只能承担机车中、架修和机车车辆配件制造及部分路用机械大修。

1963 年铁道部批准工厂配套工程设计任务书，投资 10 万元完成

锅炉间、煮洗池及雨棚，以及500吨压轴机、镗床、高频焊火设备安装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工厂已初步具备蒸汽机车的大、中修生产能力。

1950年至1964年，工厂虽然几经上下，但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和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造扩建，工厂规模日益扩大。十多年来，柳州铁路局为工厂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1964年10月，工厂已有职工540人，各种设备432台，（1965年工厂划归部属后，调拨给柳州铁路局201台）几乎集中了全局历年添置的精良的机车车辆检修设备，承担了全局的机车架修、轮轴修理、配件生产和部分机械设备的大修。是柳州铁路局的重点骨干企业，为铁路运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的发展阶段（1965～）

1964年10月，铁道部决定自1965年1月1日起，将柳州铁路局柳州铁路工厂改由部直接领导，并将铁道部浦镇机车车辆工厂的机车修理人员和设备迁并入该厂。工厂更名为“铁道部柳州机车车辆工厂”。主要任务是厂修机车，远景规划为机车、车辆修理并举。从此，工厂的建设揭开了新的篇章。

1965年，工厂按年修100台蒸汽机车的生产能力，在原柳州铁路工厂基础上进行填平补齐，当年完成，共使用资金266万元。年末职工人数达1,227人，拥有各种设备234台，固定资产1,448.4万元，工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柳州市屈指可数的大企业，是中南、西南地区铁路蒸汽机车修理的主要基地。当年完成厂修蒸汽机车试生产20台，工业总产值175万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工厂正常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7年8月，工厂停产一个月。

1968年5月至8月，工厂连续停产四个月。9月，工厂恢复生产，全年完成厂修机车35台，事故修1台。

1969年完成厂修机车145台。

1970年8月，工厂改归交通部领导，易名为“交通部柳州机车车辆工厂”。全厂完成厂修机车150台。

1971年完成厂修机车150台。

1972年8月，交通部决定将蒸汽机车修理能力由年修150台扩大为300台。工厂为此进行了扩建。这是工厂改由部直接领导后第一次大规模扩建。

1975年4月工厂重新划归铁道部领导。扩建工程继续进行。

1978年，扩建工程基本建成，共使用投资1,678万元。1978年年末职工人数增至3,748人，拥有各种设备850台，是扩建前的一倍。固定资产原值从1972年的2,293万元，增长到1978年的3,898.2万元。工业总产值从1972年775.8万元猛增到1978年的1,410.3万元。

1978年，工厂以加强计划管理为重点，狠抓各项基础工作，效益显著。全年完成厂修机车350台，超额完成部定计划30台，钢材单耗和成本两项指标达到了同行的最好水平。全年还实现大小革新项目184项，其中比较重大的有132项。如：锅炉装烟管机、机车座炉前组装炉条设备、50吨手控气动油压接车器三项受到全国铁路科技大会奖励。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全面推行了经济责任制，工厂生产创历史最高记录，年修机车362台。

1980年至1982年，机车厂修车年产量在300台至350台之间。

1983年，经铁道部和国家计委批准，工厂按新增年修300辆客车的的生产能力，新建客车修理系统。工厂成立了客车筹备处。

1984年工厂进行了全面的企业整顿，11月，经铁道部、铁道部工业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联合检查评议，验收合格，成绩优秀。

1985年，工厂进一步加强管理，深挖潜力，全厂生产秩序稳定，周期缩短，均衡率全年第一次实现100%。

经过三年紧张的筹备后，1986年9月27日，客车扩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工厂建设又揭开了新的篇章。同年，工厂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的整顿，完成工业普查工作，推行现代化管理和机车定点作业，两个文明建设都取得较好成绩。全年提前27天完成国家下达的厂修机车计划330台，并提前5天完成20台超产计划。安全生产创历史最好水平。工厂被柳州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柳州市委授予“端正党风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987年工厂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积极推行现代化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推行企业现代化管理应用成果40项。其中《优质定点作业法》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二等奖。《推行现代化管理，提高汽缸铸造质量》和《组织部应用PDCA方法培养发展党员》同获铁道部工业总公司三等奖。

1988年，工厂开始对铁道部工业总公司实行三年承包，工厂内部实行层层承包。经过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较好成绩。第一、二季度连续夺得铁道部工业系统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流动红旗。6月，工厂被自治区命名为自治区先进企业。档案管理跨入自治区先进行列，能源工作获自治区先进单位，计量工作进入国家二级。全年提前55天完成厂修机车300台的承包任务，提前8天完成340台厂修机车目标计划。

1989年，工厂客车修理系统基本建成，达到了1965年建厂时远景规划，成为中南、西南地区铁路机车、车辆的主要修理基地，实现工厂创业者多年的夙愿。1989年，在完成机车厂修340台任务的同时，完成客车试生产2台。

1990年，工厂继续完成客车修理系统的配套工程、扫尾工程。至1990年扩建工程累计完成12,807万元。当年工厂完成厂修机车325台，超额30台，完成厂修客车26辆。1990年，工厂已有职工5,889人，各种设备2,662台，固定资产原值7,606.5万元。

几十年来，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扬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创业，奋力开拓，为铁路运输和国家建设创下了光辉的

业绩。仅1965—1990年,工厂共修理蒸汽机车6,518台,车辆28辆,生产机车车辆配件69,857.6吨,路用配件18,908件(套)供工矿用配件686件(套)。

工厂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致力于改善和提高职工的生活福利水平,兴建了一大批生活福利设施。现在,工厂已建有哺乳室、托儿所、职工住宅、浴室、冷库、石油液化气站等生活福利设施。还建有卫生保健站、职工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职工学校、技工学校等文教卫生设施,此外还建有:广播电视站、图书室、职工俱乐部、灯光球场、运动场、游泳池等文化体育设施。至1989年工厂生活福利区占地面积556,000平方米,占工厂占地面积的37.7%,生活区房屋建筑面积178,840.7平方米,占工厂房屋建筑面积的64.3%。

附:柳州机车车辆工厂历年厂名变更情况表

工厂历年厂名及隶属关系变更情况

阶段	序号	年度	厂名	隶属
初创阶段	1	1946.12 ~ 1949.11.25	湘桂黔铁路工程局 柳州机厂	国民政府交通部湘桂黔 铁路工程局机务处
	2	1949.11.25 ~ 1950.1	湘桂黔铁路工程局 柳州机厂	铁道部衡阳铁路管理局 柳州分局
调整 发展阶段	3	1950.1 ~ 1952.9	衡阳铁路管理局柳州 分局柳州铁路工厂	铁道部衡阳铁路管理局 柳州分局
	4	1952.9 ~ 1953.8	铁道部柳州铁路工厂	铁道部机车车辆修理局 1952年12月划归制造局
	5	1953.8 ~ 1954.4	第一机械工业部 柳州工厂	第一机械工业部机车 车辆工业管理局
	6	1954.4.30 ~ 1955.5	柳州铁路管理局 柳州工厂	铁道部柳州铁路管理局
	7	1958.9 ~ 1959.4.24	柳州铁路局 柳州机车车辆配件厂	铁道部柳州铁路局
	8	1959.4.24 ~ 1959.12	柳州铁路局柳州机车 车辆修理工厂	铁道部柳州铁路局
	9	1959.12 ~ 1964.12	柳州铁路局 柳州铁路工厂	铁道部柳州铁路局

发展阶段	10	1965.1.1 ~ 1970.8.22	铁道部柳州 机车车辆工厂	铁道部工厂管理总局
	11	1970.8.22 ~ 1975.5.24	交通部柳州 机车车辆工厂	交通部机车车辆管理局
	12	1975.5.24 ~	铁道部柳州 机车车辆工厂	铁道部机车车辆 工业总局(总公司)

柳州市造漆厂的几度变迁

冯光祥

随着柳州工农业建设突飞猛进，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油漆，因此，1958年6月成立了地方国营柳州市颜料油漆厂筹备处。随即由筹备处主任钟平带领该处数名人员到上海市开林油漆厂学习三个月。同年九月，正式挂牌在今中山东路44号（今市财政局的左侧）办公。

因当时筹备处的场地窄小，地处市中心，对油漆生产不安全，故此筹备处另在柳州市柳北区白沙村一带联系找了两块荒地，并已着手规划、迁墓等建厂事宜，但因当时各筹建的部门很多，大家都争着要地盘。为此，柳州市工业局又将原柳州市飞鹅路红庙屯52号麻疯湾（今华丰湾）原酒精厂的旧址拨给地方国营柳州市颜料油漆厂作筹备处（即今柳州市飞鹅路92巷128号，柳州市自来水公司柳南水厂的生活区）。

筹备处的干部先是从下放到郊区农村的干部中抽调回来的，工人、学徒多数是从街道、学校、农村招收来的。当时练习生的工资每月17元，学徒每月14元，筹建时职工生活很艰苦，住的是破烂不堪的板皮房及旧的油毛毡棚，每逢刮风落雨，到处破漏。因此有些人不够安心，要求退、离工厂。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58年10月初建立了党支部，当时有中共党员3人。1958年10月31日建立了共青团支部。

由于当时的原材料不配套，技术、设备又差，试验生产的油漆不合格，故此又向上海联系，由上海市开林油漆厂派徐步云工程师来

柳支援。这时又招收一个从柳高毕业的练习生，另从宜山等地又招来约三十个合同工人。

1959年3月该厂筹备处与柳州市手工业联社颜料油漆厂合并，该社于1958年7月在谷埠街大同巷、牛屎巷（今豆腐厂附近）附近的操场空地上设有个油漆工场，用大的炒菜锅作容器（约30斤），用木棍作搅拌器，用砍柴的斧头的铁平面作粘度（拉丝）检验器，投入少许的催干子到油锅中一起熬炼，熬炼熟后，待冷却后冲些溶剂冷油就使用了。改名为柳州市颜料油漆厂，有职工约120人。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工人用手工操作，生产了红丹、黄丹、硫酸锰、油布、油衣等。到1959年5月就盈利16,000多元，因而受到上级的重视。

红庙屯52号的地形不适宜建厂、对生产和运输又不方便，便选了今柳州市制药厂（搬迁走的军工机械修造仓库）的地址为厂址，后来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又放弃此地作厂址。

1958年6月，相继成立柳州市聚乙烯厂、烧碱等厂的筹备处。1959年2月，为搞好手工业的归队，将当时分布在飞鹅路等地的街道手工业的锯木社、炸药社、综合化工厂、矿石粉厂、豆腐厂、膏药厂合并为柳州市手工业综合化工厂，厂址设在今柳石路与龙潭路口交接点猫公山的南侧下（即现今的柳州造漆厂厂址）。1959年6月聚乙烯厂、烧碱厂又与柳州市手工业综合化工厂合并，改名为柳州市综合化工厂。

1959年至1962年，在国家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时期，柳州市的工业布局又作了调整。1959年8月24日柳州市颜料油漆厂与柳州市综合化工厂合并，对原两个厂的党、政、工、团的组织机构进行重新调整后，即搬到原柳州市综合化工厂的厂址办公，厂名改为：柳州市颜料油漆化工厂。职工约有360多人，当时生产的品种五花八门、较主要的化工产品有烧碱、硫酸、炸药、漂白粉、红矾钠；化学试剂有硫酸锰、硝酸铅、硝酸银、硝酸；颜料油漆产品主要有各种较低档的钙脂、脂胶、酚醛类清漆及黄丹、红丹等。原留在飞鹅路红庙屯52号生产的烧碱车间约于1961年全部撤离红庙

屯。

1966年将柳州市颜料油漆化工厂改名为柳州市油漆厂，1979年又改名为柳州市造漆厂，对该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设备更新，使该厂由年生产油漆30多吨增至拥有年生产油漆6,000吨能力的企业，成为化工部定点生产涂料的厂家之一。1984年实现油漆产量4,442吨、实现工业总产值1,613.7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7.91万元/人，税利404万元，人均创税利18,000元，居柳州市第二位。

随着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市造漆厂大力调整产品结构，以产品多样化，系列化和配套化的优势，克服了市场疲软等困难，1990年上半年该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创税利两项已跨进了全国涂料工业的先进行列。

柳南区工业史话

刘锡香

柳南区的工业，清朝时，自在谷埠开设集市以后，除米、谷交易之外，还有柳江上游的融江、三江等地的木材运至谷埠集散。后来，各行各业逐渐繁荣起来，工业方面首先出现个体木材加工业。随着人口及其需求的增加，便陆续有酱料、酿酒、烟丝、陶器、饼家、粮油加工、煮盐、棉胎、打铁、打石碑等手工业。当时辖区的手工业比较大的行业有以下四种：

（一）木材加工业

这个行业的形成，先是因供应建筑之需要，于是产生锯木、剥板，发展为制作日家具。在今谷埠下街（旧时车渡码头一带），因此处为当时木材堆放待售之处，自然形成一条街，人们称为板木行。开有十余家店铺，较著名的板木铺有新民、联群两家。

大同巷有徐松林、陈驼子、黄森和、苏万利、陈双合、赵玉成、林福昌、钟桂记、朱名祥、森兴栈、高连兴、周和盛、高炎乐等十三家板木铺。由于上游运下的木材质量好，粗大的又多，这对旧时土葬习俗需要棺木就很合适。这样一来，就有徐小林、广盛祥、韦有道、温顺利、陈有大、董海泉，刘顺利、永和、陈有泰、利发、胡利和、江明轩等十三家专做棺材的店铺。

（二）陶器业

本行业多集中于云头岭（今红阳路）。原料所用的白泥和粘土，

云头岭和附近的沙子岭（今飞机场一带）遍地皆是，不但质量好，而且采用方便，旧时今红阳路云岭区中心是一个大水塘，用水用泥都很方便，加上那时农村所用的水缸、盆，钵、罈、罐需求量很大，烧制出的产品有了广阔的市场。制陶器的家庭作坊有吉祥、顺昌、南记、宗恒、陈振兴、黎树荣、甘坚五、梁顺荣、吉昌、陆信和杨亚德等十一家。从业人员七十余人。生产水缸、盆、钵、茶罐、药罐、腐乳罐、酒罐、醋罈、茶罈等十多个品种。

火炉多是供应城镇商家、居民之用。当时制火炉的有薛保球、邓守森、昌景美、昌文谦、覃世忠、马万英、黎春、杨达连、杨光松、杨英等十一家，从业人员八十余人，生产品种分为炭炉和柴炉两种。

（三）打石碑、打铁专业

这两种专业，多集中于区内谷埠东一巷一带和旧时牛圩坪（今工人电影处）。

打石碑的有谢宏发、伍顺和、宁恒信、唐兴发、邓广森、蒋子清等六家。产品分为单块、两件头、三件头和四合碑等四种。

打铁开店的有雷湘利、李志刚、彭长清、周志荣、黄新古、方利、达利、石利、肖本利、黄新利、成记、李汝南等十二家，云头岭也有两三家。都是打造家用菜刀、柴刀、大钳、锅铲、铁钉、斧头和小农具之类。

（四）煮盐业

人们一向不喜欢食用生盐，因其颜色灰黑，且不卫生。谷埠街一些居民，便从谷埠街批发盐商手上买了盐，再加工成精白盐。因加工时设备简单，只需一口大锅和架一个大灶，把生盐熬煮后成为纯白色精盐，亦称为熟盐。加工后的熟盐再转给杂货铺及零售店销售。此业主要在谷埠东二巷，有覃有福、覃良、谭恒隆、韦安记、韦桂荣、韦永昌、莫彦馥、韦祥华、信德号等九家。西二巷和罗汉巷也有几家。

此外，在谷埠街，旧时还有罗天昌、黄天泰、吴安昌、德昌、

华昌烟庄、和合烟庄等六家烟丝店，是用手工切烟销售的。

民国时期，湘桂黔铁路通车，铁路领导机关驻于本区，先后在鹅山附近建设一些有关铁路运输的工厂。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沦陷，不少外省工商业家迁来柳州，先后在谷埠、谷埠东一巷、东二巷、西闸巷、维新巷一带建有大陆烟厂、民生烟厂、广全烟厂、中兴烟厂、正荣面粉厂、民生酱园、天生酱园，泰兴酱园、福泰酱园、华兴酱园、谦豫酱园。糖果饼有梁美香、美源。枧厂有天成枧厂、天成兴枧厂、绍成枧厂，明盛枧厂、万成枧厂、新亚洲枧厂。还有悦兴铁工桂记大成美术印刷厂，泰昌翻砂厂。碾米的有联丰、广利、宜丰、利昌机器制面碾米厂。在麻疯湾（华丰湾）设有永事机米厂、红庙有源盛砖瓦厂。

1943年，南京被服厂迁来柳州，建于今城站路。新中国建国后，被服厂为广西省财政厅接管。

解放后，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均按行业组织，加入各自行业所组织的工厂、合作社、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一部分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一部分由国家接管改为国营。粮食加工业由柳州市粮食局接收，并在飞鹅路新建延安大米厂，五里卡建有榨油厂。

1958年大跃进时期，掀起大办工业高潮，工厂遍地开花。当时地处现柳南辖区内的柳南、柳石、南站三个人民公社总共办有四十多个工厂，开始有了街道工业。

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影响，街道工业生产的厂、组停滞或下降。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号召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小五金、小化工、小化肥、小百货、小食品）工业、市委又号召市民大办工厂。街道厂、组又迅速发展。柳南人民公社办有：拖拉机配件厂、面条厂、砖厂、麻袋厂、耐火材料厂等五家。柳石人民公社办有：红阳绳缆厂、白铁厂、机配厂、红阳化工厂、耐火材料厂、五金厂等六家。南站人民公社办有：机电五金厂、反帝五金厂、综合服务社、综合五金厂、拖拉机配件厂等五家。

1979年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对街道工业进行了调整、改革和全面规划，将厂、组分为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三级管理。

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办的：柳石街道办事处直属工厂有十二个，柳石辖区居委会共办有六十二个厂、组。柳南街道办事处直属厂六个，辖区居委会共办有四十四个厂、组。南站街道办事处直属厂、组四个，辖区居委会共办有十六个厂、组。鹅山街道办事处直属厂、组三个，辖区居委会共办有三个厂、组。河西街道办事处直属厂一个，辖区居委会共办有九个厂、组。

区办工业：柳南区的区办工业，多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创办起来的，而后经过市街道工业局的调整，大的归公社管，小的属街道居委会办，从而为培养和积累物质设备和技术力量打下基础。

1979年9月，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时，接管有原柳南人民公社的耐火材料厂，柳南针织厂、机械配件厂、柳南五金厂、塑料厂，柳石人民公社的柳石制品厂、化工厂、皮件厂、柳石福利厂，南站人民公社的综合五金厂，机电修理厂、畜产加工厂等。经过调整，到1990有：针织服装厂、印铁制罐厂、铁木制品厂、柳南饮料厂、畜产加工厂、综合机械厂、柳州市耐火材料厂、柳南福利厂、压敏粘胶厂、长生电器厂、羊毛衫厂、计量厂等十二个工厂。

八十年代后期，柳南区政府对区属工厂，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选聘厂长，引进人才，并实行承包责任制。1989年鉴于该区原有的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厂的生产又处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采取了有力措施，主要是“三抓”“两调”“一完善”。“三抓”一是抓管理、二是抓技术改造、三是抓财务管理。“两调”一是调整产品结构、二是调整资金投向。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目标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据1990年统计全区工业总产值为3,140万元，实现利润15万元，实现了稳步发展，为区的工业发展奠下基础。

前进中的壮乡铁路

欧阳侃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欺压下，广西铁路发展非常缓慢。从1896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龙州铁路的合同开始，到1949年广西解放前夕的53年中，国民党政府迫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在广西修建了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共计711.1公里。标准低，装配差，经营管理落后。湘桂铁路1940~1943年每年发送旅客330~410万人，发送货物88~115万吨。黔桂铁路1941~1944年每年发送旅客57~120万人，发送货物12~16万吨。年年收入不敷支出，2万铁路员工生活十分艰苦。湘桂、黔桂铁路经过1944和1949年国民党军队的两次破坏，广西仅留下能继续通车的铁路539公里。

新中国诞生后，广西铁路回到人民手中，沿着共产党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真正成为国家和壮乡人民经济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1950年对原有残破铁路积极抢修，当年6月和10月湘桂线衡阳至来宾、黔桂线柳州至金城江段恢复通车。1951年11月建成湘桂线来宾至凭祥段，1954年从凭祥铺轨至睦南关（今友谊关），1955年7月建成黎塘——湛江铁路，1956年修复黔桂线金城江——都匀段，1958年建成屯秋铁路，1970~1980年建成焦柳线水团——柳州段，1983~1987年5月建成南宁——防城港铁路。共计新建铁路干线支线1,227.3公里。另外，1958~1973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集资，先后新建和改建来合、三罗、东罗、金红、桂海、洛茂等6条地方铁路309.1公里。到

1990年,广西营业铁路2,123.4公里(含地方铁路),为1950年的3.5倍,居全国各省市占有铁路里程第13位。

与此同时,先后重点加强旧线技术改造。黔桂、焦柳铁路实现内燃化,湘桂线柳黎段修建双线,柳州枢纽柳南编组站建成三级三场站型、59股道、机械化驼峰的大型现代化编组站。并在新建和改建铁路中,注重和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推广采用新技术,取得科技成果518项,1979年至1990年取得国家级科技成果7项,铁道部、自治区级科技成果82项,如防止货物列车超、偏载装置,单线铁路隧道射流通风,窄脉冲轨道电路等均为全国铁路首创,建成的来宾红水河斜拉桥是全国第一座、世界第四座铁路斜拉桥。各主要干线的正线上铺设50公斤/米重轨、无缝线路、钢筋混凝土轨枕和新型轨下基础。安装机车“三大件”,车辆推广红外线测轴温装置,采用电气集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装卸、养路、修车、施工、采石机械化等。从而不断改善广西铁路运输设备状态和质量,提高了综合运输能力。

通过新建和改建铁路,并大力开展运输组织工作改革,挖潜扩能,提高和增大列车重量、密度、速度,扩大客车编组及开行组合列车,增开直达货物列车和季节性水果、蔬菜专车,开展集装箱运输和专用线共管等措施,逐步缓和和改善“乘车难”、“运货难”的运输紧张局面。广西铁路旅客发送量1990年完成2,040.9万人,为1950年114.5万人的18倍,货物发送量1990年完成2,119.8万吨,为1950年61.5万吨的34倍。1950~1990年共完成客、货换算周转量5,589.99亿吨公里,产生和提供社会效益242.01亿元,运输利润23.55亿元。1990年广西铁路担负全自治区各种交通运输旅客总周转量50.06%,货物总周转量的87.7%。由此可见,广西铁路对国家和广西的经济、国防、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柳州铁路局全面整顿和改革企业管理,强化经营活力,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各种经济承包责任制,实行与企业经济挂钩的万换算吨公里和工资含量包干等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8万铁路职工的积极性。1987~1990年实行“全面承包,一定

四年，现收现支，定额上交”的经济承包方案，运输生产、安全与效益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承包计划。四年的运输收入完成36.7亿元，为承包计划的105%，上交国家10.6亿元，实现利润7.95亿元。1987年综合经济效益为全国铁路第一名。到1988年12月9日实现行车安全连续1,169天无重大、大事故。创全国各铁路局的最高记录。

40多年来，广西铁路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呈现新气象。1983年柳州铁路局认真贯彻实施铁道部重提“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根据铁道部颁布“约法三章”要求，制定《三优文明建设规划》，持续开展创建“文明单位和文明职工”与整顿治理路风的活动，大力整顿站、车秩序，建立和健全售票、车皮计划的审批制度以及开展“微笑服务”活动等。1985~1990年自治区连续6年授予柳州铁路局“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的称号，1989年被铁道部评为“全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1990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当年还被自治区评选为“自治区先进企业”。到1990年末，柳局的文明单位占全局单位总数的87.3%，8个部定窗口单位在全国铁路最先实现省、部、地市、路局三重命名的文明单位。

柳州火车站的发展概况

严 庸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人民盼望已久的湘桂铁路得以修建，在湘、桂两省人民的奋力抢修下，1939年12月，湘桂铁路衡阳——柳州段及柳州北站建成通车，柳州有了第一个火车站；1940年12月，柳江上的半永久式铁桥及柳州站建成通车，柳州有了第二个火车站；1941年2月建成黔桂铁路的起点站柳州城站，柳州有了第三个火车站，当时由于湘桂、黔桂两个铁路局各自为政，黔桂铁路不仅不能使用湘桂铁路的柳州站，而自建的柳州城站也不能与柳州站接轨，致使湘桂、黔桂两路不能直接通车，旅客和货物都要换车。至1944年，因军事需要，按军事当局要求，才使柳州城站与柳州站接轨，柳州站再与黔桂铁路接轨，并将柳州城站改为柳州东（货）站。

当时3个火车站的规模都很小：柳州北站有四股到发线（含正线）、二股货物线，站线长度约四公里，另由柳州北站出岔建有一条木材专用线，长2.63公里，出租给广西木材公司使用。柳州站有三股到发线，2.5股存车线，站线长度约2.5公里。柳州城站有六股道，站线长度约2.4公里。三站共有站线长度约8.9公里，三站间正线长度约9.5公里。

1944年末，日寇第二次入侵广西时，柳江上的半永久式铁桥被国民党军队破坏。1945年日寇投降后，1946年成立的湘桂黔铁路工程局筹备将柳江大桥修建为12孔48.285米跨度的钢桁梁正桥。由于建桥经费及材料无着，到1949年11月25日柳州获得解放时，柳江大桥仍有4个桥墩未建成，钢梁未能架设。柳州北站与柳州站被柳江阻隔，无法通车，旅客及货物均须驳运过柳江后，才能转往其他各地。

柳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在铁路职工的积极配合下，奋力抢修柳江大桥，仅用六个半月时间，于1950年4月将墩台完成，8月将12孔钢梁架设完毕。616.2米长的铁路大桥建成通车了。1951年由衡阳铁路管理局修建了面积为1,588平方米的柳州站站房，面积为657平方米的柳州北站站房，柳州市的三个火车站投入正常运营。

1953年，柳州铁路局成立后，于1954年将湘桂铁路从凭祥延至友谊关与越南铁路接通。1956年接管了新建成的黎湛铁路。1961年接管了新建成的黔桂铁路都匀——贵衡段（后来又移交给了贵衡铁路分局），客、货运输任务急剧增长，自五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柳州的各火车站均分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新建，扩建工程：

首先，从1954~1990年多次对柳州站、柳州北站、柳州东站进行了扩建。柳州站经过多次扩建，至1961年建成到发、编组及存车线共十九股道的站场，站线延长14.172公里。1967年将站房面积扩建到4,200平方米，1988年再次将站房面积扩建到11,511平方米，成为广西最大的客运站房。柳州北站于1986年将站房面积扩建到2,447平方米，1990年底止，站场扩建为四股到发线，四股编组、存车线，四股货物线，站线长度6.827公里。柳州东站于1990年建成集装箱货场，站场扩建到八股货物线，站线长度9.396公里。

其次，由于扩建后的柳州站仍不能满足运量需要，而又无扩建余地，经报铁道部批准了柳州铁路枢纽规划，新建柳州南编组站及扩建、延长有关各站股道。1965年建成一级三场、三十二股道、半机械化驼峰的柳州南编组站，柳州才有了第四个火车站。此后，运量仍继续剧增，加上焦柳铁路需要与柳州南编组站接轨，1980年7月又开始柳州南编组站的扩建工程，并于1987年基本上建成了三级三场，59股道、机械化驼峰的柳州南编组站。到1990年完成驼峰尾部电气集中工程后，柳州南编组站全部建成，计有站线59股85.901公里长。柳州南编组站扩建的同时，扩建了柳州机务段，车辆段及车轮厂、客车整备场等，共有段管线70股道，28.408公里长。

第三，随着柳州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量兴建了工业企业

铁路专用线。1956—1990年间，柳州各工、商企业共修建企业专用线33条，长91.008公里。其中，较大的有柳州钢铁厂、柳州水泥厂等专用线。柳州铁路局各基层单位下属工厂共修建路产专用线11条，长28.788公里。（含解放前的1条木材专用线）其中较大的有铁道部柳州机车车辆工厂、柳州木材防腐厂等专用线。

第四，1990年底柳州南编组站建成后，柳州铁路枢纽也全面建成。其范围：除包括有柳州北、柳州、柳州南、柳州东四个主要站外，还有湘桂铁路的洛埠、龙塘、鹧鸪江、进德四个站；黔桂铁路的新圩、太阳村、洛满三个站；焦柳铁路的福塘、成团、柳江县三个站，共14个车站。（附柳州枢纽平面示意图），其中龙塘、柳州南编组站、太阳村、福塘、成团、柳江县等六个站均为解放后新建。按旧的柳州市区范围，计有柳州北、柳州、柳州南、柳州东、鹧鸪江、龙塘、新圩、太阳村等八个站，按新的柳州市管辖范围（含柳城、柳江两县）则14个站均在柳州市范围以内。

第五，按柳州枢纽范围，解放后至1990年与解放前1949年的设备量分别比较如下：

1、车站数量比较

1990年柳州枢纽共有十四个车站，比1949年的枢纽范围仅有八个车站，增加了六个车站。

2、正线长度比较

1990年为122.906公里（其中湘桂线含Ⅰ、Ⅱ、Ⅲ线、内外环线、及东西联线59.529公里，黔桂线29.5公里，焦柳线33.877公里），1949年约60公里（其中湘桂线约35公里，黔桂线约25公里），1990比1949年增长62.906公里。

3、站、段、岔、转等线长度比较

1990年胶道206.418公里（其中站线155.865公里，段管线28.408公里，岔线21.153公里，特别用途0.992公里），1949年约16.3公里（全属站线），1990比1949年增长190.118公里。

4、专用线长度比较

1990年柳州枢纽范围内共建有专用线119.796公里（其中工业企业专用线91.008公里，路产专用线28.788公里），1949年仅有路产专用线2.63公里，1990比1949年增长117.166公里。

综合上列正线，站、段、岔、转线及专用线三项长度比较1990比1949年增长369.893公里，这一长度比衡阳——桂林正线长度361公里还多八公里多。1990年柳州枢纽内多类线路长度449.12公里，这一长度比桂林——南宁正线长度430公里还长出十余公里。

第六，柳州市区的四个火车站的客、货运量发展概况（解放前的资料失考，按1990与1953年进行比较）。

1、客运量

1990年柳州站旅客发送量344.12万人，柳州北站14.83万人，共358.95万人；1953年新柳州站仅20.29万人，柳州北站15.56万人，共25.85万人；1990则为1953年的14倍。

2、货运量

1990年货物发送量184.63万吨（其中柳州北站45.77万吨，柳州站51.18万吨，柳州车站87.48万吨），1953年25.93万吨（其中柳州北站16.65万吨，柳州及柳州东站9.28万吨），1990为1953年的7.12倍。

3、解编能力及实际作业量（作业量以柳州南编组站投产前1964年与建成后1990年比较）。

柳州南编组站1990年查实解编能力7,020辆/日，实际完成5,500辆/日，与1964年1,600辆/日比较，1990年为1964年的3.44倍。

处于柳州市的柳州铁路枢纽，不仅促进了柳州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在广西铁路网中，起着心脏作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起着并将继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柳州的第一座无线电台

彭 澎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在柳南辖区内的鹅山旁，竖立着一对高一百六十尺，相距二百三十尺的铁塔。这对钢铁巨人般的塔顶，用环形铁线相连接，连线中间有一较小的环形线向地面垂直延伸，形成一个“丁”字形，伸进至座落在两塔间的一栋机房之内。这就是六十三年前柳州的第一座无线电台。

当时，为了军事通讯上的需要，驻广西的第七军司令部，会同广西建设厅，委派了一位主任工程师，带领几个人，专程到上海，买回三座真空管式无线电台。其中两座各安设在南宁和梧州，另一座就安设在柳州鹅山下。

柳州电台的建筑，是由梧州电台筹备处一并兼理的。南宁和梧州台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就动工兴建，第二年，南宁、梧州两台竣工，通报和通话的效果非常好，通报范围可达太原、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这年八月，柳州台也竣工投入使用，效果同样好，可通报通话两用。这座电台是德国特律风根无线电厂制造的，机力均为五百瓦特，（邕、梧两台亦同）三台天线均采用丁字形，地形用扇形地网，波长可以由六百至二千四百公尺。柳州电台共计花费材料工务费银毫 9,914 元，房屋建筑银毫 10,550 元。

可以说：柳州有无线电通讯是从柳南辖区开始的。

柳南区教育史话

刘 信

柳州市的文化教育始于唐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做柳州刺史，施政设教，进入启蒙时代。而今柳南区的文化教育，则始于清时。谷埠开埠后，商家，居民渐渐聚居谷埠和云头岭一带，随着商业的兴盛，教育事业才随之兴起。清末民初，先是一些有钱的人，为了后一代能受教育，便几家合请一个老师到家中教自己的孩子。后来发展为一些本地秀才到谷埠开馆招收学童入塾。当时在谷埠一带开馆的有：五柳轩馆，设在大同巷，因馆前有五棵柳树而闻名；还有董均之馆，设在云头岭；董海臣馆，设在谷埠后街；董合轩馆、陈治市馆、欧观生馆、韦修和馆、胡北卿馆、朱卓济馆、莫炳臣馆、周书馆、朱国凤馆、谭伟臣馆等均设在谷埠街。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三十四年在今谷埠下街北帝庙处，创办了城区第二初等小学堂，后因战乱停办。清末，在今谷埠幼儿园处，曾开设一所蚕桑学校。民国初年，在今建新饭店处，开办了城区第二国民小学，只有一个班，学生16人。民国四年（1915年）在谷埠中街旧博爱药房处，创办了中区第二女子国民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今谷埠幼儿园处，开办“谷埠小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今工人文化宫创办屏山镇中心校，谷埠小学的学生都到中心校去读。同年谷埠小学改办“谷埠幼儿园”，为柳州第一所幼儿园。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由当时的接云街工长李向春发动群众捐资，于今大同巷二里建立一所接云街街校。民国三十年（1941年）八月，原在三江县丹洲的“北平香山慈小”，

应柳州绥署参谋长张任民及地方上热心教育人士的邀请将小学迁来柳州，于柳邕路狮子岩山麓（今柳邕一小处）建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在今鹅山路四区22号，创办“扶轮第一小学”解放后改称“柳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柳江县政府于屏山镇中心校校址处建立“柳江县立表证中心校”，将屏山镇中心校迁至云头岭（今市六中处）重建。此时，谷埠幼儿园停办，改为屏山镇中心校分部。解放前夕，1949年10月，宜山扶轮中学迁来柳州，在城站路391号设校，解放后更名为“柳州铁路职工子弟中学”（今柳铁一中）。以上系柳南区解放前的办学情况。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柳南区的教育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至1990年底止，柳南辖区现有中学十四所，市属的有：六中、十七中、十八中、河西中学。柳州铁路局办的有：柳铁一中、二中、三中、五中。厂矿办的有：水泥厂中学、车辆厂中学、十一冶建中学、工程机械厂中学、微型汽车厂中学。柳州地区办的柳州地区高中。中专有：柳州市交通学校、柳铁司机学校、柳铁运输学校、柳铁公安学校、柳铁卫生学校、柳铁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柳州地区师范学校，柳州地区民族干校等八所。职业学校有柳州第一职业高中、十一冶建职业高中、车辆厂职业高中，水泥厂职业高中、柳铁三中（职高班）。技校有：十一冶建技校，工程机械厂技校、柳州地区技校。以上各校在校学生共19,891人。小学共二十二所；市属有：柳邕路一小、柳邕路二小、飞鹅路一小、飞鹅路二小、谷埠路小学、红光路一小、红光路二小、城站路小学、上游路小学。柳州铁路局的有：柳铁一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小、九小、厂矿办的有：车辆厂小学、十一冶建小学、水泥厂小学、工程机械厂小学、微型汽车厂小学。以上各校在校学生共20,254人。幼儿园共三十三所（市属3所、区属13所；柳铁9所，厂矿办的8所）入园儿童共4,896人。柳南区的教育事业，在四个城区中，发展最快，成绩最为显著。

柳南区著名的民间文艺团体及名艺人

伍 香

民国初年，谷埠街及大同巷一带，就成立有各种民间文艺团体。如“泰和班”、“彩调班”、木偶戏等。其中最早的，并享有盛名的要数“泰和班”。当时“泰和班”不仅聚集了河南地区的戏曲爱好者，它还吸引了柳州附近的戏曲爱好者参与活动。当时参加泰和班活动的名艺人有蔡老五、沈善文、韦建章、杨秀萍、蒋跃忠、覃国珍等。每逢年节，“泰和班”便搭台公演，附近群众纷纷出来观看，情景热闹异常。

泰和班，是著名文场民间艺人董秀峰先生创办的，他的艺名叫董泰和，生于1893年歿于1963年，终年70岁。他青年时期就喜爱桂剧，在谷埠下街（今红星旅店处）经营一间杂货店，店名“董泰和”这是后来群众叫他组创的戏班为泰和班的原因。董秀峰的店铺很宽，店后有一所约40平方米作为活动基地，并购置了全套戏曲乐器。他为人慷慨和善，喜交朋友，一到晚上，附近的戏曲爱好者都来练唱，共同磋商演唱技巧。这种演练方式当时称之为“座场”。另外还有很多青年特地来拜师学艺的，董秀峰就收为徒弟，日长月久之后就成为了闻名柳州的“泰和班”。班里的一切费用如乐器，服装，道具，参加演唱人员的菜饭，均由董秀峰先生个人负担。

解放后，董秀峰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1950年作为知名人士列席参加了柳州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1951年将原“泰和班”改成“春秋社”，不久更名为“柳州河南国乐研究社”。他们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运动，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经常在街头或是在黑板报前等场合演唱，得到政府和群众的称赞，为柳州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一定的贡献。

1963年董秀峰先生去世后，这个民间文艺团体也就消失了。

“泰和班”有不少有才华的戏曲艺人，如较著名的沈善文就是其中之一。沈善文先生本喜爱文场音乐，特别是文场曲调中的吹、弹、拉等技巧不仅精通，并具有独到之处。他右手打扬琴，左手打板，同时能口唱小调。他于1936年与当时盲艺人荀妹结婚。婚后潜心研究曲艺，他俩根据民间传统短剧“文运借茶”、“十不调”、“芙蓉泪”、“碧玉箫”、“相思恨”等曲目进行整理，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然后在群众中演唱，受到群众的好评。抗战胜利后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为了庆祝柳州光复，他编写了“洒金扇”短剧，在柳州河南戏院演出，演出后得到观众和文艺界人士的一致赞赏。

解放后，沈善文是董秀峰先生国乐研究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积极参加活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在南宁召开广西省第一、二届业余民间文艺会演大会，他是柳州代表队的主要成员，两次会演都为柳州载誉而归。一九六零年受聘于“广西艺术学院”文场教师。一九六三年逝世。

柳南辖区解放前后医疗卫生状况

伍齐信

（一）解放前的状况

解放前，柳南辖区有个体中医生五人，中药房十二家。其分布情况是：谷埠街有中医生周治平，魏展华，陈治国，曾寿松。文笔路有黄海波。中药房，谷埠街有万福堂，经理张金恒，开业时间一九一零年，从业六人。永安堂药房，经理姓周，开业时间不知，从业四人。博爱药房，经理陈子轩，开业于一九二五年，从业三人。万寿堂药房，经理黄有文，开业于一九四六年，从业二人。圆春堂药房，经理杨润，开业于一九四六年，从业二人。良芸药房，经理何其忠，开业于一九四八年，从业二人。大德药房，经理周治平，开业于一九四六年，零售兼医，从业二人。天生堂药房，经理陈治国，开业于一九四九年，零售兼医，从业三人。谷埠街西闸巷口有福寿堂药房，经理张昌，开业于一九二零年，从业二人。谷埠下街有国泰药店，经理吕赢洲，开业于一九四七年，从业二人。文笔路有诚济药房，经理杨跃生，开业于一九四九年，从业三人。万家春药房，经理黄海波，开业于一九四六年，零售兼医，从业三人。

以上十二家药房，数万福堂药房最好，经营品种齐全，货真价实，服务周到，信誉颇高。万福堂药房是在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零年）由广东封川县张金恒，张斗恒等三兄弟集资四百块光洋创办的。他们在谷埠街购置楼房一栋，先后聘用卢炯泉，张早昌，芦秀轩为掌柜。一九三二年在河南路（驾鹤路）设“万福堂支店”，药房与支店

共二十余人。一九三九年前，张氏三兄弟先后去世，张直伟、张直瞻、张泗荣、张萼荣、张乙荣叔伯兄弟聘请莫瑞麟为掌柜。一九三九年河南路遭火灾，支店付之一炬。一九四四年冬，日寇侵入，柳州沦陷，该药房损失惨重。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柳州光复后，由第三代张凤图等人再度筹资复业，直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历时四十六年。万福堂药房以零售配方为主兼营小额批发，一九四五年前后，经营中药材四百余种，经营中注重饮片质量，曾聘请技艺高超的钟秀堂，关吉初，伍瑞桐、张广元等老药工，他们所制药片识真，质量高，效果好。如加工麦冬去心开片，黄精、熟地做到九蒸十晒，淫羊藿去边等。为了方便顾客，他们自制有六味，八味十全大补丸，龟鹿补肾丸等丸散。还泡制蛤蚧，毛鸡，参茸药酒十多种。该药堂捡药配方，从不说“没有”二字。即使有时缺味，就从同行药铺购回，且不加价配售。柜面服务周到，需炒炭、冲碎、制丸和配方或单味购买，均予以方便，故信誉很高。

柳南辖区在解放前有医院二所。一所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从缅甸，贵阳等地出发，路过柳州时，他们在今华丰湾荒山土坡，临时建立一所战地医院。牌子上有一个红十字符号，上面写的“外科医院”四个大字。医院建筑，全部都是铁制临时活动房子，大大小小约二十余幢，每幢约四十余平方米。医生、护士中有外国人，但中国人占多数。男女工作人员都穿军装。住宿和工作，都在铁房子里。去看病的主要是军人，附近老百姓有去看病的，也能得到免费治疗。一九四七年“外科医院”随军队撤走了。

另有一所医院，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从都匀迁来柳州的铁路医院。医院最初设在柳州市老龙巷，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搬迁鹅山新村。同年十月更名为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医院。院址在今上游路柳铁科研所处。该医院有两幢平房，约1,500平方米，医院全部医护人员约100人，病床五十张。解放后，即改称衡阳铁路管理局柳州分局柳州铁路医院。

（二）解放后，中、西医发展情况

1、中医业的变迁

一九五一年经柳州市人民政府发给营业许可证的药房是：地址在谷埠路的，有良知药房，店主何其忠。万福堂药房，店主张凤图。天生堂药房，店主陈家济。回春药房，店主杨澜。和春堂药房，店主陈家琰。在文笔路的有万家春药房，店主黄海波。在飞鹅路的有万寿堂药房，店主黄有文。

一九五六年一月，柳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有关对私营工商业纳入公私合营的指示精神，经过政治思想发动，有五家私营药房实行了公私合营。它们是：万福堂药房，负责人张凤图，地址在谷埠街，从业六人。万寿堂药房，负责人黄有文，地址在谷埠街，从业二人。万生堂药房，负责人黄伯衡，地址在谷埠街，从业二人。万家春药店，负责人黄海波，地址在文笔路，从业二人。中兴堂药房，负责人张兴堂，地址在鹅山路菜市区，从业四人。万福堂药房，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改为四新医药门市部。中兴堂药房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并入鹅山综合管理商店。万家春药房，于一九五八年转市内医疗站。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活跃，辖区内医药业也发展很快。1986年调查辖区社会药店：如大鹅山菜市鹅山药店，已成为全民所有制，经营零售中西成药，从业十六人。延安西路柳州市民族药堂，是集体所有制，经营批零中成药，从业十七人。飞鹅路健宁药材购销部，经营批发代销，从业三人。南站路四海药房，集体性质，经营零售中西成药。飞鹅路中药厂综合经营部，集体性质，经营批零中成药，从业四人。文笔路麒麟药店，个体性质，零售中西成药，从业三人。延安西路双马中草药购销店，个体，购销原生中草药，从业三人。延安东路永安国药店，集体性质，零售中西成药，从业九人。延安西路南站药店，集体，经营零售中西成药，从业三人。

一九五三年一月，成立了公助私办的柳州市第二中医联合诊

所，所长曾寿松，他是小儿科有名的医生。他写有《曾寿松观方三十二》，书中记载了治疗小儿麻疹，疳积，结核性脑膜炎等验方，如用五色金石类独创的“曾寿松小儿疳积散”，治疗小儿疳积疗效颇佳。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六日第一、二中医联合诊所合并，成为柳州市中医院。以后谷埠路联合诊所改为第一门诊部。鹅山菜市属第六门诊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柳州市第二中医院，鹅山菜市第六门诊部属第二中医院领导，至1989年仍是集体所有制。

2、西医发展迅速。

解放后，政府为了保护职工家属的身体健康，从五十年代起，铁路、厂矿企业单位，一般都建立了卫生机构。有职工2,000人以上的有职工医院。100人以上的有卫生所或保健室。新建厂矿，在建厂的同时，就建立了卫生医疗机构。1989年底统计：有公办较大医院十个，防疫站三个，卫生所二十二个，保健室二十四，个体行医八十二人，共有病床966张，医疗卫生人员1,332人。

柳南区人民医院，属柳南区人民政府领导。为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是一小型综合性医院，创建于一九七九年冬，位于谷埠街72号。该院是由原来的柳南人民公社卫生所，南站人民公社卫生所，柳石人民公社卫生所合并而成。初时有职工二十七人，其中医师六人（西医三人，中医三人），医士二人，助产士二人，检验士一人，放射医士一人，护士五人，药剂士五人，中药士一人，会计员一人，院长一人。（区卫生科长兼），其他职工二人。1980年增置200毫安X线机一台。该院分设三个门诊部，地址在原来的南站，柳石，柳南卫生所原址。每个门诊部设所长一人，由医生兼任。门诊部均为综合性的，设有门诊室，注射室，外科室，药库，药房。柳南门诊部还有妇产科，检验室，放射线室，按摩针灸药治疗室。1986年全院日均门诊为70余人次。1989年又开办了美容院。同年该院有职工二十五人，其中全民职工八人，集体职工十七人。全院基建占地面积34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00平方米。医院设行政办公室，院长由区卫生科长兼，副院长一人。

柳铁中心医院，前身是湘桂黔铁路工程局柳州铁路医院，解放

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化的、综合性的大型医院。1960年元月该院全部迁入新址——飞鹅路利民区14号。1986年占地面积约6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196平方米。辖区铁路职工家属人口为八万一千余人，每日门诊平均为1,600~1,700人左右。全院医技人员845人，设病床529张。临床科室有：门诊部、内科（分三个病区，ICU病房，干部病房）。外科（分三个病区，麻醉组，手术室）。儿科（分二个病区，新生儿病房），妇产科（分产科，妇科病房，待产室，遗传性疾病研究室）。中医科，五官口腔科，传染科，结核病科。医技科室设放射科，检验科，药剂科，物理检查科（包括同位素检查，心电图，各种内窥镜及B超放疗等）。供应室，营养室，器械科，预防保健科（下设计划生育室及柳江、红桥、文化区、鹅山、柳南，直属苗圃、南站、东站、柳北等10个卫生所）。1963—1988年有教授级医生李光星院长等，多人在全国、省、市级医学杂志上，发表各种医学论文100余篇，获省、市级科研成果奖15人次。198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授予“文明医院”光荣称号。

辖区还有二空医院，卫生工作人员三十二人。十一冶建医院，有病床50张，卫生工作人员145人。水泥厂医院，有病床15张，卫生工作人员70人。微型汽车厂医院，病床50张，卫生工作人员74人。车辆厂医院，病床35张，卫生工作人员117人。柳铁工程医院，病床40张，卫生工作人员112人。二运医院，有卫生工作人员42人。工程机械厂医院，有病床30张，卫生工作人员62人。中国人民解放军158医院有病床150张，卫生工作人员400余人（已迁柳州市社湾路）。

辖区防疫站有三个。即柳南区人民政府防疫站，柳铁中心防疫站，车辆厂防疫站等。

柳南区人民政府防疫保健站创建于1983年。从成立站以来，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取得了一些成绩。1986年荣获市计划免疫六项达标奖。1987~1988年辖区地段均获计划免疫工作全面达标奖。对食品卫生检查，自1982年《食品卫生法》颁布以来，坚持每月一次

检查，1989年5月开始成立了卫生纠察队，经常进行食品卫生检查。

为了加强辖区妇幼保健工作，1988年完成地段13个居委会妇女围（医学专用词）产期防疫卡108张，二次防疫138人次，防疫率为91%，三次防疫率为82%，均达到了保健质量标准。还负责区属10所民办幼儿园313名幼儿的体检工作，对维新巷试关街37名散居儿童开展了系统保健工作，体检率达90.2%，获柳州市1988年妇幼保健工作二等奖。1989年柳州市卫生局对四城区站的全面工作考核结果，柳南区获柳州市1988年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柳铁中心防疫站创建于1953年，1957年迁入新址——柳州市火车南站北侧，建筑面积为550平方米。1981年又扩建一幢六层监测楼，总面积为2,460平方米。该站科室设置为七科二室一所。即车站卫生科、劳动卫生科、防疫科、检验科、环境监测科、食品科、学校卫生科，宣教资料和站办两室，一所是职业病防治所。

3、制药

辖区制药业，1958年在柳南区谷埠街99号和110号处开设有红旗制药厂，有膏、丹、丸、散和酞水两个车间，后搬迁。

柳州市民族中药总厂。前身是1971年6月创建的柳州市中药厂，厂址在柳南区红光路74号。1988年2月，柳州民族药厂与中药厂合并，成立了柳州民族中药总厂。有固定职工418人，占地面积151,457平方米，厂房面积为22,477平方米。生产中成药四十九种（其中片剂十二种、冲剂十四种、膏剂二种、糖浆剂七种、散剂一种、丸剂三种、酒剂四类、酞剂一种、西药五种）。其中获自治区优秀产品的成药有消肿止痛精，牛黄解毒片，罗汉果止咳冲剂。获市优秀产品的中成药有花红冲剂、板兰根冲剂、半夏冲剂、罗汉果止咳糖浆。这些产品主要销往云、贵、川等各地。

该厂1988年年产值为1,422.42万元，销售收入为1,508.32万元，税60.09万元，利润28.33万元。

1984年至1987年连续四年被评为柳州市先进单位。1986年被评为柳南区文明单位，1987年被评为柳州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4、个体行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柳南辖区个体行医增多，一方面是由于柳南区铁路，公路交通方便，来往人多。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离退休医务人员再就业增多。1989年10月统计：领有执照个体行医的共计八十二人。其中西医三十人（男13人，女17人）、中医三十一人（男28人，女3人）、牙科十三人（男9人，女4人）、草医三人（男2人，女1人）、眼科二人（女）、妇科一人（女）、从分布地段看：飞鹅路十一人、延安路十二人、谷埠路七人、柳邕路六人、革新路五人、城站路四人。永前路三人、上游路二人、红光路四人、鹅山路四人、鹅岗路五人、磨滩路三人、柳太路四人、柳石路三人、红阳路二人、南站路三人、文笔路二人、西环路二人。如住柳南区飞鹅路南一巷八十六号中医师李成贵，原是鱼峰区医院医生，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等甲级残废革命军人，一九八五年元月经组织批准，因年老体弱退职。同年元月办理个体行医执照，他是祖传中医，自学成才。在自建三层楼房约150平方米住房行医。1982年10月10日《柳州日报》报导：“李成贵采药送医为人民，不辞千般苦，精医除百害”。他专事中医内科，有30多年的经验，对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类风湿关节炎、腰椎肥大、不育症等有一定治疗造诣。他于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1978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市群模会。他是柳州市个体医协副理事长。

陆老二米粉

沙培铮 整理

陆荣廷换李宗仁，世界如今不太平。

连夜退兵韩彩凤，一翻一复沈鸿英。

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柳州民谣，由此便可想见那时的局势动乱和老百姓谋生艰难了。

那时有个后生在家乡钦州穷得没法，来到柳州打工，搭了一间茅寮在谷埠街西闸巷住，人称他陆老二。其实他叫陆耀南，因为是打工仔，就随便叫叫，大名尊号反无人知道了。

陆老二个子矮墩墩的，农家子弟大都孔武有力，因在柳州无亲无故，只好到谷埠码头抬木头。他为人老实，所以和人家抬木头总捡重的一头扛。木头又湿又重，到后来终于损了腰骨，再也不能干这活路了。他隔壁有个老者叫杨火寿，年青时开过粉店，见他生活无着，便把卖粉技术传授与他。

陆老二终于在谷埠下街刘文龙赌馆旁边，开设起粉店来，他人灵便，肯动心思，下的粉料足，粉又大碗，赢得了顾客的赞赏，吃过他的粉的顾客都说“抵食”。因此，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起来。

那时陆老二每天蒸八十来斤米的粉，因为生熟浆冲得好，米粉韧滑透亮。八十斤米粉要配上同样多的新鲜瓜菜和肉类。肉类中有猪肝粉肠、猪腰杂碎、黄喉宝盖过江龙等，都是上好肉料。他熬的汤水也不同别人，他到中药铺捡齐小茴、桂丁、罗汉果、陈皮、丁香、甘草等，根据君臣佐使配的，绝不多加少减。然后烘干、碾粉，用白布包了浸进锅里煮。大鼎锅里还有骨头、猪蹄、猪尾等等，所以他家的

汤水又胶又白，清香而不油腻。炖牛腩他加上八角、沙姜、桂丁，这样才不膻不带草味。他的叉烧、烧鸭也烧得好，不像一般的烧得半生不熟，再经过油锅便上市哄人。

陆老二米粉，名气越来越大，据说覃连芳也来他摊边蹲过。

解放后搞合作化，他进北方饮食店（工人电影院侧面），他放出功夫，使这家的小食也很出名。现在上了些年纪的人，每一提到陆老二的米粉，还要流口水咧！

壮族“老师”考

潘朝业

柳州市住着不少壮族人民。壮家的“老师”曾在壮族文化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壮族的巫师，壮家称为“老师”。由于他们在布道时，为了争取观众，常作化装表演，演唱古代故事。这种表演，实是戏剧。故有人称之为“师公戏”，由此延衍，也讹称这些巫师为“师公。”实则在壮家中，没有人称“师公”，只称“老师”。名从主人，“师公”之称，仍应改为“老师”，盖老者，长也、尊也。师者，可以助善教化也。古代壮族的巫师，实是知识之传授者，他们既是劝善之长老，又是治病的医师（巫医）。更是祭祀仪式、婚丧礼节的指导者。其处世地位，虽则依附宗教（鬼神迷信），而真正价值，实远远超过宗教范畴。

在“老师”的经典（法术书）中，基本上是道教符箓派与佛教密宗的混体。在法术上，除了用道家七十二符箓外，还用道家的《万法归宗》。在禁咒上，则用密宗的禁术（如禁人夫妻不和，禁死所恨的人。）禁术不轻易传世。《万法归宗》的嘉庆木版本我曾见过。其书大部分是咒语，一部分是魔术。咒语如“避雷”则曰：“奉请天都大华盖，盖我头，盖我身，盖我脚，八万雷兵寻不着。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此类咒语，实是自我吹牛，自我壮胆。但据说乃是信之则验，不信则不灵，这当然是唯心的观点。其他咒语造句不通之处甚多。若是学生作文而有此类句子，老师非打零分不可。魔术如“捕雀法”。大意是：将谷子酒浸，九浸九晒，撒于雀鸟常来之处，

待雀食谷而醉，乃手拾之，以显法术之高。此实是以酒精醉雀也。此亦唯心论者，每借科学方法以达所欲之一例。

病家有请，则先将道家占书搜寻，看是何日在何方得病，遇上何种邪鬼。然后即带法具，前往病家驱鬼。病轻者须用熟猪肉一方置碟中，病重者须具熟鸡一只，生公鸡一只，于是以盘或箕盛上供品，盘中盛生米一碗，上置银钱，钱上又放铜道印一方，向送鬼之方，斟酒三杯，焚香点烛插地上。“老师”即头缠红道中，手举法剑，向空一挥，剑柄铜环铛铛作响，“老师”蹲在供品后方，即作驱鬼法事。其法是先请神明，次报病人名姓籍贯，再次恐吓邪鬼。其请神则曰：“哈！好化好化，悠悠来降。奉请北山大帝，圣母婆王，某某大庙，某某将军，提督佩印杨文广，唱歌风流刘三妹……”现在看来，当然全是骗人之术，毫无科学可言之恶作剧！

其报病则如：“今有某县某乡其村某社某人，在某方遇到某鬼撩弄，卧床不起，饮食不旺……”

其施威逐鬼，则曰：“你不信我讲，剑斩颈！你不信我劝，刀砍足！今既酒肉相酬，冥钱相送，速离九天世界，速返海殿龙宫。”喃毕，扬剑锵然，焚纸钱相送。然后焚黄符于清水碗，将米碗中钱米道印倾入道袋，再将符水端至病人床前，取燃香三柱书空，念念有词，向病人喷符水三口，法事即算完毕。归时祭鬼诸物，主家早包好置于道袋。据云：此种鬼食之物，惟有“老师”可用，凡人则不可也，这当然又是“老师”骗食之技了！

以上所谈，皆是“老师”消极方面。至于劝善之事，戏剧艺术，则是影响甚广的。

凡逢丧事，除在灵堂作超度法事外，即化装男女角色，设坛演出二十四孝故事。劝人孝顺父母。

凡在祭神、游神、祈福之际，即设坛演唱古代故事。据我所见唱本，如《伏羲娶妹造人民》。说明洪水过后，人种的来源。又如《社王出生》。说明社王生时，尚为胎包所包，后借母牛肚子再生，又借老虎喂奶长大。再如《九官娶七妹妹》说明男女恋爱的不易。再如《北山

大帝入赘三位花林圣母》，更如《杨文广》，说出文广乱伦，寄托少数民族，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与蔑视，但唱本中，又渗进封建迷信色彩，迷惑人心。

二十四孝本是汉语的故事，但有的故事一到“老师”手上，却附上新内容。可举《董永不食母亲肉》为例。故事说：古时人食人肉，父母死后不理不葬，将其肉割下，亲友纷至，共同烹作美餐。及董永牧羊，看见羊羔跪乳，其声哀切，始悟人不如羊之情。故其母死后，不再忍心烹食。既葬之后，又怕他人挖坟偷肉，因在坟上庐墓三年。此剧总的主旨，即在忠孝者必得昌盛，忤逆者必致绝灭，以此劝人行善。

古本的唱词中，以七言二句为一首。叶腰韵。中隔锣鼓声过板。每坛在开场锣之后，先由主持大师开唱。其词曰：

坟（或坛）前锣鼓响振振（振音真，鼓声。）

獠（我们）唱古事斗（来）故寻（寻读jam音，故jam，玩戏也。）

哩（不）唱古事仿（鬼魂）哩爰，

苟瓜（瓜藤）哩亥（牵延）哩迷（有）喃（瓜实。）四句之后，入主题。然后由化装角色出场。如：

今晚就唱杨文广，

文广被困柳州城。

八姐千里来相救，

救出文广畜生人。

见到妹妹杨八姐，

面如花朵乳丰隆。

此后遂述文广拥抱八姐，抚弄其乳房，八姐羞惭过甚，乃投柳江而死。这一故事，固属对宋将杨文广给予最大的诬蔑，亦反映了少数民族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心态。

“老师”们的唱本，多将汉字借用，有时另造壮字。四十年前我曾大量搜集，惟历几度厄运，今已无存。不知民间尚有孑遗否？

（《鷓鴣室笔录》民俗类）

《柳州府志》府、州、马平县秩官补录

(唐、宋、元、明)

刘汉忠

乾隆《柳州府志》所记秩官缺略颇多，笔者注意及此，每有所见，必登录之。今先行将自唐至明柳州（府、州）及马平县各任职官汇录辑出，共补记《柳州府志》所遗各职官98任。清代部分，亦收集不少，惟尚需核对排比，有待来日。

唐代

周君谟 柳州刺史，约武后时在任。

《元和姓纂》卷五“昭州周氏”：“君谟，柳州刺史”。按，君谟乃唐初乐州刺史周孝谏孙，永州刺史周万才子。《旧唐书·地理志》昭州：“隋始安郡之平乐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乐州。贞观八年，改为昭州。”则知周孝谏为唐初人，其子周万才约为高宗时人，故系周君谟刺柳在武后时。

陈思应 柳州刺史，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任。

《嘉泰吴头志》卷十四“郡守题名”：“陈思应，天宝元年自柳州刺史授，不之任。”

郑某 柳州刺史，约代宗时在任。

《全唐文》卷四二四于邵《为柳州郑郎中谢上表》：“二纪蛮陬，三提郡印，惟贞苦节，以奉休辰。今者又即殊方，复临杂族。”

李某 柳州刺史，约贞元间任。

《全唐文》卷五零四权德舆《长安主簿李君（少安）墓志铭并序》：

“元和三年三月乙酉感疾不起于长安兴化里第，享年五十……先是君元兄柳州刺史捐馆舍，请君襄事，问关勤远，问一岁有嗒然之痛，丧服甫除，俄启手足。”

陈宪忠 柳州刺史，约元和中在任。

《全唐文》卷六四七元稹《赠陈宪忠衡州刺史制》：“敕故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柳州刺史陈宪忠，在德宗时，执羁勒以从，遂加戡难之名，在宪宗时，沐雨露之恩，实被念功之诏。朕敬承先志，崇奖旧勋，爰命有司，用申常典。”

崔某（崔侠？） 柳州刺史，约元和间任。

《全唐诗》卷三八九卢仝有《寄崔柳州》。嘉庆《广西通志》职官记柳州刺史有“崔侠”，年次无考。黄洛生《柳州识小》谓此“崔侠”即卢仝诗中之“崔柳州。”

吴从 柳州刺史，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在任。

《全唐文》卷七四九杜牧《吴从除蓬州贾师由除琼州萧潘除罗州刺史等制》：“前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从等，……可依前件。”

支讷 柳州刺史，咸通间任。

上海图书馆藏拓片《唐故西川少尹支公（讷）墓志铭并序》（乾符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遂历藤，富，贵、柳□郡。”乾符五年七月十三日卒。支讷咸通二年（公元861年）由藤州转富州，故系刺柳在咸通年间。

卢某 柳州刺史，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在任。

《全唐文》卷八九五罗隐《湘南应用集序》：“自己卯至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长沙郡，明年，隐得衡阳县主簿。时硤州卢侍御自龙城至。”按，己卯为大中十三年，庚寅为咸通十一年。

王某 柳州刺史，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在任。

《南楚新闻》：“王凝侍郎按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许人，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又见《太平广记》

卷二三八引。按，王凝咸通十三至十四年在潭州刺史任。

朱友宁 柳州刺史，昭宗时任。

《旧五代史》本传：“累官至检校司空，兼龚、柳二州刺史。太祖驻军岐下，遣友宁领所部冥先归梁苑，以守备御，及昭宗归长安，朝廷议迎驾功，友宁授岭南西道节度使。”

柳 绅 柳州刺史，任年待考。

《元和姓纂》卷七“河东解县柳氏”：“绅，柳州刺史。”柳绅乃卫州刺史柳谔曾孙，柳谔乃蕲州刺史柳州怀素之子，柳怀素任刺史约在贞观年间，柳绅溯至柳怀素计五代，柳绅刺柳年代难以推定。《元和姓纂》乃唐元和年间林宝撰，故柳绅刺柳以元和年间为下限。

[校按]

《柳州府志》录唐刺史“董岳”乃误收。据《新唐书·僖宗纪》，《资治通鉴》，董岳为郴州刺史。

《官柳人物史迹记略》据《朝野僉载》（《丛书集成》本）录段崇简为柳州刺史。今见《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朝野僉载》作“邠州刺史。”

[补遗]

陈 谏 柳州刺史，约贞元间任。（光绪）《湖南通志》卷一三四选举进士唐德宗朝：“陈谏，蓝山人，贞元间及第，翰林学士，柳州刺史。”

按，《府志》录刺史6任（其中误收1），今补入13任。

宋代

黄 弼 柳州知州，约仁宗朝任。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三四选举进士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张师德榜：“黄弼，宁远人，知柳州，有传。”同上卷一六三人物：“字直卿，……历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集贤校理，出知柳州，在官有政声。”

彭 介 柳州知州，约仁宋朝任。

同上卷一三四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蔡齐榜:湘阴人,知柳州,有传,案《一统志》作天禧进士。同上卷一六二:“历官柳州刺史,有廉声。”

裴子奇 马平县尉,元祐间任。

见于马鞍山摩崖周睿书题名。

万某 柳州司法参军,绍兴初任。

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十九启《回柳州万司法》。

萧楹 柳州巡辖,约宁宗朝任。

《湖南通志》卷一三四选举进士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陈亮榜:“萧楹,邵阳人,柳州巡辖。”

郑肃 柳州知州(代理),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在任。

民国《雒容县志》卷上金石“白象岩”三字题名:“嘉定内子六月既望转运判官方信孺书,修武郎权发遣柳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郑肃立。”

崔乾德 柳州知州,年次失考。

道光《广东通志》卷六三选举宋辟荐:“崔乾德,新会人,大理丞,知柳州。”

赵汝迂 柳州知州,约理宗朝任。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选举进士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庚辰刘渭榜:“乐清人,知柳州。”

周靖 柳州录事参军,约宣和间任。

光绪浙江《诸暨县志》卷二七列传:“周靖字天锡,其先南康人。幼通敏,好古,善属文章,举宣和进士,主中江簿,转柳州录事,遏于守帅,守法不阿,常预内铨。靖康之变以宗社大计关白大臣,欲上书阙下。当事阻之。知事不可为,弃官归。”

按:计补录宋代各职任官9任。

元代

马里 柳州路郡监,大同人,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在任。

鱼峰山至大元年戊申仲冬朔日马里军人题记。

梁国栋 柳州路总管，寿春人，至大元年在任。

出处同上。

郭伯颜 柳州路同知，至大元年在任。

出处同上。

马良 马平县尉，汴梁人，至大元年在任。

出处同上。

按：补出元代4任。

明代

牟伦 柳州知府，约永乐间任。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三四选举明举人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己卯科：“牟伦，永康人，柳州知府。”

黄彦斌 柳州知府，任年无考。

道光《广东通志》卷六四选举明制举：“黄彦斌：高要人。举人材，柳州知府。”

童世彦 柳州知府，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在任。

民国《象县志、金石》老孟村石额题名。

何振海 柳州知府（署），约嘉靖间任。

民国《柳城县志：流寓》：“何振海，江西吉水人，嘉靖进士，署柳州知府。”

邵旻 柳州知府，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任。

《国榷》卷二六英宗正统九年五月乙卯：“工部右侍郎邵旻降柳州知府。旻坐盗官物下狱，适值赦丧去，至是服阙。吏部以闻，特滴。”

陈舜道 柳州知府，约万历末任。

嘉庆《上海县志》选举进士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丁未科：“陈舜道，字见华，柳州知州。”按，当作“知府”。

陈梦庚 柳州知府，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任。

光绪《重修奉贤县志》卷十二人物志：“陈梦庚字台锡，萧塘人。自少能文，年弱冠举于乡，万历二年成进士。由刑部郎中出知湖州府，升福建运使，谪守柳州，晋松潘副使，再迁陕西少参，为人谦谨清约，笃于伦。”又据余立《复怀远县治记》题名知其知柳在万历二十年。

伦 文 柳州知府，约隆庆，万历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六九选举进士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广州府：“伦文，顺德人，柳州知府。”

麦 江 柳州知府，嘉靖间任。

同上举人广州府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戊子“麦江，番禺人，字公永，一字廉泉，柳州知府。又见《南海志》。”

涂 麟 柳州知府，约嘉靖间任。

同上举人广州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甲午：“涂麟，番禺人，字于藪，柳州知府。”

林维翰 柳州知府，约正德间任。

同上卷七二举人宏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甲子广州府：“林维翰，番禺人，柳州知府。”

严 霜 柳州知府，约宣德间任。

同上卷七十举人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癸卯高州府：“严霜，电白人，柳州知府。”

杨 鼎 柳州知府，约宣德间任。

民国湖南《慈利县志》人物科举表举人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癸卯科：“杨鼎，柳州知府。”

谭 钺 柳州知府，年次无考。

同上荐辟明：“谭钺，柳州知府。”

任良翰 柳州知府，隆庆间任。

乾隆《袁州府志》卷十七秩官同知：“任良翰，电白人，举人，隆庆元年任，升柳州知府。”

陆敷锡 柳州知府，约嘉靖间任。

民国《象县志》宦绩：陆敷锡，字德承，嘉善人，嘉靖中知柳州，

署象州事。

许子峻 柳州知府，约嘉靖间任。

明吴国伦有《送子峻使君赴柳州》诗云：“岭云随客度苍梧，直道无妨再剖符。象郡自开秦井邑，蛮荒总列汉舆图。一樽解缆无声剧，万里怀人海月孤。报国此身君独健，勿云迁谪是穷途。”“使君”乃汉代对刺史之称，汉以后为对州郡长官之称，此疑指“知府”，“子峻”为字，名无考。《府志》知府无许姓者，故录入。吴国伦，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进士。

按：《府志》录知府42任，今补出17任。

周绍台 柳州府同知，年次无考。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四八选举十六明贡生武陵县学：“周绍台，柳州同知。”

黄训 柳州府同知，约正统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十选举举人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潮州府：“黄训，海阳人，柳州同知。”

江永 柳州府同知，约正统间任。

同上卷七一连州府：“连州人，柳州同知。”

林瑛 柳州府同知，约代宗、英宗朝任。

同上卷七一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潮州府：“林瑛，潮阳人，兴国知州，柳州同知。瑛一作英。”

张元忠 柳州府同知，约嘉靖间任。

光绪《浦江县志》卷六仕籍明：“张元忠，柳州府同知。见科第。”科第：“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丙午科举人，应天中式。忠一作中。”

丁彦信 柳州府同知（存疑），约永乐间任。

民国浙江《新昌县志》卷十一人物明：“丁彦信，仕至武昌府同知。为诸生时即敏达异常，名其轩曰‘淡泊’以见志，……以才调柳州，督建王府，咸有成绩。性刚直不畏强御，以此九载不迁。”选举岁贡：“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丁彦信。”

伊伯熊 柳州府同知，嘉靖初任。

《袁永之集》卷十六《伊先生墓志铭》：伊伯熊字臣举，号虚室，江宁人，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举人，历知深州、祁州，皆有惠政，迁柳州同知。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卒，著有《易学讲义》。

林裕阳 柳州府同知，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在任。

民国《象县同》“金石”老孟村石额题名。

陈基虞 柳州府同知，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任。

余立《复怀远县治记》题名；“同知陈君基虞，同安人。”

马晋明 柳州府同知，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在任。

罗之鼎《明郡侯董公祠碑记》题名。

按，《府志》同知22任，今补出11任。

罗化 柳州府通判，年次失考。

同治湖北《宜昌府志》卷九选举：“夷陵贡生：罗化，柳州通判”。

陈佑 柳州府通判，约天顺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一选举举人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唐午琼州府：“陈佑，儋州所人，柳州通判。”

邝慈 柳州府通判，约成化间任。

同上卷七一选举举人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壬子肇庆府：“邝慈，原新会人，今隶开平，柳州通判。”

林津 柳州府通判，嘉靖末或隆庆间任。

同上卷七四选举举人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戊午广州府：“林津，番禺人，柳州通判。”

姚兼善 柳州府通判，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在任。

《国榷》明宣宗宣德二年十月乙丑：“起（柳州）通判姚兼善行在江西道监察御史。”

宋允殖 柳州府通判，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任。

余立《复怀远县治记》题名：“通判宋公允殖，宿州人。”按，《府志》通判16任，今补出7任。

段嵩 柳州府推官，年次无考。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四六选举十四贡生明益阳县学：“段嵩，柳州推官。”

袁 某 柳州府推官，年次无考。

明赵士谔《兰玉篇引》：“余君二守袁公筮仕柳州司理。”按，明代俗称推官为“司理”。赵士谔，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进士。

刘 正 柳州府推官，约隆庆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四选举举人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甲子科南雄州：“刘正，保昌人，柳州推官。”

吴孟侁 柳州府推官，约成化间任。

同上七二选举举人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戊子科琼州府：“定安人，柳州、庆远推官。”

周维新 柳州府推官，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任。

余立《复怀远县治记》题名：“推官周君维新，巴县人。”

洪 焕 柳州府推官，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在任。

罗之鼎《明郡侯董公祠碑记》题名。

按《府志》推官19任，今补出6任。

李 庶 柳州府教授，约嘉靖间任。

道光《直隶南雄州志》选举举人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李庶，柳州教授。”

陈万化 柳州府教授，约嘉靖间任。

同上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府学：“陈万化，都御史德文之孙，来宾知县，改柳州教授。”

李 翰 柳州府教授，约嘉靖间任。

同上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府学：“李翰，柳州教授。”

唐 仪 柳州府教授，约成化间任。

康熙《香山县志》卷六选举举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己卯：“唐仪，仁厚坊人，广西柳州教授。”

郑 贤 柳州府教授，约天顺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一选举举人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丙

子廉州府；“郑贤，灵山人，柳州教授。”

潘 谦 柳州府教授，约永乐间任。

同上卷七十举人湖州府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潘谦，海阳人，柳州教授。”

林 干 柳州府教授，约永乐间任。

同上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戊子科：“林干，海阳人，柳州教授。”

符 贞 柳州府教授，约弘治间任。

同上卷七二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癸卯科琼州府：“符贞，琼山人，柳州教授。”

吴 珍 柳州府教授，弘治间任。

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三选举举人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吴珍，字景儒，柳州教授。”

黎景宽 柳州府教授，约洪武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十选举举人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庚午南雄州：“黎景宽，定远人，今属崖州，岁贡，柳州教授。应天中式。）

黄 甲 柳州府教授，年次失考。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四七选举贡生，零陵县学：黄甲，柳州教授，有传。卷一六八人物，“字瀛洲，由贡生任常宁教谕，迁柳州教授，归，尝有乡人盗其羊，事觉叩门谢，甲慰遣之，且劝以自新，其人遂改行。”

廖观海 柳州府教授，约弘治间任。

民国《陆丰县志》选举举人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癸卯：“廖观海，广西柳州教授。”

王敦化 柳州府教授，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在任。

罗之鼎《明郡侯董公祠碑记》题名。

金 星 柳州府教授，约崇祯间任。

光绪《浦江县志》卷之六仕籍：“金星，柳州府教授。”《两浙輶轩录》：“金星字德甫，一字介庵。洪鹤元曰：介庵归老后，溯

长江，泛洞庭，走衡濑岭峤，足迹所及，不隘万里。楼上层曰：金星在前明时为柳州府教授，顺治辛卯从光禄金湘邻按粤西，值氛扰，湘邻殉节，左右各分散，介庵不避艰险，从戈戟中索得尸葬之，随归朝，表陈湘邻死难时始末，还家筑晚青堂以老。”

吴 谏 柳州府教授，约宣德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选举举人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癸卯：“吴谏，广西中式，海丰人，柳州教谕。”

按：府设教授，无“教谕”之职，（县设教谕）此当为柳州府教授。

张 佐 柳州府教授，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任。

嘉庆《广西通志》卷二十九：“张佐，莆田人，举人，嘉靖三十六年柳州教谕。”

伍昌旻 柳州府教授，年次失考。

民国《全县志》第五编选举明贡生：“柳州教谕。”

按，《府志》教授4任，今补出17任。

谢 辉 柳州府训导，约景泰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一选举举人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庚午科广州府：“谢辉，东莞人，字明甫，南海卫军生，柳州训导。”

黎秉诞 柳州府训导，约宣德间任。

同上卷七二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庚子科“宇宗冕，番禺人，柳州训导。”

谢 杰 柳州府训导，宣德间任。

同上卷七十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丙午科廉州府：“谢杰，合浦人，柳州府训导。”

经邦漠 柳州府训导，万历四十一年在任。

罗之鼎《明郡侯董公祠碑记》题名。

按，《府志》训导3任，今补出4任。

夏 宇 柳州府经历，约成化间任。

民国《高淳县志》卷十一选举明贡生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丁酉：“夏宇，柳州卫经历。”

朱夔 柳州府经历，年次失考。

光绪《诸暨县志》卷二四科第仕籍明：“朱夔，柳州卫经历。”

按，《府志》经历1任，今补出2任。

曾节 柳州府照磨，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在任。

《国榷》卷二十明宣德二年十月乙丑：“擢柳州照磨曾节为行在河南道监察御史。”

李善 柳州府照磨，约成化间任。

嘉靖广东韶州府《翁源县志》成化年贡：“李善，任广西柳州府照磨。”

汤鼎 柳州府照磨，年次失考。

乾隆《袁州府志》卷二二明选举贡生：“汤鼎，宜春县学，柳州府照磨。”

吴芳舒 柳州府照磨，约万历年任。

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七选举例仕万历年：“吴芳舒，柳州照磨。”

按，《府志》照磨1任，今补出4任。

张羽宸 柳州府大军仓大使，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任。

光绪《临桂县志》职官表：明典史：“张羽宸，字锦石，湖广常德卫吏员，崇祯九年任，十一年六月升柳州仓大使。”

按，《府志》1任，补出1任。

黄受 柳州府检校，约宣德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十选举举人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廉州府：“黄受，钦州人，柳州府检校。”

按，《柳州府志》未列此官职目。明代中央六部、都察院、地方布政司、按察司及各府皆置检校官。

尹祥 马平知县，永乐间任。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三八选举人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戊子科：“尹祥，来阳人，知马平县。”

黄刚 马平知县，年次失考。

同上卷一四六选举贡生明长沙县学：“黄刚，知马平县。”

关玉成 马平知县，约隆庆间任。

道光《广东通志》卷七四选举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辛酉广州府：“关玉成，南海人，字玉山，马平知县。”

劳守谦 马平知县，约隆庆间任。

同上肇庆府：“劳守谦，原新会人，今隶鹤山，广西马平知县。”

尹邦宁 马平知县，嘉靖间任。

同上卷七三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乙酉广州府：“东莞人，字元始，广西马平知县。”

按，《府志》知县30任，今补出5任。

[补遗]

宋和庆 柳州府通判，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在任。

《万历武功录》：“……而是时（万历十年）柳州守则陈大猷，（《柳州府志》已录）同知漆文昌，（《府志》已录）倅则宋和庆，……皆以功著。”

按，“倅”，地方佐贰副官之称，此指通判。如桑悦为柳州府通判，其《念奴娇》词云“龙城老倅”即是。

柳州史事拾零

铁 音

一：难得的地方文献——《柳州县文艺集》

桂林图书馆藏有一册手书的《柳州县文艺集》，是民国廿五年（公元1936年）广西省通志采辑员、柳州人朱心源抄辑的，书前有其一段说明：“所有各卷各艺文之批语概行从略不录。以节手续。如上各文艺词章有裨于我省文化，系由乡会试殊卷中寻取而辑成之”。从说明可知该集内的文章原均有批语，抄录时已从略。据统计，书中收集了自清乾隆四十三（公元1778年）年至宣统元（公元1909年）年的131年间柳州13位科举人物情况简介及他们撰写的应试诗12首、文37篇。对研究清乾隆中期至清末柳州科举、文化情况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是一份难得的地方文献。为让无机查阅该书的人得以了解其中的大体内容，现将书中抄辑的科举人物简介、应试的诗文题名综录如下、供对地方史志有兴趣者参考。

杨廷理：由府学优禀生于乾隆四十二（公元1777年）丁酉科贡应四十三年朝考，取一等第一名，引见，奉旨以知县试用。应试诗文题：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赋得游思竹素圆。得勤字，五言八韵。

杨立冠：由增广生中嘉庆十二（公元1807年）丁卯科本省乡试举人第六名，第二年钦取景山官学汉教习第四名，十四（公元1809年）年己巳恩科会试第121名进士。应试诗文题：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向焉夫子何为，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赋得秋光秀远山得秋字五言八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赋得一意同欲得同字五言八韵，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赋得雨敲松子落琴床，得琴字，五言八韵。

杨立旭：优贡生、民籍。道光二十九（公元1849年）年己酉科中式第18名举人，现任兴业县儒学教谕。应试诗文题：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舟车所至。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赋得千崖秋气高，得高字五言八韵。

胡慎猷：县学优廪生、军功即选训导、民籍。咸丰十一（公元1861年）年辛酉年补行己未、壬子两科中式第85名举人。应试诗文题：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赋得秦桂远分花得蟾字五言八韵。

吴吉谦：县学优廪生膳生、民籍。同治三（公元1864年）年甲子科并补行咸丰辛酉科中式第23名举人。应试诗文题：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赋得政简移风速得风字五言八韵。

王济中：府学廪贡生、马平县民籍，同治九（公元1870年）年庚午科中式第2名举人。应试诗文题：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而好察迩言。民事不可缓也。赋得学问至刍豨得豨字五言八韵。

崔雄飞：县附生，民籍。同治十二（公元1873年）年癸酉科中式第1名举人。应试诗文题：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无施于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赋得官府有青山得青字五言八韵。

邓启霖：府学廪生，马平县民籍。光绪十七（公元1891年）年辛卯科中式第14名举人。应试诗文题：子曰：事居敬其事，丙后其食。子曰：有教无类。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善教得民心。赋得千峰苍玉有谁诗得峰字五言八韵。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

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

刘起今：字古香、民国成立后以字行。生于前清同治己巳（公元1869年）十二月初二日，系广西柳州府学增生。马平县民籍。肄业于广东广雅书院。应考光绪廿七（1901）年辛丑补行庚子恩科广西乡试中式第26名举人。历任中学小学各校教员。马平县劝学所总董。于地方振兴文化推广教育不余遗力。嗣因清室内政腐败、外交不力，遂辞职走香港、上海、日本等处，奔走国事，以从事革命为唯一宗旨。辛亥之役，亦与同攻粤督署。反正后，胡都督汉民因古香为党内努力分子，故留掌都督府秘书处，同时柳州军政商学各界开大会公推古香为柳江军政分府总长。并公推朱奇元为全权代表赴粤欢迎古香回柳，维持军民大政，旋改为国民军第五军统领。任职两年，整军经武，赏罚严明。附民国廿五年五月三日邕报载：柳州起义，讨袁殉国，国府明令褒杨先烈刘古香及其妻媳抗节殉难一门义烈，南京二日电，国府今日命令先烈刘古香早岁追随总理，奔走革命，历在粤桂两省密谋举义，备尝艰险。辛亥光复广州，勋劳尤著。嗣以袁氏专政、树帜柳州兴兵声讨。不幸志事未偿，惨遭戕害。其妻马氏、媳杨氏同时抗节殉难。一门义烈，洵堪矜式。应予明令褒奖，以彰忠节，而示来兹。此令。应试诗文题：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以立未可与权。至于衡山过九江，策问。

莫锡鑫：县副贡生、民籍：光绪廿九（公元1903年）癸卯恩科中式第3名举人。应试诗文题：泰西法律有公法便法之别，其体例若何。或谓法国律最为精审，日本律尤与我相近，能条举其大纲否。方今改以刑律，试采取东西律之有关交涉者，以期无损主权策。东周七国五代十国形势异同论。物有本来事有终始义。

温日新：马平县民籍，蒙广西学政孙大宗师岁试录取府学一等第3名廪膳生。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己卯恩贡元。应试诗文题：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赋得采菊东篱下得东字五言八韵。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踰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

严恭：府学廪膳生、马平县民籍。光绪廿三年（公元1897年）

年丁酉中式广西选拔贡生。应试诗文题：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焉有君子而可以贷取乎。赋得移官又买载书船得官字五言八韵。

胡纯熙：府学附生、民籍。宣统元（公元1909年）年己酉科中式广西选拔贡生。应试诗文题：汉诏、问贤良文学民间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宏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论，晋之乘楚之棹机鲁之春秋义。

二：康有为三题“须钻课诵图”

王拯逝世的时候（公元1876年），康有为才18岁，尚是个在乡间默默无闻的青年，他不可能认识王拯，与王有过什么交往。待长，尤其是1894年冬（时康已46岁）来广西桂林讲学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王拯是个对广西文化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人，在桂林的知名度很高。开始对王拯的思想、学术有所推崇，并反映在诗文里。如他在一篇《池学使墓铭书后》中提到：“……当道咸时，粤西才士翩翩辈出，若吕月沧、朱伯韩、龙翰臣、郑小谷、王定甫（按：即王拯）诸先生、并以文章节行著于海内……”还在一篇《桂学答问序》中，对王拯主讲榕湖书院时保存那里的书籍表示赞赏。

王拯少时贫寒，依姐过日，姐氏常促其苦读，日后王拯为官京师，深感其姐的教养之情，请人画了一幅“须钻课诵图”。此图当时不少名人如曾国藩、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等均有题咏。王拯逝世后，此图由其后人王浚中（字颖初）珍藏。王浚中曾在康有为来桂林讲学时入其门下为弟子，深受康的厚爱，认为他“志清而气直”。一日，与从弟补园携该图请康题咏，康欣然命笔，题道：“风节文章独秀才，通家孔李服丰裁。岂知诵读孤童日，却自秋钻须女来。梧桐秋影月光寒，砧响书声共夜阑。我亦秭归资诵读，遗经泪湿不堪看。”未几，浚中病逝，图归补园。十余年后，补园重晤康有为，再次展图请览，康观后，感慨丛生，又题二言于其上。一为：“此图足见王定甫大理之姐弟孝友行义。其书画题辞皆一时名士，备极妙选。可传于后也。

王氏子子孙孙宜世世珍护之。丙辰冬至日南海康有为题。”二为：“颖初弟为定甫先生哲嗣。清才寡欲，高淡简远。戊戌吾败后，庚子勤王，颖初来共患难，不幸短命，失此哲人忽忽十八年，其从弟补园出此图相示，览此悲感。丙辰冬至康更生。”

康有为前后三题“须钻课诵图”，表现了他对王拯为人的赞许和对其后人的关心，也是柳州近代文坛的一则轶事。

[补白]

红庙码头

红庙码头位于柳南区红庙村，解放前这个码头作为谷埠的辅助码头。为上游融水，三江、宜山一带运下来的柴炭、水果、蔬菜、鸡、鸭和砖瓦等物资起岸。柳州解放后，一度为蔬菜公司管理。一九五八年市里为在五里卡建设一个炼焦厂，特投资10万元对码头进行修建，后因杨柳煤质量差，不能炼焦，转交给市航运局作辅助码头。现在主要是用作从火车、汽车运来的宜山、罗城等地产煤供应柳江上游各地。

码头的建设有两条作业线。一条是流槽。一条是皮带机，吞吐量每年15万吨。

（刘锡香）

柳州国民党反动派

企图破坏民盟的地下活动

抗战胜利后，柳州地下党组织活动非常活跃，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因此非常害怕，他们千方百计地想阻止其活动。当时，国民党柳江县党部于1945年11月14日，按照国民党广西执行委员会意旨，发了个“代电”（组字第46号）给所属区党部，内容是：查中国民主同盟最近大肆活动，亟应予以防制，兹规定各级党部应：一）选派忠实干练之同志打入该同盟秘密活动；二）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扩大其

内部矛盾；三）调查其活动情形，随时具报，签发这“代电”的是当时柳江县党部的书记长冯培仁。

当然，反动派的阴谋，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订订)

广西制造的第一架飞机

民国22年(1933年)1月起,航空管理处所属机械厂,开始仿制“亚维安”教练机,同年6月广西第一架飞机在该厂试制成功。经试航,升降徐疾均极灵敏,性能不逊于舶来品,获当局奖金毫币500元。下半年又仿制出5架“亚维安”飞机。民国23年1月,进一步仿制出“吉的”中级教练机一架。

(容志裕)

第一架滑翔机

民国22年(1933年)6月,广西航空管理局机械厂造出第一架优于国外同类型的滑翔机。此机重176磅,国外同类机则重200~250磅。

(容志裕)

第一次组织机群飞出外省

1933年9月19日，粤桂在广州联合举行航空纪念活动，航空处长林伟成亲率飞机18架，于18日飞粤，下午安全抵达广州，次日即参加纪念活动，24日下午安全飞返柳州。

(容志裕)

广西第一架双翼单座战斗机

民国26年(1937年)夏，第一架经过改良，性能先进的轻型战斗机，在广西航空管理处机械厂研制成功。经专家在地面和空中鉴定，结论为：性能和安全系数，以及燃料消耗，均优于同类型进口飞机。

(容志裕)

第一颗炸弹试制成功

民国22年(1933年)冬，广西航空管理局机械厂试制成功第一颗炸弹，规格为20和50磅。次年进一步造出150磅的炸弹。

(容志裕)

鹅山藏银洞

清时有沈氏者，自州城晚归西郊，步至鹅山山麓，有白驹飞奔入洞，疑而尾之以寻。洞狭且浅，一无所见，意愈疑，以杖四撞，偶陷小穴，火而视，则白银万也。明急乘夜驾牛车载取，遂为百万富室，时人皆称之“沈百万”。及衰，闻其居遗迹犹存。后人又改所居旧地曰“白饭村”。百万、白饭、谐音也。

藏银洞在何处？有待考焉。

（潘朝业）

柳州首次防空演习

1934年7月9日4时至21时，驻柳第四集团军第七军航空管理处，组织和动员了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四个步兵团和特务、工兵、高炮等三个独立营、一个飞机教导队、十二个特业分队、一个军训大队以及柳州城厢各机关团体、学校、店铺、居民等共三万余人，联合举行中国首次大规模防空演习。以卓识之创举，当即引起全国注意。随之沪、京、穗等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相继仿效，举行了防空演习。

当时，鉴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航空兵器之出现，战争将由单纯地面作战变成立体的战争，战线将由前方延伸至后方。为应付这一战略的变化，保卫后方人民生命财产，必须及早做好一切准备，包括检阅陆、空两军对空的防卫能力，向民众灌输防空知识，加强心理训练等。从未来战争特点出发，柳州举行了这次大规模的防空演习，对后来的抗日战争是有一定效果的。如1938年1月10日，日机九架首

次侵入柳州，我空军当即升空迎击，击落日机二架。在整个抗日期间，日寇出动飞机 63 批，718 架次，对柳州进行狂轰滥炸，共投弹 2,300 余枚，炸毁房屋 4,500 余间、炸死军民 672 人，炸伤 654 人。如无备而后患，损失更加不堪设想。

此次防空演习，第七军长廖磊任演习统监，第七军参谋长郭凤岗、第十五军参谋长兰腾蛟、第四集团军航空管理处处长林伟成，副处长冯璜等任防空指导员。下设防空演习委员会和防空警备司令部。由侦察队（四架飞机），警备队（三架飞机），战斗队（九架飞机）和地面分队（包括高射炮，高射机枪，探照灯，听音器，防空监视，通讯，掩避，警卫等队组成。）并出动假设敌机（亚维安，阿扶劳各三架），制造模拟炸弹（包括燃烧弹毒气弹等）。于七月九日四时演习统监发出第一号指令开始进入临战状态，至 21 时，防空警备司令部发出第二次停止演习信号，历时 17 小时，演习结束。

（容志裕）

柳南文史

第四辑

南站人民公社的历史回顾

姜新和

原柳州市南站人民公社于1979年9月22日撤销，与柳南公社和柳石公社合并成立柳南区人民政府，从而结束了公社的历史使命。我是柳州市南站人民公社最后一任的党委书记兼主任，为了用历史事实教育启发后代，现将南站人民公社往事和担任过领导的同志及工作人员的情况回忆整理如下：

一、历史渊源及归属

南站名称的由来是因修建了柳州火车站而得名的。1939年12月，湘桂铁路衡阳至柳州段建成通车到柳江北岸，即柳州北站。1940年12月柳江南岸建成柳州站。柳江上建成了半永久式铁路桥与北站连接通车，故称南岸车站为南站。横亘南站前的马路称为南站路。

南站位于柳州市八景之一的鹅山脚下。竹鹅溪以西的居民区属南站人民公社的管辖范围。南站人民公社的办公地点，由于柳州火车站及车站广场的不断扩建和市政建设的需要，几经搬迁于1972年才落脚在南站路一区183号。

1949年11月25日柳州市解放后，河南片于1950年1月成立屏山区，同年7月改为柳州市第一区人民政府。1951年5月撤销第一区人民政府，成立柳州市人民政府工作大队。河南片设立第三、四中队。1952年南站成立了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主要管辖该地区的居民，归第四中队领导。后来，柳州市人民政府撤销了工作大队，1952年12月河南片成立第二区人民政府，南站居委会归第二区人民政府领导。

1955年11月柳州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及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撤销第二区人民政府，河南片设六个街道办事处，作为柳州市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归人民委员会街政科直接领导。南站地区成立南站办事处，办事处第一副主任是宋兰庭，副主任是武忠信。南站办事处成立后，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在铁路家属区成立了居委会。这时南站街道办事处就有了南站一、南站二、南站三、南站四、南站五、南站六、南站七、南站路居民委员会，共八个居委会。南站一、南站路两个居委会管辖的是居民区，其他的是铁路家属居住区。家属区原来均设有家属委员会，其领导成员既是家委领导又是居委会领导，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由于铁路家属不断增加，住房区面积不断扩大，1962年铁路家属区又成立了南站八、南站九、南站十、南站十一四个居委会。南站路在“文革”期间曾改称为红旗路，南站路居委改称为红旗路居委会，直到70年代初期，红旗路才改回原来的称谓。南站路居委会改称为南站十二居委会。这样南站公社管辖区内的十二个居民委员会一直延续到合并成立柳南区人民政府。

1957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紧接着城市也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9月南站办事处成立了南站人民公社。此时鱼峰区公所成立，南站人民公社归鱼峰公所领导。1960年5月柳州市人民政府在河南片分别成立了鱼峰区人民公社和鹅山人民公社，各办事处改称为分社，铁路地区的家属区则分片成立管理区。南站分社划归鹅山人民公社管辖。在公社化期间欧阳非、代文英、成淑芝等同志曾担任过领导。1960年5月，鱼峰区公所委派卢广焕担任南站分社主任。1961年12月市委撤销鱼峰人民公社和鹅山人民公社，恢复鱼峰区公所和郊区公所的职能。与此同时恢复南站办事处的称谓，仍归鱼峰区公所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南站办事处曾易名为红旗办事处。1968年9月鱼峰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红旗办事处亦同时成立了“柳州市鱼峰区红旗办事处革命委员会”。1972年2月城中、鱼峰区合并，成立城区革命委员会。同年8月5日中共柳州市委作出《关于改变城区各街道办事处体制的决定》，将各街道办事处改称为人民

公社革命委员会，并恢复原称谓。红旗街道办事处改称为“南站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延续至1979年9月合并区时止。在此期间先后担任南站公社(办事处)的领导有：1964年9月黄伯华调任办事处书记，后任公社党委书记兼主任。1976年5月姜新和调任公社党委副书记，9月任公社党委书记兼主任。担任过党委副书记的有黎燕青、梁继福、李毅，担任过副主任的有秦新亭、鞠健、成淑芝。

二、组织机构

南站人民公社(办事处)成立初期人员较少，除正副主任外设民政干事，妇女干事和青年干事。六十年代增设宣传干事、会计、出纳。到七十年代改称公社后，设立政工组(办公室)，组长黎燕青，后谭佩玉任副主任，蒙凤生任主任。生产组组长冯耀斌，办事组(街政组)副组长韦钰。群团组织设团总支和妇委会。团总支下辖5个团支部，张柏余、刘英宽、梁继福、蒙凤生、明世德先后任过团总支书记。谭佩玉、陈惠卿、李群辉先后任过妇委会主任。公社机关总人数29人(国家干部13人，事业干部16人)。居委会一般设有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爱国卫生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街道积极分子担任。各居委会根据生产发展和工作需要设脱产人员1~3人。

三、生产发展概况

街道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史。南站人民公社(办事处)生产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时期。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波及到小业主和个体手工业者。通过教育和动员将分散在各居民点的个体手工业者，按照不同行业组织起来成立各种不同类型的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如打铁的成立铁工社，车缝的成立车缝社等，这部分则由市手工业联社(二轻局)管理；另一部分则是归口管理，如理发的归市服务公司管理，饮食的则归口饮食服务公司管理，马车队则归交通局管理。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参与管理，有的发展成为大集体企业或国营企

业，这对于促进柳州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办事处则成立劳动调配站和劳动联队，居委会则成立劳动中队。负责安排无业居民劳动就业，开展生产自救，以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街道生产发展起了飞跃变化。南站人民公社（办事处）在“文革”前就在磨滩中办起了一个红旗拖拉机配件厂，这个厂到七十年代初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集体企业，厂房面积由几十个平方米发展到四千多平方米，职工人数发展到300余人，1975年划归城区街道工业局管理。“文化大革命”后街道陆续办起了一批工业生产厂组，在这个基础上南站公社又办起一批工厂：1970年成立综合五金厂，该厂1977年与柳州市红旗玻璃仪器厂（1974年办的，书记伍雪满，厂长李明月），合并成立柳州市综合机械厂，主要加工柳州拖拉机厂扩散的部分配件，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拖拉机配件加工厂。到1979年底产值达120余万元，职工人数186人，书记庞良芳，厂长陈之宪。1974年和1975年先后由综合服务社、反帝五金厂与机电五金厂合并成立柳州市红旗机电五金厂，该厂主要为柳拖加工差速器，生产发生器及外加工铸件、电机修理等。到1979年底产值达46万元，职工104人，厂长兼书记张桂钦。1974年在南站十二居委会五金小组的基础上成立柳州市机械修配厂，主要生产保险柜及五金加工修理等，书记郎凤英，厂长何文奎。1975年在城区和公社的领导以及市外贸部门的支持下，街道十八名妇女自带材料盖起了草棚，办起了柳州市畜产品加工厂。该厂主要加工猪肠衣、猪棕、猪小肚、牛羊皮等产品，交外贸部门出口。到1979年12月底年产值达32万元，职工发展到145人。各居委会则办起了各种厂、组、店计42个，业务涉及到各个行业。其中商业方面计有：糖烟、蔬菜、肉食、面条加工等；工业方面计有：耐火材料、五金加工、机械修理铸造、竹器加工、化工、塑料等；服务行业方面：有废品回收，印刷装订，建筑维修，钟表单车修理、车缝、饮食、木模木器加工等。同时将个体行医人员组织起来成立南站卫生所，解决居民治病难的问题。在这个阶段，街道生产发展比较快。到合并区的1979年9月，南站公社的产值达到

286万6千余元，利润15万余元。从业人数计2,000余人。这对于加速柳州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增砖添瓦的作用，同时解决了居民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由于生产的发展，还为公社和居委会积累了资金，解决了部分干部的工资福利和办公经费。

四、落实政策

“文革”期间办事处及居委会普遍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做了大量的“处遗”工作，对于非正常死亡的二人按政策作了妥善处理。对二起冤假错案给予平反，对下放农村的八户人家办理了回城手续，对下乡锻炼的104名知识青年抽回城市安排了工作，对受冲击的干部群众，做了说服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积极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柳州市红旗机电五金厂发展史

柳 生

柳州市红旗机电五金厂是1968年红旗（南站）办事处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成立的民办工厂。当时有些劳动队员根据个人技术专长，自由结合组织起修理服务组或加工组对外营业。1974年，为了加速街道工业生产的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办事处在原有小规模生产小组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走工厂化集体化的发展道路，将红旗机电五金厂，红旗综合服务社部分人员以及红旗反帝五金厂三个厂（社）合并，组建了柳州市机电五金厂。

红旗机电五金厂是1970年12月19日，由两个打铁组，一个机电修理组合并成立，工厂内部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张桂钦，副组长韦有谋。厂址在河西小学对面，是约500平方米的油毛毡棚架厂房。该厂业务主要是外协加工各种罐、桶、翻砂铸件、打码钉、机电修理等，工厂还能生产乙炔发生器。

红旗综合服务社是1970年初由街道竹器组、卫生队等27个生产经营小组联合组织起来的。领导成员是庞良芳任指导员（书记），何琴莺任社长。办公地点在小鹅山菜市。1974年5月综合服务社解散，各生产经营小组划归街道居委会管理。办公室部分人员调入机电五金厂，这时机电五金厂领导成员作了调整。由张桂钦任指导员（书记）兼厂长，何琴莺、韦有谋任副厂长。

红旗反帝五金厂是1970年夏由居民中的锻工、钳工、白铁工、五金修理工联合组织起来的五金组，工具作价集中使用，由居委会领

导梁坤来担任。1971年9月上级领导委派胡永南到该厂任指导员（书记）兼厂长。厂址设在现鹅山菜市区57号，厂房是用毛竹、油毛毡等材料，由工人自己动手盖起来的，约170余平方米。厂部设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分管政工、外协、会计、出纳、保管等。职工人数30人，实行等级工资制。该厂的主导产品是乙炔发生器，主要销往四川的自贡、内江、绵阳、溢陵等地，其次是生产保险柜和外协五金加工。1975年该厂花了一千二百元在工农路10号购买了六亩土地。工人上山砍松树，自己动手盖起了约40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的车间一间。根据生产发展需要，该厂于1975年7月与红旗机电五金厂合并成立柳州市机电五金厂。由张桂钦担任书记兼厂长，副厂长由何琴莺担任。柳州市机电五金厂成立后，经过生产实践，土生土长了一批技术工人及技术骨干。工厂生产发展较快，曾参加过柳州市组织的柳化、柳拖发展工程大会战。工厂在办事处很少投资，银行也不贷款的情况下，走自我发展的道路，厂领导发动工人，在工农路10号又盖起了约500平方米的车间一间，并盖起办公室，整个厂迁至新厂址投入生产。生产设备除原有的618车床2台，刨床1台，钻床1台，电焊机2台外，柳拖当时扩散给该厂的设备有车床6台，钻床1台，简易绞床1台，多用钻床5台，十字镗床2台。该厂除了发展原有产品及外协加工外，主要为柳拖加工零配件差速器等产品。到1979年底，该厂职工人数达104人，产值46万2仟2佰元，利润3万4仟6佰元。八十年代后该厂先后转产，厂名更改为柳州市印铁制罐厂和柳州市南光金属材料厂。

柳州市综合机械厂史略

江 海

柳州市综合机械厂是1969年11月，由姚兴利、杨海琛等人筹建组成的。参加厂的个人带生产工具进厂作价后集体使用。办事处借了二仟元给厂买了一台电焊机。初成立时称为红旗综合五金厂，厂里成立了五人革命领导小组，由居委会主任杨玉珍任组长。1970年12月陈之宪任副组长，1974年上级领导委派庞良芳到该厂任指导员（书记），厂址设在南站路。该厂成立初期主要以外协加工为主。随着生产积累的增加，先后购进了冲床2台，皮带车床2台，钻床1台，马达2台。1972年以后又增购618车床4台，620车床1台，刨床1台，台钻3台，摇臂钻1台。这时，除了外协加工外，工厂已着手生产煤炉、白铁桶和保险柜等产品。1972年开始，为柳州拖拉机厂加工消声器配件，每年能生产一万余件。另外，还加工生产拖拉机拉杆10多种。随着柳州拖拉机厂产品的扩散，1976年和1977年先后在西环路柳拖厂隔壁盖起了车间4间及办公室一间，约2,100平方米，并与柳州市玻璃仪器厂合并，更名为柳州市综合机械厂，厂址由南站路迁往新址。当时柳州拖拉机厂扩散了30多台套设备给该厂，成为以加工拖拉机配件为主的生产厂家。除了加工原有产品外，还为柳拖加工拖拉机前桥系统。到1979年底，该厂职工人数达186人，产值120万元，利润6万5千元。1992年该厂与铁木制品厂合并，成立柳州市铁木制品总厂。

柳州市机械修配厂简史

江 礼

柳州市机械修配厂是由三个五金组合并组建起来的。1969年底红旗（南站）办事处，以红旗路居委会冷作组为基础成立了由办事处领导的红旗五金组，组员共11人，组长李学礼。该组靠两把锤子起家，走自我发展的道路，利用生产积累先后购置了五十吨冲床一台，牛头刨床一台，车床一台，电焊机及点焊机各一台，以生产保险柜为主导产品，同时开展外协加工。1974年下半年与红旗路莫德绍五金组4人，南十一居委会五金组10人，合并成立柳州市机械修配厂。郎凤英任指导员（书记），何文奎任厂长。职工实行等级工资制。厂址设在南站路。为了扩大生产，工厂在小鹅山盖了500平方米的厂房。该厂产品仍以生产保险柜为主导产品，同时还生产顶针、翻砂铍锅铸件及外协加工。保险柜年产量达到1,400台，远销新疆、甘肃、黑龙江、山西以及云贵川等地。到1979年底该厂产值达25万3千5百元，利润2万5千元。1977年更名为柳州市冷作制品厂。1982年更名为柳州市铁木制品厂，1992年与柳州市综合机械厂合并成立柳州市铁木制品总厂。

红旗玻璃仪器厂始末

周顺刚

1973年3月，柳州市城区南站公社管辖的红旗居委会（后改为南站第十二居委会）拟建一个玻璃仪器厂。经南站公社同意后，王志英（南站公社生产组干部）、郎凤英（红旗居委会主任）和李明月（红旗居委会居民）3人于同年4月到湖南祁阳县九二〇仪器厂联系聘请师傅等事宜。双方协商决定，红旗居委会预付伍佰元钱给九二〇仪器厂，九二〇仪器厂给四盏煤油灯和三百公斤玻璃管，并委派两位师傅到红旗玻璃仪器厂帮助建厂和进行技术指导。

1974年3月，总投资800元的柳州市红旗玻璃仪器厂正式成立，地址在红旗居委会后面（不久迁至小鹅山地母庙旁）。职工共7人（管理员1人，师傅2人，工人4人，财务由居委会代管）。主要设备有四盏煤油灯、四个皮老虎（起鼓风助燃作用）和5张桌子。当时，调节煤油灯火势用的灯头耐火砖很缺乏。厂里就用板车到柳钢去拉回人家丢弃的废耐火砖，经过改制而成。工厂主要产品有安瓿、试管，后又生产了金鱼缸和糖缸。经过几个月试生产，已有12人投入到生产安瓿、试管中去。为加快生产发展，同年12月，工厂归南站公社管理，厂址由小鹅山搬迁回红旗居委会后面。同时，调伍雪满（女）任指导员，负责工厂全面工作，李明月主管生产。工厂内部健全了供销、财务和保管机构。

1975年3月，工厂招进20名学徒工。1975年10月，为生产精密玻璃仪器，工厂选送了三名工人到江苏浏河玻璃厂培训学习。同时，工厂购置了四台刻度机。至1976年底，工厂已生产了各式滴管、滴

定管、吸管、容量瓶、称量瓶、安瓿、试管和标准球共 11 个品种 50 多个规格的产品。

注射器生产是广西医疗器械生产的一项空白。为开发生产注射器，工厂于 1976 年 11 月第二次选送了 4 人到湖南岳阳玻璃厂学习生产注射器的技术。工厂处在设备比较简陋的情况下，试制出了 5 毫升医用玻璃注射器，并形成了小批量生产。此时，工厂职工发展到了 45 人。

红旗玻璃仪器厂在发展过程中，曾先后两次共贷款 3.6 万元，增购设备，使生产得以发展，产品质量有了可靠保障，生产产值和效益都不错。由于工厂所生产的原材料——玻璃管，都是从区外购进，而且购进材料受人限制。更重要的是原来经销玻璃仪器厂产品的柳州医药站不再继续经销该厂产品，致使工厂发展受到约束。此时恰逢柳州市红旗综合五金厂承接了柳州拖拉机厂的拖拉机配件生产业务，需增加力量。所以，南站公社研究决定，1978 年 3 月 8 日，把红旗玻璃仪器厂合并到红旗综合五金厂去。合并后的厂改名为柳州市综合机械厂，厂址迁至河西变电站对面。

一个草棚工厂的兴起

谭丽君

柳州市畜产加工厂是在南站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在柳州市外贸局和柳州市食品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街道集体工厂。工厂虽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却为国家出口创汇作了贡献。

南站公社领导派赵学英和陈金莲等同志为畜产加工厂的领导。1975年元月8日，厂里派军属彭菊兰同志带领7人去市食品公司学习加工猪肠衣的生产技术。这一天，是工厂建立的日子。当时工厂一无场地、二无厂房、三无设备、四无资金，怎么办？只有发动大家从自己家里拿来席子、竹子和油毛毡，自己动手盖起了一间20平方米的毡棚作厂房。这厂房夏天太阳晒，冬天北风吹，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厂房内遍地是水和烂泥浆。工人每天干得又脏又累，每月工资才18元。可从没有哪个叫过一声苦。大家从早到晚劲头十足。由于公社领导的关心和重视，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加上该厂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工厂盖起了一栋三百平方米的新车间——肠衣车间。1975年底，厂里完成产值8万5千元。因生产发展，工厂由原来的单一肠衣加工到猪小肚和猪七寸三种产品加工。1976年5月，为了扩大再生产，又派七个同志到食品公司冷冻厂学习加工牛羊皮技术。加工技术学会后，厂领导发动全体职工自己动手盖厂房，经过大家的日夜奋战，到6月30日，搭盖好300平方米的牛羊皮车间，7月5日正式投产加工。工厂从一种产品发展到四种产品，从一个车间发展到两个车间，工人增加到54人。到1976年底产值达23万2千元。工厂被评为柳州市和自治区的先进单位。1977

年，该厂决定开发猪鬃产品，组织人员赴桂林学习。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把鬃毛加工技术基本学到手。同时，厂领导到湖北省黄陂县请来老师傅指导，使畜产品加工厂厂房从一个车间增加到四个车间，场地11亩，产品由一种产品增加到七种产品，产值从8万元增加到52万元，工人增加到124人。为了响应政府的“增产节约”的号召，该厂将猪鬃加工剩下来的废料加工成毛刷，既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又增加了厂里的收入。此后，工厂还增加了干肠衣产品。

畜产加工厂在南站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在兄弟单位的支持帮助下，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有一班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有一支过得硬的工人队伍，不欠内债，不欠外债。银行里有十几万元积累的大集体企业。到1979年底止，产值增加到32万元，有职工共145人，建设起相当规模厂房，还被评为“文明”工厂。

红旗拖拉机配件厂创业史

黄淑群

红旗拖拉机配件厂是1966年2月由南站街道办事处筹建的。当时办事处派退休工人、共产党员孙金荣同志担任厂长。以鹅山菜市区一个四人五金小组为主体，加上退休工人，劳动队员（铁路家属）等共十人参加筹建，我是其中一人。厂址设在磨滩路的一个荒坡上。

创办初期，条件比较艰苦，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资金，四无工资。但是，我们在孙金荣厂长带领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家挑灯夜战，挖土方平整地面，担石头运材料，在荒坡上盖起了第一栋冷作车间。我们边盖房子，边试制产品。我们从家里拿来锤子、锯子、凳子。孙金荣厂长把自己家里的新板车拿来作运输工具。我们厂承接的37型拖拉机配件有：左右挡泥板，工具箱，前后电瓶架，左右撑杆臂，排气管接头等。生产挡泥板没有工模夹具，我们在赵宏业师傅的带领下自己动手制造，经过大家的努力，1966年6月，第一套挡泥板终于试制成功了，工艺达到厂方的要求。当年就生产了50套。1967年至1970年每月生产100套，1971年每月增加到150套，1972年至1973年每月又增加到350套。工具箱，前后电瓶架，左右撑杆臂，排气管接头等按任务进行了生产。1974年，工厂还增加生产油罐、榨糖设备、龙门吊、汽车水箱和单车包链壳等。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员也不断增加，1966年底就增加到43人，到1975年增加到307人。为了加强对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南站街道办事处先后委派办事处党支部副书记成淑芝，办事处主任卢广焕等同志到该厂担任领导，同时建立了科室4个，加强了生产的领导和经营

管理。

在办厂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艰苦创业的精神，领导干部和工人心连心，同甘共苦。大家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开会研究工作。孙金荣厂长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1975年5月在临终前一天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在经济开支上，我们从不乱花一分钱。需要购买的东西，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才确定下来，使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生产上。由于生产不断地发展，资金不断积累，至1975年，我们用工厂积累先后盖起了冷作一、冷作二、金工一、金工二和综合车间等六个大车间，同时还盖了一个电工班室和一栋办公楼，建筑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由于工厂生产发展较快，经济效益好，使工厂有了积累，1975年7月，工厂划归城区街道工业局管理。

一所草棚小学的变迁

姜新和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口不断增长，群众迫切需要文化知识，儿童需要入学读书。解放初期，国家要办的事情很多，百业待兴。为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政府不可能投入更多的经费来办学。南站地处柳州铁路局所在地，地域较宽。除铁路职工外，菜农、居民夹杂在其中。当时铁路小学没有招收地方学生的任务。市办的飞鹅小学招收的学生名额很有限。居住在南站的不少儿童还读不了书，这是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57年秋，柳州城区各人民公社办起了十所民办小学。南站办事处成立人民公社后，根据中央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南站路，现南站粮店对面的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的草棚里（这个草棚以前是马棚，公社化后用来办公社街道食堂）办起了南站小学。桌凳是用木板条钉的木板架。当年就招收了学生76名，办起了两个班，上课实行二部制。由谭佩琪和韦玉群老师各包一个班的课程。1958年春，公社委派王静芳首任南站小学校长，当年秋季又招收一个班，前后共三个班，学生增至116人，教师由2人增至4人。因教室不够用，小学由南站路迁至鹅山菜市区现煤场隔壁的巷子里。这里是两间小木屋，白天给小孩上课，夜间作为成年人夜校。1960年学生增至236人，共设六个班。这时学校迁至鹅岗区，用公社停办的陶器厂厂房三小间，二大间作教室，桌凳用板条钉成，老师这时有了办公室。1961年春，由于市教育局和鱼峰区的重视和关怀，拨了专款就地盖起了四间砖瓦房的教室，增添了40套高年级用的桌凳，这时学校才像个样子。高年级实行全日制，

中低年级实行半日制。1967年学校改名为光明小学。1986年在市教育局领导的关怀下，南站小学由民办转为公办，更名为上游路小学。1989年由教育局拨款盖起了约1,500平方米的四层教学楼，为培养更多的人才创造了条件。

民办小学的创办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除校舍外就是师资问题。当时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生交的学费，初小每人收4元5角，高小每人收5元。这些经费除了用来购置一些学生体育用品、学生奖品和卫生用具等外，就是用来开支教师的工资。开始每人每月只有20元左右。1962年，鱼峰区公所设专人管理民办学校经费后，才按教师的学历调整了工资，初中毕业教师25元，高中毕业教师35元，校长定为40元5角。教师每月可报销3元医药费，放假期间老师工资停发，此外再没有其他福利待遇。由于学校贯彻了勤俭办学的方针，所收学费基本够开支。当时学校条件差，工资待遇低，教学任务繁重，学生住得分散，不便管理。因此，多数教师不太安心工作，从开办学校到1964年先后调进调出教师30余人。唯有群众喻为“开荒牛”的校长王静芳始终为培养下一代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静芳校长受到冲击。1966年9月至1985年由赵先旗老师任校长，1985年下半年改任党支部书记。1985年下半年以后李海云、吴淑华，陈和珍老师先后任副校长。

民办小学始终遵循国家颁发的教学大纲进行授课。一至四年级设语文、数学为主科，图画、音乐、体育、周会、手工为副科；五、六年级设语文、数学为主科，图画、音乐、体育、周会、自然、地理、珠算、劳动为副科。所设课程都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才。市教育局对教师也极为关怀，组织教师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教学大纲，通过到公办小学听课等多种途径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从1980年起先后有5名教师考入柳师中师班学习，并取得了中师文凭。由于师资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打下良好基础。据统计，到1990年，在该校毕业的学生达800多人，升学

率达到95%以上，这些毕业生通过初、高中阶段学习，考上大专以上的有十八人，考上中专的也有十余人，有的学有所长，担任了领导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南站小学 1957 年 ~ 1966 年师生情况一览表

年份	班次	招生班数	学生人数	共有班数	在校生数	教师数	备注
1957	初一、二	2	76	2	76	2	
1958	初三	1	40	3	116	4	
1959	初四	1	40	4	156	5	
1960	初五、六	2	80	6	236	7	
1961	初七	1	40	7	276	8	
1962	初八	1	40	8	316	10	
1963	初九	1	40	9	356	10	
1964	初十、十一	2	80	11	436	13	
1965	初十二	1	45	12	476	13	
1966 秋				12	476	13	

柳南区街道史话

刘锡香 彭 澎

自汉代柳州设县，及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筑柳州城墙，远在城墙之外，一片荒野，真像柳宗元诗中写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清时，仅有黄泥岬（今云头岭一带）和何家村两处为农民居住的两个小村庄，五里卡、红庙、鹅山一带尚属一都管辖。

清朝中期，商品经济发展，柳州城相应繁荣，街道逐步发展到城外。谷埠因地濒柳江，附近各乡所产谷物，多在此集散，形成一个交易旺盛的农贸市场。后来谷埠日益繁荣，人口增多，以谷埠为中心，周围又形成一些街道。东有东一巷、东二巷，西有西闸巷、大同巷、维新巷、接云街（黄泥岬段）。

民国十三年（1924年），伍廷颺在柳州着手地方建设，在柳南辖区内开辟了柳邕路。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湘桂、黔桂铁路，先后通达柳州之后，在今火车东站设车站，叫“城站”。为使客商进入市区，开辟了文笔路。随之云头岭住户增多，形成一条街道谓之云岭街。铁路局又在今柳州火车站开设火车南站。车站两侧自然发展成为南站街。随着交通发展，开筑了飞鹅路。

抗日战争时期，北方国土沦陷，城镇人口不断南流，柳州成为大西南后方之交通枢纽，外来商贾云集，促进柳州经济的繁荣。柳南辖区也相应得到发展，大小街道多至十一条，总面积约一平方公里。

柳州解放后，特别是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柳州成为新工业城市。1956年后各部门陆续来柳南辖区设厂办点。在此之前，柳

州铁路局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铁路附近也先后建立起来，柳南城区迅速扩大，辖区内新的街道不断出现。现全区有75条街（巷、里），总面积已达22.7平方公里，为解放前的二十三倍。

今就柳南辖区内具有特色的几条街道简介如下：

制作棺材出名的大同巷

旧时，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可知柳州的棺材早就扬名千里。

旧时柳州专制做棺材的有两条街颇为有名：一是河北寿板街（今长寿路），二是河南的谷埠街。到了1921年以后，棺材铺从谷埠街逐渐迁移到大同巷内。

大同巷原叫黄泥岬，位于柳南区东部，东起谷埠上街，西至文笔路，南接维新巷，北出柳州电机总厂至飞鹅路，全长260米宽7米。巷内还有三个里，即一里、二里和三里。民国十一年（1922年）与接云街合并改为大同巷至今。巷内专门做棺材的店铺共有十四家，每家店前铺后有一个工棚为做棺材的作坊，当时做棺材的作坊为巷内的主要行业。其中产销量较多，工艺亦较好的，要数双发祥、董海泉和刘顺利三家。他们做的棺材不仅销售到邻近县份，还远销广州、港澳和东南亚等地。大同巷棺材业所做棺材的规格，一般是内腔七尺长，一尺五寸至二尺甚至二尺以上宽。整副棺材长约八尺许。型号分大、中、小三种；档次分高、中、低三等。高档的棺材均用优质木材制作，如楠木、红黑油杉、榿木等，制作工艺非常考究。一般是将宽二尺以上原木一分为二做棺材两侧墙或上下底盖。棺材的两头用巧妙的手工艺把它镶嵌成梅花瓣形，以显示死者生前傲霜斗雪，玉洁冰清的一生。棺材头大尾小，其弧度设计也非常大方美观。两头的封口方板上精工雕刻龙、凤纹饰，或是双龙戏珠，或是鲤鱼跳龙门，或是福寿双全等纹饰或文字，然后油上朱漆，敷上金粉，并将全副棺材外面漆上乌黑的国漆，棺材内油成朱红或其顾主所需色彩，有的还油上上好的松脂以防水浸。中档的其工艺大致相同，惟木质较差；低档的则是一般木

材，工艺则不那么精细，棺材两头的加工略翘，封口的方板，则是用红漆写上“福”或“寿”二字。品种有平头式和凸形式两种。销售时由顾主选择。每副棺材售价为当时的大米约一千至三千斤价格。高档货都是顾主事先预定并说明规格及其要求等，其价钱则以所需材料和做工的精细情况论价。

旧社会有钱的人家，家中有老人的都是事先做好棺材停放家中叫防老，从而宽慰老人之心，故民间旧俗把它叫“寿坊”、“老房子”等。这些有钱人家的后代如在父母死前未做有“寿坊”的，其父母死后也总要想办法买一副上等棺材以报答其养育之恩，免遭世人的非议。一般人家实在无钱，也得买一副四块的“火板”料理老人丧事。

柳州解放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实行殡葬改革，民间推行了火葬，政府并相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使火葬得以普遍推广。故此，棺材业已转向海外营业。如今外面来柳客商也有在柳定购棺材运至港、台销售的，这业务由市工艺美术厂承揽。另外美术厂为了满足港台客人升官发财的心愿，模仿棺材式样，生产出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柳州小棺材”，博得客人的欢心赞誉。因“棺材”与“官财”同音，买一个精巧玲珑的小工艺品放在家中做小摆设，客人见了道声“有官有财”，也会获得个好兆头。

过去在大同巷经营棺材的店家，工商业改造时期，归口转到木器厂。1981年，谷埠上街辟为农贸市场，大同巷近谷埠路一段成为蔬菜、肉类交易场所，如今的大同巷，已没有做棺材的作坊了。

打铁、制碑的谷埠东一巷

谷埠路东一巷，位于谷埠路南端，东起鱼峰路，西至谷埠上街。东一巷旧称打铁巷。1966年改为四新路东一巷，1975年改称今名。

东一巷是伴随谷埠路的发展而形成的。1857年湖南团练来柳进剿李文茂，事平后，留下了一些人。其中一些会打铁，打石碑的人，便在此地搭棚盖屋开业，靠为人打铁，打石碑为生。谷埠路日益繁荣起来，对铁器、石碑等需求量增多，这行业也就跟着发展，竟有十几

家在此开了作坊。这行业打开了门面之后，为争手工艺市场，纷纷挂牌营业。挂牌开店的有方利、周时利、成记、达利、万利、肖本利、黄新利、雷湘利、李汝南、彭官清、黄新古、李志刚等十多家，他们能打造家用菜刀、柴刀、斧头、锅铲、火钳、铁锤和农具等，故人们把这条巷叫做打铁巷。据说民国十年（1921年）后，为了开拓生意，有些便搬到附近的拉堡圩、双桥圩（今柳江县进德乡）和成团圩去开店经营了。

打石碑的，在今工人电影院后面一带，大部分是湖南人，后来也有本地人。最早开业的是唐兴发。那时因此地宽阔，随处可堆放石料，且附近多石山，取材亦方便，故在此开业的店家日益增多。石碑产品分单块，两件头（一块碑和一块碑脚），三件头（即碑身、碑脚、加上碑顶上的装饰盖），四件头（在三件头的基础上，碑身两旁还附加两条装饰条石，把碑装后好像框架一洋，也有用它刻上对联的）等四种。其规格以碑石的大小尺寸来分，并以此论价。旧时老人去世后，后辈人都为老人立碑，以尽孝道。达官贵人则表彰其身世之显赫，以此炫耀家门。

1956年政府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均按行业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打铁的初时组织生产组，收购废钢铁打造家具和农具，后因原材料缺乏则为工厂加工零部件。如螺丝，螺丝帽等，以后打铁工人多为工厂吸收当工人。

打石碑的，则改行打石磨。政府推行火葬后，石碑业不像解放前那样兴隆了，有些石匠只好参加到建筑行业为石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搞活经济，政府允许自由经营，近年来打铁的已恢复了两家，打石碑的也有五家开业。

云头岭今昔

云头岭位于柳南区东南部，属红阳路居民委员会管辖，称云岭区。旧时这一带多丘陵，云头岭因地势高而称云头岭，也曾有人称“人头岭”，因人与云谐音，实为讹传。旧时这些地方为荒野之地。云头岭

东南为牛仔岩、银子山群峰。清初已有人居住，民国初年形成一个小村，住的都是贫苦居民。常言道：靠山吃山，近水打鱼。居住这里的人，有的砍柴割草卖，有的开荒种地。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有人发现沙子岭（今柳州航空站大门一带）产白泥（铝凡土），便拿回家做灶。后来，由宾阳迁来的陈同合、卢信合等人懂得制陶器的手艺，便用沙子岭的白泥原料制陶器开起家庭作坊来。他们起初只能做些盆钵和做烧柴用的大炉。有了师傅带头做，一些居民也跟着学这门手艺，云头岭便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制陶行业了。为了方便，后来自然地分成制陶和制火炉的两个专业。抗日时期柳州成为西南大后方的繁荣城市，人口增多，对陶制品的需求量增多。制陶业更兴旺起来，产品除供本地消费外，还外销至附近各县。

在云头岭开业制陶的有：陈同合、吉祥、顺昌、南记、宗恒、陈振兴、黎树荣、陆信、杨并德、吉昌等十一家，从业人员达七十余人。他们生产水缸、盆钵、茶罐、药罐、腐乳罐、酒罈、茶罈、醋罈等十多个产品。其中以陈同合、吉祥两家工艺较好，产销量亦较大。

制火炉的有：卢信合、薛保球、郑守森、昌景美、昌文谦、覃世忠、马万英、黎春、杨达连、杨光松、杨英德、杨建民等十二家。生产品种有炭炉和柴炉两种，其规格分大、中、小三种。制作工艺精良，烧制好的炉子，外面用细的铁线结网护住，一来美观，二来保护炉子能经久耐用。烧柴的炉子在柴门加上一个活动的灶门塞，可作烧柴烧炭两用，很受顾客的欢迎。柳州开始烧煤时，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他们又制作煤炉、炉胆，其中以卢信合的手艺较好，产销量较大。

柳州解放后，工商业作合作化时期，制陶业组成陶器生产组，后发展为陶器合作社。1958年工商业改造时改为社会福利陶器厂，后来划归市二轻局领导，不久与市陶瓷厂合并，成为柳州市美陶厂的前身。

如今云头岭的制陶业已不复存在了，它现在成为柳南区主要集市贸易市场之一。

十里长街——柳邕路

柳邕路位于柳南区南部,东起柳石路,西至柳江县界。全长8公里,路面宽50米,采用快、慢车分道之三板形式构造,是通往自治区首府南宁的主要交通干线,亦为广西公路南北交通之要道。随着市区经济不断发展,公路衔接市区一段,逐渐热闹起来。如今商店厂房林立,企事业单位逐年增多,真可谓是在辖区内的一条十里长街了。

民国初年,柳邕路是杂草丛生,蛇鼠乱窜的荒野。虽有蜿蜒小道从拉堡通向柳州,但道路难行,土匪经常在这一带抢劫过路行人,故来往农民和商贩,总要拉帮结队才敢行走。当时有民谣唱道:“家中缺油盐头痛,雨天变泥人头痛,晴日尘满身头痛,行路怕抢劫头痛”。故民间将这条路呼之为“头痛路”。柳邕路东二巷里有个地方叫“老虎冲”的山沟,民间传说这里是老虎出没的地方,可见旧时的柳邕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了。

1926年,伍廷飏在柳州着手建设柳州,始建柳邕公路。公路面宽6米,1931年称柳庆路,1938年改为柳邕路。1946年改东段为鱼峰路,1949年改为贤良路,1950年复名,1966年改为红鹰二路,1975年复今名。

民国三十年(1941年)柳州飞机场进行扩建,柳邕路亦进行改建,从今航空站门口改道往五里卡。当时只有沙子岭、五里卡两个地方有人居住。

抗日战争时期,柳州飞机场为军事重地,军事机关进驻机场,柳邕路成为交通要道。当时日机常窜犯柳州进行狂妄滥炸,老龙岩牛仔岩等山洞为天然的防空洞,一有警报,附近市民都到山洞躲避。于是,为方便躲避日机轰炸,柳邕路口至沙子岭一带,居民房屋迅速增多起来,随之小商小贩也都云集此间,盖起住房开起商店来。达官贵人则看中老龙岩、牛仔岩等山洞是躲避日机轰炸的安全避难所,便在这一带大兴土木构造安乐窝。如:今汽车总站处,曾有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吴耀建的一栋别墅;红阳路旁靠六中处,曾有国民党军长韦云淞

建的一栋别墅；今公路总段对面，曾是国民党时期的柳州警察局长王景宜建立别墅的地方。国民党官僚李开新在今狮子山脚周围占据大片土地（包括今柳邕一小）建了花园别墅，取名“金之园”；国民党军的团长郭雍章曾在今柳邕路口圈围大片土地建了洋楼。此外，在这一带建官邸还有朱逸安（广西物资供应局局长），刘启忠（夏威夷的秘书长）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湘桂铁路材料供应站在五里卡附近建立材料仓库；民国三十年（1941年）北京香山慈小迁至今柳邕路一小处建校上课；同年，缅甸归侨数十人家于沙子岭兴建住房住下来，附近居民称之为华侨村。1944年柳州疏散时才搬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有美孚洋行石油公司在今南二巷处建一石油仓库，因其商标为“飞马”，人们称之为飞马仓。

柳州光复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屏山镇中心校迁到云头岭（今市六中处）建校，柳邕路近市内一段路已渐渐形成一条热闹的道路了。

柳州解放后，街道建设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1953年柳邕路面整平，扩宽为8米。1953年后，企事业单位先后在近市区内的路段纷纷建立，一些散居的居民房被征用，居民逐渐移住到附近山脚，将凹地、冲沟填平，组成了现在的柳邕路东一、二、三、四巷的居民区。柳邕路上的企事业单位有汽车总站、公路总段、国防工办及招待所（一〇四招待所），市二轻局一、二仓库。1956年后，柳州工业迅速发展，市造纸厂、刀片厂、玻璃厂、耐火材料厂、地区机电厂、地区排灌站、粮食局榨油厂、冷柜厂等在柳邕公路沿线一带兴建起来。

1982年，柳州地区在高岭兴建柳州地区高中、地区师范学校、地区民族干校、技术学校，还建有高岭电影院。这一带成为新的文化区。

1986年市人民政府对柳邕路进行改建，共投资2,180万元，首先改造从航空站门口至高岭一段，全长7,300米，路宽为50米，采用快、慢车分道之三板式道路结构。路面为沥青，混凝土。

1992年，从柳石路口至公路总段一侧路面进行扩建，扩建后的

一侧为水泥路面。柳邕一小至柳州航空站门口一侧，因民房多暂未动工。

腾飞的飞鹅路

谈到飞鹅路，民间流传一个美丽的传说——鹅山的故事。今之大小鹅山，原系天上王母娘娘养的一群白天鹅中的两只，美猴王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时，有两只天鹅受惊离开了鹅群，飞出了南天门落到人间。这两只天鹅来到人间，被风景如画，水清如澈，鱼虾成群的柳江迷住了，人间自由自在的美好生活使她俩再也不愿返回天宫，变成两个善良美丽的姑娘，认了一个村上老妈妈做娘亲。两姊妹勤耕勤织，过着美好的生活。不久，终被王母娘娘发觉了，决心要惩罚她们。一天，顿时天昏地暗，刹时电闪雷鸣，这两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在痛苦的翻滚中现出两个天鹅面目后化成了两座山（现在的大，小鹅山），永留人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人们从车渡码头开辟一条直至柳州火车站的大路，因正对鹅山，便称为飞鹅路，这是人们对善良美丽的天鹅寄托良好的愿望。

昔日的飞鹅路地段，是一片荒郊野岭，华丰湾茅草高过人。今柳南派出所附近有一冲沟把路截断，人们用了几根木条搭便桥通行。今电机总厂、探矿厂一带是座土岭，只有红庙、鹅岗一带有人居住，今柳南区政府驻地附近均是冲沟和水塘。

抗日时期，湘桂、黔桂铁路建成通车，1941年设立柳江火车南站（今柳州火车站），当时为方便旅客来往曾修整过路面，供铁路的交通车和马车行驶。后来路的两旁陆续有人盖房居住，这些人大多数是来柳谋生的贫苦人民。

柳州光复（1945年）后，外地人来此落户者日众。此时，车渡码头一带开始有小杂货店，理发店，木器家私店。最多的要数木板铺，共有二十余家之多，故人们将它称为木行街。

柳州解放后，飞鹅路终有能飞起之日。1956年柳州市人民政府

对飞鹅路进行修建，1959年又进行整修、拓宽，1963年兴建了通往柳州火车站的新的飞鹅桥。1966年再次进行彻底翻修、加宽。路面分车行道和人行道。现在全路长2,052米，宽40米，是柳州火车站通向市中心之干道，也是整个河南片东西方向交通主干道。

1951年于华丰湾建立河南水厂，1952年于中段建立市十七小（今飞鹅路一小），1954年市粮食局在今五四四六五部队驻地旁填平水塘建立大米厂。

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柳州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各企业纷纷到柳南辖区选择新厂址。1958年有柳州电机厂，探矿机械厂，首先到飞鹅路建厂，同年柳州铁路局于老飞鹅桥地段建成“柳铁工人文化宫”，成为全市较大的综合性文娱乐场所。柳州市服务公司于市十七小学旁建起“和平旅社”（今延安旅社）是飞鹅路的第一家旅社。

1959年，柳州铁路局在延安旅社对面建成一栋约200米长的四层楼的职工宿舍，因占地长，人称为长楼。至此整个飞鹅路的面貌大为改观。

1979年柳南区人民政府建立，党政机关驻华丰湾。区党委和区政府认真贯彻在经济上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柳州电机总厂、探矿厂破墙开店，市一职高开办飞鹅宾馆，柳州汽运公司于1991年新落成“柳州汽车南站”大厦。如今的飞鹅路，街道宽广、笔直，路两旁绿树成荫，商店林立，飞鹅路与飞鹅二路交界处高两丈有余的双马腾飞塑像高高地矗立着，使飞鹅路显得更为生气勃勃了。

柳州航空站史话

江功绪

一、人民解放军接管柳州机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柳州，龙城宣告解放。

广西解放后，华中军区司令部航空办事处（1950年2月改“中南军区航空处”）派周交臣同志带领三十余人的航空接管组，从湖南芷江接管航空机场，后来到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进行航空接管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先后派了十三人到柳州了解情况，十二月六日夜間，航空接管组正式进驻柳州。

原柳州的旧航空部门一共有四个单位。其中有国民党空军（即第四军司令部、273供应中队、404通信大队）、民运航空队、中国及中央两家航空公司。此外，尚有国民党交通部柳州气象站。除两航公司和气象站人员完整、设备保存完好外，国民党空军和民运航空队都已于十一月逃往台湾。除留下一些笨重器材以及油料外，贵重和轻便的设备都已运走。民运航空队只留下家具，其余的亦都全部运走。

航空接管组入柳后，其机构编为办公室、机械、油料等三个组。首先是将国民党空军留下来的物资以及航空器材进行集中清理和造册登记。十二月十四日开始接管中国、中央两航公司，至二十二日顺利地完成了两航公司的接管和各种物资的清点工作。接管四个航空部门的物资主要有：通信电台4座、航空发动机5部、车辆5台、修理器材和五金器材一共400余吨，各种油料3,115.5桶、旧房产34栋。

在接管和清点物资的同时，于十二月十三日，开始对航空部门人员进行造册登记，至十二月三十日共登记各类人员 219 人。根据上级“技术人员年轻的吸收、培养、教育，非技术人员和年老的遣散”的原则，航空接管组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录取了 95 名工作人员。但是，只有 74 人在一月八日至十日来站报到。随后，由于旧航空部门人员迫切要求参加工作，因此，根据军管会“不准遣散（原则上个别例外）”的通知精神，又陆续录取报到的有 33 人，累计录用共 107 人。其中，空军人员 70 人，两航公司 32 人，气象站 5 人。

柳州机场接管后，对被录用的人员，除两航公司人员不动和一部分同志留广西工作外，其余 19 名同志调往汉口学习。接管后的油料、电台和气象器材全留柳州。车辆调往南宁、桂林各一台，其它器材一部分留在广西，尚有一部分运往广州、汉口等地。对遣散的 84 名人员（含员工 47 人，眷属 37 人）都按其路程和规定标准发给路费（大米）使之顺利返回家乡。

通过航空接管组全体同志的努力以及在原机场人员的配合，到一九五〇年元月底，圆满地完成了对柳州航空部门的接管。

二、航空站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空军成立。一九五〇年春，根据空军参谋会议精神以及毛泽东主席“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题词，为巩固国防和加速人民空军建设，一九五〇年四月，“广西军区航空省站”在柳州机场正式成立。省站下设南宁和桂林两个分站。

航空省站首任领导主要由站长周交臣、政治委员郭永昌、参谋长张以诚、政治处主任何煌初等同志组成。

一九五一年四月，为了加强省站工作，上级决定重点建设柳州，因而撤销了南宁、桂林两个分站。并将分站下属的两个气象台移交给当地政府暂管，其他分站人员全部充实省站（柳州）机构。

航空省站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机场扩建前期的准备工作以及

旧营房和水电设备的修缮。从一九五〇年五月开始动工，并新建了三栋二层楼房，为航空兵部队进驻，创造了条件。此外，为了协助地方工作，还配合地方政府参加了剿匪工作，省站曾派出二个建制连队和部分政工人员参加了柳州市郊的剿匪反霸斗争。一九五一年，省站党委根据空军发展的需要，以及针对省站人员大多来自陆军之特点，下大力抓了干部的培训，挑选了一批骨干，分别到预总和航校学习，为迎接飞行部队进驻柳州，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一九五二年五月，奉中南军区空军命令，省站进行了整编，将“广西军区航空省站”改编为“中南空军柳州基地场站”。建站四十二年来，几经沿革和整编，尽管空军柳州机场番号及代号屡次变更，但“航空站”之称呼仍被龙城市民沿用至今。

三、建国后重修柳州机场

机场是供飞机起飞、着陆、停放和组织保障飞行活动的场所。它是空军航空兵赖以生存的基地。全国解放后，空军接管了旧中国遗留下的几百个机场。空军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和次年八月两次向中央军委和政务院提出有关机场的修复报告，中央军委和政务院批转了空军的报告。为适应空军发展需要，柳州旧机场亦被列入修复工程之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主席曾批示：“各地修机场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因此，机场修建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又要节省国家开支，必须组织专门的修建力量。为此，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军委从各军区抽调工兵连给空军。同年十一月，空军组成了五个工程大队，成为空军最早组建的修建部队。根据当时情况，空军主要负责技术要求，派人指导，必要时进行现场检查。当地党、政、军共同组成修建委员会负责组织施工。

在广西省及柳州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柳州机场修建工程，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在南宁成立了柳州机场工程修建委员会，由广西省各有关机关领导组成。柳州市成立了工地委员会，由柳州市各有关机

关领导组成。还在柳州机场成立了工程处（含材料和管理两科，以及第一、第二工区），具体负责组织修建实施工作。参加柳州机场修建任务的有：部队的两个支队、柳州市劳动生产委员会、柳州市建筑公司、柳州电厂，另外，还有汉口、桂林以及柳州的技工、普工，衡阳铁路局等单位也参加了施工作业。

一九五二年二到三月，初步完成了对场面工程的测量，并绘制了平面图，随后，又进行了加测及设计工作。五月十九日，中南空军后勤部朱参谋长携带湖南大托铺机场图纸来柳，并向广西省人民政府及柳州市人民政府请调技术人员。六月五日，开始进行机场有关工程项目的设计。由于当时时间紧迫，大部分营房工程设计翻印大托铺图纸（如现在气象台的旧红砖房与大托铺气象台是同一图纸），新设计的营房约占三分之一。到六月中旬，营房及场道工程部分图表制就，并分别由中南军区空军后勤部和广西军区调来会计人员开始着手统计工料数量。到七月十日，已整理统计出机场工程制就预算额，并呈送中南军区空军后勤部以及中央军委审批。那时候，正处于抗美援朝的高潮，为加速空军建设，几乎在设计图纸及工程预算的同时，即六月上旬，担负机场修建的各工程施工队伍陆续上马。七月十五日前，衡阳铁路局完成了铁路支线的承包任务；六到九月，两支施工支队先后完成了场道面填挖工程以及主跑道和滑行道的清理工作；柳州市市民劳动委员会从七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九日完成了盖沟和溜沙井片石墙任务；工程连先后完成了停机坪修整和盖沟水泥盖板的浇制。此外，来自汉口、桂林以及柳州的技工在场务队和柳州普工的配合下，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进行柏油跑道施工，十一月底完成60%。以后，日夜挥汗加班，终于在十二月十五日圆满完成了主跑道道面的施工任务。机场营房工程由柳州市建筑公司承建，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于十二月十五日前全部竣工。

柳州机场修建是一项较大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在广西省修建委员会、市工地委员会以及机场工程处的领导下，一万多军民的大力协作，日夜奋战，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修建任务。从一九五二

年六月五日开始工程设计到十二月中旬，先后完成了跑道、滑行道、各种停机坪、推机道、疏散道以及暗沟排水道等场道修建工程。新建特种营房×栋，一般营房××栋。此外，还完成了5.2公里的铁路支线，5.4公里的高压线以及电气、水道、消防等设施的修建任务。机场修建工程大，时间短，谱写了一曲柳州军民团结奋斗的战歌，为同年十二月航空兵进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建国后驻桂空军第一架飞机在柳起飞

人民空军诞生不久，就面临着担负国土要地防空、支援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作战等任务。航空兵部队就是处于“边打边建”形势下成立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第一批机务人员由上海到达柳州。随后，飞行人员和干部亦从各地陆续到柳。同年十二月，航空兵某师在柳州机场组建。第一批飞机10架由火车运来。驻柳航空兵的机种主要有拉——九、拉——十一活塞式歼击机和乌拉——九螺旋桨教练机。这些飞机主要来源于我人民空军有偿接收来华协助中国防空的苏联空军飞机以及从苏联订购的机种。

一九五三年三月，航空兵某师迎来了组建后的第一个飞行日。这天阳光灿烂，盼望已久的隆隆机声划破机场上空，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由师长徐兆文驾驶的乌拉——九型教练机率先昂首振翼拉杆而起，以喷薄的轰鸣声飞翔在龙城上空。这闪着“八一”徽章的雏鹰告诉人们驻桂空军第一架飞机从龙城开始跃升，盘旋搏击，飞机掠过崇山峻岭，在共和国新疆的天空，开始了五十年代的新纪元。

五、越南人民军航校在柳州

——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积极保障××部队

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借口越南鱼雷艇攻击美国“马德克斯”号驱逐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尔后美国又采取“南打北炸”、“以炸逼和”等手段，于一九六五年五月，突

破北纬 20 度线，将空袭地区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

越南人民军为了有一个安宁的国土，急切盼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根据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中越双方会谈纪要精神，越南人民军航校（总校）于一九六五年进驻中国云南机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国又悍然轰炸了越南首都河内和第二大城市海防。此后，美国对越南北方轰炸逐步升级，美机空袭规模越来越大，次数日渐频繁，战火愈演愈烈。越军航校为了强化训练，加速培养飞行员，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关于越南航校有关问题会谈纪要精神，确定越军航校进驻一个分校到柳州机场进行训练，代号为“南 × × 部队”。

南 × × 部队先遣组由越航总校副校长（后升校长）梅君带队，一行十三人乘依尔—14 型飞机一架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从云南机场空转到柳州机场。十一月八日，南 × × 部队正式开始空中转场，到十一月二十日，空中转场飞机 20 批 40 架次，主要战斗机有米格十七、乌米格和雅克十八等机种。空转各种器材 100 多吨，空勤、地勤和机关人员达两百余人。到达柳州的航校领导主要有副校长梅君，政委范太，分校校长陈文持，分校政委潘成利、分校参谋长潘文那、分校政治处主任黄春其，雅克大队长根杜结，米格大队长陈文光等。南 × × 部队到柳州后，为保障开训，双方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了协商会。并分成雅克十八教练机和米格十七战斗教练机两个基本系，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组织了由中国空军专家组和越南教员的场内试飞。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南 × × 部队正式开始了飞行训练。

保障南 × × 部队飞行训练，外事活动政策性强。为此，场站官兵始终坚持以《中越两国会谈纪要》为依据以及上级对外事的指示为根据。各级领导经常进行外事工作教育，认真落实和检查外事工作情况，使干部战士在两军相处间，自觉做到内外有别。对越军的政治、军事、生活习惯等做到不说长道短，不评头论足。自觉遵守既不干涉越军内部事务，又严防泄密的纪律。凡一切涉及两军之事，都按要求严格建立了外事登记制度。在外事工作的处理上，场站党委和各级领

导,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本着加强双方军队的友谊出发,都在中越“联席会议”上进行友好交涉,使一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此外,为了促进中越军队双方的了解和团结,在双方国庆、建军节及重大节日都要举行茶话会或吃“便饭”、看电影等招待形式集会联欢,这样的招待形式据有记载的就有七次。越方曾多次赞扬我国建设成就,赞扬我国对他们无私的援助。如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在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24周年大会上,及在南××部队设便宴招待场站领导及我方专家组的茶话会上,南××部队领导在谈及中国对越援助时说:“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斗争中,一贯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又如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为纪念我军建军42周年,场站也设宴招待了南××部队,并举行了电影晚会。通过中越双方的邀请活动,增强了团结和友谊,进一步密切了两军关系。

保障南××部队训练,是场站一项新任务,不但政策性强,而且保障要求高,与我军自己航空兵部队比有较大差异。针对他们时间观念强、场次多而且大,几乎天天想飞等特点,站党委把飞行保障工作列入中心工作来统筹安排,从难着想,从严要求,严格培养场站快、准、细、严的作风,使全站官兵在每个飞行场次的保障中,做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确保了飞行安全。如南××部队在一次复杂气象的训练飞行中,通信三号台定向员卢万金同志,从领航员的呼叫声中,凭经验判断出空中飞行员与塔台指挥员失去联络,因此,他果断向空中飞行员报出了准确的航向,使飞机安全返航落地,避免了一场可能迷航而发生的事故。在保障南××部队空中转场100多架次以及在本场训练300多个场次,14,000多架次的飞行中,由于全站官兵对工作极端负责,认真过细以及各单位勤务保障密切配合,圆满地完成了越南人民军航校驻柳期间的训练中各种勤务保障,没有因我方保障不当而造成的飞行事故。曾受到南××部队领导的多次赞扬。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代表团和越南人民军防空空军代表团在中国昆明举行了会谈。根据越方建议,中方同意越航校驻中国柳州分校将于四月全部撤离柳州,转到云南机场与总

校合并继续进行训练。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南 × × 部队的 22 架战斗机（含教练机）安全空转到云南机场。随后，空运器材 94 吨，空运空勤地勤及机关人员 94 名亦于四月八日前完毕，剩下人员和飞机于四月二十一日离开柳州空转至河内。尚有 60 吨物资和器材，由场站帮助从地面转运至云南。

在一年多的岁月里，场站全体官兵克服了各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南 × × 部队紧张飞行训练的供应保障和各种勤务保障，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中国人民援越抗美光辉的一页。中越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佳话将传之后世。

柳州车站“三变”

欧阳侃

柳州车站位于广西盆地中部，柳江之滨，是柳州市的第一大门户。1941年3月，国民党政府修建湘桂铁路时建成柳州站，计有到发线3股道，存车线2股半道和站房设施等。1941年11月，修建黔桂铁路时，建成柳州城站。由于湘桂、黔桂铁路各自为政，柳州站与柳州城站互不接轨联运。1944年6月，因日寇入侵广西，在军事当局要求下，黔桂铁路改由柳州站接轨，1946年1月，湘桂、黔桂铁路统由湘桂黔铁路工程局领导管理，柳州城站改为柳州东货站。

建国后，衡阳铁路管理局接管湘桂、黔桂铁路和柳州站，并改柳州东货站为柳东货场，由柳州站统一管理，办理客、货运业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柳州车站的建设先后发生三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1951年12月，衡阳铁路管理局在修建湘桂铁路来宾——镇南关（今友谊关）段的同时，以改建柳州站房为主，增建站房1,588平方米，并扩建站场为7股道。

1957～1958年，由于黎湛铁路建成通车，黔桂铁路也修复金城江——都匀段交付营业。柳州站运量增长，柳州铁路局再次将柳州站场扩建为11股道。

1961年，随着黔桂铁路柳州——贵阳段全线通车，柳州站运量急剧增长，柳州铁路局继续扩建柳州站、场，包括湘桂、黔桂正线共计18股。其中：客车到发线5股，货车到发和存车线13股道以及附属设施。1964年查定货车接发能力为57列/日，解编能力817辆/日。

而当年实际完成货车办理车数达 1,600 辆 / 日, 有调中转车占 90% 以上, 经常发生堵塞现象, 但是, 柳州站周围均为各工矿企业和铁路厂房建筑占用, 并设有铁路专用线 22 条, 站场实在无法继续扩建。

1965 年元月 ~ 8 月, 柳州局在柳州站南端建成柳州南编组站一级三场共 32 股道。现已扩建为三级三场共 59 股道。12 月改建柳州站南端客车进路和道岔咽喉区, 以利接发客车。

第二次: 1966 年元旦开始, 柳州站改为以办理客运业务为主, 兼办柳南工业区专用线取送车工作。货物列车各种作业以及柳东货场货车发送业务, 均交由柳南编组站办理。

1969 年 4 月, 为适应客运增长的需要, 柳州局又以扩建柳州站房为主, 改善各项为旅客服务设施, 增建站房总面积 4,200 多平方米, 并增建雨棚、地道、中间站台以及改色灯信号和电锁“品”为大站电中集气。完成国家投资 61.9 万元。

1980 年, 推广采用乳化沥青道床, 宽轨枕和无缝线路等新技术, 改建柳州站客车到发线 1-4 股道共计 3.66 公里。完成大修投资 55.76 万元。

1982 年 4 月, 柳局在柳州站南端新建贵宾软席候车室 660 平方米。完成国家投资 15.13 万元。

1985 年 12 月, 为适应南宁——北京 5 / 6 次特别快车由 15 辆扩大编组为 20 辆的需要, 柳州局将柳州站的基本站台和雨棚延长至 495 米以及再次改善客车进路、信号和道岔咽喉区等, 完成国家投资 47.9 万元。

第三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1986 年元月, 柳州站客流最高日一次集结人数达 3,000 人以上。而普通旅客候车室仅有 557 平方米, 另有临时旅客候车棚一座 1,029 平方米, 地道一座进出口仅有 4 米宽, 售票房 504 平方米等设备, 满足不了旅客运输和发展需要。柳州局决定全面改造柳州站房为主, 进一步加强各项为旅客服务设施。从 1986 年 11 月开始施工, 扩建站房总面积为 11,511 平方米, 包括售票、候车、行包房屋以及站台、雨棚、地道等。其中: 旅客候车厅,

主楼高 25 米，面积 5,500 平方米，可容纳旅客最高日一次集结人数 4,500—5,500 人，成为广西最大客运候车站。1988 年 2 月建成并交付使用。到 1990 年末，柳州站改、扩建工程完成国家投资 890 多万元。

柳州车站经过三次技术设备改进和更新，客、货运量不断增长。1953—1990 年旅客发送量平均增长 4.62%；货运量平均年增长 4.4%，对促进我国、广西和柳州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1990 年柳州车站完成客、货运量表

年度	旅客发送量(万人)	货运量(万吨)	
		柳州站	城站
1953	20.29	9.28	15.13
1957	28.98	14.7	31.27
1960	70.03	61.44	101.84
1965	44.09	34.23	75.93
1970	74.86	15.72	26.93
1975	122.38	18.79	37.19
1978	131.0	20.02	43.40
1980	206.54	16.26	43.37
1981	197.81	17.6	46.37
1982	200.70	22.72	51.68
1983	266.16	22.79	52.53
1984	322.82	25.21	51.27
1985	333.46	26.67	58.92
1986	321.03	29.31	54.57
1987	369.47	35.09	51.49
1988	448.8	51.93	51.91

年度	旅客发送量(万人)	货运量(万吨)	
		柳州站	城站
1989	412.9	55.12	53.43
1990	344.22	51.58	62.05

注：表内 1965 年及以前包括柳东货运量。

焦柳铁路（广西段）建设

柳州铁路局工程处

焦柳铁路广西段，1970年—1987年称枝柳铁路水团——柳州段，建筑长度256.2公里，是为了加强内地建设，巩固国防，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修建的。1970年9月，枝柳铁路水团——柳州段，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由广西自治区和广西军区抽调干部组成会战指挥部，先后动员广西40多万民兵和铁路专业队伍参加施工。1973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1974年元月移交柳州铁路局工程处负责收尾配套，1983年元月实行临管运营，1985年元旦正式投入运营。1987年12月31日，铁道部将枝柳与焦枝铁路合并，更名焦柳铁路。这条铁路与京广铁路平行，是沟通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的一条南北向重要干线。

自然条件

枝柳铁路从湖南牙屯堡穿越彭莫山分水岭进入广西后，盘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水团——八斗段，峭壁悬崖，地形险峻。过八斗、三江进入河谷地段，地形起伏仍较大。过丹洲（富用）后，河谷逐渐开阔，地形起伏趋缓。跨融江，过融水后，则进入丘陵地带。

水团——柳州段沿线地质主要为第三纪白垩系板溪群板岩、千枚岩、变质砂岩、页岩、灰岩、冰碛岩等。三江——丹洲线路沿浔江、融江河谷，与断裂带平行，岩性破碎，地下水发育，工程地质状况较差，过融水后，灰岩广泛露头，暗河溶洞险伏，岩溶水较丰沛。

沿线平均气温26℃左右，最高气温40℃，最低气温-2℃（高

寒山区—4℃)，年降雨量 2,500 毫米以上，地震烈度 6 度以下。

吸引区范围内，森林、水力资源丰富，矿藏有铅、锌、锰、石灰石等。农产品有稻谷、玉米、花生和油茶等作物。广西境内沿线多为壮、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

勘测设计

1969 年 10 月 27 日，铁道部军管会指定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简称铁四院）进行枝柳铁路方案研究，铁四院于同年 12 月提报了澧水、慈利沅江北、常德北沅江南三个方案，1970 年 8 月中央军委发布《纪要》同意采用澧水方案（即现行线路走向方案），并明确了设计任务分工。枝城——洛满段由铁四院负责设计，融水等 7 座大桥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负责设计，洛满——柳州南编组站由柳局负责设计。确定的主要技术标准为：

线路等级：一级（乙）铁路干线；

正线数目：单线

限制坡度：6‰，其中牙屯堡——八斗公里为加力坡 12‰；

最小曲线半径：一般地区 700 米，困难地区 450 米；

到发线有效长度：近期 650 米，远期 850 米，双机牵引地段加 30 米，融安区段站和柳州南编组站一次建成 850 米；

线路上部建筑：次重型（暂铺 43 公斤 / 米钢轨）；

桥梁载重等级：中——22 级；

隧道净空：丹洲以南按隧限甲—2（电气化）净空，丹洲以北施工中改为非电气化净空。

机车类别和牵引重量：近期柳州——融安为前进型蒸汽机车，牵引 2,400 吨。融安——怀化为东风 4 型内燃机车单机牵引 2,400 吨，远期全线为东风 4 型牵引 3,400 吨，其中牙屯堡——八斗段为双机；

通信信号：架空明线，三铜五铁。信集闭方式，近期为继电半自动、色灯、臂板电锁器联锁，福塘、成团、柳江站为电气集中；

设计运量：近期客车 4 对，货运量 600 万吨。远期客车 6 对，

货运量 1,200 万吨。

澧水方案和技术标准确定后,1970年10月,施工队伍即陆续进点。为了应付紧急施工,铁四院采取“一次定测”的方法,提供设计图纸和资料。用五万分之一地图进行纸上定线;站场平面图只有一条股道中心线;地面标桩每百米只设一个木桩。施工中发现设计资料问题多,由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战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枝柳铁路广西壮族自治区会战指挥部(简称区指)组织“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现场设计组,全面复查。铁四院也组织设计人员参加。据不完全统计,修改预算 655 项,其中 633 座涵渠中取消和改变设计的就有 420 座;增加排洪、灌溉、交通涵洞 100 多座;大、中桥 86 座中有 80% 的墩台基础改变了设计,大岭——更村区间取消大展线改用小展线,融安内燃机务段改用山外方案等。改变后的设计质量有所提高,设计图纸及预算资料勉强满足了施工需要。

施 工

1970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枝柳铁路广西壮族自治区会战指挥部设于融安,领导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简称铁二局)、大桥局、柳局等专业施工队伍负责桥、隧及架桥铺轨施工任务,还设立柳州、桂林、南宁、玉林、梧州、百色、钦州等7个地区指挥部(简称分指),组织民兵 40 多万人,负责土石方及小桥涵洞施工。分指的施工方法采取“冬闲突击,春忙下马”。常年则留少量民兵配合各专业队伍进行大、中桥及隧道等工程施工。

枝柳铁路广西水团——洛满段 1970 年 10 月全面动工。

施工中,广大铁路员工和民兵开展技术革新,推广应用新技术。创造葫芦炮、连环炮等加快石方的开挖。隧道施工推广使用光面爆破、蘑菇形开挖法,隧道内溶洞处地基采用旋喷桩加固。桥梁工程采用圆形空心墩和柔性墩等。融水铁公两用大桥采用悬臂拼装法架设钢梁。支档建筑物工程采用板柱式,拱腹式,扶壁式及抗滑桩,并试用垛式、斗式等多种新形式。推广气热浮升焊接工艺,完成了 3 座 2,000 立方

米的柴油灌体焊接等，使施工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至1973年12月，水团——洛满段完成投资30,687.5万元，为批准总概算43,990万元的69.8%。

1974年1月1日起，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总指、区指撤销。水团——洛满段的剩余工程交由柳局继续施工，柳局成立枝柳铁路工程指挥部，留用民兵1.2万人配合，除抓紧铺轨架桥外，以融安段站、融安内燃机务段等工程为重点，逐项逐点完成配套工程。铁二局则继续完成收尾工程。

1974年9月开始，分段办理临管运营。

1975年5月26日，水团——洛满段221.04公里通车。

1978年3月，洛满——柳州南编组站一段开工，由柳局施工。

1980年因投资不足，处于半停工状态。1981年3月复工，1982年12月26日建成30.852公里通车。

至此，枝柳铁路水团——柳州南编组站建筑长度251.89公里全部竣工，共计完成工程量：土石方3,065.6万立方米，路基加固及支档建筑物圻工35.139万立方米，桥梁117座10,951.3米，隧道79座25,360米，涵渠808座18,106米，正线铺轨251.9公里，站线66.1公里，房屋建筑180,677平方米，以及通信、信号、电力、给水等工程。购地16,140.7市亩。完成投资46,596万元，其中，洛满——柳州段投资3,870万元，共使用人工3,575万工天，钢材（不含轨料）19,686吨，木材94,756立方米，水泥32万吨。

1982年3月，铁道部确定柳局与广州铁路局在牙屯堡站北1,370.058公里处分界。同年3—7月，铁道部组织有关单位对枝柳铁路初步验收，1982年8月，铁道部将原湖南省枝柳铁路会战指挥部修建的牙屯堡——水团14.395公里线段及完成投资5,214.89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392.3万元），按固资移交柳局。柳局管辖枝柳铁路为牙屯堡——柳州段269公里。

1982年12月，国家计委、建委组成枝柳铁路验收委员会，22个单位参加验收认为：枝柳铁路设计符合国家一级干线标准，技术选

线比较合理。桥隧设置得当，质量良好。线路基本稳定，石碴充足，发现的病害进行了整治。通信线路、信号、电力、给水、机车、车辆、房屋建筑物等运营设备布局比较合理。在设计和施工中，三废治理，安全生产和生活卫生等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采取了措施，基本上达到正常生产和使用要求。工程质量总评良好。但指出枝柳铁路建设初期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使部分线路走向不尽合理。同时，工程仓促上马，没有初步设计就搞一次定测，给勘测设计和施工都带来不少困难，多花了国家不少投资。国家验收委员会决定：枝柳铁路从1983年1月1日起临管运营一年，1985年1月1日起正式运营。

1983年柳局接管后，对枝柳铁路广西段进行线路中线校正，全面加强线路更换非标准钢轨和扣件，增补石碴以及重点病害整治；改善顶紧的桥梁；整治隧道漏水和限界；更新和加强通信、信号、给水、电力设备，增加部分职工住宅和生活福利设施等。

1983~1985年包括处理验收中设计施工的遗留工程和增加工程等共投资1,810万元。

枝柳铁路于1985年元旦正式交付运营。到同年末，枝柳铁路广西段总计完成国家基本建设投资48,406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187.76万元。

设备加强

1986~1987年柳局在年度基建，更改计划内安排增加融水、融安站货场股道和融安地区、三江站、牙屯堡站、八斗站等给水、电力设备、安装机车“三大件”以及建成彭莫山隧道帘幕通风设施等，完成投资92.28万元。1988-1990年柳局在年度大修计划内安排洛满——牙屯堡段线路清筛大修235.4公里，更换50公斤/米钢轨102公里，铺设无缝线路99.3公里，铺换钢筋混凝土轨枕242公里，共计完成大修资金4,992.2万元。1990年扩建融安区段站为横列式一级二场，共有股道11股，其中到发线7股（2股尚未使用）、编组线4股。

通过历年对设备加强、改善，使牙屯堡——柳南段线路容许速度由1985年的60~70公里1小时提高到1990年的70~80公里1小时。

1990年末，焦柳铁路牙屯堡——柳州南段268.1公里，其中八斗——牙屯堡为补机地段，年输送能力：牙屯堡——融安段上行729.6万吨，下行1,196.8万吨（1985年上下行均为908万吨）；融安——柳州南段上行691.9万吨，下行1,200万吨，（1985年上下行均为708万吨）。其中：洛满——柳州南段上行1,877.9万吨，下行3,354万吨。焦柳铁路的重车方向为下行，能力有较大提高。

1990年焦柳铁路牙屯堡—柳州南段车站分布表

站名	等级	中心里程（公里）	区间距离（公里）
牙屯堡	四	1,373.934	0
水团	四	1,385.089	11.155
弄卯	四	1,394.096	9.007
八斗	四	1,403.588	9.492
三江县	四	1,410.578	6.990
程村	四	1,420.838	10.260
(平寮)			
老堡	四	1,435.041	14.203
塘库	四	1,442.352	7.311
六孟	四	1,452.537	10.185
程祥	四	1,463.827	11.290
富用	四	1,472.795	8.968
平琴	四	1,483.011	10.216
融安	三	1,491.129	8.118
浮石	四	1,501.364	10.235
(贝江)			
融水	四	1,517.518	16.154
永乐街	四	1,530.434	12.916
双蒙	四	1,540.322	9.888
(牛鼻河)			

站名	等级	中心里程(公里)	区间距离(公里)
罗笛	四	1,552.309	11.987
古砦	四	1,559.551	7.242
寨隆	四	1,572.602	13.951
(四塘)			
大岭	四	1,583.824	11.222
更村	四	1,595.388	11.564
洛满	四	1,604.947	9.559
福塘	四	1,615.379	10.432
成团	四	1,624.905	9.526
柳江	四	1,633.728	8.823
柳州南	-	1,638.176	4.448

注：1、括号为乘降所；2、柳局管辖起点为 1,370.058 公里。



柳焦铁路示意图

修建焦柳铁路的意义及其他

欧阳侃

修建意义

为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加强内地建设，巩固国防，发展国民经济，1970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修建枝柳铁路。铁路北起焦枝铁路终点湖北枝城，经鄂西、湘西至广西柳州，线路全长878.578公里。其中：广西水团——柳州南段256.2公里。该线位于我国中部腹地，与现有太焦、陇海、襄渝、湘黔、黔桂、湘桂铁路相衔接，平行京广铁路，为沟通华中、华北、中南地区，形成南北走向的一条国家重要干线。1970年9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组成会战指挥部组织施工，1974年元月移交柳州铁路局收尾配套，1983年元月实行临管运营，1985年元旦正式投入运营。1987年12月31日，铁道部将焦枝与枝柳铁路合并，更名为焦柳铁路。这条铁路的建成，对于加速我国四化建设，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地方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巩固国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地貌概况

枝柳铁路水团——柳州南段从湘南牙屯堡穿越彭莫山分水岭进入广西山区，经三江、融安、融水、柳城、柳江至柳州南，地形险峻，地质复杂，工程艰巨。水团——八斗区间18.5公里，工程集中，高填深挖，桥隧相连，采用12‰的加力坡度，线路仍高悬于半山腰上。桥隧43座9,438米，占全线延长50%以上。过八斗、三江进入河谷

地段，地形起伏仍较大。三江——丹洲线路沿浔江、融江河谷，与断裂带平行，岩层破碎，地下水发育，工程地质较差。过丹洲后，河谷逐渐开阔，地形起伏趋缓。跨融江，过融水而至柳州，则进入丘陵地带。吸引区范围内，森林、水力资源丰富，矿产有铅、锌、锰、石灰石等，农产品有水稻，玉米、花生、油茶及亚热带作物。沿线多为壮、苗、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

1970年10月，施工队伍陆续进点，为了应付紧急施工，铁四院采用“一次定测”的方法，提供图纸资料，用五万分之一地图纸上定线，站场平面只有一条股道中心线，地面标桩每100米只设一个木桩。施工中发现设计资料问题多，由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战总指挥部，枝柳铁路广西壮族自治区会战指挥部，组织工人（民兵）、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现场设计组，全面复查设计。据不完全统计，修改预算655项。其中：633座涵渠中取消和改变设计的就有420座，增加排洪、灌溉、交通涵洞100座，大、中桥86座，有80%的墩台基础改变了设计。大岭一文村区间取消大展线改用小展线，融安内燃机务段改用山外方案等。

运营效果

焦柳铁路正式交付运营后，牙屯堡——柳州南区段逐步成为大西南煤、磷运输的重要通道。1985—1990年完成旅客周转量1,270百万公里，货物周转量13,308百万吨公里，换算周转量14,578百万换算吨公里。根据铁道部对广西地区铁路运输每万吨换算公里产生社会效益为432.54元，6年共计产生和提供社会效益62,977万元。

从1986年开始，柳局实行铁路经济承包责任制，焦柳铁路广西段逐步扭亏为盈，到1990年末止，运输收入共计7,125万元，扣除成本和支出，平均每年获经济效益843.2万元。

柳南水厂今昔

顾读云

柳南水厂，前称河南水厂，前身为广西航空学校净水站。

民国22年(1933年)11月,广西航空学校从鱼峰山下迁入飞机场,航校距柳州(河北)约八里之遥,飞行生本来对柳州的条件不满,加之每日用水完全由车输运,间接耗费不少,生活很不方便,即以待遇差为由闹事。当局只好于民国23年(1934年)6月与外商签订合同,安装自来水。水站设在麻风(现华丰)湾。建钢架水塔1座,394立方米慢滤池1座,567立方米清水池1座,供水泵房一间,特警室及临时木皮工人宿舍,取水浮伐等。用柳江河水,设计能力为360立方米/日,最高可供500立方米/日。当年底竣工,自来水专供广西航校用。1944年日本军队入侵柳州,撤退时水塔被炸毁,机器遭破坏。民国35年(1946年)8月12日,柳州水厂致函恳请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修建河北水厂,扩建河南水厂,并呈请广西省政府向空军第五站交涉回拨河南水厂交柳州水厂,扩大供水“以应市民之需”。水厂出人出钱,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援助和空军第五站的帮助下,扩建了河南水厂厂房,增加了机器设备,增配了街道水管,扩建工程于民国36年(1947年)2月完工,6月,不仅保证了飞机场空军用水,而且向河南市民供水。

解放后,1953年为了扩大和调节城市供水,在马鞍山建500立方米蓄水池一座,同时新装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出厂管,并铺设城站路、柳石路、桂柳路水管,扩大供水面积。(1986年柳州电视转播站用马鞍山500米蓄水池一带的土地,水池停用。)1955年,投资

兴建华丰湾集泉地下取水点，安装两台套机泵，地下取水点最大日供水量可达2万立方米。此取水点1970年以后不断受到污染，1975年受市制药厂排出的污水严重污染而被迫报废，全部用柳江河水。1964年投资改造2万立方米/日的配套工程，将慢滤池改建为平流沉淀池，新建一座普通快滤池及一座清水池。1974年进一步扩建，搬迁了市二轻局所属的综合化工厂，迁移了20多户居民住宅，扩大了水厂面积，拆除了老供水泵房，新建固定式圆形钢筋混凝土岸边取水泵房，加速澄清池、虹吸滤池、加矾间、清水池、吸水井和送水泵房各一座，增加了新的机泵，新装直径800毫米出厂管一条和直径600毫米、400毫米的输水干管约6公里，这套工程1979年5月投入使用，缓解了河南市区工厂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紧张的局面。

1985年，为了解决河南城区工厂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日益增长的需要，进行扩建供水能力配套工程。对取水头部、取水泵房机泵、取水泵房、送水配房配电系统和加矾室进行了改造；拆除平流沉淀池、普通快滤池及老清水池；新建折板反应斜管沉淀池、双伐滤池、3,700立方米清水池和综合楼；增加一条直径为1,000毫米的出厂管，对河南城区街道的管网进行改造。这套工程1989年元月全部竣工投产。柳南水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10万立方米/日。现在两天的供水量超过解放初期一年半的供水量。供水范围：东到荣军路，西到柳州车站，西南到张公岭以南，南到鸡喇，北至驾鹤路，供水面积约12平方公里。1983年初，柳南水厂的输水干管分别在驾鹤东路、荣军路口、烟厂门前、柳石路、龙泉山医院旁与柳东水厂输水干管相连通，形成河南城区环形供水体系，使柳南水厂对柳州市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稿资料：

- 1、广西航空学校校刊。民国23~25年。（1934~1936年）
- 2、柳州市军事志。（1990年出版）
- 3、民国35年（1946年）柳州水厂来往公文，代电。
- 4、河南水厂扩建工程说明书（1974年5月）。
- 5、柳州市自来水公司1980年以来历年工作总结。

鹅山飞瀑见闻

梁始菊

编者按：

“鹅山飞瀑”为柳州八景之一。但这飞瀑过去却绝少人见。地质学家考证也认为：鹅山为孤山，山及山麓附近无水源，何来飞瀑？柳宗元在《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文中虽在文末写有：“峨山（即今鹅山）在野中无麓峨水出焉东流入于浚水”句，顶多也只是说山脚下有水流入柳江。柳宗元在他的《登柳州鹅山》诗中写道：“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诗中就更无一字提到鹅山有飞瀑之事，可见，柳宗元登鹅山时，是没有飞瀑可观的，不然，子厚会发挥一番。到了宋代刘洪道时，写有《观鹅山飞瀑》一诗。全诗录于下：“探奇不畏险，拔雾上高岭；放眼观飞瀑，枕流听素琴”。刘洪道的观鹅山飞瀑，似乎与本文写的类似，即雨后爬上鹅山，去探究飞瀑形成的原因。故此，鹅山飞瀑一事，并非虚构，但也非四季长有的景观，它只不过是在特定条件下，暴雨滂沱时出现的奇观。确否，还需待进一步见证。

六十年代初期，笔者就读于柳州市南站街道办事处开办的南站民办小学。当时校址在南站鹅山路菜市区（今柳州市第三食品厂处）。学校只有两个班，即初小一，初小二班。笔者是初一班学生。那时是春季，一连下了几日滂沱大雨。白天雨较小，夜间特别大。一日早上，笔者与同学们正在教室内上课，突然头顶上响起轰隆隆的声音。这声音似雷非雷，很像飞机从头顶上飞过的马达声。老师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青年女教师，她说声不好，有空袭。忙带我们冒雨冲出教室，朝鹅山方向跑去。我抬头朝响声处望，原来是鹅山顶上绝壁喷出一股

宽约米余的飞瀑发出的响声。当时菜市区内不少买菜和卖菜以及各行业的人都惊讶地抬头观看。有的说：雨下得真大，连鹅山顶上都出水了，那上面肯定有池有塘，要不然哪来一股这么大的瀑布呢。当时我一听说有池，有塘，心想：那必然就有鱼！待水流干了，就爬上山顶出水处去捉鱼。于是我便邀了年岁稍大的张志刚，约他放学后，如天晴就上山捉鱼。为了确定喷水地点，下课后我又跑到当时鹅山粮店面前的马路上抬头仔细观望。这时已没有那似雷非雷的声音了。只有那哗哗的飞溅而下的落水声。那水是从山顶绝壁下的斜坡淌出，流向斜坡凹槽缝中，与从西南山槽的水汇合形成一股之字形的水流。从绝壁斜坡下向北面喷出的水流，因前边似乎较高受阻，变成一块瀑布朝东北方向飞溅而下。水溅落在山脚上面的岩石中。那轰隆隆的响声是来自绝壁下面水流转弯处一石缝之间。这石缝中有一块石头拦阻水路，水在那里分成两股流下，后又合成一股向北喷出，所以发出轰隆隆的回声。当时这种声音持续了半个小时就消失了。待放学后，那哗哗的流水也逐渐消失了。中午我和张志刚爬上山腰又发现鹅山背西南方向也有一股水顺着山槽飞泻而下，落在车辆工厂旁的山脚之中。后来我们爬上距离山顶约有五十公尺的地方，朝东北方向的半山中寻找是否有池，有塘。只发现有一半月形低凹处。它低于喷水处，却没有水。当时我很想下去看看，张不同意，于是我只好随着他下山，扫兴而归。一九六二年我初小毕业，转到雅小读高小，再也没有听说过出现鹅山飞瀑的奇景。

鹅岗桥下话沧桑

梁始菊

鹅岗桥，位于柳江西畔，今柳南区上游路鹅岗区东一巷（原鹅岗村）柳铁工人报社后面、职工家属大楼下面斜坡之间。桥高约八米，宽约两米，长约十米。一墩两拱，由石块砌筑而成，南拱已毁，毁于何时，众说不一。一说抗战期间被日机轰炸；一说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时所为。断拱南端本来有一小块石碑，后来不知何故不见了。五、六十年代，此桥行人稀少，临江村边，一般是乘舟沿江而下。只有极少数村民在枯、水季节卷裤挽袖涉溪而过。当时溪边尽是芭芒荆棘，灌木野草丛生。坡顶上面到处是荒岭野坟，人烟稀少。鹅岗村上只有临江北边有九户人家，日暮西沉时已是关门闭户，寂静无声。柳州铁路管理局首先打破了这里的沉静寂寞，于六十年代中期，在西南两边建起了管理局大楼、医院、学校，紧接着是一排排的职工宿舍拔地而起。铁路技术馆（今铁路工人报社）也座落在此，并架起了轻便桥（今铁路鹅岗桥，旧称新一桥，此桥距鹅岗桥西南上游约100米。从东向西，由市中药厂大门直通铁路管理局东边小门。其原结构为钢木结构。现改钢筋水泥预制板结构）。由于城市工业飞速发展，那一排排低矮的宿舍已经拆掉，换成了一幢幢高楼。鹅溪西南上游已建成了五、六座大小不一的桥梁。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街道名称的变换，真正的鹅岗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有的把飞鹅桥、新一桥叫作鹅岗桥。其实真正的鹅岗桥就是这断旧拱石桥。旧石桥北边斜坡是鹅岗村，解放前只有一黎姓业主，人称黎老九，他和几位结拜的异姓兄弟在鹅岗村耕作，后来烧砖瓦、开码头。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土改时，黎老九被政

府抓去关押死在狱中。其土地和砖瓦窑，码头都归国有。土地归郊区磨滩、黄村、新云大队种植。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鹅岗桥下两边荒地都属黄村大队耕种，笔者当时常见他们从柳江对岸划船过来耕种和收割，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们过来了。原因是土地已划归园林管理局了。曾见过有人来种竹子和树木。现已竹木成林，砍了一批，又种一批。也有居民在其中划地种菜。后来，鹅岗村变成了鹅岗区东一巷。再也不是昔日日暮关门的鹅岗村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鹅岗区居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从各方面搞活经济，走致富道路，居民房屋由原来的黄泥春墙变成砖墙房屋，又由砖墙房屋变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小楼房。工厂、学校和大楼在这三角地的鹅岗村耸立起来。居民由原来的几户人家增加到几百户，人口约万余（包括铁桥以南的铁路家属区）。鹅岗桥已成为南北沿江来往行人的主要交通要道。遗憾的是此地段与铁路属地有纠纷，形成了三不管地带。这里外来人员较多，十分复杂。打架斗殴、赌博和凶杀时有发生。近年来由于采取了综合治理，治安比过去好多了。据说市政府和铁路管理局协商准备在原鹅岗桥南北架设一条公路桥，并在沿江修筑河堤，还要治理鹅岗桥下的工业污水。这样鹅岗桥两岸就变得更加幽静美丽了。

柳南区解放前后文体活动琐谈

伍齐信

群众文化

清末民初时期，在谷埠街、大同巷一带，有各种民间艺技团体。如泰和班，春秋社，彩调团，木偶剧，杂技团等。每逢圩日或过年、过节，民间艺人常来搭台演戏。尤其是每年春节、元宵节，群众舞狮舞龙非常热闹。节日时，彩茶戏盛行，也有演唱桂剧的。当时柳南区有著名的老艺人沈善文，他住在谷埠街，生于公元1900年，死于1969年12月18日，终年69岁。经他培养的艺徒有曾伯希、董锐山、洪国璋、陈楼、龙溪、曾泰松、吴亚平、梁启仁、曾宪书等30余人。

民间艺人陈一旦，生于1914年4月，死于1985年5月29日，终年71岁。青壮年时期，他就爱好文场曲艺，1983年间，在“柳州市文场研究社”任指导。社员有陈仕鸿、苏铭珍、覃玉喜、王小英、钟鸿仁、陈锦明、覃茂华、黄仁福等20余人。

著名武场艺人董秀锋（艺名董泰和），死于1963年，终年70岁。他于解放前，在谷埠下街（今红星旅馆处）组织一个“泰和桂剧班”，约有一百余人，经常在一起学艺和演唱。该社有名艺人蔡老五（也是名乐师），还有韦建章、杨秀萍、蒋跃忠、覃国珍等人。

1951年在大同巷，有民间艺人覃公安，他组织一个十余人的业余彩调团，经常参加业余演唱活动。

1951年衡阳铁路局柳州铁路分局工会，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其

中有京剧、歌舞、话剧等剧组，总导演唐雅卿，副总导演杨振华，助理导演孙大爷。京剧分三个班，共60余人。置有两堂（套）古装戏演出服装。第一班以铁路职工家属文艺积极分子为主，每周或两周举办一次演出晚会；第二班以职工、干部文艺爱好者为主，参加节日或到外单位演出；第三班以业余老艺人为主，参加重要汇演。

柳铁京剧组自1953年成立以来，至1964年春节，在柳铁文化宫演出“盗仙草”、“除三害”、“华容道”等三出京剧后，一直衰落未振。“文革”中将两大套古装服装封存，以清唱样板戏为主。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十月上旬，柳州市业余京剧团，在柳州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成立，当时有柳铁京剧爱好者唐雅卿，劳绍武，五志平，杨继武，张淑英等参加为团员，曾在柳铁文化宫、防腐厂、机务段演出。柳铁京剧组自打倒“四人帮”后因老一辈京剧爱好者中多数老了，有的死了，青年们对京剧又缺乏兴趣，故多年组建不起来。后经柳铁工会多方动员，由局老战士协会发起，于1985年9月26日，成立了“柳州铁路局工会京剧文艺组”，开始有所活动。

体育设施

柳南辖区柳铁鹅山体育场，于1953年1月1日建成。柳铁体育馆于1984年12月建成，以上总占地面积为56,000平方米。体育馆内有篮球、排球场和舞厅，四周有座位2,100个。柳铁工人文化宫后面，建有一个标准的柳铁游泳池，占地面积为800平方米，有容纳2,000观众的看台。还建有柳铁柳江游泳场，可容一万余人游泳。一到夏天，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来到柳江河边游泳场消暑。柳铁鹅山体育场，一年四季中，每天早上，都有一、二百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尤以离退休职工居多。

辖区内各企事业单位，或多或少均有不同体育设施，如太阳村水泥厂，工程机械厂，柳铁一中，柳铁二中等有游泳池。柳铁文化宫舞厅、柳铁青少年活动中心舞厅、鹅山体育馆舞厅、市工人电影“影

中阁”舞厅等，经常晚上开放，节日通宵开放。

武术团体

1953年——1956年，柳南区居民周汉初拳师，组织一个“群力武术杂技团”，周汉初任团长，有团员五十余人。1990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柳州微型汽车厂的退休老工人周志，是广西自治区武协委员，硬气功教练，柳州市武协副主席，技术顾问，又是老拳师，硬气功师。近年来他在柳铁工人文化宫，举办了速成硬气功学习班六期，招收学员350余人，传授“硬气功绝技”。凡参加者不分男女老少，只要学习15天至一个月，就能基本学会，可以全身抗打，身体能压四百至五百公斤。据说学会了硬气功，既能强身健体，祛病延年，又能防身自卫。

周汉初先生，曾多次参加全区、全国武术竞赛，均获得优秀奖牌。周志的硬气功绝技，曾在《体育报》，《解放军报》，《柳州日报》上多次报道，评价较高。1983年中国新闻社特邀他赴泰山参加全国十大气功师合拍“中国硬气功”影片，发行海外，享誉全球。

1954年徐声均先生，组织一个“健身杂技团”，徐任团长，有团员30余人。

1955年刘炳章先生，组织一个“五星杂技团”，刘任团长，有团员40余人。

1975年陆飞先生，组织一个“柳南区气功魔术杂技团”，陆任团长，有团员11人。表演节目有“人头搬家”，“肚皮当菜板”，“胸开铁链”，“真剑顶喉”，“全身抗打”等。

一间朝气蓬勃的完中

——六中简史

赵 庆

一九六〇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

柳州市人口逐年增多，市区面积不断扩展，青少年入学难的问题日趋严重，学校每年招生时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市委和市政府对鱼峰山以南地区的单位日益增多，居民人数不断上升，青少年入学难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当时遇上了经济困难，仍决心在这地区内开办一间中学，以解决地区内青少年就近读书的大事。

市委书记梁山，于一九五九年底亲自参加校址的选择事宜。开始拟将校址选设在五里卡一带，因这地区宽阔，且多荒地，可任由学校圈定范围，便于学校将来的发展。后来梁书记考虑这地区离居民区较远，学生上学来往不便，加上安全感也较差，经反复磋商，最后决定在云头岭柳邕下段小学校园内办中学，原小学则迁往对面空地另建新校舍。

市教育局任命孙忠传为建校党支部书记，阙之杰为副校长，并要求他们一面建校，一面着手筹划招收初中新生事宜。新校舍未建成之前，暂借用下段小学教室上课。同时教育局拨款十六万元人民币，筹建两座三层楼，每层八间教室的教学大楼，另建一栋两层楼，共二十四间房的教职工宿舍楼，三栋楼房同时兴工，尽量赶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份开学前完工。后因木材缺乏，原定在足球场兴建的一栋教学大楼，虽已打好基石，只得停建，集中人力和物力，先建足球场东侧

的教学大楼和职工宿舍。

一九五九年五月，国务院曾发出“关于全日制学校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一文，要求学校加强对学生进行德育和智育教学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和生活管理。因此，建校时，学校动员全校师生，人人动手，共同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全校师生均投入到建校劳动中去。教学大楼和宿舍楼的地脚基石，全由师生们从采石场用畚箕挑回来；砌墙砖块全由师生逐层搬运供施工用；砌墙用的河沙，全由师生从东门沙角一担担挑回学校施工场地；教学大楼和教职工宿舍周围地面，全由师生们用灰沙和煤碴铺平打实。师生们劳动时，尽管学校采用规定任务和分段包干的办法，但师生们劳动热情高涨，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用不着学校督促。校园内要植树栽花，师生们争着找回花木栽上，课桌椅定做好了，师生们从木器厂全部扛运回教室。在建校劳动中，全校师生自始至终均保持高度热情，学校有什么劳动任务总是抢着干，无任务的班级也积极帮着干，放学了，还自动留下来找事干，因而建校工作按计划顺利完成。

一九六〇年九月，学校如期开学上课，头次招生，共收六个初中班，学生三百多人。学校校名定为“柳州市云山中学”，取其座落在云头岭之意。根据当年陆定一同志发表的“教学必须改革”的号召，学校与柳邕下段小学合并成“一条龙”学校，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将小学六年与初中三年的学制合并为一体。

学校开学后，新建教学楼有的还未装修好，除部分班级暂借用下段小学教室上课外，有的班级仍无教室上课，只好在校园内的大树浓荫下上课，黑板则挂在大树干上。大家说：这是延安时期的抗大风气，无不引为光荣。

十月，砖木结构“U”形三层教学大楼竣工交付使用，全校师生喜气洋洋地搬入新楼上课。

当时，中小学“一条龙”学制，行政统一办公，原下段小学校长改任中学副校长，管理上分中学部和小学部，原则上，小学部行政管理由小学原行政人员主持，中学部由中学校长主持工作，总务处则

统一为一个，总管学校后勤工作。中学部教师除由教育局调来大部分外，不足之数，则由小学有经验的教师担任上课。

一九六〇年，由于天灾，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上级领导提出大办农业的号召，粮食则以“瓜菜代”。师生们在坚持上课的同时，下课后就在校园内种瓜栽菜，还在校园的一角挖了个约两个教室大小的鱼塘，准备放养鱼苗，因水塘下面有溶洞漏水，结果没有放养鱼苗。学校还到竹鹅塘开辟农场，种上花生、水稻等农作物。一九六一年花生获得丰收，开家长会时，学校用花生招待全体学生家长。家长们说：用自己儿女亲手劳动得来的果实让自己尝新，心中既感到无比欣慰，又体会到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深刻意义。

一九六二年，遵照教育部关手对学校工作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教师队伍得到充实。教育局除分配一批高师毕业生来校任教外，还从兄弟学校抽调来一批有经验的教师充实教学第一线。临时从小学抽调来任教的教师仍回小学上课。这样，中学教学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为今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打下了牢靠的基础。另外，市工专因故停办，该校全部理化教学仪器拨归云山中学使用，从而使理化课程的教学有了直观教学仪器，对理化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了物质基础。

一九六二年，教育局拨款一万三千元，在校内兴建一栋两层楼，每层七间前后房的第二教职工宿舍楼，这栋宿舍楼为钢筋水泥结构。竣工后，缓解了教师住房难的问题。一九七三年，在这栋宿舍楼的顶层平台上，又加盖一层七间前后房的住房，容纳更多教工住进学校。

一九六三年，学校工作又进行新的改革，“一条龙”的九年一贯制不再实行，六年制小学与三年制中学分开，柳邕下段小学迁出中学，搬往对面新校址上课。这年，云山中学改校名为“柳州市第六中学”。七月，全校师生欢送第一批初中毕业生到六万林场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停课闹革命，行政领导和班主任被定为“当权派”。工作组、工宣队和军宣队纷纷进驻学校，大批教

师被批斗，教学大楼成为武斗据点，教学仪器，图书和课桌椅全部被毁，一批教师送至“五七农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学校未招收新生。

“文革”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课堂教学逐步正规化，教师教学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课堂教学质量较“文革”期间有较大提高。

一九七〇年九月，开始招收了三个高中班。从此，柳州六中从初级中学发展成为一所普通完中。

一九七九年，学校用勤工俭学积累的钱，在第二教师宿舍楼西侧，兴建了一栋五层楼，三单元，共三十套两室一厅的第三教工宿舍大楼，全部钢筋水泥结构。（后因钱不够由市教育局拨了小部分钱补助）一九八〇年，宿舍大楼竣工交付使用，三十户教工住进新楼，教职工住宿条件得到了改善。

一九八四年秋，学校领导班子大调整。

六中新任校长陈升礼，书记梁祖荫来校主持校务后，首先着手调整了中层干部，在校务会上，向全校师生提出：“一年校风大变样，两年质量有提高，三年打个翻身仗”的奋斗目标。陈校长带领全体师生员工真抓实干，在调动教师积极性的同时，狠抓教学质量，建立起各项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使学校工作有章可循、有矩可比，正常教学秩序很快建立起来。到一九八六年，教学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学生学习风气有了好转，各科学业成绩较前均有较大提高。中考时，数、理、化和英语各科成绩，均超过市平均水平。高中毕业生考上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普通高中学校中居首位。三年奋斗目标提前实现。一九八七年后，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学校又提出新的设想：在原有基础上，要更上一层楼，教学质量争取名列普通学校前茅，校风要进一步好转，校貌要进一步改观。

一九八七年五月，学校开始进行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教师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高级、一、二、三级教师。至今，评上高级教师的有十四人，中级教师五十名。

一九八九年，在教师职工中，实行了结构工资制。根据不同岗

位和任课情况，发给为数不同的结构工资。结构工资实行后，不仅改善了教职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也进一步调动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学校工作的凝聚力，稳定了教师队伍。

由于教学改革措施的执行，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调动了起来。用陈校长的话说：现在不是怕教职工不肯出力工作，而是怕教职工因拚命工作而累垮了身体。所以，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更好地爱护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更好地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如提高教工的福利待遇（含离退休教工，自八九年春节起，所有节日补助，离退休教工均与在职教工一样，为教育系统之首）。

一九八八年四月，新建钢筋水泥结构的四层实验大楼竣工交付使用。大楼每层四间教室，宽敞明亮。大楼外形也美观。

一九九一年八月底，新建六层钢筋水泥结构教学大楼竣工，共有教室二十七间。大楼造型新颖，成锯齿形，每间教室光线明亮，教室宽敞，大楼两头有教研室。大楼造价近一百二十五万元，为市一流教学楼。一九九〇年还新建一现代化厕所，全天有水冲洗，在学校中亦不多见。

原来的砖木结构教学大楼已全部推倒扩建为操场。现又着手兴建二十八套教工宿舍楼，其中三房一厅十四套。工程完工后，学校面貌将大为改观，一所全新的普通完中，将以崭新的面目屹立在云头岭上。

六中建立至今，已三十三个年头，为国家培养了几千名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为社会造就了很多优秀的建设人才，为大学输送了不少学有成就的学术尖子，这些学生中，现在有的是教授、讲师、高级工程师、厂长、银行行长、校长、有的是党政干部。如我国第一个词学女博士王筱云，著述达十多种的师专讲师黎远芳等，都是该校毕业生。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都在发挥着中坚骨干作用。

近几年来，经过全校师生的辛勤努力，获得的市级奖励有：一九八五年获教育局“三优一学”先进单位称号；一九八六年，获市、局教学质量奖（高、中考试成绩优良）；一九八七年，获自治区

和市“三防教育先进单位”称号（三防即：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和防原子武器）；同年并获市高、中考试教学质量奖；一九八八年获市高、中考试教学质量奖全面奖；一九八九年，获教学质量全面奖，一九九〇年，获市教学进步奖；一九九一年，获市教学质量全面奖，中考成绩跃居市区学校第一名，在统一考试的六个科目中，平均分及格率和优秀率共十八个指标中获得十五个第一名，《柳州日报》为此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五日，以头版头条位置报导了这事。教育局为此特颁发奖金4,500元。学校工会获一九八六年市优秀职工之家奖，一九八八年亦获优秀职工之家奖。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学校已毕业高中班二十四个班，学生1,185人，初中三十七个班，学生1,857人。现在校高中十个班，初中十六个班，共有学生1,427名，在职教职工九十八名，离退休职工二十五名。

陈升礼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已超过国家规定的领导职务年龄，市教育局于同年十二月调李群武来校接替陈升礼的工作。李为自治区数学特级教师。李校长来校后，现正领导全校教师员工奋力工作，将把六中办成市区一流普通完中。

柳铁五中艰苦创业史

伍齐信 于鹏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柳州铁路局随着运输生产的发展，职工人数不断增加，局机关周围地带，高层住宅建筑拔地而起，人口密集。小学生升入初中，要到较远的柳铁一中、二中、三中去上学，来往很不方便。而且几所中学的学生容纳量有限，学校压力增大。铁路局领导于1984年，在听取局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教育战线代表的建议后，决定创办柳州铁路局第五初级中学，校址选在鹅山路四区原柳铁一小，一小则另在鹅山路四区原直属房建段预制厂建新校址。1986年9月柳铁一小迁入新址，柳铁五中进驻一小，开始办学。

原柳铁一小搬迁新校址后，柳铁五中筹备组接管一小房产，除两幢小学教学楼外，几乎空无一物。当时五中的干部、教工都是上级从各铁路学校抽来支援的，约40余人。课桌椅中的部分也是从别的学校调拨支援，由教工去搬来学校的。学校因陋就简，开始招收初一新生，共计八个班320名学生。开学后，正逢第一个教师节，该校除上级发给每个教工10元慰问费外，学校什么也没有给。教工们理解当前学校困难，没有怨言。学校党、政领导，因势利导，向全体教工提出艰苦创业的要求：决心把教学质量搞上去；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把勤工俭学搞上去，创一流成绩，五中的前途是光明的。领导的决心，鼓舞了教员工的信心，激发了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在上级和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随着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学校规模逐年扩大。到1992年，短短六年时间，五中艰苦创业，茁壮成长，现在校貌大大改观。占地面积由原来约40亩扩大到52亩。建

筑面积由原来 3,066 平方米增加到 8,300 平方米。其中 1988 年新盖综合楼一幢, 1,871 平方米。1991 年新盖六层教学大楼 2,369 平方米。学校有阶梯教室, 电化教学室, 微机室, 语言室, 英语打字室, 物理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 生物实验室, 图书室, 阅览室, 教工活动室等设施。还有足球和田径运动场。各种设备比较先进齐全。现在有三个年级 27 个班, 学生 1,400 人, 教职工增加到 108 人。

领导班子勤政廉洁, 以身作则, 从严治教, 从严治学。他们认真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贯彻以德育为首, 教学为主,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全体师生员工发挥“团结、拼搏、竞争、奉献”的五中精神, 同心同德, 共创柳铁和柳州市一流成绩。

德育方面: 在健全政教处、年级组、班主任三级政治教育网络的基础上, 认真抓好常规教育, 坚持执行“中学生行为规范”的量化考核及各项常规的检查评比。学校党支部, 共青团, 少先队积极开展“学雷锋, 学赖宁”和进行“两史一情”等教育活动, 学校已形成了“勤奋, 进取, 友爱, 守纪”的优良校风。1991 年全校学生 1,266 人, 其中文明学生 1,196 人, 占 94.4%; “三好”学生 288 人, 占 24.26%; 文明班级 26 个, 占 96.2%。

教学方面: 严格抓教学常规的检查落实, 重视发挥教研组, 备课组的群体智慧, 重视发挥中、老年教师的骨干作用, 并认真做好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学校 3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 37.5%, 学校领导不仅注意表扬其优点, 还针对青年教师不足之处, 通过建立党员责任区, 党员联系户, 使青年教师参加党课学习和政治学习。学校还常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使他们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增强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学校还认真抓业务培训, 请专家作教学辅导报告, 签订以老带新师徒帮教合同, 组织优质课评比, 激励青年教师钻研业务, 形成“严格, 认真, 创新, 求实”的优良教风。由于全体教师不断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对学生管教管导,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自觉性, 形成了“勤奋, 多思, 好学, 求进”的优良学风。

六年来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成绩斐然。至1992年，为国家培养了四届初中毕业生1,422人。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考会考，1989年、1990年、1991年均名列柳州市第一名。1991年，《柳州日报》头版报导了学校在中考会考中获“三连冠”的事迹。

学校领导平日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各年级体育锻炼达标，及格率为100%，达标率为95.2%。在1991年全局召开的中学生运动会，获三项第一，四项第二。第二课堂成果显著，经常开展多种学科兴趣小组活动。书画组多年来参加局中学书画比赛，获奖人数及名次均在全局各校之首。1991年在全区数学目标管理教学竞赛中获一等奖；在分局举办的学生查字典比赛中获团体第一名；在铁路局初中学生电算比赛中获团体第一名；在全国初中数学竞赛中，陈涛同学获广西赛区二等奖。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中，获两个三等奖。全区地学知识比赛初中组的一、二、三等奖均为该校所获。柳铁五中也被评为自治区地学教学先进单位。

校园景观也今非昔比，师生们自力更生对校园进行绿化美化。六年前校内到处是坑洼不平的烂泥地，1990年上级投资8万余元，学校设法填平土方二万多立方米的洼地，修建了排水沟，修建了绿草铺地面的足球和田径运动场。1991年筹资5万元，建成了组合假山喷水池、花圃，改建了校门。如今校园林荫叶茂，环境优美，创造了心旷神怡的教学环境。

勤工俭学方面：从无到有，白手起家。校领导早来晚归，寒暑假也很少休息，他们忙着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勤工俭学。既姓“教”，也姓“钱”。1988年5月参加铁路局召开的勤工俭学会议后，成立了学校勤工俭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建购销经营部。灵活利用学校三条优势：即校舍环境优势；学生家长社会关系优势；教职工智力优势，群策群力，勤劳守法致富。首先学校党政领导干部，深入柳铁地区40多个大小单位求援，获得33个单位慷慨捐资七万余元，动员组织师生拾旧砖头四万多块，自力更生，修建厂房两大间，门面九间，建筑面积共计350平方米。同时，采取一贷款，二合资，三引进技术

的方法，向柳州铁路分局教育服务公司贷款三万元，先后办起了印刷厂，食品厂，小卖部，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1991年勤工俭学综合收入达10万余元。用来改善办学条件，添置了25台英文打字机和绿化美学校环境，同时，师生员工的福利也随之有了较好的改善。

柳铁五中，经过了六年的艰苦创业，办学成绩显著，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家长、社会的赞誉。先后被评为柳州铁路分局，柳州铁路局，柳南区及柳州市文明学校。1989年、1990年、1991年连续三年荣获柳州市全面教育质量奖和柳州铁路局教育质量奖。学校党支部也被柳州铁路分局和柳州铁路局党委评为先进党支部。

民办鱼峰中学的建校经过

卢润民

创办鱼峰一中的经过

一九五六年，当时住在柳邕路的民革党员、原国军炮兵上校郭雍章和解放前新闻界人士赖文华、杨达佐、石××等合议，响应人民政府民间办教育的号召，呈报鱼峰区政府批准，在柳石辖区试办初中补习班，原计划招收考初中落榜的高小毕业生一个班，而报名求学者竟逾百人，由于教室不够只好挤在两个班内。上课地址在河南红光路何家巷，利用民办柳石小学教室夜间授课。补习班学费以当时的市民夜校同等收取，印发讲义也只收很低的纸张成本。上述四位教师乃半义务性质，无工资，只发很低的课时津贴；每晚上四节课，每周上课五个晚上。

由于补习班的四位教师文化程度较高，教学有方，该班办了不到两年，各期学生除部分因年龄大就业外，其余大都获得好成绩考入中学。

一九五七年，鱼峰区政府指示，在原补习班师资的基础上建立民办鱼峰第一中学，校长由民办柳石小学校长李彦兼任，校务由教导主任郭雍章实际负责，校址选在柳邕路老虎冲东边，原有的破旧建筑物连同空坪、荒地、水塘共占地约二千二百多平方。

校方原计划招收以柳石辖区内应届高小毕业失学的学生为主，办初中一年级新生两个班，比市内公办中学收学费略低，对贫困学生

酌情予以减免。后来实际上招收新生达二百名，突破编制。当时面临师资不足，校址内虽有房子但因住户不肯搬走而缺少教室。四位教师中有三位已年过花甲，他们仍甘愿辛劳也要让同学们都能读上书。经鱼峰区政府批准，对已招收的学生，暂编五个班，柳石小学设法挤出一个教室安置一个班，暂借柳石礼堂安置一个班，修理校址内三间原来破烂得不能住人的平房安置三个班。桌椅由区府动员河南片各学校捐献，对已破损的桌椅，师生们从家中拿来工具动手修理。学校安排每个班每天劳动两节课，师生挖土、踩浆、打泥砖，盖了四间教室。用于盖教室的木料和小青瓦的资金是向辖区内四个劳动队、四条街居民和学生家长自愿捐助得来的。当时还有几位懂建筑的家长到学校义务做泥瓦工、木工，协助大家将教室盖好。

一九五七年秋天，民办鱼峰第一中学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上课了。

开课初时，校长李彦精力仍放在柳石小学，不常来鱼峰一中，四位老师虽有具体分工，但勤杂、清洁以至木工、泥瓦工都一齐争着干。郭雍章虽体格较好，但亦年过半百，赖、杨、石三位均年逾花甲，且一向未搞过体力劳动，但他们在劳务中积极带头干，使学生们异常感动。教师们精打细算，紧缩开支，积极带领学生勤工俭学，为学校逐步添置了用具和教学设备。

该校学生学费全部上交鱼峰区政府，学校的财务由柳石小学统一管理。区政府定学校教师每月工资为三十元，教导主任为三十二元。而四位老师认为学校急需用钱，大家自愿减为二十八元。郭雍章教导主任兼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五个班的总课时他占四分之一，个别老师临时有特殊情况缺课时，他亦无偿代课。学校实际很多事务均由他主办，在工资上他和别的教师一样只领二十八元。

学校虽然上课了很久，但校区内的铁路家属及居民仍不肯迁出。郭老师向区政府求助，于是区府领导在劳动队上缴的公积金中拨款，派人和铁路方面联系，在城站路二级站附近建一栋平房，铁路家属才迁出校区。至此，整个校区才无闲杂住户人员。

创办鱼峰二中的经过

一九五八年，在家赋闲的原中学青年教师王守常、飞鹅路街道干部陈世光、黄埔军校校友、原国军辎重兵中校邓长江等三人，申报鱼峰区政府批准，筹建民办鱼峰第二中学。

先在谷埠路北段借用合山煤矿驻柳办事处半间铺面，陈、邓二人从自己家搬来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此开始招生。原计划招初中一年级新生两个班，由于当时失学少年较多，入学人数竟超过二百人，只好将原定两个班扩大为五个班。

学校的人事和师资：由鱼峰区委宣传部何××部长兼任校长，王守常任教导主任总理学校日常事务，陈世光、邓长江任教师，何秀娟为总务，鱼峰区推荐青年知识份子韦云勋来当教师，后来又报鱼峰区聘请了四位教师。

学校经费来源及财务管理：当时鱼峰区下辖五个街道办事处（后改称公社），各民办学校均在其辖区内自筹经费。鱼峰一中创办时已在柳石辖区内所属街道居民和劳动队队员中进行了办学募捐活动。鱼峰二中也在柳石辖区内，创办时就不能再在本辖区搞募捐活动了。因此二中的办学经费比一中更困难。邓长江等人考虑到民办中学要自力更生，政府概不拨款，即建议校方报鱼峰区政府批准，二中按公办中学学生收费标准收费，若尚有不足则搞些适当的勤工俭学活动，组织师生轮流到火车货运站做些轻易的装卸劳动，这一活动使师生们既锻炼了身体，加强了互助团结，又为学校增加了经费。这个活动一直到后来的曙光中学仍然继续坚持。

学生学费及其他收入全部上交鱼峰区，学校用钱由会计领取；教师每月报酬三十元伍角。

鱼峰二中开办时的教室是在柳州河南五里卡冷冻厂旁边，借用建筑公司冷冻厂工地完工后待拆的几间茅草盖的堆料工棚，并借用工程剩余的砖块、片石、木板来搭砌桌子或坐凳。不久建筑公司拆工棚，

学校搬到张公岭公路南边航空站解放军暂闲置的几间红砖房，那里房子又宽又亮，可是师生们到这里要步行七公里，遇到刮风下雨对体弱的师生实是苦不堪言。即使这样全体师生也毫无怨言。但好景不长，驻军部队到了，学校又要搬走。经过多方找寻联系又将学校搬到民办乐群小学（现在的马鞍山小学）借其空余教室和堆放杂物的破屋来上课。当新的学年到来时，小学招收学生满额了，已无空余教室，鱼峰二中只好又“孟母三迁”了。这时学校的创建人之一陈世光已另有高就而离开了学校。学校从乐群小学搬出来，借用柳石公社礼堂当教室，但礼堂是当时公社的活动场所，根本不能给二中长期当教室用，只好向慈小（现柳邕一小）借用该校礼堂上课，到此时鱼峰二中已是五易校址。

鱼峰二中开办两年来，完全没有政府资助，靠全体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每迁移一次校址，鱼峰区都派人到校察看。尤其是在张公岭上课时恰遇那天下雨，市、区文教部门派人到校视察，随便抽查了一个班，拿该班学生名册在课堂点名，该班四十五人一个不少，提问学生时，见到教学质量并不比那些安定的公办中学差，视察人一致认为这所民办中学难不倒，拖不垮，无不为之钦佩！邓长江老师文化水平高，态度和霭，授课深受学生欢迎，带领学生去劳动更是关前顾后像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是任劳任怨为学校几次搬迁找寻教室出力，深受全体师生爱戴。

市、区文教部门于一九六〇年决定将鱼峰二中合并鱼峰一中，正式定名为柳州市民办鱼峰中学。合并时尚余一百六十多人，加上鱼峰一中原有学生共编为八个完整的班。

鱼峰中学成立后

鱼峰中学成立后，发扬、保持原来一中的自力更生精神和二中的勤工俭学作风，挖土、踩浆、打泥砖到火车站装卸劳动又加盖了四间教室，师生们用劳动时间去火车站去装卸货物，为学校置办教学设

备增添了经费。全校师生勤奋向上，学校出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六十年代初期，鱼峰区调柳东某小学校长来主持鱼峰中学校政，原鱼峰一、二中艰苦办学且教学有方的优秀教师，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均被迫先后离去。

一九六六年底，文革开始，红卫兵以破“四旧”为由强行将鱼峰中学改名曙光中学，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市教育局正式将曙光中学定名为柳州市第十八中学。

柳州史事拾零（续上辑）

铁音

三、雍正干预选任马平令

清雍正元年（1723年），发生过一起皇帝对马平县令人选予以干预的事。事情的缘起，由广西巡抚孔毓珣于当年七月十六日的一份请示：“窃惟马平县为柳州府首邑，僮多民少，兼之提督驻劄，兵民聚集，必需能员料理。查现任马平令侯靖，书生初任，谨飭有余，而才具不足。臣在柳州访之舆论，俱云前任马平县知县章曾印在任时办理地方颇称安妥。查章令系康熙六十一年护抚臣王沛愷题准终养在案。臣闻章令之母尚在强健，章令因马平地方淡薄而难治，恐其有累，故到任未久，随告终养。而章令任内有督臣杨琳委销帑盐尚未销完，现今尚留粤西，臣思其才既与地方相宜，未便任其避难而去。可否令章曾印仍任马平县事，以资料理？其现任马平侯靖，或令其赴部另补，或令其留粤，俟有简僻小县缺出，容臣题请补用。伏祈皇上批示遵行。”对此，皇帝的批示是：“侯靖如尚属可用，留粤题补。若实系平常，令其赴部，将章曾印具本题补可也。”（见《雍正朝硃批谕旨》）

此事证之《柳州县志》、《柳州府志》、可知章曾印[按：《县志》作章会印，错]为浙江会稽贡生，康熙六十年任马平知县；侯靖为山东堂邑人，进士，雍正元年任马平知县（见《柳州府志》卷21、《柳州县志》卷6）章任官头尾不到两年，而侯任官才数月就被上司认为无能。不过，后来选任马平知县的也不是章，而是一位杨姓进士，雍

正三年任，这已是皇帝批示后两年的事。

此事说明了几个问题：其一是雍正皇帝的高度集权。这一点，诸多史学家有同一认识，在此是多一例证。你看，小小一个马平县令的任命，他都要干预，并批示得如此具体。其二是清初的任官还是以才具为主的。侯靖因谨饬有余而才具不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办事缺乏开拓精神，能力又不够，尽管出身进士，仍有被降级的危险，而章曾印仅为贡生，但“办理地方颇称安妥”，“其才与地方相宜”就可重用。当然，这里所说的“才具”是指封建统治术，是有阶级性的。其三是马平县当年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以至能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同时也是个地僻民穷之地，难于治理，以至无人愿来此任官，如是“肥缺”章某也不会借故溜了。

四、清初柳州并非乐土

据《柳州府志》卷39记事，给人的印象是自清康熙晚年至雍正初年，封建王朝对柳州府真是恩宠有加，又是免税、又是赈民、又是助耕，又是劝垦。绝无刀光血影之事。其实这是粉饰太平。从当时地方官对皇帝的上奏就可知当时阶级及民族矛盾的尖锐，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反抗镇压的残酷。

请看《雍正朝硃批谕旨》中雍正元年七月廿九日广西巡抚孔毓珣的上奏：“为奏明剿除凶僮事。窃查柳州府属雒容县地方之东塘村僮贼莫贵凤者，兄弟子侄及族姓人等共居一村，恃强劫夺，不法多端。相近之马平、柳城、永福等县良民每受其害。地方官差役拘质，竟抗拒不服。臣署理提督印务到柳，查东塘村距柳州府城仅八十里，岂容凶僮逞强、肆行扰害，若不急为擒拿，良民受害愈深。因即委右江道万际璋、中军参将蔡成贵带领官兵六百名，乡勇二百名，于七月十五日到东塘村攻围剿捕，当场杀死僮贼二十五人，活擒莫贵凤等一十八人。毁其村寨而还。臣随讯明各供，尚有余党逃脱未尽，就获者不即正法无以威服群僮。臣于七月廿日恭请王命旗牌供奉，将莫贵凤等押

赴市曹处斩示众……再僮人肆恶、劫夺拒捕、总因历年姑息太过，以至养成党羽，尚有数处鸱张无忌者，臣当仰体皇体，剴切晓谕，如仍不悛，在柳庆等府者，臣即令商提臣发兵擒处、如地近桂林者，臣即遣臣标官兵擒处、庶僮人不敢为匪、良民得安生矣……。”另，孔子于当年十二月廿六日又奏道：“窃查柳州府属来宾县新旧、王二、白藤三村居近江滨，僮贼覃扶成等，纡众驾船于江上行劫。当据客民白际和等控告，来宾县差拘，诬凶僮恃险放枪，不服拘唤。该县详请拨兵擒拿、臣随咨会提臣韩良辅，委梧州副将蔡成贵带兵前往。臣又委右江道万际璋协同擒拿……先后拿获僮贼共六十三名……请将为首之覃扶成、韦道奉等八名各俱照苗民白昼抢夺、聚众不及五十人、亦无杀死人命例，各枷号两个月、责四十板；为从之李妙庆等三十三名各枷号一个月，责三十板。仍于各犯名下追赃给主。其李念通等三十二名审无抢劫情事，先行省释。更有请者，僮民赋性凶恶，恐枷责满日，放回本地未必俱能改恶从善，请将覃扶成等一併儉妻分发粤西各州县收管……。”

以上为地方官反映给皇帝的情况，雍正初年至乾隆中期不过数十年事，《柳州府志》编纂者即使无法得阅奏报原文，采访地方老者未有不详知的，然而《府志》却不见录，可见是有意隐瞒，于此亦可证封建时代所修方志事实上存在差错的一面。

南明永历朝柳州史事纪略

刘汉忠

按：南明永历朝时期，永历皇帝两度莅柳，一时，“瑶壮杂处，地瘠民贫”（瞿式耜语）之龙城，成为皇帝之行在所。龙城又在这一时期数度易手于南明朝与清廷间，成为争夺之战略要地。故欲见当时之社会势态，则以考永历君臣至柳活动及军事攻夺柳州为大要。《柳州府志·纪事》以编年记当时史事，然简略。今从南明野史及有关史书中钩稽相关者，辑采编次为此文。

1646年 南明隆武二年 清顺治三年

十月十四日，南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奉原明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监国。

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于肇庆称皇帝，改元永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1647年 南明永历元年 清顺治四年

二月二十六日，广西平乐陷，守将陈邦傅走柳州，清兵乘胜直上。据《所知录》载：陈邦傅，字霖环，浙江绍兴人，历官分守柳庆参将。隆武元年（1645年）杨国威挟靖江庶人反，招邦傅，未赴。丁魁楚檄邦傅讨贼，邦傅揣国威无成，守柳州不为下。据《永历实录》。

春，清兵一从平乐上漓江，窥桂林。一从浔州略左右两江郡县，窥柳。柳距浔三百里，叛将李明忠据浔以瞰柳，柳州知府及推官托病去，分守副使遁去。独同知王奕昌与马平令守城。招降武官狼目廖文登等截劫清兵舟船，沉之断藤、勒马间。思恩侯乘胜复浔州，明忠宵遁，柳乃固，而桂亦得安堵。据《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王奕昌墓志》。

又据《所知录》：焦琏于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阳朔，下平乐。叛将李明忠据浔以瞰柳，闻之宵遁。陈邦傅亦由宾州、柳州出，复浔州，次复梧州，全粤初定。

是年六月初一，何腾蛟朝见永历帝于武冈州。据《清史编年》。刘承胤挟旧隙欲夺腾蛟兵柄，矫旨召腾蛟入直，腾蛟因请出，收兵图恢复。永历意亦欲遣之，承胤乃谋解其部曲困之，令无所往。而滇师胡一青、赵印选悉承胤，愿为腾蛟效死，遂从腾蛟自古泥至柳州，转收周金汤、熊兆佑、马养麟军于广西。据《永历实录》。

刘湘客被斥，避兵居柳州。刘湘客字客生，别号端星，陕西富平人，永历朝翰林院编修。被刘承胤参奏落职，后刘承胤降清，永历奔柳州，乃复湘客职，敕往桂协赞留守军务。据《永历实录》

十月初一戊辰，南明永历帝至柳州，据《清史编年》。先是永历帝在武冈，清孔有德攻武冈，永历出奔靖州，武冈陷，永历由靖奔柳。道出古泥，总兵侯性、司礼监庞天寿率舟师五千迎驾，会天雨泥淖，乘舆、服御沿途散失，宫婢，内竖皆狼籍雨中，饥困不能兴。据《所知录·永历纪年》。

九月，桂王（永历帝）驻柳州，总督何腾蛟，南安侯郝永忠，宜章伯卢鼎各以兵至，分汛防御，行在以安。据《甲申朝事小纪·桂王佚事摘记》。何腾蛟以滇兵入卫。据《清史编年》。

此行或伴驾，或奔赴行在者，计有：

吴贞毓，字元声，直隶宜兴人，随永历帝于武冈，……（永历）南奔柳州，贞毓达行在，遽自太常寺少卿擢吏部右侍郎，以冢宰自期。据《永历实录》本传。

侯性，河南归德人，永历自武冈奔靖州，性与车驾相失，先由新宁至柳。于右江劫行旅，得金帛数万。永历帝至柳，服御皆匱。性以其所劫献慈圣、慈宁两宫，上及中宫，充服御。三宫大喜，加性太子太师、左都督，掌中军都督府事。……后梧州陷，降清。据《永历实录·佞幸列传》。

王坤，顺天大兴人，为御马太监，武冈陷，永历常奔柳州，坤

得复入，与庞天寿分掌监事，然权稍落。先是，刘承胤首论坤弃权误国，罢坤秉笔，以监事授庞天寿。坤被遣，出居柳州。据《永历实录·宦者列传》。

庞天寿，顺天人。刘承胤逐王坤，天寿掌文书房事，随上自武冈走柳州，蒙尘苗峒中，天寿与马吉翔皆有劳勩，由是益为上所亲信。据《永历实录·宦者列传》。

马吉翔，顺天大兴人，武冈陷，永历自靖州走苗峒，出柳州，两宫泊车驾蒙尘草莽。永历不能骑，吉翔奉篮筥（按，竹轿）步从，扶掖行羊肠。永历在柳、象，敕旨皆出吉翔手。据《永历实录·佞幸列传》。

严起恒，字震生，浙江山阴人，崇祯辛未进士，永历帝驻武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上走靖州不及从，已知驻柳州，即间道驰往。寻还蹕桂林，复走柳州，走南宁，俱间关相从。据《小腆纪传》本传。严起恒从万屯来会。据《行在阳秋》。

瞿式耜檄迎何腾蛟于柳州，腾蛟以胡一青、赵印选之兵至，攻复全州。据《永历实录》本传。

十月初十日丁丑，广西土司覃鸣珂与南明分巡左江道龙文明相仇杀，攻陷柳州，永历帝仓卒南走，抵象州。据《清史编年》。覃鸣珂，副将覃遇春之子。初，遇春从何腾蛟于楚，溃归，入桂林，陈兵索饷，腾蛟、（瞿）式耜俱恶之。比至柳，龙文明承督府密檄，佯与遇春饮，解散其部曲，执遇春送桂林诛之。永历至古泥潭，覃鸣珂诉冤，从行者仓皇，未详其始末，遂以不知对。鸣珂率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府城大掠，矢及永历舟中。据《野史无文·永历皇帝本纪》，又《南明野史》。

十二月初三日，永历帝复还桂林。据《鹿樵纪闻》《行在阳秋》。

1648年 永历二年 清顺治五年

二月，孔友德攻全州，郝永忠溃走，大掠桂林，永历出奔柳州，遂入南宁。据《永历实录》。时永历惊恐欲逃柳州转南宁，瞿式耜曰：“若以走为上策，桂危柳不危乎？今日至桂，明日不可至南（宁）、

太(平)乎?”反复苦谏,永历曰:“卿不过欲死社稷耳。”二十二日晨,瞿欲进御用银而永历已逃之夭夭。据《乐明闻见录》。

五月二十七日,降清之原刘承胤部将陈友龙于武岗州叛清归明,将出长沙,七月何腾蛟以私憾嗾郝永忠攻之。据《永历实录》。明郝永忠方屯柳州,何腾蛟使谓永忠曰:“诸将出楚,皆立大功,将军独深壁柳州,将为诸将笑。为将军计,唯有靖(州)、武(冈)一路可出耳。永忠军方困于食,得腾蛟报大喜,即卷甲趋古泥。贻书陈友龙,言假道自黎平西出黔境,往复辰州。友龙不为备。郝永忠借道驰袭友龙于武冈,乃称奉督师令讨友龙。友龙兵不得集,遂溃败。友龙挟一矛冲重围走,三日夜不得食,乃达柳州疏讼冤。朝廷果以腾蛟故置不问。据《永历实录》之金王李陈列传。时是在年十一月。七月郝永忠往靖州时,所过残破,人民逃匿,柳城民避落崖岩内,永忠兵纵火薰之,死者一千零八人。据《柳州府志·纪事》。

是年浔、柳二府为陈邦傅所据,不贡赋税,资用乏绝。据《南明野史》。

1649年 永历三年 顺治六年

四月,清军败忠贞营于柳州。据《南明野史》。

九月初九日,监军毛寿登赴楚,途经柳、庆,为陈邦傅标下曾海虎劫掠一空。据《所知录》、《永历纪年》。

1650年 永历四年 顺治七年

十一月,孔友德攻榕江急,胡一青方拒战间,赵印选遽撤诸军,护其妻走柳州。胡一青惊遽,乃弃垒去,桂林陷。据《永历实录》。胡一青,临安人,赵印选,其中表兄弟。

1651年 永历五年 顺治八年

闰二月二十六日,清军攻陷柳州。据《行在阳秋》。《柳州府志·纪事》作“春正月,定南王孔有德遣总兵线国安率大兵入柳州。”

八月十五日,定南王孔有德疏报:“总兵线国安、马蛟麟攻克柳州、梧州二府并所属十二州县。据《清世祖实录》。

《国寿录》云是年十月“孔有德以兵破柳州,赵仲先、胡一清

弃城走。”《柳州府志·纪事》云“十月，定南王至柳州阅兵。”

1652年 永历六年 顺治九年

二月，定南王孔有德自广西以七百骑出河池州进入贵州。清遣大兵驻柳州接应。据《野史无文》及《南疆绎史》。《小腆纪传》作“有德分重兵驻柳州。”

八月，李定国于广西招南明兵部尚书刘远生等参赞军务，时南明残部胡一青、赵印选、马宝、曹志建等尚留广西，屯聚山谷，闻讯相率来会，民间亦多啸众响应。李定国等迅速占柳州，下梧州，收复广西全境。据《清史编年》。《柳州府志·纪事》作：“七月，伪晋王李定国遣其将杨割鼻攻陷柳州。”

十一月二十八日，桂平义军由柳州撤离。据尚可喜、耿精忠为农民军撤出桂林等地揭帖。

是年六月，孔有德题广西清军缺饷乏粮急请救接事：粤西夙称瘠壤，逐年凋残至极，时地方初碎，附近省会数府八、九两年之粮，催征告竣。余南（宁）、思（恩）、柳（州）、庆（远）各郡，尚不足以供驻防之兵。据《明清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

1653年 永历七年 顺治十年

四月，安西王李定国败于肇庆，退驻柳州。据《行在阳秋》。

八月，孙可望闻李定国驻兵柳州，命冯双礼统兵三万袭之，定国闻可望兵至，烧粮而走。双礼谓定国怯，率兵追之，定国回兵奋击，双礼大败而回。据《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是时，李定国得龚铨密报，知冯双礼等追兵将至，即遣精兵伏柳州江口芦荻中，俟双礼过迁江、来宾二邑，方逆之。双礼败回，伏发，一军皆陷，悉投江中。定国纵冯双礼。关有才还，易旗帜以诛逆为名，称师柳州，声言东下。据《南明野史》。

九月，永历遣主事林青阳、孔目周官由间道趋柳州，十月林青阳等至柳州，定国率部郊迎，受读感激，泣数行下，军中皆流涕，遇青阳等有加礼焉。据《南明野史》。

又，九月，李定国率兵至柳，与民分田而耕，为久屯计，派征浮粮，

又拆屋为桥，一夕，忽焚桥走。据《柳州府志·纪事》。

1654年 永历八年 顺治十一年

二月二十日，清廷敕谕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逆贼李定国见距柳州，狡图窥视，伏莽尚繁，亟需剿抚。特命靖南王耿继茂带领本标官兵及随征绿旗官兵，前赴广西桂林驻扎，续即发马五百匹，以资驰剿。”据《世祖实录》。

孙可望遣将领兵由靖州至柳州迫攻李定国，经过县邑，抢掠一空。据《柳州府志·纪事》。

1656年 永历十年 顺治十三年

七月，义宁伯龙韬驻柳州。据《行在阳秋》。

七月初二日，广西巡抚于时跃奏报“官兵擒斩贼渠伪义宁伯龙韬。”据《世祖实录》。

1657年 永历十一年 顺治十四年

九月，清右翼镇总兵官全节镇柳州，招来逃散，乃作民居，始有宁宇。据《柳州府志·纪事》。

1661年 永历十五年 顺治十八年

十二月，缅人执永历帝献于吴三桂军前。次年四月，永历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

廉父贤母育良臣

龙城柳

明代柳州八贤之一的张翀，因勇斗权奸严嵩而闻名于朝野。他嫉恶如仇的性格与刚烈气质的形成，是与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

张翀的父亲张全是个穷书生，贫而好学，寒冬盛夏亦手不释卷，中举后任广东廉州府训导这样一个掌管当地生员学习事务的小官。张全不顾官积卑微，以培养后学为己任。他鼓励当地有志者刻苦学习，并为之出灯烛费。有人认为他本来俸禄就不多，这样做未免太傻了，张全答道：“若能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来，本人贫苦也没有怨言。”他这种安贫乐道，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质，深深感染了张翀，为他日后的忠君爱国打下了思想基础。

张全不久病逝，抚养及教育张翀兄弟的重担就落在其母李氏的肩上。张母从小知书达礼，于今孀居，甘守清贫，亲为教导，常以忠孝大节勉励他们，并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严加督责。在她的教导下，张翀兄弟日后皆成才。张母还是个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的人。当听到张翀于嘉靖37年因上疏弹劾严嵩获罪时，她慨然说：“我的儿子成长了。”不久，张翀被贬到贵州都匀，向她辞行时，母子见面，不说其他，惟勉励张翀不要改变自己的志向。后来张翀在都匀不但没有消沉，反而以振兴当地文教为己任，设坛讲课，潜心治学，深得那里人士的赞誉。这些都与他父亲表率在前，母亲鼓励在后分不开的。九年后，张翀复起，有人向张母庆贺，她答道：“惭愧的是他没有什么可以报效朝廷的”。

张母为人既有原则性也有人情味，当张翀以刑部左侍郎退休归家时，家里发生了这样一件戏剧性的事：他的一位仆人仗势骚扰墟市，败坏了张翀的名声。张翀为挽回影响，要处死这位仆人。张母劝道：仆人的确有错，但考虑到他从患难时相随到今，还是与人为善，从轻发落吧。张翀盛怒之下，置母亲的再三劝说于不顾。这时张母也来了气，顺手操起拐杖要打张翀。张翀中是个孝子，见状急忙下跪请母亲息怒，愿听从她的意见。于是，给了一些生活用具把仆人打发走了。不久其母病逝，张翀筑室守墓三年，乡人十分敬其孝心，有不少人也陪他住在一起。久而久之，居然形成了一个村，人们把这个村叫作孝兴村。

到过柳州的唐朝僧人浩初

金石生

《柳宗元集》中有两首诗一篇文与僧人浩初有关。一诗题为“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一诗题为“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一文则题为“送僧浩初序”。这浩初是何许人？柳宗元与他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原来浩初是当时长沙龙安寺禅师如海的徒弟。这如海在湖湘一带以精通佛理而出名，著有《安禅通明论》。当时在湖南的几位官员包括柳宗元的岳父杨凭在内，也拜在他座下作俗家弟子。如海于元和三年以81岁高龄圆寂，时柳宗元在永州。由于柳宗元、杨凭、如海之间的关系，于是作为如海徒弟的浩初便请柳为其师撰写碑志，这就是柳集中的“龙安海禅师碑”一文，此乃柳宗元、浩初相交之始。第二年杨凭被贬为临贺尉，其侄随行，不幸夭亡于彼，浩初亲到临贺对杨慰问，并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才北归。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柳州，浩初闻讯，立即赶到柳州会见老友。浩初的到来，激起了柳的思乡怀友之情，于是遂有与浩初同登山寄念之作。浩初临走，柳还将诗作用章草书写送给他。诗写得情真意切，尤其是“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一首，被后人认为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而收入各家选本。

柳宗元与浩初友善，不仅仅因为他是个佛教徒，与柳在思想深处有共鸣的地方，还由于浩初能“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见柳集“送僧浩初序”）即兴趣爱好也与柳相同。柳后把浩初介绍给刘禹锡，这两人也成了知

音。刘禹锡曾在“海阳湖别浩初师引”，一文中记浩初“为诗颇清，而弈棋至第三品”他与浩初有“共载于湖上，弈于树石间”之乐。据北宋成书的《棋经十三篇》记，唐宋时人把棋艺水平高下共分九品，浩初的棋艺能达到第三品，可算高手了。浩初的诗在《全唐诗》中无载，想是其人不羈，随写随散，以至没有留传下来。他在现代人编的《佛学人名大辞典》中也无传，幸好柳宗元在其集子中保存下他的某些行状，使我们得以对这位到过柳州的唐代僧人有一定了解。

记解放前的桂柳航空客机

陈显达

解放前桂柳线航空班机，是在抗战胜利后，由美国派遣的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组织的航空公司办理的。航空站设在桂柳路口。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解放军进逼武汉三镇之际，当时我在柳江二中（今市一中）任职代理校长，忽然接到广西省教育厅电报，限期到桂林出席全省中学校长会议。为了赶上会议时间，我只得乘坐桂柳班机前往赴会，同行的有因回家省亲的我的家属。航空售票站有汽车送乘客到机场。

只见客机是由小型军用运输机改装的，机身为草绿色，机舱内沿机身分左右两行设座位可容纳约五十人。机上无空中小姐招待，也没有饮料供应。由柳州到桂林的票价每张光洋八元，比火车头等票价贵一倍左右。

飞机起飞后，环绕柳州上空盘旋一周，乘客可从飞机窗孔俯瞰鹅山柳水风光，然后直飞桂林。只三十分钟，即达桂林机场。可是令人感慨的是，在桂林机场，军警联合检查站的繁琐检查，迄至乘车进入桂林市区，竟花费了两个钟头之久，是桂柳航行时间的四倍。

象州曾改名“相州”

梁始菊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当时任大成国平靖王、陆路总营的李文茂，率“红巾军”溯柳江而上，克武宣，占石龙。攻象州时，一连攻打数日不克。后来利用在象州衙内当差的钱四（尹家圩村人）作内应，才攻占象州。并委派梁森为象州知州事，改象州为“相州”。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李文茂攻克柳州，在柳州建靖王府。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清按察使，湘军统领蒋益澧攻陷柳州。李文茂退至融县，梁森便退出相州。七月，蒋益澧移师贺县，镇压陈金刚起义军。李文茂再挥师分水陆两军并进，又攻克象州。咸丰九年（1859年）李文茂因攻柳州不克，身有伤迹，忧郁成积，吐血身亡。一说在宜山山中病故，一说在怀远（今三江）山中吐血身亡。详细地未知何处。同年，石达开率十余万精锐从当时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出走，游击南方各省。他以万余人由修仁至大乐，万余人由永安（今蒙山）翻山走庙王，万余人由中渡走鹿寨至运江。到象州城会合梁森。全城军民热烈欢迎。曾留下一首民谣：

太平天军要进城，百姓舞狮耍龙灯。
人山人海排成队，大开城门来相迎。
天军驻在象州街，百姓家家乐开怀。
争向天军问寒暖，胜比亲朋远方来。

[补白]

打烂水桶不敢回

旧时，柳州没有自来水。居民吃水用水，全靠人力从柳江河挑上来。当时，柳江边码头又陡又窄，柳南辖区内的码头更是如此。如遇天阴下雨，上下码头更易滑跌，挑水的人滑跌打烂水桶之事更是家常便饭，故民间流传一首歌谣：

妹呀妹，
打烂水桶不敢回；
一怕家婆大声骂；
二怕老公把我捶！

(汀汀)

柳州人民生活今昔

据民国22年（1933年）《广西各县概况》所述柳州人民生活状况称：县属大同、中道两区附城地方程度最高，每人年需七、八十元（银毫），维新区（以上三区均郊区，现柳江县辖）次之，每人每年需五、六十元。食则一粥一饭，佐以杂粮。雍和（市区及近郊）及近大同之一部多荒旱、生活最苦……食则稀粥或杂粮，除年节外，少食肉者。

再看看今日柳州人民生活，真有天壤之别！

(何人)

解放前侨家巷的归侨

文笔路中段有一条小巷，名叫侨家巷（现侨家一巷）。解放前，这条小巷住的人家多为东南亚的侨胞，他们多是为逃避日军的侵占，指望有个太平日子而回国居住的。

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境遇却是十分悲惨的。据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日（1946年），柳州华侨协进会办的《业务旬报》披露：“别的不必谈，光拿‘侨家巷’来说，目前一百四十多人中，便有十分之二在病，百分之百在挨饿了。在那里，我们整日整月听见呻吟哀号。今天，两周前领到的十市斤赈济米，早已吃完了。医病的药品没有，请医生的钱也没有。冷天快来了，衣服更没有，你想能够不死么？‘侨家巷’以外的归侨们也都差不多，可以说，死神的手，已经扼着每一个归侨的咽喉！”

（柳人）

旧时辖区的交通要道

清朝乾隆年间，柳南辖区内有一条驿道（官道），是官府传递文印信息的“官马大道”。它由旧时窑埠经水南、对河圩、鱼峰山脚，穿过辖区云头岭和五里卡，通往迁江、宾州等南方地区。故此，云头岭至五里卡一带，为辖区旧时的交通要道。

（南人）

沉重的代价

湘桂铁路于1937年9月兴建，1941年9月通车到来宾。黔桂线兴建于1939年9月至1944年3月，通车至贵州清泰坡，两线通车后，由柳州城站（今东站）举办联运。修筑两线路时，两年之内集中民工二百万。当时国民党政府征调原则是：由各工管处查照所需工额及时间长短，按路线附近各县壮丁多少为比例，近者，按壮丁总数50%——80%，远者，征调15%——50%，令各县县长征调组织至指定地段参加施工。由于当时劳动强度大、营养差、居住条件恶劣和医疗设备不足，致使施工壮丁健康状况恶化，伤亡事故不断发生，总共死亡员工2,943人。广西人民为修筑两线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何人）

柳州何时看电影

柳州何时看电影，众说不一。

据《两广官报》第六期（宣统三年六月十八日发行，即公元1911年4月16日发行，官报由两广总督署编辑，总编辑为督院参事员孔昭燊）刊载：曾有希腊人哈衣巴罢偕其妻阿沙夜等“在柳放电影”。后因希腊当时与清没有外交关系，哈衣巴罢及其妻阿沙夜被递解出境。

据此，柳州有电影，最早当在1911年间。

（汀汀）

暗河

华丰湾有一条地下暗河，水可通至鱼峰山下小龙潭。每逢柳江河水上涨，小龙潭水亦涨。为了探其究竟，有人在柳江河水上涨时，将谷壳放入小龙潭中，水退后，见谷壳从华丰湾暗河出口处漂出来。是否，待考。

（杨再荣）

柳江鱼类

据《柳州县志·物产》中载：柳江产鲤鱼、鲫、鲮、荷叶鱼、鲈、鳙、鳊、鳙、鲢等三十多种鱼类。时至今日，由于滥捕乱杀，柳江中不少鱼类已绝迹。滥捕乱杀的方法有：电枪电鱼、农药毒鱼、炸药炸鱼等。

另据1985年统计：全市排放废水量约有21,471.2万吨，其中生活废水约3,497.5176万吨；工业废水约17,973.687万吨，每年由工业废水中排放的汞、镉、铬、砷、铅、酚和氰等类有毒物质共约185.1725吨。这些有毒物质给柳江中鱼类的生存繁殖造成巨大损坏，因而柳江鱼类产量急剧下降。1979年3月正值鱼类繁殖季节，水上公社组织干部，渔民20人出动机帆船一艘，渔船四艘，光头小艇二只，大围网一副（20公尺长，4公尺宽）沿江捕捞至柳城凤山，再由凤山打捞回柳，前后四天四夜，下网二十多次，只捕得鲜鱼20市斤。

（柳人）

哭 嫁

封建社会时，柳州民间嫁女，流行“哭嫁”婚俗。新娘出嫁时，哭得死去活来，悲悲切切之声，远近相闻。这一来，表现姑娘对家庭留恋之情，二来反映姑娘对嫁后前途之担忧。当时有首民谣唱道：“亲娘生妹一朵花，媒婆挑唆嫁人家；不知老公是好丑，不知跛脚眼睛瞎。”

封建婚姻，不知害了多少年轻妇女。

（柳人）

柳南文史

第五辑

柳南人民公社组织沿革

李燕珍

一、历史沿革

1955年7月28日，柳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为加强城市的居民工作，密切市人民委员会和居民的联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在2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一般不设区的指示与《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的决定，在全市建立12个街道办事处，作为市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负责管理有关居民事务。

柳南街道办事处就是当年全市建立的12个街道办事处之一，并于1955年11月5日正式办公，办公地址在谷埠街。市委任命沈长林为办事处主任，负责办事处全面工作。吴才瑶为第二主任，喻考君、陈耀威和吴雏龙为办事员。1958年1月，沈长林调走，市委调任肖明远为办事处第一主任。柳南街道办事处管辖谷埠上街、谷埠下街、谷埠东一巷、西闸巷、飞鹅一街、飞鹅二街、飞鹅三街和河南搬运新村等8个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辖区内优抚、救济、劳动就业、婚姻登记、民族事务、调解、妇女、职工家属、宣传、夜校、民校和卫生等工作。

1958年9月2日，在大跃进和全国人民公社化热潮的推动下，中共柳州市街道办事处党总支召开全体办事处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和布置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根据全市的地区行政区划情况，原则上一个办事处成立一个公社，实行处社合一，即街道办事处与公社合在一起，居委会与生产大队合在一起。4日晚，柳南办事处负责人对群众进行动员，5日，正式成立柳南人民公社。建立人民公社是在党支部

的绝对领导下进行各种工作的。在公社里面，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社委会设有职能机构，分为工业交通、民兵武装、文教卫生、财粮、劳动组织调配和妇女六个部。柳南人民公社成立后，仍管辖原街道办事处 的 8 个居民委员会。市委对原办事处的干部进行了调整，朱元爱（女）任柳南公社党支部书记兼公社主任，梁静霞任副社长，刘志芳任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覃华任劳动调配部部长，朱永志任工业部部长，冯素华任妇女部部长，廖桂珍任卫生部部长，吴一元任劳动部干部，骆志刚任卫生部干部，段殷泉任工业部干事，陈开卓任武装干事，李桂兰任会计，林毓任会计，曾珍莲任出纳。

1959 年，公社干部再次进行调整，曾秀群任社长，刘志芳任联社支部书记，梁静霞任联社出纳，覃华任劳动中队长，朱永志任劳动中队长，冯素华任谷埠上街主任，廖桂珍任东一街主任，吴一元任联社会计，骆志刚调竹器厂工作，段殷泉任西闸街主任，陈开卓任飞二街小队长，李桂兰任飞三食堂会计，林毓调飞一劳动生产队，曾珍莲任谷埠下街主任。柳南人民公社建立后，积极组织和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大办街道工业，大办钢铁（当时，整个鱼峰人民公社共炼出了 5 吨钢），大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卫生所和小学等集体福利事业，为后来创办街道集体企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0 年 4 月，鱼峰区公所改名鱼峰人民公社，柳南公社与全市 10 个公社同时改为分社，隶属鱼峰公社管辖。柳南公社领导再次进行了调整，张绍武任分社党支部书记，梁天保任分社主任，李新任分社副主任。1961 年 6 月，市委组织部对柳南分社干部进行调整，史明志任分社主任，张绍武任支部副书记，梁天保任分社副主任，冯伟文任秘书，颜英豪任党组委，刘志芳任党宣委，李景辉任青年委员，陈品俊任妇女委员，杨燕颐任民政委员，莫骄任劳动工资委员，周炳南任财贸委员，黄怀基任总务。

1962 年 1 月，根据市委关于调整街道组织形式的通知，柳南分社改为柳南人民公社并恢复柳南街道办事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市委对办事处部分干部进行了调整和分工：史明志任公社主任，张绍武

任支部副书记，张柏全管宣传，李景辉管青年武装，杨燕颐管民政，莫骄管劳动，周炳南管财贸。1963年，柳南街道办事处干部再次调整分工为：史明志为办事处主任，胥宗威为副主任，张绍武为副书记，张柏全为宣委，李景辉为青年干事，杨燕颐、林云为民政干事，莫骄为劳动调配干事，王瑛为妇女干事，吴清为文教干事。1964年至1965年，除个别干部调动外，变动不大。

1966年7月，鱼峰区委任陈超荣为柳南办事处党支部书记。不久，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办事处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机构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968年下半年，在全国“革命委员会好”的欢呼声中，柳南街道办事处酝酿成立革命委员会，并将柳南街道办事处改名为红光街道办事处。经市革委批准，红光街道办事处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陈超荣、刘志忠、张华珍、黄桂英、林德和潘海兰等同志组成红光街道办事处革委会，陈超荣任主任，刘志忠任副主任。办事处革委会同时行使党、政职权。

1970年至1971年，为加强对办事处工作的领导，鱼峰区革委会对红光街道办事处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先后任命一批正区级以上干部担任办事处主任或副主任。他们是王秀亭（正县）、孙连亭（正县）、杨玉龄（正区）等。1972年8月，红光街道办事处改名为柳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孙连亭任公社革委主任，谢卓权（副县）、罗文忠任副主任，成员有：吴一元、潘海兰、黄挂英、林德、张华珍。公社内部职能机构也日臻完善，至1979年9月，公社设有办公室、生产指挥组、街政组、共青团总支委员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机构。张柏全、李祥文、余瑞云先后任办公室主任；吴一元、饶淑华先后任生产组组长；叶玉华任街政组组长；黄彩娣、谭桂森先后任共青团柳南公社总支书记；余瑞云、李燕珍、黄彩娣先后任妇联主任。

1975年3月29日，成立中共柳南公社党委，孙连亭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主任，黎燕青任党委副书记兼组委、监察、革委副主任，谢卓权任生产委员兼革委副主任，张柏全任宣传委员，莫灼为武装委员兼柳南派出所所长，罗文忠任武装保卫委员兼公社革委副主任，谭桂森

为青年委员，黄彩娣为妇女委员。1978年，公社党委改选，孙连亭继续任书记，黎燕青继续任副书记，委员有谢卓权、余瑞云、谭桂森、饶淑华、梁静霞。1979年9月，市委、市革委重新调整城区机构，撤销原城区及所属的人民公社机构，分别成立柳南区、鱼峰区、城中区、柳北区四个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至此，柳南街道办事处和柳南人民公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经济发展概况

柳南人民公社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自1962年大力兴办街道集体企业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些工业配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生活日用品的供给也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街道居民生活困难。柳南公社或街道办事处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自救，大力兴办各种生产厂组。1963年，公社组织9名篮球队员办起了面条组，主要帮粮食局加工面条。1964年改为柳南面条厂，梁静霞任厂长，生产发展后，职工增加到20多人。1974年面条厂扩大生产经营范围，生产起轴器、螺杆、高压龙头和电磁瓶等产品，工厂由此更名为综合五金厂，职工增加到80多人。

1964年，最初由几名街道妇女办起了白泥组，1969年扩大生产基地，由原来占地二百多平方米的简易草棚，搬至占地三万九千多平方米的柳邕路三区的一块荒坡上，与原来的柳南砖厂合并，成立柳州市红光耐火材料厂，梁桂芳任指导员。新成立的耐火厂，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资金，全厂职工在梁桂芳指导员的带领下，自己动手平整场地，挑石头、烧砖、烧瓦、烧石灰、建厂房，修窑炉、建烟囱、安装设备，自力更生办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耐火材料工厂，产品由单一的白泥粉发展到生产耐火砂砖、耐火粘土砖、生熟耐火粉、地板花阶砖、蛭石粉等多种产品。全厂职工增加到50多人，年产值达28万元，利润5万多元。到1979年已发展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集体企业，新开发的蛭石粉产品填补了广西保温材料的空白，地板花阶砖荣获柳州市百花奖。

1965年，公社委派劳动联队指导员沈国卿负责筹建麻袋厂工作，并派李秀琼同志带领6名青年到湖南长沙麻袋厂学习生产技术。回来后，就在柳南公社办公室的一个屋檐边搭起了一间简易厂房，自行设计，自己动手制造梳麻机、捻线机、预子机，改造了一台从一个大厂中已报废的织布机。就这样因陋就简办起了柳南麻袋厂，工厂安置了70多名生活比较困难的居民和待业青年。公社委派张华珍当厂长，李秀琼当副厂长，张钧当指导员。柳南麻袋厂建成后，为柳州市有关厂矿的产品解决了包装问题，因此成为第一个纳入市生产计划的街道小厂。1972年工厂转产汽车电瓶塑料隔片、排球网、篮球网、乒乓球网、童鞋等，1973年，工厂与市针织厂挂钩，加工针织背心、文化衫等产品。1974年改名为柳州市针织服装厂，职工由7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厂房扩大3倍，年产值达200万元，1974年盈利30多万元。

1966年8、9月份，公社把原街道十几个人办的五金组和翻砂组合并成立拖拉机配件厂，为柳州拖拉机厂加工拖拉机配件。1977年职工逐渐增加到112人，1977年夏合并到城区丰收拖配厂，后来因生产需要和形势的变化，成为今丝绸厂。

1968年11月，由曾庆华、翟全、梁时瑶、陈富荣等4人，自带工具、设备和资金办起了一个街道生产组，主要帮二空加工空压机配件，为工程厂加工军工产品部件。1970年3月，公社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柳南机械配件厂，委派吴兴良任厂长，高效莲任指导员，职工发展到20多人。

1975年5月，成立柳南塑料制品厂，有职工50多人。张华珍任厂长，罗定文任副厂长。主要生产汽车电瓶塑料隔片和塑料药物包装袋。柳南人民公社的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至1979年9月，划归柳南区政府管辖的有针织服装厂，耐火材料厂、综合五金厂、机械配件厂、塑料制品厂等五家工厂，共有职工460多人。不仅解决了部分人民群众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同时，也为柳州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柳州市耐火材料厂创业史

邓宝芳

耐火材料厂的前身是柳南公社管辖的街道生产自救小组。当时，是由郑忠全同志负责组织街道的军烈属和贫困户吴小丽、唐小勤等几位家庭妇女的生产自救小组。小组主要生产白泥粉。该组成立于1964年10月，名称叫柳南公社白泥组，地址在今华丰湾柳南区政府驻地。生产自救组没有机械设备，只有一间简易草棚作为生产场地，几位妇女用手工操棍、棒、槌的方法，加工白泥粉。生产的数量、质量都不理想，产品销售后只能维持生产者的生活。

1969年在柳南公社的领导下，生产组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委派梁桂芳同志任指导员，新增大批生产人员。扩大了生产基地，专职技术员扬芜同志监督产品的生产。生产组先搬迁至柳邕路三区10号，后又迁至西鹅公社竹鹅大队的石桥岭荒坡上，后来与岑运灌负责的柳南公社砖瓦厂合并。同年改为柳州市红光耐火材料厂。

合并初期，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资金，困难很多。工厂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边生产边建设。在梁桂芳指导员的带领下，同志们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家挑灯夜战，挖土方，平整地面，担石头，运材料，在荒坡上盖起了第一栋生产耐火材料的车间，接着兴建了一座A字形窑炉和配套的一座15米烟囱，又新装一台干碾机。这样，生产能力扩大了，从单一的白泥粉产品发展到生产耐火砖、耐火粘土和生熟耐火粉料、骨料。工人用自己安装的夹板锤（用脚踩木板锤），把一块块的耐火砖坯生产出来，经过高温焙烧生产出耐火砖。当时的从业人员发展到50多人，年产值达25~28万元，

创税利3~5万多元,销售额达20万元。

1971年柳南公社派出谢绍胜到厂任厂长,后来又派出企业整顿工作组,积极支援红光耐火材料厂的建设。1974年孙玉梅为厂长。

1978年公社又委派朱绍明同志到厂担任厂长。把二万六千多平方米的厂区规划好,组织职工加班加点,建起了工厂的围墙和工厂大门。厂区空地逐年种上树木、花草,绿化了工厂的环境。在生产上又新添了一座焙烧石粉的窑炉。这年工业总产值达70多万元。

1979年底郑忠全同志转回到红光耐火材料厂担任书记。在郑书记的领导下,又新建了一座建材车间,专门生产地板花阶砖,该产品荣获柳州市百花奖。年生产10万块,为红光耐火材料厂新增产值90万元,创税利8万元。

1980年厂部兴建了一栋办公大楼。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厂部成立了5个股室:政工股、生产股、财务股、供销股和技术股。各股室设有股长、副股长,加强了生产的领导和经营管理。

1982年8月份,经过工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从温州引进白瓷砖生产线,经过多次到温州实地考察,1983年初开始筹备建厂。首先建一栋白瓷砖生产车间,基建工程投资30多万元。然后从温州引进白瓷砖生产设备,包括:压力机两台,喷釉机一台,球磨机2台,圆型窑炉一座,多孔窑一条。总计设备投入资金45万元。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和设备安装。1983年已进入试产阶段,1984年正常投产。1987年,由于受市场新产品的冲击,加上白瓷砖产品质量差,成本大,造成一定的亏损,被迫停产。

白瓷砖生产线虽停产,但其它产品,如珍珠岩粉、蛭石粉、耐火砖等产品的生产却日日增多,销路很好,有时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由于生产不断地发展,资金的不断积累,从业人员增加到170多人。工厂的经济效益好,其它建设同步发展,得到柳南区、柳州市的好评。1983年经市经委(1号)文批准,耐火材料厂由小集体转为大集体性质单位,同年红光耐火材料厂改名为柳州市耐火材料厂。厂部各股室改为科室名称。

工厂的发展在于技术力量雄厚，设备不断更新。随着生产积累的增加，先后购进了一台 C630 车床，一台牛头刨床，一台钻床，一台电焊机，一台氧焊机和生产所需的电机设备，同时购进一台 75 千瓦的发电机。生产设备的增加，完善了工厂生产配套设备。

1985 年领导班子得到充实，唐玉生、杨超全两位同志为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潘秀兰同志为耐火材料厂党支部副书记。同年郑忠全同志调离耐火材料厂。1986 年唐玉生同志任耐火材料厂厂长，潘秀兰任党支部书记。

新的班子上任后，着重抓好耐火材料生产发展工作，特建了两座工业窑炉，每座窑炉能焙烧耐火砖 75 吨，产量比 1969 年建的 A 字窑炉翻了三番，加上新安装一台 160 吨的压力机，专门生产耐火标砖和刀口砖。1986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130.2 万元，税利达 23.88 万元，销售额达到 107.2 万元的好成绩。

1987 年 10 月，又引进一台 4R3216 型悬辊式磨粉机，专门生产各种耐火粉料，磨粉机的引进，代替了古老的高速皮带运输机。磨粉机加工出来的粉料，可随意调粗调细，它一边进砖料一边出粉料。产量比“高速皮带运输机”翻四番。磨粉机的引进以及安装总投资 7.5 万元。

1988 年在唐玉生厂长的领导下，又组织生产技术科的人员，从大连耐火材料厂引进焙烧珍珠岩粉的窑炉技术；厂长亲自外出采购钢材，利用旧设备，改装了用煤烧珍珠岩的窑炉，原计划新安装珍珠岩窑炉需总投资 22 万元，经厂长，采购员和机修人员共同努力，珍珠岩窑炉建成只用了 17 万元，节约开支 5 万多元。新窑炉的产量比旧窑炉年产量翻一番，年生产能力达 2 万立方米珍珠岩粉。这产品为耐火材料厂增添了不少的经济效益，还被中国建材部珍珠岩协会评为优等奖产品。

1985 ~ 1987 年的技术引进、设备更新，使生产能力明显增大，经济效益也同步增长。1987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135.21 万元，销售收入达到 106.73 万元，税利达到 26 万元。1988 年工业总产值更上一层楼，

达到165万元,1989年持续增长达到180.12万元,税利达到38万元,销售额达到155万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1987~1989年三年连续被评为柳南区先进单位和柳州市先进单位,厂长唐玉生同志被评为1988年柳州市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

1991年经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从唐山陶瓷厂引进80年代的新技术,新设备,投资240万元,兴建65米隔烟隧道窑炉以及成型车间的管道设备、球磨机、泥浆泵、真空机、空压机、立浇线设备及喷釉机等设备。一边组织人力安装新设备,一边派20多人到唐山、洛阳学习卫生间瓷洁具工艺操作技术和车间管理等。1992年3月开始试产,6月3日正式投产。能生产中高档的卫生间瓷洁具,产品投放市场,前景十分喜人,受到建筑行业的好评,一些品种供不应求。199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建厂以来最好水平,产值200万元,销售额达到164万元的好成绩。

为了使陶瓷厂产品能满足市场需要,1992年10月中旬,投资13万元,安装了一台2.5吨的锅炉,专门供应热气到成型车间和立浇线车间。有了管道热气,卫生洁具的坯体干燥快,脱模快,产量得到大大的提高,不受天气影响,实现全天候生产,素坯质量也得到提高。

耐火材料厂在柳南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生产发展到有三大类产品:1、耐火材料产品。产品有几十种不同规格型号的异型砖,高铝砖,粘土砖,各种耐火粉,骨料、石英沙、耐火泥料系列品种。

2、保温材料:有轻质保温膨胀珍珠岩粉及制品,膨胀蛭石粉及其制品,耐火隔热制品,硅藻土制品。

3、建筑材料:有白瓷砖,建筑卫生陶瓷系列产品,产品品种繁多,规格齐全,质量高,售价低,产品投放市场后得到广泛应用,深受广大用户信赖。

柳州市针织服装厂史

李秀琼 谭桂森

柳州市针织服装厂于1966年2月24日创办，它的前身是柳南麻袋厂。

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工业生产品种不断扩大，一些工业设施的配件及特需物品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柳南公社根据上级的指示并结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为更好地解决军烈属、闲散居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成立了工业办公室，兴办五小工业，为大厂服务。柳南麻袋厂就是五小工业中的一个。当时公社派柳南劳动联队的指导员沈国卿负责筹建工作。

1966年2月24日，柳南公社派工业办公室成员李秀琼带队，组织杨坤超、邱庆春、谢太莲，民纪兰、潘海兰、彭秀群等六名青年到湖南长沙麻袋厂学习生产麻袋的技术。为节约经费，他们自带铺盖，住在长沙麻袋厂的办公室里。他们虚心请教师傅，日夜刻苦学习技术。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学习回来后，在公社领导的关怀下，柳南劳动联队腾出一间办公室，并利用办公室的屋檐偏角，搭起一个简易厂房。在这简陋厂房里，自行设计、自己动手制造梳麻机、捻线机、预子机，并改造一台从大厂要来报废了的织布机，然后进行麻袋的试产工作。在试产中，七位同志同心协力，在失败中找原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在经过十几次的失败后试产成功。在红五月的欢声中，柳南麻袋厂正式投入生产，同时公社任命李秀琼为该厂副厂长。

柳南麻袋厂的成立，解决了柳州市工业包装问题，是柳州市五小工业第一个纳入柳州市生产计划的工厂。

1966年7~8月,公社调张华珍当麻袋厂的厂长,张钧当指导员。

1972年底,受原材料影响,工厂被迫停产。麻袋厂何去何从?几十个职工的工作、生活如何解决?在这严峻情况下,厂领导迎难而上,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一方面组织大部分职工到柳南耐火厂,柳南劳动联队做临时工和挑土方等来维持全厂职工的生活。另一方面组织以杨坤超为主的技术骨干份子七人,进行汽车电瓶塑料隔片生产。把生产麻袋的车间改为隔片车间。自己动手、自行设计建造塑料隔片生产炉、模具设备等,进行试产。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试产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塑料隔片的生产,填补了广西塑料隔片的空白,并纳入区的计划生产项目。

塑料隔片的生产,使麻袋厂的生产得到逐步恢复,但是受产量的限制,不能使全厂职工全部回来工作,仍有部分职工在外面做零工。为解决职工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在中百站的支持下,进行三网(篮球网、乒乓球网、排球网)生产,在全厂干部职工的努力下,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最终使全厂恢复正常生产。

生产虽然恢复了,但隔片、“三网”的操作工艺落后,生产的数量、质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为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厂里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走出去请进来,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到广州、吉林学习“三网”、隔片的先进工艺技术,二是依靠群众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设备,使生产工效提高三到五倍,实现增产增收,产品质量受到上级的好评。到1973年底,厂盈利10多万元,彻底改变了落后面貌。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轻工业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厂领导吸取以前单一产品的沉重教训,不失时机地与市针织厂挂钩,争取加工针织品。1973年10月,由李秀琼带领30名青年工人到市针织厂学习生产针织品的工艺技术,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回厂后安装设备,正式生产针织品。产品有:针织背心、文化衫等。

1974年初,麻袋厂正式更名为柳州市针织服装厂。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将西三街道居委会办的童鞋厂合并进来。至此,厂里的生产品种有隔片、“三网”、童鞋、汗衫等。职工人数由70多人增加

到 200 多人，厂房扩大了 3 倍。年产值 200 万元，1974 年盈利 30 多万元。

1980 年，市政府规划修建东风西路，工厂被迁移到荣军路横漏山下。经过重新规划建设，工厂得到较快发展，兴建了一幢 600 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和四幢 3,000 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以及食堂、托儿所等。生产由原来的为大厂加工型转变为以生产自销产品为主，兼加工生产经营型企业，厂里还增加了漂染、织造车间，加上原有的成衣车间，形成了生产针织产品一条龙的生产线。产品品种不断增加，效益逐年增长，初步形成了年产 500——600 万元产值，年创税利 50——60 万元的街道龙头企业。

柳州市综合五金厂创业史

李秀琼

柳州市综合五金厂建于1963年。它原是由一个生产面条的生产小组发展起来的。

柳南公社原来有一支篮球队，公社当时为了解决队员的生活问题，办起了一个面条生产小组，组长是张成孝，成员有赵巧来、刘继纯、汤智，毛本希、覃振球、李秀凤、林德、黄淑玲等，地点在谷埠路原柳南公社的青年讲习所里。

1964年在原来的生产小组的基础上，改为柳南面条厂，厂长梁静霞，会计由公社的会计李桂兰兼任，工厂迁到飞鹅路柳南派出所隔壁。后来吸收了一批军烈属进厂，增加了生产人员，扩大了生产。为满足市场需要，依靠群众搞技术革新，把手工操作改为电动操作，提高产量和质量，得到市粮食局的好评，并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1974年，随着生产的发展，面条厂开始搞多种经营，除了继续生产面条外，还添置三台车床，一台40吨冲床，二台空气锤，一台刨床和五台微型车床等，进行五金行业生产，生产轴器、螺杆、高压弯头、电磁瓶等产品，增设电镀车间、充电车间，扩大了生产范围，扭转单一生产的被动局面。生产产值随之增长十多倍，职工由20多人增加到80多人，厂房由一个车间扩大到六个车间。同年，面条厂更名为柳州市综合五金厂。

1979年，根据市场需要，组织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民用锁边机，投入市场后受到好评。由市组织的一次交易会上，锁边机受到购方青睐，签订了几十万元的生产合同，综合五金厂迎来了勃勃生机，

出现了建厂以来最好的生产形势。后因工业科认为厂设备条件差，场地小，不宜接受这样大的生产任务，就把锁边机的生产任务拨到综合机械厂，并调走技工 20 多人到综合机械厂生产锁边机。

1985 年，区政府决定把综合五金厂合并到机配厂，整个厂迁到市五里桥机配厂内。

我所知道的柳南五金厂

沙培铨

1966年6月，我从柳南街道办事处西闸居委会调到柳南五金厂当车工。在这以前即1965年初该厂已经成立了，厂址在谷埠路下街，即现在的柳南工业公司办公处。莫增优代为负责。当时人数很少，有焊工、车工、钳工、锻工等总计不过20来人，然而却是柳南公社那时期最早办起的社办工厂之一。（斜对门早已有一充电、修理门市部，后并入在老虎冲的鱼峰机械厂，不属柳南公社管）。

该厂招收社会上的闲散技工，大部分是待业青年。因为年轻人多，厂内文娱活动搞得很活跃，大家经常参加办事处的文化宣传活动，受到上级的好评。工人每天上班都读报，很关心国家大事，老工人李师傅曾匿名寄出自己省吃俭用积下的一百元给越南人民，表达自己支援越抗美的心意。

车工组开始只有两台破烂皮带车床，从外地买回来的，生铁床焊上熟铁架子，可能已用上了四五十年，零配件多已丢失，我们居然修好起来，起先加工电机厂的配件，另外接些零碎活，勉强维持下来。

文革开始，各厂都处在无政府状态，我们的生产更艰难了。这时成立厂管会，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因为我们是社办小厂，没有固定工资，我们要求大家团结一心，多找门路，不搞派别，不串连，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1967年初，翻砂组的焦炭已告罄，无法生产，大家派我去贵州从江县求援。我到从江后，辗转找到灌洞区一炼焦工场。焦炭是1958年炼的，含硫量已天然减少，正适合使用。该场慨然答应支援

几万吨，于是我押着首批焦炭从柳江源头一路吹笛放歌而回。

这批焦炭不但解决了我厂的铸造困难，还由市物资局统一调拨给别厂使用，这在“文革”混乱期间，对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我同时在从江农械厂接下一批螺丝加工和机床修理，使厂里的锻工、钳工都有工作干。

1967年底，全市武斗进入紧张时期，子弹炸药包的响声不离厂前厂后，我们车工仍在生产岗位为印染厂加工辊筒。去运料沿途的砂包工事里都有人探出头来盘查，并要抢我们的无缝钢管去造大炮，经我们苦口婆心劝说，才没动手。

有些“造反派”、“红卫兵”进我厂要用设备加工手榴弹，他们说这里的机床又破又旧，你们用不了的，我们也没有饭吃，他们才悻悻走开。后来知道很多工厂的设备给那些“红卫兵”乱用，都损坏了，量具、刀具、钻头甚至马达也通通偷走。

1968年初，“武斗”升级，在疏散前夕，我们把厂里的物资及时转移，把机床马达架焊死，才免遭洗劫。

“武斗”平息后，我厂为拖拉机厂（微型汽车厂的前身）加工配件，该厂的加工单价较低，为了支援农业生产，我们爽脆答应下来。该厂的曹技师见我们动脑筋改革工具，一个个攻下技术难关，连连称赞。

这时来了“工宣队”，在一系列“四人帮”路线的左右下，厂里出现不少冤假错案，工人平白无故挨了整，大大挫伤了生产的积极性。我也在1969年春离厂了，望着三年来朝夕与共的机床和患难的工友，不禁有凄然之感。

该厂在1966年底与解北五金厂、中南五金厂、红旗五金厂、柳石耐火材料厂一并合为柳州市丰收拖配厂。以后又改为丝绸厂。

柳南五金厂几年来培养了不少技术工人，也为当时办事处的几个小厂加工制造各种设备，支持各厂的生产发展。

柳南塑料制品厂建厂始末

子 燕

1975年5月，已纳入自治区计划生产项目的汽车电瓶塑料隔片，由自治区汽车配件公司包销。谷埠二街塑料组生产的板兰根等塑料药物包装袋、瓶，得到柳城制药厂的支持，产销稳定。柳南公社欲把生产塑料制品的厂、组归口管理和扩大生产，决定投资十多万元，把原是柳南麻袋厂生产的塑料隔片车间分离出来，与谷埠二街塑料组合并，成立柳南塑料制品厂。公社从拖配厂抽调了罗定文同志和唐菊娣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厂址选定在市荣军路五里桥边，即柳南公社原战备砖厂厂址，今为柳州市计量器具厂。

创业工作是艰苦的。罗定文、唐菊娣两位同志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不辞劳苦，利用有限的资金，勤俭节约，在占地三亩多的厂址上，因陋就简，盖起了三百多平方米的厂房和仓库。整个筹备工作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便投入了生产。柳南公社任命张华珍同志为厂长，罗定文同志为副厂长，唐菊娣同志负责政治工作。

新成立的柳南塑料制品厂，犹如襁褓中的幼儿，弱不禁风。但是，它仍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塑料隔片生产工艺比较简单，利润则比较高，一块长和宽约16至17公分的塑料隔片，成本约0.07元，汽配公司收购价是0.12元。原材料供应和销售不用厂家费心，且产品供不应求。为此，生产厂家越来越多，至1979年，柳南塑料制品厂生产的塑料隔片出现滞销，产品积压二百多万片。另一产品塑料药袋或瓶，由于在并厂时，个别不愿并入厂的生产组成员，又到另外的街道办起了新的塑料生产组，并把主要产品逐步引到新办的

生产组去投产,致使工厂生产任务不饱满,工厂一方面被迫增加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开辟试制新产品——可发性聚苯乙烯泡沫。该产品于1980年正式投产,年产值达24万元。1988年转产计量器具,同时更名为柳州市计量器具厂,厂领导也同时易人。

街道卫生医疗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李燕珍 杨立贞

1958年9月，柳南人民公社成立后，为了改善城市街道卫生医疗环境，方便居民群众就医，同时，也为配合柳州市工人医院搞好地段医疗保健工作，公社和居委会的领导在街道挑选了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把他们送到工人医院培训，然后，在各条街道建立卫生合作医疗网点，在公社设立卫生医疗站。合作医疗网点和医疗站均属集体性质单位，自负盈亏，药品从医药公司购进。

柳南公社医疗站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于1959年春建立的。当时，诊室设在谷埠路64号，1965年搬迁到谷埠路72号，今柳南区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所在地。1968年9月，柳南公社医疗站改名为红光医疗站，1969年改称柳南卫生所。1979年9月，柳州市重新调整市辖区行政区域后，柳南卫生所与南站、柳石等3个卫生所合并成立柳南区人民医院，隶属于柳南区人民政府管辖，柳南卫生所则为柳南区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

柳南卫生所在建站初期，有医生护士4人。其中医生1人，司药1人，注射、外伤换药1人，挂号1人。1963年精减到3人。1975年初，卫生所增设化验、草医。1978年初改设中医，医务人员逐渐增加到7至8人。每天来寻医治病的达40多人，少的也有20多人。

柳南卫生所创建20年来，在柳南公社和柳南街道办事处领导下，一直为市公立医院拾遗补缺，方便群众医治小伤小病。认真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热心为居民群众防病治病，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谷埠小学沧桑史

蔡远征

谷埠小学的前身是柳南小学，是一所原柳南公社所属的民办小学，群众称它“门板”小学。说来也不奇怪，追根溯源，该校创建于1958年，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为了解决辖区部分学生入学难的问题，柳南公社领导指示原柳南幼儿园负责人朱美球，负责筹办一所小学。当时，一无资金，二无师资。真是“白手起家”。但困难吓不倒创业者。朱美球只是一个初中生，经过三个月的简师培训，就毅然接受了这个艰难的任务。没有校舍，向外借，没有师资，自己兼。就这样，一个教学班，一个领导，一个教师，一间教室的小学复式班就办起来了。这间所谓的校舍，便是一间约二十多平方米，四周钉板皮，上盖油毡瓦面的板皮房。课桌椅更简陋，是用长板子钉成的。如此校舍，晴天还可以，碰上下雨天，师生们就苦不堪言了。大家只好戴着竹壳帽上课。就这样，这个襁褓中的婴儿硬是活下来了！

在党组织的关怀下，第二年，公社派来了几个教师。大家咬紧牙关，闯过了一个个难关。班级由少到多，由一个教学点变成三个教学点，除原校外，新设的一个教学点是将东二巷的旧戏台当作教室上课，另一个教学点是一间民房约二十多平方米当作教室来上课。1961年，上级党委又派来了一批年轻、文化素质好的教师充实师资力量。随着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在群众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教学班级递增到10个。学校分别在谷埠路东一巷、东二巷、西闸巷设立了三个教学点。虽然教学条件艰苦，工资也不高，但教师的教学情绪却是非常好的，因此，班级人数猛增到50多人，学校由原来的一个复式班

发展到一所完小。

1962年，由市房产局和鱼峰区拨款5万元，重建柳南小学，校址迁到谷埠路55号。学校有了一栋三层楼的教学大楼和教师宿舍。文革期间，教学大楼中部被炸断，文革后，教育局拨款修复，学校改名为先锋小学。

1982年，全市九间民办小学归教育局接管，转为公办小学。先锋小学改名谷埠小学。在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学校步入正轨，教育、教学成绩突出。1985年该校被命名为市体育传统项目田径训练网点的学校。为培养新一代体育人材作出了贡献。同年，市教育局拨款新建了一栋六层综合大楼，用于办公和宿舍。1992年，市教育局又拨款新建一栋七层三房一厅教师宿舍。师生员工增加近400人。真是：“风雨三十年，旧貌换新颜！”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谷埠小学必将开放得更加鲜艳。

柳南劳动联队建队简史

孙连亭 李燕珍

解放初期，柳州市区百业萧条，群众生活困难。1950年至1952年，市内各街道居民自发地组成劳动小组，自找工作谋生。1953年夏天，河南片成立了由程德为大队长，张振宇为副大队长的失业人员劳动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接洽、联系劳动就业事宜，调整和安排闲散劳动力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工作。至此，几百名街道闲散劳动居民和无业人员依靠劳动委员会组织安排工作，成为城市劳动队员。

1954年，市劳动局在劳动委员会的基础上，分别在河北片、河南片成立劳动调配站，取代了劳动委员会的职能。河南片同时成立了柳南、柳石、南站，天马、驾鹤等5个劳动联组。调配站和联组管理人员的工资及办公经费，主要从雇工单位或劳动队员的工资总额中，根据不同工种，分别按3%、5%、8%和12%计提的管理费中开支。队员的工资分配是根据不同工种，分成若干小组，按天计算。工资有计时工资，也有计件工资，少则每天几角钱，多则每天五、六元，一般平均都在一至二元左右。总之，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1958年，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时，劳动联组仍然存在。柳南公社管辖的8个居民委员会，分别成立了8个劳动中队，每个中队有中队长一人，每月拿半脱产工资。公社抽调一些有专长的队员组成3个专业队。这些专业队是：建筑队、搬运装卸队、开山采石队。劳动联组至此改称劳动联队，管辖8个劳动中队和3个专业队。劳动队员逐渐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历任柳南劳动联队队长的有覃华、朱永志、赵子谦、黄世平、李爱英。柳南劳动联队办公地址最初在今谷埠路86号，

即柳南区物资供应总公司驻地，1963年建好联队办公室后搬至飞鹅路207号。

1976年2月9日，柳南公社将柳南劳动联队撤销，分别成立柳南装卸搬运队、柳南土石方队、柳南劳动服务队等3个专业队。同时任命李爱英为装卸搬运队队长，黄民凤、彭祥勇为副队长；刘冰琼为土石方队队长，唐菊娣为副队长；劳动服务队划归柳南调配站管理。柳南劳动调配站由副站长王秀珍主持工作。各专业队和调配站办公地址仍在飞鹅路207号。

1979年9月28日，成立柳南区人民政府时，柳南装卸搬运队、土石方队、劳动服务队等3个专业队和劳动调配站一起合并到柳南区，隶属于柳南区劳动服务公司管辖。

柳南劳动联队建队20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以及柳南人民公社、柳南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组织劳动队员先后参加过贵州营房建设、大明山国防工程建设、桂林青狮潭水利建设、象州冲天桥一带水利建设、柳铁线路维修、社湾坳至一五八医院、四三四厂、五一路、八一路、三中路、鹧鸪江至洛埠纸厂等公路路段和柳江大桥土石方工程的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安置社会闲散劳动力就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8年底，柳南劳动联队在管理费收入中拨出约3万余元，在飞鹅路柳南派出所对面建起了约270平方米的公社办公室和一个500多平方米的篮球场，在螺蛳塘建起了177.8平方米的公社干部宿舍。1973年又从管理费收入中拨出6万元，在飞鹅路华丰湾25号，原柳州市耐火厂白泥粉车间建起了一栋700多平方米的公社办公楼。此外，为给劳动队员创造进厂就业的条件，从管理费收入中无偿拨出18万余元给公社创办了麻袋厂、拖配厂、面条厂、砖瓦厂、石灰厂等工厂。现在这些工厂大部分已合并转产，有了各自的发展。

柳石人民公社的历史简况

罗 维 刘锡香

柳石地处柳南区南部，东邻谷埠路，南至郊区帽合村，西与南站西鹅乡相连，北界飞鹅路红光路。

一、历史沿革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1950年2月柳州市人民委员会成立，下设四个区，区下设街道委员会。柳石辖区属柳州市第三区管辖。1953年柳州市由四个区增加到八个区，后又合并为三个区，柳石街道办事处属柳州市第二区管辖。根据国务院1955年5月颁发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同年10月成立了柳州市柳石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管辖大同巷、维新巷、柳石路、乐群路、柳邕路、文笔路、城站路、老龙巷、东站等9个居民委员会，担任第一任街道办事处主任的是陈明德同志（没有副职）。1957年至1958年8月期间，因陈明德有病住院，上级曾派沈长林、梁森、吴一元、陈耀威等同志，先后在办事处担任过主任或副主任等职。

当时街道办事处是属于柳州市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工作主要任务是：管理街道居民的民政救济、拥军优属、征兵工作、婚姻调解、社会治安、居民学习、扫盲、卫生、妇女工作、劳动就业、居民委员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同时设有筹办工业和商业任务的组织。办事处内设主任或副主任1~2人，民政干事2~3人，文教卫生干事1~2人，治保干事1人，妇女干事1人。街道办事处下设的居民委员会是办事处的下属单位。居民委员会内除主任一人由政府每月发

30元生活费，居委会文书发给15元生活费外，其余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均属义务服务。

1958年人民公社高潮时期，柳州市撤销所属街道办事处，成立城中、鱼峰、柳北三个区公所，区公所下设人民公社。柳石人民公社于1958年8月成立，隶属于柳州市鱼峰区公所管辖。柳石人民公社第一任主任是陈明德同志。1960年柳州市撤销区公所，调整原有公社管辖范围，城中和郊区合并，统一组成城中、鱼峰、雀儿山、鹅山四个人民公社，下设分社。柳石人民公社改为分社属鱼峰人民公社管辖。

1961年柳州市实行城乡分管，恢复区公所建制，下设公社，柳石人民公社属鱼峰区公所管辖。

1968年撤销区公所，城区内分别成立城中、鱼峰区人民委员会，下面机构仍然为人民公社。柳石人民公社属鱼峰区人民委员会管辖。

1972年5月城中区和鱼峰区合并为城区革命委员会，统一管辖原城中、鱼峰区及两个区所属的11个人民公社和97个居民委员会。

1979年9月撤销区革命委员会及所属各人民公社设立区人民政府，全市分为城中、鱼峰、柳南、柳北四个区。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柳石人民公社撤销，成立柳石街道办事处，直属柳南区人民政府管辖。现今的柳石街道办事处管辖文笔路，城站路、红阳路、大同巷、维新巷、柳邕路（分一、二、三个居委会）、东站一、二、三区，共11个居民委员会。文笔路1966年曾改名为新华路，1975年恢复文笔路路名，管辖老龙巷，侨家一、二巷。文笔路居委会1958年人民公社期间由袁树莫及杨英权分别任主任、副主任。城站路1966年曾改名新风路，1975年恢复今名，原属鱼峰人民公社管辖，1985年由柳石办事处管辖，其所属有城站南二巷、南五巷、南六巷、南七巷及菜园屯等。1958年人民公社期间，居委会由杨连英及韦文金任主任及副主任。红阳路居委会1966年前是老龙巷，1958年人民公社期间由何玉英任主任，大同巷居委会1966年曾改名为奋发路居委会，1975年恢复原名，管辖大同巷一、二、三里，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由

覃玉森、覃运发任主任或副主任。维新巷居民委员会，1966年改名为图强路居委会，1975年恢复原名，管辖有维新巷一、二里。1958年人民公社期间，由覃玉英、覃永华任主任、副主任；柳邕路居委会，1966年曾改名为红鹰路第一居委会，管辖柳邕路，1958年人民公社期间李伯贞、韩汉坤、吴慧琴分别任主任或副主任。

二、组织居民生产自救及经济发展的概况

解放后，各街道办事处领导各居民委员会带领居民想方设法，发挥本身的优势及特长，除组织劳动联队安排就业人员外，还组织一些服务性、修理性的生产小组。柳石路1954年建柳石劳动联队，建队时有180个队员。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柳石劳动联队行政归公社领导，业务则由建设银行柳州支行负责，当时有队员650人。

劳动项目有挖土方、铺路、挑煤、修建房屋、装卸、搬运、挑河沙和在市内各厂、矿作临时工等。曾承担八一锰矿、鹿寨氮肥厂、桂林青狮潭水库、象州冲天桥、贵县部队营房等基建的土石方工程。并派有队员分别到柳江、天等、河池以至贵阳、昆明等地做装卸工作。同时参加市区内的修路工程。

1958年柳石劳动联队的队员集资建起柳石大礼堂，1973年又兴建柳石公社办公大楼、宿舍和劳动队的办公大楼，先后还为柳石化工厂、红阳拉丝厂、柳州电扇厂、柳州电器二厂提供办厂资金约70多万元。

柳石人民公社所属居民大多数是个体户或小手工业者，他们靠开办小手工业维持生活。1956年经过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小手工业者按不同行业组织起各种生产合作社（组）。柳石路以打铁为主组织起合作社，为大工厂加工螺丝和回收废旧钢铁打造小农具。云头岭的陶器专业户合并为社会福利陶器厂，还组织一部分人烧石灰。谷埠街、大同巷的居民组织做豆腐、熬盐和做木工等。文笔路、老龙巷居民就地取材，用当地的鹅卵石为原料，组织了专制耐火材料的生产组。各街道还有车缝、打绳、编织、五金修理、车辆补胎充气 and 面条

加工等小组。

1958年“大跃进”时期，掀起大办工业高潮，工厂遍地开花，大部分街道工厂也一哄而起，但由于缺乏工业生产管理经验和原料不足等原因，发展不起来。1962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将各街道工厂统交公社管理。上交柳石人民公社的有石灰厂、耐火材料厂。1963年，柳石五金厂转为柳州市二轻局所属的塑料四厂，柳石人民公社陶器厂并入柳州市美术陶瓷厂，柳石电机厂合并入柳州元件厂。

1965年起，根据上级兴办街道工业的指示精神，各街道又开始分别办起各种生产厂组。由于各街道有的交通方便，条件优越，有的背街小巷，一无场地，二无资金，办厂比较困难，各街道厂、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时柳石人民公社办有光明化工厂，工人15人；综合制品厂，工人31人；大同纸筋组工人7人，车缝帆布组工人6人；维新面条加工组工人14人。

1979年，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对街道工业作了调整、改革和统盘规划，分别由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三级分管。

柳石街道办事处直属厂、组共有11个（光华电池厂、室内装璜厂、尼龙配件厂、柳石机械厂、柳石皮件厂、柳石服装厂、柳石工艺制品厂、糖业备件厂、向阳塑料厂、强生修理部和立声修理部）。

街道下属居民委员会办的有：文笔路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12个。城站路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6个。红阳路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11个。大同巷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8个。维新巷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4个。柳邕路第一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9个。柳邕路第二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8个。柳邕路第三居民委员会所办厂，组2个。东站第一居民委员会办有一个服装厂，东站第二居民委员会办有一个电器成套厂。

柳南区人民政府重视发展个体商业，1989年柳石街道办事处辖区各类商业网点达824个，比较大的有：延安五金店、美佳食杂店、广成购销部、城站购销部、立声美术部、广益公司、清新五交店、永前公司、顺光百货店、柳南饮食店、柳南冰室等11间。

下面重点介绍柳石人民公社办的工厂：

（一）耐火材料厂

耐火材料厂的前身，原为街道生产自救耐火材料组，1965年发展为工厂。厂址在柳邕路三区（五里卡）10号。1979年9月，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时，为区属企业。现是国家建材部中国珍珠岩工业协会会员厂，柳州市文明单位。1986年3月经上级批准，企业全面整顿验收合格。现有正式职工110人，合同工、临时工70人。工程技术人员3人。下设一个分厂（柳州市瓷砖厂）三个车间。

主要产品有：耐火材料、保温材料、建材彩釉瓷面砖。1986年接受国家建材部产品抽样检查，产品质量达到部颁标准。

（二）红阳福利厂

红阳福利厂，原在公社组织车缝、化工等生产组的基础上，1974年发展为柳南福利厂，厂址在红阳路云岭区7号，主要为照顾安排残疾人就业。

1979年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为区属工厂。现有职工47人，其中残疾人22人，工厂占地面积65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固定资产18万元，有塑料薄膜吹塑机1台，针织服装设备20多台（包括三线机、细缝机、电动衣车等）。下属1个旅社，两个生产车间。福红旅社五层楼24个房60个床位。吹塑车间主要生产食品薄膜袋，针织服装车间主要为市第二针织厂加工各种针织服装。

（三）柳石石灰厂

柳石石灰厂始建于1960年，厂址在大高岭，初是11个人的小厂。1964年迁至横漏山，职工增至80人，年产石灰3.6千吨。1966年增设立五金组，生产压塑膜用的高频机。1969年生产水玻璃，1973年生产漂白粉，1974年生产溴化钾，1976年生产再生机油、柴油、光油。由于原料缺乏，这些产品先后停产。1977年与公社下属的柳石电扇厂合并为红阳化工厂，全厂职工增至100人，并成立电镀组，承接对外加工。

1979年，柳南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为区属工厂。1980年仍以生产

石灰为主兼生产 53 加仑油罐（自产自销）及加工各种油罐。1981 年成立冲压车间，喷漆、镀漆车间和木器、冲压车间，以石灰车间、果脯车间为主。厂名改为“柳州市果脯厂”，亦为柳州市红阳化工厂。

新厂址在荣军路五里桥 351 号，占地总面积为 204.068 平方米。全厂职工 138 人，固定资产 9.37 万元，流动资金 5.8 万元。1985 年与区政府签定承包合同，生产金属类和其它果脯食品，原定生产全年为 3,000 公斤，逐渐增加到 8,000 公斤。

柳石小学变迁史

韦家萍撰稿 朱禾改写

解放初，柳石辖区云岭街一带有一所公办的第六小学（现六中），另有一间工人子弟小学（现鱼峰山小学），则专招收工人和职工子弟。每年，两间学校招生名额有限，满足不了附近街道居民子女的入学要求。不少家长为解决孩子入学困难的问题，他们纷纷要河南区政府解决儿童入学问题。河南区政府当即决定：由吕振周同志负责在云岭附近筹办一所小学。校址选定在靠六小围墙边，利用没收来的三间房子作教室，开设三个班级，学生共一百多人，校名定为柳石补习小学。教师工资全来自学生交的学费五元，月工资 20 ~ 25 元，放假期间教师则自找工作解决生活问题。

柳石补校于 1952 年 10 月开学上课，共有教师五名。

1958 年 9 月上旬，在大跃进和全国人民公社化热潮中，柳石人民公社在热烈的掌声中成立了。

公社一成立，就接办了 1952 年开办的柳石小学。当时，小学只剩下大同分部的三间木板房和一间泥砖教室。学生大部分已到公办小学就读，部分教师也到公办小学执教，未能到公办小学就读而留下的学生有三百多名，他们分成两部制在简陋的教室中上课。1960 年 4 月，一场突来的冰雹，三间木板房教室被冰雹打得只剩下木架子，所幸的是时值傍晚六时多，师生已放学回家，因而没有一人伤亡。

公社领导在校长兰佩珍陪同下，第二天到学校查看灾情，并向师生保证：学校一定要办下去，房子被冰雹打烂了，我们发动群众修盖。公社立即向辖区所有单位发出号召：有人出人，有物出物，重新

盖好学校。于是，各单位纷纷派人送来木料、砖瓦，劳动联队无偿派工，在很短时间内，在原地盖起了三间砖木结构的大教室，师生们重新回到学校上课。

1961年接受了铸造厂子弟70余人，学校在三间教室中分早、中、晚三部制上课。1962年，增建了两间教室，才缓解了校舍紧张的情况。

1963年，新学年一开始，公社调整了学校领导班子，由陈定保任校长，整顿了学校秩序，使学校教学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学校新领导班子采取了以下措施：

1、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学校聘请了一批思想品德好，有高中文化或有教学经验的中青年到校任教，在教师中发展党团员，先后有两名教师参加了共产党，有两名教师加入了共青团。

2、加强管理，完善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通过全校教职工充分讨论后，制定了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使学校各项工作有章可依，有规可循。学校还定期和不定期召开检查评比会，检查各项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3、从实际出发，狠抓教学

针对学生实际与教案，有的放矢，课堂上以练为主，摸索出一套适合本校学生具体情况的教学方法。

4、健全财会制度，开展勤工俭学

学校经费来源于学生，教职工生活主要靠这些钱维持，因而，一分钱也不能随意花。公社为使学校增加收入，拨了张水塘给学校养鱼种藕，从这些收益中缓解了学校经费的困难。

学校经过整顿后，1964年毕业升学率为76.3%，比1963年提高了56.9%，民办小学有这样的成绩，在当时是个奇迹。消息传开，师生奔走相告，公社领导对此也多加鼓励。原在本校就读的学生虽转入公办小学，现在却要求回校插班了，学校附近的适龄青少年也纷纷要求入校就读。过去是学校怕生源不足，现在却无法招架住要求转学来的学生了。为使学校办得更好，公社党委决定给学校大部分教师转为

正式教师，从1965年1月起，给教师工资拨款20%，也就是这一年，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4.5%！有的人不服气，可是，经过教育局来校听课、检查后，正式肯定了成绩，并给学校拨了78套（三个班）新桌椅。全校教职工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鼓励后，干劲更大了，1966年，升学率达到了97%，距100%已不远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工作受到了干扰。“文化大革命”后，1981年9月起学校合并到柳南小学，柳石小学经历了29个年头，毕业学生800余人，不少学生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中坚。

柳州水泥厂

朱 铨

一、概述

柳州水泥厂座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西郊太阳村镇。东近柳江，南傍黔桂铁路，距市中心 20 公里，柳太公路与市区衔接，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全厂分厂区、生活区和矿山三部分。占地面积 3.7 平方公里。横山公园位于厂区和生活区之间，山底人行隧道连结两区。石灰石矿储量大、品位高。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

柳州水泥厂从 1958 年 3 月开始筹建，1964 年 9 月至 1966 年 3 月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的三条湿法生产线相继建成投产。老生产线设计能力为年产水泥 60 万吨。

1982 年 5 月开始扩建，1986 年 12 月新生产线投入试生产。这套主要由丹麦引进的窑外分解设备，具有规模大，自动化程度高、能耗低、粉尘污染少等特点。该生产线经过国家核定，年生产水泥 103 万吨。两线总年产水泥能力为 163 万吨，近几年水泥出口东南亚、香港等地。已增加到近 50%。

柳州水泥厂产品质量稳定，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五羊牌水泥 1979 年获国家质量金奖，鱼峰牌普通硅酸盐水泥 1991 年也荣获国家质量金奖。至 1992 年底全厂累计生产各种水泥 2,053 万吨，其中出口水泥 566 万吨，实现利税 6.3 亿元，为发展广西城乡建设和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为出口创汇和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全厂现有固定职工 3,095 人，其中干部 734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622 人，拥有固定资产 3.4 亿元。

二、党、政机构

1958 年 5 月，经中共柳州市委批准，柳州水泥厂筹建处成立党支部，有党员 20 名，洪觉任支部书记。1959 年 2 月成立中共柳州水泥厂委员会，康彬任党委副书记。至 1992 年底，全厂有党员 479 名。设有 3 个党总支，11 个党支部，党委办事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党委办公室；由党委主管的部门有：纪检会和工会、团委、科协、武装部、精神文明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

经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柳州水泥厂于 1987 年 12 月 21 日宣布实行厂长负责制。设厂长兼书记 1 人，党委副书记 2 人（其中 1 人兼工会主席），副厂长 5 人，调研员 3 人，厂长助理 1 人。

行政设处级机构：企业管理处、计划财务处、劳资安全处、技术能源环保处、供销处、保卫处、行政处、教育处、动力处、机械处、进出口公司、化验室、总调度室、职工医院、厂办公室、劳动服务公司、矿山分厂、干法分厂、湿法分厂、装运分厂、机修分厂和动力分厂。

三、基本建设

1、工厂的筹建

五十年代，为了改善工业布局，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央建材部决定在广西兴建水泥厂。1956 年 4 月，北京水泥工业设计院受命到柳州收集建厂资料。1957 年 10 月，建材部焦善民副部长带领有关司局领导和三名苏联专家，会同广西省有关部门和柳州市领导黄云、梁山等人，对柳州水泥厂建厂条件和厂址选择作了多方案比较分析，最后确定柳江县太阳村为最佳建厂厂址。1958 年 4 月成立“柳州水泥厂筹建处”，委派原柳州市市长周彤担任筹建处主任，筹建处设在柳州市柳江路 185 号。

2、创业

柳州水泥厂建设初期，正是“大跃进”时期，起步十分艰难。当时太阳村贫困落后，交通闭塞（有铁路无车站、无公路）。爬上横山顶峰，举目四望，只见丘陵起伏，杂草丛生，一片荒凉。1958年7月1日生活区动工。筹建人员迎难而上，头顶蓝天，脚踏草地，进行各项前期准备。先后建起了简易家属宿舍和六栋单身楼。

1959年11月20日厂区破土开工。仅1960年一年，就基本完成了主要厂房的施工，窑磨主机就位，一座中型水泥企业初具规模。

3、缓建

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调整，建工部于4月17日通知柳州水泥厂缓建，筹建处成立维护办公室，科室由13个减至9个；干部由138人减至92人，全厂精简职工387人。工厂缓建，人心浮动，筹建处一面精兵简政，加强思想工作，稳定局势；一面积极进行设备厂房维护，自力更生搞好零星收尾，为复建创造条件。

4、复建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中南局和区党委的直接关怀下，筹建处领导积极争取，终于使柳州水泥厂成为国家第一批复建项目。1963年4月，建工部通知：“你厂业经国家批准列入国家1963年度基建计划，全年投资额为400万元，完成第一条工艺线的收尾工程。1964年上半年建成一台窑，其余全部工程继续安排完成”。

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满足区内外对水泥的迫切需要，1964年4月4日成立了“柳州水泥厂会战指挥部”。由建工部基建局副局长田英俊任总指挥，厂筹建处主任李仁任副总指挥。参战职工多达2,500多人，并创办了《奋战报》，（现名为《柳州水泥厂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工程进展情况，交流建设经验，表扬先进人物，在会战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业，一、二号窑分别于1964年9月25日和11月16日建成并一次投料试生产成功。11月10日是柳州水泥厂职工最难忘的一天，一列满载500号水泥的列车一声长笛，在一片欢

笑声和鞭炮声中徐徐离厂，宣告了广西不能生产高标号水泥的历史已经结束。干部职工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许多干部、职工流下了激动的泪花。

在一、二号窑的复建过程中，厂领导利用难得的机遇，积极酝酿扩建第三号窑。大家一致认为可以收到投资省、见效快的效果。1964年5月30日正式向建工部申请扩建，国家计委于8月24日批准了三号窑的扩建任务书，同意利用原分配给江西万年水泥厂的同类型捷克窑进行扩建。在会战指挥部的组织领导下，边生产、边扩建，仅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投资1,183万元。1966年3月三号窑胜利试产，至此，三条生产线总投资为5,841万元，与之配套的生产、生活各项设施基本完善。

四、扩建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水泥工业成为建材行业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柳州水泥厂经济腾飞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以发挥资源及交通优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这是2,000多名“柳泥人”的共同心愿。

1979年自治区建材局领导全力以赴，牵头抓扩建工程的引进谈判，前后与日本等多家外商洽谈，并邀请国内数十名水泥工艺、机电、自动化专家，参与评估论证，咨询研讨，历时三个月。1982年4月14日择优选定丹麦司密斯公司日产熟料3,200吨的窑外分解生产线，同年5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柳州水泥厂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丹麦设备进行扩建。

1982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柳州水泥厂扩建工程指挥部，区建委副主任马玉珏任指挥长，全面开展扩建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该工程具有工艺装备新，协作单位多，建设任务重，时间紧等特点。许多设备在国内尚属首次使用，如自动化取样站，原料预均化堆场、生料均化库、分解炉自成体系的预分解窑、帐篷式熟料库，康必丹水泥磨、模糊逻辑控制窑的作业、红外线温度扫描监视等等，集

中体现了八十年代初国际水泥工业先进水平。1984年2月28日扩建工程破土动工,约5,000名建设者奔波各个工地,经历了1,00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完成总投资2.8亿元,于1986年12月28日建成投料试产。从此,柳州水泥厂成为我国水泥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它的投料试产,对振兴龙城,开发广西丰富的水利电力资源,建立出口基地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生产和经营

柳州水泥厂自1964年9月投产以来,企业生产与经营成绩显著,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近卅年的风风雨雨,水泥厂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创建道路。

1、投产初期

1965年投产后的第一年生产水泥32.5万吨。熟料平均标号达到700号,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畅销东南亚。创产值2,015万元,利润317万元。1966年虽受“文革”初期的影响,产量仍达52.78万吨,产值3,542万元,利润648.3万元。

2、“文革”十年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大革命”,对刚刚建成的柳州水泥厂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

(1)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被打成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实行挂牌揪斗,隔离审查,劳动改造。厂内职工分成两大派,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旗号下,生产经营无人负责,管理十分混乱。

(2)打派仗、搞武斗,前后死亡10人。大批职工离厂避难,致使工厂停工减产。水泥产量1967年减到40.78万吨,1968年再度降到14.14万吨,仅为设计能力的23.56%,当年亏损175万元。

(3)管理混乱、事故频繁,无政府主义自由泛滥。投产前建立的三大管理规程被当作“管、卡、压”来批判。

(4)消耗上升,质量下降。曾多次出现不合格水泥出厂的重大质量事故。每吨熟料的标准煤耗由215公斤上升到264公斤,成本大

幅度提高。

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老职工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守岗位，尽心尽责，使生产得以维持下来。十年间，共生产水泥490万吨。

3、振兴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柳州水泥厂生产进入了一个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崭新时期。1978年至1987年，年产水泥均在70万吨左右。1985年老线生产73.3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超过生产能力20%以上。1986年12月引进丹麦的新生产线点火试产成功。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1991年柳州水泥厂被国家定为大型一类企业。1992年生产水泥147万吨，实现利税9,200万元，出口创汇2,500万美元，在全国同行中居领先地位。值得庆贺的是新线分解炉于1992年9月成功地进行了改造，使原来日产徘徊在2,800吨左右提高到日产3,200吨，达到了设计能力。现在全厂职工团结一致，满怀信心，为实现1993年生产水泥163万吨，利税过亿元的宏伟目标而奋力拼搏。

柳州鹅山路立交桥

韦长文

鹅山路立交桥位于柳州南端。1974年以前，鹅山路是一条只有4.5米宽的泥土马路。西通城乡，西南为柳州工程机械厂、微型汽车厂及柳铁运输学校，东到市区。马路周围均是茅草山坡。1937年9月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动工兴建，1938年9月通车。接着于当年8月桂林至柳州段开工，1939年12月竣工。至此，衡阳至桂林、桂林至柳州站通车。通车后，从北向南进入柳州站只有三股道，两边股道相距约50米左右。

随着柳州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设不断发展，鹅山路行人、车辆越来越多。由于鹅山路面比较狭窄，使鹅山路经常出现堵塞。为了缓和鹅山路交通堵塞的状况，1974年10月，柳州市城建局和柳州铁路局通过协商，兴建铁路和公路两用立交桥。该桥由铁路局设计院设计，工程处桥隧工程段施工。立交桥设计跨越柳州市鹅山路，还穿越7股铁路线，分别由4座（每座分3孔2至8.7米或1至10米）桥组成立立交桥。每组桥的纵向即顺铁路方向均与鹅山路公路斜交，斜交角均为 $62^{\circ}40'$ 。桥下分公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行人道。路面到桥底的距离，其中机动车道（亦称主道）净高5.0米，非机动车道净高3.0米，人行道净高2.8米。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分上、下行，分别对称于立道两侧，采用与主道不同标高，这是为便利交通和充分利用空间，减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的坡度而设置。主道即中跨宽9.32米，非机动车道宽5.13米，人行道宽2.55米。鹅山公路路面采用沥青路面，总长为800米，其中除了包括4组桥下路面外，还有一座人

行天桥。即越1、2道的一组桥。由于车站站台延伸的需要，1991年亦加宽及延伸了人行道。

柳州立交桥桥组，采用全面连续版梁，其中1、2道由7片版梁组成，梁底宽12.496米；3至4道、5道由8片梁组成，梁底宽14.276米，湘桂正线一组有6片梁，梁底宽10.716米，黔桂正线一组有5片梁，梁底宽7.240米，桥全长均为27.40米。

桥组地段地质、表层为粘土，人工填筑年代转之，为老土性相似，下伏层为石灰白云质灰岩，分布在地表以下12至15米间，白云质灰岩表面侵蚀较严重，呈高低不平状。这一段区域地下水位很不稳定，附近水塘、水池及水沟水影响很大，因此，该桥组部分基础下层土质通过压浆，做硬化处理。在立交桥施工前专门设计了13孔眼做地质钻探，并根据钻探资料设计，要求桥台基底压应力210kga，桥墩基础设计基底应力2.00kg厘米，桥台坑回填土夯实最佳密度要求达到95%。在1、4组桥施工过程中，发现基础下地质与设计有些出入，并及时地提出相应处理措施。在以后的2、3组施工中，把原设计基础厚1.00米改为1.1米，以提高基础承载能力。

桥台及桥身是桥组的主要控制工程，在施工中，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尺寸及形式。其中全桥的桥台含工程量2,215.31米，桥墩含工程量966.01米，全桥用钢量40,293.54公斤，基础钢轨工程量71,424.80公斤，土方工程量24,472米，砌片石工程28,822.4米。鹅山路总投资为173万元，是柳州市第一座立交桥。同时，从结构到使用上，都优于南宁、黎塘立交桥。

该桥从1974年10月施工于1975年9月竣工并开通使用。鹅山路立交桥规模壮观，自建成以来，为柳州市铁路交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为龙城增添了一处景观。

(北桥)

柳铁鹅山公园

伍齐信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经济建设日益兴旺，鹅山四周铁路职工住宅林立，职工群众迫切希望能将鹅山开辟为一个游乐园地。柳州铁路局党政领导十分重视铁路职工的意见，于一九八七年六月首先在鹅山红岩区，建造一幢“柳铁青少年活动中心”，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内有电脑室、航模室、乒乓球室、音乐室、书报阅览室等，供青少年、学生开展业余文体科技活动。一九九零年一月三十日，局领导办公会决定修建“柳铁鹅山青少年公园”，并决定由孙中文副局长牵头，具体工作由局团委实施。同年二月初，局领导亲自查勘地形，决定立刻修建，造福于子孙后代，并定名为鹅山公园。四月一日，鹅山公园正式破土动工。

修建鹅山公园，需要资金400余万元，大部分由柳州铁路局以集资捐款形式筹集。修建计划定五年全部完工。总的设计指导思想是：借鉴传统建筑形式，应用现代化建筑材料及现代意识创建出反映铁路特点，别于其它公园的特色来。

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柳铁老红军杨志宏、杨世贵、陈西民、李明、杨正国、谷庆斌在局领导曾宗标、孙中文的陪同下，听取了汇报，并视察了鹅山公园工地，进行了座谈，老红军关心下一代，为建设好公园献计献策，提出把原计划后期工程上山缆车改在前期实施，早日建成广西一绝。这样既可以方便山上建设运料，又可供人上山游览，既考虑娱乐效果，又考虑经济效益。这个好建议，在场

的局领导立即赞同，并指示公园建设的有关领导照此办理。从1990年4月1日起，至1990年6月，短短三个月，单位和个人共捐158次，金额50余万元。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在鹅山脚下举行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公园建设第一期工程竣工典礼。

鹅山公园现行已修建的工程有：

一、冠亭。冠亭是鹅山公园第一亭，位于鹅头顶峰，高7.65米，呈六角型，造型借鉴传统形式，以简练手法尽量表现其现代材料的力度美。冠亭寓意鹅之冠。且说明其在众多景点建设中首先问世，登冠亭观景，柳州市风光大都可收眼底。有诗曰：瀑誉龙城属八景，冠飞鹅岭第一亭。

二、闻笛亭。闻笛亭是冠亭姊妹亭，同在鹅头主峰相对而立。闻笛亭较冠亭略小，采用同样设计手法与建筑形式，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因站立在该亭可常听火车笛鸣而得名。闻笛亭有楹联：闻笛起舞，仙鹅借景九天去；抚琴讴歌，墨客怀情四海来。

三、园志碑亭。园志碑亭位于鹅山鹅之颈处，该亭座落在一个200平方的平台上，鹅山公园园志碑立在亭侧。园志碑亭造型线条流畅，亭面为两只白鹅展翅欲飞，新颖精巧，象征从此亭可左右攀登鹅头峰及鹅尾峰，园志碑亭有楹联：寒暑皆适宜，往来随歇息；风光无限好，左右任登临。

四、鹅山山门。鹅山山门依就两块自然山石，顺其形而建成两只白天鹅交颈相戏，构成一个洞开的大门。气势不凡，寓意深刻，为鹅山公园第一景。

三条游览道路。一号路从鹅山山门通至鹅脖亭（园志碑亭），宽为2米，长约150米。上山道路已修至鹅山顶峰，全长709米，皆由青灰石板铺砌而成，有栏杆，游客可以漫步登上鹅山峰顶。二号路是鹅山山间曲幽径，宽为1米，长300米。有鹅山悬崖峭壁洞穴，乃柳宗元读书避暑之地，联楹是：鹅岭梅香刚吐蕊，龙城柳色尚含烟。三号路，是上鹅山头的路，宽为1米，长300米。此路上到约50米处，

分叉两路而行，左边一条到鹅山头亭为止。右边一条到鹅头山崖。

广西一绝，鹅山观光缆车。于1992年12月竣工，1993年元旦投入使用。观光缆车使鹅山更显露迷人的风采。从鹅山山门拾级而上到海拔104.8米处，就是索道的下部站。上部站位于鹅山海拔205.8米处，离鹅山峰顶还距25米。两处垂直高度为101米，夹角22度，索道全长355米。缆车采用单线吊舱式，往复运行，两组采用飞机钻和航空玻璃制成串列式车箱，上挂缆车六台，车内各有6个座位，这些缆车是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缆车沿索道上、下行全程为10分钟，每秒钟运行速度为2.5米，单向每小时可运送游客240人。牵引动力是40千瓦电机，并配有意外停电保护装置，乘坐缆车绝对安全舒适。游客在车中可饱览鹅山柳水，凌云飘飘，欲入仙境之乐趣。

红杏一枝出墙来

柳州一职校 侯建雄

一、诞生

柳州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前身是柳州市十中，创办于1965年，是一所鲜为人知的普通中学。1982年，在全国教育体制改革中，校长朱沧平另辟“阳关道”。在十中创办了电子、烹饪两个职业高中班。这就是襁褓中的一职高，她只有77名学生，一名专业老师，以及不到二百平方米的烹饪、电器实习场地。

1983年学校开始扩大招生，并正式命名为“柳州市第一职业高中”。

二、成长与壮大

朱校长从日本考察回来，立即投入筹建生产实习基地及组建专业教师队伍的工作，为一职高后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984年，汤来兴同志接任了校长。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学校建起了一幢有120床位的宾馆，内含能容300人同时就餐的餐厅，还办起家电维修门市部和美发厅等校办企业。这些企业对外营业，为社会服务，更主要的是我校学生生产实习的重要基地。

1984年第一批职高生毕业了。他们有的进了电子工厂，有的进了工厂、机关的食堂。他们首次向社会展示职业技术教育的风采。

1985年，学校又增开了微机、旅游服务管理两个专业。1989年又增设塑料成型专业。至此，学校已开设六个专业。由于社会的不同

需求，电子、微机、旅游服务管理和塑料成型几个专业先后升格为中专学制，为社会培养较高一级的专业技术人才。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民族画报》、中央电视台……等都报道了学校的办学情况，吸引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为此，国家教委在1986年和1990年先后两次授予学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称号。1990年，国家教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认定学校为自治区（省）级重点职业高中。

三、领导与教师

校长汤来兴1985年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1988年为全国中小学先进德育工作者，书记张文军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这些同志都有强烈事业心。他们同心协力，锐意进取，率领全校师生努力开拓职业技术教育的新路，取得了诸多的成绩和荣誉。

在学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学校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他们采取在职培训、改行、引进人材等办法吸引专业教师。学校的兴旺吸引了大学教授、讲师及专业技术人才。几年时间，学校的专业教师从一人发展到现在的48人。目前，学校有高级教师9人，一级教师52人，本科毕业生52人，专科毕业生46人。

这些教师中有一批同志获得全国、自治区、市的各种奖励。他们中有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青年教师龙陵英两度获得“市十大明星教师”和“十佳青年教师”称号。

四、关 怀

1990年4月的一天，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有关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我校，他视察了学校的实验楼，观看了学生在电子实验室的操作，并在语音室与旅游专业的学生用英语对话。

来到学校的面包厂时，他高兴地品尝了面包。在美发操作室里，他欣然坐下让学生吹了一个头型。他高兴地说，职业学校就应该这样

“真刀真枪地干”。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留下墨宝：“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人才”。职教司司长杨金土1992年11月挥毫写下：“为柳州市的振兴广育英才”的题字。

五、桃李芬芳

在园丁多年辛勤栽培下，校园已是桃李芬芳满园春了。有的学生的论文发表在全国的专业报刊上；1991年、1992年共有15名微机专业的学生通过了国家级的专业考试，取得初级程序员的技术职称；一批学生在全国、自治区、市的专业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其中1992年11月烹饪专业的李文森、苏海林、叶宏刚和刘宇在全区职高烹饪邀请赛中夺得六个单项中的四个桂冠，微机专业学生申浩在1992年全国职高“浪潮杯”微机比赛中一人夺得两个名次，覃婷（女）在1993年暑假代表广西参加全国青少年信息学（计算机）比赛；文艺会演、体育竞技均在市里名列前茅。

职业高中不像普通中学一样肩负往高等院校输送人才的重任。尽管如此，1986年至今，仍有20名学生考取了高等学府，其中黎志光考取公费赴日留学。

几年来，学校为柳州市200多家工厂、企业以及深圳、珠海特区输送了2,000多专业技术人才。在这些毕业生中，尹海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不少毕业生在国家、自治区、市的技术竞赛中获优胜，更多的成为单位里的技术尖子。学校的毕业生普遍受到社会的欢迎，每年的毕业生均供不应求。

六、校办企业

学校创办初期，只有200平方米的烹饪、电器两个生产实习基地，发展至今已有近一万平方米的烹饪、电子电器、旅游、电脑、塑料成型、美容等七个专业相配套的基地。学校这些基地以自己独有的特色参加市场竞争。飞鹅宾馆宾客常满，飞鹅餐厅以物美价廉，服务上乘

在河南一带小有名气；杜白莉美容厅是爱美的人们的好去处；镀锌管厂生产、经营相结合取得良好效益……它们不仅承担了教学生产实习任务，也在为学校创造财富。八年来，共创收 200 余万元利润。

七、改革新举措

回顾学校多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职业技术教育必须不断突破原有的格局，才能向前发展。为此，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新举措。

1984 年以来，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引进人才，培训师资，大量投资增加教学设备，加强和扩建实习基地，完善办学条件，使学校实现教学、实习、生产、经营为一体的职业教育新模式，且越办越有特色。

1989 年学校实行结构工资，把教师的辛勤劳动和经济收入挂钩，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1991 年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前夕，学校经多方努力，派出了 109 名师生参加了大会的联络、烹饪、礼仪和服务工作。师生在民运会的出色表现，一展职业教育的风采，赢得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把学校的声誉扩展到全国各民族心目中。

在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的精神鼓舞下，学校领导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利用国家贷款，三个月内，就办起了三个企业。其中，在边关凭祥办起了新的教学点——飞鹅大酒店，以其独有的优势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人才效益和经济效益。烹饪专业生制作的菜肴居然端上了凭祥市委招待各级领导，招待美国、日本、南朝鲜、港、澳等国内外宾客的筵席；旅游专业礼仪小姐的上乘服务更受各路宾客和凭祥人的青睐。这家“娃娃酒家”开业不到 150 天，营业额就达 40 余万元，使学校的工作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学校还深化内部机构的改革，充实各处室，配备助理，建立企业办公室，成立一支主管经济管理的教师队伍。在教师中实行优化组合，以专业组为主，实行组长责任制。

八、满园春意

1987年毕业的李九忠，是坐着轮椅来上学的。他毕业于十中，以500多的高分考取重点高中，然而，由于身体条件差，被拒之门外。一职高重新把他招回来。同学们自觉地向他交朋友，每天上下学都推着他，而他不负众望，始终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一职高给了他一门维修电器的技术。毕业后，他自强不息，成了一名家电维修的个体户。

无独有偶。1990年新生入学时，由家长带来了一名叫黄进光的学生。他1989年中考录取在一职高，但开学前一场大病使他致残，行动语言均受阻，病休了一年。此时，学校领导面对这样的学生，作出让他试读一个月的决定。于是，他成了90电子（1）班的一员。班主任汪葵老师发动全班同学伸出温暖的手，帮助他战胜病魔。从此，同学们都自觉地帮助他，每天用自行车送他上下学。一年后，全班同学又捐款为他买了一辆小三轮车。教师和同学们的温暖挚爱扬起他生活的风帆。现在他每天蹬着这辆车自由自在地上下学。

1992年的中考，从中考办又转来了一份要求照顾入学的报告。坐轮椅的唐峰，以500多的高分被破格录取了。由于家住柳机，他把学校的课程带回家自学，只参加学校的考试。92电子班的同学没有把他遗忘，在团支部和班委的组织下，每周一次到唐峰家去帮助他学习，和他谈心，让他了解学校，了解班级。每逢春游，文艺会演，同学们就把他接来同乐。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他的成绩名列班级前茅。

1992年春节刚过，寒风细雨，88家电班的朱海文在厂宿舍区听到呼救声，他立即赶到水塘边，跳下污水中救起一名三岁的小男孩，并用刚学过的人工呼吸法把昏迷的孩子救活。孩子的家长几次来到学校致谢，称朱海文为“九十年代的活雷锋”。

九、校园的变迁

1982年初办职高班时，校园内仅有不到200平方米的烹饪、电器生产实习基地。

1984年在上级的关怀和扶持下，学校建成了宾馆大楼。1985年一幢六层的实验大楼拔地而起，内含电子、电工、电器、微机、美容、烹饪、语音、摄影、服务等实验、操作室。学校为这些生产实习基地配备了较为完善的教学设施。1992年又扩建了宾馆和实验大楼。

1988年学校建起第一幢七层楼28套的教工宿舍，1990年建起第二幢，改善了教师的住房条件。

1990年新建了办公楼，内部装修豪华、舒适，改善了教师的工作环境。办公大楼内含学校的图书室，资料室及师生阅览室。图书室藏书21,388册，有报刊、杂志284种，宽敞、明亮的120座的阅览室称得上柳州市第一流。

十、外宾

几年来，到我校来参观的不仅是区内外的专家和同行，更有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的外国朋友及港、澳同胞。

1984年，来自日本的一批参观者到我校，他们参观了学校教学设施，实习场地等，最后，他们被烹饪专业学生制作的精美点心和菜肴吸引住了，围着餐桌兴高彩烈地议论着，赞扬着这些诱人的佳肴，喷香的点心引起他们要品尝的欲望，纷纷提出：是否可以尝一尝？我们根本没想到客人会要求品尝。这一下，忙让人准备筷子和餐巾，然而这些日本客人已等不及，主人同意后，他们就五爪金龙地拿起点心吃起来，有的还从兜里拿出纸，包起一、二个精美点心，留着回去慢慢品尝，在场的摄影师看着他们的样子，只顾得惊诧，却忘了把这精彩场面给拍下来。

美国教授卡维奇已三次到我校。1988年，他又随同三个美国专家一起到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他们对我校的工作给予较高的评价。

新加坡来的朋友对我校旅游服务专业的学生表现出的专业技能极为赞赏，并邀请她们到新加坡去工作。

柳南辖区“8·31”抗洪救灾实录

刘春香

一九八八年八月下旬，由于柳江与红水河流域连续降下大雨，自一九三一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在象州石龙附近三江口相遇，柳江洪水被顶住而渲泻不畅，致使柳州市遭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水袭击。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柳江洪峰水位高达八十九点零四米，仅次于一九四九年的八十九点三一米。柳州市六十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百分之二十的面积被洪水淹没，柳南区则是柳州市洪水险情较重的地区。然而，在党中央、国务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亲切关怀下，在柳州市委、政府的领导和柳南区党政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全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奋力抗洪救灾，夺取了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现将“8·31”抗洪救灾情况概述如下：

一、洪水袭击的街道及单位

八月二十九日，汛情发展，三十日晚上，柳江洪水以每小时二十多厘米的速度急剧上涨，到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柳江洪水最高水位已达八十九点零四米。由于柳南辖区地处低洼地带，无情的洪水凶猛地向我区袭来。全区有二十二个居委会四十二条街道，八十三个单位被淹。四十二条街道是：西闸巷、西一街、西二街、西三街、红光小区、河南新村、菜园屯、鹅山路、南站路、南站一区、南站三区、南站四区、南一菜市区、车渡区、鹅岗一区、鹅山路一区、鹅山路三区、鹅山路四区、鹅山路五区、鹅山路六区、鹅山路九区、上游路一区、上游路二区、上游路四区、红岩路二区、永前路一区、永前路三

区、永前路四区、永前路五区、革新路、东站一、东站二、柳邕三、排灌站路、城站路新风区、磨滩路、南九配电区、南九钢厂区、红桥路新区、红桥路三区，西环路、和平路。八十三个单位是：柳州机车车辆厂、柳州石化建公司、柳州市食品加工厂、柳南工商分局、柳南法院、柳南检察院、柳州市果品仓库、柳南交警中队、柳南水厂、柳州市飞鹅煤店工地、八一锰矿柳州办事处、柳州港务局河南码头港务所、柳州市装卸机械厂、柳州长虹机械厂旅社、柳州市勤丰汽车出租公司、柳州市汽车运输公司、柳州市城站路小学、柳州地区机电公司门市部、柳州市中药厂、柳州市红庙港务所、柳州市土产公司河南批零商店、柳州市豆制品公司、柳州地区化工公司、柳州冷冻厂、柳州市造纸厂、柳州市冷冻机厂、柳州地区农机站、柳州地区汽车配件厂、柳州市锰品厂、柳铁东站卫生所、柳州林业基建公司、柳州二级站大楼、柳州市食品公司新大楼、柳州农药仓库、柳铁一中、柳南公安分局、广西井巷公司、柳州市耐火材料厂，柳州地铁处、柳州市南疆饭店、柳州市工贸批发店、柳州市南站水果店、柳州市糖烟公司南站日夜店、柳州市南站百货商店、柳南区洞天酒家、柳州市风华旅社、柳铁设计院、柳铁招待所、柳州市柳南邮电分局、柳铁防疫站、柳铁柳苑饭店、合山电厂柳州招待所、柳铁客运段及知青商店和知青饭店，柳州市南站粮店，柳州市南站菜店、柳铁分局幼儿园、柳铁青少年宫、柳铁一小、柳铁五中、柳铁第五幼儿园、柳铁环卫队、柳州市南站五金商店、柳州市南站派出所、柳州市公共汽车公司二车队、柳州市食品公司菜市屠场、柳州市铁木制品厂、柳铁养路工区、柳铁水电段、柳州市丝绸厂、柳州市美术陶瓷厂、柳州木材厂、柳铁建材厂、柳铁电务配件厂、柳铁工程医院、柳州市葡萄糖厂、柳州市河西养鸡场，柳州市工具厂、柳州市塑料制品厂、武警二支队、柳州市印铁制罐厂、柳州市综合机械厂。

洪水袭击的四十二条街和八十三个单位，使五千七百四十五户被淹，二万九千余人被围困，倒塌房屋二百六十四户计二百七十间，面积达四千五百二十三点七四平方米，洪水造成危房一百二十九间，

面积达三千零九十点四九平方米，使二千四百七十二人无家可归；辖区公路中断九处；损失家用电器、马达、发电机、糖烟、汽车配件、电子元件、电器化工材料、水泥、珍珠岩粉、耐火粉、汽车座垫等物资，折合人民币达六十五万八千零九十五元，群众财产损失折合人民币一百零四万八千九百三十八元。洪水给柳南辖区带来的灾难和损失是严重的。

二、组织力量抗洪抢险

“8·31”洪水是无情的。但是党和政府对人民是有情的和关心的。柳南区党委和政府对抗洪抢险工作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抗洪救灾，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全区无一人伤亡，经济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充实防洪抗洪力量。早在洪峰到来之前，区政府就十分重视防洪工作，充实调整了区防洪领导小组成员，并多次召开办事处主任会议，要求他们调查摸底八十六米以下，低洼地居民房情况，预测灾情可发性。八月二十五日开始，区政府、办事处日夜值班，密切注视水情。八月二十九日汛情发展，区政府连续两次召开紧急动员大会，传达市委市政府关于抗洪抢险紧急会议精神，布署我区抗洪救灾工作，要求干部、群众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投入抗洪抢险。与此同时，迅速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部，区长龚明辉担任总指挥，副区长蒙凤生、武装部部长姚本强担任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办公室、宣传组、保卫组。随时听从指挥，统一调度全区车辆、人力、物力，保证抗洪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区委、区府和武装部的领导，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们深入抗洪抢险第一线，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克服困难，抗洪抢险，给广大群众抗洪救灾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二是组织抗洪抢险队，奔赴第一线。为了及时解救受灾群众，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柳南区委、区府于八月三十日上午召开机关干部紧急会议，迅速组织抗洪抢险队，奔赴灾区。第一中队队长何庆富，带领抢险队员11人到柳南办事处抢险；第二中队队长黄雄杰，

带领抢险队员 11 人到南站办事处抢险；第三中队队长刘英宽带领抢险队员 13 人到鹅山办事处抢险；第四中队队长杜启勋带领抢险队员 10 人到河西办事处抢险；第五中队为机动队，队长王太生带领 11 名队员随时待命，听从指挥，到最需要的地方抢险。各抢险队积极配合各办事处抢险，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抢险队员。他们废寝忘食地抢救群众生命和财产，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给群众，给广大灾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区委，区府在组织抢险队的同时，还组织机关、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区医院、区公检法和区属工厂等 678 名干部，积极投入抗洪抢险的战斗。各级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抗洪抢险中不怕苦，不怕累，不计工作时间，不讲劳动报酬，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领广大群众抗洪救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

三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各方紧密配合抗洪抢险。从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二日，在柳南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辖区有关单位、职工、群众、军队、民兵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大家互相协作，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谱写一曲抗洪救灾的胜利凯歌。柳州十一冶公司、柳州机车车辆厂、柳州工程机械厂、柳州微型汽车厂、柳二空、柳州电机总厂、柳州市钢改厂、钢圈厂、装载机厂、葡萄糖厂、丝绸厂、美陶厂、冷冻厂等单位主动到区政府请战，在柳南区武装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先后派出民兵预备役部队战士 1,786 人次投入抗洪救灾。54465 部队、53014 部队和 53013 部队共派出 525 名官兵支援我区抗洪抢险。广大战士和民兵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日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为保护国家物资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辖区各大单位在抗洪救灾中做到有人出人，有物出物，想方设法保证抗洪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据统计，在抗洪救灾中辖区各单位出动车辆 112 辆，支援竹排、橡皮艇等 61 个，电台 8 台，有力地支援了我区抗洪抢险。

由于柳南区党委、政府对抗洪抢险工作重视，措施得力，经过

全区人民奋力拼搏，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据统计，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922 人，抢救和转移国家物资 619 吨。对居民群众的房屋倒塌和损坏情况，及时调查登记，上报有关部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补助。

三、检查疫情，清理灾区

洪水退后，许多污泥垃圾堆满了路面，臭不可闻。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保证良好的市容卫生和人民的身体健康，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柳南区政府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有关力量，又投入了检查疫情、清理灾区的战斗。

一是成立了柳南区卫生防病、救治工作小组。组长由柳南区卫生科科长李元豪担任，副组长由区医院副院长周国汉、区防保站副站长韦庆远担任。组员 11 人，分成 6 个组，其中 5 个组分别下到各办事处。另一个组为联络组。各小组主要任务是收集疫情上报，搞好卫生宣传，为灾民治病及做好灾后消毒的技术指导。防病救治工作组深入各居委会，把宣传资料和消毒药物送到灾民家中，并为广大灾民示范消毒，使灾民掌握消毒方法，被淹房屋基本上都进行了消毒。防病救治工作组在灾区还为灾民治病 730 人次，发现腹泻病人 9 例、红眼病 275 例，白喉病 2 例，都给予了治疗，防止了传染病的传播。与此同时，防病救治工作组还对辖区的重点蚊蝇孳生地和被水淹过的 15 所公厕、27 个垃圾点、13 条臭水沟进行了消毒。在防病救治工作中，小组的同志们利用 2 天时间对辖区食品卫生进行了检查。共检查饮食摊点 36 个，糖烟店 15 个。重点检查了一些冷饮、凉茶摊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其中对 6 个冰室、5 个凉茶摊进行了停业处罚，将其原料全部倒掉，以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二是政协委员调查灾区疫情，检查灾区卫生。为配合抗洪救灾工作，尽快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柳南区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的委员们于九月四日至六日利用三天时间，深入到柳南辖区五个办事处、十四条街、三个工厂进行卫生疫情调查。

他们不怕辛苦，走街串巷，到灾民家中访问，向群众宣传灾后防病治病方法，告诉人们搞好环境卫生，消除传染病源的重要性和应采取的措施，并对有传染病的可疑人员及时检查治疗，消除隐患。除此之外，他们依据实地考察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向区政府领导作了汇报，并建议区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医卫组的建议很快被区政府采纳，对灾区的环境进行了整治，迅速恢复了灾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有效地防止了传染病的发生。

三是组织力量突击清理重点灾区

柳南辖区的四十二条街道被洪水淹过，退水后的大街小巷和一些工厂满是灾后的污痕残迹，特别是红光路边的新村中区民房，因受灾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圩。南站路、红桥路、红光小区、葡萄糖厂、美术陶瓷厂、丝绸厂等路段和工厂垃圾污泥成堆，影响交通和生产。为减少损失，尽快恢复生产和交通秩序，柳南区政府在广泛发动群众自清自扫的基础上，又组织力量突击清理重点灾区。九月二日至四日，柳南区机关干部全部出动清理灾区环境卫生，各大厂民兵和53014部队的数百官兵在清理灾区工厂、街道卫生中又立下了汗马功劳。全区共清除垃圾污泥46,000多吨。经过清扫后的灾区，道路整洁干净，秩序井然，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十分高兴。

洪水无情人有情

——美术陶瓷厂“8·31”纪实

1988年8月31日，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将柳州市三分之一的城区变成了一片汪洋，有337家工厂受到了洪水的突然袭击。地处柳南区西环路的美术陶瓷厂，由于地势低洼，几小时内涌进洪水达2~3米深，正在高温烧制产品的69米隧道窑和四孔堆板窑突然被洪水包围，热气不断向外扩散，窑边水温高达百度，万幸的是没造成人身伤亡事故。洪水来临前，工厂正赶发往东北大庆的4000箱产品刚刚装好车，洪水就切断通往西环路的所有路面，两部汽车困在途中进退不得。8时，洪水又上来了，涌进车间、仓库、价值30多万元的半成品，成千上万只石膏模具，还有十多万元的纸箱、化工原料以及几十万元的上百种出口的陶瓷产品，倾刻间淹没在洪水之中，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传来产品的倒塌声，水面到处飘浮着坯板、纸箱和各种陶瓷。一场来势凶猛的洪水将昔日宁静的、花园般的美陶厂扰袭得七零八落。

这时，在家主持工作的只有陈副厂长，其他领导外出开会、出差。她召开了中层干部紧急会，安排布置全厂各部门做好抗洪工作，确保生产正常进行。由于事先不知洪水高度，只是按往年做法，所有能搬动的东西只是堆放在离开地面1米高的架子上。谁知8时40分后，洪水又吞没了一切，怎么办？陈副厂长只好打电话找主管公司——柳州市工艺美术公司，汇报灾情和请求援助，但是，公司无人接电话。工厂只好向武警二支队求援。部队领导急工厂所急，想工厂所想，当即从4公里外的下属连队抽调200多名官兵火速赶到美陶厂与厂职工一道组成一支军民抗洪抢险队。从早上9点一直奋战到下午3时，从

无情的洪水中夺回了一部分财物，保住了一批机电设备，挽回了十多万元的损失。

下午4时，部队领导又亲自划着竹排到美陶了解灾情，当他们得知还有几十户住家需转移时，又主动派出30多名战士，从厂后门游水进入厂宿舍区。当时，大雨倾盆，浊浪滚滚，洪水仍凶猛地冲来。孤儿寡母的吴社凤母子三人被困在家出不来，情况十分危急，武警战士及时赶来，他们手拉手、肩并肩，挡着激流，淌着深水将吴社凤母子三人安全护送到几十米远的厂部办公室二楼上。在途中，一战士被陶瓷碎片割破脚，伤势很重，但是他忍着巨痛，一直背着吴社凤的小儿子到达目的地。后来，战友们背起他送往部队急救。危难之中见真情，人民子弟兵在“8·31”抗洪救灾中用鲜血凝成的军民鱼水情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争相传颂。

9月1日凌晨2点，洪水距厂办公室二楼仅差10公分，这意味着刚刚摆脱洪水围困的人们又重新陷入了洪水的威胁之中，而这次却是无路可走了。加上停水断电，楼上这200多职工家属面临着危机。留守在厂部的陈副厂长想起了柳州电台《抗洪抢险特别节目》，立即给电台打通了电话，请求紧急援助美陶厂。不到5分钟，收音机里就传来了美陶厂的呼吁和有关灾情报导。深夜的电波，传遍了龙城，牵动了无数市民的心。这一夜不断从外面打来一个个关心、询问灾情的电话，有熟悉的，更多的却是素不相识的，美陶厂成了市民关注的地方。

这一夜，在市政府值班室里，原副市长刘知炳亲自主持召开如何援助美陶厂的紧急会议。

9月1日凌晨，由市政府派出的柳南区、工程厂、微汽厂、十一冶、河西派出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救援队划着皮筏、木排到来美陶厂，给受灾群众及时送来食品和防治红眼病的药水。此时此刻美陶厂职工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在接过一份份慰问品时，饱含热泪。70多岁的谭伯妈说：“我这么老还是头一回见涨这么大的水，旧社会也发过大水，那时不知死多少人，水退后死尸摆满街，无人过问，今天

是多亏有共产党领导，时时关心我们，还是新社会好，这救命之恩今生今世也报答不了。”

这一天龙潭公园也用汽车送来2只小船，载着受灾群众到武警部队招待所。

这一天柳州电视台也及时赶到美陶厂拍下了一组组感人至深的场面；拍下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美陶厂留下的巨大创伤。

这一天从早到晚，很多人冲破洪水的封锁进入美陶厂探望抗洪救灾的职工，了解灾情。原二轻局党委书记毛维恭（退休）、副局长郑素华也来了，尽管只是一两句轻轻的问候，也使美陶厂的职工感动得热泪盈眶。

9月2日清晨，厂长胡光裕风尘仆仆地从南宁开会赶回来了。兴冲冲地扛回一面全国少数民族用品先进企业的奖旗。然而，迎接他的是几百米倒塌的围墙，7万平方米的厂区堆满了灾后的垃圾，直接经济损失达173万元，这对于一个不足300人，固定资产不过400万元的小厂，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胡厂长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他万万想不到这几年，他苦心经营、全厂职工共同的努力，使原来长期亏损的一个小厂，变成一个初具规模、产值、利税翻番，并多次荣获市、区先进单位的工厂，在一夜之间被洪水洗劫一空。他望着自动来厂关心灾情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望着几天几夜与洪水作殊死拼搏的精疲力尽的干部和职工，激动地说：“当年，我们美陶厂能够从一片废圩走过来，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这废圩中站立起来。洪水冲垮了我们的工厂，但是人还在，我们的精神不能垮，拿出当年创业的信心和勇气，我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力量的无私援助和支持，我们一定会再创一个全新的美陶厂。”厂长表达了全厂职工共同的心声。过去在吃大锅饭的旧体制下，职工的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受到束缚和窒息，职工对企业的兴衰存亡，表现得冷漠和麻木不仁。现在不同了，自从1984年美陶厂实行改革以来，年年都有大变化，仅职工收入一项是改革前的3倍，企业效益的好坏与职工经济利益紧密相连，职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工厂的命运，这

就是大灾面前众志成城的重要原因。“爱我美陶，重振家园”，在职工中汇成一股恢复生产的强大动力。

9月2日上午9时整，在市委书记王仁武的陪同下，自治区主席韦纯束、水利电力部部长杨振怀等领导专程来到美陶厂详细了解受灾情况，并鼓励职工们尽快恢复生产，弥补受灾损失，直到近10时才离去。

这一天区工艺美术公司黄帮武经理专程带队从南宁赶到美陶厂，积极帮助解决恢复生产急用的钢材和木柴。

这一天由柳南区政府组织的预备役部队近1,000人次，分批到美陶厂进行灾后清理工厂的义务劳动，克服了种种困难，清除各种废弃物达1,000多吨。

这一天，由区、市保险公司一行6人赶到美陶厂进行现场查勘定损。三天后预付30万元赔款，有效地支持企业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最后美陶厂总共获赔款77.40万元人民币。

这一天，市郊百露纸箱厂厂长申长松拿着一张5,000元支票亲自送到美陶厂，他代表他的并不富裕的只有86人的小厂对美陶灾后恢复生产，渡过难关，给予无偿赞助。

各级领导的深切关怀和社会各界力量的援助，使美陶厂的职工感动不已。

在清理69米隧道窑时，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几十部窑车上面堆满了烂泥和残物，臭气难闻，蚊子成群，烟道、轨道里面积满了脏水，河西消防中队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开来消防车帮助抽水。窑里又窄又黑，窑车轮由于生锈被卡死，工人们硬是用肩扛，用手撬，用铲子一点点往外移，将这几十部重千吨的窑车拉出来清理。到9月11日止，全厂4个车间、7个仓库全部清洗得干干净净。

9月17日在湖南礼陵窑炉工程队的通力合作下，69米隧道窑和四孔堆板窑全面修复，并开始点火。9月29日灾后的美陶厂经过重整旗鼓，终于烧出了第一批产品。

10月中旬，美陶厂在柳州宾馆如期召开了有11个省、市代表参

加的美陶产品订货会。当全国各地的客户得知美陶厂在受灾严重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恢复生产，提供订货样品，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时，代表们非常感动。新疆电热电器厂李厂长说：“美陶厂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这说明他们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有一种可贵的自信力和凝聚力，美陶厂值得我们信赖和学习，与这样的企业打交道是我们的骄傲。”这一次订货会的成交额突破120万，超过任何一次会议。

10月下旬，美陶厂全面完成了与市政府签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提前2个月进入了1989年。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当在“8·31”期间目睹美陶厂受灾情景的记者，又重新回到这里时，看到的比想象中的更好，美陶厂依然是花红柳绿，生产线上一派繁忙，井然有序，职工情绪饱满，这里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灾情，唯一可辨的是约在3米高的墙上，用油漆涂写这样一行醒目的数字：1988年8月31日洪水水位89.04米。

“8·31”柳江铁路大桥抢险记

欧阳侃

柳江特大桥位于柳州市西南区，湘桂铁路柳州北站与柳州站区间，中心里程 531·287 公里处。民国 28 年（1939）修建湘桂铁路时先建成木便桥，翌年改建为半永久性桥，1944 ~ 1949 年因战争先后多次被破坏。建国后，1950 年在湘桂铁路抢修中，建成 12 孔 48.285 米下承钢桁梁，钢筋混凝土墩台的正桥，全桥长 616.2 米，是湘桂铁路和联接黔桂、焦柳、黎湛铁路通往祖国各地以及保证广西铁路客、货运输的“生命桥”。

柳州解放后，上级要求立即抢通铁路。衡阳铁路管理局决定按原桥设计方案抢修柳江特大桥，组织柳州桥梁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担负柳江特大桥 2 座桥台和 #7 ~ #10 号桥墩新建工程施工。1950 年 2 月 12 日开工，4 月 20 日完工，完成混凝土 2,257 立方米。并组织柳州第二桥梁队负责 12 孔钢梁和通信电缆架设任务。推广采用我国尚属首创的多孔连接拖拉法架设钢梁，加快施工进度，提高工程质量，柳江特大桥于 1950 年 8 月 30 日建成，并正式通车。比原定计划提前 4 个月。全桥造价为 333.72 万元。

柳江特大桥跨越柳江。柳江是珠江流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贵州省独山县境，上中游为山区，植被茂密，雨量充沛。流域中部为多雨区，年平均降雨量为 2,000 毫米以上。上流域汇水面积为 45,785 平方公里。每当山洪爆发，柳江水位涨落变幅最大可达 18 米。最高涨率每小时达 1.28 米，按当今推算，柳江特大桥址处水位可达 90.94 米（黄海高程），最大流量为 34,000 立方米 / 秒。

柳江上游盛产木材，沿江常有木排流放，每到汛期，柳江特大桥常受木排冲击威胁。1988年8月下旬，桂北、贵州南部连降大暴雨，柳江上游融安地区8月30日，24小时内降雨208.4毫米，柳江水位突然上涨到89.05米（黄海高程）。柳州铁路局当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成立以局长为首的保卫柳江特大桥指挥部，研究落实柳江大桥抢险加固方案。实行局长轮流值班制度，组织车务、机务、车辆、工务、电务、物资、公安、生活等有关部门干部职工，日夜奋战在柳江特大桥进行抢险救险现场。并得到当地驻军、武警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8月31日上午6时，柳州特大桥10号墩水位高达89.4米（黄海高程），距离桥梁6.5钢梁底仅1.3米，洪峰流量达27,000立方米/秒，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峰。水面上有大量竹子、竹丛、草堆、大树、树根以及被洪水冲跨的屋架等漂流物，大桥下的吊篮已被洪水淹没，桥墩多处遭受漂流物的撞击。先后有4次较大的5棵树枝横卡在#2、#4、#7、#8桥墩上，严重威胁大桥安全。7时30分指挥部立即选派工务、工程等部门的线路工50名和电焊工6名进行抢险，56名勇士面对桥下洪峰，毫无惧色，立即用安全绳悬吊到水面，数百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和铁路职工也纷纷投入战斗。他们用锯子锯、斧头砍、滑车吊、绳子拉等办法，忽儿拿着抓钩，拨开深入桥梁连接处的漂浮障碍物，时而弯腰进行打捞，消除卡在桥墩上的大树、竹丛和杂物。为保持钢梁稳定，他们用钢板电焊6个钢板支座，并做好用载重列车压桥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26小时连续战斗，终于化险为夷，9月1日8时柳江特大桥解除险情，9月5日18时恢复正常运行。

洪水期间，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水利部长杨振怀带领国务院视察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广西军区政委、柳州地市党、政、军领导同志陪同下，于8月31日上午10时和下午5时亲临柳江特大桥视察灾情和指导救险工作，并转达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慰问，使广大抢险军民深受鼓舞。

有关“振柳营”一些问题的探讨

哨兵

长期以来，居民群众乃至市内学者、史学界人士，十分关心振柳营有关情况。因振柳营原始资料难寻，故而对振柳营一些问题，很难正确定论，现只有从清乾隆二十九年“马平县志”和民国廿年（1931年）经增补后改称的“柳州县志”中，所记载的微小线索和现在世的老年人言谈中，综合提出有关振柳营一些具体问题，向有关学者、史学界人士请教，所提出的问题难免有差错，请给予批评指正。

一、振柳营的建立与性质

振柳营建于明代，设于柳江南岸太平圩（西街）当时称“关梁”，清朝称“营堡”。马平县共设10处。即：振柳营、三门堡（在城东二十五里）、三江堡（在城南十五里）白面堡（在城南五十里、后改“白面塘”）、官道堡（在城南六十里）、响水堡、穿山堡（在城南八十里，今柳江县穿山乡）、乌石堡（在城南一百二十里）、鸡公镇（在四都，今柳江县百朋乡）。10处营堡，分别设于马平县各个通津要道。

振柳营属什么性质？有的说属屯兵之地，是个武装组织。我认为还不能说明振柳营的性质。应该说振柳营既是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如沙塘、东泉镇原也是营堡，是通津要道，既是地方行政基层组织，也是军事组织，以后改为乡、镇。振柳营于民国十年分出谷埠、振柳团局，既是地方行政机构，也是地方治安组织。以后合并为屏山镇。为什么呢？主要是根据当时环境而定。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两广总督张岳镇压马平义军后，首先在

五都（今柳江县洛满乡）建立营堡、立营防守。至民国后，改为保甲制，10户一甲、10甲一保。可惜为什么叫振柳营？现在还弄不清楚。清乾隆廿九年，《马平县志》中的马平县图，在鱼峰山脚旁标有一处“振柳塘”。“塘”、“汛”也是一种地方行政基层机构和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但“营堡”、“塘”“汛”之间有何差别？振柳营、振柳塘是什么关系，谁先谁后，目前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资料来说明，请各学界人士共同探讨。

二、管辖范围

当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振柳营是管整个柳州的（现柳州市），因为“老志书”提到，振柳营设在柳江南岸。另一种认为，振柳营只管柳江南岸。因为当时全马平县共有10处营堡（含振柳营），而且城厢二十五个村圩中也记载有振柳营，柳江北岸有城府，柳江南岸在城府外，振柳营管不了城府。我认为第二种说法较有道理，同意这种看法。

三、具体地域

以现鱼峰区人民政府驻地为起点，东界半山脚（今驾鹤路东端与水南路接口处），西至榨油巷（西闸巷），南为鱼峰山脚南侧，北邻柳江河岸。东西距约1,600米，南北距约850米，共约1,360,000平方米（即1.36平方公里），呈长方形。

四、所属街道（路）

何家塘、黄家坪（现鱼峰路）、谷埠上、中、下街、西闸巷、云头岭、黄泥岬（大同巷）。榕树脚、赵家井、小龙潭。

以上四点的提出主要依据是：

（1）明代乃至清代中期，柳江南岸，人烟稀少，一片荒野。据有关资料记载，此时期，柳江南岸只有太平圩、谷埠街、水南村、窑埠村，以上四街（路、村），均始建于明代。太平圩是古老的街市场，

谷埠、窑埠因物而得名，水南村因地处柳江之南、故名。以上四处，是柳江南岸最早的居民居住点和村落，其余街道、村落均建于清中、末期以后，多数是民国后创建。清乾隆廿九年《马平县志》记载，在厢二十五个村圩，其中柳江南岸有三处，即振柳营、水南村、窑埠村，而太平圩、谷埠街（路）没有记载在内。说明太平圩、谷埠街是振柳营。水南、窑埠两村分别记载，说明它不属振柳营范围。

（2）以“两个五里”（五里桥、五里卡）为据，两个“五里”均以城南脚（鱼峰山）为起点到实地处，均相距五里。这就说明，城南的振柳营的圆周长是：北起柳江河岸，顺东方向半山脚，延伸往南至榕树脚（今屏山大道写字楼处）、马鞍山、鱼峰山，沿西至谷埠街背后的西闸巷，这一长方形地段。

（3）从民十政变后所划分的社团而言，民十政变后（1921年），地方人士感到时局混乱，地方政府已无力维持社会治安，各街道在原供奉的基础上，分别成立振柳、谷埠、云岭三个团局。水南、窑埠以原有不变。说明它原来不属振柳营。谷埠街、云头岭距太平圩很近，随着人口增多、街道建设，原振柳分为三个团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分出后振柳团局辖太平圩、赵家井，榕树脚、小龙潭。谷埠团局辖谷埠街西闸巷、黄泥岬（大同巷）、河家村、牛圩坪，这样范围小，容易组织管理，对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有利，也说明振柳营的性质既是地方行政基层组织，又是地方治安（军事）组织。

以上所述，表面上似有推理性，但实际上是以《柳州县志》记载的微小线索为依据。是否正确，请共同探讨。

华丰湾水碾被拆之经过

梁镇海遗稿

鱼峰山麓小龙潭，是我市风景名胜，古八景之一。由于它在鱼峰山麓，故景中称之为“南潭鱼跃”。潭水四季清澈，虽夏季略有上涨，但仍绿油如镜。潭水在过去市内未敷设自来水之前，是供附近一带居民饮用的。

1942年，因潭水呈黄色、污秽不堪，而消流甚慢，引起屏山镇一带居民注意。因潭水的来去无前人记载根据，纷纷猜测，说来水源于大龙潭，而去水可能是华丰湾，请求屏山镇镇民代表会处理。当时代表会主席是胡仲卿（县属白沙乡人，已故），根据群众意见，报请柳江县临时参议会提案处理。参议会认为华丰湾出口流水处设置有水碾，障碍了潭水之流畅，致使小龙潭水终年污浊，影响了市区名胜，建议县政府飭令私商拆除该水碾。殊知该水碾之碾主，是当地有名人物高伯伦（住罗池路，已故），高伯伦不服，认为潭水之出，未必一定经华丰湾。于是，县政府与高伯伦协定测验，令柳江县市区建设委员会派员勘察，并组织会议处理。笔者当时是参议员并兼职建委会，亦被派参与其事。结果建委派出工务科的工程人员在小龙潭水中竖立标竿，华丰湾处水碾放开储水闸之后，潭水陆续下降，在事实面前，高伯伦只得服输。

在该水碾未拆除前，适逢龙州专员雷彪过此，高伯伦求助于雷，他们洽商高愿将此水碾卖给雷，卖价四百元（东毫），并声明此水碾被拆不关高事。但雷彪以为自己有权势亦愿买。雷去找当时在柳州任督察专员的尹承纲交涉，尹专员亦不敢拂民意。结果这水碾还是被拆除了，并立碑记其事于华丰湾出口处。（鱼峰区地志办提供）

张、覃两派势力在屏山镇之争

吴 宏

1947年冬至1948年1月，围绕张任民与覃连芳“立法委员”的竞选，柳州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为获得“立委”头衔，张任民在竞选前不惜辞去广西省保安副司令之职，而投身立法委员的竞争，因此，竞选获胜之后得到的好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覃两派竞选前的主要活动在柳东、柳西镇（今河北市区主要街道），但是，有近两万张选票的屏山镇（今河南市区主要街道），他们是万万不会放过的。于是，围绕张、覃的竞选，屏山镇的两派也在明争暗斗。

张任民为控制河南市区，在屏山镇组织了类似帮会的“廿八宿”。所谓的“廿八宿”，即是由覃万高等组织的屏山镇的28个青年，在瑞和园（今市第三建筑公司后面）结社，希望能借助“廿八宿”的力量来扩大张任民的影响，“廿八宿”四处活动，由28人增至72人，后增至108人，最后竟增至200人，旨在张任民竞选获胜之后，以农村建设协进会（主要负责人是覃万高、董双山、董喜）的招牌来号召群众，将屏山镇的政治控制在张派的手中。

覃连芳为与张任民竞选“立委”，也在屏山镇积极活动。覃派的势力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徐雨川把持的机器工会（覃连芳为名誉理事长），徐雨川利用由覃连芳出资经营的《立言报》，大肆宣扬覃连芳的政绩，为覃连芳拉选票，在竞选之时，凡是投覃连芳选票的人，机器工会均用汽车免费接送。另一方面是由董峥、谭跃联络的在乡军官，因覃连芳是在乡军官会的名誉会长，又是马平县四都金陵村（今柳江县百朋乡琴屯村金陵屯）人，故在乡军官与覃连芳颇有

感情。再一方面，则是由吴越（屏山镇前任镇长）等人联络的地方士绅及青年，主要有黄炳炎（县参议员）、梁华章（屠宰公会理事长）、莫显承、覃子权等。他们借用屠宰公会的名义来拉拢群众，并制发证章，为覃连芳拉票竞选。

本来，覃连芳的势力在屏山镇并不比张任民的势力差，机器工会所办的《立言报》的宣传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张任民有桂系军阀的支持，并拨给竞选经费，而覃连芳仅靠出卖自己的产业得竞选经费（以至竞选失败后造成经济亏损，《立言报》停刊半年）。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竞选前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向第一选区各县党的执行委员会下达秘密命令，要求全体党员极力支持张任民当选。结果，张任民以超过半数选票而获胜，当上了立法委员。

张任民竞选“立委”获胜之后，张派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了河南市区。1948年夏天，屏山镇选举镇民代表，并由镇民代表选举镇长时，他们便有计划的达到胜利的目的。

接管屏山镇公所前后

吴 宏

1948年夏天,屏山镇由镇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选出镇长傅学说、副镇长吴越。镇公所设在鱼峰路南段的鱼峰山脚(今市工人文化宫内),下设户籍主任1人(由傅学说兼任)、副主任1人、户籍干事3人;民政干事、经济干事、镇队附、庶务各1人,警长1人、警士12人。镇公所还设有财产保管委会,设主任1人、干事1人、征收员3人。

屏山镇公所管辖15个街(村)公所:河南上街、河南下街、驾鹤上街、驾鹤下街、鱼峰路、太平东街、太平中街、太平西街、水南街、云岭街、接云街、谷埠上街、谷埠中街、谷埠下街、依山村。镇民代表会的代表由各街街民选举产生,共选出镇民代表27名,由镇民代表选出莫显承为镇民代表主席。镇民代表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任务是监督镇公所的工作及商讨屏山镇的兴革之事。

傅学说担任镇长未满两年,柳州即于1949年11月25日解放。

1950年1月4日,市人民政府委派张远、陆石林、郭展华三位同志接管屏山镇公所,建立屏山区人民政府。接管时,张远即对原屏山镇公所的旧人员宣布:1、共产党对屏山镇进行接管;2、原屏山镇公所的职员为旧人员;3、要服从政府的命令、安排和处理,服从党的政策法令;4、不许乱说乱动、不许再欺压群众。接管时,由于工作人员少,对旧职人员陈起亮、郭启元、董喜及勤杂人员唐迟来予以留用,其余人员遣散回家。接管后,即对屏山镇公所的物资进行清点登记,计有:七九步枪九枝,子弹200发、公地约10余亩、公房50余间、鱼塘3个。

屏山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1、开展收缴民枪运动，共收得各街公所公枪 46 枝、街长及镇民代表私枪 14 枝、私营工商业主私枪 14 枝；2、配合市人民政府开展禁毒运动；3、接待过往部队，为过往部队筹集粮草（过往部队主要住宿在太平圩亭）；4、组织街道民众捐钱捐物，进行拥军优属活动；5、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主要方法有开荒及副业生产，组织劳动队修建苗圃、修建火车南站；6、2 月份，区政府迁至原区公所对面街（现鱼峰区医院），开始对街道进行摸底，着手街政建设（这时，因街道政权尚未建立，仍用旧街长管理街道工作）。

1950 年 7 月 26 日，屏山区人民政府改称柳州市第一区人民政府，李凤林任区长。同月 29 日，市人民政府在解放戏院举行“柳州市街道委员会接印典礼”，正式宣布废除旧街甲制度。

湘桂黔铁路局平剧社

柳南区志办 罗维整理

三十年代，湘桂黔铁路局业余平剧社在湘桂黔等地颇有名气。此剧社名义上是一家业余的娱乐组织，而实际上却是一个较为完善的戏剧团。因为，剧团有组织、有戏服、有生旦净丑卓异的人才，并有舞台和观众。当时，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市来说，没有哪个业余剧团组织有这么充实完整的。

该社的社长肖瑾字伯渝，原籍四川省，寄籍北平，为北平名伶苏龙文老先生之哲嗣，自幼聪颖绝伦，除文学外，酷爱音乐戏剧。幼年就读北平师大附中，在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留学异邦，入伊利诺大学，回国后历任各交通机关要职，时任铁路局副总工程师兼工务处处长。在学校期间曾利用业余时间常与同学们互相研讨，并得老伶工金远舟的指导，造诣较深，经常在各游艺晚会上演出。他扮演的青衣小生，每逢粉墨登场均博得观众喜爱。副社长吕义权，字仲衡，原籍山东省，寄籍北平，北平铁路学院毕业，幼年爱好音乐戏剧，尤喜操琴，任铁路局桂林运输二段段长。社员唐介琪先生是江南名票，扮演青衣，其身段和唱功，极负盛名；社员吴铭先生，扮演小生；社员苏樾乔先生扮演小丑，是难得的人才。扮演净角的王金铎先生，在剧社串演《空城计》的司马懿一角，最得观众喜爱。曾镇西先生扮演的老生，更为观众所钦佩。

剧社的业余演员，文场戏的有：肖子虎、曾昭谏、吕仲衡、唐介琪、吴铭、楼亚尔、余叔龄。武场戏的有：孙福勋、胡定然、董廉、程百福、孙智齿、唐敏忠、徐岳竣、王余厚。剧社的职员：演出前台主

任史铭先生，前台副主任温念愚先生和张心濂先生，后台主任是吴铭先生，指导员是王金铎先生，宣传主任是龚谦先生，总务主任张松寿先生，场务主任侯国枢先生。

该剧社演出的戏码，大压轴戏有《凤还巢》、《三国志》、《全本宋十回》、《棒打薄情郎》等，这些大型连台戏，都是文武唱做兼备的好戏，未曾见过业余剧社有这样大的剧目。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该剧社常在江南一带演出，曾为国际扶轮社在柳州分社暨本社筹募基金公演，并常为救济难民而义演。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元月十八日，在柳州市映山街柳州大剧院演出《三娘教子》、《打龙袍》、《全本宋十回》的“宋江闹院”、“刘唐下书”、“坐楼杀惜”、“活捉三郎”。《三娘教子》中骆逸飞小姐扮演王春娥，李晓风扮演老薛保，伍碧娟小姐扮演薛倚；《打龙袍》中沈德厚先生扮演王延龄，高必刚先生扮演仁宗，王金铎扮演包拯，李晓风先生扮演陈琳，李宗镒扮演灯官，伍碧娟小姐扮演庞妃，王余厚先生扮演李后。

旧时谷埠路的老字号

陈显达

柳州素有桂中商埠之称，而地处柳江南岸的谷埠街，则是桂中商埠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时谷埠街，是四乡农民进城赶圩的交易场所（解放前河南三日为一圩的圩市故名对河圩）。谷埠之所以形成一条街并不仅限于它是大宗的谷米交易地，而且还有不少闻名邻近城乡的行业。

以木铺来说，早在咸丰9年（公元1859年）湖南宝庆的陈义杰，因随湘军援桂打太平天国军而来到柳州。他与同乡申双义合伙在河边搭厂拉手锯，锯出五分、八分厚的木板出售。他们积攒钱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合伙于谷埠上街开陈双和木铺，光绪28年（1902年）柳江河涨大水，上游流失许多木材下来，被人抢救上岸后廉价出售。陈家收购了一大批，制成不少棺材（又称寿枋），碰巧第二年柳州霍乱流行，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差，因此死了不少人。碰上此机遇，陈家卖棺材发了一笔大财。陈义杰死后，由其子继承祖业，生意兴隆。其子从融县三江买木山，伐木成排，放下柳州，或转运到广州销售。陈家雇有锯板、寿枋木工多达十名，一付棺材论质议价，少则八、九块银元，多则上百元。直达1938年间，因经济萧条，陈家在外欠债万余元而宣告停业。谷埠街除陈双和申双义木铺外，以后陆续有周长茂、周长发、陈昆记、钟贵记等家小木铺。

罗天昌烟庄，位于当时谷埠下街，开业于清末宣统年间，罗是柳江县布远村人，该烟庄有高大楼房四进。至民国初年雇有刨烟丝工人约十余人。每大包烟丝价银一钱二分，小包售价银七分二厘。民国成立，“改两归元”后（即废止银两、分、厘记帐，代之以几元、几

角、几分计帐)。每大包烟丝售价2角,每小包售价为1角。所用烟叶多来自迁江大湾,故简称湾烟。湾烟张大而色黄,稍逊于当时的广东南雄烟。当时烟叶售价每市斤银毫五角,这比当时的米价还贵。

罗天昌烟丝质优价廉,不仅在柳州出名,还远销柳江上下游各县乡。外地人托人到柳州买烟丝的,只说买罗天昌多少包就行了,能以招牌代产品,真不简单。这也说明产品的知名度是很高的。迄至1936年间,因河南修马路,铺屋被拆迁,于是迁移至河北沙街(今河堤)继续营业,不久因转业经营旅馆业,将招牌出售给李西昌经营,由于买他的招牌营业,竟出了高价一万元银币成交,足证名牌产品的招牌也是有价值的。安记隆山货收囤店,店主邓亚东,广东肇庆人。早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谷埠中街盖起铺店,专门收购各种兽骨兽皮、桐油、干果等山货,然后将这些山货运销广州和香港。由柳州开往广州的每班航船,都留有一半仓位供该店运货,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获利颇丰,是谷埠最大的收囤铺。1929年,因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终因资金周转不灵,生意亏本而宣告破产。

董泰和杂货铺,位于谷埠下街,宣统元年(1909年)开设经营,迄至民国初年以后,生意逐年开展,兼营向附近城镇开展批发业务。直到1944年间,因业主病故,其儿子另图别业而停业。

福寿堂中药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张,是谷埠街最早的一间中药店。每遇瘟疫流行,该店施舍药品给穷人,故店铺深受街坊称赞。该店是谷埠街老字号的药材店,解放后还继续在原址营业。

天福当铺,开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当时的当铺为了便保管和保护典当珍贵饰物和衣物,都用砖木材料,建成方形楼房,楼上每层墙角设有长方形枪眼孔。铺面一律是高柜台。

到了民国元年以后,谷埠街的商店最多的是收购谷米的收囤铺,其次是木铺,还有几家客栈和饮食店。此外桂系统治时期有番摊赌馆。铺户房屋为木瓦结构者多,砖木结构者少。通街用大石板铺路,路宽约两丈五尺左右,原可通牛车,自民国十五年修栅门后,牛车已不能进街了。每遇对河圩日,商贾云集。

柳州机场接管简况

伍齐信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军管会后勤接管工作：

航空组已接管前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民航大队及伪空军第四军区司令部二七三供应中队等五个单位。工兵组已接管了伪国防部工程机械修理厂，第三工程器材总库，伪工兵四团等四个单位。军需组接管了第五被服厂第十三被服库。运输组接管了四零三汽车修理厂，三八修理厂等六个单位。军械组接管了一一三军械库等三个单位。军工组接管了伪国防部三十兵工厂等七个单位。电讯组接管了伪联勤总部十一区电台，伪陆军第七通讯营等二十三个单位。以上共接管了七十三个单位，所属人员一万三千余名，均分别作了妥善安置。

辖区街道史话

伍齐信

1、文笔路。东起鱼峰路，西至火车东站，全长650米，宽32米，沥青路面，与城站路分界。1928年前，该处地势较高，曾名云头岭，原系旧城荒郊，岭旁有一座神祠，祠旁住户稀落，时有民谣曰：“富家城里住，穷人岭上蹶”。民国十六年（1927）时，广西建设厅长伍廷颺任柳州督办时，拟在今竹鹅溪一带筹建所谓“广西物产展览会”，计划从云头岭至竹鹅溪之间，辟一专用小钢轨铁路线，后因军阀混战而停建，这乃今日文笔路之雏型。以后，由于火车东站（当时城站）建成通车，因而聚居人口逐年增多。

在今侨家巷左边，曾建有一幢较大的当铺，名曰“一善押”，当时当铺生意兴隆，什么均可典押，后因兵争匪乱而倒闭。其房屋在1945年为日寇溃逃时炸毁。在今二空宿舍大楼处，原系一荒塘，四周刺藤密布，坟茔垒垒，人迹罕至。

民国十七年（1928年）曾在此地建有地方法院一所，解放后迁至河北，后拆除建成宿舍大楼。

文笔路1942年曾名城站路，1946年改称云岭路，1949年复名文笔路，因路西面遥对文笔山故名。1953年民居遭大火，茅草棚屋被烧后，改建成瓦房，1954年路面扩宽，1966年改称新华路，1975年复今名。1986扩建成混凝土，分汽车道、人力车道、人行道。其中老龙巷，位于路东端东起汽车客运站，西至红阳路，全长290米，宽3米。民国廿八年（1939年）柳州防空指挥部辟附近的牛仔岩为防空洞，牛仔岩亦称老龙岩，抗日战争时，因此地近汽车站，人口骤

增，颇为热闹。1966年改称新华路三巷，1975年改称文笔路三巷，1982年复老龙巷，巷内均为居民住宅。侨家巷，位于路中段南起文笔路，北至本巷19号，1950年称侨家巷，1966年改为新华路侨家二巷，1978年改为文笔路168巷，1982年复今名，因巷内曾多有归国侨眷居住故名。

2、城站路。东起柳邕路，西至南站路，全长2,340米，宽32米，分车道、人行道，沥青路面。初仅为一高低不平的土牛车道，通向文笔山等地，属柳江县屏山镇境，中段在今二空对面，地势较低，有一大池塘。由文笔路口，老法院南边起，至今新风桥一带，满是杂草丛生，荒无人烟。1926年始有人聚居，有名陈二者曾在此开杂货店。民国廿五年（1936年），因地近云头岭，称云岭巷，又称云岭街，设有街长管理，至民国卅年（1941年）以后，火车站动工建设，人口逐年增多，住户多搭棚为室，居民多是装卸搬运工人。后来街道逐渐加宽，1950年扩展成六米多宽的石碴路，始称城站路。1955年，再扩展成10米宽的混凝土路面。沿路两边房屋建筑日益增多，1966年改称新风路。1975年复称城站路。1986年再次扩建为宽32米，分汽车、人力车和人行道，有十一路公共汽车往来，直达火车南站。

其中城站路南二巷，位于路东段，东起城站路，南至柳邕路，长450米，宽7米，原是牛车路，由老龙巷通往五里卡，民国卅三年（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美军曾在此设美浮洋行，供销石油，它的商标为飞马牌，在围墙上装有飞马图样，人称飞马仓，即今日市果品公司批发部地址。解放前无名，1978年始取名为城站路47巷，1982年改今名，按所处路走向及序数排列故名。城站路南五巷，位于路东段，东起城站路，南至本巷20号，全长60米，宽2米，解放后始建，原无名，1978年取名城站路14巷，1982年，改称城站路南五巷。城站路南六巷，位于路东段，东起城站路193号，南至214号，全长100米，宽2米，呈U字形，解放后始建，初，这一带无人烟，只有一座砖瓦窑，毁于1955年，后辟为菜地，陆续有人在此建房，原无名，1978年取名城站路195巷，1982年改称今名。城站路南七巷，位于路东段，

全长70米，宽2米，东起城站路，西至本巷43号，解放后建，原无名，1978年取名城站路215巷，1980年改称今名。

3、红阳路。北起文笔路，南至柳邕路，包括云岭区，全长224米，宽12米，沥青路面，清末民初，原名云头岭，又称营盘岭，街呈人字形，因地势较高，故称岭。在街中段，有两人合抱的樟树六、七株，1943年8月为日寇飞机空袭投弹炸毁，1938年前归接云街辖。1939年属老龙巷辖，分老龙一、二、三、四巷，素有贫民窟之称，居民饮用水须远到鱼峰山下小龙潭去挑，极为不便，1954年老龙二巷扩建称红阳路，当时云岭区管辖范围甚广，东起鱼峰山脚，西至五里卡，包括城站路，北达大同巷，1966年称红阳路至今，由于柳州汽车总站及云头岭农贸市场位于本街，在经济地位上较为重要。

4、大同巷。东起谷埠路，西至维新路二里，全长310米，宽6米，1934年前此处称黄泥岬，在它的西北角有何家村，村旁有一座神祠，叫新安社，在此设有一层闸门，黄泥岬是闸门外的一条小巷，原系黄土路面，下雨时泥浆铺面非常难行，1955年始将路面扩宽并打成三合土，连接维新巷上坡处，还铺上石板，与云头岭相接，故称之为接云街。1945年改为大同巷，1966年曾名奋发路，1975年复今名，巷内均为居民住宅。

其中，大同巷一里，位于巷北端，南起7号，北至20号，原无名，全长170米，宽2.5米，在今电机厂宿舍区，初系一大水塘，塘边芭茅高过人头，近处一土岭，遍布土坟，初仅住有几户人家，后逐年增加，逐形成街里。1966年曾名奋发路一里，1978年改今名，系按所处巷序数排故名。大同巷二里，全长540米，宽3米，位于巷中段，南起29号，北至119号，旧名牛屎巷，原系通往何家村之乡村牛车小道，因居民平日所收集的猪粪、马粪、牛粪都堆存此地，故称牛屎巷，在今豆腐厂车间对面，原系一大臭水坑，老法院后背一角亦近此坑。1964年兴修柳江大桥时，指定被拆迁户搬来这一带建房逐渐形成一条巷里，1966年曾名奋发路二巷，1976年复今名。大同巷三里，位于大同巷南段，西起56号，南至47号，全长170米，宽3米，水

泥路面，原无名，1966年名奋发路三巷，1978年复今名。

大同巷及一、二、三里的路面，1964年在周宝珍同志任居委会主任时，曾全部用石灰三合土改铺。到1984年黄歧同志任主任时，复改修成水泥混凝土路面。

解放前，大同巷有一特点，是专营棺材业的街道，有不少住户，如钟桂记、宁广茂、郭大毛、徐老板、陈驼子、韦有道等家都经营此业，他们所做棺材既批发又零售。他们从融水成批采购原木，精工制作，在棺材头尾雕龙刻凤，油光抹漆，外表十分美观，旧社会时颇盛极一时，解放后，殡葬改革，提倡火葬，棺材业已不复存在。

5、维新巷。东起谷埠路，西至文笔路，全长220米，宽5米，1935年与大同巷并称接云街。1949年称维新巷，1966年改称图强路，1975年复今名，其名含常往常新之意，巷内均为居民住宅。

其中维新巷一里，位于巷北端，北起维新巷，南至文笔路，全长150米，宽3米。初仅两户人家，四周杂草丛生，人迹罕至。在今25号后面，曾有一古坟，坟四周围铺以大青石，面积约十五平方米，刻有一大墓碑，。扩建文笔路时，始将此坟迁走，墓碑失落，墓中究系何许人，无从考证。因陆续有人在此居住，故形成巷里，原无名，1957年始取名维新巷一里，按所处巷序数排列故名。维新巷二里，位于巷南端，东起维新巷，西至文笔路。全长250米，宽4米，1934年前与今大同巷并称黄泥岬，1949年归接云街管辖，1950年归大同巷管辖，1957年归维新巷管辖，1975年称今名。一九七九年用石灰煤渣加宽路面，1982年改为混凝土路面。

柳州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烈士生平简介

柳南区志办

黄永安烈士生于1901年6月，被“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殁于1972年11月4日。1979年5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桂发（1979）95号追认为革命烈士。黄永安烈士是广西凤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农民。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我军战士、班长、红军五十八团三营九连指导员、新四军兵站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政治协理员、院长、管理科长、华东荣军分校校长。解放后转业任铁路局蚌埠公安处处长、济南局总务处长、客运处长、柳州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同志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黄永安同志是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红军老战士。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农民革命斗争。在当地苏维埃政府任肃反委员，领导农民斗争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积极，斗争坚决。1930年6月，他在广西平马镇参加红七军，在战斗中勇敢杀敌，负过伤。在江西反围剿的广昌战斗中，又第二次负伤，被截去左臂。长征部队出发后，留在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革命斗争，坚持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随军南征北战，在后勤卫生战线上积极工作，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黄永安同志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积极工作，艰苦朴素，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了革命事业他不畏艰难，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

董秀峰

董秀峰名岚，秀峰是字。生于光绪十九年（1890年）五月初六日。歿于1963年9月3日。享年73岁，他是柳江县樟木村人，清光绪年间，其祖父董用舟举家迁至柳州，定居于谷埠街。董秀峰年青时帮人打工，摆杂货摊维持生计，后于现红星旅店处开设一间杂货店，店名“泰和”。他善于经营，业务日益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店家。

董秀峰发家后，没有大量购置产业，却把一部分钱财用于扶助人的社会公益事情上。

抗日战争，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热潮。柳州市各界出动募捐车到街道募捐，募捐车到谷埠街，他带头将款送至募捐车上。

1939~1941年间，日机对柳州进行狂轰滥炸。此时他出资在香山慈小（现柳邕一小）后面的狮子山，建一个防空洞。建成后，请街邻到洞中躲飞机。这个洞，大家称为三街岩（即谷埠上、中、下三街的防空洞）。董秀峰喜爱桂剧，他组织市内一些桂剧爱好者到家演唱和磋商演唱技艺，称之为座场。这座场在市内非常活跃，群众称之为“泰和班”。当时成为全柳州闻名的一个文艺团体。

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1950年3月20日，董秀峰列席参加柳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不久，他亲自到房产部门把自己在鱼峰邮局后面的一大片土地和房屋捐献给人民政府。

1951年，董秀峰将原“泰和班”组成“春秋社”。后更名为“柳州河南国乐研究社”，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运动，以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还经常组织在街头、黑板报前演出，或者参加游行大会等活动，得到政府和群众的称赞，为柳州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一定的贡献。

（柳南区志办）

王拯事迹述要

刘汉忠

笔者编撰《王拯年谱》（连载于《柳州古今》总第五、六、七期）时，曾着意搜集了有关的史料文献，限于年谱纂例及篇幅，有的材料未能纳于《年谱》正文，此后又在上海、南东等大图书馆及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陆续发现有关王拯的一些重要文献，今拟作摘要介绍，并就文献价值略作阐述。

王拯在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考中进士后，较长时期在京师任职，当时京师集结着许多名流、学者，王拯多与交游，评议朝政，诗酒唱酬，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丰富的内容，对他思想及诗文创作有深刻的影响。这些与王拯交往的人物中，有的与王拯同属于古文流派（桐城派），影响最大者是梅曾亮，他是桐城派后期最重要的作家，广西古文五家中的四家都直接受他的影响，王拯的诗文就曾由他评点。这种交往使当时京师的古文派创作呈现出一个高潮。另外有曾国藩，他虽不属古文派，但与古文派作家有很密切的来往，道光二十五年王拯南归省亲，曾国藩赠《送王少鹤》诗云：“待尔双双至，春回又一年。开尊皆旧友，发篋半新篇。荔子红时雨，芭且绿外天。江乡好风景，话向酒杯前。”（《曾文正公诗集》卷三）送别而从再会着笔，语情真挚，清新可诵，足见交情之深。又有承龄，字子久，一字尊生，满州旗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历官至贵州按察使，著《大小雅堂诗集》，有《别少鹤》诗云：“近局忽忽路阻长，相看吟鬓各沧浪。一官漂泊仍军幕，八口艰难且故乡。客子欲行歌慷慨，故人临别语悲凉。可堪他日成追忆，团坐同依短烛光。”又广西全州进士蒋

琦龄（字申甫）有《宿武连驿次和放翁武连县诗寄霞舫、少鹤》诗：“四十功名未可期，秋怀应有故人知。三刀远道销髀肉，九月清霜点鬓丝。世路艰危忘栈险，宦情恬淡到官迟。回看禁掖朋从隔，古县鸣笳向夜时。”（《空青水碧斋诗》）同治年间，王拯回桂林居住，蒋琦龄又遥致诗问：“湘皋农事又眷兴，枯木庵中伴懒腾。沧海成田今复几，扁舟散发亦何曾。旧游共感山阳竹，朋咏犹怀雪夜罍。咫尺吟魂每飞越，夜梁落月淡孤灯。”（《寄王定甫桂林即用其昔年送别韵》），另外邵懿辰有《喜闻少鹤病已》，彭昱尧有《得王定甫苏州书，喜其病愈有作》二诗（见《年谱》道光三十年）。这是在纷纷传闻王拯死讯而终证实未真的情况下而作。他的好友代州冯志沂《王户部少鹤至》诗作于王拯久病江南，初愈返京之时：“游子别河梁，设喻誓生死。昔与君别时，深语未及此。契阔五年中，传闻剧诙诡。（笔者按，诙诡谓奇特，指传闻王拯死讯）。江陵梦李生，道山怆苏子。频年丧深友，腹痛今未已。颇自疑不详，信尔亦其理。宵来闻剥啄，欻然见名纸。握手转无言，方寸杂悲喜。未损谈辩豪，更益须发美。促膝话今宵，犹疑梦魂里。”（《微尚斋诗集初编》卷二）这种执手无言，悲喜交加的情景，实在体现出王拯交友之情的淳真。类此的还有翁同和，当他于同治七年听到误传的王拯死讯时，在《日记》中写下“为之凄怆”贮满悲悼之情的四个字。

道光二十四年秋，王拯请友人陈鏊绘《须砧课图》（须，此字下从女。为古代楚人对姐姐的称谓）。自己写序，记幼年在柳州依刘氏姐之读书生活。晚清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民国王文濡《清文评注读本》，民国的《广西乡贤文选》等选入此文，《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在介绍《龙壁山房文集》时，特别提到这篇序，说他“沉痛已极，发于至性”。此文既经传出，当时挚友，或咏其意于诗，或叙其事于跋，计有朱琦、曾国藩、梅曾亮、祁隽藻、邵懿辰、龙启瑞、彭昱尧、李宗瀛、周之琦、范泰亨、苏汝谦、张金镛、马志沂、王柏心、钱应溥、宗稷辰、孙依言等数十人。足可见此序的感人至深，也可看出王拯在文人集团中的声气之高。

王拯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论者多推其古文。尽管在当时，有广西籍的王拯、朱琦、龙启瑞与邵懿辰、冯志沂皆集于梅曾亮门下，呈一时兴盛之貌，梅曾亮就曾叹：“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但从桐城派的文运看，已呈不可挽回之颓势，这是时代之使然。由广西籍作家独擅一时之胜，对广西文士倒是起了不可低估的激励作用。最值得注意的倒是王拯诗作、词作，真正反映他的个性特点及艺术特点。从文献价值叙说诸家对王拯诗词的题评。

对王拯的诗作，历来评价甚高。清人张维屏《谈艺录》说。“少鹤诗笔，卓犖不群。”《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也说：“拯涛戛戛独造，意深而词粹、兼有苏、黄二家之长。”指出王拯诗作的师承。清人谢莲士有《读王定甫亲家通政诗集，敬书四十字以志倾倒，即次赠诗原韵》：“珠玉逾千首，苏韩共一家。云霞浮紫极，江海出金沙。报国能培本，归乡只种花。呕心流至性，击节动悲嗟。”（《莲洁诗存》）可见他对韩愈、苏轼、黄庭坚的诗作揣摩研习之功。笔者就曾见过王拯批点的两部《韩吕黎诗集编年笺注》，一部有王拯朱墨笔过录李宪乔、施雪丹评点并墨笔题记。又一部识语题“定甫”，有“定甫手校”朱印及“王拯定甫”印。与王拯同时的名诗人林昌彝有诗话《海天琴思录》，其中评道：“马平王少鹤农部锡振，有《龙壁山房诗集》，多抚时感事之作，音节惨怆，如哀笳晓角，尝记其抵都诗云（诗略）。”此乃从其诗的情感基调的惨怆而言。但，他也有健朗之作，现代钱仲联先生《近代诗评》说“王定甫拯如健鹰盘野，弥见沉雄。”可见王拯诗风格的多样化。王拯有《同人过十刹海看荷遂游高庙四首》（略），清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说“王定甫曩在春明，与章佳立庭都护屡作高庙之游，三复是诗，有举目河山之慨。”有《不寐口占》诗（略），清人符葆森《寄心庵诗话》说：“定甫枢部从征粤西，感时伤事，中多笳鼓之音。而忠爱缠绵，每形寤寐。”王拯诗中的忧患意识很重，这除了来自其身世之苦，体质多病，主要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他长期在京师，生活接触实际不多，诗作为文人唱酬品题，虽工而巧，而内涵思想则欠丰。在其外出之作，因面对社会现实及自然大观，诗

作内容即见丰满。陈融《顛园诗话》说：“定甫凡数至粤东，初至游罗浮，有伏虎崖、冲虚观、长寿涧、黄龙洞、华首台诸作，为吟流所诵。”咸丰元年王拯以司员随赛尚阿赴湖南、广西办理防堵太平军事宜。以后有《书愤》一诗，记“粤乱”始末，颇著名，即从今天看，也很具史料文献价值。祁隽藻为此篇题诗：“文章出入杜韩间，壮岁忧时未解颜。书愤一篇诗史在，北征终合胜南山。”《雪桥诗话续集》说：“定甫乙卯《书愤》诗，拟杜（甫）《北征》，于兵事颇为翔实。”《寄心庵诗话》也说：“其《书愤》一首，纪粤乱始末，可为诗史。”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也注意到此篇，他说：“王定甫拯亦桂中诗人之铮铮者，可以抗颜伯韩（朱琦），犹黔中之有郑（珍）、莫（友芝）也。龙壁山房诗中《书愤》一篇，感红羊之事而作，最有名。……于太平天国军虽多污蔑之词，然叙具体事可备参。”正是着眼于他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作出的评价。还有《拟古》诗，《雪桥诗话续编》说：“其拟古诸作办皆具体少陵，自谓诗不工，颇好为之。当其为之，不顾于人，惟欲其意之自得而已。”郭则沅《十朝诗乘》说：“王定甫《拟古》十二章，多述兵事。其末章云云。尚武余风，凋敝至此，可胜叹哉。”

叙及王拯诗作活动，有可补《年谱》之略者。咸丰元年（1851年），王拯随部南行，临行与苏赓堂相戒毋作（诗），《顛园诗话》记：“（王拯）交张南山、苏赓堂，赠南山有‘老著异书柱史，近传逸句似香山’之句。怀赓堂有云‘握手经番戒我诗，我诗憔悴独君知’，盖与赓堂论诗最洽。赓堂相戒毋作，故在粤中自池司业秋祭两诗外，未尝有一字也。”《年谱》记同治五年由上海登舟赴广州，据陈琰《艺苑丛话》：“记者昔藏有王定甫先生立轴，诗追盛唐。诗云云。（王拯）跋云：‘此二十年前饮海山仙馆句也。同治丙寅，自京师假道出广州，留滞者累月。故交寥落。而德畬方伯闭门却扫，巍然灵光。谈次，属为留题，未有以应。爰以旧句质之，且为三至斯园卷也’云云。诂未几，以亏盐数十万，为瑞文庄奏请抄抵，园亦籍没，废为田圃矣。其附近有张氏之听松序、邓氏之杏林庄，虽宏敞，精致远不能及，亦相继致

废。胜地不常，可慨也。”王拯诗文尚有未及刊刻者，此跋为其一，中言二十年前旧作，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省姊羊城，与友饮海山园所作诗。至为跋时，已是三度游园，时过境殊，徒成追忆。

王拯的词学成就也很高，评论者多认为其词出于诗之上。他被称为清词后十家之一。徐珂《清稗类钞·文学》说：“词学名家之类聚，……后七家者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鸿祚、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也。……合以张琦、姚燮、王拯三家，是为后十家，世多称之。”其在清代词坛的地位自然可知。夏善业曾说：“少鹤之作，力追北宋，浏亮浑脱，较美成（周邦彦）诸君无不及焉，洵词家巨手也。”直以填词巨擘誉之，清代词家可当此称者实不多见。

王拯的词，大多是流连光景，抒写胸意之作，因之个性表现很是强烈。同治四年（1866年），王拯出京返山阴故家，过嘉应，与友作鸳鸯湖之游。郭嵩焘《金眉生烟雨寻鸥图卷序》记其事云：“嘉兴鸳鸯湖上有故烟雨楼，吴越时钱氏所建，……同治乙丑王少鹤通政来自京师，（金）眉生招同陈芟裳太史泛舟，为鸳鸯湖之游，相与寻烟雨楼故址。少鹤为赋《木兰花慢》词，芟裳、眉生继之，因为图纪盛。三人者以高才负时重望而谫于仕宦，其于身世之际，凄凉感叹殆过于予，而观其所为词，抚景流连，其词甚悲。……然则三君子肃闲放适，自得于湖山之外，以悲以喜，惟意所向，……读三君子之辞，使我神游三茆五葦之间，凄以思而益慨然以叹也。”王拯之词作于被劾参之后，（事详见《年谱》同治年。）就是郭氏所说的“谫于仕宦”，个人穷达悲喜，自然浸透于光景留连之中。王拯称自己填词乃为“聊以宣幽道郁，不自爱重，遂亦不自检点”，惟其如此，自然而不造作。

除填词外，王拯亦作词评，柴萼《梵天庐丛录》记云：“祥符周稚圭之琦，自号金梁梦月词人，有词一卷及鸿词钞一卷，自视极为珍重。马平王锡振定甫谓金梁词殆张伯雨一人，今核其所作，信然。”又培养后学，著名词人况周颐年十二即从学于王拯，词风也深受其影响。

王拯的书画艺术也有一定的造诣。《粤西先哲书画集序》称他

书法早师董、赵，晚学平原，写梅学冬心，说者谓其寒香铁干，位置精严，能以书之关键，透入画中去。《中国画家大辞典》也收入王拯。冬心即金农（1687～1763），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画梅竹等有名。王拯画梅，时人颇多品题，足见已著名声。冯志沂有《少鹤画梅见赠》诗云：“昔君旅宿夜举杯，败墙忽见横枝梅。走呼邻生坐同赏，寒香习习随风来，迫观始悟画在壁。惊叫不顾旁人哈，想君从此得画法。腕底倏忽春风回，早诵暗香疏影句，梦魂不踏江南路。都下瓦盆盈尺花，人力屈盘少生趣。爱君放笔为高枝，亦似君书能崛奇。只怜庾岭隔天末，烽火乡关生远思。”（《微堂斋诗集初编》）临桂王必达有《题梅花画卷》二首：“寒花亦自占新春，雪后园林不染尘。倘遇逋仙来索笑，冰心犹可证前身。”“十年幽梦费徘徊，如水明蟾望我回。闲伴梅花饥可乐，清风况有竹林（味）。”也是品题王拯的梅画。（“味”恐为来字方合音韵，编者注）

笔者撰《王拯年谱》时，曾综列其著述及版本，今将续见补记。《龙壁山房文集》五卷，又有民国九年（1920年）奉天第五监狱铅字排印本，民国《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即据此本著录，据提要所云，此本出自善化向刊光绪十年（又记作九年）刊本。《龙壁山房诗草》十七卷、《茂陵秋雨词》四卷，也有民国九年排印本，与文集为同一版本。《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六卷，《年谱》记有光绪元年（1875年）锦城节署刊本。笔者又见一本，卷前题“同治丙寅（五年，1866年）孟冬广州行次校刊”，有王拯自序，文末题“同治五年秋九月马平王拯自序于广州行次之遄有喜斋”。则当为同治五年广州刊本。此年秋，王拯从上海至广州，十月廿五日起程返桂林。则校刊此书为时甚短。

王拯的文集，《年谱》记有光绪七年的八卷本。光绪九年的八卷本，在其生前，似无刊本，分卷出于后人的厘定。稿本尚存二种，均未分卷次，一种十行二十一字，蓝格，左右双边。另一种，有孙衣言批点，吴大廷、莫绳孙跋语。王必达《忆定甫先生》诗云：“十年高卧桂山云，四海犹知内相勋。剩有丹铅珍弱息，拟将金玉表斯文。晴窗榆叶凉阴护，净宇槐花午气熏。往事销沉浑如梦，短檠犹自照宵分。”诗

后注：“文集乞孙琴西（孙衣言字）作，故有第四句。”据此则此本似请由孙衣言评阅。除已集刊诗文外，尚有集外诗文多篇，限于篇幅，待以后再加整理。

柳州文化工作史料剪辑

(1967 ~ 1980)

于辉云

1967年

1月1日,元旦。全市电影院隆重上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影片。

1月6日,《柳州日报》刊登毛主席《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稿。

1月7日,柳州日报社“新闻战线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等15个造反组织发出查封《柳州日报》通告。

1月8日,市新华书店发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书。

1月12日,柳州日报社、柳州邮电局联合启事:《柳州日报》已于6日被革命组织查封。在查封期间出版《新华社电讯》发给读者。自1月份起定价为2角6分。

1月22日,柳州日报社革命工人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出版《柳州日报》新一号。

3月26日,柳州邮电局、柳州日报社革命职工启事:决定从4月1日起把原办的《东风》和《新华社电讯》二报合并出版,定名《东风》,每周出版六期,前后共出版四期(总期9~12期)。

4月6日(星期四),《柳州日报》出版新1号。

5月1日起,在人民电影院、人民礼堂、柳州剧场、工人电影院等处同时上映彩色大型文献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5月28日,《柳州日报》(新47号)刊登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6月3日,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市人民电影院等四家影剧场从当天起隆重上映《毛主席第五、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大型彩色纪录片。

7月1日下午,在人民北路口(今五一路“喷泉”处)举行庆祝毛主席巨幅画像落成典礼。巨幅画像台总高16.5米、宽12.6米,门楼长56米。

11月10日,市新华书店组织25,000套《毛泽东选集》(普及本)1—4卷大量发行。

11月下旬,市新华书店发行《毛主席巨幅画像》(高2.5米、宽2米);《毛主席彩色生活像》20多种,首次在本市与读者见面。

12月2日起,《特制毛主席画像》首次在市新华书店发行。

1968年

市印刷厂首次印刷成功的100本《毛主席语录》(袖珍型),于12月26日在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正式公开发行。

1969年

2月中旬,市新华书店首次发行自治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64开袖珍合订本一书。

2月17日起,市文艺工作团在柳州剧场公演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14日举行全体会议》彩色文献纪录影片,于6月3日起在本市隆重上映。

8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彩色文献纪录片,在市人民电影院、工人电影院隆重公映。

从9月1日起至9月3日,《珍宝岛不容侵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会屈服》两部纪录影片,在市人民电影院、工人电影院、柳铁文化宫等处放映。

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五周年,市举办电影周,从11月29日起至12月5日,分别在人民电影院、工人电影院上映《广阔的地平线》和《海岸风雷》两部影片。

12月13日起,自治区京剧团来柳,在柳铁文化宫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

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本市上映大型文献纪录片,从12月23日至28日分别在市人民电影院、工人电影院、柳铁电影院(文化宫)放映。

1970年

4月23日《柳州日报》转载《广西日报》4月21日洪辛兵文章《大毒草(刘三姐)的要害是反对暴力革命》。批判《刘三姐》是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一个黑标本”。全市又掀起对《刘三姐》一剧的批判。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市人民电影院、工人电影院、地区礼堂、柳铁宣传站(文化宫)于5月23日起上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钢琴伴唱(红灯记)》、《祖国南疆尽朝晖》等电影片;5月24日分别在工人电影院、人民电影院上映《南征北战》和《地道战》故事片。

7月27日柳州日报社刊登《关于(柳州日报)停刊给革命群众的信》一文,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经市革委会研究决定《柳州日报》于8月1日停刊。

1971年

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合并成立柳州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负责人粟剑。1972年第四季度该站撤销,恢复原三馆建制。

9月,市文教办集中文化系统人员,在羊角山板栗园处开展清查“5·16”运动。数十名文艺工作者被审查批斗,蒙受不白之冤。

1972年

2月,市宣传部门在工人俱乐部放映内部片:《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等日本影片,作为批判教材。

10月上旬,市革委会文化局成立。局长丛天功。

1973年

元旦,市电影发行放映分公司成立。

5月下旬，市革委会撤销“柳州市文艺工作团”称谓。恢复市桂剧团、市彩调团、市粤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队和市演出公司原建制。

1974年

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柳城县大埔公社木桐乡龙庆村发现柳城宋代陶器窑址。（1981年8月，该窑址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月下旬，《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判柳州市桂剧团根据话剧《不平静的海滨》改编演出的桂剧《302案件》。

1975年

7月，市粤剧团划归市彩调团，更名为市彩调团粤剧队。

12月，市桂剧团排练现代戏《钟声阵阵》赴邕城，参加全区现代戏调演。

1976年

3月中旬至4月初，全区曲艺调演在本市举行。市代表队演出柳州渔鼓《智取炮楼》。

6月10日，市代表队以桂剧《风云岭》一剧参加全区“农业学大寨”专题调演。

10月，市各专业剧团编写揭露“四人帮”罪行话报剧上街演出。庆祝粉碎“四人帮”。同月，郊区电影管理站成立。

1977年

10月上旬，市文艺代表团排练的《百年大计》（桂剧）、《旅店风波》（桂剧）和彩调剧《红英考勤》参加全区现代戏会演。

第三季度左右，市彩调团恢复上演被批判为“大毒草”的彩调剧《刘三姐》。

从8月2日起至1978年3月1日，《柳州日报》停刊。

1978年

1月,市桂剧团恢复上演被禁锢达10余年之久的古装剧《十五贯》。

3月,《柳州战报》出版。

3月下旬至5月底,市彩调剧团应上海市文化局邀请,专程赴沪演出彩调剧《刘三姐》。上海电视台三次现场直播,共演出57场。在沪参观访问的美、英、法、日等十五个国家的3千多名外宾观看了演出。

市桂剧团移植的桂剧《302案件》一剧被“四人帮”打成毒草后,一直蒙受冤屈。6月,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平反通知,市桂剧团重新排练演出。

7月份,本市上映国产故事片《大刀记》、《蓝天防线》、《老兵新传》等新片,8月份上映有《我们是八路军》等4部和外国片《白玫瑰》。

9月份,市内上映国产故事片《女交通员》、《霓虹灯下的哨兵》等5部影片,另有外国片《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公映。

9月间,广西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舞台艺术片《刘三姐》。市桂剧团演员张青应邀饰演剧中小牛,市彩调团演员吴发书饰演剧中曾秀才。

10月份,上映《猎字99号》、《祝福》及《保尔·柯察金》等中外影片。

位于市五一路口南面,一座大型宣传橱窗已竣工。橱窗长90米,高3米,12月11日起展出反映我市二十年来各条战线的成果。

1979年

1月,市革委会在1978年群英会上授予市彩调团演员林秀发为市劳动模范称号。

6月22日《柳州战报》报道:今年5月2日,于市南郊西江造船厂某基建工地,首次发现2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铲。大的一件高为39.2厘米,宽为17.7厘米,厚为1.5厘米;小的一件高为25.8厘米,宽为16.7厘米。

7月22日至27日,市文化局召开柳州市第三届文艺工作者代表

大会。市桂剧团根据老戏剧家曹禺的话剧《雷雨》改编的同名桂剧，于7月间上演。

《柳州战报》于7月~12月停刊。

10月，彩调剧《刘三姐》，在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国庆献礼演出评奖中，获剧本创作一等奖。

1980年

1月1日元旦，《柳州报》出版发行。

元旦，市博物馆举办“清代柳州名人书画展览”。展出藏品10多幅书法和扇面，均为王拯、郑小谷的作品。王拯是柳州人，郑小谷为象州人（原柳府八属）。

1月4日，市革委在1979年群英会上，授予市桂剧团演员周英市劳动模范称号。市文化局、市文联主办的“上海海墨画社”画展，元旦起至15日止，在市工业展览馆二楼展出。

市博物馆于2月16日春节期间，举办历史文物展览。展品为从洛阳、西安等地区征集得来的“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复制品）等文物。

春节期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市桂剧团演出《济公断案》；市粤剧团演出《碧蓉探监》；市彩调团演出《屠夫状元》；市杂技团演出绝技《眼皮挑水》（水重一担约11升）；市歌舞团演出《姑娘跟我走》；市文联等单位举办迎春书画展销和图片展览；市文化馆组织一部分书法名手到郊区沙塘等地书写春联，组织山歌手在鱼峰公园举行春节山歌会；市图书馆节日照常开放外，分别在郊区太阳村，沙塘举办图书展览。

3月21日至22日，市委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等8家联合举办“青少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黑板报演唱展览”，有45个单位参加。

市总工会，市文联联合举办“五·一”节职工诗歌欣赏比赛。

5月间，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市文联、团市委、市广播站等6家联合举办全市“红五月革命歌曲演唱比赛”。

市委宣传部、市选举办公室联合举办黑板报演唱“选举”宣传，市染织厂、柳州机械厂等20个单位分别获得优秀、甲、乙等奖励。

广东广州乐团，从7月7日起在本市演出广东南音，广州方言歌曲、民歌和广东乐曲等节目。

市博物馆易光撰写的《“柳江人”遗址》一文7月15日刊登在《柳州报》上，对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及有关方面研究成果作介绍。

市博物馆收藏“彩绘骑马俑”（复制品）一件。该文物为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墓出土历史文物。（9月15日报道）

柳州开办的“广西戏校八〇届桂剧班，于9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地址设在市郊长塘公社黄土大队（后迁大龙潭）。学员29人，教职员10人。

9月底，市群众艺术馆（前身市文化馆）大楼建成。国庆节开放。

全区艺术摄影作品展览，10月25日在市艺术馆展出。

中央歌剧院于12月6日至14日先后分别在柳州剧场、柳铁文化宫演出世界著名喜剧《货郎与小姐》及音乐、舞蹈等节目。

12月上旬《柳州日报》出版试刊版。将于1981年1月1日正式复刊。周六报，逢星期一无报。

市博物馆考古人员，于今年10月下旬在大龙潭畔（后称鲤鱼嘴）发现柳州古人类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这遗址地处龙潭山岩厦处，约60平方米。出土有人类头盖骨的比较完整的人骨架（化石），还有大量堆集的螺蛳壳及古人类用过的打制石器和各种用具，是一个距今5000年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

门头村摩崖石刻、竹鹅村刘炳丞墓碑刻

刘 文

1987年，我们按照广西区文化厅的部署，在柳州市境内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现根据我们调查之后笔录的羊角山乡门头村水车屯社王山清代摩崖石刻、西鹅乡竹鹅村凉水屯民国年间刘炳丞墓碑刻文字抄于后。

摩崖石刻，位于市羊角山乡门头村水车屯东南约300米处社王山东南麓石壁上，高出地面2.5米，面积83×58厘米。字大约3厘米、字小约2.5厘米，全为楷书。字内容为：

窃维起建村庄创由先辈分楚河界定自前规吾等各宜保守语云有例莫灭无例难与诚欲安居乐业以杜争端法至善矣惟是我等门头村系属祖居已历年以所有河界上侧至于□村背下则至於石灰坝南有小河至於土名歪罗为界其与上下村邻若老若幼长于斯俱皆目击通晓是以相守和睦各依村界每年着令鱼排日月向河塘打取从无争捕夺鱼计讼情事何期心不古去岁突遭强谋通估以致吾等有越村欺估坝取河鱼之呈控下村曾仁纯等在案兹蒙

特授马平县正堂加二级□□记录五次吴主集□□当本团保正上下村老按□□向例村吾等村□□上下□□至河界捷实供开清白业奉县□□主明察□□□□断吾□门头村兼排打鱼上至旧村禁为止至石灰□□止南至小河歪罗为止系吾村永行管业下得□□多谋亦不许外村人等再行越村争占将□□□捕阻于究处取法判行立案炳据讯断之后□□等自当恪守旧规遵奉成案亲睦和好无与法纪长享升平裕后弗替岂不美哉爰集众人勒石以让不拓

今将控案人名□经投保老叙于左

金光尾□□吴章□□覃文

韦道亮□□吴贵宁□□朱俊贵

保□好村

熊章□□覃老

正□□村老□□

门头村

覃老□□□刘定祥

嘉庆十九年三月□日公众立

西鹅乡竹鹅村凉水屯刘炳丞墓，原位于凉水屯北约100米，因修铁路墓已不存，墓碑移置凉水屯中。碑高69厘米、宽49厘米、厚约15厘米。全为楷书，内容为：

“公讳瑞虎字炳丞先王父星谦公长子也髫年颖异孝友性成迺清未叶负笈桂林卒業广西农业学校参与同盟会辛亥武昌首义随从显丞公光复柳庆自是奔走国事凡十余年历任建国桂军军需正广东省长公署参义新塘厘厂总办晚岁家居睦宗族和乡邻以忠厚传家以诗书衍泽阴历六月廿六日午时寿终里第生於甲申正月廿三日卯时享寿六十五岁卜葬凉水村村背大岭辛山乙向兼戌辰谨述生平以志怆恻、“故显考讳瑞虎字炳丞刘之墓”。

廿世，孝男，汉忠、汉栋、汉光、汉兴、汉圣、汉梁、汉材；孝女，汉珠、汉玉；孙，民富、民达、民贵、民逵，曾元等泐石，民国三十七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申时立。

柳南区古今事略

(1856 ~ 1949)

刘伍罗 搜集整理

一、清 时

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李文茂联合陈宝、张彪等三次攻柳时,在云头岭、红庙等地与清军激战,失败。

光绪三年(1887年)柳州大雨雹,辖区谷埠一带居民屋瓦尽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三经为首组织天地会。在柳江县三都石门村誓师起义,攻占拉堡圩,后向柳州进攻,与清军战于竹鹅村、五里卡一带,兵败被俘,就义于柳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一日,柳江大洪水,俗称“壬寅”大水,最高水位为91.47米,最大流量每秒34,000立方米。辖区部分地区被淹,灾后大疫。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十一日晨,陆亚发在城内起义。清军据谷埠码头,于北帝庙前架大炮向大、小南门义军轰击,十五日陆亚发率众撤出柳州。

光绪三十四年(1906年)于谷埠下街北帝庙创办城区第二学堂。为辖区举办新学堂之始。

宣统元年(1909年)谭徵祺(字志岳),留学日本回柳在谷埠黄泥岬(今大同巷口)建蚕桑局,在黄泥岬往云岭西边建蚕业学校。附近畲地种桑。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二十三日。柳州会党在大龙潭和谷埠

西闸外蛋家社集会拜台。并做“三潮”。被清政府派兵捉去百余人，周亚光等九人被杀。

二、民国时期

民国2年(1913年)7月，马平县废“都”设“区”，各区设民团局，总管地方民政治安，辖区设有谷埠团局，局址于今谷埠幼儿园处。

同年，谷埠幼儿园处建立谷埠小学。

民国4年(1915年)在谷埠中街旧博爱药房处开办中区第二女子国民学校。

民国6年(1917年)春，柳江道于鹅山新桥处建立一苗圃。1921年改为柳州第四区林场，1933年改为新桥苗圃，1935年裁撤。

同年，修建文笔路，为辖区第一条三合土大马路。

民国9年(1920年)，柳州人陈炳坤与黄培初合资于云头岭建一栋九层楼当铺称“一善押”。

7~8月，城厢霍乱流行，谷埠街死亡20余人。

民国10年(1921年)5月，革命党人刘震环攻占柳州时，覃超自封第一师部指挥，其部黄超武营在谷埠驻扎。

7月，黔、滇军人侵广西，攻进柳州缴了驻扎在谷埠的黄超武营，并盘据谷埠。

民国11年(1922年)9月30日，韩彩龙、韩彩凤、韩彩辉军进占柳州，其部在谷埠、小南路、香竿街大肆抢掠。

同年，大同、接云两街合并为一街，叫大同巷。

民国12年(1923年)第四集团军于今飞机场靠帽合村旁建陆军营房，称为标营。

民国13年(1924年)7月，柳江大水，俗称“甲子”大水。辖区沿江一带等地被淹。

民国14年(1925年)动工修建飞机场，伍廷颺担任总指挥。

民国15年(1926年)谷埠开辟为市场，拆迁沿河民房，修筑由鱼峰路直达河岸基地。修建汽车渡码头。

同年，磨滩黄启清、黄启顺、梁少记领头发起募捐，于飞鹅路东段竹鹅溪处兴建一桥（木桥）取名“鹅岗桥”，后累因大水冲垮，又由以上诸人倡议募捐，复于1945年重建石桥，并立碑记其事。

同年，开始修筑柳邕公路。

民国16年（1927年）7月，柳州成立市政筹备处，开辟谷埠马路。

10月，柳州统税征收局在谷埠街设一“三等分卡”专司查验河南陆路进口货及征收税款，至1931年裁撤。

民国17年（1928年）3月，省府在大龙岭（今柳州东站）兴建“物产展览馆”开辟马路，为省会迁柳作准备，次年春，“武汉事变”牵动广西政局，计划落空。

5月，省府在鹅山下筹办师范大学，10月停办。

7月，柳州发大水，辖区河边巷等处受灾。

8月，广西第七军司令部在辖区鹅山旁建立一座无线电台，为柳州的第一座无线电台。

8月中旬，因“乾元山庄”所属土地，马平县决定收回公有，与谷埠居民发生纠纷，当时谷埠董姓控告官府，结果民胜官败。

同年，柳州第一个司法机关“柳州地方法院”在文笔路（今柳州第二空压机厂五交化商店处）建立，负责人为王心伟。

同年，云头岭改为云岭街，民国二十八年改为老龙巷。解放后扩建街道，1966年改为红阳路。

民国18年（1929年）2月，第一师在帽合标营前筑飞机场，3月竣工，粤“中山”号飞机首航柳州。

同年，谷埠街进行改建，由爵力公司承建，扩宽街道，将所有闸门拆掉，改建成为现在的街道。

民国20年（1931年）广西航空学校飞行教官司徒霭驾机高空作技术表演，因飞机失事，在竹鹅村附近水田坠落，机毁人亡。

5月，首间粉笔厂创办于谷埠街。

民国23年（1934年）4月4日，第四集团军在辖区建立航空学校（柳州机场）。

7月9日，驻柳第四集团军航空管理处组织一次全国空前的大规模防空演习，京、沪、穗等相继仿效。

春，中国空军第五航空站在麻疯湾兴建自来水厂，于同年夏投产。

同年，桂系第七军在辖区进行构筑战壕和碉堡，南起柳邕路、老龙巷，穿过公路绕城站经飞鹅路达红庙河边，全长约四公里。解放后大兴城市建设，已把壕沟填平，碉堡毁掉，今已无迹。

民国24年（1935年）7月4日，柳州地震，震级五级，谷埠街受震较严重，居民房屋均遭不同程度的损失。

同年，谷埠小学改为谷埠幼儿园，为我辖区第一间幼儿园。

同年，湘桂铁路材料供应站在柳邕路建成。

民国25年（1936年）夏，广西航校将日本顾问遣送回国。

10月，西南航空公司于柳州机场设柳州航空站。

11月25日中午，“长庚”号机首航柳州。

民国26年（1937年）9月13日上午，20余架日机侵入柳州，轰炸飞机场等地，我机与日机空战，高射炮向日机射击。此次空战我方战死8人，伤6人，共损失340,000元国币。

11月，扩建柳州机场，次年5月竣工。

同年，开辟谷埠码头至麻疯湾口为汽车渡河码头，同时兴建飞鹅路（即谷埠下街至南站的大路）。

民国27年（1938年）4月，黔桂铁路以柳州南站为起点，在柳开工筑建。

同年，柳州邮政局在柳邕路建一邮政大楼（今航空站内），1944年被日寇焚毁。

同年，柳州邮政局在南站开设邮政支局。

民国28年（1939年）7月8日，日机轰炸柳州机场，设备大部分被毁坏，被迫暂停使用。

12月5日，苏联志愿援华空军进驻柳州机场，与我空军一起支援昆仑关与日军作战的地面部队。

12月30日，日机18架犯柳，被苏联志愿队和我机击落8架，

为本年空战最辉煌战绩。

同年，柳江县防空指挥部开辟牛仔岩为防空洞。

同年，接云街街长李向春发动群众捐资，于今大同巷二里建立一所接云街校。

冬，县府奉命征集民工破坏柳邕公路，次年修复。

民国29年（1940年）12月，柳江火车站（今柳州火车站）建成通过。

柳州洪水，水位83.75米，辖区河边巷、麻疯湾、红庙等处受淹。

民国30年（1941年）2月，柳州城站（今火车东站）建成，同年11月21日开站通车。

3月7日，湘桂铁路管理局、广西农事试验场、广西家畜保育所联合举办国内首创农产品巡回展览专车，展品2000余件，往返于柳（州）衡（阳）铁路沿线，第一天观众达二千余人。

春，扩建柳州机场，年底竣工，成为美国志愿空军使用基地。

6月，私立北平香山慈幼院小学部（简称香山慈小）由三江迁到柳邕路上段（今柳邕一小处）设校。

12月1日，湘桂铁路局开办包裹保险运输业务。

同年，于城站西段，跨竹鹅溪处兴建一桥，取名新桥，1969年10月重建，改名新风桥。

民国31年（1942年）夏，日机侵柳，谷埠被炸，投下的燃烧弹烧毁东面十余间房屋（由20号——尹振兴44号止）。

同年，在柳邕路（今第二居委会辖段）山脚塘边建一间私人开的大成印刷厂，柳州沦陷时为日军所焚。

40余户缅甸归侨在沙子岭附近建屋聚居。称“华侨村”。1933年秋，废。

民国32年（1943年）美商“美孚洋行”石油公司在今城站南二巷设一仓库，商标为“飞马”，人称“飞马仓”。

民国33年（1944年）7月28日~10月5日，日机先后出动14批87架次袭击柳州机场和铁桥。

8月15日，南站发生大火灾，共焚毁房屋140余间，灾民1,000多人，大批堆放在旅社、栈房的物资化为灰烬，损失惨重。

8月中旬，柳州大疏散时，在城站等待乘车的难民万余人，秩序混乱，一张1,129元的二等车票黑市价卖1万元（国币）以上，10月上旬绝大多数难民被迫徒步离柳。

10月上旬，柳州机场经常保持有美机50架协同地面部队作战。

11月8日，部队开始破坏柳州南、北火车站和炸毁铁路大桥。晚，美国空军撤离柳州。

11月1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柳州。

民国34年（1945年）6月18日~27日，国军与日军在张公岭、飞机场、南站展开争夺战。

6月29日，日本侵略军败退柳州，柳州光复。

9月，飞机场成为美空军重要基地，每日平均5分钟有一架飞机起落。

9月13日，中国航空公司渝柳线复航。11月19日，辟柳昆、柳穗线（1936年6月，各线停航。1938年9月19日复航）。

10月5日，接云路火灾，烧掉民房百间。

同年，麻疯湾更名为“华丰湾”，是取华夏丰足之意。

同年，国民党军队在今华丰湾五四四六五部队处，建有一所外科医院。

民国35年（1946年）春，国民政府将湘桂与黔桂铁路合并，组成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局址设在鹅山新村。

5月，由黔桂线都匀医院改组迁柳成立柳州铁路医院，院址设在老龙巷。

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在今鹅山四区22号，创办扶轮第一小学。

7月15日，柳州航空站裁撤。

同年，云头岭、老龙巷一带天花流行，死亡儿童达数十人。

同年，扩建飞鹅路。

同年，屏山镇中心校迁到云头岭（今市六中处）建校。

同年，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的援助下，并得到空军第五航空站的帮助，修复和扩建华丰湾自来水厂，改名为柳南水厂，于1947年2月开始向河南市区供水。

民国36年（1947年）2月9日，湘桂黔铁路局举行庆祝成立一周年大会。

3月15日，谷埠街一店铺骑楼被汽车撞倒，压死1人，伤16人。

6月15日，湘桂黔铁路局的交通车开始行驶于鹅山新村至浮桥头之间，日往返7次以上。

8月23日，柳州铁路医院由老龙巷迁至鹅山新村，10月改称湘桂黔铁路医院。

民国37年（1948年）1月1日，湘桂黔铁路平剧院在鹅山中正堂公演平剧“别窑”“花田错”很受群众欢迎，一时轰动柳州。

1月13日，城站苦力工人“本地帮”和“外来帮”发生斗殴，军警出动弹压无效，双方数人重伤。

3月17日，由柳开赴梧州的“汉兴”轮船在车渡码头附近沉没，损失大米3,000斤，药品数箱，行李甚多，无人伤亡。

7月2日，辖区发生一桩怪事，西闸巷61号女骗子覃妹女扮男装讨老婆邓××，成婚，邓诉公堂，此覃妹常以男装骗妇女玩，真为世间怪事。

同年，基督教会，于辖区今维新66号设教堂一所。

同年，屏山镇中心校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陆寇昌、尹曼华等开办识字班，组织附近工厂的女工和童工学习，接受革命和文化教育。

民国38年（1949年）1月8日，辖区湘桂黔铁路工程管理局，柳州机务段的工人开展索薪罢工斗争，数百工人冲击和包围局长大楼，迫使柳铁当局补发拖欠职工的工资。

3月，中共柳铁地下党组织工人举行罢工包围局长办公大楼，开展反饥饿斗争。

7月26日，中共柳铁地下党组织领导铁路工人开展“停工待命”

的索薪运动。

7月，“萍乡被服厂”从湖南迁来柳州于现在二级站仓库和农机厂处建厂。

8月10日，柳江洪水暴涨，水位最高峰为89.31米。是自清光绪二十八年以来的四十七年间第三次大洪水，把南站、飞鹅路、河边巷、华丰湾一带淹没，居民遭受严重损失。

11月12日下午，白崇禧逃到柳州。于24日下午又匆忙从柳州机场乘飞机逃离。

同年，柳邕路改称贤良路。

[补白]

芙蓉与薜荔

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刺史》诗中有“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句。芙蓉又叫木莲花。据《柳州县志·物产》中说：“开花有红白二种，又有开时其色数易，早白浅红，午暮深，谓之醉芙蓉，千叶者尤佳”。如今，这种醉芙蓉已很少见。至于薜荔，它又名爬山虎，是攀缘墙壁而生的一种攀缘植物，现今仍有不少住宅种植它，作为观赏植物。这种植物耐旱，攀附能力强，尽管有的墙壁为瓷砖墙，它也能攀附上去。

(小秋)

小统计

解放前，柳州是座消费城市。1949年只有3平方公里市区，19家小型工厂，工业总产值为913万元，市区道路12公里，9万平方米，仅谷埠街为水泥马路。城市供水能力不足54吨，房屋建筑面积140万平方米，多为泥木结构，最高房屋为位于河北大桥头，现已拆掉的覃连芳的五层钢筋水泥结构楼房。

(方可)

绿 化

柳州解放前，市内只有柳侯公园等处共8条街道有行道树，公

共绿地面积仅 6.4 公顷，人均公共绿地为 0.4 平方米。如今，人均公共绿地为 5.22 平方米。街道绿化及行道树已遍及大街小巷。较有代表性的有：树石点缀，景色秀丽的文惠路；幽静高雅的北站路；景观较好的友谊路；遮荫较好的解放北路、龙城路；突出市树小叶榕的解放北路；突出南洋杉的潭中路。

(南人)

柳侯公园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 819 年）柳宗元病逝柳州，年仅 47 岁。公元 821 年，柳州人在罗池旁建“罗池庙”纪念他。宋代追封柳为文惠侯，罗池庙遂更名为“柳侯祠”。清光绪 32 年（1906 年）秋，地方名流倡议以柳侯祠为中心辟建公园，宣统元年（1909 年）定名为柳侯公园。经历年整修扩建，至解放前面积为 3.07 公顷至今为 18.5 公顷，为市区内设施完善的公园，1990 年游人量达 214 万人次。

(小柳)

辖区内的桥

柳南辖区在四个城区中，是大小桥梁最多的一个区，共有 17 座跨水桥梁。铁路大桥南端在辖区内，北端在柳北辖区，桥下柳江河则归城中区管辖，是三个辖区交汇之处。辖区内最长的桥为飞鹅桥，桥长 63.06 米。30 米以上的桥有铁板桥、砂布厂桥、上游桥、柳太路一号桥、桥太路 18 公里桥。其余均在 30 米以下，最短的一座桥为造纸厂桥，它跨鹅溪，仅长约 4.7 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上余)

名厂名牌

柳州市 1949 年全年工业总产值仅为 9,133 万元。1990 年年产值达 50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1992 年年产值已超百亿。1993 年欲达 130 亿元。柳州工业在区内外甚至海外也有一定影响。柳南辖区的柳州水泥厂、工程机械厂、柳州第二空气压缩机厂、美陶厂以及柳州微型汽车厂等一大批企业的名牌产品，已扬名海内外，产品受到客商青睐。

（海工）

旧时柳州妇女

旧社会，柳州妇女受“四条绳索”束缚，即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束缚。柳州城乡的富商、官僚等普遍有纳妾蓄婢养童养媳的习惯，有的妇女被迫用来抵债。三十年代，柳州人口仅三万人左右，竟有妓女一百多人。1908 年以前，柳州没有一所女子学校，大革命时期，柳州女童入学率不到十分之一，上中学的就更为凤毛麟角。当时的四中（今柳高前身）学生有数百名，女生仅有 20 人。

（柳人）

旧歌谣

柳州旧时歌谣：“一龙二狮滚金球，三川九漏四码头；五庵六寺七里路，十街八巷任君游”。

“一龙二狮”，指的是柳江河和柳侯公园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如今，不少单位和酒楼门前也雕塑有石狮作装饰，龙城已不仅只有二狮了。

(小君)

街道的命名

柳南辖区街巷的命名，颇为有趣。如抗日战争时外来侨胞多集中住在文笔路的两条新开辟的小巷内，则取名侨家一、二巷。东风路上一小巷内居民多以做竹工为业，则取名为竹篾巷。文笔路因西面正对文笔高峰，故取名文笔路。磨滩路因位于磨滩村旁而取名。龙屯路南端有龙屯村而得名。百饭路北有百饭村而命名。石烂路因西有石烂村而得名。柳邕路因路通南宁而取名，柳石路因路通石龙而得名。至于谷埠路因旧时为谷物集散市场则为人人所知之事了。

(石谷)

古时柳州瘴气

瘴，《辞海》条解释为：瘴气，旧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如人在山林间或在山林周围生活，常受这种湿热蒸郁，就会致病、身感不适、晕厥，严重的甚至导至窒息死亡。明代桑悦有诗曰：苦奈气候异，因兹瘴疔虐。金虞有诗曰：蜓风瘴雨天漫漫。戴朱弦的诗句：蛮溪雾毒苍虬舞。元代陈孚的诗句：水毒人多病，烟昏马易惊。韩守益的诗句：庭树参天绿，柳来瘴疔清。蓝智的诗句：草寒初息瘴，林曙欲浮岚。林爱民的诗句：候烽靖瘴烟。孙洵的诗句：使君游宦地，言在瘴乡边。柳宗元的诗句：瘴江南去入云烟。王维的诗句：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等等，说的都是柳州的瘴气。古时柳州四处森林覆盖，柳宗元的“城上高楼接大荒”就足以说

明这点。由于山林多，柳州瘴气就重了。

(伐西)

旧时归侨悲惨遭遇

1946年7月20日柳州归侨主办的一份《业务旬报》16期上，刊登有一篇反映归侨悲惨生活的报道。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在柳的归侨们所住的，是金字塔形，高三四尺，广六七方呎，用破草席，碎砖盖搭成的住所，简直是猪圈，说不定“屋子”也够不上编钉门牌的资格，竟挤下两三户人家，哪里有户籍呢？因此，按规定是不发给赈品，不予救济的”。

柳州归侨住的条件如此恶劣，吃也够可怜的。另一段写吃的是这样的：“经本会向善后救济总署交涉，获准发给赈米……大人每名十斤，小童每名五斤，合计得到救济的485人，仅占总数三分之一左右……一点点救济品，哪能活得命，因此每天都有饿死的”。

(南人)

跋

《柳南文史》从1988年11月到2001年7月共出十辑，时间跨度十三年之久，凝聚着历届从事政协工作的柳南人及热爱、关心人民政协事业的有识之士的智慧和心血。因年代久远，历史的渐行渐远，文稿涉及的史实近百年，可谓弥足珍贵。浩瀚桑海，岁月如梭，随着自然的变故，文献史实就像大海沉船散落海底的珍宝一样，将淹没和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我们本着留史存真的目的，使文史资料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作用，组织财力、人力对行将散失的《柳南文史》1—10辑加以甄别、录入、汇编、排校等发掘和整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这部洋洋大观的书稿得以付梓出版，这是柳南区第七届政协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柳南人的一件大事。我们坚信该书的问世，将为世人了解柳南区发展史提供一条捷径，必将得到研究柳州乃至广西发展史的专家的喜欢和广大读者的垂爱。

收集文史资料、抢救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为尽快完成《柳南文史汇编》1—10辑的整理、汇编，柳南区政协组织力量，开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在汇编该书的两年中，一直得到中共柳南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而确保了我們全体工作人员得以全力地开展一系列汇编校审工作，并顺利地完成了汇编的重印任务。

为了保证该书精选精确，我们组织编务人员对10辑书稿进行全面的录入后的校对、审核、把关，对各方面材料进行查核、取舍和补正。汇编工作人员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经反复传阅、广征博取，合众人之力，集两载之功，几易其稿。尤其该书得到我市散文作家、《竹语随风》一书作者龙家泰先生对《柳南文史汇编》的编整进行了仔细的校阅，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使一些记载不详和有谬误的史实得到进一步核实和勘误。本书在汇编工作中，还得到了广西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柳州太奇高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吉韬先生的关心和帮助。在此，特向龙家泰先生、黄吉韬先生和关心、支持该书出版的各级领导以及参与汇编工作的全体人员表示谢忱。

由于我们汇编业务水平的局限和时间仓促，加之文史溯源年限的久远，有些疑案和不实之处，已经无从考稽，这是工作的遗珠之憾，敬请社会各界人士赐教。

蒙凤生

2010.10. 柳州

(本文作者系政协柳州市柳南区委员会主席)

《柳南文史》第1—5辑编委会名单

《柳南文史》第一辑

主 编 程泽欢
副 主 编 何积祯
编 委 潘朝业 陈显达 刘锡香 杨文凤
董咸熙 蔡文魁 董进凯
责任编辑 赵 焰
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准印证№ 8821 号
(1988年11月)

《柳南文史》第二辑

主 编 蒋石明
副 主 编 何积祯
编 委 潘朝业 陈显达 刘锡香 杨文凤
董咸熙 蔡文魁 董进凯
责任编辑 赵 焰
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准印证№ 18—0060
(1989年12月)

《柳南文史》第三辑

主 编 姜新和
副 主 编 杜启勋 章定国
编 委 刘锡香 潘朝业 陈显达 杨文凤
刘春香 韦长文 董进凯 汤 桐
责任编辑 赵 焰
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准印证№ 18-0005
(1991年12月)

《柳南文史》第四辑

主 编 姜新和
副 主 编 杜启勋 章定国
编 委 刘锡香 潘朝业 陈显达 杨文凤
刘春香 韦长文 董进凯 汤 桐
责任编辑 赵 焰

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准印证№ 18 — 000080

(1992年9月)

《柳南文史》第五辑

主 编 姜新和
副 主 编 杜启勋 章定国
编 委 刘锡香 潘朝业 陈显达 杨文凤
刘春香 韦长文 董进凯 汤 桐
责任编辑 赵 焰

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准印证№ 18 — 930044

(1993年10月)